XU JIYU AND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EAST AND WEST

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任复兴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八十七叟董寿平

任复兴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责任编辑：虞和平
责任校对：吕义才　赵光清
封面设计：张鲜花

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Xu Jiyu yu dongxifang wenhua jiaoliu
任复兴　主编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441531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忻州日报激光照排中心
印　　刷　山西省建筑科学研究所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75 印张　6 插页　420 千字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5004－1454－4/K·220　定价：15.00 元



中国近代一些值得注意和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与徐继畬的轶事密切关联。他的《瀛环志略》向东方启蒙些什么？与《海国图志》、《文明论概略》等有何异同？他与林则徐、倭仁等发生过什么冲突？他在腐败吏治下如何砥砺清廉节操？为什么他被久抑不彰？……海内外数十位专家教授和史学爱好者作了深入探讨，发表诸多独到见解，披露一些历史资料，对中国近代史学领域若干重要"定论"有所突破或提出了质疑，为徐继畬这位"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拓荒者、中国近代世界观的创造者和宗师"，在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教育、外交等领域的巨变中充当的历史角色，作了初步的定位。本书是海内外学者通力合作完成的、大陆第一部关于徐继畬的论著。

徐继畬学术研究会

徐继畬学术论文集

徐向前题

一九八一年五月

徐松龕老夫子遺像

徐继畬像

（玄孙女徐惠云捐献）

為弘揚三晋文化
做出新的貢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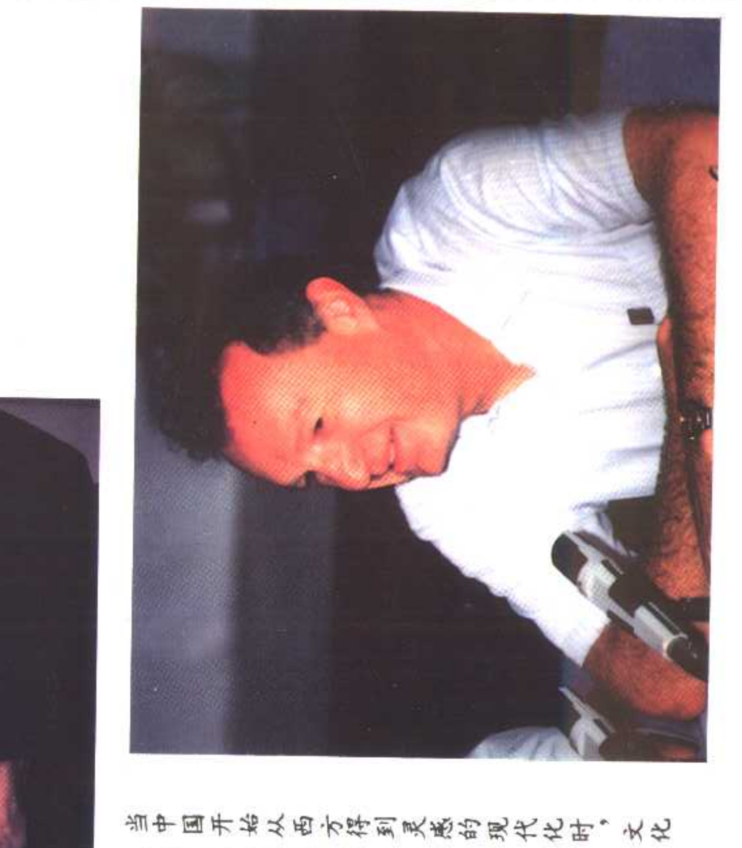
題贈徐継畬与東西文化
交流國際学术討論会

薄一波
一九九一年
七月九日



参加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人员合影

一些值得注意和能引起兴趣的历史问题，与徐继畲的轶事密切关联。他的生涯是一段值得研究的经历。——徐继畲研究的首倡者费正清(John K. Fairbank 1907—1991)



当中国开始从西方得到灵感的现代化时，文化交流则是主要源泉。徐继畲是中西方文化交流这块处女地的拓荒者，充当了中国现代世界观的创造者和宗师的历史性角色。——《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著者龙夫威(Fred W. Drake 1939—)

髫年入塾，窃读乡先正《瀛环志略》书，每思航海西渡，考察拿破仑、华盛顿之战迹，研究卢骚、孟德斯鸠之法理。

——《松龛先生全集》编者阎锡山(1883—1960)

一粒种子，培养得法，能变成遍地谷子，此种能也。徐公《瀛环志略》一书，可使国人早通知世界，大助日本明治维新，成为强国，亦种能也。

——《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著者方闻(1901—)

1989 年 11 月，徐向前元帅听取了徐士瑚关于徐继畲研究的介绍后与其合影。

1991 年 1 月，参加中国革命博物馆徐继畲生平文物展开展式的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与文物捐献者徐惠云合影。

参加徐继畬讨论会的海内外学者到五台县永安村凭吊徐继畬墓。





海内外学者在东冶镇东街“司马第”内徐继畬出生的陋室前合影。（左）

海内外学者在五台县城徐继畬纪念馆观看徐继畬穿过、用过的蟒袍和补子。（下）

1991 年 7 月，美国龙夫威、约瑟夫（左一、右二）、台湾陈存恭（中）、香港潘振雄（左二）等到平遥一中寻访超山书院遗址。

1992 年 9 月，台北赵正楷夫妇（前左一、后左四）、陈存恭夫妇（前左三、后左五）、原馥庭夫妇（后左二、左三）、卢学礼（后左一）、张其祥欢迎第七次访台的龙夫威。

●杜导正

序

我是一个老新闻记者，对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事情了解不是很多。1990年秋，虽然粗糙但还是很有兴味地读了美国德雷克博士所著经任复兴翻译的《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1991年夏，又回家乡参加了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现在论文集《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即将付梓，应好事者邀请，我在此写几行字说点话，勉强叫作序。

读完这本书，听了那么好的学术发言，我以为，松龛徐继畬先生是历史上率先主张吸收西方文明改造中国社会，并且为官清廉的一位先进人物。改革开放和为政清廉问题，是当前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碰到的两个最尖锐最现实的重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松龛先生的远见卓识和优良品质，很值得我们后辈们学习、参考。因此，我觉得研究徐继畬很有现实意义。

鸦片战争以后不久，徐继畬就强烈意识到大清帝国及其藩属国受到西方列强严峻挑战，处在"古今一大变局"之中，他忧心如焚地撰写《瀛环志略》，向国人介绍世界的真实面貌，推崇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主张取法西方文明以图中国之自强。他的这本著作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东方其他一些国家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时间已经过去140多年，全球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当今，任何先进的民族，都不可能仅仅依靠自身创造的文明成果而自立于世

界优秀民族之林。只有敢于和善于吸收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的民族，才是有光明前途的民族。假如引导人们避开现实，避开世界文明潮流，成天抽象地讨论姓“社”姓“资”的问题，热衷于挑起无谓的争端，人为地制造文化壁垒，孤芳自赏，自绝于世界优秀文明之外，那将是很愚蠢的。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已经吃够了这方面的教训，再也不能这么干了。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的曲折遭遇，为我们科学地处理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了一些历史的借鉴。

徐继畬官至福建巡抚，是一省的最高长官，不乏发财的机会。可是他廉谨自守，在职时拒收馈赠的资斧银三四万两；被迫害丢官后，靠教书为生。而且他的祖父、父亲都是五品的府同知，相当于今天的副专员级，也都有廉名。这可以从至今幸存、徐继畬出生的“司马第”的简陋状况看得出来。徐家三代清廉一脉相传的事例说明，即使在封建专制时代的清朝，为政清廉的官员也并不乏其人。似乎这也是清朝统治地位得以巩固，国家相对长治久安，皇朝能够绵延二百六十余年的一个重要原因。“乾坤正气赖支撑”，这是徐继畬的诗句。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发扬中华民族为政清廉的传统，对于今天消除腐败，加强廉政建设，也是大有裨益的。

世间的事物通常是经过长期量的积累，而后发生急剧的质变。近年来，世界政治格局又呈现出一大变局。有的史学家推断，这一变局预示着东亚的崛起。对我们这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这既是严峻挑战，也是重大机遇。中国应该在东亚崛起中，在未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中，占据与其历史、幅员、人口相称的地位。能不能像徐继畬等当年主张的那样，“兼容并包，智周无外”，大胆吸收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迅速发展自己，使中华民族冲在世界前列，再现一个辉煌的时代，这对炎黄子孙的理性应变能力，是一次重大的检验。

1992年8月

王庆成

序

徐继畬以所著《瀛环志略》而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部介绍外国地理历史的十卷著作，在1848年初版时尚无重大影响，但在六七十年代后却成了当时中国人追求新知、力图自强的启蒙读本，对促进中国人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起了很大的作用。

徐继畬著作的这一际遇不是偶然的。鸦片战争中，外国侵略者以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把闭关自守的中国强行拉入世界，拉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但中国的统治阶级对这一形势全无认识。中国皇帝以天下共主自居的旧体系，事实上已遭沉重打击，但统治集团所谓战后的种种检讨和善后措施，全然谈不到对世界和中国的真实情况有新的认识。而且这些措施也大都停留在纸面上，依然是文恬武嬉的泄沓局面。《瀛环志略》是徐继畬参考利用西文资料花了五年时间写出的，它介绍了亚、非、欧、美几大洲几十个国家的地理、历史概况，并且推崇一些西方国家的人文制度。这是与中国传统上对世界秩序的观念不相容的。打破这种传统观念，切实认识外部世界，是中国人切实认识自己民族的危机和奋力自强的起点。而要做到这一点，对外国史地人文的介绍往往是有力的武器。当时的先进人士林则徐、魏源、梁廷枏都重视了解外国，他们的《四洲志》、《海国图志》、《海国四说》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都是同时代的作品，都具有启发国人睁眼看世界的意义。《瀛环志略》出版后十年，洪仁

玕到太平天国，据说天王府所挂地图，除中国以外只在西北方有英、法两岛，洪仁玕上书洪秀全建议取消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夷狄戎蛮鬼子等字样，同时介绍了英、美等十余国的情况。在当时，介绍外国的意义是远不能只从地理学着眼来衡量的。但在四五十年代，多数士大夫还不能认识战争失败的意义，还没有感到认识外部世界的需要，这就是《瀛环志略》初版时曾受冷落的社会背景。

《瀛环志略》出版时，有些士大夫从华夷有别的陈旧观念出发，批评它为外夷张目。但这是私人的评论；徐继畬在书成后三年被免去福建巡抚，降级内调，并不是直接由于这本书，也不能说是由于守旧派的打击。徐继畬在书成后三年被免去福建巡抚的直接原因，是由于他对英国人强行租住福州城内神光寺一案的处理受到了批评。五口通商初期，外国人是否可以住在港口的城内，曾在中外关系中引起巨大争执。广州入城问题的多次冲突是最突出的；福州的神光寺一案也引起了清政府官员内部的争论，而徐继畬在此案中是首当其冲的。从 1843 年起，经耆英奏准，徐继畬以福建藩司主办福建的福州、厦门二口的通商事宜，升任巡抚后仍是福建夷务的主持者。耆英和闽浙总督刘韵珂密折陈奏，认为福建的夷务少不了徐继畬。刘韵珂认为他素为夷人所信服，是办夷务的能手，道光二十六年十月，徐继畬有调升广西巡抚之命。刘韵珂密折挽留。他对比现任福建巡抚郑祖琛和徐继畬，说英国人从来不去郑祖琛那里，有事总是求地方官带去藩司衙门商议，一经徐"相机开导，靡不帖然悦服"。道光帝立即将郑祖琛、徐继畬对调，郑调广西，徐改福建。这一事实说明，徐继畬办夷务曾得到朝廷的赏识；据此也可以澄清前人所写的徐继畬传记中说郑祖琛是由于贪图广西梧州、浔州的关税收入而主动要求调广西之说。徐继畬在福建，早在道光十五年就经办过英国领事李太郭租住城内积翠寺之事，并未发生大的纠纷，到道光三十年五月，英国领事进一步为两名传教士租住城内神光寺。此事与徐继畬原与英国人商定的领事可住城内、夷商住城外的

协议不符，但徐继畬不愿采取坚决的措施，引起了当时刚退休回籍的林则徐和其他绅民以及福建籍京官的反对，认为官府办理太软。林则徐等认为应断然驱逐强租者出城；为预防英国武力恫吓，立即募勇、演炮，加强武备。这时，道光帝去世，咸丰即位，朝廷对外国的态度转趋强硬。刘韵珂、徐继畬终于在皇帝多次对神光寺案的质询声中先后去职。

对于这件事的是非，当时人和后人都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本世纪 30 年代有人在谈到英法联军之役时说，“外人入城本无关轻重”。的确，从今天中国与外国已建立平等关系的条件下，开辟通商口岸，外国人入城居住都不是什么问题，但在当时，中国是作为失败者而被迫开放的，开放本身还伴随着其他的不平等条款如领事裁判权等。外国人在战前曾抱怨中国不给他们以平等的待遇，但他们在战后却是“自大自高”、“肆意贪求”，还常以战胜者的优越感欺凌中国人。广州有过多起外国人无故殴打、刺杀中国人的事。福州也屡有“民夷争殴”的事。一名英国人因细故用木棍殴打民人林森森，林畏惧逃走，英国人还穷追不舍，又打坏前来劝阻的中国商人店铺中的油缸。次日，英国人的通事又仗势开枪打伤前来评理的中国人。一名外轮上的人因买烟丝，无故用刀戳死戳伤中国人各一人。两名外商的通事用鸟枪打死打伤两名孩子。这些仅仅是官书上的记录。上海似乎没有什么矛盾冲突的材料，因而被有的学者认为是华夷相安无事、友好相处的典范。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几年前我在英国发现了两份当时上海人民的手写传单。一份是通告北门外有田地坟墓的乡民起来驱赶击杀强毁田庐、强筑马路的英国人。另一份控诉外国人从“通商以来，妄作妄为，肆行无忌，以烟土害人性命，以夹板船夺我利源，强租硬占，毁掘坟墓，闯入城中建鬼楼不计其数，并且要开马路，开马场，在松江府起天主堂，罪恶滔天”，号召百姓掩杀扑灭。这些材料表明，鸦片战争结束后，和约虽然订立，但中国人和外国之间存在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冲突。反对

外国人入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引出的，是中国人在外国已经入侵的条件下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防卫。尽管这种防卫即使获得成功——外国人不住城内，也并不可能消除中国人遭受的侵略和欺凌，但不能否认这种防卫并不是单纯的排外，而是对外国入侵的合乎当时历史条件的反应。在条约中，外国人是否可住在通商口岸城内，并无明确规定；就福州而论，徐继畬说曾有领事可居城内、其他人应居城外的协议。既然如此，林则徐等要求巡抚采取坚决手段处置神光寺一案，是合理又合法的。

当时，清朝中央政府内部有着允许外国人入城的主张。道光二十九年广州入城问题吃紧，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认为外国人入城是无关紧要的事，万年和约是一劳永逸之计，不可因入城问题而启衅。徐继畬在福州入城问题上的做法，很受穆的影响，或者说有类似之处。他在《谢政归里祭主文》中自述，他之所以为言路所攻，是因为“不肯轻开边衅”。他在福建与外国人办交涉八九年，对他们的骄横是有亲身体会的，曾说：“从前为委员时每与此辈周旋，何尝不惭恨在心，思得而食其肉？”他之所以委曲求全，在认识上是由于他比较强调英国人武备之优越，认为无论水战陆战、海上内河，都是中国难以制服的。这也是他和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区别。在中国被迫打开大门之初，林、魏和徐继畬都是睁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徐的《瀛环志略》在介绍西方史地人文的详实方面还有其突出的优点，有很大的启蒙意义，但它没有直接地回答中国面对这样的世界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也就是如有的学者已指出的，它没有如林、魏那样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我想，这与徐在福建的对外交涉中的表现，是互为表里的。

●阮芳纪

序

任复兴先生主编的《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一书，是由徐继畬学术研究会和近代史研究杂志社、历史研究杂志社发起，并与山西大学、山西省文史资料委员会、山西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共同举办的，于1991年7月在山西省忻州市召开的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收到的论文选编，其中还选了少部分会后收到的论文。

由于我做为历史研究杂志社的成员，参与了会议的筹备和学术讨论的组织工作，任复兴先生执意要我也写个序，实不敢当，但又盛情难却，就只好写一点与会的感想来应命，并借此机会表达我对本书出版的祝贺。

以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为主题召开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我国事属首创，也由于会议主题意义深远，因而引起了国内外学术同仁的广泛兴趣。应邀到会的国内外、海内外学者就有60多人，会议收到的论文也有30多篇。与会的学者都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贡献。在这里还需要提到的国内外学者，包括到会的和没有到会的，如，美国的前不久谢世的费正清先生、台湾的《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的编者方闻先生、赵正楷先生、卢学礼先生、陈存恭先生和美国的《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一书作者龙夫威(Fred W. Drake)先生，以及阎志洪先生、梁伯华先生，北京的徐氏族人徐士瑚先生

等，也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为会议做出了贡献。这里请允许我表达会议的发起和举办者对所有学术同仁的谢意。

下面谈几点个人粗浅的感想。

首先就我国的徐继畬研究做一点粗略的回顾。自 1848 年《瀛环志略》问世到 1949 年前，这整整 100 年，除了先后出过《瀛环志略》的几种不同版本，出过退密斋的文集及时文、诗作，阎锡山编印过《松龛先生全集》和《松龛先生家书墨迹》影印册等外，还有一些很简略的徐继畬传。上述徐继畬著述等的问世，特别是阎编的全集出版，在资料搜集上自然功不可没，但也还远不能说是完备的。特别是就徐继畬的研究来说，可以说没有什么成果。这以后再过 30 年，也就是到了本世纪的 70 年代末，就大陆来说，对徐继畬仍然缺乏研究，在众多的中国近代史和晚清史的论著中，徐继畬和《瀛环志略》并没有其应有的位置。进入 80 年代，随着国家的对外开放，大陆学者对徐继畬的研究开始多了起来。1981 年 6 月出版的胡绳先生所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在论述鸦片战争刺激了由林则徐开其端的中国人开始寻求对世界各国新知时，把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和魏源的《海国图志》并列，指出它们是中国系统介绍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各国的历史和地理的最早两部书。紧接着，研究徐继畬与《瀛环志略》，有关徐继畬的专文、徐继畬的小传、研究《瀛环志略》的内容、版本、影响、介绍国外对徐继畬研究、《瀛环志略》在日本的传播等方面的成果先后问世，进而合乎逻辑地把徐继畬放到了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志士仁人群体中加以研究。由于研究的开展和逐步的深入，对资料的搜集和考订工作产生了很大的推动。各地的学者对《瀛环志略》的稿本、各种版本，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考订工作。特别是在徐继畬的家乡——山西省，学者们下大力气搜集徐继畬各种著作，着手编辑约有 300 万字篇幅的更加完备的《徐继畬全集》，编辑徐继畬的年谱，采集徐继畬的文物，筹办徐继畬的生平展览，筹建徐继

畲纪念馆，筹备建立徐继畲学术研究会等等，同时，国内外、海内外研究徐继畲的学术交流，也开展起来了，任复兴先生也承担起了翻译《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一书的工作。进入90年代，前面10年的努力，已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徐继畲与东西方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当然也包括本书的出版），正是这些成果的一个集中表现，同时也可以说是徐继畲研究达到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其次就徐继畲的研究谈点感想。这次讨论会上，学者们从众多的方面探讨了徐继畲和他的代表作《瀛环志略》，使我获益良多。这里只就会上有一种比较强烈的意见，认为以前对徐继畲研究存在一个大的问题是评价不公正，再就是徐继畲回答咸丰皇帝询问林则徐为人时说的"忠正，惟不悉外情，致误事机"，多被引证和认同，谈点感想。历史人物的研究是历史学中一个重要内容，也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中国的二十四史有重视历史人物研究的传统，但也有重要的不足，如许多传记只是满足于简单的褒贬忠奸，就是一个重要的不足。而这还影响到后来的一些人物研究，如对历史人物只局限于简单的定性评价，以致于对一些历史人物的看法分歧和争论也大多是围绕着这一点。其实，对于历史人物，历史学应该重在于研究，应该重在于把历史人物活动的时代背景和基本史实全面、准确弄清楚，然后在此基础上给予科学的说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当然是需要的，但它只是科学说明的一部分，而且如果研究不全面、不深入，恰当的评价是无从谈起的。至于简单的定性评价，那是回答不了什么问题的，它本身就是缺乏研究的产物。如果具体说到徐继畲的研究，那就应该侧重于研究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产生了他这样的人物，他在历史上起过什么作用，和他的前人、同时代人比较，他达到了什么程度等等。如果把这些稍加展开，是否可以提出一些问题，譬如徐继畲如果一直在山西，或在北方，即使他的学识、志趣也是一样的，但他没有到过福建、广东等地，也没有办过"夷务"和接触雅裨理等人，那么，他写出来的著作，很可能是《圣

武记》、《朔方备乘》之类的，而不会是《瀛环志略》；再譬如与徐继畬差不多同时在广东、福建当督抚、道台的，办过“夷务”的，和外国人有接触的，也大有人在，那么，为什么徐继畬写出《瀛环志略》，而别人没有写出来。诸如此类的问题，可以提出很多，这里只是举点例子，目的无非想说，对这些问题如果加以研究和回答，那对于徐继畬的研究较之简单地给他一个什么评价无疑是要有意义得多。当然，也得承认以前对徐继畬的评价不仅简单，而且也确有不公允，把徐继畬定为主和派说他主张对外屈服就是一个明证。但是，以前很长时间对徐继畬在“开眼看世界”的地位和作用，不了解或是忽略，甚而抹煞，恐怕是存在着的更主要问题。而这些从根本上说都是与对徐继畬研究不够有很大关系的。同样，用“不悉外情”并引申出“致误事机”来评价林则徐，从根本上说，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其中恐怕包含有徐林之间个人恩怨成分，恐怕也不公允，而这也是与对林则徐以及林则徐与徐继畬关系等研究不够有很大关系。因此，对徐继畬的研究虽然可以说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这正如要登五台山还只走到忻州一样，后面的路还长，还需要我们去努力。

再次就东西方文化交流问题谈点感想。人类的历史，总是不断地从古而今地发展着，在这个纵向发展过程中，随着人类走出远古的互相隔绝状态后，各国的历史又总是在与其他国家程度不同的横向联系中发展的，而且愈到近代，横向联系就会愈加密切。这个纵横联系，对每个国家的历史发展，都有重大的影响。明代以前的中国，特别是汉、唐时期，历史文明的发展居于世界前列，就是明证；明代以后，中国在世界上落伍了，又是一个反证。这表明，对一个国家历史文明来讲，纵的积累和横的借鉴的有无、多少以及互相关系的优劣，就会对它的发展产生高低、快慢、文野差别的。鸦片战争打破了清朝的闭关，这是在经历了差不多400年后，中国重新打开对外的大门，但不幸的是，这一次是被迫和被动的对外开放。当

然，被迫开放之中，也发生了某种主动，由林则徐、魏源开其端，包括徐继畬在内的一些先进者，就属于这一种。虽然在很长时间内，他们不同程度的主动还只有量的意义，但它却预示出了历史的新希望，是很可贵的。前面说过这次讨论会可以说是徐继畬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不单是说这次会对徐继畬的研究有许多新的认识，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这次会把徐继畬的研究放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进行的，诚然，今天来回首徐继畬那个时代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应该说那还只是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始初阶段。美国牧师雅裨理等人来了，介绍了一些域外的知识，在当时应该说具有很高见识的徐继畬顺应历史潮流如饥似渴地汲取了这些知识，而且作为位居封圻的大员能够用5年的勤奋写出了《瀛环志略》一书，随后《瀛环志略》又流传到海外，这些都是切切实实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也是弥足珍贵的。无独有偶，在《瀛环志略》问世127年后，又一个美国人龙夫威用了多年的辛劳写作出版了《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这里不由我不想到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中美文化交流。前面提到的各国历史发展的纵横关系，中国的特点是纵向发展特长，而且在历史上曾有过横向发展也很长的时代；而反观一下美国的特点，却是横向发展特长，这仅从雅裨理到龙夫威，也是可以看出这个特点的。我曾和一些美国学者谈过，中美两国历史发展特点不同，表明两国文化交流对彼此都是需要的和有益的。同时我还说过，本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横向发展上划了一道，这是近代以来主动的对外开放，这一道了不起，是顺应了长期以来中国历史的迫切要求，也是适合于世界历史的潮流，是有划时代历史性意义的，过几百年后再回头来看，相信一定会看得更清楚。话再说回来，对徐继畬的研究，就是应该把他放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之中，放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特有的历史发展的纵横坐标上，这样也许才有可能全面、准确地把握徐继畬，进而对徐继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做出科学的说明。我们热切地期待着徐继畬研究的更多新成果的出

现，热烈地欢迎日益扩大着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空前繁荣时代的到来。

1992年12月3日草于北京

目　录

CONTENTS

●[台]陈存恭

徐继畬事略及其《瀛环志略》

前　　言

16、17世纪欧人东来，武装商船自水路向华南，武装移民自陆路向西北、东北，对中国形成包围夹攻的态势，中西关系因而大变，惟因其人数不多，兵员更有限，中国兵多势众，尚可自保。[①]又二百年后，英国集船舰四十余艘，海陆军四千余人，前来叩关，清廷调兵遣将，动员十数万，竟不能敌。鸦片战后，西人挟船炮余威缔造不平等条约之结构，凌辱中华，而我朝野对西方世界了解不够，对策难筹。或坚强对抗，或忍辱抚绥，意见分歧，其能虚心研究西事，知己知彼，拟具肆应之方者，殆如凤毛麟角。邵阳魏源、五台徐继畬，分别著述《海国图志》及《瀛环志略》，为其中之佼佼者。本文简介徐继畬的生平事迹及其对西方的认识，由于鄙人才疏识浅，尚望学者专家不吝指教。

徐继畬的生平事略[②]

徐继畬字健男，号松龛，生于乾隆六十年(1795)，逝于同治十

二年(1873)，享年七十九岁。其先祖洪武时迁山西五台，耕读传家。高祖幼孤贫，走塞外牧牛羊积资而贾致富，设家塾教本支子弟。曾祖邑庠生。祖敬儒，乾隆己卯举人，任官至九江府同知。父润第，乾隆乙卯进士，内阁中书、储运仓监督、施南府同知，治陆王之学，研易理。道光七年(1827)卒于教馆，四年后遗著《敦艮斋遗书》17卷由继畬辑刻问世。

继畬六岁从母续氏启蒙，嗣赴京从父读书，十八岁州试第一，十九岁山西乡试第四。二十二岁主讲五台崇实书院。其后随父、叔(徐寅第)苦读约十年，三十二岁应丙戌正科试，中式，选庶吉士。丁忧服阕后，授编修，转陕西江南两道御史。曾参“州县入省钻营”、“州县讳灾催征”、“退赃诱结”、“藉端科敛”，并请“整顿晋省吏治”、“除大臣回护调停积习”，陈言“政体宜崇简要”。疏数上，道光帝深受感动。十六年(1836)召对，询及民瘼，翌日即擢广西浔州知府。次年调升福建延建邵道。十八年抵任，详禀巡抚《捕治盗匪办法》，境内肃然。

道光十九年钦差大臣林则徐严禁鸦片，遂启兵端，次年英舰窜入穿山洋，闽海骚动，调继畬署汀漳龙道，参与防务。二十一年英舰破厦门，继畬督兵防守，志与漳州共存亡。二十二年正月兼任粮台事，驻泉州。四月授广东盐运使，五月授广东按察使。二十三年四月迁福建布政使。奉命移驻厦门，兼办通商事务。得晤美人雅裨理，询译世界地图，此为《瀛环志略》撰述之始，至二十八年(1848)，五年之间修改增补数十次，方于福州印行。

道光二十六年十月，授广西巡抚，至衢州奉谕入京，二十七年正月抵杭州，调补福建巡抚，并即折回新任。继畬办理洋务信守条约义务，一时相安无事，但广州方面英人与国人争执时起，如何肆应成为重要问题。

道光三十年道光帝去世，咸丰登基。此年三月，回籍养病的云贵总督林则徐返抵福州。此后为英人入城问题发生争执，继畬不以

少数士绅之抵制为然，另有防夷策略，终不见谅于若干闽省官绅，弹章数起，闽浙总督刘韵珂既免，咸丰元年(1851)三月复召继畬入京，降补太仆寺少卿。二年继畬上《三渐宜防疏》，秋简放四川乡试正考官，闱务毕以闽抚任内迟报起解军犯官案，吏部议革职，自石家庄折归山西。

咸丰三年，继畬奉命襄办团练，防堵太平军。六年主讲平遥超山书院，以束修为生。

同治四年(1865)闰五月，召京起用，命参通商事务，以在籍办团练功赐二品顶戴，以三品京堂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此时总领大臣为奕䜣，大臣为文祥。次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重刻《瀛环志略》。六年设同文馆，命继畬以总理衙门行走管理同文馆。七年上《严查教匪以靖闾阎疏》。八年三月乞休。十二年秋病卒。

徐继畬的教育背景

徐继畬自幼治科举业，应试正途出身，历官至封疆，虽办理洋务与众不同，及罢退，于书院教读八股，其政治理念没有脱离儒家传统，而其思想的形成与其所受的家庭教育关系最为密切。他生于官宦之家，曾从母亲、堂叔读书，惟影响他最大者仍属其父润第。父子皆进士登科，皆好读群书博学多闻、皆治陆王之学、皆考注汉书、皆好傅青主学问，[3]相同之处甚多。又儒家教育特重道德修养，其父在道光十八年于湖北施南谕继畬一书，以“佛曰：‘自在菩萨’。儒曰：‘素位君子’。自言涉世勿生‘眷恋之情’，亦勿生‘厌离之念’，苦乐诸境，随缘了达，而己不与焉”。又云：“平昔心中一切私己、薄人、忌妒、冷漠、阴贼、短绝、便宜、巧诈诸念头，凡有伤于天心仁慈公普者，时自翦除，秉一个空荡荡热腾腾底心，委命投诚于天，……”此书嘉许其子著力于“恒忍”、“寡欲”，又教以应酬之道“一曰文貌谦和，一曰语言诚实”。结语云：“做人好，处事妥，文字自高，出人头

地，所谓真实本领，有本原得学问”。[4]嗣后又谕一书，为探本之论，谈心性本体，谓“物物事事，求一可以用忿懥、恐惧、好乐、忧患之所而不可得，而心常虚矣。虚则物我之形骸化、彼此之畛域泯，而内外合一……于性天性海之中，直来直去，纯任自然，无己可私也，无人可徇也，率性而已矣”。结语云：“夫凡物有坏而虚无坏，能虚尚何不恒之足患？”[5]这些教谕对继畬影响重大。

徐继畬其他师友甚多，他幼年时曾就业于高兰墅、王月潭，并与月潭子同学。两氏均为润第知交。又润第曾教学于旗人佶山家，因此学生阿灵阿亦与继畬同学。[6]继畬结交另一类知友属山西同乡，[7]在此不赘。

山西地瘠民困，赖制盐制铁及煤冶工商以为调剂，而民俗自古以来即以“纯朴勤俭”著称于世，[8]可能由于局促一隅，闭塞保守，为重大缺点。[9]徐继畬受故乡环境熏陶，个性质朴刚健，同时受父叔携引出入京师、河南，个人好学不倦，神交古人，其思想言行无“鄙陋吝啬”之成分，反而“乐观进取”，并未受乡党环境不良的影响。至于他思想上并未放弃儒家传统，这是受时空大环境的限制，无可奈何！

徐继畬的政治理念

关于徐继畬的政治思想大致可以鸦片战争为界而分为两个时期，战前全属于传统儒家思想的范围之内，而又以经世实学为其特色；战后因位列封疆筹办洋务（外交）接触洋人，著述《瀛环志略》，意在知己知彼，书中对西方议会政治及民主政体深表倾慕，但其儒家的政治理念仍牢不可破。兹分两点略述如下：

一、忠君与爱民：道光六年，徐继畬以二甲第八十名应殿试，朝考第一，文题《政在养民论》，甚可显示其儒家的政治思想，首先他

说:“生万民者天,而天不能自治其民也。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古圣人陈谟赞化,不曰治民,而曰养民,养之云者,养其身,并养其心”。他申论虞书大禹“政在养民”之言,解释“政”的意义是“天下之民,群待养于圣人,而圣人者,如其愿而与之”,归纳“三王递嬗,通变宜民,制其田里,薄其税敛,经其礼俗,修其政教,大纲小纪,至纤至悉,而其立政之大意,未有异于古也”。[10]这是内圣外王、德治的儒家思想,特点在于民本主义。

关于忠君方面,继畬已将君国合而为一,焉能不忠?他对满清盛世印象深刻,志略卷一提到中国云:“壤尽膏腴,秀淑之气,精微之产,毕萃于斯,故自剖判以来,为伦物之宗祖,而万方仰之如辰极,我朝幅员之广,旷古未有。”[11]又说:“我朝德威远播,悉主悉臣。”[12]肯定清廷武功之盛,并非虚辞。

再其次,继畬亲属既多入仕,他三十二岁中式为京官,至四十二岁得道光帝召见,即擢浔州知府,又次年升延建邵道,鸦片战争时期数迁至福建布政使,至五十三岁(1847)遂升任巡抚。此固继畬能展布其行政才能,得上官赏识推荐,[13]亦道光之善于识拔,他谢恩疏云:“十年之中,由知府擢任封圻”,是以“断不敢畏难苟安,以冀仰答高厚鸿慈于万一”。[14]

道光三十年元月,道光帝去世后,新主登基,此后对外强硬派抬头。咸丰元年三月遂被召入京,君臣默契已失,但继畬仍忠言抗论。他以降调京官的地位于咸丰二年上三渐宜防疏,一曰土木之渐,不以咸丰之大兴土木为然,他说:“今(平太平军)军务未完,河工未毕,人知帑藏之空虚,亦料无暇于此。……宫廷之内有一分之损裁,军国之间即受一分之补益,”请停“秋狝热河一切工程”;一曰晏安之渐,请咸丰体念“圣德之日新又新,圣政之久安长治”;一曰壅蔽之渐,咸丰虽“屡下求言之诏”,但他所顾虑的是“言事者之限于才识”如“鸦鹊之鸣噪”,“所谓言路既通而壅蔽之患转生于不觉者也”。他说,在京言事之人约分三等,而各有所优,各有所蔽,申明

"听言之道以理为衡，揆之于理而是，刍荛亦有可采，而况于臣工，揆之于理而非，亲信者亦难曲从，而况于疏逖"。[15]这三渐之防前二者直接针对咸丰之好土木、晏游（后来慈禧亦然），后者针对当时强硬派之嚣张，劝咸丰勿受市言愚弄，不料当年继畬即被罢回籍。可以确定的，所谓忠君，不是逢君之恶，而应是明察君国大政的缺失，犯颜直谏，在这方面，继畬是做到了。

二、实学与经世：如上所述徐继畬有深厚的学术基础，丁忧时即继承父志，批注《后汉书》（已发表六百余条，现山西省发现全部批注本），并作《尧都辨》、《晋国初封考》，以理势考证史地实学。又另有《两汉幽并凉三州今地考略》，亦属史地考证。[16]此所以在对外战争大败后立即访问洋人及国人，搜集中外史地资料，撰写《瀛环志略》，此志略即当时的世界历史地理。又罢退后为其家乡撰修《五台新志》。[17]

以上国内舆地考证属于学术研究，与政治关系较少，评注《后汉书》，臧否人物已涉政治理念，譬如注"申屠蟠传"，于"处士横议"之上注曰："横议之风，治世亦能取祸，况于板荡之时。"[18]至于志略则具实用价值。

徐继畬并无专文阐述"经世致用"之学，但他亲炙父叔身教，观摩办理地方政务——特别如仓廪、粮运、水利等，应有心得。从他的任官行事，禀示奏疏，亦可见他具有经世的思想与才能。他在道光十六年疏言"政体宜崇简要"，论古今治术，认为"开创之初，……政令简质，其病在疏略，而核实之意多；守文之世，百事求详，法制周密，其病在于烦琐，而虚文之患起"。痛切指出满清二百年统治，诸禁令成为具文。他在鸦片战争前夕，提到"鸦片之禁三令五申，所得者州县出结，年终一报而已，其实贩卖成群，肆无忌惮者如故也"。他以为"令之而不行不如不令也，禁之而不止不如不禁也"，提出"当今时势宜简者有三"，即教令、条例、处分都宜简，畅论时政，希望重振纲纪。[19]《请除大臣回护调停积习疏》对钦差、督抚查办（地

粮、漕米、驿站、差徭、讼棍)案件,有回护积习,使台垣弹劾无功,请求"核名实以振纲纪"。[20]此外,他甫任御史,即参山西忻州、保德州知府入省(太原)钻营,"其门如市……实为省垣垄断之首"。[21]又参山东登州讳灾不报,"下为残民,上以敛怨,成何政体,安可姑容?"[22]又参山西荣河县知县藉祭商汤王陵科派敛财,请"严行查办。"[23]该知县于委员查案时退赃令各里长出结,继畬再参请旨将该县书差"提省严究""按律惩办"。[24]道光十五年上《请整顿晋省吏治疏》,针对官吏之不讲操守,地方之不办重案,弹劾隐匿的州县。[25]

徐继畬担任知府仅半载,即升调道台,至延建邵道月余即以《捕治盗匪办法》上禀闽抚,并致属下十七县书,申明条约,督属奉行。[26]及中英之战启,继畬调集民兵协防,当时督宪准海澄防兵照泉州大营口粮加七分,其余四分,继畬致书督宪,议裁漳海病弱防兵,节饷,对所属有用之兵一视同仁,各增七分或六分,以免"兵心解体"。[27]休战后,继畬数迁至藩台,办理洋务(详后)。

徐继畬罢职后,值太平军北窜,晋抚恒春奏请令其进省襄办防务,于上党等地办理团练。稍后王庆云抚晋,他与继畬原有交谊,多所请益。继畬建议"严缉匪盗"以"保此一片土,……为国家留一分元气"。条陈"山西防守事宜",并胪陈"潞盐刍议"。[28]

王庆云以"治盐务"著称于世,尚为盐务就教于继畬,可见继畬具有多方面的经世学识。可惜他于咸丰七年以京师乏粮,筹拟"运西米调剂策",传入都中,部议未采,自此不谈时事。[29](在籍曾为山西票号拟订章程)[30]

同治四年入京,六年管理同文馆,七年上《严查教匪以靖闾阎疏》,希望消弭"妖言"于未萌。[31]当系惩于太平军乱事教训,不能料及三十年后,清廷竟援引义和团以抗列国。

概言之,徐继畬并未刻意论述经世之学,亦未建立其政治思想的体系。他罢退后,书其屋门为"退密斋",寓"退藏于密"意,逝世后

其弟子徐耘田等集其奏议四卷、诗文杂著二卷，称之为“退密斋遗著”但未付梓。[32]

民国四年，五台阎锡山增补考略、叙传及诗若干卷，取名《松龕先生全集》印行问世，实非全集，相信尚有甚多的奏疏与评注，有待于吾人的发掘和研究，[33]届时或能理出他思想的演变与体系。以下仅就其对西方认识及办理洋务的立场予以探讨。

《瀛环志略》的撰述

一、撰述缘起：根据光绪山西通志乡贤录《徐继畬》传，谓“先是继畬（为臬司时）入觐，宣宗询以各国风土形势，奏对甚悉。受命采辑为书，书成曰《瀛环志略》，未进呈而宣宗升遐”。[34]似乎系奉旨撰书。其实继畬能“奏对甚悉”，应已从事译著，尚未成书而已。

根据道光二十四年手稿本《瀛环考略》，其序略云：“道光癸卯（二十三年）冬，余以通商事久驻厦门，米利坚人雅裨理者，西土淹博之士，挟有海图册子，镂板极工，惜不能辨其文也。暇日引与晤谈（按志略云雅能作闽语），四海地形得其大致，就其图摹取二十余幅，缀之以说，说多得之雅裨理，参以《海国闻见录》……诸书，题曰《瀛环考略》，未得其详，故名之曰略也。”[35]以继畬对舆地考证之兴趣与专才，加上战争失败的刺激，他是在道光奏对前即已着手研考西洋史地的。

二、成书与版本：道光二十八年《瀛环志略》初刻版于福州完成，即戊申版（台北市中央图书馆藏有一部）。[36]三十年于福州再镌，称庚戌版（台北市华文书局曾予影印，本文所根据者即此版）。[37]同治五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重刻（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有一部），[38]由李文田阅注，为避讳删去六字。另日本于1861年翻刻（辛酉版，方闻藏有一部），于正文页两边凡名词分注英日文

字。[39]

三、撰述方法：

(1)从考略的序略可知徐继畬撰述方法系于道光二十三年，先就雅裨理所携之世界地图为研究的工具，在志略序言中他说："地理非图不明，图非履览不悉，……泰西人善于行远，帆樯周四海，所至辄抽笔绘图，故其图独为可据。"[40]不过次年，他再赴厦门，郡守霍蓉生购得地图二册，分别为二尺、一尺大小，尤为详密。[41]其他参考的地图有《皇清一统舆地全图》，相信亦参考及于明末清初外国教士所绘的地图(如《万国图志》、《职方外纪》等)。

(2)口述访问：首先他摹图二十余，逐图向雅氏请教。雅氏能闽语，为述世界各国史地，成为内容主要来源。但他继续向外人请教，譬如英官李太郭，亦为其讲述希腊、犹太古史。[42]他在《凡例》中说明他搜集西人资料，有不同说辞，"择其近是者从之，亦有晤泰西人时得之口述者"。[43]对于人名地名之译音，亦使"泰西人口述之"。[44]此外，他亦向国人航海外洋者请教，卷二《南洋各岛》的按语云："今就泰西人原图，博采诸家之说，又询之泰西人，及厦门曾历南洋之老舵师参互考订，约略言之，不能保其必无舛午也。"[45]

(3)征引书目：关于西方资料，志略《凡例》提到使用"泰西人杂书"，"有刻本有钞本，并月报、新闻纸之类约数十种"，又明末清初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等的译作如《万国图志》、《职方外纪》，他亦予以参考。[46]至于国人著作，见于考略《序》者有《海国闻见录》(陈资斋)、《海岛逸见录》(不详，待考)、《西域闻见录》(七椿园)、《海岛逸志》(王大海)等书。而志略征引范围扩大，计有《安南纪程》(蔡廷兰)、《海录》(谢清高)、《薄海番域录》(邵星严)、《吕宋纪略》(黄毅轩)，同时对《汉书》……《明史》、《通纪》、《天下郡国利病书》之涉及西域、南洋及泰西者，亦予以征引考证。[47]

(4)修改增补的原则：考略系继畬从事著述年余的手稿。嗣后他继续搜求中西杂书文献，"其书俚不文，淹雅者不能入目，余则荟

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自癸卯至今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48]可见他著述本书之精神，其一“虚心”，不断搜集地图及资料，而且不耻下问，向人请教。其二、富怀疑精神：他并不偏听偏信，对雅裨理所述皆以新旧各说予以考证，考略提到“雅裨理又云，南极北极之下，以半年为日，半年为夜，其说太奇，余未敢遽信也。又云日未尝动，地转动不停，受日光则昼，背日光则夜，此说尤奇”。[49]这些现在是普通常识，但继畬不能相信，结果是疑不能解，而志略不采。同样对中国古籍记载，他亦以怀疑精神，以新得资料，予以考证，更正旧说甚多。[50]其三、尊重第一手资料：对两种以上的说法除了以“理”来推论以外，偏向相信第一手资料，譬如《地球图》及《东洋二国图》中之日本三岛，他不采根据经纬度画出来的西方地图，而且说他们是错误的，考略云“彼市舶罕到东洋，就所传闻者，以意为之耳，兹据《海国闻见录》更正之”。[51]到志略刻印仍如是，[52]不过补充说明“泉州陈资斋提军(伦炯)少时尝附商舶游日本，言其风土甚悉”。[53]关于南洋诸岛或西域各国，他同样的参用亲历者的记录，这在史学上称第一手的原始资料，而不料由于亲历者的欠缺地理知识，导致他之犯错。其四、客观的态度：他历时五载，易稿数十次，尚且说“不能保其必无舛午也”，可见他力持客观。此时国人方愤于英人之侵略，他在考略中对英吉利的按语谈论其养印度兵二十余万，“与中国构兵，兵之黑面者，皆即印度之人，约计不过万余，每月口粮，……事罢立即撤还，久则彼亦不支也”。[54]其余叙其兵船、夷炮、火轮船，含有明了敌情之意，但到志略，略去印兵事，增加其议会政治之叙述，不含一点火药味，十分冷静。其五、富和平仁爱精神：这是中国史家的特色，字里行间贬抑暴虐好战的暴君，赞扬仁民爱物的国主，怀悲悯之心怀，同情非洲人之被贩为奴，过牛马不

如的生活。又他对西方宗教战争的频繁，如新旧两派皆信仰耶稣，而君与民，国与国相残如是，不以为然。[53]

概言之，徐继畬撰述本书非常虚心、慎重，具有求真的客观精神，而且含有中国史学反战的和平仁爱的精神，可惜由于时空限制，对地学知识的欠缺，诚如其言舛误难免，但此书所描绘的西方世界提供国人许多新颖而正确的观念，是可以肯定的。

徐继畬对西方的认识

自从雍正禁教后，中西文化交流中断，彼此隔阂，国人对西方尤欠认识，徐继畬亦不例外。有如上述，经过他苦心探求后，有重大突破，亦有若干成见，兹分五点叙述如下：

一、天朝大国的意象：我国素以天朝大国自居，而视四裔邻邦为夷狄，洋人东来，亦以夷人视之，并无对等外交观念，形成中外冲突的重要因素。继畬于鸦片战争期中，以“二百年全盛之国威，乃为七万里外之逆夷所困，至使文武将帅，接踵死绥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末，兴言及此，令人发指眦裂，泣下沾衣”，[56]他撰述志略时期，对西方世界了解增加，但对天朝国威仍念兹在兹，他在考略《地球全图说》中说：“中国……故自剖判以来，为伦物之宗祖，而万方仰之如辰极，我朝幅员之广，旷古未有。”[57]志略改《地球全图说》为《地球》，其有关中国部分，一字不改。[58]不过志略中称非洲人为番（指其文物未盛），而未尝指欧美人为夷，且多处盛称各方面之进步情形，他已主张信守条约义务，至于奏疏用语，他仍沿用“英夷”，不得已也。

二、对“世变”的警觉：王尔敏统计 1844 年至 1902 年中国知识分子关心时变，提出“变局”之言论者 66 人。[59]而未列入徐继畬。《瀛环志略》“凡例”中提到“南洋诸岛，苇杭闽粤，五印度近连两藏，

汉以后明以前皆弱小番部，朝贡时通，今则胥变为欧罗巴埔头（可能为英文 port 之闽音音译），此古今一大变局”。[60]此处指中外国际形势之“变”，西方武力及商业经济力量延伸及于亚洲，改变中国宗藩关系，当然是“世变”；至于上述，为英军所败，二百年来之奇辱，当系中外强弱形势之变。

三、对英俄威胁的判断：志略多处言英俄于中东、印度等地对抗，谓英人以“巧”，俄人以“力”，将来不知如何演变。[61]魏源亦知英俄冲突，基于“以夷制夷”的策略，主张联俄（及美、法等）以抗英。至于继畬对英俄威胁见解不同，对策自异。首先他认为“逆夷以商贩为生，以利为命，并无攻城掠地割据疆土之意，所欲得者中国著名之马（码）头，以便售卖其货物耳”。又志略云：“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由其善于操舟，亦因国计全在于此……。”[62]对贸易及航海的重要性有所认知，但过分强调，他认为南洋诸岛岛民“震以炮火”即“窜伏不敢复动，故西人坦然据之而不疑”。“至安南等三国，……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又立国皆数千百年，争地争城，诈力相尚，战伐之事，夙昔讲求，其意计之所至，西人不能测也。”[63]以理推论，英人对中国当无领土野心。关于战斗方面，他认为“逆夷船坚炮利，海中断不能与之角逐，即在海岸安炮，与之对击，亦是下下之策。至于登陆步战，则非彼之所长，其所用者自来火之小枪，不能过四十步，此外小刀而已。我兵之排枪弓箭长矛等器，彼皆无之”。他认为敌人不明地形，而将败溃原因，归咎于买汉奸为爪牙，以及我兵之“无纪律，无赏罚，见贼即走”。[64]江宁条约既订，英人得于五口通商，立即依约撤兵，印证英人无割据野心。

志略对“峨罗斯国”叙述亦甚中肯，提及俄之驱逐蒙古，“沿北海渐拓而东，绕出西域回部外蒙古诸部之北，直达黑龙江东北徼外，名曰西伯利部。……筑城于雅克萨，侵扰索伦诸部称为罗刹。屡遣兵毁其城，辄复据之。康熙年间……分定疆界立碑为志。

……”。[65]

四、对西方农工商产业及科技文教的认识：志略对西方各国的生产事业无论商农工矿各业情况皆据实记述，尤注意各港口之繁盛、货物之产销、营利之多寡，对商业更为重视，而对新兴工业制作亦颇注意，他说英国“织布者四十九万余人，其机以铁为之，激以火轮，关捩自能运动，是以工省而价廉。……枪炮刀剑钟表，以及日用各项器皿之工，约三十万人，每年各项买卖，约值一万万余两。街市之中，衽帷汗雨，昼夜往来如织，其商船四海之中，无处不到”。他针对社会贫富不均，云“大利归于商贾，而工则贫”。[66]

关于西方文教，言伦敦“有大书院曰屋度，文儒所萃”，[67]著墨不多，独盛言“佛兰西颇重读书，学优者超擢为美官”，[68]谓巴黎为欧洲都会第一，“城内有大书院藏印本书三十六万册，钞本书七万册，游学之士许住院借读。又设医院十四所，选名医居之，每岁收疗病者一万四千人，各国学医者皆裹粮赴巴勒，三年或五年学成然后归。又有繁术院居各项艺术之师，如学兵法、开河道、造器物之类，学者各就所愿，群居讲肆焉”。[69]

关于西方长技——科技，志略言英国兵船极大者安炮一百二十门，对船炮构造长篇记录。另记火轮船及火轮车（铁路）之发明使用。[70]徐继畬对西方长技颇为注意，惟受原有观念所影响，对科学的认识略有不足，前述他不能接受南北极半年为昼的事实，又误置日本地图位置，是欠缺地学知识之故。再其次，他不认为苏伊士、巴拿马两运河可以开凿。[71]低估科学的力量。而将各国置于罗经八卦方位，以金木水火土五行来解释各国地形人物。[72]亦属中国原有观念。其父润第喜研易理，他予以附会运用。国人好谈运会，卷五《日耳曼列国》，他称“其人聪明阔达，西土以为贵种。……又佛郎西、英吉利立国之祖皆日耳曼人。诸国每遭丧乱，辄招致日耳曼列侯或世子为王。……殆西土王气之所钟欤”。[73]

五、对西方政治的认识：志略对世界各国政治平实记述，其虐

民以暹暴君受民厌弃，其具文治武功者名登青史，此与中国史学传统完全一致。但对中国最新奇的是西方议会政治和美国的民主制度，譬如描写英国的两院（称上议院为爵房，下议院为乡绅房，后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详述其政治的运作情况。[74]志略对美国华盛顿之建国及民主政治之奠基以寥寥数十言予以评述，“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75]最后按语又云：“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76]！”其钦羡之情溢于言表。

鹰鸽之争

鸦片战争对中国朝野刺激殊深，但因各人对敌我国力的认知不同，因此对策亦异，当时即有强硬派及抚绥派之别，近似今日所谓鹰派与鸽派。强硬派认为军事失败乃抵抗不坚定之故，怪罪与敌谋和者，而隐以林则徐为首；抚绥派确认力既难敌，利用民心士气不足以攘外，攘外必先安内，应整饬吏治，安定民生。耆英如此主张，[77]徐继畲亦近似之。

徐继畲在福建管理厦门、福州通商事务，与洋人原相安无事，不料英人在广东与乡民屡生事端，特别为英官民进入广州城事发生严重冲突，徐广缙、叶名琛在广东利用民众抵制获售，道光予以封爵嘉勉。[78]及道光三十年咸丰践位，年轻气盛，强硬派水涨船高。同年三月，林则徐返回福州调养，英人进入福州城冲突随即发生。杨笃所撰家传言继畲闽抚任内坚守要约，商民辑睦，“侯官林文忠

公时督云贵，闻之弗善也。及归里，倡议驱西商出城，责公畏葸，公不之辩，发数难曲询之，林亦不能答也，意稍解，而闽之新近喜事者，日相与媒孽，竟为蜚语闻都中，同官皆为公危，公屹不动”。[79]盖为实录。当时英官借住神光寺及阻止英人进城事，督抚意见一致，痛斥谣言，认为少数士绅“博一时之名望，而不计黎庶之安危。现在民夷虽安静如常，该绅士等是否别有筹划，尚未所闻。臣等固不便明阻其所为，致露不和，更不敢曲徇其所为，致生外衅。……事事处以镇定，不露张皇，务期华夷两安，仰副圣明绥静海疆之至意”。[80]不过咸丰方以叶名琛利用民众抗英为得计，强硬派对督抚抨击不遗余力，且就《瀛环志略》中云日耳曼得“西土王气之所钟”句，去“西土”两字，欲入其罪。刘韵珂先以病辞，继畲署闽浙总督，咸丰元年三月遂召京觐见，询以林则徐为人，继畲答云：“忠正，惟不悉外情，致误事机。”咸丰顿足叹息，及退，语廷臣云：“徐继畲乃老成人，何谓欺诈？”[81]

由上所述，可知鹰鸽之争实皆忠爱国家，只是对西方认识有所歧异，政策遂执两端。在此魏源与徐继畲亦有异同，其一、都虚心追究西事，撰述世界史地；但《海国图志》对英人有敌忾之心，志略则较客观冷静；其二、都筹谋对策，魏源的策略分议守、议战、议款，有完整的体系，其议战“以夷制夷”、“师夷长技以制夷”，前者结盟以抗英人，后者学西方之造船制炮，具有制敌之力，允为重要的战争原则。[82]不过以当时中国的财经力量和重工业制造能力，即学西人长技，亦难立竿见影，何况官民之间利害冲突，上下隔阂，本身既无力量，如何“以夷制夷”？耆英以“远水不救近火”，并恐“引狼拒虎”，因此拒绝法使建议，不肯联法抗英，[83]但以五口通商权利均沾列国，引进列国力量来平衡英国独占权利，亦为一种类型的“以夷制夷”。[84]

徐继畲没提出具体的对抗对策，一直到道光三十年，他在《揣度夷情密陈管见疏》中认为英夷远在六七万里之外难于制伏，又我

沿海七千余里海口为彼炮力所及，海滨城邑市镇无法内撤，难于防范。但“彼以贸易为生……，其货船虽无所不到而总以中国马头为养命之源，攻略割据之谋敢施于散弱之五印度、孤僻之各海岛，而不敢施于暹罗越南，况中国乎。即使空我海滨数城，割而与之，彼亦不敢居不敢守也，而一绝其贸易，即如婴儿之断乳，有不可以终日之势”。[85]似乎他是主张“以商制夷”的，这方面他过分抬高中国市场对英人的重要性，但有一点是正确的，即在当时英人尚以对“整个中国的贸易利益”为重，而不斤斤于领土的割据，[86]而具有抵抗力始能自保，至于抵抗力培养，叶名琛是利用民众抗英，继畲则不认为民众能齐心御敌。[87]至于师夷长技，继畲盛言西人工艺之精巧，言船炮轮船火车之奇妙，他在同治初年，对王庆云提“条陈山西防守事”，作四点建议，即“守口宜择要、练兵宜聚集、将才宜物色、火器宜讲求”。提到“官兵之制胜，仍当以火器为主”。[88]惟继畲甚反对海口置炮设防，认为难以为敌，而且反遭夷人猜疑，“是防夷适以招夷”。[89]在此时期，他与刘韵珂还痛斥妄论以木炮、石炮、土炮抗英的前漕运总督。[90]在肆应难筹之下，他主张对英人讲信修睦，满足夷人贸易的愿望，不得已方修原有炮台，再以绝商为对抗之策，认为当时不可盲目抵抗。儒家传统“仁民爱物”是政治的根本，继畲不与英人冲突是唯恐有伤黎民，具有和平的仁爱的精神，他在《瀛环志略》中，记述西方人的重商特征，斥其侵略的奴役异族的行为，但极言议会政治、民主体制之优点，暗示上下一心之道，如果上下一心，具有历史文化的而且拥有抵抗力的中国又何患英人之侵略。

结　语

海通以来，中西因商务、传教冲突时起，惟传教士为文化交流之媒介，影响及于双方有远见的知识分子。[91]惜康雍禁教，智慧

沟通管道中阻，二百年间西方政军、财经、科技、文教各方面突飞猛进，国人陶醉于清初盛世，对西方世界茫然无知，[92]及鸦片战争变起东南，肆应维艰。

五台徐继畬生于官宦之家，年甫十九即中举，但十三年后始中进士任京官，又十年后即简放知府，鸦片战争时适以道台协防闽(漳)，此后数迁至闽抚，署闽浙总督，自 1843 年以布政使驻厦门至 1851 年 3 月内调，八年之间，为其从政之黄金时代，惜其对外平和的主张不能见容于朝野，1852 年罢职。其科考与仕途，时而顺畅，时而梗塞，但因此得能饱读群书，多所阅历，是以学识精进，著述等身。他以家学渊源，从父治陆、王之学，评注《汉书》，而独擅舆地考据。他从政固忠爱君国，惟期待君主之圣德日新、圣政长久，以安养黎民为念，他针对时代的弊端，纠弹苟且偷安的职官，以冀纲纪之重振，而对禁烟、[93]治盗、兵防、团练、盐务等皆有卓见，其经世致用可谓有学有术。他运用其考据舆地之学，著作《瀛环志略》，从知彼知己的工夫上探求肆应之方，在历史上已占重要的地位。

有关徐继畬办理洋务的原则源之于他对西方世界的认识，这在当时——也在目前，都是非常重要而值得争辩的问题。林则徐禁烟之际，亦探求西事，致友人书，如大炮不能用，“虽远调百万貔貅，只恐供临敌之一哄”。[94]然他请其友人勿以真相告人，因此蒋廷黻批评有真实的林则徐，亦有假的林则徐。[95]此时国人方以见辱于洋夷为奇耻，竟抬林氏为英雄，林氏不肯明告世人以利害，或恐有伤民心士气，或恐因此获散布谣言之罪，绝非有意虚名以盗世。他复起用后强硬抗英如故，此为福州官绅引发福州入城事件之源，他与强硬分子同流，具虚矫之气，有盲目排外之嫌。

魏源经世名家，得则徐所集之西洋资料，写《海国图志》较能了解敌情，明言敌之长技，倡言师其长技，实具重大意义，其后自强运动即依西法造船制炮，自强方能自卫。然既以英人为唯一假想敌，言防、言战、言款都针对英人，实则若俄若法，焉为良友？[96]

徐继畬撰写《瀛环志略》，具有虚心、求真、客观冷静、和平仁爱的精神，这些都是中国考证学家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史家的精神。[97]虽囿于成见，客观、新颖、条理井然以及综合评论之优点，实为中外史家所共认，[98]笔者所要强调的是他的爱好和平、反侵略、反奴役的精神，费正清(John K. Fairbank)赞美志略之撰写，但谓"虽然徐氏的作品中被证明含某种程度的仇外(xenophobia)，不过数年后他却以亲于外人的原因被抨击及召回"。[99]笔者则以为他并不盲目排外，他重视者保境安民，反对穷兵黩武。1844年之考略，论拿破仑战争引用中国的和平观念，谓"兵犹火也，不战将自焚也，有国家者，保境安民，斯称上理，穷兵黩武，灭亡之渐。……若夫糜烂其民，而日驱之锋镝之间，将不旋踵而覆亡，尚何富强之有？"[100]这是中国"佳兵不祥"的观念，用以告戒侵略者，至于被侵略的中国当然有自卫的必要(中国反战，但并不反对义战)。徐氏的奏疏确有防夷议论，但他并不强调要联此攻彼，他主张使用火器，不强调立即制作船炮，以牙还牙，而是较理性的绥靖政策。如师夷长处，毋宁从交通、商业、文教以及政治入手，从儒家的仁政德治出发，而已有所突破，不失为救时良策。

(作者陈存恭，1934年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附记：本文是作者在广州中山大学1990年12月召开的纪念中国近代史开端1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的论文，这次收入，作者作了修正。——编者

注释：

① 按郑成功收复台湾、彭春攻克雅克萨，水陆勉能自保。

② 阎锡山编：《松龛先生全集》，民国四年刻于太原，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集奏疏、文集、诗集、考略、叙传；其《徐氏本支叙传》对其家世记录甚详；徐继畬编，孙步墀(汝明)增补《五台新志》，光绪五年刻，崇实书院藏版，卷四，人物续，有继畬传，并附杨笃，太仆寺卿前福建巡抚徐公家传；又方闻，《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1982年台湾商

务初版，附录清史列传，徐继畲传；山西通志乡贤录，徐继畲；山西献征，郡丞徐广轩先生事略。本事略参考上述各书，不另注释。

③ 《松龛先生全集》，徐氏本支叙传：《显考赠资政大夫广轩公家传》，页661—674；《五台新志》，卷四，页6；年谱，页35，52，418—421。

④⑤⑥⑩⑱㉛ 年谱，页403—415；页416；页12，页16；页31；页42；页194。

⑦ 《松龛先生全集》，从诗集、文集，可知继畲与祁寯藻、祁幼章、曹象谦、薄石农、武次男等相交甚笃。

⑧ 曾国荃主修《山西通志》，光绪十八年刻于太原，卷九十九，风土记，页15；彭昭恒《三晋民性古风抉录》，载《山西文献》，第十八期，1981年，台北山西文献社，页93。

⑨ 同上，又按山西一般平民固甚闭塞，惟商人常出省外，但近代晋商多墨守常规，更不涉政治。

⑪⑫㊲ 徐继畲：《瀛环志略》，道光三十年，福州镌版，台北华文书局影印，页42；页98。

⑬ 按荐举及赏识继畲者有福建巡抚吴文镕、刘鸿翱，闽浙总督颜伯焘、刘韵珂等，见诗、文集；又年谱，页82。

⑭⑮⑯ 全集，奏疏，页34；页120—132；考略，页519—610，又年谱，页36—60。

⑰ 按《五台新志》系继畲以新法编纂，曾国荃称其"综核简明，义精文赡"，缺乡贤、列女、艺文三卷（因奉召入京未修竣），由知县孙步墀及徐耘田等增补。

⑲⑳㉑㉒㉓㉔ 全集，页26—33；页20—26；页9；页11；页13；页14。

㉕ 同上，页16—20，按此疏弹劾涉及山西赵城县教案官员。

㉖㉛㊹ 同上，页141，页293；页139；页302。

㉗㉙㉞㊱㊳㊴ 年谱，页72—75；页239，页245；页369；页96；页272；页97。

㉘ 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王庆云（传），页601，按王氏治河东盐务、四川盐务，休致后定居于晋省；年谱，页201，210；全集，页150—170。

㉚ 按见《山西文史资料》（待查）；按继畲高祖经商致富，其后人虽有入仕者，谅有从事农商者，继畲重视"贸易"可能与山西的商业文化有关。

㉜㊾ 《五台新志》，卷四，页54；页7。

㉝ 按应可自清档发现其他奏疏；至于《后汉书》评注已于山西省内发现，有待刊行。

㉟㊵㊾ 徐继畲：《瀛环考略》，道光二十四年手稿本，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刊行，首页，按手稿雅稗理，排印为"稗"但志略作"裨"字；页1；页21。

㊶㊷㊸㊹㊺㊻㊽㊿52 ㊿53 志略，页17，另使用英人所刻之五印度图，页201；页474，493；页22；页23；页106；页22，页183；页17；页63；页72。

㊼ 同上，征引书如，页 63，以陈资斋《海国闻见录》改西洋日本地图位置；页 63—75，引顾亭林《天下郡国利病书》，《元史》，《后汉书》，元王恽《泛海小录》，周海山《中山志》等书来撰述日本及琉球；参考《海国闻见录》；邵星严《薄海番域录》，黄毅轩《吕宋纪略》，王大海《海岛逸志》，《天下郡国利病书》，《通考四裔门》，《明史》，《宋史》，泰西《万国地理书》等撰述，页 105—176 之南洋各岛；引《西藏志》，谢清高《海录》，《汉书》天竺传，利病书等撰述，页 197—239 之五印度，引《西域闻见录》，汉书，新唐书等撰述，页 245—278 之印度以西回部四国；又页 298，谓“西域诸回部，七椿园《西域闻见录》言之最详”。页 295，谓“道光二十年，粤东译出英人新闻纸(即月报，有云，五月十四日，接印度来信，论及俄罗斯欲攻打印度事”。可知他资料已用到粤东英人报纸。

㊿ 例如志略页 176，考证利病书所谓真腊民色甚黑号为昆仑。页 572，考证佛朗机人并不好食小儿，他说：“佛国之在西土，称雄已千余年，果有此事，诸国当视为豺虎，谁甘以牛耳相让？”又页 88—89，“俗传红毛船最畏安南，不敢涉其境，其人善泅水，……没水钉其船底，……。”他详曰：“没水而钉其船底则事涉杳茫矣。……耳食之谈，施之实事，往往凿枘，正不独此一事也。”

51545⑦ 考略，页 31；页 18；页 21。

55 志略，页 686，“阿非利加西土……，族类自相攻虏，获生口，卖以为奴，……每船辄二三百人，如货豕畜。……贩往亚墨利加者尤多，用以灌园耕田、种加非、造白糖，如牛马”。页 702，他评述阿非利加人“以略卖人口为俗，强半为诸国之奴，亦可悯矣。然其人愿而驯，豢之终身，无逃叛者，其又得坤土之柔顺者欤？”此外他对土人之不能变荒墟为腴壤，谓“惜乎番族之无此智能也”。页 520，按语论宗教迫害云：“君与民因分教相杀，国与国因分教相攻，数百年来西土之民肆市朝、膏原野者不知几百万，皆因争教而起。……余谓耶稣之立教以救世也，乃诸国因分教之故而残杀不已，耶稣而有知也，其谓之何？”

56 年谱，页 80；全集，页 304。

58606162636566676869⑦0 志略，页 41；页 20；页 20；页 325；页 100；页 356；页 560；页 629；页 568；页 560；页 641。

59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1977 年初版，1978 年二版，台北华世出版社，页 384。

71 志略，页 787，苏尔士、巴拿马“西土之人谋疏凿者非一日矣，然开河道易，开海道难，且两地之限隔，天地之所以界画东西也，今欲以人力凿之，不亦慎乎？”

72 同上，页 700，“阿非利加一土，以八卦方向视之，正当坤位，其气重浊，其人类颛愚。……其又得坤土之柔顺者欤？”

737475 同上，页 430；页 635；页 745；按考略，页 210，“华盛顿”作“兀兴腾”。

⑯ 同上，页 773，按考略无各州地理，亦无此段。

⑰⑱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册，1979 年初版，1983 年第三次印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页 82；页 86。

⑳ 全集，页 71；年谱，页 155。

㉒ 参见王家俭：《魏源年谱》，台北，商务，1967 年。

㉓ 姚廷芳：《鸦片战争与道光皇帝林则徐琦善耆英》，台北，三民。

㉔ 按使列强互相制衡，甚至互相冲突，亦为弱国自存之道。

㉕㉗㉘㉙㉚ 全集，页 84；页 51—59；页 159；页 91；页 89。

㉖ 按若有割据之意何必订条约撤兵，直到英法联军之后，英政府尚不支持大理的回民政权，唯恐有损中英关系，参见黄嘉谟，《滇西回民政权的联英外交》，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三七。

㉛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页 26；又 herrlee Glessner Greel（芝大顾理雅），"Confucius and Chinese Way"，Chaptir Four，认为中国儒学经由耶稣会士之手传到欧洲，影响到启蒙时代的伏尔泰（F. M. Voltaire）等人的思想。

㉜ 郭廷以：《中国近代化的延误》，载大陆杂志，第一卷，第二、三期 1950 年 7、8 月，台北，又载郭廷以《近代中国的变局》，1987 年，台北；联经公司，页 3—25。

㉝ 全集，页 193，继畲于鸦片战争后曾撰《禁鸦片论 》一文。

㉞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页 81。

㉟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台北，1959 年。

㊱ 按法国于鸦片战争后派代表剌萼尼（Theodore de lagrene）来华，说耆英订盟抗英，订黄埔条约；但 1856 年，拿破仑第三与英结盟侵华；英法联军之际，帝俄乘机迫中国订瑷珲、天津、北京三个条约，所得利远比英法多。

㊲ 参见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1988 年再版，台北，东大图书公司，第三章及第五章。

㊳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页 8，认为简明，有系统。

㊴ JohnK. Fairbank，EdwinO. Reischauer，Alber M. Craig，"*East Asia ，The Modern Transfomation*"，First Printing，1965，Eighth Printing，1973，Charles E. Tuttle Company，Tokyo，P. 150。按费正清认为此书另创一格，并非零碎翻译，对各西方国家予以综合记述，且附正确而新颖的地图，而为合乎标准的作品。

（100）按志略，页 569—570 对法兰西之用武评曰"可为黩武者之殷鉴"，惟内容略有变动。

●（美）龙夫威

徐继畬与美国：一种特殊的关系

美国人对徐继畬的特殊兴趣，开始于鸦片战争之后不久他担任他们所留心的沿海官员的时候。从此之后，对中国近代史感兴趣或是研究早期中美关系的美国人，或多或少地看出，作为清朝高级官员的徐继畬在鸦片战争这一巨变中的角色，他向中国知识界如实地报道西方世界的开拓性尝试，他对美国，尤其是华盛顿的全面赞扬，以及他的世界观对以后历代中国人的理性感化。由于和在中国的美国人的个人接触以及他对美国的赞赏观点，使美国人感到，如同与当时和后世的为数不多的其他几个中国人一样，和徐继畬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长时期内，（在费正清教授的倡导下）终于导致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学术论文，最后于1975年出版了关于他在中西方之间进行理性对话的生平与贡献的专著。[1]

当徐继畬在广东和福建担任高级官员的时候，美国及其他英语国家的读者就从《中国丛报》上第一次知道了他。《中国丛报》是1832年至1851年在广州和澳门出版的英文月刊，宗旨是将中国的信息介绍给西方世界。创办者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是美国最早到中国的传教士，期刊广泛地论述关于中国历

史和现实状况的一系列问题。[②]该期刊 1843 年报道了徐作为广东按察使抵达广州。尽管时间迟缓，对他到职的日期的记载也不准确，这却是用英文出版的文献中第一次提及徐继畬。[③] 显然，裨治文已经注意到，徐继畬是一个对中国与海上来的西方人的关系的看法有重大转变的务实官员。期刊报道，徐已经转任福建的高官。裨治文希望，徐继畬在到福建任职前觐见道光帝的时候，将能够“帮助皇帝开阔眼界”，正视在世界和中国沿海面临的新的情势。[④]这个期刊也简洁地报道了徐在福建的官方活动，例如，说他 1844 年在厦门参观了欧洲人的住处。[⑤]

1844 年，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与徐继畬在厦门的几个场合发生了历史性的意外相遇。他们一起讨论世界地理和历史，雅裨理为徐继畬引进了西方的世界地图。雅裨理关于此事的日记在《中国丛报》发表以后，在美国读者中进一步激起了对徐继畬的兴趣。[⑥]美国传教士报道说，徐“是我迄今见过的高级官员中最爱寻根究底的中国人。他询问了许多外国的事情后，我们提出，拿一本地图集，向他说明最感兴趣的各个地方和区域。对此，他欣然表示赞同。我们尽量(使语言)简洁，在一个下午时间内，给他介绍了尽可能多的基本情况”。[⑦]雅裨理的日记，不仅表明在一个美国传教士和一个中国高级政治家之间的直接联系，而且使许多美国人看到这样一个人类发展史上的生动例证：他们这个世界上最年轻国家，是如何帮助世界上最古老国家推进现代化进程的，这就使美国人对自己民族的命运更加坚信不移。1846 年，《中国丛报》又登载了(英国)维多利亚主教四美(George Smith)牧师关于外国人在厦门境遇的报道。著者在文中描绘徐继畬是在业已出现的条约口岸制度下，以自己的行为和姿态，“推进他的国人”适应眼前的外国幽灵的人物。[⑧]这样，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外国人在《中国丛报》的评论中，已经正确地观察到，在回应眼前的外国幽灵方面(不论其秘而不宣的动机)，徐继畬与一般的清朝官员们

（尤其是与林则徐）有着重大的不同。徐继畬辑著《瀛环志略》，试图促进中国读者对改变世界的力量作出现实主义评价的努力，进一步增加了他在西方评论者中的声望。最早赴华的美国人公认，徐继畬是中西方文化交流这块处女地的拓荒者。为了引导西方读者关心中国，裨治文的期刊再一次适合时宜地充当媒介，首先报道了徐继畬对中国面对着的变化多端的世界的富有创新精神的描述和分析。

裨治文的同事卫廉士（S. Wells Williams）在最后一年的《中国丛报》发表的评论，用二十五页的篇幅，详细分析了徐氏新著的内容和意义。他赞扬徐书是"沿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并提出，徐继畬已经充当了中国现代世界观的创造者和宗师（Legitimizer）的历史性角色。[9]卫廉士也适当地评论说，按照经纬度的方法，徐氏的地图并不精密准确，而且在地理学方面也有不少缺点错误，不过他已注意到，徐氏的主要目标并不是要使地图精益求精，而是要从总体上把握各个国家的一般概念——"它们的幅员、政治地位、商业联系，尤其是与中国……"。[10]卫廉士赞扬著者"以尊重的措辞"谈到每个国家，并且注意到，他"在提及这些国家的居民时，不用轻蔑傲慢的称呼和贬低的解说，这样，他的国人也就不得不努力随之纠正对遥远陆地的思想"。[11]"联想著者的教育和职位，（《瀛环志略》）是他创造性、公正和学识的丰碑；而且（它）应被看作与英国的战争给予中国思想界的初始推动力之一。它将……在驱散中国统治者和学者们之中存在的夜郎自大和愚昧无知思想，向他们表明，在地球上，他们并不仅仅属于一个国家方面，发挥更多作用。"[12]

徐继畬对美国的赞美性论述、对华盛顿的推崇，格外地打动了美国的报刊评论家。卫廉士以更多的赞颂结束他的评论，并且希望徐氏"将继续从事他创造性的学术研究，向他的国人奉献上经过校订和修正的《瀛环志略》版本，并且在他的笔墨生涯中增添新的

作品。有了目前这本著作，他的年轻主子(咸丰帝)将把利益问题处理得更好。而且我们希望，将来有一天，著者会被召唤到某些岗位，在那里，他的意见能够影响皇帝的决策”。[13]

卫廉士对徐继畬的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致此后若干年，他在修订关于中国的第一流的不朽报道、19 世纪在美国有相当广泛的关心中国的读者的《中国总论》时，至少四次提起徐继畬(1848 年，当《瀛环志略》完成时，《中国总论》同时出了第一版)。卫廉士书中说，徐是鸦片战争以后，“沿海官员中能够看到其结果很可能是持久的和严重的”“少数几个富有思想的人”之一。而且他“比他们在京城的上级能更好地领悟，‘西洋人’在五个开放口岸的出现，对(中国)输入了持久的势力”。[14]卫廉士引证说，徐继畬是在厦门接待美国传教士雅裨理、文惠廉(William J. Boone)以及甘明博士(Dr. William H. Cumming)的地方官员之一。徐“到他们的住处，在这里，他们就有机会回答他关于域外国土、风俗习惯的理性询问”。徐继畬由于雅裨理在他准备撰写论著时向他提供地图和情况，而将雅裨理的名字记入他的《瀛环志略》，对此，卫廉士感到惊讶和欣喜。[15]

徐继畬在美国的声望，也由于他对美国的描绘，尤其是对华盛顿的礼赞而上升。美国在华传教士，甚至节录徐继畬的有关描述镌刻在一块花岗岩石片上，从宁波送回华盛顿特区的华盛顿纪念塔(如今镶嵌在西墙的 200 英尺高度)。徐继畬对华盛顿的正确评价，在美国领导人中已经众所周知。1867 年，美国第十七任总统约翰逊(Andrew Johnson)和国务卿西沃德(W. H. Seward)请著名画家普拉特(Prate)制作了一幅斯图尔特(Gilbert Stuart)的华盛顿画像的复制品。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行将离开北京的时候，将这幅画像赠送给徐继畬以表达敬意。《纽约时报》以重大事件用巨大篇幅对此作了报道。有趣的是，(16 年前在《中国丛报》上评论徐书，希望徐的意见将影响皇帝决策的)卫廉

士，也以副公使和未来的署理公使的身份出现在向徐氏赠画的历史性场合。而现在，徐继畬果真成了清朝掌管外交政策的 管理机关的最高级官员之一。[16]

在赠像仪式上担任译员的是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丁是 1850 年到宁波的美国传教士。1853 年宁波府向筹建中的华盛顿纪念塔赠送石碑的时候,他也在宁波。丁 1863 年到北京,后来在同文馆与徐继畬成了互相敬慕的同事。1868 年春,同文馆刻印丁韪良介绍自然科学基本知识的《格物入门》,徐继畬热情为此书作序。序中还回忆起当年与雅裨理的交往,并说那时急于了解世界历史、地理,来不及学习自然科学。这次读了《格物入门》,知道书中讲的道理闻所未闻,都能见诸实事,言外之意是丁书对国家富强很有好处。丁书和徐书一样,不久就被日本翻刻。这表明,如果美国传教士雅裨理对徐继畬乃至东方的近代比较系统的世界历史地理知识的形成起过媒介作用的话，那么另一个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则对徐继畬乃至东方的近代比较系统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形成起过媒介作用。[17]

总之,19 世纪对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的瞬间即逝的评论，虽然已经在当时美国人之中激发起了兴趣，却没有立即导致对其个人和著作的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当美国对中国最接近的过去给予一点点注意的时候，除了偶然的原因在中国近代史教科书上提及之外，徐的贡献逐步从美国人的记忆中褪去了。

是费正清的学术生涯唤起了美国人对中国近代史新的兴趣。费正清将了解中国近代史重要性的紧迫感传导给了他的读者和学生。在费正清促进和引导下,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隆隆炮火的副产品，对徐继畬的生平及其作为沟通西方世界与中国之间信息的导线的角色的热情，被重新燃起。在费正清的一系列著名论著,例如 1953 年出版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

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中，费正清向读者复述，徐继畬是“满清官僚政治下，具有外国人和他的同僚都可接受的美德的夷务专家，真诚的学者—官员”之一。徐“在福建承担的与夷人联系的重大责任，远远超出了他的实际职位”。[18]费正清的论著中描述，徐继畬作为福建的“夷务专家”，处理了诸如外国人住处、收缴入港税、1846年南台的骚乱，以及中国的“内奸”等等事项。可是，费正清特别关注的焦点，却是徐以新的观念对外部世界的介绍，他专门用了四页的篇幅进行分析，结尾写着，徐的生涯是“一段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经历”。[19]

1954年，费正清与邓嗣禹合著《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年文献综览》。在阐明“中国的学者—官员阶层，面对现代西方的侵略扩张，试图了解异己的文明，并且采取行动维护他们自己的文化以及他们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问题方面，直至今天仍然作为必备文献中第一流的文集被利用。[20]为了说明随着条约口岸的开放而出现的和解政策的合理性及其结果，文集用几页篇幅概括了徐作为与西方“夷狄”打交道的专家的经历，并从他的书中摘录了关于世界各国的富有启蒙意义的论述。编者指出，“徐巡抚的研究，将西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充分论据摆在他的国人面前，一清二楚地说明，西方夷狄体现出一个迥然不同和十分强大的社会。困难在于，如何从这种差异中吸取经验教训，将它运用在提高管理国家事务的水平上”。[21]

在诸如以上这些材料中，费正清向新一代学生指出，一些值得注意和能引起兴趣的历史问题，与徐继畬的轶事密切关联。他的几个研究生为了回应他的有关徐继畬的生涯是“一段值得研究的经历”的提示，在关于近代中国历史以及清代文献的研究科目的论文中，开始着手对徐的角色的研究。费正清认为有的论文值得较多读者参考，就将其修改收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现在叫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出版的系列丛书《中国论文集》里。这样，1957

年版该文集登载了罗克韦尔(Dorothy A. Rockwell)关于徐继畬《瀛环志略》的研究论文,随之引起对徐生涯的兴趣。[22]两年后,罗伊(David T. Roy)研究了徐在神光寺事件中的角色。[23]

当我1964年进入哈佛在费正清指导下从事研究的时候,在美国,他的几个学生(及另几个人)已经组成一个小组,开始对19世纪40年代中国沿海的领导者的再评价,正在被研究的有林则徐、魏源及其他几个。因此,我成为费正清第三个聚焦于徐的研究生,写了一篇关于徐对美国的解释的研究论文,被收入次年夏季出版的《中国论文集》里。[24]在费正清帮助和鼓励下,此后若干年我在徐方面的工作,终于导致《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在1975年出版,这是致力于徐的经历的第一本用英文写的专著。

中国读者可能想知道,为什么徐继畬能够吸引一个美国学者将第一本论著就致力于他?[25]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个美国人的视角来看,徐的轶事颇能阐明和证实西方挑战—中国回应的学说,而这一学说正是当时多数杰出的美国学者解释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发展时奉行的模式。徐的经历显示出早期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影响,生动表明,一个重要的中国领导者,当他看到西方的知识和军事优势之后,为了帮助中国恢复均势,他是如何思考和行动,如何奋斗的。而且徐的进展也揭示出,当中国领导者开始从西方得到灵感的"现代化"进程时,文化交流则是主要源泉。

当研究徐的经历,在透视他的生活和时代的细节过程中,我开始领悟到另外一些因果联系。我很少用预先设想的历史解释,而是把他经历中揭示和影响进程、前途、难点以及机会的东西,与他当时超越对自己民族的利益、政治、文化缺乏远见的近视症患者,作为"专家"的艰辛努力联系起来,这样就逐渐发现了他的重要性。在并不否认挑战—回应模式正确性的前提下,我意识到,从徐的中国文化根源——其家庭,教育,乡土,社会,以及政治联系,来理解他的动机的形成,从而在本土特色的广阔背景之下,来评价他的

回应，是必要的。(在资料的提供程度允许的前提下)通过这样的透视，我确信，徐对西方挑战的回应——不单纯是对西方刺激的肤浅条件反射，更重要的是一个精心构想的行动计划——只能被他对中国文化基础的根本信念来解释。正因为有对中国文化和国家的忠诚，才激发徐这个反对英国侵略的爱国主义者、中国领土的保卫者，去探究外国的实情，支持和解政策，从而使中国作好未来的准备。其文化背景的显著特色——他的知识渊源，政治交往，乡土传统——给了他突破文化壁垒，寻求新的真理的勇气和信心。如同一个世纪以后许多有爱国热忱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成为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一样，徐因为对变动着的世界的未来的大胆陈述而付出了沉重的个人代价。对于某些探究60年代和70年代初美国东亚政策的不现实和过时状况的人来说，徐的动因和阅历确实能使人触摸到一个会引起连锁反应的疼痛点。

在我从事徐继畬生平方面的工作的十年期间，由于两种世界观的持续冲突，美国和中国被深深地困扰。60年代中期的美国和中国，好似两个对峙在文化深渊边上的发怒巨人，互相呼喊着非赞美性的称号，把在东亚称雄的梦幻抛到九霄云外，(通过代理人的搏斗厮杀)斗争一场接着一场。这就使人联想到，徐继畬面对两种世界秩序的冲突，早已在近代框架之内寻找理解和同一性，并进行百折不挠的调解，可是温和与妥协的声音实在太少了。像徐这样的安抚者，极端需要双方改善剧烈的争吵，而且徐已经显示出特别稳妥的范例。他的所作所为表明，甚至在最大的文化鸿沟之上，以互相交流为使命的、有创造力的、开明的政治家，必然能架起理解的桥梁(幸运的是，在我完成徐的研究课题之前，中美之间的和解进程已经开始了)。

在我研究徐的十年当中，有一件事情已经十分清楚：美国的越南政策，招致了20世纪降临在美国人民头上的最大灾难——对国家的经济、社会以及精神，造成了悲剧性的结果。过时的思想，有

缺陷的政策，造成了美国在越南的失败，从而使人或多或少感到，这好似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经验教训的折射。现在，已经是美国转而面对它在世界上影响力的局限性的时候了。这也意味着，通过徐的轶事看中国的经验教训，更能恰如其分地理解美国的惨痛进程。徐对西方入侵的有力回应，增强了一个认识：尽管他的世界已经永远改变了，这种变局却并不意味着中国必须（像以后数十年他的许多继承人所做的那样）抛弃自己的传统，恰恰相反，中国应该适当去保留自己的传统。而徐为了中国在这个复合的、多民族的世界上的生存，促进和解、妥协、了解，以及彼此融洽，所用的正是中庸之道。

在 1975 年《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出版的时候，尽管有其缺点不足，我仍然希望它能有助于美国读者通过徐的轶事，对 19 世纪中期中国试图参与新的世界竞技场时，面临的二难选择和复杂局面有较多了解。徐的经历证实，鸦片战争以后，至少有一部分中国领导人——任凭其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压抑——在他们的世界内确实已经作出有力的回应，并在有效地改变着环境。尤其是徐已经清楚认识到，一旦英国炮弹悄然落下的时候，使用中的过时的观点、无效的政策，是多么无裨于事和危险。作为深受中华帝国儒家文化熏陶灌输的孔门弟子，他冒险犯难，冲破思想和文化的重重阻力，系统地提出处理中国与新的、突然出现的世界秩序的关系的相当务实、可行的观点，这就表现出对他的祖国、对他的文化的更高的忠诚。

我也希望，美国读者通过徐的生活和经历，看到在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不断进行文化交流与和解的进程中，人力所致的卓越成就，这样，他们将能够对徐继畲在西方侵略之下，面临政治、文化的二难选择的困惑而深表同情。目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谓现实主义地估价和有效地对付东亚各国民族主义上升的“最杰出最辉煌的”美国领导者们的失败，我找到徐这个理性地适应变化着的

形势的实用主义的卓越典范。徐继畬走在时代前面，对于中国现已加入其中的世界，早已创造出一个有用的新观点。如果当年他对中国面临的新形势的理解能在皇朝和官僚主义化的领导阶层中推行得更广，中国也许能避免在"现代化"进程中丧失十年时间，避免伴随着缺乏准备的急速转弯而产生的某些极度痛苦。当代的美国人，在外遭到越南的失败，在内又有美国价值的问题，面对这些变幻莫测的幽灵，徐继畬时代中国的轶事，兴许是有益的教训。

感谢费正清及早地认定徐继畬的重要作用，现在，徐已经在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确立了持久的固定地位。忽视徐继畬的作用，这对美国 1975 年以后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些新近的教科书，例如沃赫拉(Ranbir Vohra)的《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斯潘塞(Jonathan D. Spence)的《现代中国研究》，都引用《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向读者相当详细地概述了徐的经历，并都提到徐的贡献。[26]有些美国著作家对徐的论述更为充分。例如，受到广泛赞扬的亨特(Michael H. Hunt)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美关系的研究中(主要依据《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用许多页论述徐在缔结中美之间特殊关系过程中的作用。[27]更为切近的例证是，由阿库什(R. David Arkush)和利奥·李(Leo O. Lee)编译的一部对中国关于美国的印刷品进行研究的迷人文集里，徐继畬占了一节，广泛地引用了《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里徐对美国和华盛顿的观点。[28]

近二十年来，在美国，尽管增加了对徐贡献的认识，可是对他的研究已不再进行了。如今，正是中国的学者，利用仍然保存在山西的丰富文献资源，向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提供了徐继畬作为晚清伟大学者和政治家的许多内容十分丰富的研究课题。这本论文集，就是朝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另外一些美国研究生，会迈开他(或她)的双脚，去徐继畬的家乡，利用收集

在那里的丰富资料，重新开始对这位中美关系史上真正重要的历史人物的严肃研究。

（作者 Fred W. Drake，汉名龙夫威，1939 年生，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教授。）

附 记：本文于 1992 年 8 月完成。原文为英文，编者译出后经作者校订。

费正清先生临终仍在关心徐继畬研究。我翻译《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时，碍于当时环境，未与著者联系。中译本经重重困难出版后，我立即寄赠费正清一本，并请他转赠著者一本。不久即收到哈佛—燕京图书馆来信，说明费已将书送给该馆收藏。龙夫威回信则中途丢失。1991 年 6 月才在罗荣渠帮助下与龙建立联系。次月龙即应邀来华参加徐的讨论会，在五台参观了徐的故居、坟墓、纪念馆、家庙。临行，我请他向患心脏病的费正清代致问候，并请为徐的墓碑题词。龙返美后不久来信说："8 月 15 日，我刚从中国返回，就到费正清教授家停留两小时，向他报告了我在中国讨论会期间的见闻。当听说你们重新激起对徐的经历和历史重要性的兴趣时，他感到极其欣慰，并答应送你一篇徐的墓碑上能用的文章。不过他先得完成手头的书稿（名为《中国，一部新的历史》——编者）。9 月 11 日上午，他把这部书稿交给哈佛大学出版社；这天下午，他再次病倒，被抬进医院，三天后他在那里逝世——快，且无痛苦。这样，不幸的是，纵然他确实惦念着回应你的请求，他已不能……"为了费正清先生灵魂的安然，我愿抹掉这笔稿债。

龙夫威六访中国大陆、七访中国台湾。去年 9 月从台湾返美后，感到精疲力竭。后来经医院检查，是得了癌症。今年 4 月 18 日，他接受手术前一天，写信告编者自己遇到的这一严重健康问题，并说已到了"晚做总比不做好"的状况。他还在惦念着邀请此间人士访美、校订本书部分文稿的问题。费、龙师生俩后先相继，倾心力于中国史研究、中美文化交流，实在感人至深。——编者

注释：

① Fred W. Drake, *China Charts the World, Hsu Chi－yu and His Geography of* 1848(Cambridge, Mass. ;1975). (Fred W. Drak 汉名龙夫威，以前中国出版物上的音译名德雷克；他的这本专著英文原版的封面上有手写体汉字书名《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编者)。

② 裨治文(Bridgman)，1801 年生于马萨诸塞州的贝尔彻敦，1830 年，受波士顿美国公理会的派遣到达中国，成为美国最先到华的传教士。他在中国停留长达三十年，用汉文出版了世俗和宗教的读物，其中有第一部详细介绍美国历史、地理和当时情势的汉文著作，此书 1838 年以后出了多种版本。1861 年他在上海逝世。

③ 《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 卷 12，页 328(1843 年)。

④⑤⑥ 同上，卷 12，页 333(1843 年)；卷 13，页 168(1844 年)；卷 13，页 236－237 (1844 年)(雅裨理生平详见本书李志刚论文——编者)。

⑦ 同上，卷 13，页 236(雅裨理 1844 年 1 月 27 的日记)

⑧ 同上，卷 15，页 216(1846)。

⑨ 同上，卷 20，页 169－194(1851)。卫廉士(Samuel Wells Willams 1812－1884)，在美国接受印刷工的训练，1833 年到华帮助裨治文出版《中国丛报》。他连年担任副主编、主编，在这过程中，他成了那个时代第一流的美国汉学家。他的生涯曲折多变；当过传教士，佩里(Commodore Perry)在日本的译员，撰稿人，翻译家以及驻华外交官。最后，从 1877 年开始，在耶鲁大学担任汉文教授终其余年。

⑩⑪⑫⑬ 同上，卷 20，页 170(1851)；页 178；页 192；页 194.

⑭ S. Wells Willams, *The Middle Kingdom* (New York; rev, ed. , 1883), 2:575. 卫廉士：《中国总论》卷 2，页 575.

⑮ 同上. (文惠廉 William J. Boone, 1811—1864)，1840 年来华，两年后到鼓浪屿。后返美被选为主教。甘明 William H. Cumming，据福建师范大学陈增辉教授提供的资料，他是美国医学博士，1842 年初抵澳门，6 月 1 日赴香港，7 日到达鼓浪屿，即在雅裨理住宅设一施药所。1844 年初在厦门开设医院，直到 1847 年退休——编者。)

⑯ *The New York Times*, 17 # 5151(March29, 1868)4; 10. 《纽约时报》1868 年 3 月 29 日第 4 版，第 10 版。

⑰ 丁韪良：《格物入门》，徐继畬序。同治戊辰(1868)仲春京都同文馆版；明治二年己巳官许明亲馆版。

⑱⑲ John K.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Cambridge, Mass. ; 1964ed.), 1:192, 1:284; 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卷 1，页 192；同上，卷 1，页 284.

⑳ ㉑ Teng Ssu—yu and John k.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u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Cambridge, Mass. , 1954), 1; 42。邓嗣禹、费正清合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页 1;页 42。

㉒ Dorothy Ann Rockwell, "*The Compilation of Governor Hsu's Ying—huan chih—lueh*", *Paper of China*(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vard University), 11:1—28. 罗克韦尔:"徐巡抚的《瀛环志略》",《中国论文集》卷 11,页 1—28。

㉓ David T. Roy, "*Hsu Chi—yu and the Shen—Kuang Szu Case at Foochow in* 1850"(*Seminar paper*, Professor Fairbank's files, Havard University; 1959). 罗伊:"徐继畬与 1850 年福州的神光寺事件"。

㉔ Drak, "A Nineteenth—Century View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rom Hsu Chi—yu's *Ying—huan chih—lueh*," *papers on China* 19:30—54(1965)。龙夫威:"徐继畬《瀛环志略》对 19 世纪美国的观察。"

㉕ 由于编者请我讲述徐继畬研究在美国的进展,而目前我的书依然是美国唯一的关于徐的专著,我相信读者会理解和原谅,为什么我在下文用不适当篇幅谈论自己的著作。

㉖ Ranbir Vohra, *China's Path to Modernization, A Historical Review from* 1800 *to the Precent*(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1987). 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New York*, 1990). 沃赫拉:《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斯潘塞:《现代中国研究》。

㉗ Michael H. Hunt,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New York, 1983). 亨特:《缔造特殊的关系,至 1914 年的美国和中国》。

㉘ R. David Arkush and Leo O. Lee, trans, and eds. , *Land Without Ghosts, Chinese Impressions of America from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Berkeley, 1989). 阿库什、利奥·李编译:《没有鬼魂的土地,19 世纪中期至今中国关于美国的印刷品》。

●萧致治　杨木根

鸦片战争与徐继畬

徐继畬是鸦片战争时期的著名人物，所著《瀛环志略》曾对近代中国发生深远的影响。徐自 1826 年以朝考第一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到 1869 年辞官归田，前后在中国政坛活动了 40 多年。但真正有所作为时期只是鸦片战争前后的十多年。自 1838 年春到 1851 年初，他长期在闽、粤两省做官，由道员递升到福建巡抚，并曾两度署理闽浙总督。他既亲身参与了禁烟和抗英活动，战后又长期负责福建省的对外交涉事务。他是禁烟和抗英的支持者；战争失败对他又产生重大影响。探讨一下徐氏在鸦片战争前后的表现，实事求是地评价鸦片战争对他的影响，对于全面正确评价徐继畬将是很有意义的。

禁烟与抗英的积极支持者

鸦片战争前，徐继畬在担任监察御史期间，弹劾贪官污吏，揭发官场腐败，反对藉端科敛，主张整顿吏治，受到道光皇帝的赏识，从此官运亨通，1836 年秋，出任广西浔州知府，1837 年秋又升任福建延建邵道。他感激道光帝的特达之知，为官清廉，办事认真，力图有所贡献。1838 年仲春抵达福建后，正值全国即将围绕如何禁绝鸦片展开大讨论之际。他因位卑官低，还没有资格上奏皇帝，参与这场大讨论。不过，从他 1841 年写的《禁鸦片论》一文来看，他是主

张严禁吸食鸦片的严禁派，对禁烟不但积极支持，而且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禁鸦片论》[1]中，徐继畬针对当时不少人主张“先杜来源，次绝兴贩，吸食者无所从得，将不禁而自止”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首先，他分析了“杜来源”已很困难。他指出，康熙末年，鸦片流传只限于广州、台湾、厦门等沿海少数地方，而且吸食者甚少。如果及时采取措施，切实禁止，是很容易禁绝的。而“事之玩忽，殆且百年”，到了鸦片泛滥已经十分严重之际，英国已因鸦片贩卖，每年“获金钱数千百万”，哪肯一旦放弃！此时此际，如若厉行严禁，就会像今天这样酿成战争；如果采取温和态度，“则沿海售卖如故”，因此杜来源已行不通。其次，“绝兴贩”也不可能。自从鸦片贸易兴起，兴贩者得利超过种田经商数十倍。大利所在，这些人也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对他们如操之过急，“不掉艇于海洋而为蔡牵、为张保，即啸聚于海岛，揭竿于薮泽，而成为矿徒驿卒之乱”。由此他得出结论：“治夷舶者乱之已成者也。……今若因夷舶之不可治，转而从事于奸民，不旋踵而弄兵潢池，害且有甚于夷舶者。”

杜来源既不可能，绝兴贩又会激起奸民造反，弄得无法收拾，是不是就听之任之呢？徐氏认为也是不行的。因为英美贩卖鸦片，“以鸩毒啖我，载我金钱货贝以去，而我因之以贫，使我耕田服贾之民，挽弓持戟之士，遍饵妖淫之药，而破家废业、宛转尪羸以死”。他们已用这种办法“戕人之国家数十”，我们决不能“听其自毙”。那么怎么办？唯一的办法是“严吸食”。他说，吸食鸦片的人，本身没有得到什么利益，既没有“杀人于市”，也未曾“剽人于途”，用诛杀办法加以严禁，似乎有点过于残忍。可是法制是因时而变的，“原情定罪，法之常也。立制以防乱，法之非常者也。鸦片之害，切于国计民生，近且酿为边患，宽之以自首，予之以期限，亦既谆谆然示之矣”。如果这样告诫还是屡教不改，是为“梗化之顽民，诛之又何惜焉”！若说“吸食之人半天下”，诛不胜诛，则是“法不及众，亦示惩而已

矣。”自 1839 年颁行《严禁鸦片烟条例》以来，有些郡县官也曾严行禁治，而民间依然是名禁实不禁。其所以如此，就是量刑太轻，不足使群众畏惧。如果将吸食者绞死于市，群众自必奔走相告，相诫不吸。

他提出的禁烟具体办法是：“先贵而后贱，先富而后贫，先内而后外，先豪猾而后良弱”。他主张通过访察，把那些平素表现即该诛杀而又吸食鸦片的人先行捕杀示众，每年大县不过 10 人，小县依次递减，“操之无过蹙而持之不少懈”。如此坚持十年，能改的改，不改的或诛杀，或死亡，鸦片当可禁绝。

是不是严禁吸食，对英美鸦片贩子、国内兴贩奸民就可置之不问呢？当然不是。儆治兴贩者应当“急于西北，而缓于东南，密于内地，而宽于海口，得而诛之无后时，可以无激变之患。”如果无人吸食，国内兴贩少，英人无利可图，“虽含怒蓄怨，终不能藉为兵端”。这样，“外而伐强寇之阴谋，内而消奸民之反侧，所诛者少，所全者多，愚以为弭大患于无形，而复凋敝之元气，计无有良于此者”。

从徐氏的上述主张看，他和黄爵滋、林则徐建议严禁吸食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而强调先贵后贱、先富后贫等等尤为卓见。他提出杜来源、绝兴贩难于实行，显然是从清朝统治面临崩溃形势的国情出发，为了维护统治而采取的“弭大患于无形”的委曲求全的办法。至于他说是由于禁烟酿成战争，则在认识上不免有片面性。因为鸦片问题只是爆发战争的直接原因，根本原因是英国为开辟中国市场而推行的扩张政策。

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朝当局为了加强福建沿海防卫，把徐继畬从闽西北的延建邵道调署闽东南的汀漳龙道。他刚刚到任，厦门即告急。漳州离厦门仅 70 里，并且有一水相通，居民一日数惊，人心惶惶。徐继畬为堵死英军进攻之路，即刻采集大木为排桩，塞住镇门各个港口，同时调集民兵，扼险固守。英军知道有备，没有发动进攻，防区幸得安全。将近两年的抗英防御斗争，徐继畬尽职尽责，兢

兢业业，努力整顿和加强防务，常备不懈。虽然始终未曾和英军直接交锋，但保卫了海疆地区的安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抗英斗争中，他有三点是值得特别肯定的。

第一，整顿海防，努力提高军队战斗力。清朝的军队，到鸦片战争时已经彻底腐化，不堪一击。鸦片战争中一触即溃，屡战屡败，就是明证。诚如徐继畬指出的，"两年以来，当事只知调兵，而不忧兵之不可用，饥与寒莫之恤，诛与赏莫之用，其名为兵，实则市人。水中已矣，逆夷登陆来攻，望风辄走，堕名城直如弹纸"。[②]他分析腐化到这步田地的原因，一是士兵薪饷太低，食不充腹，衣不蔽寒，自然没有积极性；二是缺乏训练，素质很差。针对这些问题，他抵任后，一是整顿海防，加强士兵与乡勇的组织与训练；再是采取了汰弱留强的办法，将戍守海澄的老弱残兵裁去800多人；把这些兵丁口粮，报请督抚批准，加成六分发给留下兵丁，借以激发兵丁的抗英积极性，当时福建藩司不同意一律发给六分，他为保卫海疆，不计个人得失，不怕得罪上司，以死力争。他说，漳海防兵，已"遵督宪批示行知各营，一律加成六分，万无更改之法"。如果不同意，"着赔惟命，参撤惟命，头可断，议不可改"。[③]他这种不怕丢乌纱帽，坚持正确意见的志节，实在可钦可敬。

第二，以身作则，与守土共存亡。徐到达漳州后，为了尽守土官之责，他奔走于海澄漳州之间，每天夜间都要登上城墙，"与守陴者垂泣告语，勉其敌忾"，认真防守。1841年8月26日，英军攻陷厦门。徐所管辖之海澄县东离厦门仅30里，西离他驻守的漳州也只40里，都是一水相通，旦夕可达。厦门失守，海漳同时告急，百姓纷纷逃散，有些官员也将家眷偷送出城。在这严峻形势面前，他调兵募勇，运米拦港，加紧练兵，誓以死守，力劝大家镇静，人心才渐渐安定下来。他身为文官，虽不知兵，但为卫国保邦，"驰驱海疆，日不暇给。自厦门失守之后，则寝食不遑，心力交困"，决心"与此土共安危，与此城共存亡"。[④]特别可贵的是，当徐决心"督兵勇昼夜防守，

志在与城存亡”之际，其夫人绫氏亦壮烈表示“相从俱死”。婢媪劝她外出潜避，反遭叱斥。[5]这种夫妇一心，共守危城，十分难得。由于徐继畬以身作则，认真防守，海防有所加强。后来他在感怀诗中有云：“无何海波扬，楼船致声讨，霞漳当其冲，防海周群岛”（道光二十年署汀漳龙道，沿海各岛港皆设防——徐自注）。[6]1842年初，张集馨接替徐出任汀漳龙道，张也认为漳海防守妥洽，“实在能接仗者三千余人，接应勇千余人，已给腰牌听候传令者六万余人，布置俱属妥洽，声势亦壮”。[7]

第三，反对妥协投降，坚持抵抗。鸦片战争中，面对敌人船坚炮利，是坚持抵抗，还是妥协求和，既是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争执焦点，对于每个人的志节也是一次重要检验。徐在这个问题上，从他的言行看，是坚持抵抗、反对妥协的。当时琦善“弛备求和”，满以为可以换取英方停止进攻；结果却是导致沙角、大角、虎门相继失守，进逼广东省城。奕山妥协投降，与敌人签订《广州停战协定》，赔偿赎城费数百万两。徐继畬对他们的做法很不以为然，认为无异“以薪救火，祸不旋踵”。后来英军攻陷定海、镇海，钦差大臣裕谦因坚持抵抗殉难，徐则赞扬他是“豪杰之士，以灭贼自任，力竭而死，天下悲之”。[8]由此可以看出，在抵抗与投降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徐的态度是鲜明的。

根据徐继畬在鸦片战争中的表现，他不但坚持抵抗，而且为此付出了全部心血。可以认为，他不愧为尽职尽责的抵抗派。

“总期民夷两安，方为不负疆寄”

鸦片战争是清朝入关以来与从东南海上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强盗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武力较量。清朝统治者对于这次战争，事前既毫无思想准备，同时对敌情蒙昧无知。道光帝开始想以撤换林则徐求得妥协，结果却导致英人的节节进攻。和平幻想破灭之后，又

想大张挞伐，决一死战。哪知由于战略失策，战术失误，兵不能战，弄得节节失败。在武力毫无战胜希望的情况下，最后不得不屈辱求和，被迫与英人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经过这次战争较量，清朝当局鉴于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对外又无法依靠武力战胜敌人，因而在政策上推行息事宁人方针，对内力求稳定残局，对外尽量避免引起衅端，他指示各省督抚，“不可致生夷衅，亦不可稍拂民情。总期民夷两安，方为不负疆寄”。[9]

徐继畬作为抵抗派的一员，对于战争的失败，感到十分痛心，却又无可如何。这种困惑心理，战争期间已有反映。1841 年冬，他在给家乡老友的信中说，英人“见官兵连年败挫，知中国孱弱无能，其志愈侈，其谋愈狡，非大挫其锋，其势未有所止，而水战非我之所长，仓卒无制胜之术；欲与之议和，则彼且索银一千数百万，又必索沿海各要地为码头，岂能听之耶！二百年全盛之国威，乃为七万里外之逆夷所困，至使文武将帅接踵死绥，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末，兴言及此，令人发指眦裂，泣下沾衣”。[10]经过鸦片战争，徐深知敌人船坚炮利，以中国孱弱之兵，断断无法取胜。加之鸦片战争后，道光帝的态度已经改变，只求民夷相安，竭力避免引起新的争端。徐继畬乃道光帝一手提拔起来的。对道光帝的知遇之恩，他感激涕零，“十年之中，由知府擢任封圻，……以孱弱之才，骤膺艰巨之任，臣惟有殚竭血诚，力图挽补，尽其心之所能尽，为其力之所能为，断不敢畏难苟安，以冀仰答高厚鸿慈于万一”。[11]因此，他对道光帝唯命是听。鸦片战争时期，道光帝主战，他竭力尽心，“捐糜图报”；鸦片战争结束不久，他被提升为福建布政使，并兼办通商事务。尽管“困心棘手，不可名言”，他也谨守道光训谕，“饮冰茹蘗，不取一钱，矢慎矢勤，力图补救。……坚守素志，不肯轻开边衅”。[12]他的态度的转变，既取决于他对时局的认识和敌我双方实力的估量，也与道光帝态度的转变有直接关系。

按照南京条约规定，东南沿海共计开放五口对外通商，其中有

厦门、福州两口均属于福建省。徐继畬从出任布政使起，到1851年解除福建巡抚职务止，厦门、福州的对外通商事务一直由他管理。当时事属草创，一切均无成例可循，其艰难是可想而知的。1847年初，徐接任福建巡抚后向道光帝报告说："闽省素号瘠贫，福厦两口，现又为夷人互市之区，官民交困，催科与抚字两难；番汉杂居，弹压与羁縻匪易。臣受恩深重，固不敢因积疲难返而相率循延，亦不敢因嫌怨易生而少存畏葸，惟有勉策驽骀，将地方夷务与督臣刘韵珂悉心商榷，督同属吏力图妥善，冀酬高厚鸿慈于万一。"道光帝对此曾作了朱笔批示，嘱咐他"一切认真勉力，夷务尤当细心妥办"。[13]综计徐在福建办理通商事务，前后九年，他始终遵照道光的旨意，坚持"内安民心，外察夷情，不敢有偏袒之私，不敢存苟且之念，总期民夷相安，上慰圣怀。"[14]这可说是徐办理通商事务的指导方针，也是他处理民夷关系的基本原则，无论是在布政使任内，还是担任巡抚期间，他都是这样做的，下列事实足资证明：

一、福州英人欺侮民人事件。1846年3月末(阴历三月初二三日)，有一只英国小船驶入福州南台港停泊，水手先后到市场上购买鱼肉。由于语言不通，钱未付足，即将鱼肉带走。各店铺认为是"短价强买"，愤愤不平。恰好英人阿金在街上行走，乡民林森森误碰了他一下，阿金即拿木棍打伤林的额角，居民路见不平，均认为英人欺人太甚，各怀怨愤。正当群众议论纷纷之时，又有英商记连等人先后走出，被愤怒的群众殴打致伤。4月1日，"又有民人扛抬酒瓮，经过夷馆门首，被管门之广东人误将酒瓮碰破，致相争论"。群众闻讯，蜂涌而至，竟有英人雇用的广东籍仆役开枪打伤群众两人。众人益发忿怒，齐找英人讲理。他们"拥至夷馆，将馆外栅栏挤毁，并在街殴伤黑夷一人。该处匪徒溷迹其中，即假托公忿，乘机将夷馆内货物搬抢。时弁兵等驰至，将抢夺各犯连所抢各赃，当时一并拿获，并查拘斗殴各犯，解交臬司亲督委员分别审讯，众人走散"。[15]事件发生后，福建当局一方面审讯了抢劫匪徒和斗殴各犯，

另方面因怕群众怀疑"地方文武偏护夷人而不爱百姓"，又发布告示说明原委。同时向英国驻福州领事阿利国辩明是非曲直，并警告"如再不约束夷众，激成众怒，即官为保护，亦属无济"。阿利国表示："事后必当明定条规，严谕船馆各色人等，不许再惹事端。"4月10日，阿利国又带同夏巴谒见了徐继畬。徐再次当面告诫："此后必须严行管束夷众，中国官员亦禁止众百姓，不许欺凌远人，两不偏袒，方可永敦和好。"阿利国心悦诚服，唯唯而去。[16]此事由于处理公正及时，事态很快得到平息。

二、处理中外命案。1850年11月13日(十月十日)，瑞国人发士、吕吉士二人雇坐小船赴五虎门外，在金牌洋突遇贼船拦抢。发士用小鸟枪击伤一贼，另一贼将发士刺落水中淹毙，吕吉士泅水逃回，船中洋银200元被抢去。事件发生后，徐继畬限令三日内拿获正贼归案。18日将该船船主朱茂科拿获，后又将朱瓜婆等3人拿获解办。同月17日，停泊南台的葡萄牙国护货船上黑人淹波罗吐和含璧上岸购买丝烟。淹波罗吐因与铺户陈炉炉争论价值，竟用尖刀划伤陈的额颅。民人林举为前往拦劝，又被戳伤肚腹殒命。淹波罗吐畏罪脱逃，含璧被群众抓获。不久，淹波罗吐在船主山哑的协助下也很快抓获。徐继畬不明约法，竟按与英美国等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关于领事裁判权的规定，将葡属黑人淹波罗吐、含璧二人解往广东，咨送两广总督徐广缙发交葡驻澳门之领事，"查照条约办理"。此两案奏报清廷后，军机大臣字寄闽浙总督裕泰和徐继畬，同意他们"分别照例办理"。[17]

三、英国传教士等租住神光寺事件。1850年，英翻译官金执尔代替传教士在乌石山下之神光寺租屋两间，将租约送侯官县用印。知县兴廉未经禀商，即在租约上加盖公印。徐继畬查知后认为传教士与英商无异，"断不听其入城居住"。嘱令兴廉与金执尔交涉，令在城外另行租赁。金执尔借口要报告英使文翰批复后才能确定是否搬迁。徐继畬同意暂行从缓。消息传出，绅民群起反对，联名缮

写公启，要求传教士等作速搬出城外。书院生童和闽省士民也遍贴告白，声言要与之讲理。监察御史亦纷起弹劾。徐与闽浙总督刘韵珂反复密商，因害怕过激生变，数次上奏，申说原委，说明利害，力主缓办。徐认为英夷租屋一事，他“与绅士虽有缓急之分，然皆坚意驱逐，并无歧异不同之处”。但不同意绅士提议调兵演炮募勇。理由是这样大事声张，如为英人得知，“窃恐枝节一生，不可收拾”。[18]双方各持己见，越弄越僵。此时道光帝已经去世，咸丰帝继位后，不满意前此的屈辱外交，对外态度趋向强硬。原来主抚的中枢权要穆彰阿和耆英相继去职。尽管神光寺租屋事件于 1851 年初解决，徐继畬还是因此事被罢去福建巡抚。

上述几件事就是徐继畬在福建办理通商事务的几桩主要事件。从这几件事的处理经过看，他采取的是一种稳健态度，“两不偏袒”，力持公正，依法办理。除了将葡属黑人淹波罗吐捕送澳门当局治罪有损中国司法主权外，其他几件事无可非议。即使神光寺事件，徐和福建绅士的争执也只是缓急之分，并非原则分歧。而且徐并没有像耆英那样，按照“一视同仁”的原则，与美法等签订丧失大量权利的不平等条约。因此，以往将徐定为投降派是不符合实际的。

究心世务　发奋著书

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既震撼了已经腐朽的清朝大厦，也唤醒了长期沉浸于“天朝大国”迷梦中的知识分子。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引起了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的深思。他们一方面感到清朝的腐朽统治非进行改革不可；另一方面看到英人的船坚炮利，远为中土华夏所不及，迫切希望了解九州以外的世界。从而，睁眼看世界的风气，紧接着鸦片战争在中国大地逐渐形成。徐继畬可谓开风气

之先的先驱。《瀛环志略》则是徐在鸦片战争后究心世界事务，关注外国情况，奋而著之为书所结出的一个硕果。

徐继畬究竟为什么要撰写《瀛环志略》？这个问题似乎尚未完全解决，本文只拟侧重探讨一下该书的撰写与鸦片战争的关系。

关于徐氏撰写《瀛环志略》的动机，他本人没有留下多少记载。他在致吴思澄的信中曾说，系"在闽藩任内偶著《瀛环志略》一书，甫经付梓，即腾谤议。先师（按指吴文镕）独加褒赞，嘱令再加修饰，抄缮进呈"。[19]这封信是《瀛环志略》脱稿付梓整整十年之际写的。他说是"偶著"，似乎没有什么动机可言，其实并不尽然。徐氏撰著《瀛环志略》，不排斥没有偶然因素。诚如徐氏在该书自序中谈到著书缘起所云，是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底，因为办理厦门通商事务，在厦门遇见了当时担任翻译的美国人雅裨理，偶然从他那里看到了"绘刻极细"的地图册子，因而引起了他撰著此书的兴趣。从此花了整整五年的功夫，"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自癸卯至今，五易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事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20]从这个自叙看，确有偶然因素，但偶然中也寓有必然性。不然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大气力，"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来撰著此书呢？

细考徐氏为何撰写此书，与他本人的爱好固有关系（如他本来对史地早有喜爱，曾写过《两汉幽并凉三州今地考略》、《两汉沿边十郡考略》等著作。还想完成《两汉郡国今地考略》一书）。但主要还是出于当时形势的需要。经过鸦片战争，徐氏深知清朝国力衰颓，远非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手，但又无法在短时期内改变这种力量对比，万一再次发生中外战争冲突，中国只会进一步丧权辱国，招来更大祸害。为了维持残局，所以他在办理对外通商事务中，特别谨慎小心，不敢轻启边衅。然而，作为忧国忧民的徐继畬，并非甘于苟安，而是竭力图谋有以振作。他写《瀛环志略》一书，尽管他没有明白说出这个意图，而只要我们通读全书，他的这种政治意向是

十分明显的。《瀛环志略》一书，除引用资料经过反复推敲考证，比较符合实情，记叙比较全面外，就是很注意探求世界各国兴衰强弱之理，为当时衰朽的清朝振衰起敝提供各方面的借鉴。他在书中加了很多的按语。这些按语都是叙述各国政治、经济、军事、社会风情、历史沿革之后有所为而发的议论，其目的就是提醒人们吸取各国兴衰成败的历史教训，发奋图强。徐继畬在鸦片战争时期，眼见清军节节失败，对中国前途深表忧虑，"未知作何了局"！鸦片战争后，由于办理通商事务之便，在与西方传教士、领事、医生、外商等接触中，较多地了解外部的情况，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扩张政策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预感到中国面临严重危机，因而在《瀛环志略》一书中，一方面对英、法、美等国家富强的原因作了较多的介绍；另方面对非洲、美洲，特别是印度和东南亚各地怎样沦亡也作了详细的记叙。其目的无非是启迪人们要赶快猛醒，否则不免要蹈印度和东南亚的覆辙。

比如，书中对印度沦亡的经过，在卷三《五印度》和卷七《英吉利》中均有较翔实的叙述。他说："欧罗巴之居印度，始于前明中叶，倡之者葡萄牙，继之者荷兰、佛郎西、英吉利，皆以重赀购其海滨片土，营立埔头。蛮人愦愦，不察萌芽。英吉利渐于各海口建立炮台，调设戍兵，养锐蓄谋，待时而动。迨孟加拉一发难端，遂以全力进攻，诸蛮部连鸡栖桀，等于拉朽折枯，于是五印度诸部，夷灭者十之八九，哀哉！"[21]这里无异是在提醒国人：印度的沦亡，是我国的前车之鉴。而今灭亡了印度的英国，又打进中国来了，如果麻木不仁，等闲视之，大难即将临头。

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政策面前，要想避免亡国的厄运，别无他途，惟一办法是奋发自强。徐继畬虽然没有像魏源那样，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主张，但对世界一些国家敢于奋起反抗、奋发自强，曾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如在记叙东南亚各地时，对苏禄人民的反抗，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苏禄是个南洋小国，"当西

班牙、荷兰虎视南洋，诸番国咸遭吞噬；苏禄以拳石小岛，奋力拒战，数百年来安然自保，殆番族之能自强者哉”![22]瑞典是苦寒之国，物产也不丰富，因能奋发自强，屹立北欧。徐继畬对此亦颇有感慨。他说：“瑞国处穷发之北，在欧罗巴诸国中最为贫瘠，而能发奋自保，不为强邻所并兼。‘安乐者祸之萌，忧患者福之基’，虽荒裔亦如是也。”[23]

有关这类兴衰强弱的记载与经验教训，书中随处可见，不必一一列举。徐继畬这种以世界各国兴衰为鉴，启发国人猛醒的政治倾向，早期维新派王韬有过评论，非常精辟，也十分中肯。他在《瀛环志略跋》中说：

> 中丞之作是书，殆有深思远虑也乎？其时罢兵议款，互市通商，海寓晏安，相习无事，而内外诸大臣，皆深以言西事为讳，徒事粉饰，弥缝苟且于目前；有告之者，则斥为妄。而沿海疆圉，晏然无所设备，所谓诹远情、师长技者，茫无所知也，况询以海外舆图乎？中丞官闽峤，膺方面之寄，蒿目时艰，无所措手，即欲有所展布，以上答主知而下扶时局；而拘文牵义者动以成法为不可逾，旧章为不可改，稍有更张，辄多掣肘。中丞内感于时变，外切于边防，隐愤抑郁而有是书，故言之不觉其深切著明也。呜呼！古人著述，大抵皆为忧患而作，顾使中丞不得行之于事，而徒见之于言为足惜已。

后来，阎锡山在为徐继畬全集出版作叙时，虽不是专评志略，同样谈及其政治意向，足资佐证。阎说：“前清道咸之际，海氛初煽，英人百计狡尝，当事者率狃于侈大，不能究厥底蕴；或失则激，往往有之。先生莅闽久，务得其强弱胜负之所以然，而不为旦夕功，曲意咨访，随事防维，大要不轻启衅端，示之无间可入以服其心，而屈其计，而深识远虑，常烛照数计于数十年之前，数十年之后覆成局而案之，有历历不爽者焉。”[25]

由上可见，无论是从书中的内容看，还是从后人的评论看，徐

继畬撰著《瀛环志略》一书，其核心是鸦片战争之后，有感于民族危机的深重，想借此唤醒国人，共谋御侮图强之策。可以说，没有鸦片战争，就不会有《瀛环志略》的成书。《瀛环志略》正是在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下的忧愤之作，是徐氏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作者萧致治，1929 年生，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
杨木根，1966 年生，武汉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附记：本文于徐继畬讨论会后完成。——编者

注释：

① 徐继畬：《禁鸦片论》，《松龛先生全集·文集》民国四年版卷一，第 7—10 页。本段引文均见此文。

②③ 徐继畬：《致某方伯书》，《松龛先生集·文集》卷三，第 3 页。

④⑧⑩ 徐继畬：《致赵盘文明经谢石珊孝廉书》，见同上，第 6 页。

⑤ 徐继畬：《续夫人家传》，《松龛先生全集·徐氏本支叙传》，第 38 页。

⑥ 徐继畬：《感怀杂咏五首》，《松龛先生全集·诗集》上，第 9 页。

⑦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61 页。

⑨ 齐思和等编：《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 册第 107 页。

⑪ 徐继畬：《授闽抚谢恩疏》，《松龛全集·奏疏》卷上，第 13—14 页。

⑫ 徐继畬：《谢政归里祭主文》，《松龛全集·文集》卷四，第 25 页。

⑬ 徐继畬：《报接任疏》，同⑪，第 14 页。

⑭⑱ 徐继畬：《复官绅意见不合疏》，同⑪，第 37 页。

⑮⑯ 《敬徽等奏福州英人欺侮民人激起公愤当经分别审办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4 年版，六，第 2989—2990 页。本奏徐集未收。

⑰ 《交涉华夷命案疏》，《第二次鸦片战争》丛刊，一，第 132—133 页。

⑲ 徐继畬：《复吴思澄比部世兄书》，《松龛集·文集》卷三，第 20 页。

⑳ 徐继畬：《瀛环志略》自序，光绪二十四年新化三味书室版。

㉑㉒㉓ 徐继畬：《瀛环志略》卷三，第 18 页；卷二，第 9 页；卷四，第 33 页。

㉔ 王韬：《瀛环志略》跋，《弢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274 页。

㉕ 阎锡山：《松龛先生全集》叙。

●吴廷桢

徐继畲——开眼看世界的先驱和爱国者

关于徐继畲及其历史地位的评价，学术界存在分歧。我以为徐继畲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先驱和伟大的爱国者。

一

鸦片战争前，徐继畲对鸦片泛滥的后果，认识颇深，主张严厉禁止。他在《禁鸦片论》中说："鸦片之害，食货之妖也"，"切于国计民生，近且酿为边患"。正确指出，鸦片流毒所以日趋严重，是由于清政府长期不予重视，"事之疏忽，殆且百年，其间虽稍设禁防，而有司以为具文，渐染浸淫，愈传愈广"。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英国鸦片贩子的大量输入，"其鸦片售之中国者，常十之七八，是英夷之剥我元气而富强其国者专任是矣"。禁烟办法有三："一曰杜来源，夷舶是也"；"一曰绝兴贩，奸民是也"；"一曰严吸食，官吏军民比比是也"。①并把重点放在重惩吸食上，因为重惩吸食，贩者无利而改业，夷无销路也就不载运来华了。这种见解和主张，同禁烟派林则徐等基本一致。

鸦片战争爆发后，徐继畲力主抗战，并在福建前线积极参与和

组织反侵略战争。他严厉谴责英国用"鸦片愚弄中国,朘其财货,萌心窥伺,已非一日"。揭露琦善用交纳赎城费来换取英军从广州撤退的做法,是"以薪救火,祸不旋踵"。坚决表示"死守"国土,并为稳定海澄民心,做了大量工作。当厦门失守后,他寝食不安,断定"夷情叵测,事无了期",誓"竭力尽心",与漳州共安危、共存亡。他对于反侵略战争中清军屡被敌人挫败,许多爱国将士为国牺牲,愤激不已。裕谦殉国后,他沉痛指出,"此公豪杰之士,以灭贼自任,力竭而死,天下悲之"。又说:"二百年全盛之国威,乃为七万里外之逆夷所困,至使文武将帅,接踵死绥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末,兴言及此,令人发指眦裂,泣下沾衣"! 他还认为鸦片战争中,由于清朝官兵"承平日久,人不知战,名之为兵,实则市人,无纪律,无赏罚,见贼即走,此其所以败也"。[②]见识虽然肤浅,却反映了徐继畬想从中总结出有益教训的良好愿望。

鸦片战争结束后,徐继畬每忆及英国侵略者蹂躏国土的情景,犹愤懑填膺,愤怒指出,"英吉利以西海岛夷,为强售鸦片之故,突尔称兵,在粤则扰我虎门,在闽则扰我厦门,在浙则扰我定海、镇海、宁波、乍浦,在江苏则扰我上海、镇江,且阑入长江,直逼江宁,截我运道,逆恶滔天,凡在血气之伦,畴不怀食肉寝皮之恨"。[③]仇敌爱国之心,溢于言表。与此同时,徐继畬在战后的中外交涉中,审时度势,慎重对策,力求避免资本主义列强借故制造衅端。对神光寺事件的处理,即其实例。

二

更可贵的是,徐继畬在鸦片战争之后,鉴于中外交往大开,古老的中国已经不能与世隔绝的新局面,立刻着手研究世界各国的情况,撰写了《瀛环志略》10 卷,成为近代中国系统介绍世界史地的重要著作之一。

徐继畬在《瀛环志略》中，除了介绍整个世界和各主要国家及地区的自然地理、历史沿革乃至风俗习惯以外，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通过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格局以及西方国家经济政治的描述，流露出对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的忧患意识和隐约而曲折地表述了当时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

徐继畬指出，印度、南洋等地相继成了欧洲列强的殖民地，"五印度全土，归英辖者十之七，仅余西北数部尚未服也"。[4]"昔之南洋，为侏儒之窟宅；今之南洋，乃欧罗之逆旅，履霜冰至，岂伊朝夕？事势之积渐，盖三百年于兹矣"。[5]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在东方的扩张，已经构成对中国的严重威胁。"泰西据南洋诸岛，……中土之多事，亦遂萌芽于此"。[6]中国"求隔绝而不能"，[7]惊呼这是"古今一大变局"，[8]"天下从此多事矣"！[9]

中国古代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往往是从体肤等外表形态上开始的。譬如说西方"隆鼻赤发，面粉眼绿"、"身长鼻高，猫眼鹰嘴"等等。《明史·外国传》称"和兰，又名红毛番"，"其人深目长鼻，发须眉皆赤，足长尺二寸，颀伟倍长"。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世界除了坏人心术的"奇技淫巧"以外，根本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东西。鸦片战争期间，英军的船坚炮利，才使朝野人士大吃一惊，才发现那些不足挂齿的远方愚顽，原来也有不可小看的地方，但其长技也不过仅此而已，鸦片战争后，包括《瀛环志略》在内的几部介绍世界史地的巨著问世，使中国人对国外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把着眼点和注意力，从人种学转到社会学，从生理特征和武器精良转到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并看到一个"多事"的天下，极大地促进了人们思路的深化，也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新觉醒。

《瀛环志略》指出，"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由其善于操舟，亦因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力而为之也"。[10]又指出"欧罗巴诸国，皆航海立埔头，远者或数万里。非好勤远略也，彼以

商贾为本计，得一埔头，则擅其利而归于我”。[11]认识到英国所以“骤致富强，纵横于数万里之外者，由于西得亚墨利加，东得印度诸部也”。“盖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朘削其精华”。[12]不但觉察到了欧美国家所以富强，全赖于贸易和税收，而中国则以农立国，重农轻商，显示出中外“国本”的差异，而且初步揭露了资本主义列强海外掠夺的本质，并从被掠夺被侵占的残酷事实中引发出带有时代特征的民族危机感。

在政治制度方面，徐继畬特别介绍英、美、法、瑞士等国的选举制、议会制和立宪制，对于议会的组成、职权范围等，都作较详细的叙述。如法国设“宰相一人，别立五爵公所，又于绅士中择四百五十九人立公局。国有大政，如刑赏征伐之类，则公所筹议；事关税饷，则令公局筹办。相无权，宣传王命而已”。[13]对英国的政治制度，记述特别详细，并结论说，实行议会制，是欧洲各国的共同体制，“不独英吉利也”。[14]徐继畬特别赞扬美国的民主，说美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15]称瑞士为“西土之桃花源”，“国无苛政，风俗简朴纯良，数百年不见兵革”。[16]

《瀛环志略》关于欧美各国经济政治制度的描述，已经接触到近代资本主义体制的主要特征，它虽然不意味着徐继畬已经认识了资本主义优越于封建主义和号召国人仿效西方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徐继畬也和魏源等人一样，发现了一种和古老中国根本不同的“国本”和政体，深刻感到这种重商轻农、以商为本的经济结构和“聚众公议”的政治制度的出现，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尤其是在字里行间对资本主义政治的赞扬，不能不构成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潜在威胁，因为它向人们宣告，在地球上还有一种和封建主义根本不同的新的社会体系。因之，一旦有相应条件的配合，就会推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崩溃。

三

徐继畬遭到指责，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对神光寺事件的处理，另一是鸦片战争后对资本主义列强的某些认识和对策。应该具体分析。

关于神光寺事件，当时有两种主张：林则徐等主张仿照广州反入城斗争的做法，直到调兵演炮募勇，采取武力手段，把租赁住入神光寺的两名英国人（传教士和医生）赶走；徐继畬等主张通过交涉以达到同样目的，因而受到前派人物的严厉谴责和弹劾，认为这种办法是对英人的迁就和妥协，"听其任意阑入"，[17]是"强民以从夷"[18]，甚至散布谣言，诬徐继畬派兵护送英人进入神光寺等等，"吠影吠声，轰然交作"。徐继畬认定"夷人租赁城内寺屋一事，事本细微"，从容劝谕，即可了结。倡议调兵演炮募勇，强制驱逐，"意在沽名"。故坚守成见，不为所动。除向反对派"剖析利害"外[19]，又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反复申述了所以主张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原由，归纳起来是 1. 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中外事务，必须镇静筹办，宽严互用，总期民夷两安，方为妥切。尤其是当时英国文翰因广州入城未遂，正在上海、天津投书申诉，又在香港公开策划，企图用福州口岸以交换台湾，办理更应慎重，使之无机可乘，制造衅端。如果调兵演炮募勇，一旦英人"因此借口，是以小事而堕其奸计"；[20] 2. 英人违约租屋，固属理曲，而侯官知县兴廉在租约上误行用印，也是英人得以入寺的依据。经过交涉，英国代理领事金执尔并未断然拒绝退出，只是坚持要等待文翰的批复，没有堵死解决争端的门径，不宜操之过急，致令别生枝节，可以从缓设法，使之自行搬出；3. 道光二十四年，英国领事李太郭租赁城内寺屋居住，徐继畬等曾饬署侯官县保泰密向绅民授意，要他们联名上书反对入城，并聚众阻止，以便用众怒难犯等危词耸听，使之畏葸，不敢入城，不料联名具呈虽有二百余人，但李太郭入城之日，竟无一人前往拦阻，李太郭终

于如愿，入城租住乌石山积翠寺。福州南台口岸开市时，徐继畬也用过同样办法，邀集绅士，密约居民铺户公立议单，不与夷人来往买卖，亦未奏效。所以福州不能简单沿用广州方式。

基于以上认识，徐继畬一面将其决策，密谕联名驱逐英人的生童，劝其静俟处理，一面对英人“故示优容”，在给金执尔的答复中称：“讲经人尚未得住处，岂忍别令迁移，致使露处，但省中绅民既不甘愿，必难日久相安，只好在神光寺内暂行借住，不准租赁，一俟在城外觅有妥善住房，即行退还”；[21]一面密令绅民不得前往神光寺听经、就医，工匠不得为英人住房加工修缮，僧侣不得向英人出租寺院住室，一面派兵在神光寺附近巡防，以免坏人乘机肇事。徐继畬的这种做法，“有驱夷之实，而无驱夷之迹；不拂民之情，而可关夷之口”，[22]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入寺英人日陷窘境，不得不通过翻译官星察里向兴廉表示：“租屋是小事，既系士民不愿，官府为难，若不搬迁，恐伤和好。惟城外一时难得住处，应先搬至伊国翻译官所租赁之道山观暂住，即将神光寺交还，以免口舌”。[23]接着，两名英国人在十一月十九日、十二月二十二日前往道山观居住，退还了神光寺房屋，租约交回涂销。徐继畬随即饬侯官县谕令神光寺僧人出具切结，日后永远不准将房室租与英国人居住。到此为止，圆满地解决了神光寺问题。

那么徐继畬何以在神光寺问题上受到责难、惩处和罢官呢？原因值得深入剖析，但就实质而言，应归结为审势度势和盲目虚骄原则分歧的具体反映。如果联系徐继畬因撰写《瀛环志略》而受到攻击，问题就是更加清楚了。大量资料说明，此书“甫经付梓，即腾谤议”[24]，说它“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25]“听信夷书，动辄铺张扬厉”，说它“似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26]种种斥责，不一而足。甚至曾国藩也认为“徐松龛中丞著书，颇张大英夷”，[27]因此神光寺问题一出，徐继畬“坚守成见，不敢启衅边隅，遂致弹章迭上，万矢环攻”，[28]“欲中以奇祸”。[29]关于对列强的某些认

识和主张，如道光三十年的《揣度夷情密陈管见疏》、《奉谕密防英夷疏》和《再奉谕密防夷情疏》等，认为中国对英国侵略者难于制服，难于防范，并列举了许多事实来论证自己的见解，在一些问题上确有夸大敌人、贬低自己的倾向，对敌我实力和长短的估量，有失偏颇。但也不能说徐继畲的议论，毫无是处。他认为对外原则是"总以制夷而足以服夷，息事不致生事为妥"。特别是当时正值"夷情浮动之际，巡防堵御固宜讲求，而驾驭笼络，亦应参酌"。因此，他既"积极暗中筹画，外面仍寂然无事"，"又密饬办理通商各员，时时留心访察该夷有何动静，即行密禀"，反映了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政府官员，经过鸦片战争之后，对待资本主义列强，开始放弃蛮夷"性等犬羊"、非抚即剿的传统观念和对策，转取一种比较审慎的态度。这种对外态度的变化，似应理解为从盲目蛮干到理性的现实主义的过渡。

四

徐继畲是个历史人物，是封建统治者的一员封疆大吏，如同其他历史人物都具有历史局限性一样，也存在着特定的历史局限性。例如他强调以民制夷，认识到"夷人不畏绅而畏民，缘绅士之口诛笔伐，不能慑其气；而百姓之力强势众，实可挫其锋"。"驭夷之要，莫先于固结民心，如果民知大义，志切同仇，地方官正乐于激励，以为防御之资"。[30]并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于人民力量，挫败了英人想染指台湾煤矿的阴谋。但是，徐继畲不可能真正相信和发动群众来对付外国侵略者。他认为福州人民"民气孱弱"，"重利轻义"，[31]宣称民众"易聚难散"，"沿海地方数年来盗贼之充斥，半系乡勇流毒"。[32]他的"藉民以拒夷"[33]不过是把老百姓当作地方官的挡箭牌，强调民意如此，官莫可奈何。站在民夷之间扮演仲裁者的角色，力图以此堵死侵略者发动战争的借口。又如他常常立足于原有知识

结构的基础上应用传统的价值标准去观察、认识和评论外部世界。他说："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34]这种比喻，可称为不伦不类。诸如此类，必须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不能苛求于前人。

（作者吴廷桢，1924年生，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注释：

① 《松龛先生全集·文集》卷一。

② 《致赵盘文明经谢石珊孝廉书》，《松龛先生全集·文集》卷三。

③ 《揣度夷情密陈管见疏》，《松龛先生全集·奏疏》卷下。

④ 《瀛环志略》卷三。

⑤⑦ 《瀛环志略》卷二。

⑥⑫⑬⑭ 《瀛环志略》卷七。

⑧ 《瀛环志略·凡例》。

⑨ 《瀛环考略》卷下。

⑩ 《瀛环志略》卷四。

⑪ 《瀛环志略》卷六。

⑮ 《瀛环志略》卷九。

⑯ 《瀛环志略》卷五。

⑰㉓ 《再复办理夷务疏》，《松龛先生全集·奏疏》卷下。

⑱㉒㉚ 《复英夷租住寺屋实情并镇静办理侦察谣言疏》，同上，卷上。

⑲ 方闻编：《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第191页，台湾商务印书馆。

⑳㉜ 《复官绅意见不合疏》，《松龛先生全集·奏疏》卷上。

㉑㉛ 《报英人租住神光寺并采买台湾煤炭疏》，《松龛先生全集·奏疏》卷上。

㉔㉘ 《复吴思澄比部世兄书》，《松龛先生全集·文集》卷三。

㉕㉖ 转引《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第82页。

㉗ 《致左季高》，《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六。

㉙ 杨笃：《松龛先生传》，《松龛先生全集·叙传》。

● 冯祖贻

徐继畬属于什么派

中国近代史有关著作中，徐继畬属于什么派？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从他鸦片战争后著述《瀛环志略》，向国人介绍世界而论，他无疑属于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一类人物，应与林（则徐）、魏（源）同侪；但从他鸦片战争后主抚，在外人进驻福州一事的处理上与林则徐对立，在穆彰阿当政时又屡次升迁，他不仅有“穆党”之嫌，有的论著直认他是投降派或妥协派。因此，徐继畬究竟属于什么派，仍是十分需要讨论的问题。

徐继畬是经世派

经世派是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别称。他们标榜经世实学，恢复了清初顾炎武等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一革乾嘉以来的烦琐考订，宋学的空洞无物，提倡“以经术为治术”，要深究天下古今治乱之得失，找出通家国天下治安之计。经世派代表人物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包世臣、贺昌龄、陶澍、王鼎等，无不关注国计民生有关的务实之学。诸凡整饬吏治、革除弊政、减轻赋税、理财、治河、漕运、盐务、水利、刑狱、边政、海防、夷务等，都在他们专心研究范围。

经世思潮出现，一般以魏源代贺昌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为

标志。此书收集清初至道光有关经世奏章、条陈、文章二千余篇，于1826年(道光六年)编成，次年刊行。这个年代很重要，1826年也是徐继畬中式为进士的一年。在思想界卷起的经世之风不可能不对这位刚刚踏上政治道路的、年轻的翰林产生影响。杨笃说徐继畬中式后，“虽读书中秘，而于部曹事例，郡国利病，靡不穷研洞晓，思有所建白。”

经世思潮的出现，是鸦片战争前清朝国内外阶级矛盾激化的反映，面临封建衰世到来，地主阶级不得不急谋对策。经世之学一个最显著特征就是它是进步的，但最终目的是为挽救统治危机服务的。道光帝就提倡过经世之学。[①]上有皇帝的提倡，周围又有经世之学环境，徐继畬从翰林转为御使后，一月之中，奏章数上。“当时宣宗屡降旨切责内外诸臣，空文无实。每得公疏，必称善再四，风示有位”。其中《政体宜崇简要疏》得到道光帝激赏，“立召对，与语移时，询及民瘼，至于流涕”，成为他外放的契机。

以上仅根据社会环境的分析和徐氏家传的材料来判定徐继畬的政治态度，论据似不充足。下面，我们将以徐继畬的言行与经世派的主要政治主张一一对照，来看徐继畬究竟应属于何派。

经世派的主张大致是：1. 揭露封建制度的黑暗，向清王朝敲响了末世警钟。其中以龚自珍锋芒最利，对清朝的吏治腐败，士风日颓，世风浇薄都给予揭露，指出清朝已处于“将萎之华，惨于槁木”，“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便民愈甚”的危机边缘。2. 针对清政府种种弊政，提出了具体改革方案，如吴铤的限田，包世臣对农政、河工、漕运、堵塞白银外流的建议等等，特别是魏源提出的“变古愈甚，便民愈甚”的改革主张，最能掀动人心。3. 主张防御抵制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经世派人物都是爱国者，面对鸦片战争前鸦片肆虐中国，他们都是严禁派，黄爵滋、林则徐都主张重治吸食，从根本上消灭烟毒。鸦片战争爆发，他们又多是抵抗派的代表，坚决反对列强的侵略暴行。他们又留心边务，除留心海防外，还密切

注意西北沙皇俄国对中国的威胁。由他们倡导，开创了研究西北史地的新风气。4. 吸取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的教训，主张了解外国，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为人称道的有林则徐关注夷情，编纂了《四洲志》，在此基础上，魏源又编了《海国图志》等。他们针对封建顽固派认为学习外国是“矜奇眩异，骇人耳目”，不需学，也不用学，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

用上述经世派主要政治主张对照徐继畬的言行，我们可以发现，两者是完全吻合的。

（一）徐继畬通过奏疏揭露了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

徐继畬一踏上仕途，就痛感清政府吏治腐败已达到不可救药的程度：州县官不是忙于钻营，搞得“其门如市”，就是到处聚敛，他们讳灾不报，大搞摊派，把人命当儿戏。这种地方官遍及全国，“几不知人间有青白吏”。基层如此，督抚们则千方百计回护，以至“官吏之枉法，命盗之沉冤，无不从而回护之”。即使钦差大臣下来查办，经过调停，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融化消弥。他将当时官场概括成几句话：“大臣之负清名有时誉者，大约以缄默不言为慎密，以圭角不露为深沉，以漫无可否为和平，以多所容忍为宽厚，以模棱两端为和衷济事之道，以遵循故事为奉公守法之规。观其章奏，所敷陈似乎精密周详，了无遗憾，而实则铺张粉饰，纸上空谈，稽诸事实，大谬不然。”徐继畬这段话，与龚自珍在《明良论》中对晚清官僚政治的揭露，魏源在《默觚》中指斥官僚们是“鄙夫”、“乡愿”，有异曲同工之处。在这批大大小小官僚统治下，农民遭灾还要完课，“骨髓已罄，目下青黄不接，粮价腾翔，卖男鬻女，道殣相望。壮者弃产奔逃，弱者填委沟壑。人心汹汹，朝不谋夕”。这里，徐继畬不仅为封建统治前途担忧，字里行间也透露出他对人民的同情。[②]

（二）徐继畬关心时政，不尚空谈，对整顿吏治和盐政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在整顿吏治上，他主张对中下层官吏，应由皇帝下旨，“痛除情

面，力矢忠诚，斥乡愿之陋习，溯正直之遗风"，在"实"字上要"恪遵深体，夙夜无忘"。他对实事求是体会很深，认为只要"实事求是，无一影响揣摩之语，为将帅者果能遵而用之，战无不克，守无不固。正如良医立方，病者覆杯而沉疴立起。空言之与实用，岂可同日而语哉"。[3]

他以实事求是的作风考察盐政，对盐政改革的两种意见：归地丁与行票盐都提出不同看法。将盐课纳入地丁，的确能保证盐税收入，但必然造成"不耕者食无课之盐，而农民独受其病"的后果，将负担全加在农民身上。加以盐课业已增加，银价又在上升，农民何能胜任数百万两之盐课？行票之法也有不周之处。行票必废引，"引一废而商散矣"，又会产生旧法不能用，新法不能行的局面，作为政府财政重要来源的盐课必受影响。徐继畬并不反对行票盐，而是提出新旧交替中应注意解决的问题，反映了思虑周全循名质实的一面。对于盐政改革，徐继畬罢官回晋后也没有中止考察和探索，曾就山西潞盐问题向地方建议。[4]

徐继畬在整饬吏治与盐政改革上的意见还反映了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传统的民本思想。所谓"邦本之所维系，元气之所蟠结，一有动摇，所关匪细"，是他最关心的。而民本思想正是经世派人物如林则徐等所共有的。

（三）徐继畬对殖民主义者将鸦片传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深恶痛绝。与黄爵滋、林则徐一样，主张严禁鸦片。具体措施也是放在"严禁吸食"上。

徐继畬指出，鸦片不产于英国，而产于孟加拉和孟买。"两地久为英夷所并兼。孟加剌岁得税银五百万，孟迈岁得二百余万，皆鸦片之利。其鸦片售之中国者，常十之七八。是英夷之剥我元气，而富强其国者，专在是矣。"而英国的阴谋不仅仅"以鸩毒啖我，载我金钱货贝以去"，而且要使我因之贫困，人民"宛转尪羸以死"，达到"据割"我国的目的。他还以"彼自泰西达于东南洋，以此戕人之

国者数十”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徐继畬揭露殖民主义者贩卖鸦片的险恶用心是深刻的，达到了同期经世派代表人物的水平。

如何根治烟毒？他的意见也是和黄爵滋、林则徐一致的，即从重刑严惩吸食者下手。他针对弛禁派对黄、林的攻击，再三辩明实行这一政策的必要："近者英夷为寇，扰乱海疆，论者归咎于鸦片之禁，又或疑吸食拟绞为过重，欲从轻典，是因噎而废食也。”他还对“严吸食”提出具体执行程序："先贵而后贱，先富而后贫，先内而后外，先豪猾而后良弱”，从官僚、富商、土豪开刀。立论之坚决，可见一斑。[5]

鸦片战争爆发后，徐继畬立场是鲜明的，积极设防，抵御侵略。1840年徐继畬署福建汀漳龙道台，他与兴泉永道兼金厦兵备道、著名主战派刘耀椿一起，在闽浙总督邓廷桢领导下，在闽南布置防御工作。徐继畬负责漳州、海澄、铜山一片，是厦门的二线。他“每夜登城与守陴者垂泣告语，勉其敌忾”。对于坚守厦门的刘耀椿，他极为钦佩，为了协商公事，两人“手书商榷公事，旬日中三四往还，邮人苦其烦也……积半年，两处缄札各盈尺”。1841年英军大举入侵厦门，漳州、海澄震动。徐继畬决心“誓死以守”，“与此土为安危，与此城为存亡”，表现了一个爱国者的气节。[6]

（四）徐继畬与经世派代表人物林则徐、魏源一样，都是具有世界眼光的人，他所著《瀛环志略》与魏源的《海国图志》，都是那个时代以后几代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津梁。

第一，志略是徐继畬在鸦片战争后写的。鸦片战争中，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反败于海外小国之手。惨痛的现实，激发了一部分知识分子走向世界，林、魏就是这样。徐自己就说："二百年全盛之国威，乃为七万里外之逆夷所困，致使文武将帅，接踵死绥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末，兴言及此，令人发指眦裂，泣下沾衣”。反映了徐写志略时的心态。

第二，在鸦片战争中，徐继畬亲身观察到英国武器的先进，“我

之铁炮不如彼之铜炮轻灵，我岸上之炮又不如彼船中之炮稠密”，“海中断不能与之角逐，即在海岸与之对击亦是下下之策”。[7]因此志略对英、法、美、德等国军队、武器多有阐述，进而论及了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这与魏源图志的思路是相仿佛的，不过徐继畬没有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命题而已。还应该提到的是，龚、林等人已注意到俄罗斯对中国西北边疆构成的威胁，徐继畬书中也同样提到了。徐退职返乡还写了《两汉幽并凉三州今地考略》、《两汉志沿边十郡考略》，从关心西北边疆史地角度论，徐的想法和做法也是与经世派一致的。

第三，徐继畬的志略得到经世派代表人物的认同。志略初刻于 1848 年，比图志晚出六年，但魏源在 1852 年将图志增补为 100 卷本时，曾参考了志略。如在介绍美国和美洲时，就将徐著中有关美国地理形势分析、美国西部的发展及徐对巴拿马运河开凿的看法，均择要选录。由此可见魏源是将徐继畬引为同道的。

所以，尽管徐继畬对经世之学没有系统地提出什么看法，他的奏疏、文稿中也鲜见“经世致用”这样的词汇，但他的言论和行动都证明了他应属于经世派。

徐继畬不是投降派

为什么有些近代史论著在谈到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派时不提徐继畬，即使提及，也只三言两语，或只讲他的志略，不讲他其他的思想及著述？恐怕最重要的原因便是鸦片战争后，他曾在英人进驻福州城的处理上与林则徐直接产生冲突。这件事对徐继畬一生影响很大。他因此离开福建，后人给他扣上“投降派”的帽子的重要依据也在此。

事件的起因并不复杂，根据《南京条约》规定，英国领事李太郭

来到福州，要求进城居住，徐时任福建布政使，在劝阻无效后，李太郭便在乌石山积翠寺租房住下。1850年6月，英国代领事金执尔，又为"讲经人"一名，医生一名，在福州城内神光寺租房，侯官县令兴廉即加印立约，形成事实。徐继畬时已任福建巡抚，以条约未规定非官方人士可以入城，正与之交涉间，福州人民起来了，"在城绅士仿照广东绅士前致夷酋书信之式，缮写公启……转致夷官，令讲经人作速搬出城外"，同时又有"书院肄业生童谓神光寺系各生童会课之地，难容夷人居住"，并约定要到寺内讲理。此外，各种"公具"、"告白"遍贴城内。有的写"字条"公开倡言，英人不退出，就要"割取夷人首级"。福州人民驱逐英人的斗争，得到刚从云贵总督任上回籍的林则徐的大力支持，致英国领事"公启"就是林则徐领衔发出的。林则徐领导福州人民反入城斗争是有其特定历史背景的，当时同类斗争在广州已蓬勃开展，并取得一定胜利。但闽浙总督刘韵珂和徐继畬担心因此"启衅"，引起更大的矛盾和冲突，更不接受林则徐调兵、演炮、招募兵勇的积极建议，反认为林则徐是"以目前之小事，不顾后日之隐忧，究属失计"。无疑，在反英人入城事件中，徐继畬显得软弱了一些。

但是是否可以给徐继畬扣上一顶"投降派"的帽子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历史本身要比简单地给人戴帽子要复杂得多。

第一，应全面地考察徐继畬。徐继畬在闽为官共13年(1838——1851)，其中仅有几个月时间一度任两广盐运使(旋升为广东按察使)。在这13年中，鸦片战争爆发前和进行中，他的态度是鲜明的，既主张严禁鸦片，又身体力行，抵御外国侵略者。只是后期，他的态度才发生变化，由主战倾向于主抚。这与一贯主抚，在侵略者面前摇尾乞怜的投降派是有区别的。即使在他已倾向主抚期间，他也不像投降派那样，自撤樊篱，敞开大门，让侵略者的目的轻易得逞。1847年他出任福建巡抚，便与闽浙总督刘韵珂一道修筑闽江口长门和闽安南北岸炮台。所有炮台都安置了新铸大

炮,“预筹密防,以备不虞”。1850年,英驻香港总督文翰突然要求采购台湾鸡笼山煤炭,将台湾作为北上舰只的加煤站。这是英国政府处心积虑,企图霸占台湾的图谋。他一面“备文照复,正言拒止”,一面又“飞饬台湾镇道府”,命令他们“团结民心,坚为防拒,使之无可觊觎”。英船到台湾后,终因台湾已预作防备,侵略者无隙可乘,只得暂时停止了侵略阴谋。徐继畬的行动,很难说与广东方面的琦善、耆英等投降派有什么相同之处。

第二,对英人入福州事件,亦应作全面具体分析。在道光二十四年福州开埠,英领事官等企图入城之时,徐继畬考虑到此事已载入条约,官方不便公开禁阻。于是“密约绅耆居民公同出阻”,并为此向福州绅民密为授意,先具联名公呈,然后在李太郭入城之日“邀集多人,在南门外坚持力阻”,再由官方出面,“以众怒难犯等情危言耸动”,阻止英人入城。但是实行结果是“李太郭进城之日,绅耆士民竟无一人出城阻止”。类似的办法后来在广州却能奏效。徐继畬由此产生了“福州民气孱弱,重利轻义,心志不齐,与广东情形迥不相埒”的感叹。这里,徐继畬把绅与民搞混了。正如徐继畬说过的,“夷人不畏绅而畏民,缘绅士之笔伐口诛不能慑其气,而百姓之力强势众实可挫其锋”。绅士态度暧昧,转依靠人民如何?林则徐与徐继畬最大不同之点,是林曾亲赴口门(闽江口)一带调查,知道“彼处民情与其力量,洵能不负其险。又水部门、东门一带,劲气相联,迩日亦甚著效,此差足以慰荩怀者耳”。[8]人民是反侵略斗争的主力,林则徐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能鲜明地坚持反侵略立场,而徐继畬则不是这样,一再说“福州民气散弱,心志不齐”,将绅士的软弱,当成人民的软弱,又怕人民起来,“希图乘机滋闹,藉得肆行搬抢”。更不敢调兵演炮,招募乡勇,怕引起英人的挑衅,以致一再强调“镇静”,想用各种软办法(如不准泥瓦木工为英人修房,不准续租等),逼英人退到城外。所以徐继畬自己说,他与林则徐在“英夷租屋一事……虽有缓急之分,然皆坚意驱逐,并无歧异不同之

处”。也道出了其中一些微妙之处。所以据神光寺事件来判定徐继畬为投降派，有失公允。

第三，无可讳言，徐继畬在闽任职后期，确由主战转而倾向主抚。这个转变基本与道光为首的清朝最高统治者的转变是一致的。众所周知，鸦片战争爆发，道光帝为了满足自己的虚骄心理，曾一度主战；但一经战争失利，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他迅速由主战跳到了主抚，反过来向主战派林则徐等开刀，以取悦于侵略者。但侵略者的贪婪，又使他很难堪；群众反侵略斗争，又迫使他不得不考虑，如不照顾群众的情绪，又会失去民心……从道光帝到咸丰帝，他们总是期望“不可致生夷衅，亦不可稍拂民情，总期民夷两安”。这种卑怯、自私的心理状态，决定了他们总是在民与夷之间走钢丝。既然殖民主义者的侵略阴谋和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是对立两方，如何能够调和？“民夷两安”只是他们的主观愿望罢了。清朝最高统治者的指导思想，也就为徐继畬等办理夷务的督抚大臣出了难题。徐继畬由主战转而主抚，在神光寺事件上矛盾重重，无法走出困境，这一切的根源，都出在道光帝身上。他后来回顾这段时期的经历时说：“以焦头烂额之地，值山穷水尽之时，并以抚局既定，奉命专办通商事务，困心棘手，不可名状。”就如实道出他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徐继畬被召回京，由贬职到落职，也是最高统治者“不可稍拂民情”的具体体现。神光寺事件处理不当与其说徐继畬应负责任，倒不如说道光帝的决策应负更大责任。

第四，应结合徐继畬这时的主要著作《瀛环志略》的内容来判定他是否是投降派。志略的写作在1843—1849年间，也恰是他倾向主抚的时间。徐继畬为何要写这本书？前面已作了分析。所以《瀛环志略》写作目的是清楚的，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作者忧国伤民的爱国主义感情。例如，他将中国置于卷首，称中国“自剖判以来，为伦物之宗主，而万方仰之如辰极”。《瀛环志略》还特地说明，中国不是他介绍的重点，但“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疆域之界画，

山川之形势，人人知之……吉林一省，东尽赫哲费雅诸部。黑龙江一省，北跨外兴安岭。周回万余里，皆自古重译不到之地。至若旃裘毳幕，棋布北庭；雪岭天山，蟠回西域；襄平箕子之遗封，乌斯吐番之旧部，昔限异方，今归典属……”剔除其陈腐的天朝意识，他对中国领土的辽阔，文物典章丰富的自豪感，浮于纸上。值得一说的是，他写志略曾参考了西方发行的地图、地理书籍，又采访了西方来华传教士、外交官，如雅裨理、李太郭。西方地图、地理书及外人口述，肯定都以西方为中心。但徐书却是典型以中国为中心。全书先介绍亚洲，而亚洲又以中国的邻国日本、琉球、越南、暹罗、缅甸、南洋诸岛国为先，再次及印度、西亚。对其他洲的介绍，在亚洲之后分别是欧洲、非洲、美洲。这种排列次序，大致已与现代中国人编写的世界地图和地理书籍相同。由此，我们不能不佩服徐继畬的眼光。

为了使中国人明白，中国已处于西方殖民主义者武力威胁之下，徐继畬极为关注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国关系密切的的东南亚。

他说：“昔之南洋，为侏儒之窟宅；今之南洋，乃欧罗之逆旅。履霜冰至，岂伊朝夕……自泰西据南洋诸岛……中土多事，亦遂萌芽于此。”明指东南亚已成了殖民者侵略中国的跳板。在志略头几卷中，除了总结东南亚沦为殖民地的惨痛教训，还特别注意某些国家抵抗侵略，保持独立的经验。如苏禄国，“当西班牙、荷兰虎视南洋，诸番国咸遭吞噬，苏禄以拳石小岛，奋力抗拒，数百年来，安然自保，殆番族之能自强者哉！”他又称赞缅甸人民在英国侵略者面前不屈服，“时怀报复之志”。他估计，南洋各国即使被侵略者“强据其海口”，也不会持久，“能保诸国之甘心相让乎？”这些话有强烈的针对性，对于中国人民认清形势，提高信心，加强警惕，作好长期准备，以及运用正确方法等，都有重要作用。

此外，志略对英、法、美、德等国幅员、资源、人口、兵力、船舶火炮制造极为关注，含有知己知彼的用意。

不能想象，一部倾注了作者五年心血，又洋溢着爱国主义感情的作品，会出自投降派之手；也不可能，同一个人，政治上是投降派，而其著作又有如此进步意义！

最后，想对徐继畬为何由主战转而倾向主抚，什么时候发生这个转变，以及徐本人是否是“穆党”，作些分析。

如前所述，决定徐继畬转变的重要客观原因是道光帝为首的清朝最高统治集团的转变。徐一向对道光帝怀有知遇之恩，所谓“十年之中，由知府擢任封圻……断不敢畏难苟安，以冀仰答高厚鸿慈于万一”。此类的话，在他奏疏中屡屡可见。道光帝既然认定“抚局已定”，徐继畬自不敢自专，这是其一。

其二，是受到某些投降派的影响。1842 年，徐继畬升任两广盐运使，不久转广东按察使。同年，耆英赴广东任两广总督。耆英赴粤时麾下收罗了不少投降派，如“一手经理”签订南京条约的黄恩彤、咸龄等。其中黄恩彤是徐继畬的同年。此人一向反对严禁鸦片主张投降，曾写过《抚夷论》，大肆宣扬英国侵略军的船坚炮利，散布失败情绪。这批人的态度不能不对徐产生影响。徐在广州仅几个月，但他的政治态度已起了变化。外人办的《中国丛报》曾这样说徐继畬：“在这里短暂任职时期的工作，是令人满意的。”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 1842 年是徐继畬由主战到倾向主抚转变的关键年代。也正因为徐的政治态度变化，耆英才认为他是“历办夷务，素为诸夷所信服”的人才，向道光帝推荐。[9]

从徐继畬自身角度论，他转变的主要原因还是他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在观察与思考中他的思想进入了误区。

第一，他虽留心世界大事，但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本质缺乏认识。下引两段话，很可以说明问题。

> 然彼（英国）以贸易为生，其国势之强弱，民生之舒蹙，其货船虽无所不到，而总以中国马头为养命之源。攻略割据之谋，敢施于散弱之五印度，孤僻之各海岛，而不敢施于暹罗、越

南，况于中国乎！即使空我海滨数城，割而与之，彼亦不敢居、不敢守也。而一绝其贸易，即如婴儿之断乳，有不可终日之势。

逆夷以商贩为生，以利为命，并无攻城掠地割据疆土之意，所欲得者，中国著名之马头，以便售卖其货物耳。

看到西方殖民主义者以商立国，将海外贸易（实际是掠夺）作为他们积累资本、富国的手段，是徐继畬观察深刻的一面。但他认为殖民主义者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则大谬不然了。将殖民主义侵略本性低估，必然导致轻敌和抚夷思想的出现。

第二，徐继畬过分夸大了西方武器的力量，过低估计了人民的力量。他实际参加了鸦片战争，亲眼看到“逆船坚且高，炮极猛烈，又散舶于海中，无从下手与之相持”。“我……以兵勇血肉之躯与浮沉之巨舰相争拒，鲜不为其炮火所攻溃”，等等。看到西方船坚炮利并承认当时中国的落后，这并不是坏事，问题是如何对待它。徐继畬在谈到上述情况时，往往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姿态。这是徐继畬不及林则徐和魏源的地方。更有甚者是徐继畬根本不相信人民群众，他说鸦片战争时招募的“水陆乡勇”只耗费了口粮，“卒不闻何处得一乡勇之力”，“沿海地方数年盗贼充斥，半系乡勇流毒”。这不只是怕群众，而是对人民群众的污蔑了，徐继畬既在西方殖民者先进武器面前束手无策，又反对依靠群众，所以对敌只能讲抚、言和。

徐继畬由主战转变到倾向主抚，其转变的主客观原因已如前述。但他后期虽倾向主抚，但绝不是投降派。他与穆彰阿、耆英等还是有区别的，说他是“穆党”，即穆、耆一派，也拿不出过硬的材料，至多在他的文集中能找到一篇《诰封一品夫人穆太夫人八十寿序》，还是他代替同年鄂松亭所作。从他升擢之快而论，也许与穆、耆的有意拉拢有关，据《清史稿》穆传所记，穆的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以徐继畬的才干和他后期的政治态度，

也有可能被穆、耆引为同类。不过，徐继畬的品格和为人却不可能成为“穆党”，徐自己曾说“顷在史馆，足不履津要之门”，“迂谨自守，不阿权要”。他一生清廉自守，落职回籍还要以教馆谋生。经济困难由此可见。所以，当1850年道光帝去世，咸丰帝即位，对“穆党”大加挞伐时，穆、耆均被革职。不久，咸丰帝召徐继畬回京，连徐本人都很紧张。但召对之后，咸丰帝却对群臣说：“徐继畬乃老诚人，何谓欺诈？”徐的处分只是降职，假若徐真是“穆党”的话，处分就不会如是之轻。

（冯祖贻，1942年生，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注释：

① 道光帝说过：“士不通经，不足致用。经之学，不在寻章摘句，要为其有用者”。“通经致用，有治人而后有功，课绩考勤，有实心而后有实效。”见《宣宗实录》二十一年四月乙巳条。

② 《松龛先生全集·奏疏》。

③ 《请除大臣回护调停积习疏》，《璧勤毅公兵武闻见录序》。

④ 《盐法论》，《潞盐刍议致王雁汀中丞》。

⑤ 《禁鸦片论》，《全集·文集》卷一。

⑥ 《致某方伯书》，《别刘庄年观察序》。

⑦ 《致赵盘文明经谢石珊孝廉书》。

⑧ 林则徐：《再复苏鳌石书》，引自《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

⑨ 《道光夷务》册5、页2741。

●徐士瑚

放眼看世界的先驱——徐继畬

本文着重写的是徐公的良好教育、刚直性格、清廉节操、经世才能、抗英决心，以及《瀛环志略》所展示的丰富的世界史地知识与远见卓识及其影响。

家世、教育、功名

徐公字健男，号松龛，生于乾隆六十年冬十月二十四日（1795年12月4日）。始祖才甫，明洪武年间由马邑县迁居五台县滹沱河南岸的大建安村，开垦为生，传至四世文厚、文达、文源弟兄三人，仍务农为生。文源有子九人，后修家谱，顺序分为九股。徐公属二股，其八世祖光澄，明宁夏府经略，始由大建安迁居滹沱河北岸的东冶镇。九世祖腾芳，顺治五年武举，卢州府守备，封明威将军。曾祖天叙，邑庠生。祖敬儒，乾隆乙卯举人，官至九江府同知。父润第，字德夫，号广轩，乾隆乙卯进士，与《红楼梦》续者高鹗同榜，且有深交。徐公曾受教于高鹗。润第历任内阁中书、典籍、储济仓监督、施南府同知。在京任职期间，寓内务府大臣佶山小花园，教其子阿灵阿与徐公。润第平生鄙弃训诂，崇尚陆王，“豹值之外，闭户读书，不履津要之门……中岁即潜心易学，悟入元微，先儒理学之书，读之殆遍，旁涉二氏百家皆以易象折衷”。[①]润第不仅学问渊精，而且具

有经世致用之才，任官职，必有树立。嘉庆十六年任施南府同知，重法严惩不法吏役，条教简重，风声肃然。“生平一介无苟取，服官二十余年，衣不盈两笥”。[2]辞官归里，在晋阳、介休等地授徒自给。道光七年九月病逝于介休馆舍，寿67岁。润第生平未尝著书，门人有质疑者，随问条答，或读书有得，随手札记。逝世后徐公搜集整理，刻印成书，题名《敦艮斋遗书》，又刻印润第制义200余篇，题名《敦艮斋时文》。

徐公母系崞县西社村庠生续昶的幼女，知书识理，是徐公的启蒙教师。幼年还受教育于他的爱好桐城派、反对训诂派的堂舅续克家。11岁至15岁，在京受教于其父与进士王月谭，研读《史记》、《汉书》，与唐宋八大家古文，兼学八股文。16岁返里与西社村副榜、襄垣县教谕续锐的17岁三女戴月结婚。18岁应县试、州试，均名列榜首。19岁应乡试中举人。后又随父在河南光州，随堂叔寅第在河间府勤攻经史10年，32岁中二甲第80名进士，朝考第一，名曰朝元，朝考文题为《政在养民论》，阐述了内圣外王，以德治民的传统儒家思想。

对徐公一生做人、做事、做学问影响最大的是他父亲。他18岁，其父从施南府写的《谕继畬书》与《再谕继畬》就是最好的言传。在他第一封信中教徐公在人世间勿生“眷恋之情”与“厌离之念”，而要“苦乐诸境，随缘了达，而已不与焉”。谈到应乡试，他教其子要“勤攻经史，体认义理，乃心术、文章、功名之本……得进毋自满……不进毋自灰，年尚有待，暇中正好着力也。为学本自修之事……科名得失，半由命数，自修则其权在我，有得而无失也”。

第二封信短，为探本之论。他要其子认识心性本体的重要性，只要不“恃力逞智，与命争衡”则“妄想息矣，物物事事，求一可以用畬忿嚏、恐惧、好乐、忧患之所而不可得，而心常虚矣。虚则物我之形骸化，彼此之畛域泯，而内外合一，胸次间一片清明，无己可私，也无人可徇也，率性而已矣”。这两封信，提出的种种教言，徐公终

生身体力行，获益匪浅。

任职京桂

徐公于道光十年服阕入都后，授翰林院编修，耿介自信，足不履权贵之门，暇时曾教其姨兄梁问青两子。梁是一个在北京朝阳门外开通和砖瓦窑的大商。徐公入翰林院后，梁借给他车马以供出入驱使，不时助以薪水，直至10年后出守浔州。

徐公任监察御史时，由于他读书志在经世致用，部曹事例，郡国利病，无不穷研，所以前后上疏，均与肃清贪污受贿、阿谀奉迎不正之风及关心民生大计有关。道光十六年七月上《政体宜崇简要疏》，即教令宜简，条例宜简，处分宜简，尤切时务。疏入，宣宗嘉纳，旋召入内，与语移时，询及民瘼，剀切陈述，为之流涕。次日即擢为广西浔州府知府，徐公受宣宗知遇自此始。

任闽省道台

从道光十八年至道光三十年，13年期间，除任广东按察使3月外，徐公都在福建任职。道光十七年秋，徐公升任福建延建邵道（正四品），使他有机会展示其治民、卫国、认识外敌的杰出才能与远见卓识。此道所辖17县，多是崇山峻岭，森林茂密，向为盗匪出没难治之区。但是徐公到任后，立即制定捕治盗匪办法，详禀巡抚，并致属下17县书，要求他们编练保甲，督率部属，严治盗匪，擒杀巨盗，不期年而境内肃然，治绩卓著，巡抚吴文镕屡召晋省，多所垂询，亦有建议。徐公后在平遥教书时，在致吴文镕子吴思澄书中有以下数语："……不逾岁而分巡延建，旋值先师文节公持节来闽，获隶宇下。先师察吏严明，属吏皆斤斤救过，独弟与刘庄年、马祉斋遇

事好断断力争，辞气不平，殊失事上之礼。先师不加督过，而嘉其有守，首以三人登之荐牍……”。[3]就是徐公性格刚直，有守有为的证明。约在十九年秋吴离闽后，刘鸿翱来任巡抚，亦甚倚重徐公。

道光二十年夏，英舰驶入穿山洋，厦门告急，乃调徐公署汀漳龙道，驻节漳州，距厦门70里，所辖之海澄县距厦门30里，一水相通，乘风破浪，片帆可达。徐公为坚决抗英，调兵募勇，并与士卒同甘共苦。次年二月，闽浙总督颜伯焘来厦门督办军务，经营厦门防务半年之久，安炮200余门，集兵6000余人，筑好坚固的防御工事。七月初四日，英舰30余只来攻厦门，炮火猛烈，终于攻占厦门。死伤军官士卒千余人。于是汀漳龙道防务更加吃紧。他在是年十月初七日致五台赵盘文、谢石珊书中写道：“……民心惶骇，一日数惊，极力抚以镇静，誓以死守，调兵、募勇、运米、拦港、劝练诸事，昼夜拮据，略有头绪，人心乃渐安贴。逆夷火轮船直驶至海澄城下，因水浅退去，其杉板屡次窥探，我兵静伏于岸上，不肯轻动，幸未失事……其大队驶往浙洋，八月中旬重陷定海(定海百姓两年中两遭大劫，可为悲痛)，下旬下镇海，又陷宁波……殉难者钦差大臣裕谦(此公豪杰之士，以灭贼自任，力竭而死，天下悲之)，总兵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逆夷以商贩为生，以利为命，并无攻城掠地割据疆土之意，所欲得者中国著名之马头，以便售卖其货物耳。今见官兵连年败挫，知中国孱弱无能，其志愈侈，其谋愈狡……欲与之议和，则彼且索银一千数百万，又必索沿海各要地为马头，岂能听之耶！二百年全盛之国威，乃为七万里外之逆夷所困，至使文武将帅接踵死绥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末。兴言及此，令人发指眦裂，泣下沾衣……与此土为安危，与此城为存亡……”。[4]这段引文足以清楚地显示四点：一是徐公对英人侵略本性的深刻认识，二是对为国殉难的文武官员的无限崇敬，三是对受苦受难的人民的深切同情，四是誓死卫国准备殉难的坚定决心。

又厦门失守，漳州危急时，徐公对夫人说：“城如不保，陈忠愍

公祠(前明壬午全家殉难,仅乳母带男婴逃走,署内有陈子祠堂)内,吾尽节处也。卿且奈何?”夫人笑曰:“相从俱死耳,此事岂待商量!”[5]夫妻双双殉国的决心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能不令人敬佩!是年颜伯焘与刘鸿翱由于敬重徐公的操守与治才,故以“清廉明达,有守有为”两言列之荐牍。

在此期间,徐公写了《禁鸦片论》,阐述了自已独特的严禁吸食的办法。其要点是杜来源,绝兴贩,严吸食,审时而行,应先严禁吸食。他写道:“然则吸食之人半天下,将尽执而诛之乎?曰:法不及众,亦示儆而已矣……治之之法……先贵而后贱,先富而后贫,先内而后外,先豪猾而后良弱,访其素行可诛而兼有此病者,借以锄莠,即借以警众。每岁大县以十余人为率,次者递减”。[6]

擢授广东按察使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宣宗先擢授徐公为两广盐运使(从三品),旬日改授广东按察使(正三品),此职是有权直接向皇帝上疏的。徐公在任三月,乏善可述,只知他与两广总督祁埙幕僚梁廷枬以及协助耆英办理江宁条约的同榜进士黄恩彤常相往来,可能获得了不少外事知识。徐公离粤时,首府照旧规赠番银4000元,系一府六县所摊,徐公婉言谢绝。南海富绅潘德畲好结交文人学士,慕徐公为人,以白银千两相赠,徐公亦婉言谢绝。

擢授福建布政使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徐公擢授福建布政使(从二品),不到半年,连升三级,这一殊荣就是深受宣宗知遇的明证。先是徐公进京陛见时,“宣宗询各国风土形势,奏对甚悉,爰命采辑为书,书成曰

《瀛环志略》”。可惜书未进呈而宣宗已崩。[7]

道光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徐公致堂兄服先信尾有“督宪悯弟之贫也，使之兼署盐道，两月中仅得平余三四百金，而反添许多忙迫，可笑之至！今已于六月底交卸矣”等语。[8]这可以说明他的清贫生活使他的上级——总督、巡抚不得不给他以特殊的照顾。徐公到任后，除主管全省钱粮税收外，还兼办通商事务，常往来于福州、厦门之间，接触了许多外人，如领事、传教士、商人等，为他们安排住所，指定活动范围，解决中外人士之间的纠纷等事宜。

擢授福建巡抚

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徐公升任福建巡抚（从二品），次年五月他在致介休曹象谦函中表达了自己此时的心情：“时事日益艰难，以孱弱之才，当盘错之地，孤恩溺职，又何能免！所幸外宦十余年，两袖清风，依然如昔。………仆官情素淡，无恋恋栈豆之心。乃自戊戌到闽，旋值海氛甚恶，以避难为耻，遂牵率不能引退。上年已决计归田，又蒙受疆圻之任，恩重命轻，何敢自惜。”在抚闽四年期间，两署闽浙总督，他与总督刘韵珂相处融洽，对于外事，根据条约均抱稳健持重态度，两人多次联名上疏，请求拨款，增强防务，先后修建了长门及闽江南北岸的炮台。至于在闽政绩《山西通志·乡贤录》载有以下的评语：“继畬久驻岭表，熟悉敌情，得其要领。莅任后，端严持重，务以恩信羁縻，体国家休息之意，于时各通商诸国悦服，咸遵约束，市舶辐辏，部内疮痍尽复。”[9]

《瀛环志略》

一、编写过程与体例

徐公自奉命编写志略，经过五年辛苦，终于在道光二十八年在福建刻板问世，二年后，又刻印一次。他在初板"识"中叙述成书经过甚详，书中提到帮助过他的外人有美国传教士雅裨理、英领事李太郭与美国医生甘明。另外据说还有后任英领事阿礼国与夫人。他除参考了许多中文材料外，还请教过去过南洋的老舵师，可见他编写此书是抱了怎样实事求是、不耻下问的严谨的治学态度。他与西方各界人士的频繁接触，使他这位儒家人道主义者原有的局部的世界看法扩展到地球所有已知的海陆地方予以密切注意的地步。他随时随地准备从外国源泉汲取知识与信息。关于徐公为人，凡是见过他的外人都发现他身上有一般士大夫未有的品质，他为人直爽、坦诚、公正，而且待人友好，令人敬佩。

志略体例不同于一般地理书，书中共有总分图 40 多幅，先叙地球概貌，后叙四大洲各国，每洲又先有总叙，后有分叙，对各国的疆域形势、气候、物产、风土人情、历史沿革、典章制度、政治得失、兵力强弱、兼并征伐、海外扩展以及与中国的交往等等方面，叙述有详有略，夹叙夹议，常有按语表示自己的独特见解。对于发生"古今一大变局"的南洋诸岛国和五印度以及英、法、俄、德、美、荷六国与土耳其叙述最详。叙述各国是，历史方面的材料与按语常占相当多的篇幅(以后者二字表示)。以下列数国为例：俄国共占 24 页，后者占 8 页；法国共占 12 页，后者占一半；英国共占 45 页，后者占 20 页；荷兰共占 6 页，后者占一半多。这是本书与笔者所见到的一般世界地理书大不相同的一个特点，可谓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史地并重的世界地理书。徐公在书中试图探讨西方力量的根源与性质，给国人提供了一幅世界史的基本画面、一种多元化世界各国

相互争雄的景象，并认识到近代世界各国争雄中最成功的，是西方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是用古希腊、罗马的模式建立起有效的民主制度，产生了强有力的秩序，来向以天朝大国自居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挑战，在字里行间表达了只有变革才能富强的思想。

徐公所以这样写志略，恐怕是与他心目中时刻不忘宣宗的面谕分不开的。他一生爱国爱民，总是希望宣宗能够鉴往知来，西为中用，了解世界大势与各国兴衰的道理，以便处理好内外事务，而不再受列强的侵略。如果说他这番苦心和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苦心一样，恐怕不算过分吧。他在书中提供的西方国家力量方面的许多重要信息以及远见卓识，顽固保守派竟认为是张大夷情，崇洋媚外而加以猛烈的抨击，终于借故罢免了他的巡抚。

二、志略内容

限于篇幅，在此只能略叙五个国家的重要方面。

关于日本——徐公叙述日本国体、疆域、郡邑、岛屿、习俗等等之后，又叙述了日本自西汉始通中国的沿革。谈到元世祖因日本拒不臣服，乃派兵 10 万，战船 900 远征日本。不幸，大风破舟，10 万人尽为日本所歼时，谴责了元世祖穷兵黩武的政策，并得出了“倭自是遂有轻中国之心”的结论。

关于俄国，徐公叙述时，强调了彼得大帝奋发图强，招致英贤，锐意改革的精神与成就。他说彼得为了学习造船技术，不惜埋名隐姓，亲赴荷兰，“投舟师为弟子，尽得其术乃归，治舟师与瑞典战，胜之”。又在波罗的海岸建立新都，命名为彼得堡，打开了对外开放的窗口，终于“战胜攻取，疆土愈辟，峨罗斯近世之强大，实自彼得罗始也”。暗示出彼得大帝应该是任何国家由弱变强的榜样。

关于侵略中国的英国，徐公叙述中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对英国陆续征服印度、缅甸等地，叙述甚详。第二，对英国海陆军力量，先叙述了本国额兵 9 万，印度英兵 3 万，土兵 23 万，兵船大小 600 余只，火轮船百余只；次叙述了兵船极大者安炮 120 门，中等

者安炮 44 门；后叙述了兵船的坚固构造以及一昼夜可行千里的百余只火轮船。第三，对英国资产阶级民主议会上下两院的构成与职权，叙述甚详，并说："此制欧罗巴诸国皆从同，不独英吉利也"，这样夸大议会的职权，缩小君主的权力，字里行间显然流露出赞赏之意。按语是："英吉利夐然三岛……盖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朘削其精华，而目前之倚为外府而张其国势者，则在于五印度……英人之属地久已近连炎徼，而论者止知其本国以为在七万里之外也。"这样评述不啻是对鸦片战争后依然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士大夫的严重警告。

关于法国，除叙述其历史沿革、典章制度、风土人情、拿破仑的崛起，横行欧洲终至覆灭等方面外，徐公还叙述了法国目前的海陆兵力与好战精神。"其俗人人喜武功，军兴则意气激扬，面有矜色，临阵跳荡直前，……虽伤亡千万人不恤，但以崇国威全国体为幸。其酋长沉鸷好谋，知兵者多。水战陆战之法无不讲求，又好用纵横之术，故与诸国交兵，常十出而九胜。"这样评述表明：使中国军队大受挫败的，不仅有英军，将来还可能有法军。如果咸丰君臣对于志略不是无情打击，而是仔细研读，知己知彼的话，第二次鸦片战争或许可以避免，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研讨的问题。

对于美国，除详述其疆域、山川、气候、物产、人口、财经、教育、风尚以及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会等等方面外，徐公还详叙了美国人民在华盛顿领导下，奋起抗英并取得独立的经过。对于"少有大志，兼资文武，雄略过人"的华盛顿的赞辞则出现在两段按语中。一段是"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第二段是："美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一个半世纪以前终生服膺孔孟学说的封建士大夫如徐公者，竟对华盛顿推崇备至，认为他有尧舜

传贤不传子的三代遗风，这样的胆识，难道不值得钦佩么？

在此顺便提及一件值得重视的事，即上述两段按语，咸丰三年六月，由宁波基督徒刻在石上，赠送给修建中的美京华盛顿纪念塔，砌在第十层内壁，这块按语碑无疑是中国人民赠送美国的一份高尚礼品，既为华盛顿纪念塔增光，又为中国人民增光，也是中美两国悠久传统友谊的象征。可惜当时徐公已罢职归里，对此殊荣一无所知。

三、志略受到的毁誉及其影响

此书问世后，毁多于誉，誉之者为福州初版作序的刘韵珂、彭蕴章、鹿泽长以及为总理衙门重印本作序的董恂，还有湖广总督吴文镕。毁之者《清史稿·本传》云有"言者抨击及之"，这方面的资料，笔者耄耋之年无力搜求，尚望清史学者予以发掘。

此书遭抨击后，其影响首先及于日本。日本再三翻刻，以为是认识世界的指南，与魏源的《海国图志》同对日本明治维新起了相当的作用。这个作用，希望精通日本史的学者加以探讨。而在中国，直至同治五年方由总理衙门重印，开始广泛流行。光绪二年，郭嵩焘出使英国，最初亦以此书叙述英、法诸国强盛为过。及使英与人书叹曰："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者乎？"康有为17岁时"涉猎群书，始见《瀛环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梁启超18岁时，在沪始见志略，方知五大洲各国。此书给中国读者带来许多新的思想——民主思想、变革思想、宗教思想、经济思想等等。对于同、光两朝的洋务派、维新派以及中国同盟会会员都起了相当大的启迪鼓舞作用。

福州神光寺事件与两次贬黜

《清史稿·本传》对此事件，叙述如下："英吉利人僦居会城乌石山神光寺，士民大哗，言路以入告，上命韵珂、继畬令其迁徙，久

之乃移居道山观。士民以继畬初不力拒，终不慊，言者屡论劾。"台湾学者方闻在其《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中用了50页篇幅，援引台湾故宫博物院查阅到的一切有关奏疏，对此事做了详尽的叙述。在此只能略述其原委。道光三十年六月（宣宗已崩，文宗即位）英国驻福州代理领事金执尔为英一医生和一传教士代租城内神光寺房屋两间，租期半年，租约由侯官知县兴廉，未请示上级，遽盖县印。徐公获悉后，即令兴廉向金氏言明自己盖印错误，并依据条约，照会金氏促使两英人移居城外，金答应先将照会转香港英使核准后，再定行止。徐公认为等候英使批文期间，为大局计，不妨让两人暂缓搬迁。不料福州士绅们，包括在家养病的林则徐在内，力主索还租约，驱逐英人，并力劝徐公调防兵，募水勇，演大炮以防万一。徐公认为城内外洋人数十名，安居如常，不宜先自张皇，引起外人猜疑，未接受其建议，他们更加不满。他在复士绅书中有"倘仓卒之间夷船突来恫喝，誓当张一小舟，直造其船，与之讲述情理，如有不测，当殒身以谢吾民，再与之开炮未晚"等语。可见他是如何持重，如何胆识过人。但他们认为他处理此事太畏葸，太迁就，又包庇部属。于是嗾使京中言官弹劾。徐公始终以大局为重，并得到刘韵珂的全力支持。文宗根据言官们的弹劾，屡下谕旨，垂询各条，严加斥责。两英人终于在十一二月先后迁出城外。他为此事昼夜操劳，心力交瘁，决心引退。十一月，刘韵珂先行引退，他再署闽浙总督。咸丰元年一月，文宗令闽浙总督裕泰复查此事，裕泰连上两疏，内有"刘韵珂、徐继畬复奏各情，尚无不实，亦无掩饰情弊"，对其部属"尚无回护徇庇别情"。为他主持公道的还有吴文镕。

是年二月文宗召徐公入京陛见，与语移时，召见毕，语廷臣曰："徐继畬乃老诚人，非欺诈一流"。[⑩]尽管裕泰为他说了公道话，文宗还是罢免了他的巡抚，降三级任为太仆寺少卿。显而易见，这是受了言官弹劾与志略引起的谤议的双重影响，咸丰三年徐公不顾个人安危上了《三渐宜防疏》，一宜崇尚节俭，不宜大兴土木；二以

养德为主，以防宴安；三宜广开言路，宜防壅塞。文宗特置之座右，时时省览。《清史稿·本传》有徐继畬"直针君德，所举三防，陈义尤高"的赞语。是年秋，文宗特简放徐公为四川乡试正考官。乡试甫毕，言官以他在巡抚任内起解军台官犯迟误，上疏弹劾，终于再次罢官。十一月归里后，他在祭祖文中有："谨守祖训，饮冰茹蘖，不取一钱，矢勤矢慎……惟谨洁自守，尚未玷先人清白"等语，是年冬由"四川归来，差囊例得四千余金，乃得苫盖数椽为藏身之地，又置地十余亩，为埋骨之所"。

教书生涯

徐公归里后，两袖清风，家境萧条，正拟设帐授徒，不料太平天国北伐军挺进至河南怀庆府，山西戒严。巡抚恒春传旨徐公晋省协助官绅办理防堵事宜。咸丰四年初，徐公抵达上党，奔波二年，完成了防堵的任务。平遥超山书院为晋中著名书院，咸丰六年正月，聘徐公为山长，年俸 240 两，从此过起了"绝口不谈时事，邸报亦从不借看……暇时则流览古书，间作小诗自娱"(复吴思澄书语)的苦闷的教书生涯。但他在咸丰九年复保慎斋书内却表达了老骥伏枥的壮心："因获咎之故，转得置身事外，偃息林泉，局外之人多以塞翁失马相庆，弟每闻此言，寸心如割……气力衰残，不任金革……惟此热血未寒，寸心不死，心中有欲吐之数言，关系安危大计，此言朝达宸枫，夕依秋柏，毫无遗憾……欲效一喙之忠，竟无上达之路……不知其心头眼底，有死不瞑目四字，念念不忘也……。"[11]

古稀之年奉旨入京

同治四年闰五月徐公奉陛见之旨，勉强扶病入都，"两宫皇太

后慰劳甚至，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旋补太仆寺卿。各国使臣闻公至皆欢抃，持酒榼诣署谒公，其为异国所敬服，与辽人中国相司马之言无异。而公所著《瀛环志略》，中外奉为指南矣。复充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纶音褒嘉有老成望重，品学兼优，足为士林矜式之语。旋以前在籍团防功，赏加二品顶戴”。[12]当时总理衙门总管大臣为恭亲王奕䜣，大臣六人，徐公为第七人。徐公兼任新成立的培养外语和科学人才的同文馆管理大臣后，聘请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等为教习。徐公于同治七年，曾为其书作序："泰西之学，始于利玛窦之东来，迨后南、艾诸公扩而充之，益见详备。然所言者，天文历法，于格物穷理之说，未之详也。余顷待罪闽中，因公至厦门，晤米利坚人雅裨理……余暇辄引与长谈，于泰西各国古今形势，粗知大略，至于格物之学，未暇及也……《格物入门》一书，……余受而读之，皆闻所未闻，且一一可以见之实事，与他人之驰骛元虚，其语不可究诘者，盖判然矣。”由此可知徐公对于西方自然科学——天文、历算、物理学，表示了怎样较为深刻的认识，对于西方名儒是怎样诚心敬佩的了。

对于同文馆的成立，当时任翰林院掌院大学士的倭仁，反对尤烈。两次丧权辱国的鸦片战争竟未能削弱倭仁这类士大夫的盲目排外的顽固思想，难怪徐公在京度过 3 年多的无所施展才能的苦闷生活。《山西献征》载有："自悼衰老，然以受累朝知遇，思得展布所蓄，因时补救。乃尔时清议多主排外，主张者又徒恃虚骄而无实际，用是日歔欷不自得”等语。但使徐公得到少许慰籍的则是《墓志铭》中所说的外国使节对他的友谊与敬佩。在此有几个问题值得探讨：第一，徐公以古稀之年的废员再次出山，是否受了外国使臣时常询问徐公情况的影响？如果是，通过那位大臣提出召用徐公？第二，外国使臣与徐公究竟有什么密切的交往？第三，徐公再次出山，是否仅由某一个或某几个大臣的推荐？

美国龙夫威教授告诉我们，同治六年，发生了一桩迄今鲜为人

知的非常重要的事件。即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举行了一次隆重仪式，代表美国总统约翰逊将一幅华盛顿画像赠给徐公。蒲安臣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徐公做了简短的答谢辞。龙夫威是从 1868 年 3 月 29 日的《纽约时报》发掘此事，并援引了讲话全文的。现摘译如下：

> 自从阁下编写一部专讲中国域外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以来，已过了将近 18 年。阁下为写此书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展示了正确的判断与令人叹服的渊博学问。阁下详述了各国的伟人，推崇华盛顿为众伟人之首。阁下还宣称华盛顿恢复了贵国三代传贤不传子的遗风。为了表达美国人民对这些赞辞的感激，敝国总统要求国务卿聘请著名画家画了这幅像送给阁下。当阁下看到这幅画像的慈祥面容时，请不要伤心地回忆起为了使贵国人民熟知华盛顿和西方国家而尝到 18 年之久的辛酸后果。阁下现在又兼任同文馆管理大臣，而这个机构的目的，就是提倡一些阁下为之而受到弹劾的观点，并使贵国人民学习华盛顿的语言和原则。华盛顿像贵国人民一样，重视农业，也主张和平。他支持孔子两千多年前讲过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原则。我们中美两国人民为什么不该相互交流我们的思想呢？我们美国为什么不该了解孔子和孟子的箴言呢？贵国为什么不该了解敝国的科学、铁路、电报以及火轮船呢？伟大的中国曾发明过纸张、印刷、瓷器、罗盘、火药以及“民为邦本”这个学说。为什么不该把这些发明贯彻到底，去享受它们全面发展的成果呢？敝人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将这幅画像赠给阁下，希望这幅画像可以永远使阁下和贵国人民回忆起美国人民和贵国的悠久友谊以及他们对贵国道德高尚的代表——阁下所表示的热爱与敬重。

徐公致答谢辞时，表示“华盛顿已成为全人类学习的榜样与向导，因此他的优良品德已成为连接古代名人与后代人的纽带”。关

于上述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既不见诸涉及徐公的任何文献中，也未见诸徐公本人的任何文字中，原因何在，百思不得其解。希望史学家们作进一步的探讨。

同治八年四月，徐公告老还乡后，县中学子前来请执弟子礼者为数甚多。十二年距嘉庆十八年乡举整60年，故事重宴鹿鸣，大吏先期奏闻，清廷赏加头品项戴。是年七月初三日，病逝于中丞第，享年79岁。关于徐公著述的特色，《山西献征》概括如下："读书通大义，不沾沾章句，亦不为讲学家空谈，制举文广大宏深，自成一家言。他文亦精峭透快，无嗫嚅语。晚学诗，具张王体格。"徐公著作传世者除志略外，还有《松龛先生全集》、《古诗㳂评》、《五台新志》、《徐松龛家书真迹》、《退密斋文集》、《批后汉书残本》等等。1988年又发现了他的《批后汉书全本》，将收在《徐继畬全集》中。

1990年10月初稿，1991年12月修改稿

（作者徐士瑚，字云生，山西五台人，1907年生，北京市北方交通大学退休教授。）

注释：

①⑦⑨⑩ 《山西通志·乡贤录》。

② 《五台新志》。

③④⑤⑥⑪ 东洋文库《退密斋文集》第五卷，第63页；四卷，59页；《续夫人家传》；四卷，76页；二卷，49页。

⑧ 《徐松龛家书真迹》。

⑫ 沈桂芬：《松龛徐公墓志铭》，见《徐氏宗谱》卷七。

●潘振平

《瀛环志略》研究

清人徐继畬所著《瀛环志略》十卷，是近代中国人探求外部世界知识过程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徐继畬（1795—1873），字健男，号松龛，山西五台人。道光六年（1826）进士。道光十八年以后，在闽粤沿海地区任职十余年，官至福建巡抚。咸丰年间因故去官归里。同治初年复出，在总理衙门行走，旋充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徐氏的为宦生涯并无突出的建树，但他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完成的《瀛环志略》，在 19 世纪的后 50 年中一直被人们奉为了解世界的标准读本，对这一时期知识界观念的变化有过长久的影响。本文拟对《瀛环志略》作一全面研究，并试图探讨从中反映出的近代中西文化接触的若干相关问题。

从《瀛环考略》到《瀛环志略》

《清史稿·徐继畬传》对徐氏辑书事记述如下：

> 继畬初入觐，宣宗询各国风土形势，奏对甚悉，退遂编次为书曰《瀛环志略》，未进呈而宣宗崩，言者评击及之。

类似的文字也出现在形成更早的徐氏传记中，如杨笃的《太仆寺卿前福建巡抚徐公家传》、《五台新志》卷四人物续等。现在徐氏自己的文字材料中，涉及《瀛环志略》的寥寥无几，他于咸丰八年所写的

一封私信中说：

> 后在闽藩任内，偶著《瀛环志略》一书。甫经付梓，即腾谤议。先师独加褒赞，嘱令再加修饰，钞缮进呈。

所称"先师"者，是曾任福建巡抚的吴文镕。他在鸦片战争期间与邓廷桢（时任闽浙总督）一起上折推荐徐继畬署理汀漳龙道，与徐氏私交甚厚。此外，徐继畬在开始著述的道光二十四年七月，曾在《瀛环考略》这个稿本中留下一段涉及写作动机的文字：

> 方今圣泽覃敷，海外诸国鳞集仰流，帆樯萃集，其疆土之广狭，道里之远近，任边事者，势难已于咨询。此说虽略，聊以为嚆矢云尔。[①]

这段话清楚地揭示了徐氏著书与时势变化的密切关系。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被迫开放东南沿海的五个口岸，并不得不更多地与海外各国打交道。作为参与办理"夷务"的官员，徐继畬在实践中深感以往文献的记载"其说恢谲，其文瑰异，考之事实，或不尽然"，[②]不能适应实际的需要，于是根据自己接触到的有关材料和知识，整理成册，以期使国人了解"海外诸国"的"疆土之广狭，道里之远近"，不再昧于外情。这就是徐继畬编著《瀛环志略》的初衷。

徐继畬编纂《瀛环志略》的直接动因，则得自于一个偶然的机遇。

道光二十三年末（1844 年 1 月），徐继畬在厦门会晤了英国首任驻厦门领事记里布（H. Gribble），商谈有关开口的具体事项。在他们会谈时担任译员的是一个美国传教士，名叫雅裨理（D. Abeel），徐继畬称他为"西国多闻之士"。此人正是使徐继畬对世界史地发生兴趣的关键人物。

徐继畬与雅裨理的交往过程，是《瀛环志略》成书经过中一个饶有趣味的插曲。徐氏本人于此记述比较简单，只是说看到了外国地图册子，"绘刻极细，苦不识其字。因钩摹十余幅，就雅裨理询译之，粗知各国之名，然匆卒不能详也"。[③] 雅裨理则有更为详细的

记录。

在道光二十三年底，徐继畬与雅裨理见面多次，询问了许多有关外国的问题。雅裨理认为"这是我迄今遇见的最喜欢提问的一位中国高级官吏"。"一天下午，我们带了尽可能多的资料送给他，这是在他约定的短时间里尽力为他提供的。"为了自己的传教使命，雅裨理还把《新约全书》等基督教书籍送给徐继畬。[①]

这部不知名的外国地图册和其他书籍肯定给了徐继畬深刻印象，使他对世界史地知识愈来愈感兴趣。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初二日（1844 年 2 月 19 日），在获悉徐继畬又一次来到厦门的消息后，雅裨理登门拜访了他。在交谈中，徐氏自称已在阅读基督教书籍，但所提出的问题仍主要是"一些有关的地名和特征方面的"。很明显，徐继畬所请教的是自己在了解世界地理中碰到的难点，他把与雅裨理的接触当作学习域外史地知识的极好机会。同年三四月间，徐氏再次与雅裨理交谈了一个下午。这次交谈似较前几次更为深入，徐继畬表现出了解外部世界知识的迫切愿望。雅裨理记载道："他已经获得了相当多的知识"，"他对了解尘世间各国的状况，比聆听天国的真理急切得多"。雅裨理所叙述的世界地理、历史和政治知识，在客观上促成了《瀛环志略》这部中国人研究和探索域外史地名著的诞生。

徐继畬在与雅裨理开始接触的半年以后，于道光二十四年七月写成了《瀛环考略》二卷。是书未曾刊印，但其手稿本现仍存世。《瀛环考略》分为卷上、卷下。卷上介绍亚细亚和亚非利加，卷下介绍欧罗巴和亚墨利加。卷下之首又有《舆图考略》几个字，可能是徐氏著书时曾经考虑过的书名。全书共收地球全图及世界各地区、各国的地图二十八幅，基本上包括了当时整个世界。这些地图，就是雅裨理的那本地图册上"摹取"的，但与《瀛环志略》所载地图多有不同，可知徐氏后来另有所本。每图之后都"缀之以说"，"说多得之雅裨理，参以陈资斋《海国闻见录》、七椿园《西域闻见录》、王柳谷

《海岛逸志》、泰西人《高厚蒙求》诸书”。[5]图说之后往往有按语，或为考订文字，或为本人见解。从撰著时间看，《瀛环考略》基本上是徐继畬根据同雅裨理多次交谈所获得的知识整理而成的，只是在涉及南洋、西域等地区时，使用了一些中文资料。这个图说已初具世界地理志的规模，是《瀛环志略》的雏形。《瀛环志略》正是在《瀛环考略》的基础上，经不断增补修改而编写的。

此后几年中，徐继畬继续埋头于域外史地知识的探索。他自幼接受的是系统的封建文化教育，他的知识结构和学术兴趣，都从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尽管他对舆地考证之类颇为用心，曾写过《尧都辨》、《晋国初封考》、《两汉沿边十郡考略》、《两汉幽并凉三州今地考略》等书，但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并没有超过同时代人的水平。理解并接受有关近代地理学的新概念和新知识，对他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徐氏没有机会出洋，对外部世界没有感性认识，只能根据别人的口述或著作来分析比较，查考核实，更给著述带来困难。但是，敞开在他面前的这个知识天地是如此新奇诱人，以致他为了获得更多的掌握而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在《瀛环志略》的自序中，徐继畬回顾了五年中搜集资料和反复增补的情况：

> 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自癸卯至今，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

这种探索使徐继畬大开眼界，并掌握了丰富的外国史地知识。道光二十五年末（1846 年 1 月）来到福州访问的一个英国传教士四美（G. Smith）从英国领事阿礼国处得到了许多关于徐继畬的消息。他报道说：徐继畬“会一连几个小时地谈论地理学”，“对于西方的政治和地理异乎寻常的精通”，“对欧洲政治的全过程有普遍的了解”。[6]与徐氏素有交往的中国人士也都一致认为他在这一方面

有广博的知识。到了道光二十八年(1848),在同僚、好友的怂恿和帮助下,徐继畬把五年来日积月累的文稿整理成书,定名《瀛环志略》,正式付梓,公诸于世。

《瀛环志略》的资料来源,亦即徐继畬获取外部世界知识的途径,大致包括了三个方面:一是与外国人士的直接接触。除了雅裨理外,徐还利用职务之便,在接触外国官员、传教士、商人时尽量询问世界各国的情况。雅裨理的朋友、美国传教士甘威廉(W. H. Cumming,书中称为甘明),就是徐的询问对象。《瀛环志略》有关瑞士的章节引用了他的叙述。英国首任驻福州领事李太郭(G. T. Lay)与徐结识后,徐经常向他求教,书中有关古希腊文明、古犹太史、古巴比伦史等,就有李太郭提供的知识。李的后任阿礼国(R. Alcock)及其夫人也多方面地为徐继畬提供外国史地情况,还答应送给徐一架地球仪。他们所介绍的知识虽然不会那么系统完整,但对于徐继畬比较准确地把握外部世界特别是欧美各国的历史状况和现实社会,帮助很大。

二是搜集和阅读外国地图集以及西方人士的汉文书籍。道光二十四年,徐的下属,泉州府同知霍明高(蓉生)为他购得两本外国地图册,"较雅裨理册子尤为详密","并觅得泰西人汉字杂书数种"。[7]此外,他还通过各种渠道罗致流传在东南沿海地区的西洋人编写的介绍世界地理、历史的出版物。《瀛环志略》的"泰西诸国疆域、形势、沿革、物产、时事皆取之泰西人杂书,有刻本,有钞文,并月报、新闻纸之类,约数十种"。[8]当时在广东任地方官的黄恩彤在致徐氏的一封信中提及:"近日咦夷郭实拉撰《西洋地理志》一书,殊嫌猥杂,远不及玛基士书之明晰,而文烦事增,亦足供外史之采。此间有人将付剞劂后,续为邮致"。[9]信中所提郭实拉(C. Gutzlaff),又译作郭士立,普鲁士传教士,道光十三年(1833)曾创办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连载其所著《万国地理全集》,十八年又载出《古今万国纲鉴》。玛基士(Machis),又译作玛吉士,葡萄

牙传教士，曾著《地理备考》一书。这两个传教士的作品，《瀛环志略》中都有引用。

三是考查了一批中国的官私文献。在介绍东亚、南洋及印度、西域等地区的情况时，徐继畬较多地参考了中国传统史志的材料。他所引用的文献，一类是历代的正史，如《汉书》、《后汉书》、《新唐书》、《元史》、《明史》等；另一类是私家著述的游记或地理志，除了在编写《瀛环考略》时已参考过的几种外，还有郦道元的《水经注》、王恽的《泛海小录》、邵星岩的《薄海番域录》、黄毅轩的《吕宋纪略》、顾亭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谢清高的《海录》，等。魏源编著的《海国图志》，徐继畬已见到了，但《瀛环志略》中未直接引用。[10]值得称道的是，他还能注意从民间了解情况。例如，为了写好有关南洋群岛的章节，他曾向厦门一个姓陈的老舵师专门请教。

多方面地搜集资料为《瀛环志略》的成功奠定了基础。由于徐继畬重视资料的考订比较，特别是注意吸收了当时传入的有关外部世界的最新知识，这就使《瀛环志略》在世界地理的研究和介绍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

代表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世界地理著作

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系统介绍世界史地的著作，最早出现于鸦片战争之后，以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为嚆矢。这类著作中，水平最高、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两书。关于这两部著作孰优孰劣的问题，前人多有议论，一般认为魏书广博，徐书简明，推崇《瀛环志略》“体裁较整”，[11]“言核而意赅”。[12]这仅仅是从两书的编写形式上来评判的，就思想性而言，《海国图志》显然要高明一点，书中揭示的“师夷制夷”之命题，梁任公认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而《瀛环志略》则不是一部以思想深刻见长的

作品，书中的按语，考订文字和就事论事的议论居多，在如何对付西方侵略的问题上没有明快有力的回答。但在叙述的明晰、考订的严谨、资料运用的准确方面，《瀛环志略》略胜一筹。《海国图志》几经增补，它在介绍世界各国时，把能得到的有关记载几乎一并辑入，纲目较乱，差误不少，可以说是一部未及精雕细琢的资料集；而《瀛环志略》集中叙述世界的地理历史，对搜集到的资料予以消化，故眉目清楚，层次分明，是一部精心编撰的著作，在世界地理的研究和介绍方面的成就超过了《海国图志》。

《瀛环志略》在介绍世界地理方面的成就，可以简略地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比较全面地叙述了当时世界各大洲各地区的情况。全书共分十卷。卷一、卷二分述地球的基本知识和东亚、南洋以及现今大洋洲的情况；卷三为印度及西域（即现今南亚和中亚）各国的概述；卷四至卷七介绍欧罗巴（今欧洲）各国，包括英、法、意、俄、奥、普、希、比、荷、西、葡、丹、瑞典、瑞士等十余国；卷八、卷九、卷十介绍南、北亚墨利加（今南、北美洲），重点是米利坚（美国）。当时世界上存在的各个国家，基本上都得到了反映，内容则包括方位、疆域、地形、山脉、河流、气候、物产、风俗及历史沿革等等。

第二，初步吸收了某些近代地理科学的概念。《瀛环志略》以四大洲（亚细亚、欧罗巴、阿非利加、亚墨利加）和五大海（大洋海、大西洋海、印度海、北冰海、南冰海）来划分当时的世界，已注意到大陆和海洋的区别，与中国文献中以“东南洋”、“西南洋”、“小西洋”、“大西洋”等观念来区别世界上不同地区相比，显然更科学一些。在介绍各国时，首叙一洲的概貌，然后根据不同的地理位置将一洲划分为若干区域，各区之下再按国分述，这是近代区域地理的运用。尽管徐氏本人还没有认识到这类概念的价值，但由于书中实际上已在运用，因而就使《瀛环志略》对地球概貌的介绍建立在比较科学的基础之上。

第三，重视地图的作用。徐继畬认为："地理非图不明，图非履览不悉。大块有形，非可以意为伸缩也。"[13]全书即以图为纲展开叙述，共收图四十二幅，包括东半球、西半球的全图和各洲各国的分图。地图多摹至西方的地图册，虽然仍很粗糙，但所钩勒之地的大致形状和位置都比较准确，是当时中国出版物中最好的。书中不少对地形的生动描述，显然出自对地图的观察。如描绘地球的大陆："大地之土，环北冰海而生，披离下垂如肺叶，凹凸参差，不一其形。"[14]描绘美洲的形状："北土形如飞鱼，南土如人股之著肥裤，中有细腰相连"[15]。描绘意大利："斜伸于地中海，似人股之著屐者。"[16]地图是表达地理知识最直观的工具，准确的地图会给人以正确的地理观念。《瀛环志略》之所以能对世界地理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和叙述，重视地图的作用当为一重要原因。

第四，著述态度严肃，纠正了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不少错误观念。在中国传统的外部世界知识体系中，有关各处的奇异人种、风俗和物产的记载占了很大比重。直到清朝雍正年间纂修《古今图书集成》，还把"一臂国"、"三身国"之类视为"边裔"，列为"西方未详诸国"。这类传说的长期存在，成为人们正确观察和对待海外诸国的巨大思想障碍，以致文人墨客言及海外，便津津乐道于此，把外部世界的探讨等同于猎奇。徐继畬通过对世界各国的介绍，否定了长期流传的种种荒诞不经的认识。

此外，对民间存在的一些错误的地理观念，书中也作了力所能及的考订。当然，限于知识水准及其他情况，书中所作的考订不可能都是正确的，但徐氏这种求实求准的探索精神，保证了《瀛环志略》所介绍的地理知识比较准确可靠，使世人由此得到了比较正确的地理观念。故后人论及此书，都不约而同地称赞其"博采前贤著述，正其舛误"和"考核甚精"。

《瀛环志略》用士大夫们熟悉的语言和思维、论证方式，比较全面、正确地介绍了世界各国，使中国人有关"天下"的概念得到了极

大的延伸。它告诉人们：外部世界并不是扑朔迷离、只能"存而不论"的混沌一片，而是划分为若干洲若干海，完全可以掌握它的全貌；海外诸邦亦非神秘莫测，不可究诘，而是一些与我们一样有着自己历史沿革和治理疆域的国度。把一种新看法告诉国人，并在人们面前展现这个新世界的各个方面，正是《瀛环志略》一书在地理学方面的主要成就，也是它对时代的重要贡献。

《瀛环志略》对世界地理的研究和介绍仍然有很大的不足，这主要地不是指它对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沿革或其他状况的描述有不少差误（这是不可避免的），而是指它在吸收近代科学知识方面所表现出的保守和胆怯（当然也有难言的苦衷）。例如，他明明已经了解到"亚细亚以中国为主"，[17]但在正式定稿时一定要将之改为"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18]他对经纬线等的运用不甚重视，在叙述、制图时都将之略去。如此等等，说明徐继畬对近代地理科学的基本知识还缺乏必要的认识，以致在本来可能跨进一步的地方裹足不前。因此，从基本性质上看，《瀛环志略》仍然是一部传统的地志，而不是一部新型的近代地理著作。传统文化观念的沉重压力，使得《瀛环志略》一书不可能吸收更多的新知识的养分，完成中国地理学上的划时代的进步。

新知识与旧观念

徐继畬是如何看待他所竭力探索的这个世界呢？换句话说，《瀛环志略》在叙述世界各国基本状况时，向世人表达了一些什么样的见解呢？

当徐继畬把视野转向外部世界后，他立刻感觉到现实世界与自己心目中原有的那个世界的格局有了很大的不同。西方殖民扩张的浪潮早已波及亚洲，中国实际上处于被包围的状态之中。于

是，徐继畬在描述天下大势时，把注意力首先集中到这个焦点上。

徐继畬认为，印度、南洋等地相继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是“古今一大变局”。[19]他十分正确地描述了西方扩张与中国遭受侵略的关系：“自泰西据南洋群岛……中土之多事，亦遂萌芽于此。”中国的近邻印度成了殖民地，“诸部夷灭者十之八九”，而且成为列强觊觎中国的根据地，“求隔绝而不能”。[20]徐继畬用“天地之气”的生息演化来概括世界大势的这种演变：“天地之气，忽而旁推交通，混为一体，倘亦运会使然耶？然天下从此多事矣。”[21]

他已意识到：欧洲的扩张打破了世界各地原来的隔绝状态，这是一个人们无法控制的必然趋势。这个过程造成了世界格局的新变化。显然，徐继畬已开始从总体上去把握明末清初以来中国海疆告紧的历史意义，尽管其观念是陈旧的。

对于如何对付西方列强的这个重大问题，《瀛环志略》没有作出直接回答，只是在叙述或评价某些国家、地区沿革时，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主要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称颂或同情那些敢于抗击强敌的弱小国家。书中写道，在南洋群岛相继沦陷后，苏禄“奋力拒战，数百年来安然自保。殆番族之能自强者哉！”在荷兰侵略者强大压力下，“诸番皆奉命惟谨”，马神“独能毒流退师，可云铮佼”。[22]二是治国需居安思危，谋划谨慎，防患于未然。书中指出，南洋的噶罗巴就是因为“贪饵酿祸”；[23]印度之所以被鲸吞是由于当地人“不察萌芽”。[24]对于南洋形势的巨变，徐氏为之扼腕：“惜乎，筹远者之未早计也！”[25]这些议论未必正确地描述了有关史实，但其中包含着十分明显的抵抗侵略、防微杜渐的思想。

西方世界是《瀛环志略》叙述的又一个重点，全书用了大约一半篇幅来介绍欧美国家。徐继畬已经模糊地认识到古代希腊文化以及基督教在西方文明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但他着力探讨和描述的，还是欧美近代社会。除了地理方位、人种差异、风俗习惯等，书中较有特色的有如下三点：

第一是物产丰富，制作精妙。“其土膏腴，物产丰阜”。“其人性情缜密，善于运思，长于制器。金木之工，精巧不可思议，运用水火，尤为奇妙。火器创自中国，彼土仿而为之，益加精妙，铸造之工，施放之敏，殆所独擅。造舟尤极奥妙，篷索器具，无一不精，测量海道，处处志其浅深，不失尺寸。越七万里而通于中土，非偶然也。”[26]

第二是重视商业利益，以商立国。“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因其善于操舟，亦因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力而为之也。”[27]

第三是议事制度，“乡绅”在国家大政的决策中有重要发言权。“西土之例，国有兵事，则聚乡绅于公会，令其筹办兵饷”，[28]“大约刑赏、征伐、条例诸事，有爵者主议；增减课税、筹办帑饷，则全由乡绅主议。此制欧罗巴诸国皆从同，不独英吉利也”。[29]

上述介绍已初步触及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某些主要特征，标志着中国人认识西方社会的一个新水平。尽管书中所述不免有许多不正确和曲解的东西，但对西方文明更深一个层次的概括，如以商立国、议会制度等等，正是后世人们向西方探求真理中反复研究和议论的课题，只是其内涵不断扩充，理解逐渐深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瀛环志略》对近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作了富有积极意义的介绍和评论。书中对英国议会政治的概况作了专门的介绍。较早实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推择乡官理事，不立王侯”的瑞士，在书中被描绘成“国无苛政，风俗俭朴淳良，数百年不见兵革”的“西土之桃花源”。[30]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创始人之一华盛顿，在书中被尊为“泰西古今人物”之首，认为他“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骎骎乎三代之遗意”。而美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是“创古今未有之局”的壮举。[31]尽管这种用“桃花源”或“三代之治”的中国传统观念来比附新兴的近代资本主义民主混淆了不同的历史现象和社会性质，但

这种类比本身却以肯定和称颂为前提。三代之治是千余年来儒生心目中理想社会的楷模,而那些不久前还被目为"岛夷"的穷荒之地竟然出现了与之相似的社会,这一比较本身不就有一点惊世骇俗么?

在探讨世界各国历史沿革的过程中,徐继畲看到了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文明古国已经衰落,而另一些新兴国家则逐渐强盛起来。《瀛环志略》一书对此作了较多议论,有意识地分析了国家的富强之道。书中首先指出,强和弱不是绝对的,而是可以互相变化的。如奥地利、西班牙的由强变弱,俄罗斯在彼得大帝锐意进取下由弱变强等。国家富强靠什么?书中认为不是单靠疆土广阔或资源丰富,"舟楫之利,火器之精,心计之密"和"善于运筹"等都有重要作用。

在欧美各强国中,徐继畲最为推崇的是佛郎西、普鲁士和米利坚。看看书中对这些国家所作的总结,就可以了解徐氏心目中的强国之道。"佛郎西在欧罗巴诸国中,传世最久……立法峻厉,贤君复六七作,危而不亡,殆有由也","争先处强,不居人下,偶有凌侮,必思报复……其用兵也,仗义执言,不似诸国之专于牟利。故千余年来侮乱迭生,而虎视泰西,国势未尝替削"。[32]普鲁士自威廉三世击败拿破仑后,"增修国政,劝农工,设学馆,惠商旅,由是百姓亲附,邻国之民喁喁慕义"。[33]米利坚自华盛顿兴兵驱逐英人后,"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政最简易,榷税亦轻"。[34]

把这些议论归纳起来,一是贤明君主,二是重义轻利,三是修政睦邻,也就是儒家学说中关于治国安民的几条金科玉律。所以,书中出现了既以赞颂的口气叙述了某些国家的富强,又为不能"渐以礼乐车书"来雅化这些"荒裔"而表示惋惜的矛盾现象。在徐继畲心目中,海外各国的治理是否有成效是以儒家学说的价值标准来判断的,同时,某些国家的治乱得失似乎可以证明中国古代先贤的理论适用于这个新发现的世界。

由上述分析可知,用传统的观念来理解和看待陌生的外部世

界，是《瀛环志略》一书的基本特征。这相当典型地反映了那个时代比较开明的士人在初次接触到外部世界新知识时的心理状况。在他们看来，用传统的圣贤遗训来解释这些新知识是天经地义的、不容怀疑的，至于是否应当更新自己的观念，以便更好地理解和吸收这些新知识，他们没有想过，也不可能想到。当《瀛环志略》用传统观念分析世界大势，将传统的价值标准应用于对世界各国的评论时，它在无意中缩短了中国和外部世界在文化上的距离，缓解了中西文化观念冲突的尖锐程度，从而使新史地知识的传播能比较顺利地（显然是不无歪曲地）进行。从某种意义上说，把有关海外各国的新鲜知识中国化，可以说是把它们输入中国的必由之途。同时，书中的有关叙述和评论还曲折地反映了徐继畬企图用传统文化中某些理想化的成分来改良现实政治中弊端的实际主张。后人读到这些文字时，会产生强烈的共鸣，并在认识世界从而更好地认识中国的道路上继续探索。

《瀛环志略》的流传和影响

《瀛环志略》是道光二十八年（1848）秋开始在福州刊刻的，在该书还未全部出齐时，徐继畬就给友人寄去开初几卷，以征求意见。[35]

尽管徐氏的同僚及好友都来为之捧场，但该书并未获得普遍的好评，主要是书中对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叙述和评论引起了士大夫的不满。还在该书刻印过程中，张穆就曾致书徐氏婉言告诫云：

> 春秋之例，最严内外之词。执事以控驭华夷大臣而谈海外异闻，不妨以彼国信史，姑作共和存疑之论。进退抑扬之际，尤宜慎权语助，以示区别。[36]

另一些人的批评就不那么委婉和客气。说是此书："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予初见此书，即拟上章劾之。旋知已为同事者所纠，奉旨议处，书版饬令毁销。"[37]李慈铭也有这种看法，认为"其轻信夷书，动辄铺张扬厉"。"于华盛顿赞其以三尺剑取国而不私有，直为环宇第一流人。于英吉利尤称其雄富强大，谓其版宇直接前后藏。似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况以封疆重臣，著书宣示，为域外观，何不检至是耶！"[38]曾国藩的见解是"徐松龛中丞著书，颇张大英夷"。[39]可见，认为《瀛环志略》对西方列强的叙述夸大其词，是当时人们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同时，徐氏本人因"神光寺事件"受到福建士绅和京中言官的指责，"言者摭书中论日耳曼联邦有'西方王气，方兴未艾'之语，而删'西方'二字劾先生，欲中以奇祸"。[40]正因为如此，这部相当有价值的世界地理著作在出版后的十余年中，只由红杏山房于道光庚戌年(1850)重印过一次，其流传和影响的范围相当有限。

旅居中国的西方人士很快就对《瀛环志略》一书作出了反映。事实上，在徐继畬著书的过程中，他们就已不断地报道过有关消息。《中国丛报》(1851 年 4 月)对该书作了评述，认为这部作品是中国计划的产物，成为给予地理工作正确指针的一个里程碑，它比中华帝国使其高级官员和文人了解地球上其他国家的资源、计划、位置的任何出版物都要高明得多，等等。

就在《瀛环志略》在故乡遭受冷遇的时候，它飘洋过海传至日本，在那里意外地受到了欢迎和好评。该书如何传入日本，目前尚不清楚。日本文久元年(咸丰十一年，1861)刊刻了《瀛环志略》，以后又翻印了几次。该刻本即"对嵋阁本"，由井上春洋训点，印刷和装帧质量超过同时期的中国版本，地球图用红、黄、绿三色套印，相当醒目，人名、地名有英文、日文注音，年代日期也用日本纪年标出，以便于阅读。日本当代史家评论《瀛环志略》的影响时指出："如果说，幕府末期的日本的地理学，特别是有关东南洋的知识，是出

于《瀛环志略》之赐，那也并非过甚其词。"[41]

《瀛环志略》在中国受到重视，是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朝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开始兴办"洋务"，影响了当时的社会风气，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有必要了解世界。同治四年(1865)底，赋闲十余年的徐继畬被重新起用，成为新设的洋务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官员，以后又出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与此同时，总理衙门印行了《瀛环志略》，[42]后又作为同文馆的教科书之一。美国人也在这个时候对《瀛环志略》表示了公开的称颂。同治六年九月二十四日(1867年10月21日)，即将离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 Burlingame)根据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指示，将一幅华盛顿肖像赠给徐继畬。赠画仪式有总理衙门官员出席，由卫三畏(S. W. Williams)和丁韪良(W. A. P. Martin)担任译员，蒲安臣发表了演说，赞赏《瀛环志略》"是你祖国奇迹般的学术成就"，并对徐氏的遭遇表示同情。据蒲安臣在给国务卿的报告中指出："典仪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43]这个活动，大约就在世人心目中为《瀛环志略》造成"西人咸服其允当"、[44]"中外刊布，群奉为指南"等印象。[45]

从此，《瀛环志略》声誉日隆，成了人们了解世界概况的必读书，有力地推动了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历史潮流。那个年代出洋考察或充当使节的中国人，大多随身携有《瀛环志略》，以便查阅。书中对人地国名的译法，后来还成为总理衙门翻译外文书籍时的标准。[46]19世纪后半期追求新知的人士中，几乎没有人不读《瀛环志略》。王韬认为这是"当今有用之书"，因为它"综古今之沿革，详形势之变迁，凡列国之强弱盛衰，治乱理忽，俾于尺幅中，无不朗然如烛照而眉晰"。[47]他从书中领悟到时局的变化及海外诸国富国强兵之途。康有为决心研讨西学，也与《瀛环志略》有关。光绪五年(1879)，他在知道"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夷狄视之"以后，"乃复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础"。[48]梁启超则直接从《瀛环志略》受到新的世界观念的

启蒙。光绪十六年(1890)他入京会试归途中,在上海"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49]他也把该书看作西学书籍,在《读书每月课程》中把之列为"西学书"一栏的第二本必读书,仅次于《万国史记》。个别人还因读了《瀛环志略》而对美国的民主政治发生了兴趣,如张一麟写道:"余年十六岁时,得五台徐松龛先生《瀛环志略》,读至华盛顿故事,辄为心醉,自忖民主政体安得及吾身而亲见之"。[50]甚至有人赋诗云:"君不见《瀛环志略》著自徐,岣嵝委宛成异书",[51]"异书"云云,简直有点奉若神明的味道。

自19世纪70年代起,《瀛环志略》不断被翻刻,版本之多,至今仍未能有确切的统计数字。就笔者在京、沪两地所见的十余种版本而言,仅光绪二十四年(1898)就有新化三味书屋校刊本、上海老扫叶山房铅印本、上海书局代印本(即槐里堂本)几种。时人的说法是"久已家置一编,不胫而走"。[52]这种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瀛环志略》的社会需求程度。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从事着续补、增益工作,以使这部著作更为完美,更长久地传世。继咸丰年间何秋涛作《瀛环志略辨正》,对该书有关俄罗斯的记述错讹进行订正后,光绪年间又有丁日昌、薛福成二人分别辑续《瀛环志略》。有个在南洋槟榔屿任副领事的官员张煜南,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刊刻了《海国公余辑录》,其中有《辨正瀛环志略》、《推广瀛环志略》各一卷,是他考订《瀛环志略》中有关错误记载和搜集资料加以补充的成果。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已觉察到《瀛环志略》所提供的世界知识不免老化,需要更新;另一方面又反映出在该书问世五十年后,依然在人们心目中有着权威地位。

余　论

《瀛环志略》的成书经过及书中反映的思想，给我们了解近代西学东渐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近代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看来是以地理、历史知识为开端的。过去我们经常把这一时期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仅仅归结为对“船坚炮利”的重视，这显然不够全面，应予补充。鸦片战争前后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流传的西人所著汉文书籍，除了宗教宣传品之外，几乎都是介绍世界地理、历史的读物。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所关注的，主要仍然是世界各国的方位疆域、历史沿革等知识，“船坚炮利”只是其中的一项内容。在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过程中，传教士的媒介作用十分突出。他们在传教活动中不可避免地传布了某些西方近代学术文化知识，往往造成“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可以说，如果没有主要是由传教士们撰写的那些介绍世界史地的汉文出版物，也就没有《瀛环志略》一类高水平的中国人自己编写的域外地志问世。《瀛环志略》的编写过程及资料来源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相当清楚地展现了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向中国渗透的最初内容和具体途径。

一个相当耐人寻味的事实是，被后人尊崇为“新地志”开创性著作之一的《瀛环志略》，在近代地理学的基本理论、方法的引进或介绍方面没有值得一提的建树。产生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传统文化观念的制约（这一点我们上面已经作过分析），但另一个往往容易被忽视的原因则是来自现实需要的压力。在徐继畬等人的意识中，世界地理首先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与现实有着密切关系，了解和掌握外部世界知识不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学术兴趣，而主要是为了应付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的威胁。正是现实中“制夷”、

“筹远”之类的需要，推动了一部分有识之士面向世界。近代中国社会处于一种持续不断的危机状态中，生活在这一环境中并在心理上感受到强邻巨大压力的中国先进分子，所考虑的首要问题只能是寻找摆脱危机的方法和道路。因此，在近代西方文化输入时，人们往往来不及把它们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来分析考察，而只是从实用的目的出发，匆忙地（因而也是粗浅地）从中吸收对救亡图存有用的东西。坚船利炮也罢，声光电化也罢，议会宪政也罢，它们之所以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无一不与那个时期人们设计的救国方案有关。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作全面、深刻的了解，影响了中国消化、吸收西方文化的进度，构成了近代中西文化融合过程相对缓慢的一个重要因素。《瀛环志略》所表现出的忽视近代地理学基础理论和基本概念的倾向，隐隐约约地预示了西方学术文化在近代中国传播过程中即将普遍遭遇的命运。

在近代中西文化（地理、历史知识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接触的开初阶段，中国人大体上是用自己传统文化的观念来看待有关新现象和新事物的，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阐述或发挥。这种状况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方面是西方文化的实际性质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被忽视，甚至被曲解；另一方面是西方文化的某些内容由于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作为护身符，从此登堂入室，得以流行、传播开来。这种悖理的结合，正是中国近代中西文化接触第一阶段的产物。当然，这种结合本身即包含着互相排斥的因素，外来者在观念形态等方面与其引见者的冲突日趋激化。在《瀛环志略》这部著作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这种既排斥又融合的最初表现。

《瀛环志略》的流传过程与中国近代思想界前进脚步一致，也与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同步。人们对《瀛环志略》中叙述的世界知识从开始时的怀疑、不满到以后的信服以致入迷，正反映着近代

中国社会对西方文化输入的一般态度。近代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其说是“波浪式”，不如说是“波纹式”，即由若干中心点不断向四周层层扩散，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先进的中国人在此过程中不断深化着对西学的认识，由部分而及整体，由表层而及内核，从而引起观念形态中的潜移默化，最终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作用。《瀛环志略》问世五十余年中的遭遇，或许说明了这一点。

(作者潘振平，1953年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编审。)

附记：此文原载《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此次收入时经作者修改。——编者

注释：

①②⑰㉑㉕ 《瀛环考略》卷上，徐继畬识；卷上；卷下；卷上。该书共二卷，原藏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现存台湾。

③⑦⑧⑬⑭⑮⑯⑱⑲⑳㉒㉓㉔ 《瀛环志略》，徐继畬识；徐继畬识；凡例；徐继畬识；卷一；卷九；卷六；卷一；凡例；卷二；卷二；卷三。

④ 《中国丛报》(*Chiese Repository*，或译《澳门月报》)第13卷(1844年5月)、第20卷(1851年1月)。

⑤ 《瀛环考略》，徐继畬识。按《高厚蒙求》一书，是嘉庆初年华亭徐朝俊所纂辑，共四集，介绍天文、地理、数学、钟表等知识。其二集《海城大观》有“地舆总说”、“五大洲记”等内容，“第据《职方外记》及《坤舆格致》、《台郡杂志》诸书，薙其理所未可尽信者，采辑成编，聊广闻见”。徐氏参考的当为此书，但称其为泰西人所著则不确。

⑥ 《中国丛报》第15卷，1846年。黄恩彤：《与徐松龛中丞论西洋诸夷书》，《知止堂文集》卷九。

⑩ 徐继畬致张穆信中称：“魏默深《海国图志》引证浩博，洵为钜观，惟其中舛误亦复不少，如以黄海西岸之瑞典与日耳曼南之瑞士相混，大者如此，著述之难精，盖可知矣。”转引自方闻：《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第90页。引用时“之瑞士”之前的字句已与方闻先生复印的《徐松龛先生杂书集锦》中的徐氏手书的两页信件残稿作了核对。

⑪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7册。

⑫ 王韬《瀛环志略跋》，《弢园文录外编》卷九。

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 《瀛环志略》，卷四；卷四；卷四；卷七；卷五；卷九；卷七；卷五；卷九。

㉟ 如张穆就在是年底（“腊杪”）收到该书前三卷，并表示“急思快读”后七卷，询问“何日梓竟”。见《月斋文集》卷三。

㊱ 张穆：《复徐松龛中丞书》，《月斋文集》卷三。

㊲ 史策先：《梦余偶钞》卷一，转引自《近代史资料》1980 年第 2 期。文中所言奉旨毁版事，似不可靠。

㊳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咸丰丙辰一月二十八日。转引自《越缦堂读书记》，第 480—481 页。

㊴ 曾国藩：《致左季高》，《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六。

㊵ 《京卿徐松龛先生事略》，《山西献征》。

㊶ 大谷敏夫：《〈海国图志〉与〈瀛环志略〉——中国近代的始刊启蒙地理书》，原载日本《鹿儿史学》第 27 期，中文摘译载《求索》1985 年第 5 期。

㊷ 《五台新志》卷四记载：“同治乙丑继畬应召进呈，板入内府，今都城有翻刻本，上海有缩刻本。”总理衙门的这个版本虽称重订，但内容并无更动。

㊸ 有关此事的情况均载《纽约时报》(*NemYork Times*)1868 年 3 月 29 日。

㊹ 斌椿：《乘槎笔记》。

㊺ 杨笃：《太仆寺卿前福建巡抚徐公家传》。

㊻ 盛宣怀：《奏陈南洋公学缮辑书纲要折》，光绪二十八年，转引自张静庐辑：《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 52 页。

㊼ 王韬：《〈瀛环志略〉跋》，《弢园文录外编》卷九。

㊽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 4 册，第 115 页。

㊾ 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

㊿ 张一麐：《汤济武为梁伯强尊人震三先生墓碑文稿题词》，《心太平室集》卷二。“余年十六岁”系光绪九年(1883)。

(51) 张煜南：《海南公余辑录》，题词。

(52) 张元济：《两汉幽并凉三州今地考略序》，载《松龛先生全集》。

●虞和平

徐继畬与中国近代化的思想启蒙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她的近代化的一个最根本最明显的特征，是在外来资本主义的冲击和压迫下，为了谋取生存和发展而去学习外国的资本主义。要学习外国的资本主义，当然首先要认识它。所谓认识，不仅是对外国资本主义情况的一般了解，而且是对为何要学习外国资本主义？学习什么？怎样学习？都要有正确的理解。这种认识无疑是中国近代化思想准备中的重要一环。兴起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开眼看世界”思潮，可谓中国近代化思想准备的启蒙阶段。在这一启蒙运动中，除了林则徐、魏源之外，徐继畬也占有不可忽视的一席，且以其独有的特点而成为这一思潮的一派代表。

一

徐继畬于1795年出生于中国的内地山西省五台县，但从1836年起到1851年，一直在广西、福建、广东任职。尤其是1843年以后，历任福建布政使、巡抚和署闽浙总督之职，主持福建地区的洋务事宜。这既使他有机会较多接触外国的官员、商人和学者，

从中了解世界，也使他为自己的“夷务”工作所需而去研究世界。经多年积累，他终于对世界大势，尤其是对西方资本主义诸强国，形成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并于1848年刊行了《瀛环志略》一书。综观该书，他的世界观中具有近代化启蒙意义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开始意识到中国是世界中之一国。徐继畬基本接受了西方地理学将世界分为四大洲的理论。他说：“大地之土，环北冰海而生，披离下垂……泰西人分为四土，曰亚细亚，曰欧罗巴，曰阿非利加……曰亚墨利加”。对于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他明确指出，中国在亚细亚之东南，所占之面积，“固不止得其半也”，即亚细亚中之最大一国。[①]虽然徐继畬在介绍世界各国时，以中国版图之广袤、土壤之肥沃、物产之丰富，而骄傲地称之为“伦物之宗祖”，“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②]但是，他至少已在地理学上承认中国为世界中之一国。更有进者，他对中国天朝上国无与伦比的传统思想提出了挑战，认为：“南北亚墨利加，袤延数万里，精华在米利坚一土，天时之正，土脉之腴，几与中国无异”。[③]同时，认为英国、法国和俄国均是世界中的强国。此外，他对西方诸国的特强也有所认识，说欧罗巴人“性情精密，工于制器，长于用舟，四海之内，无所不到”。[④]只有在认识到中国是世界中之一国，并且非唯一强国之后，才有可能去学习别国的强处，以弥补自己的弱处；才有可能去寻求和建立合理的国际关系。徐继畬对中国的世界地位的认识虽然是粗浅和朦胧的，但是已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

第二，开始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徐继畬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的工商业称赞不已。他称赞欧洲诸国“长于制器，金木之工，精巧不可思议；运用水火，尤为奇妙。火器创自中国，彼土仿而为之，益加精妙。铸造之工，施放之敏，殆所独擅。造舟尤极奥妙。篷索器具，无一不精。测量海道，处处志其浅深，不失尺寸。越七万里而通于中土，非偶然也”。[⑤]在讲到法国时，他说：“所织大呢羽缎皆精致，又能织花纹丝缎”，“其人心思精敏，工于制器，自来火

之枪，火轮之车船，大半皆其所创”，其造钟表之法，“时时变易，奇幻出人意表”。[6]对于英国，他更是作了详细介绍。分别描绘了英伦三岛的繁华景象。如介绍伦敦“居民一百四十余万，殿阙巍峨，规模闳钜……街衢纵横穿贯，百货山积……有大肆曰北明翰，铁工聚焉……埔头最大，每岁别国商船，来者千余，本国出入者三千余”。[7]对其他各大城市也均有类似的介绍。此外，对英国最强的纺织、造船、制炮工艺还作了专门论述。述其织布业，“织布者四十九万余人，其机以铁为之，激以火轮，关捩自能运动，是以工省而价廉”；述其所造之兵船，置炮多而精良，船体固而易驭，“不畏风浪”，“关捩灵巧”；述其所造之枪炮，“其铁炮镕铸精凝，内外滑泽……进退左右，拽之以绳，极其灵便”；“鸟枪皆自来火，另有利刃长尺余”；述其所造之轮船，进退行止自如，“船之行也，轮激水如飞，瞬息不见，一昼夜约行千余里”，“可谓精能之至矣！”[8]徐继畬对美国的介绍也着墨甚多，他对美国的 26 州分别介绍了各自的物产和工商业状况。如在介绍“麻沙朱色士国”（即马萨诸塞州）的“摩士敦”（即波士顿）时，他描绘道：“城内万室云连，市廛盘匝，百货阗溢……其商船火轮船无所不到，陆地有铁路，马车与火轮车并用。火轮车行甚速，每日可三四百里”。[9]对这些西方强国所有的新奇的工艺制造业和发达的商贸业，徐继畬虽尚不可能认识到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他至少已感到这些都是西方强国所特有而中国所未曾有的东西，时常流露出对西方强国的钦慕之意，开始意识到中国与西方强国之间的差距。看到别国的长处和自己的短处，也就意味着找到了需要向别国学习的东西。尽管徐继畬并未明确提出要向西方强国学习生产技术和经济制度的主张，但已在字里行间隐伏了这种思想。如他屡次指出，西方的枪炮发源于中国的火器，但是他们能够在中国火器的基础上制造出锐利易用的枪炮，而中国却不能。

第三，开始认识到工商发达可致国富强的道理。他认为西方诸国所以致富致强的一个重要缘由，就在于工商业的发达。他说：“欧

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因其善于操舟，亦因其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力而为之也。”[10]他在分析英国的富强之由时指出：“英吉利蕞然三岛，不过西海一卷石……即使尽为沃土，而地力之产，能有几何？其骤致富强，纵横数万里外者，由于西得亚墨利加，东得印度诸部”，进行殖民贸易之结果。[11]同时，徐继畬也认为英国本土工商业之发达亦是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他在介绍苏格兰时说：“其民习勤耐劳，善于谋生……商民遍四海，积资多在数万外。故地虽寒瘠，而多素封。”[12]西班牙也由于与东方诸国的贸易，而“由此愈益富饶”。荷兰也因“通东西上万巴之海市，故国虽小，而富甲于西土”。[13]对于美国的富强之由，也有同样的认识。他指出，自美国被西班牙开发之后，“贸易日益繁盛，以此骤致富强”，“生聚二百余年，骎骎乎富溢四海”。[14]而且通过美国各州贫富之比较而特别强调了工商业的致富作用。指出，美国东北部，由于有波士顿、纽约、非勒特尔非尔三大通商码头，故而“富商大贾之所聚，地虽偏小，气象固殊。内地各国，皆资耕作，幅员虽广，而财力不如海滨之盛”。[15]他还通过俄国与英法的比较，来阐明工商致富的道理，说俄罗斯虽以其疆土之大而称强，“然在欧罗巴诸国中，亦不过比肩英佛”，“较之英佛诸国，总觉土满。舟辑之利，火器之精，心计之密，又远逊于诸国，逐鹿海隅，往往瞠乎其后”，故终究不能称霸于一方。”[16]徐继畬在当时崇奉农本主义的时代里，敢于称道以工商致富的西方诸国，这实质是对中国重农抑商政策的一种批评。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中国也要像西方那样，兴工育商以图富强，但是他已经看到，也将使别人看到工商致富的事实，这必将启迪后人去寻求工商致富的道路。

*第四，开始注意到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徐继畬在介绍西方诸强时，几乎无一不谈到它们的民主政治制度。对于英国，他着重介绍了议会制度：“英国之制……都城设有公会所。内分两所，一

曰爵房，一曰乡绅房。爵房者，有爵位贵人及耶苏教师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乡绅酌核，上之爵房。爵房酌议，可行则上之相而闻于王，否则报罢……大抵刑赏、征伐、条例诸事，有爵者主议；增减课税、筹办帑饷，则全由乡绅主议。此制欧罗巴诸国皆从同，不独英吉利也。”[17]文中所说“公会所”即议会，“爵房”即贵族院，“乡绅房”即平民院。在谈到美国的政治制度时，他着重介绍了选举制度，说：美国各州之统领“以四年为任满，集部众议之，众皆曰贤，则再留四年，否则推其副者为正。副或不协人望，则别行推择。乡邑之长，各以所推书姓名投匭中，毕则启匭，视所推独多者立之。或官吏，或庶民，不拘资格。退位之统领，依然与齐民齿，无所异也。各国（即州）正统领之中，又推一总统领，专主会盟战伐之事，各国皆听命。其推择之法，与推择各国统领同”。[18]徐继畲不仅非常注意各国的政治制度，均不乏详细的了解和介绍，而且认为欧美的政治制度是高尚而行之有效的，也是使英美等国致于富强的重要原因。他称赞开美国选举制度先河的华盛顿：“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19]并指出建立在选举制基础上的总统制使“各部同心，号令齐一，故诸大国与之辑睦，无敢凌侮之者”。[20]他也指出有些西方国家不能致于富强，或富强而后贫弱者，由于其政制不良或无贤明领袖之故。如“墨西哥拥土自擅，全效米利坚，而治忽殊途，显晦异辙，则无华盛顿其人以为之渠也”。[21]又如西班牙之先强后衰，乃由于“富而无政”之故也。[22]由上可见，徐继畲通过对西方诸国的较为详细的了解和介绍，不仅使自己开始看到了西方诸国物质文明和政治制度，并朦胧意识到了西方诸国的富强及其缘由，而且给中国社会初步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振兴中华，提供了最初的理

论依据。

二

徐继畬的开眼看世界思想对中国近代化的思想启蒙意义，除了上述为其他开眼看世界思想家所共有的普遍性意义之外，还有他所特有的涵意。

首先，他开始意识到世界资本主义化的发展大势。他在《瀛环志略》中，比较详细地叙述了资本主义从欧洲到美洲，再到非洲和亚洲等世界各地的扩张过程。如他描述世界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英国的扩张过程说："英人于前明万历年间探得"美洲。于"乾隆二十年灭孟加拉，乘胜蚕食印度诸部"。其后"渐拓而东南，印度海之东岸，遍置埔头；阿喀剌达歪，取之缅甸；麻喇甲、息力，易之荷兰；小西洋利权，归掌握者八九矣。再东则中国之南洋诸岛国"。"澳大利一岛，孤悬巽维……英人亦极意经营，欲收效于数十年数百年之后。至如亚非利加之狮山，辟荒秽而取材；南亚墨利加之特墨，践涂泥而耕作"。[23]对欧洲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无一不有类似的描写。这表明他对当时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张，已有相当全面的了解和深刻的印象。

如果说徐继畬上述对世界资本主义扩张现象的表面认识也为其他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家所共有的话，那么他对世界资本主义扩张内在动因的理性认识，则不可多得。他认为西方诸国所以要不遗余力地向外扩张，是为了通商贸易，掠取财物，谋求富源。如他在叙述英国对外扩张过程后指出："盖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朘削其精华"。[24]他在评论荷兰的对外扩张时，更明确地指出："欧罗巴诸国，皆好航海立埔头，远者或数万里，非好勤远略也。彼以商贾为本计，得一埔头，则擅其利权而

归于我"。[25]至于西方诸强国对中国的扩张行动，他也认为："逆夷以商贩为生，以利为命，并无攻城掠地割据疆土之意，所欲得者，中国著名之马头，以便售卖其货物耳"。[26]中国不仅因市场广阔、资源丰富而使其垂涎，而且"彼以贸易为生，其国势之强弱，民生之舒蹙，其货船虽无所不到，而总以中国马头为养命之源"。诸强国必将再作求伸之计，因此难保日后之无忧。[27]

在徐继畬看来，西方诸强国在通商牟利目的驱动下，而向中国侵略扩张，也像其已向其他国家侵略扩张一样，已是势所必然的事情。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28]当然，徐继畬对西方诸强国对外扩张的动机，尚不可能认识到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本性，但是在实质上，他已无意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本性，及其所带来的世界资本主义化的发展大势。认识到西方诸强国要与中国通商的必然性，对中国的近代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在认识到这种必然性之后，才能产生改革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以适应世界发展大势的思想和行动，才能认识到中国走开放改革的近代化道路的必要性。可惜徐继畬的这一思想，既没有引起最高统治者的注意，也很少得到社会精英阶层的认同，只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次受到西方诸强国的沉重打击之后，才有一些开明官员和知识精英开始认识到这一问题，从而有洋务运动的出现。

其次，以遵约通商为主的"抚夷"主张。由于徐继畬认识到西方诸强国侵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通商，并认为中外通商已成为必然之事，因此他主张对侵华的西方诸国实行以遵约通商为主的"抚夷"政策，和以商制夷的御夷政策，与林则徐、魏源的以军事抵御为主的"制夷"思想有所不同。

徐继畬的"抚夷"政策，主要表现在处理洋人入城的事件上。1842年中英江宁条约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

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29]此后，各国官商人等陆续在该五口居住，并据约要求入城居住，而清政府及该五口官民只准外国官商人等在城外居住，于是便有入城和反入城之争，尤以广州为烈。徐继畬管辖下的福州，不久也有此类事件发生。先是在1844年英国驻福州领事李太郭要求在城内租屋居住，徐继畬拟援广州例，发动绅商出面阻其入城。但在李太郭入城那天，“绅耆士民竟无一人出城阻止，闽县差役家丁上前劝阻，几致决裂。李太郭随（遂）入城，租住乌石山积翠寺房屋”。面对既成事实，徐继畬认为，“夷目准住城邑”，“已载入条约”，[30]不宜由官出面强行驱阻，且“宁波、上海两口，城内均有夷人居住，并非福州一处独令入城”。[31]因此便承认了这一既成事实，“与入城洋人要约明白，嗣后惟领事夷官准住城内房屋，其余商夷俱遵约住城外港口”。[32]于是华洋互市，相安无事。1850年时，因所管县官办事不慎，准许英国“讲经”、“行医”者二人租住城内神光寺。此事不同于洋人入城事件，而系地方官办事失误所致，但徐继畬仍据约与英方交涉，并采取非军事性的种种措施。历时半年之余，最终逼使该二洋人搬迁他处。

在处理上述二起洋人入城事件中，徐继畬采用了遵约抚夷的温和方法，但这并不能说他对外妥协投降，其实他也在设法抵制洋人的入城和违约行为，只不过他没有采用林则徐等所主张的强行阻驱的方法，而是采用了以以商制夷为主的制抚兼行、寓制于抚的方法。徐继畬在任职福建的十余年内，始终在想方设法抵御和抑制外国的侵略行为，不过他认为：“值此夷情浮动之际，巡防堵御固宜讲求，而驾驭牢笼亦应参酌，总以制夷而足以服夷，息事而不致生事为要。”[33]从这种制抚兼行、寓制于抚的指导思想出发，加之他认为洋人侵华之目的在于通商牟利，因此主张在增强军事防御力量同时，采用以商制夷的御夷方法。他曾上疏道光帝说：夷人以通商

贸易为命脉，"一绝其贸易，即如婴儿之断乳，有不可以终日之势"。[54]认为断其贸易是抵御洋人的最好方法。他在自己的制夷活动中也经常采用这一方法。在李太郭入城居住并开市贸易后，他曾在"该夷之索要马头，无非欲广销货物，若能劝谕居民铺户不与交易，则该夷无利可牟，自必无所贪恋，弃之而去"的思想指导下，命令下属官员"密约居民铺户，公立议单，不与夷人来往货买"。[55]在英人提出要求购买台湾煤炭供作轮船燃料时，他又派员前往台湾，"传集绅民，谕以大义，怵以利害，务令全台百姓，亿万一心，互相查禁，使该夷恍然于煤炭未得采购，实由民自为禁，并非官与作难，纵令贪狠狡黠，亦将颓然自失藉口"。[56]徐继畬的以商制夷主张和行动并非断绝中外通商，而只是把暂时禁止中外贸易作为抵制外国违约侵略行为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虽然不可能彻底抵制外国的入侵，但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时期内，也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抗敌手段。后世中国人在反抗外国侵略时所采用的抵制洋货手段，乃至当今世界各国外交斗争中所运用的经济制裁，实质上也可以说是徐继畬的以商制夷手段的发展。因此，徐继畬主张以商制夷，把经济手段引入外交斗争，也可以说是中国外交斗争手段近代化的一种萌芽表现。

徐继畬的这种遵约通商、以商制夷的御夷主张和行动，自其提出直至今日受到了种种褒贬不一的评论，或谓其妥协惧战，或谓其"深谋远虑"。如果与当时在林则徐等抗英将领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抗英斗争相比，徐继畬的主张和行动或许显得妥协惧战；如果从当时日本政府以中国惨败为借鉴，接受列强开国通商要求，避免战争损失，积极学习西方，厉行改革，从而迅速走上近代化道路的过程来看，徐继畬的主张和行动不无道理。当然，中日国情不同，所采用的对外政策亦不可一概而论，孰是孰非，尚可讨论。

第三，以"上佐天子""远抚长驾"为出发点。徐继畬的这一思想大多集中于《瀛环志略》及其奏疏中。徐继畬编写《瀛环志略》的主

要动机，是为了“上佐天子，布大德于埏纮；下绥黎元，乐匡生于衽席”。[37]其奏疏则更是直接向皇帝进言的。因此，徐继畬的上述思想，除了指导自己的洋务活动之外，更主要的是为了供皇上选用而提出的。上佐天子，下绥黎元，当然是协助皇帝治理国家，巩固统治。但关键在于拿什么样的东西去佐天子。显而易见，徐继畬是用其在《瀛环志略》中所介绍和称道的西方诸强国的社会模式去辅佐皇上的。这也就意味着他希望皇上能参考他所提供的西方诸国的经济政教及其富强之由，和他所提出的通商抚夷主张，实行经济和政治制度改革，和夷通商，休养生息。如果把他的奏疏与《瀛环志略》互相印证，那么就不难看到他的这一番用意所在。如他在《政体宜崇简要疏》中，建议皇上改革繁文缛节，提高行政效率，做到令行禁止；[38]在《瀛环志略》中，他又在介绍美国政制时指出："米利坚为政最简易，榷税亦轻"，于京城设有"公会"，"参决大政"。[39]在《三渐宜防疏》中，他提醒皇上要"崇尚俭朴"，"力矫浮华"；[40]在《瀛环志略》中，他也指出，西班牙"王英果，能立政，休养生息，西国再康"。[41]在有关夷务的各奏疏中，他向皇上指出，洋人为通商牟利而来，如遵约抚之，华夷能和睦共处，相安无事；在《瀛环志略》中，他不仅陈述了西方诸强国在利欲驱使下走遍全球的事实，而且指出了洋人东渐对中国经济繁荣所带来的客观促进作用。他说，自明中叶之后，"欧罗巴诸国东来，据（南洋）各岛口岸，建立埔头，流通百货，于是诸岛之物产，充溢中华，而闽广之民，造舟涉海，趋之如鹜"，"而中土之多事，亦遂萌芽于此"。[42]以此暗谕皇上既要防夷扰乱中华，也应当与夷据约通商。

因此，徐继畬著书立说，上佐天子远抚长驾，并非完全是维护皇上保持原有的治国模式，亦非协助皇上的对外妥协投降，而主要是希望皇上参照西方的社会模式，改革经济和政治制度，建立和睦互利的国际关系，发展对外贸易。正如王韬所言："中丞莅官闽峤，膺方面之寄，蒿目时艰，无所措手。即欲有所展布，以上答主知而下

抚时局。而拘文牵义者,动以成法为不可逾,旧章为不可改,稍有更张,辄多掣肘。中丞感于时变,隐愤抑郁,而有是书(指《瀛环志略》),故言之不觉其深切著明也。”[43]当然,徐继畬的这种佐上改革的用意,不是那么鲜明和全面,而是采用了启发提示的方式,也没能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

但是,即使如此,也不能掩没其内在的佐上改革的用意。徐继畬的这种佐上改革的思想用意虽然是粗浅而软弱的,但是它对中国近代化的思想启蒙来说,却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只有在最高统治者认识到近代化的必要性,并有所行动之后,中国的近代化才能逐渐启动,逐步前进。因此,造就一个具有近代化意识和积极性的统治阶层和最高统治者,无疑是中国近代化的一个先决条件和核心内容。对此,徐继畬和林则徐、魏源等人迈出了第一步。虽然他们的一番苦心并未获得皇上的理解和采纳,甚至反而以治闽不力、禁烟无方的罪名而被贬官革职。但是他们的思想并没有随之丢弃消失,而是被后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和洋务派官员们所继承和发扬。徐继畬通过开眼看世界而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世界资本主义化的发展大势,并进而企图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提供一个改革旧制,致中国于富强之境的参照模式。但是他的这种思想认识仍然是朦胧而粗浅的,因此只是中国近代化的一种启蒙思想。然而,他的这些思想为后起的改良主义思想家们所继承和发扬,从而起到了中国近代化思想的启蒙作用。如果说徐继畬的近代化思想仅属一种启蒙思想而本身不具多大价值,但是它对近代中国的近代化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启蒙意义则是深远的。

(作者虞和平,1948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经济史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注释:

① 徐继畬:《瀛环志略》,同治丙寅(1866年)总理衙门藏版(下同)1:5。

②③④⑤ 同上,1:5,11;9:34;1:6;4:8—9。

⑥⑦⑧⑨ 同上,7:5—6;7:40—41;7:43—44,47—49;9:18—19。

⑩⑪⑫⑬⑭⑮⑯ 同上,4:12;7:45;7:42;7:18,6:44;9:14,34;9:32;4:26—27。

⑰⑱⑲⑳ 同上 7:44;9:15;9:16,35;9:16。

㉑㉒㉓ 同上 10:5;7:24;7:45—46。

㉔㉕ 同上,7:46;6:46.。

㉖㉗ 徐继畬:《松龛先生全集》1915年版(下同),文集,3:6;奏疏下:2。

㉘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254。

㉙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书店1982年版,1:31。

㉚㉛㉜㉝㉞㉟㊱ 松龛集,奏疏,上:22;下:19;上:27;下:2;上:22;上:34。

㊲ 志略,彭蕴章序。

㊳㊵ 松龛集,奏疏,卷上;卷下。

㊴㊶㊷ 志略,9:33;7:19;2:3,32。

㊸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九。

●付才武

《瀛环志略》:一部自强的启蒙书

引　论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在回顾中国人走过的近代历程,探究中国人的思想开始摆脱中古的桎梏而转向近代的门槛的最早时限时,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鸦片战争,把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以下简称志略)当成最早的引导广大中国人的思想进入近代世界体系的里程碑。其中徐继畬在1848年完成的志略一书,以其突出的对世界地理介绍的准确性和划时代的启蒙意义,近来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注目。本文认为:志略一书存在着两条线索。作为一部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著作,它首先是明确地按各个国家不同的地理位置来安排全书的结构和秩序,从全书结构看,这是一条明线。但是,在志略的各章节之间,无不贯穿着作者激励国人发奋图强的意图。这种意图既是统帅全书的中心思想,也是作者用来组织材料之衡尺,这是一条伏线。本文试图对其深层机制进行探索,以求准确把握作者写作的目的。

自强之迫切性

有图强之意，才可能有图强之举。要想发奋图强，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落后的地位是首要的条件。但是，对于一个封闭了几千年的社会来说，让习惯了"中央帝国"千古尊严的中国人勇敢地接受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的"岛夷"的事实无疑是当时最为困难的事情。与此相联系，这种惰性心理反过来又成为国人发奋图强的自觉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在首先觉醒过来的中国人看来，中国沉睡在列强之侧就像是安眠于饿虎之旁，列强在外虎视眈眈，而中国人仍在夜朗自大，沉迷而不悟："天朝疆界严明，从不许外藩人等越境搀杂"。[①]整个社会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状态，使得首先惊醒过来的中国人感到关系民族存亡的巨大危机而忧心如焚："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是诚喋血饮恨为此书……免胥沦于鬼蜮"。[②]

因此，为了使"中国童叟，习见习闻"外部世界的"虚实"，在认清形势的基础之上，"徐筹制夷之策"，解救中国将"胥沦于鬼蜮"的危机，必须首先摧毁中国人虚伪的"尊严"，真实地告知国人中国在世界上的危险处境。先进的中国人感到了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采取了"当头棒喝"的猛醒策略。他们开始睁眼看世界，把中华民族放在世界民族之林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和比较，在与先进的西方社会强烈的衬照之中让中国人反观中国所处的落后地位，从而拉开了一百余年之久的"自强"运动序幕。这一点，在《海国图志》和志略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志略中，徐继畬巧妙地告知国人，现在的"天朝大国"同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相比，已经是远远落伍了。

（一）在 1840—1842 年的鸦片战争中，西人的"坚船利炮"使中国的军队无法与之抗衡，中国在军事技术上的落后是再明显不过，

因而学习西方先进的物质层面的先进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观念普遍被人所接受。但是，在众多中国人的观念中，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伦理规范的先进性是不容怀疑的。针对这种情形，在志略中，徐继畬明确地告诉国人在社会制度、伦理道德方面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了。

第一，志略首先对近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作了富有肯定评价的介绍和评论。对美、英、法、俄等国议会制度，大加宣扬。在俄国，有120名贵族组成的“公会”。在法国，议会由“公所”、“公局”两议院组成。在英国，议会由“爵房”与“乡绅房”组成。在美国，“总统领所居京城，众国设有公会，各选贤士二人，居于公会，参决大政”。[③]最后，徐继畬强调，议会制度在欧罗巴各国均已普及。“此制欧罗巴诸国皆从同，不独英吉利也。”[④]这种制度，“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⑤]这种变革性的政治制度以其先进性，是中国“公器付之一人”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社会无法比拟的。它在欧罗巴各国的普及，更是显示着中国政治制度的落后。

第二，徐继畬在志略中告诉国人，只存在于中国人的理想之中的“桃花源”式的社会，现在在西方欧罗巴的瑞士国出现了。在那里“推立乡官理事，不立王侯”，“国无苛政，风俗俭朴淳良，数百年不见兵革”，是“西土之桃花源”。[⑥]在欧罗巴诸国“关有税而田无赋”——这当然不完全准确——但中国的读者可想而知，在中国古代的历代帝王将相无不把轻徭薄赋当成最大政绩的几千年中，中国社会也从来未出现过如此盛况。但是，中国古人梦寐追求了几千年的政治理想现在在西方出现了。作者显然在暗示：西方的“蛮夷”要比“泱泱大国”先进多了。

第三，中西方领袖相比较，米利坚人华盛顿“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⑦]其中“不僭位号，不传子孙”，显然是相对于中国的历代开国皇帝的“传之一世乃至千万世”的体制而言。“几于天下

为公”乃是相对于中国帝王的“以天下为家产业”而言。公推禅让之法，观中国的历朝历代，只有在中国的上古“三代”——二千余年来儒生的心目中理想社会的楷模——中才出现过。徐氏很明显在暗示，三代以后的帝王将相的品德操行已经落后于西方的领袖。在文字狱盛行的清代，徐氏敢于发此论调，实在有被言官弹劾丢官、丢掉身家性命之虞。反面来说，正是这一点说明了，在徐氏心中对中国危局的担忧更胜于对自己的身家性命的担忧，启发国人比自身生命更为重要。

在介绍西方社会之时，徐继畬从古代的思想武库中搬出了“三代之治”、“禅让”、“桃花源”等中国儒生的心目中最美好的理想社会的楷模来说明西方的社会制度，虽然把中国的传统观念类比新兴的近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显然是不合适的，但这种类比本身即是对西方的肯定和称颂。反过来不难理解，对先进的西方社会的赞扬即暗示中国传统社会的落后。

（二）从志略中看，徐氏已经明确地认识到国力与国势的正比关系。“自古长驾远驭，必气力足以包举而后长为我有。声威一挫，不免生心”。[⑧]因此，评估一个国家的国力，从它对周边国家影响的程度即可得出。从这一原理出发，徐氏从中国的势力从南洋群岛与东南亚半岛的退出这一事实中看到中国国际地位的下降和中国的积弱。他告诉国人，千余年来一直对中国纳贡称臣的藩部，“今则胥变为欧罗巴诸国埔头”，[⑨]情况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从这“古今一大变局”[⑩]之中，徐氏看到中国再也不是这众小国的宗主，取而代之的，是远在万里之外的西班牙、荷兰等弹丸小国。

从志略的效果看，徐继畬的这种忧患意识和迫切图强的心情，体现在志略的字里行间就显得十分的惊心动魄。所以志略一出版，立即在社会上激起了巨大反响，徐继畬自称是“甫经付梓，即腾谤议”。[⑪]不少人认为此书是“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⑫]认为徐继畬“轻信夷书，动辄铺张扬厉”。[⑬]书中对西方世界的叙述和评

论引起了士大夫的普遍不满，掀起了一片弹劾讨伐志略的嘈杂之声。连曾国藩都认为“徐松龛中丞著书，颇张大英夷”。[14]而徐书的价值恰恰在于此。在一片反对声中，志略以其独特的风姿一枝独立地矗立在士大夫的心中，吸引着士大夫的注意力。不管是赞同它的还是反对它的人，都必须承认这一点，志略把他们的注意力强迫地拉向了外部的世界。梁启超就曾明确地表示：“中国士大夫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从我们今天的高度来看，姑且撇开志略的引导方法是否合乎当时士大夫的胃口不论，它想把众多士大夫的目光从中国转向外部、转向西方如火如荼的世界的客观效果却已达到。它向士大夫介绍了一种独特思想方法，把中国放到真正意义上的“天下”的背景下去认识，对保守的中国社会而言，这实际上就具有了启蒙的意义。

自强礼赞

纵观志略全篇的构思，作者除了用上文所提到的那条明线来组织束勒全篇之外，那条体现着作者自强意图的伏线在志略一书中就表现为作者极力搜寻全世界各洲各国的奋发图强最终摆脱危困的具体事例来激励国人的斗志和信心。刘韵珂在《瀛环志略》序中一针见血的指出，古今中外，“前后同轨，古今一辙”。古为今用，外为中用。外国发生的一些事例，完全可以成为我们的楷模。抱着这种功利的目的，在志略中，徐继畬不遗余力地大量介绍外国的奋发图强的人物和国家。在众多的世界级优秀人物中，米利坚的华盛顿、峨罗斯的彼得大帝、佛朗西的拿破仑最受徐继畬的青睐。与其他的历史人物相比，这三位领袖的事迹远远较其他人详尽。作者介绍他们时带着自己一定的功利目的，因此，这些历史人物具有一个共同的轮廓。第一，在国家危弱的关键时期，他们最终都能领导自

己的国家由弱一跃变为世界的强国。第二，他们都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目光。第三，他们都具有常人所不具有的不屈不挠的斗志。这后一点是徐继畬最为推重的。志略卷十描绘华盛顿云"顿军败……顿意气自如"。"血战八年，屡蹶屡奋，顿志气不衰"。峨罗斯的彼得大帝，曾"变姓名走荷兰，投舟师为弟子，尽得其术乃归"。[15]并把他同近世峨罗斯的强大直接联系起来。"战胜攻取，疆土愈辟。峨罗斯近世之强大，实自彼得罗始也"。[16]

在介绍西方的不同的国家时，徐继畬的态度是不同的。从全球范围内看，发达的欧洲和北美洲是徐继畬笔下的重点介绍对象，而落后的非洲与南美洲则基于地理学的要求而一笔带过。作者向读者介绍了欧罗巴的十六个主要国家，但其中总以峨罗斯、英吉利、佛朗西最为详尽。在介绍亚墨利加洲的一章中，介绍米利坚国的内容占去全章的近60%的篇幅。尽管作者花了许多的精力来介绍他那个时代的世界上的四个头号强国，其目的仍然不外乎是要向当时的中国介绍一些可以向其借鉴学习的榜样。在介绍这些国家之时，单纯地理上的介绍如地形、地貌、物产、气候等与介绍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军事组织、领袖人物、历史沿革的内容相比较，前者的内容要比后者简略。作者一方面较为真实地冷静地向国人介绍这四国的基本国情，另一方面作者也在力图向读者表明：这四个大国在我们现在看来是那样的强大，不可一世。但他们莫不经由一个由弱变强的发展过程。他们在称雄世界之前，莫不经历了像中国人现在面临的一样的危急存亡之秋。作者在志略中提到，俄国人曾受到波兰与瑞国（瑞典）的威胁，英吉利遭到丹麦人的入侵，法国长期与英国对抗。总之，他们莫不是从内忧外患之上发展强大起来的。作者明显在暗示：现在的中国就像是没有称霸之前的峨罗斯、佛朗西、英吉利一样，内交外困，但中国也一定会同峨、佛、英的现在一样，逐步发展起来，走出危局，称雄世界。

"安乐者祸之萌，忧患者福之基"。[17]徐继畬在考察了欧美一些

国家的强弱互变之后得出了这一结论。徐继畬看到西方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大国已经灭亡了或是衰落了，而另一些国家正在兴起和发展。他告诉国人，当今的世界，弱与强不是绝对的，而是在相互转化。原来的大国如奥地利、西班牙、波兰、瑞国（瑞典）由强变弱，峨罗斯在彼得大帝的锐意进取下由弱变强，米利坚在华盛顿的领导下日益壮大。他引用了老子的一句名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既是在解释这种变化的原因，同时也是在激励国人的信心。

作者在安排志略的详略、重点与非重点的介绍内容时，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标准，大体说来，与中国利益关系紧密的内容详写，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详写，能借以鼓舞国人士气的事例详写，其余一概从略。关于这一点，作者在志略的《凡例》中已经明确地提示到了。抱有这种功利目的，那些敢于奋起抗击强敌的弱小国家在徐继畬的笔下得到特别称赞。志略中写道：

> 苏禄以拳石小岛，奋力抗拒，数百年来，安然自保，殆番族之能自强者哉！[18]

千方百计谋求中国的出路的徐继畬，从苏禄人的胜利中看到了自强这一救世良方。徐氏惊喜地发现自强二字和依附在自强之上的战斗精神正是那些麻木不仁的国人最为需要的。

徐继畬对佛朗西国的"用兵如神"、"诸国畏之如虎"的拿破仑是十分推崇的，他花费大量的笔墨专门介绍百战百胜的佛朗西的军队的士气不能不使人联想到作者在暗示这正是中国军队所缺少的东西。倘使中国军人像法国军人一样，"以崇国威，全国体为幸"，中国的军队就不会在鸦片战争中那样一败涂地，中国的"自强"就有了成功的基础，这正是作者竭力向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军人所要指明的。

自强之路

在志略一书中，徐继畬的思想最具光彩夺目的部分就是作者极力试图从总体的路线方针上向国人指明一条自强之路。作者在许多地方反复提到一个国家道路的选择的正确与否，关系到一国的生死存亡。书中指出，印度由于“不察萌芽”[19]最后被英人吞并。南洋的噶罗巴就是因为“贪饵酿祸”。[20]马神“卒为西人所制，番族固无远谋也”。[21]对中国的势力从南洋退缩，作者也认为这与中国朝廷的对外方针不当有极大关系，为之扼腕叹息：“惜乎，筹远者之未早计也！”[22]

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徐继畬在志略中为中国设计的自强方略——即中国要想摆脱外国的欺辱应该走如何的自强道路——并不表现为直接明了的阐述，绝大部分是隐掩于笔锋的褒贬之中和中外优劣比较的暗示之中。用一种“微言大义”的方式引导读者自己去思考。事实上，作者当时的同辈人就已经明确地感受到了寄附在志略当中的经世作用，“于国家抚驭之策，控制之方，实有裨益”。[23]徐的同僚刘韵珂《序》云：

> （志略）要其盛衰迭代之效，沿革迁流之故，割据并吞之势，祸福倚伏之形，前后同轨，古今一辙……有心斯世者，宜可深长思矣。

徐氏的自强之路包含着以下内容：

（一）政治上，徐氏已经认识到了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某些先进成份，并把它同中国古代就存在的“用人唯贤，执法唯公”等良好的传统结合起来，树起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目标。这也就指明了改革中国腐败的政治应该走的道路。

（二）在志略中，作者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所设计的自强方案，归纳起来，主要有两条：

第一，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大力发展交通运输。徐氏看到，泰西的高速发展，是建立在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之上。如米利坚合众国"境内小河甚多，米人处处疏凿，以通运道，又造火轮车，以石铺路……一日可三百余里。火轮船尤多，往来江海如梭织"。[24]"佛人多开支河为运道，处处可通舟楫"。[25]而在中国，承担着京畿地区的一大半的粮饷供应的漕运，从江南运一石米到京师，要花费好几两白银。并且，鸦片战争中，英夷只以"兵船数只，阑入长江，直逼江宁，截我运道"，即可"扼我之吭"，[26]置我于死地。因此，不管是为了经济目的还是为了军事目的，发展中国的交通特别是火车已势在必行。站在我们今天的高度看来，徐氏在1848年所提出的发展交通建议简直就像是预言一样，在这十几年以后出现的洋务运动，特别是在洋务运动的晚期，修建铁路成为办洋务的最主要的内容。

第二，减轻赋税，经营沿海边疆，创造财富。徐继畬在福建任布政使时就直接主持福建的征税工作，对中国民众的赋税之重有切身之痛。在写给山西堂兄的一封家信中说，他因为上缴税额难以完成打算明年辞职不干。因此，他对欧罗巴诸国"关有税而田无赋"十分倾慕。"米利坚政最简易，榷税亦轻"。[27]同时也看到了英吉利利用高额税收剥削米利坚，引起美国人民愤而起义的可怕后果。他向朝廷上书，建议减轻老百姓的赋税负担，免除一切杂税。而国家可以仿效西方的"以商立国"[28]和海外殖民的致富之路，积极参与对外贸易和经略沿海边疆，以此创造国库的收入。他甚至把中国古代的海外拓荒的传奇人物虬髯客当成开疆拓土的英雄来赞扬："倘有虬髯其人者，创定而垦拓之，亦海外之一奇欤！"[29]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徐氏这是在暗示中国应该对外开放，向外发展。在此思想基础之上，徐氏较为直接的提出了经营台湾、琼崖的计划：

> 然古巴、海地两大岛，比中国之台、琼。其余各岛，亦多腴壤。欧罗巴人极意搜求，得片土即经营垦拓，遂使万古穷荒之僻岛，无不献之精华，其能事曷可少哉！[30]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

第一，穷荒僻岛，只要经营垦拓，也可能献出精华。

第二，仿效欧罗巴人经营古巴、海地，中国可以经营垦拓台、琼。并且，这种能事必不可少。

第三，古巴、海地已为欧罗巴人所占，但欧罗巴人仍在“极意搜求”，“片土”不会放过。因此，中国人对台湾、琼崖当分外警惕。对生活在后面几十年的中国人来说，这种警告简直就像是预言，只是以后占领台湾的不是欧罗巴人，而是在徐生活的时代还毫不起眼的小小日本国。

（三）徐继畬对中国军事自强所作的贡献高出同辈之处就在于他不仅仅认识到了中国人在军事技术上的落后，而建议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而且他已经开始触及到军事制度层面，意识到中国军事制度也已经落后于西方，并且利用上古圣王的外衣暗示中国应走西方的道路。当然，完全认识到这种制度上的落后可能给中国带来的严重后果还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那些亲身经历过甲午战火洗礼的军官们才完全地清楚了军事组织、制度对于战争胜负的重要性，但是，在 1848 年，徐氏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只是他还分不清西方近代色彩的义务兵役制与中国古代的“寓兵于农”的制度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四）积极参与的外交政策是徐继畬为中国的“自强”而设计的又一条道路。观徐氏一生的官宦经历，其最辉煌的年代是他作为清政府的夷务大臣与外国人打交道的那一段时期。在接触外国人的过程中，徐形成了近代中国早期的开放观念。他在志略中深刻地指出，在这“古今一大变局”的年代里，世界各国已经形成一种“求隔绝而不能”的国际关系。[31]就连非洲突尼斯这样的小国，也是“欧罗巴各国皆与通商”。[32]因此，积极参与世界舞台竞争，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从徐继畬向朝廷上的奏折中看，徐这种外交策略的提出，是根源于他对近代外交本质的清醒认识。徐氏已

经认识到近代外交再也不是像古代那样的攻城掠地为目的，近代外交本质上不过是通商和贸易。两国之间的战争再不是以掠夺为事而只是一种外交手段的延伸：

> 英夷举动，与倭寇本不相同……不特偏僻之海口城邑无混行杀掠之事，即滨海著名城邑，不足以牵制全局者，亦未必无端攻扰。[33]

从这段话来看，徐看到了英国对中国的宣战是作为一种强迫中国与之通商的手段而不是像明代的倭寇那样攻杀抢掠是其手段也为其目的。从他的关于英夷与倭寇明显区别中，从他的这种关于手段和目的明确分野中，我们认为徐氏已经接触到了近代外交的一般原则。

结　论

站在改革开放的高台来看，如果把中国的整个近代历史当成是向西方学习、自强御侮的一段特殊时期的话，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和魏源的《海国图志》（60卷本）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两位哲人为摆脱危局所设计的两套最早的自强方案。由于种种原因，这两套方案几乎同时问世，但它们各自设计的自强之路是不相同的。比较志略来说，《海国图志》的急功近利的色彩更为浓郁。为了立即打败西方的侵略者，魏源在此书中特别注重和提倡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这套自强方案的最大缺陷也在于此。很显然这种仅仅局限于学习西方先进的物质文化表层的方案是行不通的，洋务派的“办洋务”便基本上是走的这一路数。而《瀛环志略》比较于《海国图志》的强烈的民族情感则显得更为沉着和冷静，它不但看到了中西方技术上的差距而且看到整个中国社会包括政治制度、伦理道德都远远落后于西方世界。

在这种清醒认识的基础之上，志略提出中国的“自强之路”在于系统地向西方学习。强调学习西方先进的物质技术的同时，也必须借鉴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结合中国古代的政治理想，改良中国腐败落后的政治制度。但是，由于作者身为“控驭华夷大臣”，不便提出具体的意见，因而这套方案就显得十分的隐晦。这就在极大程度上降低了它的影响力。但是尽管如此，志略和《海国图志》在向西方学习的层次上仍然是两重不同的境界，在志略中体现出来的自强之路比较《海国图志》的御侮方法更具有一些全面、冷静和准确的特性，因而就显得更为深邃，价值更巨，许多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都从此中吸收外部世界的信息而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维新派的首领康梁自称是一见此书，“决然舍去旧学”。“中国士大夫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志略在1848年对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积极介绍和评价，可以说，就已经为19世纪末以改革清代腐朽政体为目的的维新派的出现埋下了伏笔。同样，从《海国图志》和志略在向西方学习的程度上的差异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史上，基本上是按《海国图志》所设计的自强方案运行的洋务运动失败后，中国的自强之路又走上了维新改良的轨道决不是偶然的，这在1848年的志略中就已萌芽。

（作者付才武，1966年生，在湖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

注释：

① 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三。

② 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八。

③⑤⑦㉔㉗㉘ 志略卷九。

④⑲㉕ 志略卷七。

⑥ 志略卷五。

⑧㉚㉜ 志略卷十。

⑨⑩ 志略卷一。

⑪ 《松龛先生全集》卷三。

⑫⑬⑭ 均转引《瀛环志略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

⑮⑯⑰ 志略卷四。

⑱⑳㉑㉙ 志略卷二。

㉒ 《瀛环考略》卷上《南洋图说》。

㉓ 鹿泽长志略序。

㉖㉝ 《松龛先生全集·揣度夷情密陈管见疏》。

㉛ 志略卷三。

●薛振齐　高　闻

《瀛环志略》中的文化地理成分

清代著明学者、地理学家徐继畬所撰写的《瀛环志略》，从地理学的角度，大胆地、客观地、公正地向国人展示了一个曾经被歪曲、藐视甚至遗忘了的世界；这部分世界正在以迅猛的速度发生着巨变，把古老的中华大帝国远远地抛在后面。书中所反映的文化地理成分，在文化景观、文化生态、文化资源、文化移动和文化分布等层面，都生动地、曲折地、有时也直露地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渴望祖国直面世界的良知。

在文化景观方面，作者表述的内容比重最大。从文化发祥地之一的亚州，到新兴的垦区南美洲；从浩瀚的太平洋，到风急浪高的麦哲伦海峡，他都进行了认真的涉猎。其中包括人种形貌、服饰礼仪、语言文字、起居饮食、宗教信仰、生产活动、建筑特色、婚丧制度、环境意识等。无论对具体国家特色的详细的记载，还是对各大洲宏观上的深刻分折，都反映了徐继畬作为一个地理学家的真知灼见。

文化景观是建筑在自然景观之上的人类活动形态，是人类有意识地利用自然所创造的景观。它是地球表面文化现象的复合体，反映着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获得了许多具有新特征的景观，它们往往经长期演变，由历史上积集的各具特色的各种文化叠置而成：

湄南河(注：在泰国境内[以下引文中括号内的文字皆为引者注])势缓而散，田畴藉以肥沃。农时掉舟耕种，插秧毕而河水至，苗随水长，不烦薅溉，水退而稻熟矣，米极贱。(P83[此为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日本文久辛酉版《瀛环志略》页码，下同])

大洋海(太平洋)风浪最恬，泰西人称为大平海。各岛天气晴和，水土平淑，产椰子，芋薯，果实足供采食。(P180)

其(指欧洲)地形则平土之中容畜沧海数千里，回环吞吐，亦与他壤迥别。其土膏腴，物产丰阜。其人性情缜密，善于运思，长于制器……运用水火，尤为奇妙。(P304)

同是农业文化景观，三地情况大不相同。前二者记载了最低级的传统农业。在这个阶段，人类主要依靠世代积累的传统经验和简单的手工工具去适应和改造条件。比之原始农业阶段人类完全依赖自然条件，是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这种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农业经济，技术水平低，生产规模小，改造自然的能力很弱，靠天吃饭的成分依然很大，因而也就必然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不会有很大的发展。

而在欧洲，情况就大大不同了。由于欧洲地形平坦而破碎，深受海洋影响，气候温润，形成了发展农业的良好的自然条件。尤其应引起注意的是，徐继畬对欧洲人的评价是“善于运思，长于制器”。英国人早在17世纪上半期，就在农业上使用人造肥料和播种机，并改善轮作制度。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进行，农业也进行了技术革命。在英国的资本主义农场上，出现了割草机、收割机、打谷机等，英国的传统农业开始了向现代农业发展的农业革命。

在中国，当时尽管已有了几千年的文明史，但农业文化景观仍和前两地处于同一水平。

在谈到新加坡时，作者写道：

其地当南洋小西洋之冲，为诸海国之中市。英人免税以聚

商船。西洋夹板每岁来者以数百计。闽粤贩洋之船，南洋诸国之船亦时至。帆樯林立，东西之货毕萃，为南洋西畔第一埔头。(P143)

作者把这个利用自己占有马六甲海峡咽喉要道的极有利的交通位置，发展转口贸易，以壮大自己的经济力量的岛国，摆在清政府面前。对比有着漫长海岸线却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清政府，不知当时读该书至此者作何感想。

关于英国伦敦的城市文化景观，作者记叙得非常令人羡慕：

伦敦东西南北皆七十里，无城郭，居民一百四十余万。殿阙巍峨，规模宏巨，离宫别苑，绵亘相属。文武百官之署，各有方位；街衢纵横穿贯，百货山积。景象之繁华，人户之凑密，为西国第一大都会。(P594)

我国是世界最早出现城市的国家之一。据有关考古资料记载，早在距今四千年的龙山文化时期就有了城。到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劳动人民就因地制宜，"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观其草木之饶"，建造了和江南水乡自然风貌浑然一体的阖闾城(今苏州城)。而历经辽、金、元、明、清几代的首都北京，为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内跨中原、外控大漠的名城重镇。从世界范围来看，从11世纪到15世纪，世界最大的城市始终在我国。然而，到1840年前后，我国一大批古都名城出现停滞和衰败的景象。城市的兴衰，无疑是国家兴衰的缩影。当时，中国的城市景观和中国的社会地位一样，也逃脱不了每况愈下的命运。

更可贵的是：远在一个多世纪前的徐书中，就多次出现了保护环境的内容：

(日本)俗尚洁，街衢时时扫涤。(P56)

(荷兰)性喜洁，房屋时时扫涤。街衢有污秽，必洗刷净尽。(P499)

虽然这是基本的、初步的环境保护，但却反映了人类活动对环境的

污染和破坏早在人类社会生产开始之际就已存在，只不过那时人类的负影响规模很小，还不至于破坏环境的自身平衡能力和正常功能的发挥。

书中还谈到西方的婚姻等方面的制度：

英吉利之俗，男女婚配，皆自择定，然后告父母。至婚配之日，西教师诫以善言，为之祈福。男以戒指约于女指，亲宾送之入房，欢宴而散。其俗男女皆分父母之产，男不得娶妾，犯者流之七年。(P614)

婚姻制度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之一。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习俗与中国封建社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可三妻四妾，女则从一而终的婚姻制度以及只有男子才有继承权等封建观念形成鲜明的对照。作者对资本主义的婚姻文化虽然没有一句溢美之辞，但字里行间，却流露着他的向往和选择。这对深受儒家学说影响，禁锢在封建环境中的徐继畲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在文化生态方面，作者也有一些探索。

文化生态，是应用生态学的观点研究人类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既研究地理环境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也研究文化对地理环境的反作用。人类总是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之中，总是依赖着自然又改造着自然，不断与自然界进行着物质与能量的交换活动而生存发展的。人类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大都分布在中纬度的大河沿岸——那些位置优越、地形平坦、气候温暖、水源充沛、土地肥沃、便于开发的地区。这反映了文化发源地对于特定的地理环境的依附关系。本书中，有不少这样的记载：

尼罗河从南方发源，沿红海之西岸，北流入地中海。两岸涂泥淤为良田。河每岁一涨，且粪且溉。涨甚则灾，中则稔。故近河之地，阡陌云连，户口繁密。而去河稍远，则平沙浩浩，旷无人烟，地少阴雨，沙漠熏灼，炎气逼人。(P623)

即使在自然环境严酷的热带沙漠气候地区，只要有河水灌溉，就能

发展绿洲农业。而且尼罗河水一年一度的泛滥，给两岸带来了肥田沃土，因而经世世代代劳动人民的努力，使撒哈拉沙漠里，出现了一条沿尼罗河延伸的绿色长廊，人类文化叠加在良好的自然环境上，一个重要的世界古代文明发祥地形成了。

当然，人类发展也从正逆两个方向干预，影响地理环境的演进过程。就正向干预而言，如文中记载：

英人流寓者（指迁移到澳大利亚的英国移民），垦海滨湿土种麦与粟，草肥茂，牧羊孳乳甚速。毛毳细软，可织呢绒。(P176)

其地（指阿根廷）荒草无垠，杂以荆棘丛林。西班牙人初至其地，以牝牡牛数十纵之于野，岁久孳息，不知几千万亿。四境之内皆野牛。居民七十万，耕作者少，但以捕牛为业。食其肉，寝其皮，制其骨为器皿。地亦有马，骑马驰草莽中以逐牛。(P761)

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和先进的生产力能够使人们生活着的自然环境向有利于人类文化的方向发展。如开凿运河，修筑水库，建设矿山，植树造林，改良和引进生物品种，发展农牧业生产等，可以很快地使一个贫穷落后的地区变成经济繁荣的先进地区。举例中，前者谈到澳大利亚耕作业与畜牧业的发展缘由和过程，后者介绍了阿根廷养牛业、捕牛业传统的形成。二者都深刻地改变了两国的文化生态，为其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强的雄厚的基础。

逆向干扰的事例，像农业文化加速土壤侵蚀、盐碱化、沙漠化及植被毁坏；工业文化带来资源紧缺、人口过密，环境污染，以及工农业的发展引起生态平衡破坏等后果，徐书中基本没有记载。就客观情况而言，这些问题在当时的国家，尤其是工业发达国家虽然不能说没有，但程度毕竟远不像现在这样严重。何况徐继畬著书的目的，是为了使国人了解一个已经强大起来的外部世界，至于存在的问题，就既非该书的主要任务，也非徐继畬当时的识见所能堪了。

文化资源是《瀛环志略》中多次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因为人类社会生活和文化活动中，文化资源具有可长期利用的潜力，它存在着产生经济效益与综合社会效益的因素和条件。比如为旅游业所利用的名山大川，流泉飞瀑，奇花异木，以至供人观赏和研究的文物古迹，风土人情等。文中有多处这类记载，尤其对欧洲，更为突出：

(瑞士)万山叠峙，中峰高接霄汉，常积冰雪，欧罗巴大河，多由此发源。其地山水清奇，甲于欧土。西境有官斯丹萨大湖，围以密林，萦以清涧，丰草芳缛，麋鹿群游，尤为幽胜。(P411)

日尔曼界内，江河最长者为莱茵河……沿河多名山古迹，风景清美，时有远客来游。(P407)

初厄日多(指埃及)为西土建国之祖，文物之盛，诸国无与比……都城外有古王冢数处，皆基阔顶锐。棺内贮香油，尸数千年不腐。有一冢基阔五里，高五十丈。顶似峰尖，中有洞，深三丈四尺，阔二丈七尺，内藏石棺一。不知何代何王所造。西土以为异观。(P628)

仅选其三例。第一例为瑞士美丽的自然风光，纯属自然景观；第二例介绍的是秀水名山和建筑其上的历史古迹，是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综合体；第三例，是被列为世界古代七大奇观之一的金字塔，全属人文景观。

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生产发展、经济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一个标尺。在徐书对外国文化资源的赞美之中，透露出的是对自己祖国有更多的文化资源却未被开发利用的一种叹惋。

文化移动是文化地理中的又一重要研究内容。《瀛环志略》中，既记载了文化在时间上的移动，如一些地区原始文明向现代文明的演变，宗教在亚、欧、美、北非等地区的持久发展，风俗习惯的世代相传等；也记载了文化在空间上的移动，如通过商队、军队、船队

等媒介把文化从源地向四外扩散，因而对扩散地文化起着巨大影响的事实。尤其是后者，意义更为重大。

书中对印度佛教传入我国是这样记载的：

> 印度为佛教所从出。晋法显、北魏惠生、唐元奘，皆遍历其地，访求戒律大乘要典，记载特详。……诸佛菩萨罗汉绘塑之像，多裸上体，或耳带环，胫束钏，乃印度本俗，至今未改。所衣袈裟，即印度人外著之沙郎。僧人为礼，合掌膜拜亦皆印度土俗也。佛法自后汉入中国，至南北朝，而达摩航海东来，演教外别传，缁流遂布满中国。（P227）

此段文字，把带着光环的诸佛菩萨罗汉的装束和僧人的礼节，与印度人的打扮和土俗联系在一起进行比较，用他追本溯源的求实观点来证明佛教为印度所从出。又用不同时期中国人的取经和达摩的航海东来，把佛教传入中国以至成为中国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一种工具的过程，作了一番认真的探究。

在人口迁移方面，徐书中有好多记载。如非洲：

> 统计阿非利加一土，迤北多回部，皆从亚细亚转徙而来，迤南皆土番。（P622）

这样，西亚和北非大都为阿拉伯人就有了根椐。

书中也认真记载了英国的殖民扩张：

> 先是，前明中叶，英人泛海觅新地，得北亚墨利加腴土，徙国人实其地，日渐垦辟，遂成沃壤。（P592）

16 世纪英国的海外贸易和扩张是同海盗劫掠、国际走私、奴隶贩卖联系在一起的。它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曾积极地向海外扩张，寻找原料，开辟市场，掠夺资金，建立殖民地。1584 年，英国在北美建立了第一块殖民地，夺取了西印度群岛中的巴贝道斯岛，在美洲取得了扩张殖民势力的立足点。而事实上，葡萄牙、西班牙对北美等地的殖民扩张，比英国还早将近一个世纪。

为了达到殖民扩张的目的，除了迁移白人外，殖民者还利用罪

恶的奴隶贸易，从非洲运来大批黑人奴隶，作为新垦区劳动力的重要的补充，并从中获取巨额利润：

各国之船往来贩鬻，每船辄二三百人，如货豕畜。诸国所用黑奴，皆此土人……贩往亚墨利加者尤多，用以灌园、耕田、种加非、造白糖，如牛马然。(P653)

移民来到北美后，使北美的殖民地经济逐步得到发展。徐继畬既对迁移人口开发北美给予充分的肯定，也给被贩卖的黑人所遭的非人虐待以一定的同情。这一切，都反映了他思想中进步的民主成分。

至于像下段文字所记载的，则为直接的文化传播了：

国(指日耳曼)有大邑曰来责，每岁设市二次，诸国商贾云集。其地所出者书籍，镌印最精，各国之文字，百家众术之著作无不毕备。每年所售，无虑数万亿册。(P397)

通过最方便的文化载体——书籍，把知识迅速地传播，是现代社会文化扩散的重要手段。

印刷术本是中国首创，但到这时却明显地落后了，其他许多本由中国人搞出的发明创造的遭遇亦大都如此，每个关心自己祖国命运的中国人还能够稳稳地坐得住吗？

在文化地域分布方面，徐书首先为闭塞的中国大众提供了一幅幅令人惊叹的地图——尽管这些地图并不准确——但却使中国人着实开了眼界。梁启超就认为："中国士大夫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然而徐继畬并不满足于此，而是以此为基础提出问题，寻找规律和解释原因。因为文化分布是文化移动的结果。世界语系的分布就显示了人类许多迁移的史实。如近代欧洲人向海外移民，把印欧语带到美洲、大洋洲和南非等地，使英语成为现代世界应用最广的语种：

米利坚合众国白人皆流寓，欧罗巴各国之人皆有之，而英吉利、荷兰、佛郎西为多。三国之中，英吉利又居大半，故语言

与英同。(P733)

在宗教分布中,也可看到民族迁移或文化交往的痕迹:

其(指非洲)北境古多名国,今皆回部。东境沿印度海,迤北回族与黑夷杂居,迤南皆黑夷。(P621)

奉行伊斯兰教的"回部",其实即亚洲移民;"杂居"区,亦即民族融合区。

此外,千姿百态的民居形式,像琉球群岛上为避风雨而"檐与肩齐"的"卑屋";湄南河西岸土人的"芦寮"和华人的"楼阁";"外无墙垣院落"的西方人"绕以回廊"的"层楼叠架",无不打上区域文化的烙印。

综上所述,徐继畬书中的大量文化地理记载,是他全面听取情况介绍,冷静分析国际环境和认真思考对应措施的复合体。他不仅是在研究文化的传播、扩散途径以及影响和作用等问题,而且他试图通过展示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巨大的变化以引起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清政府和国人的警觉。

有清一代,正是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欧美,其所创造的生产力几乎等于过去各个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之和的资本主义日益走向繁荣、强盛的时期;也是中国的满清统治者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把中国一步步拖入了贫穷落后的绝境,并企图造就全体国民永久愚昧、短视与驯顺的时期。《瀛环志略》这部作为救国方案的科学舆地之作,它事事皆有对比,件件均出于心,始终没有脱离现实的社会问题。地理观就是一种价值观,它深深地烙有作者所处时代的文化特征。在文字狱盛行的清代,不可能也不容许徐继畬以福建巡抚的身份,直抒匡扶时世、救国图强的理性见解,"师夷长技以制夷"。他只能从地理学的角度,用"微言大义"的表现方法,寓独到明智的经世主张于对各国国情的褒贬抑扬之中。诚如王韬所言:"中丞内感于时变,外切于边防,隐愤抑郁,而有是书,故言之不觉其深切著明也"。这是徐书的缺憾所在,而也正是徐继畬的高明之处。

《瀛环志略》这部地理学著作中的文化地理成分，包括他对西方各国文化地理方面的评议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意向，也可能并非完全是自觉的或者有些可以说是矛盾的，但却是一种清醒的，真实的，因而是独具慧眼的观照。《瀛环志略》中的文化地理成分，为当时愿意睁眼看世界不愿掩耳盗铃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可供对比和借鉴的参照系，因此，这最终成了徐继畬被罢黜的重要原因之一。原因很简单，因为这种文化地理的研究，不符合满清政府的愚民政策。

积贫积弱的大清帝国终于因不敢面对真实的世界，而成为人们研究封建专制和闭关锁国的最贴近也是最主要的历史资料了，这是它的不幸，而徐继畬在他的《瀛环志略》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意向，却值得我们今天的人们深长思之。

（作者薛振齐，1947 年生，山西省忻州师专讲师；

高闻，1947 年生，山西省忻州地区广播电台总编辑。）

●刘天纯

徐继畬与近代化

——兼与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比较

引　言

从 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到 18 世纪完成工业革命，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世界性"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时期。[1]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过程，一般是指社会发展由自给自足的手工业自然经济，到近代大工业的，社会化生产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由"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的过程，"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正是由于"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才促使社会生产力有了迅速的提高。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工业革命"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2]从此，永远结束了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揭开了人类历史的一个崭新的时代。人类社会发展史证

明，早在18至19世纪，欧美不少国家已完成了由中世纪自然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近代化的历史转变过程。东方日本的近代化，虽然迟些，但也从19世纪中叶开始进入了这个近代化的历史发展过程。[3]

可是，在世界近代化历史进程已经推进了一两百年之后，而东方的中国还沉睡在"天朝帝国"的美梦之中。对海外世界已经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巨变，几乎一无所知，仍然死抱着"以我为中心"的中央帝国的陈旧观念。自认为天朝帝国是世界上最大、最文明之国，是世界的中心。视其他国家为野蛮、落后的"夷人"，要求他们年年进贡，遵从天子"统领"和"恩赐"。

鸦片战争的大炮打开了大清帝国的国门。这才使"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致命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4]接着便是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一切引起中国朝野人士的深思，这究竟是为什么，一个曾经显赫于世的中华大帝国，骤然间变成不堪一击的败国、弱国呢？那么中国应当走向何方，如何自强，应当怎样改造这落后又愚昧的祖国呢？

虽然当时的人们并不懂得世界近代化的历史潮流，更没有意识到中国已被卷入了这个近代化潮流里，不过，要改变中国的被动挨打的局面，改变中国"国贫兵弱"的不幸处境，乃是中国朝野人士共同的愿望，却不知路在何方？正当中国人困惑不解，苦于不知如何改造中国的时候，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批中华民族的近代化的启蒙家。

徐继畬向中国人启蒙些什么？

启蒙(enlightenment)这个概念，就一般意义而言，它是启蒙

人类无知愚昧的意思。在世界近代史上，曾出现过“启蒙思潮”时期，首先在17世纪后半叶的英国出现，接着18世纪以来波及到欧美诸国，19世纪传到了亚洲。由于各国历史条件和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其启蒙忌潮的表现也不相同。

18世纪欧美启蒙思潮，把中世纪看做是蒙昧的黑暗时代，与此相反，把自己的时代，即18世纪夸耀为从蒙昧中解放出来的光明时代，是所谓“光明”、“理性”世纪。然而，东方的日本，因为“近代化的历史出发点具有后进的条件，‘启蒙’便始终‘由上而下’，即主要靠以绝对主义官僚为中心的旧封建统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来推行的”。“因为日本正是处在落后状态，所以相对地却能够表现一定程度的进步性。”⑤

中国的启蒙思潮出现与日本情况有些相似，也是由于欧美先进近代国家的产生与发展的影响下，因而在清王朝官吏中产生了先觉者，特别是在19世纪中叶前后，也出现了启蒙思潮，涌现出一批中国近代化的启蒙思想家，如林则徐、徐继畬、魏源等人。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进入19世纪以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大变革的产物。正如费正清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进入19世纪之后社会诸方面发生巨大的质的变革，“这种质变通常被看做是近代化，它不仅是受到欧洲文明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结果，而且是中国内部社会演变的结果。中国人口和领土的增大所造成的它本身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其力量不在外来压力之下，它们决定了中国向现代转变”。⑥

作为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之一，出现了一批中国近代化的启蒙思想家。徐继畬便是当之无愧的一位。

徐继畬先生一生有许多著作，编入《松龛全集》的就有《奏疏》上下卷、《文集》四卷、《诗集》上下卷。最著名的代表论著是《瀛环志略》一书，在中外历史上产生过积极影响。这是一部研究近代世界的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的综合著作，主要内容有：第一卷介绍地

球，皇清一统舆地全图、亚细亚、亚细亚东洋二国、南洋滨海各国；第二卷介绍亚细亚南洋各岛、东南洋大洋海各岛；第三卷介绍亚细亚五印度、印度以西回部四国；第四卷介绍欧罗巴、峨罗斯国、瑞国、嗹国；第五卷介绍欧罗巴奥地利亚国、普鲁士国、日耳曼列国、瑞士国；第六卷介绍土耳其国、希腊国、意大里亚国、比利时国；第七卷介绍佛郎西国、西班牙国、葡萄牙国、英吉利国；第八卷介绍阿非利加各国；第九卷介绍亚墨利加、北亚墨利加冰疆、北亚墨利加英吉利属部、米利坚合众国；第十卷介绍北亚墨利加南境各国、南亚墨利加各国、亚墨利加海湾群岛。[7]

那么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启蒙思想家的徐继畬，向中国人启蒙了些什么思想和知识呢？

第一，他告诉中国人，在"天朝帝国"之外，另有一个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崭新世界，一个"民主化"的近代世界。

我们知道，早期欧美诸国近代化的目标有两个：一是从"市民革命"(包括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开始的摆脱王权专制的政治体制变革，即建立民主化政治体制；另一个是由产业革命(包括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开始的，以机器和蒸汽为动力和工具的经济与技术体制变革，即经济工业化，技术革命化。也就是说，以18世纪为高峰的技术、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部剧烈的社会变革，这就是欧美国家早期近代化的基本内容。[8]虽然当时的徐继畬对欧美国家的近代化变革认识不可能达到上述水平，不过从他论著中所分析和介绍的欧美国家的政治、经济、技术的革命而引起的社会变迁来看，也是当时中国人中少有的高明之见。

他在19世纪上半期，率先向中国人民"启发无知和蒙昧"，通过出版《瀛环志略》一书告诉中国人，大清帝国不是万世一系，独一无二的世界中心；而在地球上，另有一个为中国人全然无知的新世界，在那里有近代的民主、自由的政治、经济制度。换句话说，徐继畬最早向中国人士系统而全面地介绍了人类社会，特别是欧美早

期近代化国家的社会变革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验教训。这对被隔绝了几千年的中国人来说，是头一次获得如此详细而真实的海外知识，从而有了认识自己与世界的比较选择的依据。

特别是在志略中，分析欧美社会经济发展迅速，领先进入近代社会的原因时，提出以下若干因素：(1)欧美人“长于制器，金木之工，精巧不可思议”；(2)“运用水火尤为奇妙。火器创于中国，彼仿而为之，益加精妙，铸造之工，施放之敏，殆所独擅”；(3)“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4)“造舟尤极奥妙”，而且“善于操舟”；(5)为对外交流，“测量海道，处处志其浅深，不失尺寸”，“四海之内，遍设埔头”，“航海贸迁，不辞险远”，“越七万里而通于中土，非偶然也”。总之“亦因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力而为之也”。[9]

当时一位英国人士在向本国政府的报告中曾这样评价徐继畬的世界知识及其人品，说徐继畬“是一个思想解放的人，他对西方地理政治的熟悉程度，简直令人吃惊，在对世界各种各样的情况的了解上，在思想的解放程度上，该省代理巡抚(徐继畬)都远远超过当地政府其他任何官员……他比他的国人要进步得多。在与英国领事交往时，他提到欧洲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事件，表明他对整个欧洲政界事务有全面的了解。例如，由于教会制度，英国对爱尔兰实行统治的困难，比利时对荷兰的反叛，英国和西班牙南北美洲各殖民地的独立，拿破仑雄心勃勃的戎马生涯，以及欧洲各国联盟在滑铁卢的最后胜利。他好像对英格兰讨论梅诺思援助基金案而引起的激动人心的事件也有所耳闻。一连好几个小时，他兴趣盎然地谈论地理”。[10]

第二，他向中国人介绍了另一个世界的首领的楷模——美利坚合众国的大总统华盛顿。

他说：“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

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11]

徐继畬在赠送华盛顿像仪式上的答词中指出：“在奠定贵国的基础方面，华盛顿显示出惊人的能力。他已成为全人类的典范和导师。他的贤德，已经成为联结古代圣贤和他以后各代伟人的一条纽带，因此，必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12]通过徐继畬对美国及其总统的介绍，使中国人首次了解作为美国的开创者——华盛顿的伟大业绩。从某种意义上说，徐继畬把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关系推向一个新阶段，加深了两国之间的友谊和交往。这从美国公使蒲安臣在赠送华盛顿像仪式上的致词中也可以看出。他说：“你们克己的精神，学者的举止，先进的农业，高度的文化……同样，崇高的基督教箴言，我们的现代科学、铁路、电报、轮船，也值得你们采用。你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是许多发明创造的母亲。造纸、印刷术、瓷器、指南针、火药，以及‘人民是力量的源泉’的格言，都是中国人民发明的。为什么不能遵循这些发明和原理，使他们为自己的一切新发展而欢乐呢？作为煤的发现者，为什么不应从煤炭利用中获得财富和力量呢？”[13]

第三，介绍欧美近代化的政治制度。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近代化的国家。其近代化历史进程，大体从 1649 到 1832 年，先后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等一系列社会变迁和政治、经济及文化科技的改革，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总共用了 136 年时间，才完成了近代化历史进程。[14]

徐继畬第一次向中国人指出：英吉利是欧罗巴的“强大之国”，“地三十万正方里，居民二千八百万人，欠项三十五万万元。”

英国政治体制：“英吉利女王主治”，“英国之制，相二人，一专司国内之政，一专司外国之务。此外大臣，一管帑藏，一管出纳，一管贸易，一管讼狱，一管玺印，一管印度事务，一管水师事务，各有佐属襄助。都城有公会所，内分两所：一曰爵房，一曰乡绅房。爵房

者，有爵位贵人及耶稣教师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必乡绅大众允诺而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其民间有利病欲兴除者，先陈说于乡绅房，乡绅酌核，上之爵房，爵房酌议可行，则上之相而闻于王。否则报罢。民间有控诉者，亦赴乡绅房具状，乡绅斟酌拟批，上之爵房核实。乡绅有罪，令众乡绅议治之，不与庶民同囚禁。大约刑赏征伐条例诸事，有爵者主议。增减课税、筹办帑饷，则全由乡绅主议”。徐氏特别指明，议会制“欧罗巴诸国皆从同，不独英吉利也”。英国听讼之制：有证据，则拿解到官，将讯，先于齐民中选派有声望者六人，又令犯罪者自选六人。此十二人会同讯问，辨其曲直。然后闻之于官，官乃审讯，而行法焉。

第二个近代化的国家是美国。从 1776 到 1865 年，经过独立战争、南北战争，最终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完成近代化历史进程，总共用了 89 年。[15]

美国实行民主共和制度。永远废除“得国传子孙”的传宗接代的宗法世袭制度，实行总统领选举制度。

徐继畬指出：在乾隆四十七年时，华盛顿立国（米利坚），“谢兵柄欲归田，众不肯舍，坚推立为国主”。但华盛顿宣布：“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宜择有德者为之”。仍各部之旧分建为国（州），每国（州）正统领一，副统领佐之。以四年为任满，集部众议之。众皆曰贤，则再留四年；否则推其副者为正。副或不协人望，则别行推择。乡邑之长，各以所推书姓名投匭中，毕则启匭，视所推独多者立之。“或官吏，或庶民，不拘资格”。

退位之统领，依然与齐民齿，无所异也。

各国正统领之中，又推一总统领，专主会盟战伐之事。各国皆听命。其推择之法，与推择各国统领同。亦以四年为任满，再任则八年。自华盛顿至今，开国六十余年，总统领凡九人。今在位之总统领，勿尔吉尼阿国所推。

建立最简易的政治体制与管理机构。户口十年一编。每二年于四万七千七百人之中，选才识出众者一人，居于京城，参议国政。总统领所居京城，众国设有公会，各选贤士二人，居于公会，参决大政，如会盟战守，通商税饷之类。以六年为秩满。每国设刑官六人，主谳狱。亦以推选充补。有偏私不公者，群议废之。合众国税入约四千万元。文职俸禄四百七十六万元，陆路官兵俸饷四百三十万元，水师官兵俸饷四百五十七万元，统领俸额万元之外，不得私用分毫。米利坚，合众国（州）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

第四，欧美近代工业、经济、技术及军事发展状况。

志略一书中指出：英吉利三岛物产丰富，除石炭外，还有铜、铁、锡、铅、硇砂等。农牧业发达，马、牛、羊最多，土地适宜二麦生长。虽然收获丰富，但仍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其余不足部分得从国外进口。

英国的工业非常发达，当时有织布者四十九万余人，使用铁制纺机织布。这种纺机是以"火轮"带动，自能运动，所以工省而价廉。每年用棉花四十万担，都是从印度和美国运入。织造大呢、羽缎、哔叽最多；又能织丝缎。丝是从中国、意大利进口。

另有三十余万机械工匠，制造枪炮、刀剑、钟表以及各种日用器皿等产品。

商业贸易极为发达，每年各项货价，约一万万余两白银。"街市之中，衽帷汗雨，昼夜往来如织"，"其商船四海之中无处不到"。然而"大利归于商贾，而工则贫"。

英吉利岁入税饷，除还商民利息外，每年约得二千余万两。

英吉利军事力量：额兵九万，战时三十七万。印度兵三万，土兵二十三万，谓之叙跛兵。兵船大小六百余艘。其兵水师衣青，陆路衣红。重水师而轻陆路。专恃枪炮，不工技击，刀剑之外无别械。

英吉利兵船：极大者安炮一百二十门，次一百，次九十，次七十

四，次六十；中等者安炮四十四，次三十六，次二十八；小者安炮二十，次十，次六。其船大者三桅，长十五六丈；次者二桅，长约十丈。船形平直，两舷高六七尺，船腹入水，深者三丈余，浅者两丈余，小者丈余。

英军船，多装有铁炮。“其铁炮镕铸精凝，内外滑泽，形粗而短。三千觔者，长才五尺许。炮架不用轮，上下两盘，施铁条，进退左右，拽之以绳，极其灵便。炮弹极圆滑，亦时时以油拭之，防锈涩也”。

米利坚合众国经济、技术、军事发展状况。

米利坚二十六国，内地各国大小不甚悬殊。各国天时和正，迤北似燕晋，迤南似江浙。水土平良，无沙碛，鲜瘴疠。其土平衍膏腴，五谷皆宜。棉花最良，亦最多。蔬菜果实皆备，烟叶极佳，通行甚远。山内所出者，石炭、盐铁、白铅。境内小河甚多，米人处处疏凿，以通运道。又造火轮车，以石铺路。镕铁汁灌之，以利火轮车之行，一日可三百余里。火轮船尤多，往来江海如梭织，因地产石炭故也。

华盛顿城是米利坚合众国之都城，设有总统领府、议事堂、文武衙署；迤西别一城曰查治当，有书院，铸炮局；对岸一城有铸炮局，育婴馆。三城贸易极盛。居民四万三千。

在米利坚东北隅的“缅国”，地产五谷、棉花、纸、熟皮、蜡烛、铁。以材木为最多，船料皆取办于此。每岁出口货价，约八百余万，合众国贸易，缅居十之三。徐氏特别指出，摩士敦是合众国一大都会，“城内万室云连，市廛盘匝，百货阗溢”。有大书院六所，藏书楼数处，一楼藏书二万五千册，官吏士子皆许就读，惟不准携归。城外临近海港，在合众国埔头为第二。其商船、火轮船无所不到。陆地有铁路，马车与火轮车并用。火轮车行甚速，每日可三四百里。

美国实行民兵制。额兵不过一万，分隶各炮台关隘。其余除儒士、医生、天文生外，农工商贾，自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一概听官征选给牌效用为民兵。餱粮器械，概由自备。无事各操本业，有事同入行伍。又设队长领军等官，皆有职无俸。每岁农隙，集聚操

演。其民兵约一百七十余万丁。与古人寓兵于农之法暗合焉。

综上所述，徐继畬着重向中国人介绍了欧美早期近代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他提出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政体模式，即"英国女王主治"的君主立宪政体和美国总统式的民主共和政体。从徐氏的论述来看，他是倾慕米利坚合众国的民主共和制度，所以对此予以称赞和推崇，尤其对华盛顿式的政治家非常钦佩和赞赏。同时，又满腔热情地介绍了早期近代化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如英国在2200万人口中，竟有近80万劳工（纺织工与机械工合计），说明工业发展水平之高。以蒸汽机和机器为动力或工具的机械工业发展，铁路、公路及海运交通运输业的高度发达，随之而来的国内外通商行业的发展，以及近代科学技术和工业所装备起来的军事力量的发展等，这一切说明，欧美早期近代化国家，不仅在政治上摆脱了中世纪封建专制极权统治，而且在经济上也完全摆脱了中世纪的小农经济的束缚，已建立了近代大工业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以，把人类社会历史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个时代。

由此可见，于19世纪上半期，在经历了几千年愚昧落后的专制统治的中国，竟然有人能如此大胆而令人惊奇地向国人启蒙愚昧与落后，介绍当时世界上最新的、最先进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与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比较而言）。这本身就是一种勇敢而有远见的爱国的正义行为。他认为，不能再让中国人民继续沉睡在愚昧、无知的天朝帝国的幻梦之中了，应当唤醒中华民族，不要再受外人摆布，而应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

为何徐氏会有如此高见，并敢冒犯上峰而启蒙中国人，向他们宣传介绍另一个世界的情况呢？这同他早期就怀有的民本主义思想有关。他曾在《政在养民论》一文中指出："生万民者天，而天不能自治其民也。""政在养民"，"政"是"天下之民，群待养于圣人，而圣人者，如其愿而与之"。"三王递嬗，通变宜民，制其田里，薄其税敛，经其礼俗，修其政教，大纲小纪，至纤至悉，而其立政之大意，未有

异于古也。”[16]

尽管徐继畬因此遭受迫害，但他敢于面对现实，勇于把历史真相和活生生的人类社会实际状况告诉国人。此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态度是极为可贵的，也是值得后人永远怀念和学习的。当然，作为以儒家思想为基本政治理念的徐继畬，并没有意识到他的一切所作所为特别是对近代世界的宣传，所产生的启蒙作用及其后果，远远超过了他的主观愿望。

《瀛环志略》与《西洋事情》比较

19世纪中叶前后，在世界东方出版了两本名著，这就是由中国近代化启蒙思想家徐继畬撰写的《瀛环志略》和日本近代化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7]撰写的《西洋事情》。现就这两本书的撰写、出版、内容，以及它对各自国家社会的影响，加以比较研究，从而阐明两个国家近代化不同结局的社会和历史的原因。

第一，先从撰写动机和资料来源看。

《瀛环志略》是1848年8、9月间最后完稿的，为十卷本；《西洋事情》完稿比前者晚20年，于1868年完成“初编”，1870年完成“二编”，也是十卷本。

徐氏写其书的动机是很清楚的，就是为了启蒙中国的无知和愚昧，把中国之外的另一个新世界的信息和成就告诉中国人民大众，以便让中国有应付新世界挑战的思想准备。而福泽氏写其书的动机是“背着日本锁国的包袱，对欧美各国巡视”，要把出访期间的见闻告知日本国民。[18]

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一书的材料，主要是根据他以译员身份，随使节团出访欧洲的法国、英国、荷兰、俄国及普鲁士等国所见的文明事物的现场“日记”素材为主。虽然回国后，又参照一些西方

著作加以整理，但其书的性质仍然是见闻汇集性的，而不是专门论著。正如他本人所说："但是(幕府时代)我自认为这是一部有关描述西洋事情小说或虚构故事之类的戏作。""不知天下有没有人读这种书。"[19]

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一书材料来源，主要不是根据出访西洋的见闻录，而是搜集有关国家的几十种材料，并对全球各国的疆界、地理、物产、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状况加以比较选材，择可靠部分用之。此外，又引用二十六种中国文献，对凡中国文献中论述海外世界部分内容，均与西洋材料加以比较，选最准确的用之。

徐书序言说："地理非图不明，图非履览不悉。"从米利坚人雅裨理获得地图册子，又让同知霍明高购地图二册。"余复搜求得若干种。其书俚不文，淹雅者不能入目，余则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自癸卯至今，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

由此可见，两书虽都是介绍另一个世界的新形势和情况，但取材来源不同。福泽公之书是以见闻的感性知识为主，而徐公之书，则是在考证中外大量书籍的基础上，用长达五年之久的时间撰写而成的。从两书的内容上也可以看出这些。

第二，两书的内容及特点。

"福泽谕吉的启蒙活动可以说是从这本书的出版开始的。"[20]根据《福泽谕吉全集》、《福翁自传》与石河干明的《福泽谕吉传》的介绍，《西洋事情》一书，主要向日本人启蒙知识有：①西洋的政治制度，议会选举法等；②西洋经济发展，如介绍机械工业、汽车、汽船等近代交通运输业等；③介绍西洋的新的文明开化的福利事业；④介绍西洋的电信、邮政事业及有关法令等。他说："例如在政治上，日本把三人以上聚在一起暗地商量事情称之为'结党'。政府的

布告牌上就明确记有'结党为不正之事'字样，这是最重的禁制。而在英国，就有所谓'政党'的组织。"在访问中，一问一答，"渐渐问到该国议院的由来，帝室与议院的关系、舆论的力量、内阁更迭的习惯等等问题，逐个听其解答后，才得知它的实情，有的还未能了解清楚。"此外，他还讲到在西洋访问时，学到的有关西洋的法律、律师制度、邮政事业与通信法、电信事业与法等。"其他如医院、贫民院、盲哑院、精神病院、博物馆、博览会等，眼之所见，没有不觉新奇的。一听到它的由来和作用，没有不为之心醉的。"我们"一边感到吃惊，同时又加以羡慕，想在我们日本国也把这些实行起来。这种雄心当然禁也禁不住。这就是我逗留欧洲一年到处笔记的情况，回国后加以整理，并参考一些西方著作写成了书，这就是《西洋事情》"。

由此可见，就《西洋事情》一书的内容而论，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都是一般表面的见闻，所以记得也很浅显"。[21]

拿《西洋事情》的内容与前述的《瀛环志略》的内容比较，可以看出，徐书的长处是全面介绍当时整个世界的地理、政治、经济状况。而且不论从系统性、理论性而言，都比福泽谕吉的书超出一头。不过徐书也有不足之处，生动性不够，文字也显得难懂些。

第三，两书的作用和影响，有极大差别。

福泽谕吉曾对他的《西洋事情》出版后，能否有人读表示担心。他说："不知天下有没有人读这种书。即使有人读此书，也很难想象人们会把其中所讲的内容试用在日本的实际上。"

后来的事实证明，《西洋事情》一书的出版，受到日本朝野人士的热烈欢迎。从福泽谕吉手中卖出的书就有十五万册，后来最高出售达到二十至二十五万册之多。这本书是明治维新前后流传最广的著作。日本人"一看就说这本书有意思，建立文明社会，这才是一本好材料。一人说万人应，不论朝野，凡谈西洋文明而主张开国之必要者都把《西洋事情》置于座右。《西洋事情》好像是无鸟村的蝙

蝠，无知社会的指南，甚至维新政府的新政令，有的可能也是根据这本小册子制订的。这种情况好像是很奇怪的，但当时在日本国内出版的传播西方新思想的著作只有我这本小册子，尽管它粗陋浅薄”。《西洋事情》出版，流传于世不仅产生了实际的政治作用，更令人惊奇的是明治政府全力推行“西化”运动。这已超出《西洋事情》的范围，政府一步一步前进，果敢行事，相反在各方面都使作者为之吃惊。

然而，徐公的书尽管在内容的广泛性、系统性及其论证的逻辑性上都比《西洋事情》要高深得多。可是，其社会效果远不及福泽谕吉的书。虽然徐公之书比福泽之书早出二十年，但是，在1848—1849年第一次印刷出版的书，出售的份数有限，1850年又印刷第二版，扩大出版发行面，其书也传到国外，曾在日本京都重印出版。1866年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重印《瀛环志略》一书。这说明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普及的程度。德雷克先生认为，“实际上，徐继畬的破荒之作，深刻地影响着19世纪中国整整一代的思想家，作为变革维新的微妙宣言，它为19世纪的自强运动奠定了根本的思想基础。当他说连苏禄人都能实行自强时，其弦外之音是中国人应该做得更好”。

冯桂芬利用“自强”的口号为维新而宣传，曾国藩也从《瀛环志略》一书中，获得对世界地理的知识。康有为两次读《瀛环志略》，从中获得不少知识，引起对外部新世界的兴趣。梁启超在1890年阅读了《瀛环志略》，认识到“外国人和中国人的强弱之势而深感忧虑”。接着，1897—1898年，康有为与严复一起上书光绪皇帝，这在客观上是徐继畬愿望的反映。

比较两书的影响，差别甚大。《西洋事情》出版，立即受到社会的欢迎，几乎成为朝野人士推行明治维新的指导纲领，不仅没有人限制读其书，而且政府出面，以此书为指导，制订一系列具体的维新改革方案，并认真贯彻执行书中所阐述的欧美近代化目标。

然而在中国，对《瀛环志略》一书，不仅一般中国黎民百姓无从得晓此书，何谈效仿呢？就是清政府当局，也没有把此书当成"自强"、"中兴"和维新变法的纲领和宣言。因为当朝根本拒绝维新变法，所以，非但不支持，反而加罪于徐继畬。因而他的行为和书中之高明见解未能得到当朝肯定和支持。

《西洋事情》、《瀛环志略》能够在各自国家产生不同作用的原因何在？

福泽谕吉指出："浅薄的《西洋事情》能够受到欢迎的原因"是，"由于当局人士对汉学的造诣不深，用一句话来评论他们，就是无知。如卷初所记，绪方先生曾说日本国内的'武家'大都无知，不懂学问。这真是事实。而从事维新的有志之辈，断事大胆活泼，但相对之下，知识非常浅薄。即使有人懂些学问，也是漫不经心，不够重视。他们以一片武士道精神而重报国之大义。凡是一听说是国家的利益，他们就会自动去做，而不顾其他，好像水往低处流一样，非常自然。他们不惜弃旧，勇于纳新，变迁通达，自由自在地进行一切活动。这就是他们所具有的作风……也就是说，日本士人的头脑有如白纸，一听说是国家的利益，立即印在心底，果断实行，毫不犹豫。"

福泽谕吉在分析了日本士人的特点之后，比较了日本人与中国人的不同之点。他认为，"深受儒权主义的教养，他们能在脑中乱书骄矜自夸的虚文。因此，可以说这是由于维新之初，我国能够当机立断所造成的结果，也有因为当局多数士人体味汉文、汉学不深所致。所以说句不好听的话，日本的文明乃是士人无知所赐。这样说大概也不为过吧！"

话又说回来，假定就以福泽谕吉的分析逻辑，中国人受儒权主义影响深，头脑比较复杂，对外面新事物反应迟缓，行为不那么轻率和简单的话，这也不是阻碍《瀛环志略》传播的根本原因。《瀛环志略》未能像《西洋事情》那样在本国传播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处

在极端反动的太上皇式的中央集权封建统治之下，一方面封建保守，故步自封，不允许改变祖宗传统的任何之举；另一方面，对海外世界新鲜事物，持轻视、拒绝态度。虽然无知，却不愿去探明究竟。因此，在这种封建专制政体之下，堵塞了任何形式的自强、维新、变法之路，死守远远落后于时代的旧政体和祖传清规。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切“自强”、“维新”，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近代化迟迟不前，始终未能发生质变的根源。

而日本的政治形势与中国不同，自 1853 年开国以来，逐渐认识到落后于西方，故而派使节团出访欧美，寻找治国之策。尤其明治维新之后，大张旗鼓地对外开放，实行“欧化”主义。所以福泽谕吉之书，正中下怀，才会受到全社会的如此欢迎，奉为经典，真正成了启蒙运动的宣言书。至于他的文字水平，理论性如何，这对文化不多的武士阶级来说不关重要，只要有用就可。[22]

结　论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徐继畬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启蒙思想家。他在一百多年前就向中国人指明，世界最先进的时代潮流是什么，并且列举了值得中国人效仿的近代化样板或楷模。虽然徐继畬没有像福泽谕吉那样直截了当地告诉中国政府和人民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然而，细心人从他的思想和著作中可以领悟到，他已向中国人提出一个模式。因为在那个时代，他能准确地看到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和制度，故而才认真地考证和研究，撰写了专著《瀛环志略》。从这个意义上说，称他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中华民族的启蒙思想家是当之无愧的。

当然，由于历史、阶级条件和知识视野的局限，他不像福泽谕

吉那样，已经成为日本资产阶级文化的先驱者。[23]至少可以说他已不是那种顽固不化的儒教主义的信徒，而是具有现实主义思想的政治家，开明进步的官僚。

第二，如果说徐继畬是中国近代化启蒙思想家的话，那么他的代表作《瀛环志略》便是中国近代化的启蒙宣言书。由于种种原因，尽管它在历史上所起的社会宣传和启蒙作用，不如《西洋事情》那样家喻户晓地广泛深入，但仍然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中国人（尽管是少数先驱者）的知识和理想，早在一百四五十年前就达到相当水准。换言之，早在那时就对世界有了一个较客观的正确认识。如果不是受到内外势力的干扰破坏，当时如能按照徐氏的认识水平去处理问题，中国的历史发展会快得多。尽管如此，《瀛环志略》的出版，还是东方世界最早介绍和宣传世界早期近代化的首本专著。它可称之为东方最早"启蒙宣言书"。由于我们对它的研究还处在开始阶段，尚不知此书在一百多年前出版后，对亚洲各国的影响的具体情况。

第三，我们今天怀念和研究徐继畬先生及其论著，是为了发扬中华优秀文化，揭示和告知世人，在中国历史转折关头有一位开明的政治家，由于种种原因使他曾蒙受不公正的评价，我们有责任还他本来面目，给予应有的客观的历史评价。

所以，加强对徐继畬的研究，是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伟大事业的组成部分。因此不能从家族、地区观念出发，而应以全民族乃至全世界的角度去研究。

（作者刘天纯，1931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注释：

① "近代化"这个词，在英文中使用 Modernization 一词，也就是现代化。在日文中多把"现代化"一词用"近代化"一词所代替。而在中文里"近代化"与"现代化"则是两个含意不同的词。

关于中国近代化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但我认为中国存在“近代化历史进程”，大体说，从19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这是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期”。至于近代化的程度，需专门研究。

②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1，页256；卷2，页2；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③ 刘天纯：《日本改革史纲》绪论，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

⑤ 近代日本思想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页21－28，青木书店1959年。

⑥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页4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⑦ 《山右丛书初编》之十四，《松龛全集》，民国23年山西文献委员会编印。

⑧ 富永健一：《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思想》《日本杂志》，1985年第九期。

⑨ 徐继畬：《瀛环志略》，光绪二十四年，新化三味书室校刊，第四卷，第8、11页。下文所引志略内容见同书。

⑩⑪⑫⑬ 《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页33，页162，页168，页167；文津出版社1990年。

⑭⑮ CyrilE・Bleck，*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P90，New York，1966.

⑯ 《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页31。

⑰ 福泽谕吉，1838年生于日本一个下层武士家庭，1854年游学长崎，学习荷兰语。1859年出游横滨，直接同外国人接触，转学英语。1860年1月，随幕府代表团出访美国。1861－1867年间，前后三次巡历欧美各国。其最早著作《西洋事情》是游欧美的产物。明治维新后，在三田的庆应义塾专心讲学。曾撰写《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等大量著作。1901年病逝。

⑱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卷1，页314.

⑲㉑ 《福泽谕吉自传》页277，页291－293，商务书馆版。

⑳ 永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页277，商务书馆版。

㉒ 《启蒙思想与文明开化》，《日本历史》，岩波书店1975年版，第312—315页。

㉓ 对福泽谕吉的评价，日本学术界有不同见解：丸山真造认为是“典型的市民的自由主义者”，嘉治隆一认为是“纯粹英美之新兴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远山茂树认为是“拥护启蒙的专制主义”，服部之总则认为是“始终一贯的专制主义”。

●章鸣九

《瀛环志略》与《海国图志》比较研究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不仅是古老的中国与英国在军事上的一次较量，也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次较量。较量的结果是具有古老东方传统的中国遭到了失败。这次失败给中国人提出了一个问题：应如何看待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对这个问题迅速作出反应的，是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和魏源的《海国图志》。那么，他们当时是怎样认识的，现在我们又应该怎样评价他们的认识？笔者通过对《瀛环志略》和《海国图志》的比较研究，并对照稍后出版的日本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发现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中国学者远不如日本学者，但徐继畲的思路颇与福泽谕吉接近，其见识又在魏源之上。本文为论述方便起见，先对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的有关观点作简要的介绍，然后，再对魏源的《海国图志》与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作较详细的评述。

一

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首先阐明了文明的涵义。他从天赋人权观念出发，认为"文明的真谛在于使天赋的身心才能得以发挥尽致"，"归根结蒂，文明可以说是人类智德的进步"，因此，一国文

明程度的高低，可以人民智德的发展水准来衡量。就智慧和道德而言，他更加重视智慧，认为“智的作用是重而广的，德的作用是轻而狭的”。他还认为社会上的一切事物，无论是制度、文学、商业、工业、战争、政法等等，都应以文明为目标，其利害得失应以是否促进文明作为衡量的标准，“能促进文明的就是利就是得；反之，使文明退步的就是害就是失”。福泽谕吉依据上述的文明观，把当时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三类：“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并非常明确地指出：“现在世界各国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得失。”

日本文化属于儒学文化圈。福泽谕吉在回顾日本文明的来源时，肯定了儒学的历史作用。他说：把日本人民“从野蛮世界中拯救出来，而引导到今天这样的文明境界，这不能不归功于佛教和儒学。尤其是近世以来的儒学逐渐昌盛，排除了世俗神佛的荒谬之说，扫除了人们的迷信，其功绩确实很大”。但是，他认为儒学只是在古时有贡献，到了近代，则再不能根据孔孟之学寻求政治途径。他参照西方文明对儒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综观《文明论概略》，福泽谕吉批评儒学有三大弊病：一是儒学只讲正心、修身的伦常道理，讨论抽象的仁义道德，运用于政治则是主张以德化来统御人民。他认为，在未开化的和人事单纯的社会里，对于维护人民的秩序，德化还能起些作用，在社会生活复杂化了的近代，再用德化当作御民的妙法就行不通了，唯一办法只能采取法制。二是儒学主张厚古薄今。他说，儒家的系统是从尧舜传到禹汤文武周公以至于孔子，孔子以后，圣人就断了种。不论在中国，或在日本，再没有出现过圣人。后世的儒者，对孔子以上的圣人一句话也不敢说，而只是叹息自己学圣人而不及圣人而已。为此，他认为儒学是迷信古代崇拜古代，而自己丝毫不动脑筋，真是所谓精神的奴隶。所以儒教在

后世愈传愈坏，逐渐降低了人的智德，这样发展下去简直要变成禽兽世界。三是儒学扼杀真正的文化。他说，儒学凡是论道而品评人的品行时，皆以道德为标准，如仁和不仁、孝和不孝、忠和不忠、义和不义，不是伯夷就是盗跖，不是忠臣就是贼子，都是针锋相对的，两者之间没有智慧活动的余地。偶尔遇有发挥的行为，也认为是细微末节不加重视。又说，儒学把人类的神圣天职局限于德教一事，而且在德教中"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企图以此束缚人们的思想，限制人民的自由，把人们置于无为无智的境地。日本人民在儒学的熏陶下，道德水准与西洋人相比，可说在伯仲之间，然而智慧方面则完全不同，从文学、技术、商业、工业等最大的事物到最小的事物，没有一样能高于西洋，没有一样能和西洋相比拟的，并且也没有人敢和西洋较量一番的。

以上是福泽谕吉对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认识，他的观点很明确：西方文明高于东方文明。日本人民必须衡量其利害得失而另定方向，应以欧洲文明为目标，向西方学习。但文明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现在的欧洲文明，仅仅是现在人类的智慧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而已，因此，又不应满足于目前的西洋文明。[①]

二

下面我们来介绍魏源对东西方文化的认识．在介绍之前，必须说明的是，《海国图志》对世界各国地理、历史的介绍，完全是分别引录有关著作的原文，在每一卷的标题下，都写明"邵阳魏源辑"，因此，《海国图志》的本志部分只能视为文集汇编，而不是著述。尽管引录的著作，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风俗习惯，有褒有贬，甚至还有一些荒诞不经的说法，所有这些只能看成是原作者的观点。当然，魏源收录什么样的著作，特别是在所收录的著作中保

留或删掉某些内容，一定程度反映出他的思想倾向。例如，在介绍美国的情况时，收录了《瀛环志略》的有关部分，但将其中赞扬华盛顿的那段删掉不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但魏源所引书籍非常广泛，难以一一考订。不过，魏源在引录他人的著作时，在行文中间或文末常加按语，重要的问题还收录他自己的文章，以表明他的看法。这些才是我们评论他的思想认识的依据。

《海国图志》本志部分能够反映魏源对东西方文化认识的，主要有第 71 卷《各国教门考》、第 23 卷《回教考略》、第 27 卷《天主教考略》，此外第 74 卷的《国地总论》中的《释五大洲》、《释昆仑》，其内容是对世界四大宗教的评论和从地理学的角度对世界中心的考辨。对这两个问题，魏源除在所引录的文章的后面加有思想倾向极为鲜明的按语以外，还收录有自己撰写的文章，主旨在说明中国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文化上处于世界中心的优越地位。

中国是“天朝上国”、世界的中心，这本是中国处于封闭状态下长期与外部世界隔绝所形成的一种愚昧无知的传统观念。魏源的《海国图志》绘有地球全图和各洲各国的分图，界划疆域非常清楚，按理不应该再有中国是世界中心的观念，然而，魏源竟然在介绍了世界各国地理、历史情况之后，在附加的《国地总论》中自己撰写了《释五大洲》和《释昆仑》两篇文章，对世界中心问题进行考辨。《释五大洲》开首就说，“梵典分大地为四大洲，西洋图说得其二焉，而强割为五为四”。他否定西洋图说把地球分为欧、亚、美、非、澳五大洲的说法，认为是“强割为五为四”，然后，依据梵典认为地球应分为东神胜洲、南赡部洲、西牛货洲和北具庐洲。经他考订所谓南赡部洲应包括西洋人所说的亚洲、欧洲、非洲。他认为这三个洲本是一个洲，其理由是这三个洲都有陆地相连，西洋人“强割”为三。所谓西牛货洲就是美洲，因为美洲盛产金银矿，制成货币流布世界，所以他说：“墨利加洲当为释典之西牛货洲，非臆度也。”至于东神胜洲和北具庐洲因阻于南冰海和北冰海，还没有被发现，但他说：

"地球所余之空度,亦凿凿当有二洲,又何疑焉"。他又依据梵典,说南赡部洲有"四主","东人主即震旦,南象主即印度,北马主即蒙古、哈萨克,西宝主即大小西洋"。魏源把世界作如此划分之后,进一步论证中国在世界之中,在各国之上。他的论证分为两步,第一步是论证亚洲的优越,他说,儒教、佛教、回教、天主教皆生于阿细亚洲,天文算法奇器亦皆创于阿细亚洲,而后流被于欧罗巴洲;非洲一直落后被称为"乌鬼之区";美洲在明朝以前,"其洲中数千载,不过草木蕃殖,游牧射猎,竟无创教治世的圣人,及各国开垦通商始知有天方天主等教"。据此,他的结论是,梵典所说的四大洲中"南赡部洲为四洲之冠","赡部洲内又以阿细亚冠彼二洲"。第二步是论证中国在亚洲的优越,理由有二,一是按梵典所说,赡部洲有四主,东方人主,南方象主,北方马主,西方宝主,人为万物之灵,"四主中亦自以人主为上"。中国恰在亚洲之东方,且人口居天下三分之一,"生齿之繁,无国可比"。所以梵典说震旦(中国)为"东方人主"是确然可信。理由之二,"圣人之出必在海滨,扶舆磅礴之气,必至平原近海"。印度正当热带,地过炎燠,人多裸袒;非洲亦偏于热带;欧罗巴又偏于冷带;唯震旦正当温带,四序和平。他说:"自古以震旦为中国,谓其天时之适中,非谓其地形之正中也"。

魏源不相信西方的地球图说,而相信释典的四洲说,并牵强附会地去证明释典所说的正确,作这种考订本身就是荒唐的。通过考订得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优越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结论,更是荒谬。

让我们再看看魏源对宗教的评论。在魏源看来,西域有三大教,即佛教、天方教(回教)和天主教,都是"事天治本,即彼方之儒",与中国的儒教"离立而四",是世界上的四大宗教。在《各国教门考》里介绍了当时宗教的分布情况,印度、缅甸、暹罗以及中国的西藏、青海、蒙古,皆信奉佛教,葱岭以西包括波斯、阿丹及非洲信奉天方教,欧洲、美洲各国信奉天主教,中国、越南、朝鲜、日本信奉

儒教。魏源对佛教很少评论，对天方教采取了不屑一顾的睥睨的态度，认为天方教"其言天也近凿"、"其称天也近诬"、"其于伦也太渎"，"何暇与议五伦，何暇与议六合"。天方教无法与儒教相比拟。魏源对西域三教，看来比较地重视天主教，在《海国图志》中有两篇资料反映了他对天主教的看法。一是全文收录了杨光先《辟邪论》上下篇。魏源于文末有一按语："福音书耶稣自称为上帝之子而称上帝为神父，未尝谓耶稣即上帝也，此所论稍未中肯，其余大概得之"。就是说，耶稣是上帝之子而不是上帝，除这个常识性问题杨光先搞错了，魏源加以更正之外，对《辟邪论》批驳天主教的观点是表示赞同的。杨光先主要批评天主教的"上帝创世说"，指斥天主教只信奉上帝，不许供君亲牌位，不许祀祖先父母是"率天下而无君父"。历官李祖白著《天学传概》一书，其中引用六经中诸如"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这些提到"上帝"和"天"的语录，以附会天主教的上帝说。杨光先认为这是把中国古时的"先帝圣师"当成了邪教的苗裔，把历代的"圣经贤传"视为邪教之绪余，斥责李祖白"作此非圣之文，自毁周孔之教"，"不思今日之天下即三皇五帝之天下"。杨光先《辟邪论》一文，内容非常浅薄，不过是出于卫道的立场，为儒教争正统地位而已。儒教是"以天秩、天序、天伦、天性立教"，所以是正统；而天主教"无父无君"，所以是邪教。对此，魏源都表示赞同。第二篇资料就是魏源自撰的《天主教考》(上、中、下)。其中对天主教的批驳与杨光先基本一致。值得注意的是，魏源将《天学初函》所收录的艾儒略的《西学凡》、高一志的《空际格致》等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的书籍，与其他宣传天主教的书籍混在一起，一律加以批驳。他说，《西学凡》所述皆其国建学育才之法，"其致力亦以格物穷理为本，以明体达用为功，与儒学次序略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耳"。魏源将《天学初函》诸书分别介绍评论以后，又加按语作总的评述，说："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

前古，其议论夸张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其书本不足登册府之编，然如《寰有诠》之类，明史艺文志中已列其名，削而不论，转虑惑诬，故著于录而辟斥之。又明史载其书于道家，今考所言，兼剽三教之理，而又举三教全排之，变幻支离，真杂学也，故存其目于杂家。"这段按语表明了魏源对西学（包括天主教神学和自然科学）的态度，他是一概斥之为"异端"、"杂学"。

儒学不是宗教，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天主教是宗教，但它不能代表西方文化，更不能代表近代西方文化。魏源何以把儒学说成宗教，又把天主教视为西方文化的代表，将本来并不相类的事物进行比较？在魏源看来，天主教等西方宗教是"以事天治人为本"，所以是"彼方之儒"。他这是从社会功能的角度，将天主教提高到与中国儒学相等的地位。佛教、回教、天主教的教义、教规都旨在劝善惩恶，以"教化"作为统御人民的一种手段，这与儒家以"德化"作为统治人民的手段是基本一致的。不过，佛教是"以神设教"；天主教和天方教是"以天设教"；而儒家是讲"天人合一"，儒学的"天"是指自然，所注重的是现实的人际之间的伦理关系。儒家讲"德化"强调人的内心修养，通过"正心"、"诚意"等一套自我修养的功夫，达到个人人格的完美，没有鬼神之类的迷信色彩。魏源研究了天主教的神理论，注意到天主教讲灵魂，也讲心性，其十诫大意也归于"敬天爱人"，但天主教强调人之灵魂心性"皆神之所为"；"敬天爱人"二者又以敬天为要。所以他批评天主教，"其言出于儒墨之间，就所论之一事言之，不为无理，而皆归本敬事天主以求福，则其谬在宗旨不在词说"，又说："历览西夷书，惟神理论颇近吾儒上帝造化之旨，余皆委巷所谈，君子勿道"。所以，魏源将儒学和天主教进行比较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毕竟儒学不是宗教，天主教不能代表近代西方文化。这种比较的结果，不仅增强了士大夫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盲目的优越感，同时因批评天主教而连及整个西学，斥西

学为“异端”、“杂学”，对中国人向西方学习造成很大的障碍，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甲午战争以前。例如，陈炽在90年代还说，“泰西所长者政，中国所长者教”，就是把儒学看成儒教，然后与天主教相比。洋务思想家长期不能突破“中体西用”的观念，恐怕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魏源在《海国图志》序言中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与上面所讲的情况岂不是一个极大的矛盾？我觉得要解释这个矛盾，须要把握魏源的整个思想。这个问题我在下面将要谈到。[②]

三

徐继畬的《瀛环志略》是“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他除收集介绍世界各国的史地著作和地图册子以外，还访问回归的华侨和来华的外国人，加以筛选，融汇贯通，形成自己的看法，然后笔之于书。所以，《瀛环志略》不同于《海国图志》，它不是汇编，而是一本著述。徐继畬还在介绍一个国家的情况之后，加上一段类似“太史公曰”的按语，阐明他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因此，通过《瀛环志略》能够比较明确地把握徐继畬对中西文化的认识。

《瀛环志略》通过对世界各国社会历史和现状的介绍，比较清晰地勾画出在中国或者说在儒学文化圈以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有自己独立发展进程的社会文明，尽管徐继畬没有使用“文明”或“文化”这样的概念。徐继畬特地详细介绍了建立在地中海沿岸的几个文明古国。他说，相当于中国虞舜时代在两河流域建立了巴比伦国，“始聚人民造宫室，是为西土第一国”，“其人习天文、善测量，度西土推步之学由此起”。徐继畬为了证实这一点，专门询问英官李太郭，李给他看用巴比伦所造文字写的“文字册子”，他说：“余翻阅之，信然！”确信在中国传说中的虞舜时期，就已诞生了西方文

明。其后，在相当于有夏帝芒之世，建立了“西土文教之邦”的犹太国。徐继畬说：“余尝闻之英官李太郭，犹太人最讲文字，西国各种书籍多犹太人所译解，故其国记载独详。欧罗巴文士游学者，不于希腊，即于犹太，盖泰西弦诵之区也”。到有夏中叶，又有希腊国，“始织羊毳为衣，酿葡萄为酒，取橄榄为油，铸金锻铁作刀刃耒耜，又以文字传其土人，欧罗巴之开淳闷，通文字，实自希腊始”。周幽王时，罗马崛起，西汉中叶，建了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土的大帝国，建都城于罗马，“声名文物之所萃”，“诸国仰之如周京”。由于罗马帝国占领欧洲大陆，才使欧洲土著人由“游猎为生，食肉寝皮”的野蛮时代进入文明社会。罗马帝国崩溃，欧洲国家受到北狄峨特族的侵扰，书册旧典扫荡无遗，“由是民变夷俗”。到明朝洪武年间，欧洲国家再度复兴。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英国等欧洲国家“骤致富强”，“骎骎乎富溢四海”，同时把欧洲文明传播到美洲。他说，欧洲人到美洲以后，“长国家而务财用，即荒裔其有幸乎！”明中叶以后，欧罗巴诸国航海东来，从此，南洋诸岛城池坚壮，楼阁华好，市廛繁富，舟楫精良，大不同于以前“番族之荒陋气象”。在这里，我们暂不评论徐继畬对殖民主义的看法（其实，徐继畬在讲到美洲、非洲，南洋诸岛的历史时，对欧洲人强占埔头，进行欺骗、讹诈、掠夺的侵略行为，多次作了揭露，并对土著民族的英勇反抗表示称赞。例如在介绍苏禄时，他说：“以拳石小岛奋力拒战，数百年来安然自保，殆番族之能自强者哉”）。我们作如此详细的引录，旨在说明：徐继畬确实看到并且承认，在中国以外的世界，存在着另一种文明，它发源于巴比伦、希腊、罗马，成长壮大于欧洲各国、已扩展到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南洋五印度。这种文明扩展到东方就构成了对中国的威胁，“中土之多事，亦遂萌芽于此”！

尤其可贵的是，徐继畬不像魏源那样，认为文明是创自亚洲，甚至是创自中国，然后“流被于欧罗巴洲”。而是认为欧洲文明有着自己独立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从上面介绍的情况可以看出，徐继

畬称巴比伦是“西土第一国”，称犹太国为“泰西弦诵之区”，特别是讲到希腊时，更明确的指出：“欧罗巴之开淳闷，通文字，实自希腊始。”而且他还反复强调，“泰西远隔神洲，礼乐车书之化无由渐被”、“欧罗巴远在荒裔，周孔之教所不及”、“周孔之化无由宣之重译”，等等。在谈到安南、日本的历史时，他却说安南由野蛮进入文明是“渐被车书之化”，日本则是“制仿周汉，文同斯邈”。在徐继畬思想里很明确，周边的国家如朝鲜、日本、安南，其文明的发展是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西方文明的产生则与中国古老文化没有任何关系。世界文化是多元的。

徐继畬在介绍古代巴比伦、希腊、罗马以及近代欧美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城市的繁荣时，的确充满着欣羡赞叹之情；对这些国家的贤君明主，其中特别是对华盛顿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综观《瀛环志略》，对西方国家赞美之词，可以说是比比皆是。这些欣羡、赞美，表明徐继畬对西方文化的肯定。他从没有说过西方文化是异端。就拿他对西方宗教的态度来说，虽然他对佛教、天方教、天主教的教义并不赞成，对神话传说也不相信，但无激烈的批驳言论，只是说“其用意原无所谓非”，“必欲传其教于中土，则亦未免多事矣”。他甚至认为对西方宗教进行批驳也是多事。在《书王印川广文诗后》的文章中，他说：“信佛者愚，辟佛者亦多事”，“二氏之外，又益以回教、天主教，口诛笔伐不亦劳乎”。他还讥讽士大夫把批驳宗教作为“讲学格套”，“大抵儒者著书，中无辟佛数条，则以为不合绳尺，窥其隐衷，不过睥睨两庑牲牢耳”。他在这篇文章末尾的“自记”里说：“此种议论，俗儒所惊，然未必敢驳”。这表明徐继畬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不同于魏源。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福泽谕吉在确定“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同时，反观日本的文化，立即进行反省和清理，对儒学取分析批判的态度；魏源则通过对世界中心的考辨和对四大宗教的评论，维护中国传统文化，对儒学取完全肯定的态度。徐继畬对中国传统文化

则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先是在《凡例》中声明，“此书专详域外”，于中国的情况“不敢赘一词”，接着在介绍亚洲时，又说，中国“非卮言之所能尽，亦非外史之所宜言。谨摹皇朝舆地全图于卷首，而说不赘焉”。企图避免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作直接的对比。而且，在介绍亚洲地理不能不提到中国时，他说，中国“壤尽膏腴，秀淑之气，精微之产，毕萃于斯。故自剖判以来，为伦物之宗祖，而万方仰之如辰极”。其后还说过“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这样的话。我以为这几句赞美之词，是在当时环境下，徐继畬不得已而说的几句违心之言。首先，徐继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非常明确，西方文化是在“周孔之教所不及”的环境下，独自发生发展的，与中国传统文化毫无关系，徐继畬本人对西方文化就欣羡不已，称赞有加，又怎能说中国文化是“伦物之宗祖，而万方仰之如辰极”。最重要的是，徐继畬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实际上存在着离异的倾向。众所周知，儒学是强调“尊德性”，注重伦理道德和个人品德修养的政治伦理学，品评人物是以道德为标准的。徐继畬在《瀛环志略》中对西方人物的评论却没有遵循以道德为标准的原则。突出的事例是他对俄国女皇凯瑟林的评论，称凯瑟林“淫荡多嬖，精于理事”，对她继承彼得大帝的改革事业，招聘外国工匠，广延文学，兼修武备，在俄土战争中打败土耳其的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没有因其“淫荡多嬖”而作贬词。很显然，徐继畬把才智和道德看成是两码事，于才智与道德二者之间，他似乎更注重才智。为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再举《松龛全集·文集》中的一篇文章《书王印川广文诗注后》为例。这篇文章本是谈论如何评价韩昌黎的《过寿阳驿诗》，有人说这首诗是忆桃柳二姬，并表示非议。徐继畬不同意这种看法，说“诗人吐谈意兴与宋儒讲书语录，判然两事”。接着，他列举一些文士名流婚外情传为佳话的故事，然后发表议论，说：“忠孝至性与男女大欲同出一源，欲其真不欲其伪，欲其节不欲其流”，如果有人说，“我性不好色”，这完全是虚伪，“窒其情而不使发，圣贤亦不能，但贵乎能

止”。又说，寡妇“不能守而改醮，亦常情耳”，把寡妇改嫁说成失节，又陷娶者以失节，“圣人忠恕不宜有此”。这些议论显然是针对宋儒“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道德观而发的。他又在文末“自记”中说，“村学究见此议论，未免惊讶”。这在当时的确是离经叛道、惊世骇俗之谈。有这样一种离异的思想倾向，很难相信徐继畬真的会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看成是“伦物之宗祖”，“万方仰之如辰极”的。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徐继畬也不同于魏源。

徐继畬没有对传统文化进行反省，反而违心说了几句赞美的话，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从张穆给徐继畬的信，可以看出其中的原因。张穆在读了《瀛环志略》已刻出的前三卷之后，写信给徐继畬，建议他必须把《皇清一统舆地全图》挪居亚细亚图之上。为什么必须作如此更动，张穆提醒徐继畬说：“春秋之例，最严内外之词。执事以控驭华夷大臣而谈海外异闻，不妨以彼国信史，姑作共和存疑之论，进退抑扬之际，尤宜慎权语助，以示区别”，“前明徐、李，止缘未洞此义，遂而负谤至今”。[3]看来，张穆所读的《瀛环志略》的版本，《皇清一统舆地全图》尚放在亚细亚图之后，所以才有必须挪居亚细亚图之上的建议，以后的版本确实按此建议作了更动，《凡例》中说“谨绘一图于卷首，明拱极朝宗之义，不敢赘一词”，是与此更动相适应而添加的。“伦物之宗祖”，“万方仰之如辰极”这些话则是1844年《瀛环考略》稿中已有的掩饰之词。从更动地图顺序这一事实来看，徐继畬对张穆的意见是重视的。因此，在“严内外之词”的文化气氛之下，以前明徐光启等人为前车之鉴，在对待中西文化“进退抑扬之际”，不得不采取谨慎态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徐继畬在《瀛环志略》中没有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也没有提出仿效西方作某一方面的改革的任何建议。《瀛环志略》是一本地理学术著作，不是政论，也不是旨在向清朝政府提供治国治民的方案。我们不能以“文以载道”的要求来要求《瀛环志略》。它的可贵在于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那就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力

求尽可能准确、详细地向国人介绍了外部世界的情况。这正是它不同于《海国图志》、高于《海国图志》的地方。[4]

四

以上我们介绍了福泽谕吉、魏源和徐继畬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态度。福泽谕吉肯定了儒学的历史作用,但认为已不适应于近代社会,因而对儒学采取了分析批判的态度,主张以西洋文明为目标。魏源视西学为异端、杂学,固守儒学传统。徐继畬承认中西文化是两支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对西方文化赞美欣赏,对儒学存在离异的倾向,但没能从学理上进行清理反省。福泽谕吉的认识和态度都远远超过魏源和徐继畬。日本学者与中国学者之间存在差距是易于理解的。福泽谕吉写作《文明论概略》已是在明治维新时代,他本人早年游学欧美,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近代科学的影响很深。魏源和徐继畬还完全是封建士大夫。他们之间的区别反映了处于两个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思想认识水平。而且,日本和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福泽谕吉曾指出:日本存在两个政治中心,一是至尊的皇室,一是至强的幕府,至尊未必至强,至强未必至尊,任何一方都不能形成思想的垄断,因此,在日本产生一种思想相对自由的风气,为真理的活动开辟了道路。他说:"这与中国人拥戴绝对的专制君主,深信君主为至尊至强的传统观念相比,是迥然不同的。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思想是贫困的,日本人的思想是丰富的;中国人是单纯的,日本人是复杂的。思想复杂丰富的人,迷信就会消除"。所以,"在吸收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说,日本是比中国容易的"。[5]应该说这一分析符合中日两国当时的实际情况。魏源和徐继畬都没能超越传统,消除"迷信"。张穆对徐继畬的警告,更是证明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顾忌太重,缺乏冲破封建网罗

的勇气。

魏源与徐继畬处于同一时代、同一社会环境之下,徐身任封疆要职,其社会地位比魏源要高,但徐在对待西方文化上却比魏较为开明和宽容,这主要是由于徐继畬在福建办理通商事务,与外国人有较多交往接触的机会,而且能够主动、虚心向外国人求教。在厦门的美国传教士雅裨理神学院毕业,获神学博士,英国驻福州领事李太郭是博物学博士,他们给徐继畬提供地图、介绍情况,回答徐继畬提出的问题,为撰写《瀛环志略》作出了贡献。徐继畬在其序言中承认"其说多得自雅裨理",在书中多次提到英官李太郭对他提出的问题所作的解答。《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一书的作者德雷克说《瀛环志略》"是不同文化的人在中国海疆接触、交流的产物",是有道理的。此外,徐继畬还收集一些去过南洋的船员和华侨的口述资料。因此,《瀛环志略》的资料来源比较直接可靠。而魏源则缺乏这样一个条件。这大概是形成徐继畬与魏源之间思想差距的一个原因。其实,《海国图志》并不能反映魏源的全部思想,要从总体上把握魏源的思想,除研究《海国图志》以外,还应该研究他的其他更为重要的著作,如《皇朝经世文编》、《默觚》、《圣武记》以及有关今文经学的作品。魏源对近代思想的历史性贡献不在于《海国图志》所介绍的那些粗浅的域外知识,而在于他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和复兴今文经学。开眼看世界思想是从属于经世致用思想的。经世致用思想对 19 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起着直接的影响;洋务思想是经世致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所以,我们说魏源的《海国图志》在对中西文化的认识上不如徐继畬的《瀛环志略》,思想比较陈旧,这并不能否定魏源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地位。问题在于我们对经世致用思想应有一个正确的估价。"经世致用"也叫"通经致用"即要求运用儒学的经典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强调务实,注重功效,但思想理论与价值观念仍一本于儒学。"经世致用"既以寻求效用为基本目标,一切学问都要归于致用,因此,对宋学和汉学都

采取批判的态度。宋学流于虚玄、汉学流于烦琐，都无裨于实用。批评宋学“空谈心性”，但不否定儒学的伦理道德；批评汉学的烦琐考证，但不否定经书。总之，经世致用之学批评宋学和汉学，是因为宋学和汉学偏离了原始儒学，所以，魏源说：“惟周公、仲尼、内圣外王，以道兼艺，立师儒之大宗”。[6]经世致用之学是继承原始儒学，独树一帜，与宋学和汉学相抗衡，本身仍属于儒学。经世致用之学确实总结和继承了儒学中优秀和积极的因素，强调内圣与外王、学术与治术、道与器的统一，并抬高了“外王”、“治术”以及“器”在儒学中的地位（经世致用之学中所讲的“器”不是指一般的器物或技艺，而是指的“治术”、即“道”用之于治理社会、国家时所施行的一切政事。魏源说：“曷谓道之器？曰礼乐。曷谓道之断？曰兵刑。曷谓道之资？曰食货。道形于事谓之治。”[7]这就是说，礼乐、兵刑、食货等一切治理社会的政事，都是“道”的表象，都是“器”）。从而校正了宋学、汉学脱离社会实际的风气。但经世致用之学无论是讲内圣、学术、道，还是讲外王、治学、器，都没有超出传统儒学，没有吸收西学。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和《默觚》是他阐明经世致用理论的两部代表作。美国学者刘广京先生称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是“晚清经世之学划时代文献”。《默觚》集魏源“毕生思想之精粹”。[8]但在这两部代表性著作中丝毫没有涉及西学。由此可见，在魏源“经世之学”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尚没有西学容身的地位，西学既没有进入“道”，也没有纳入“器”，还没有“中体西用”的概念。这正是经世思想与洋务思想区别之所在。至于《海国图志》序言所提“师夷长技”，魏源的完整提法是“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包括“攻夷”、“款夷”、“制夷”，重心在对付夷人，“师夷长技”并非用以治理中国的内部社会。用以治理中国内部社会的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即《大学》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用以御外是“师夷长技”，用以治内是传统儒学。所以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既

提出“师夷长技”，又斥西学为异端，这就叫“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两者并不矛盾。

五

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不论是它的学术价值，还是它的思想内容都超过魏源的《海国图志》，但这两本书和它的作者却遭到不同命运。《瀛环志略》一书，“甫经付梓，即腾谤议”。他的际遇很有些类似洋务时期的郭嵩焘，成为悲剧性人物。而魏源和他的《海国图志》却是蜚声不纥，不仅得到进步人士的推崇，也受到保守人士的好评。且看李慈铭对两本书的评论：

“阅徐松龛太仆继畲《瀛环志略》……其用心可谓勤，文笔亦简净。但其轻信夷书，动辄铺张扬厉。泰西诸夷酋，皆加以雄武贤明之目。佛英两国，后先令辟，辉耀简编，几如圣贤之君六七作。……似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况以封疆重臣，著书宣示，为域外观，何不检至是耶……其褫职也以疆事，而或言此书实先入罪案，谓其夸张外夷，宜哉”。

“点阅《海国图志》。魏氏此书体大思精，真奇书也。其采杨光先《不得已》中《辟邪论》上下篇，又自为论，以抉天主教之妄。往尝以为此等愚悖无理之言，不攻自破，彼丑夷之黠者，尚不肯自主于行教，何足费吾唇舌？由今思之，人理之泯棼，将不知所终极……当魏氏此书初出时，使朝廷先加意此事，宣谕地方大吏饬郡县官，日讨国人而伸儆之，毋使其陷溺，事犹可为耳……”[9]

李慈铭一贬一褒，态度很明确。被贬者是因为“夸张夷人”，被褒者是因为维护了儒学。如果《瀛环志略》再有像《文明论概略》那些批评儒学的内容，大概会遭到如同郭嵩焘的《使西纪程》被毁版的厄运。在对待中西文化的认识和态度上，《瀛环志略》的思想倾向

颇接近于《文明论概略》，而与《海国图志》确是大异其趣。李慈铭的一贬一褒，说明了在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前期阶段，士大夫阶层的文化心态，他们还存在着强烈的，然而是盲目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文化优越感不仅决定了《瀛环志略》和《海国图志》的不同命运，同时还决定了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必然采取与日本不同的途径。福泽谕吉提出的是否定以儒学为主干的东洋文明，确定以西洋文明为目标，这种思想在日本能为知识阶层所接受。《瀛环志略》和《使西纪程》的命运说明，这种思想在中国士大夫阶层则绝对行不通。魏源及其《海国图志》恰是因为适应了士大夫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文化心态。经世致用思想是总结、继承儒学的积极因素，以儒学以治内，学习西方的技能用以对外；洋务思想是“中体西用”，在维护周孔之道的前提下，逐步地有限度地接纳西学。它们都没有违背传统，而是企图弘扬传统中的积极因素，以中学溶化西学。而结果是日本向西方学习获得了成功，中国则是失败。如果说两次鸦片战争证明西方文化胜过东方文化，那么，甲午战争则证明日本学习西方的途径优于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途径。然而，依据当时中国的国情，在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上，也只能背负着周孔之道这个沉重的包袱，鹅行鸭步，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作者章鸣九，1931 年生，历史研究杂志社副编审。）

注释：

① 此节引文均见〔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

② 此节引文均见魏源《海国图志》。

③ 张穆：《复徐松龛中丞书》，《㞩斋文集》。

④ 此节引文均见徐继畬《瀛环志略》。

⑤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第 17、18 页。

⑥⑦ 《默觚》学篇九。

⑧ 刘广京：《魏源之哲学与经世思想》。

⑨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咸丰丙辰一月二十八日；光绪丙戌十二月二十日。

●李鸿生

略论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

鸦片战争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殖民者发动的一场图谋征服中国的野蛮的殖民战争。它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地球上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腐败的代表中世纪文明的、经济技术落后的东方封建主义制度,与新兴的、代表近代文明的、拥有先进经济技术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一场特殊形式的碰撞。面对"侵略的西方"和"先进的西方"的双重挑战,中国向何处去?林则徐等先进的中国人正在苦苦地思索、探求。徐继畬也在同西方资本主义发生联系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闭关自守的落后,从而潜心研究外情。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英军企图进犯广东,由于林则徐认真备战,防守严密,无隙可乘,而北犯福建厦门。当时在福建汀漳龙道任署理道台的徐继畬曾在其辖区内积极设防,筹划固守。后来,清军惨败,天朝上国受到"逆夷"致命打击的现实,使这位从内地到东南海疆不久,即碰到张牙舞爪的西方侵略者的清朝官员颇为气馁,并在黄恩彤等的影响下,逐渐倾向主和。然而,卑屈求和导致了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的主权和独立遭到进一步的破坏。丧权辱国使徐继畬在茫然中惊醒:"二百年全盛之国威,乃为七万里外之逆夷所困,至使文武将帅,接踵死绥,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末。"[①]原因何在?他开始睁眼看世界,认真探究西方列强的虚实,寻求盛衰迭代之理。从而千方百计搜集有关世界史地资料,着手编

撰《瀛环志略》。

徐继畬编撰《瀛环志略》并非偶然。

首先，是由于办理“夷务”的需要。

鸦片战争以前，由于清朝统治者实行严格的盲目排外的政策，严禁与外国人接触。结果，不仅国人对西方世界毫无所知，就连以注重实际著称的顾炎武、林则徐等，对外部世界也知之不多。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把佛郎机列在“交阯西南夷”一类，认为其国“在爪哇南”。林则徐最初也不谙夷情，曾相信有关蛮夷之国的无稽之谈，夷人需求大量的茶叶和大黄，切断供应，就会双目失明或患肠胃病等。[2]而后，由于虚心探究，才由对西方的无知逐渐走向有知的。甚至连最高统治者道光帝，对西方国家的了解也是漆黑一团。他们“不谙夷情”，对于来中国“互市”已有二百年历史，又以鸦片走私震撼朝野的英国，毫无所知：“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3]道光帝不知英国在何方，有无陆路可通。耆英说英人夜间目光昏暗。骆秉章奏称英兵上身刃不能伤，但以长梃击其足，应声即倒。黄惠田谓英地昏黑，不敢燃火，船行半月始见天日。琦善因访知英王自行择偶的“新闻”，向道光帝启奏，判断英国是“蛮夷之国”，“未知礼义廉耻”。如此无知，如何应战。[4]故徐继畬终于发出了“不悉外情，致误事机”的感慨。[5]作为参与“夷务”，在粤闽沿海地区与外人打交道的官员，为了不再昧于外情，徐继畬迫切希望了解海外诸国“疆土之广狭，道里之远近”，以便作好应付新世界的挑战的准备。

其次，对舆地考证的酷爱，使徐继畬选择了探索域外史地作为开眼看世界的起点。

徐继畬历来对舆地考证颇为用心，常阅读中国传统史志，并有《尧都辨》、《晋国初封考》、《两汉志沿边十郡考略》、《两汉幽并凉三州今地考略》等著作。正是出于对舆地考证的爱好，因此，当他在厦门会晤英国领事，认识英方译员、美国传教士雅裨理，并见到“绘刻

极细"的外国地图时,即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苦不识其字,因钩摹十余幅,就雅裨理询译之"。[6]此后,徐继畬不放过任何一个向外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机会。常常利用职务之便,在接触外国官员、传教士、商人时,尽量询问世界各国的情况。如雅裨理的朋友、美国传教士甘明向他介绍了瑞士等国的情况;英国首任驻福州领事李太郭则为他解答了许多有关中东的问题;李太郭的后任阿礼国和夫人为其提供了外国史地的资料等。徐继畬孜孜不倦,探索域外史地,几乎到了入迷的地步。据与他接触过的外国人介绍说,徐继畬常常会"一连好几个小时兴趣盎然地谈论地理"。[7]

再次是中西文化交流使徐继畬得以完成《瀛环志略》。

16世纪末,欧洲传教士来华。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了欧洲文艺复兴的成果。随着欧洲天文学、地理学、医学、物理学和哲学的传入,中国人对西方的文化有所了解。与此同时,传教士又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精华介绍到西方,成为西方文化的新血,促进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正是这种东西方文化的双向交流,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了一股清新学风。以徐光启、方以智、李之藻为代表的一批向往并学习西方文化的先进人物,力图会通中西,在中国早期启蒙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然而,这种中西文化双向交流的黄金时代,只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到18世纪初期,清朝统治者由于与罗马教廷的"教仪之争"而"禁教",完全禁绝西学,使得17世纪曾颇有起色的早期启蒙思想到18、19世纪只有零星的回音,而恰恰在清朝严行闭关锁国的愚昧政策的这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处在专制统治下的中国远远地落在西方诸国之后。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8]古老的中华帝国所遭受的数千年未有的变局,使先进的中国人惊觉"天朝"文明之外,还有先进的西方文化。近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为了"悉夷情"而罗致翻译人才,"立译馆翻夷书","凡以海洋事进者,无不纳之,所得夷书,就

地翻译"，并在一年之间，做到"海外图说毕集"。[9]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四洲志》。该书译自 1836 年英人慕瑞的著作《世界地理大全》。魏源正是受林则徐委托，以《四洲志》为基础，旁采"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10]经过一年的辛勤劳动，于 1842 年完成了第一版《海国图志》50 卷本。同样，徐继畬编撰《瀛环志略》，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他为了更多地、更准确地了解外部世界，常常不耻下问。不仅请外国人提供资料，还向曾飘洋过海的老舵师请教有关南洋群岛的情况。此外，徐继畬还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搜集流传在东南沿海地区的西洋人编写的介绍世界地理、历史的出版物，并与中国传统史志、游记等文献进行比较、考订，"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自癸卯至今，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11]最终于 1848 年完成了《瀛环志略》。

《瀛环志略》作为一部与《海国图志》并称于世的介绍外国历史的著作，曾风靡一时。与同时代、同类型的著作相比，确实有其高明之处。

第一，具有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意识。较早地注意到西方国家的对外扩张，使亚洲许多国家丧失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沦为殖民地是"古今一大变局"，[12]已构成对清朝的严重威胁，必须密切关注。

据曾于 1845 年末至 1846 年初访问福州的英国人四美（乔治·史密斯）记述，有一次，在徐继畬的要求下，阿礼国夫人为徐继畬画一幅世界地图，用不同颜色标出受英、法、俄控制的世界各地。"收到这幅地图后不久，他（徐继畬）就送来一封便函，询问把阿富汗省略的原因。是它已经与波斯合并呢，还是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王

国了？"[13]这表明徐继畬对西方殖民势力扩张的特殊关心。而且由此引起他对清朝主权受到严重威胁的担忧。他在《瀛环志略》中指出，"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由其善于操舟，亦因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力而为之也"。中国边患自古在西北之背，今则转向东南腹地。西方列强技术先进，国势强大。中国的领土及邻国，已不断受到侵扰，面临变成殖民地的威胁。五印度有为英所灭者，有受役属为藩属者。到后来，"五印度全土，归英辖者十之七，仅余西北数部尚未服也"。五印度近连两藏，南洋诸岛国与我素有来往，"今则胥变为欧罗巴诸国埔头"。"中土之多事亦遂萌芽于此"。这里的"埔头"，徐继畬虽然尚未像今天那样理解为"殖民地"的严重意义，但已经看出是隐含掠夺和侵犯意味的商贸基地。徐继畬还揭露荷兰曾企图占领中国台湾为它的殖民地，结果遇到郑成功的抵抗而失败："以彼横肆为鲸鲵，遇郑氏父子而弱焉，亦足为远夷侵凌中国之炯戒矣"。提醒国人应以史为鉴，并密切注意"天朝"周围的国家多已沦为列强的埔头这"古今一大变局"，万万不能等闲视之。

第二，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徐继畬超越了魏源等着重学习西方先进技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对欧美的政治制度予以关注，力图探索西方的制度与国家独立富强之间的联系。

鸦片战争前的一个多世纪，由于统治者厉行文化专制和闭关锁国政策，国人的思想完全处于封闭状态，昧于了解世界大势，夜郎自大，固步自封。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破关而入，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不得不接受"侵略的西方"和"先进的西方"的双重挑战。一批开明进步的爱国者，为了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在坚决抵抗"侵略的西方"，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同时，面对"先进的西方"开始睁眼看世界，重新认识"世情"和"国情"，探求救亡图存之路。最初是林则徐、魏源等在抵抗英国

侵略的斗争中，看到了“船坚炮利”的“长技”是列强所以致胜的原因，“天朝上国”所缺乏的是同英国对抗的“坚船利炮”。故魏源终于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并在50卷本的《海国图志》中一再强调“师夷”的重要性。明确指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14]而且具体指出“夷之长技”有三：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在《海国图志》60卷本中，又努力地去摸索和探求如何具体“师夷长技”、“尽得西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的途径，以便付诸实践。[15]所有这些，有力地否定了盲目虚骄、墨守成规，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的传统观念和“用夏变夷”的单向文化传播方式。这是先进知识分子在文化意识上的初步觉醒。但是，这毕竟只是在文化的物质层面上看到了“天朝上国”的短处和西方的长处。而徐继畬高出一筹之处，是在于他初步触及到制度层面，广泛介绍西方民主制度，大胆称颂民主政治。

在《瀛环志略》中，徐继畬运用西方的材料和详细的统计数字，以极富感染力和综合概括的手法，对欧美的民主政治作了详尽的描述。他既介绍英国的议院制度：“都城有公会所，内分两所，一曰爵房，一曰乡绅房。爵房者，有爵位贵人及耶稣教师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必乡绅大众允诺而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其民间有利病欲兴除者，先陈说于乡绅房，乡绅酌核，上之爵房，爵房酌议，可行则上之相而闻于王，否则报罢。……大约刑赏、征伐、条例诸事，有爵者主议；增减课税，筹办帑饷则全由乡绅主议。”[16]也介绍美国的民主政体：“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各国正统领之中，推一总统领，专主会盟战伐之事，各国皆听命。其推择之法，与推择各国统领同。亦以四年为任满。再任则八年。”“米利坚政最简易，榷税亦轻。户口十年一编。每二年于四万七千七百人之中，选才识出众者一人，居于京城，参议国政。总统领所居京城，众国设有

公会，各选贤士二人，居于公会，参决大政，如会盟战守、通商税饷之类。以六年为秩满。每国设刑官六人，主谳狱，亦以推选充补，有偏私不公者，群议废之。”[17]并认为美国这种“公器付之公论”，是“创古今未有之局”。[18]徐继畬还详细叙述华盛顿率各部民众取得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废弃分封世袭制，实行共和制、联邦制、选举制、任期制的业绩：“顿既定国，谢兵柄欲归田，众不肯舍，坚推立为国主。顿乃与众议曰：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择有德者为之。”[19]并且对此表示赞赏：“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20]

正因为徐继畬对西方的介绍，确实比着重于介绍西方文化的物质层面有更深的层次，所以，魏源在 1852 年增补的《海国图志》100 卷本中，引用了《瀛环志略》这方面的材料。并在每次辑录徐书材料时，冠以《瀛环志略》之名。也正由于徐继畬赞赏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言论，闪烁着近代民主思想的火花，因此，《瀛环志略》备受改良主义者的推崇，在日本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徐继畬作为长期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清朝官吏，在介绍西方民主制度时不可能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意识，而往往用孔子的大同思想予以解释，其最终目的也是企望通过学习西方以重振“天朝上国”之国威以求长盛不衰。这是由其阶级和时代局限所决定的。但是他毕竟是近代中国最早认识和介绍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启蒙者，对此，应予以充分的重视肯定。

（作者李鸿生，1943 年生，广东社会科学联合会副研究员，广东历史学会副秘书长。）

注释：

① 戴逸、林言椒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篇第一卷，第 316 页。

②④⑨ 《林则徐与澳门》第 175 页、第 177 页。

③ 《林则徐集·奏稿》中，第 649 页。

⑤⑦⑬ [美]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畬及其瀛寰志略》第 2 页、第 34 页。

⑥⑪⑫⑯⑰⑱⑲⑳ 徐继畬：《瀛环志略》。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 2，页 3。

⑩⑭⑮ 魏源：《海国图志》。

●洪九来

《瀛环志略》的特色
——与《海国图志》的比较

1840年鸦片战争揭开了近代中国历史上那令人不堪回首的序幕。不过，坚船利炮的出现对一直以文明之邦自居，陶醉于泱泱大国喜气中的广大中国士人无疑又是有效的清醒剂，是他们重新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极好参照物。鸦片战争后兴起的竟相"谈瀛海故实"、"开眼看世界"的思潮就是先进的中国人从睡眼朦胧中觉醒后的第一个反应。它表明，先进的中国人已在事实上认识到在华夏大国之外还有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全新的世界迫使中国要认真地探讨"天地东西南北之学"，从而使文明古国跨出了走向近代社会的第一步。当然，由于新世界的神秘莫测，更由于探索者自身的复杂心态，使之对新世界的认识深度不一，绝大多数在今天看来"不过束阁覆瓿之价值"，[①]但其中不乏有独特的见识。徐继畬，一个时下近代史书中知名度不高，但鸦片战争期间正在福建处理"夷务"的封疆大臣，其任内"偶著"而成的10卷《瀛环志略》则具备了鲜明的觅新知于域外的理性精神。其书从著述初衷到渗透全书的某种冷静的主观意绪，都大大区别于同时代的同类著述，堪称"开眼看世界"思潮中独特异常的文化标本。

在中国古人头脑中域外观是极其模糊的，"八荒"是中国人以自我为中心向外延伸最远的一个地理概念，"八荒，八方荒忽极远

之地也”。[②]这种模糊认识从一开始就染上了浓厚的伦理文化色彩，形成了中国人视四方荒远为戎夷蛮貊的华夏文明中心观。另外，中国文化中重实务、轻科学的特质也制约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中国人“研究地理不过其一种工具，地理学仅以历史学附庸之资格而存在耳”，[③]他们认识不到科学的地理学对社会的巨大推动价值，而是仅仅归于“实用”的功效。总的说来，在鸦片战争以前，“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是中国人普遍的域外思想，“徒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④]是中国人普遍的文化心态。尽管明清之际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带来了若干科学的地理学知识，但在认为“中国为天下之中”的士大夫眼光里，它们不过是奇闻异说，只有“录而存之”的认识价值，与他们所处时代的“经世”内容毫不相干。

正是由于中国人对域外世界的认识一直带着这种文化优胜感与浓厚的“经世致用”色彩，因此，当列强的坚船利炮敲开了闭关守国的大门，昔日不足称道的蛮夷竟然在中国土地上横冲直撞时，中国士大夫的对外心态是异常复杂的，“方今烽烟告警，有志者抱漆室忧葵之念，存中流击楫之思，外洋舆地不可以弗考也”。[⑤]姚莹谈其著述《英吉利地图说》的目的时讲：“莹为此书，盖惜前人之误，欲吾中国稍习夷事，以求抚驭之方耳。非侈新异欲贪四方之功也。英夷及西洋人士，每笑中国无人留心海外事者，其笑固宜。有志之士，乌可不一雪此言哉！”[⑥]归纳起来，他著述域外史地之作的目的有二：一是求抚驭外夷之方；二是雪所蒙遭外夷之辱。这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探索域外史地的心态，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于民族危难之际忧国忧民、积极有为的炽热情感，但也正是由于这一情感因素，使他们在对外在世界作具体探索时又带有极浓的“实用”色彩。掺入了大量非科学的因素，阻碍了对外在世界的准确把握。

对外在世界相对准确的把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认识者主体所具备的实事求是、冷静科学的精神，它需要认识者具备一定的脱

离传统故道的勇气，正是在这一点上，志略的作者显示了高出同辈之上的独特见识与行事勇气。

作者曾说他只是“在闽藩任内，偶著《瀛环志略》一书”。[7]在《瀛环考略》序言中，他对著述动机更是说得明白，“方今圣泽覃敷，海外诸国鳞集仰流，帆樯萃集。其疆土之广狭，道里之远近，任边事者，势难已于咨询。此说虽略，聊以为嚆矢云尔”。[8]这就是说著者仅仅把它当作一本客观的知识手册看待，没有热切寄希望于此书有某种匡时济世的社会功效。全书从内容上讲，“纯叙地理”，[9]不涉及海防、陆战、枪炮、禁烟、筹款等有关“夷务”之事，更没有梁廷枏《海国四说》中那种《耶苏教难入中国说》的文化宣言；从叙述方式上讲，它“言核而意赅”，[10]以一种简洁平实的口吻叙述世界各国的地理概况、历史沿革与现存状态，没有掺入那种“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争谋略，也没有那种“打仗，不怕；打仗，不怕”（林则徐语）的豪言壮语，表露出一种令人惊奇的冷静与客观态度。

如果把志略置于同时代以《海国图志》为代表的一大批有关域外知识的“实学”著作中作一番仔细比较，它显示了如下独特性：

准确可信

志略是作者广泛“荟萃采择”中西方官私文献，“五阅寒暑”，“稿凡数十易”而成的。尽管他本人自谦“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11]其实这决不是作者饭后茶余信手涂鸦的娱情之物，而是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据实直笔的产物。为了取得信实的材料，作者不仅广泛接触那些来华的传教士、领事馆人员，而且还不耻下问，向那些下层的当事人求教，如他在描绘南洋群岛的现状时，便亲自询问去过当地的福州老舵手。他不仅取材于一些公开的官方文献、报刊，而且也采择了些不引人注目、易被人忽视的私人著述，尽管

"其书俚不文，淹雅者不能入目，余则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12]正因为如此，全书从材料的搜集整理，到编纂成册，都贯穿着求真的态度。使之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建立在一个较为准确的基础之上，如作者在同外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认识到"地理非图不明，图非履览不悉，大块有形，非可以意为伸缩也"。而"泰西人善于行远，帆樯周四海，所至辄抽笔绘图，故其图独为可据"。[13]因而他在志略中便大加采纳，确信无疑。在编辑过程中对一些未甚明了的域外情况则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北冰海人皆知之，南极之为冰海，怀仁舆图弗著焉，故不敢言详也。"[14]正是基于对史料的准确把握之上，作者对世界的认识更合于历史的本来面目，因而志略一付梓，便被当时有识之士称之"善书"，为"当今有用之书"。[15]

与志略相比较，成书略早的《海国图志》在史料的选择上则有失准确。时人评说："近时《海国图志》，大半臆说"[16]当属夸大之词，但图志的雏形为林则徐请人编译的《四洲志》，它是为应付"夷务"而仓促成书的，虽然魏源作了一些考核订正补辑工作，但其认识的非科学性还是明显存在着。到 1852 年图志三版增至一百卷时，他显然大量引用了志略的许多材料，尽管"其自序中第言得林文公《四洲志》之钞本。绝不及松龛之《瀛环志略》，然魏书备引徐书是实"，因此时人认为"徐书作於前，魏书作於后，创始者难为功，继起者易为力也"。[17]尽管魏书卷佚十倍于徐书，但由于前者的定型之本大量引用了后者的材料，且前者也不单纯叙述域外舆地内容。从这点上讲，我们不妨称志略为中国近代第一部完备的探索外部世界的纯地理著作。

新异公允

建立于真实可信的史料基础之上，徐把叙述的重点放在"考近

今之情事，不在考古之详明也”。这与其他许多“非侈新异”者大异其趣。

如在介绍南洋之安南国时，徐认为“安南本中国州名，诸书言之甚详，故不多赘……”[18]他叙述其“沿革括以数言，叙近时情事则颇新异，为前人所未言”。[19]此前一些史地之书都载有安南人善泅水，能于水中钉破洋船，然后再焚烧船只的传闻，徐通过引证史实，否定此说，故在引《海国闻见录》的史料时便将其删去。而魏源对此事则深信不疑，特地引用明朝邓芝龙钉焚洋船的先例来证实。图志中引用《海国闻见录》也没有删去此说。这种现象不仅仅归于作者对史料的把握不同，更是作者对域外世界所持的文化心态不尽相同。魏源全书的精神所注是“议守议战议款，自抒伟论，究心经济，专筹制取”[20]。这种“经世”精神本无可非议，但是对一切史地之实都带之以“实用”的观察眼光，则不免有意气用事，背离事实的缺憾。魏源从安南人抗击法国入侵的方法中似乎找到一条实用可行的法式，“论战守谓不当守海口战海中，当纵使入口，伏而击之”。他并没有认识到中安的不同国情而断然定策，“似非万全之策也”，未免有“执古方以医今病”[21]之嫌，时人评介当不属妄语。

这种“淡化”实利与拘于“经世”的区别，在他们对欧罗巴诸国进行介绍时表现得更为突出。

与图志对英吉利洋洋四五万言的叙说相比，志略仅六千多字的简介当然显得单薄，但是“英国强以船坚炮利，智以机器轮舟，富以远商重税，更以印度所产之鸦片烟市於中国，尤握利权，此所以富天下”的原因徐书则能“一一考核之”，可谓深得个中奥秘，“似不得议其过略矣”。[22]这种准确的把握是由徐对英吉利及整个欧罗巴历史与现实客观冷静的认识所致。徐已初步意识到欧罗诸国在近世海外的一切活动是由其国内的经济生产方式决定的，而不是某种蛮民“好勤远略”的本性冲动，“按英吉利孚然三岛，不过西洋一卷石，揆其幅员，与闽广之台湾琼州相若。即使尽为沃土，而地力之

产能有几何"？但它能"骤致富强，纵横于数万里之外者，由于西得亚墨利加，东得印度诸部也……"[23]驱使其进行海外殖民活动的内在动因是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因而"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因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力而为之也"[24]，"非好勤远略也"。[25]因此，徐非常注重欧罗巴诸国的一些经济数据，如各国的主治地面积、居民数、每年进币量、每年欠项量、兵额数、战时数、军船数等等，他都一一考核，不惜笔墨。另外，徐对欧罗各国的历史沿革、政治制度、社会风情也有许多精辟而准确的见解，如他对英国议会制度，诉讼制度等的介绍常被评论者高度赞誉。通过如实的叙说，他还消除了一些常存留于国人头脑中的一些误解，如传言中法人(指国王及其臣僚)好食小儿，"广(州)之恶少竟掠小儿往卖"，他通过考证，认为此"似当时之传闻，亦未必尽确也"[26]，显示出了一种不带民族偏激情绪的写实态度。

而以魏源为代表的绝大多数"经世"者对域外地理的介绍带有较重的不甘受辱，"奋之夺之"的情绪渲泄，华夷之辨的文化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他们的行动，带着这种不健全的心理去认识一个全新的世界，往往有许多明显的误解和偏见，如魏源在介绍欧罗巴各国兴衰关系时曾有这么一段叙说："故自昔惟意大里亚足以纲纪西洋，自意大里裂为数国，教虽存而富强不竟，于是佛郎机、英吉利代兴，而英吉利尤炽，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岛夷"。[27]这里他虽也认识到英人以"行贾""雄岛夷"这一社会现象，但言中意指英吉利是"无教而贾"的少教化非正统的社会。姚莹在介绍英吉利时也有类似含沙射影的讥诮之辞："国俗王死无子，则传位於女，其女有子，俟女死后立之，实已数易其姓，而国人犹以为其王之后，足见夷俗之陋"。[28]他用中国正统的嫡长子继承法来规范西方的君主世袭制，流露出"华夷之辨"的味道。这些与徐对英国相对真实的介绍相比，就逊色得多了。

这种区别还表现在他们对美国的介绍上。徐魏二人对美国历史上的诸多关键事件如独立战争、华盛顿其人其事、美国的民主选举都有所涉及。徐是在史实的基础上表现出对华盛顿其人的羡慕和对美国共和政体的推崇。如他介绍华盛顿起事后，各州不分面积大小，力量强弱，“皆仍其旧而安之，非裂地而定封也”。“洛哀伦人户止十余万，特尔拉华止八万余，不能因其弹丸黑子，并归大国。齐鲁之不兼邾莒，亦初制则然耳”。[29]这里虽然仍有中国传统理想之治的思想烙痕，但其对战后北美各洲联邦共治的首肯是恰如分的。而魏源大写特写美利坚的诸多内容则意有所指。他在原序中阐明了其叙述的宗旨，“劲悍英寇，恪拱中原，远交近攻，水战之援”，故“述外大洋弥利坚”。[30]因此他高度赞美美国人在独立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因为他们“愤于无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约成城，坚壁清野，绝其粮道，遂走强敌”。[31]从中他得到了某种莫大的鼓舞。他并没有认识到中英之战与美国独立战争是不同历史状况下的战争。这点似乎不应苛求于古人，但是魏源主观上过分拘泥于“远交近攻”的“制夷”政策，因而对弥利坚作出有失允当的赞誉，“……富且强不横凌小国，不桀骜中国，且遇义愤请效驰驱，可不谓谊乎！”[32]这种认识就显得天真可笑了！

微言大义

指认志略是一本区别于其他作为救国方案的科学舆地之作，并不意味着它完全脱离现实社会问题。事实上，地理观也是一种价值观，它不可能不带有作者所处时代的文化特征。徐继畬作为首批“开眼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代表之一，在其著作中自然而然地会有忧世伤时，经世图强的意图。只因作者身为“控驭华夷大臣”，不便直接针对执政者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之类的主张。再加上他一贯所持的以守为攻的“迂拙”治理观不为当时“抗夷”情绪高涨

的社会所青睐，“稍有更张，辄多掣肘”，因而只能用微言大义的笔法，寓英明独特的经世主张于各国国情的褒贬抑扬之中。诚如时人王韬所言：“中丞内感于时变，外切于边防，隐愤抑郁，而有是书，故言之不觉其深切著明也。”[33]志略全书从形式到内容所寄寓的“经世”思想都显得很含蓄与深沉，不似《海国图志》那样锋芒毕露，锐气旺盛。它不是时代的某种激切呼喊，而是一种历史的理智沉思，正因这一点，它所体现的科学睿智对中国近代的历程更有一种延绵不断的社会震撼力。

志略在叙述各国的现状时往往自然流露出作者自己的主观感情。这首先表现在他对中国周边国家的不幸遭遇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比如与中国相毗邻的佛教古国印度，“今则胥变为欧罗巴诸国埔头”，且“鸦片之毒，也出于此”。难道“宇宙浮蘖之气，乃独钟于佛国，何其怪也！”[34]徐氏不由惊呼“此古今一大变局”，“想佛力亦无如之何耶！”[35]推人及已，印度与中国云南、西藏接壤，不过咫尺之间，近来法人已由此涉入我境内进行贸易，“昔日之五印度，求疏通而不得，今日之五印度，求隔绝而不能。时势之变，固非意料所及矣！”[36]中国这个古老的礼仪之邦面对着一个强权横行的世界，其命运如何？作者忧患之情溢于言表。

对中国四边烽烟骤起，岌岌不安的处境作者虽忧患但没有陷入迷惘之中。志略没有给出具体的筹夷之策，但是作者在如实介绍之中插入的那恰如其分的评议却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和鞭策。如作者在介绍嗹国（今丹麦）时说：“（其）壤地甚偏，未堪于诸大国比权量力也。而加的牙一港扼波罗的海数千里之喉，嗹人实掌其筦，遂翘然为一方之杰，国之强弱，岂尽在乎疆土之广狭哉！”[37]又如荷兰国“地本弹丸，而图国计于七万里之外，历数百年无改，亦可谓善于运筹者欤！”[38]这些评议在当时完全是对以老大帝国自居的清王朝一种忠告。同时，对落后挨了打的中国人又是一种催之奋进的力量。作者笔端间的感情不仅停留于此。它往往还直接针砭时

弊，如他介绍英人的礼俗，“除跪拜天帝救世主外，见君主亦无叩头之礼。尊卑杂坐，无上下左右之分”，[39]这对于以纲常伦理为本的封建统治社会来说，无疑是冒犯当朝统治者的“不敬”之言。由此可见，即使志略的作者本人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但由于他所介绍的这个全新世界本身有着与大清帝国格格不入的，并能动摇其统治根基的社会内容。因而使志略在客观上就已超越了纯地理学的范畴，纳入到了“经世实学”的思想体系之中。

作为一个从小身染传统的儒家现实主义者，一个国家危难之际勤于政事的士大夫，徐继畬的整个思想不可能超越时代，总要带着时代的烙印。这在他对域外世界的认识中也必然有所体现：

一、志略与同时代一大批有关域外之作一样，是外来因素刺激下的被动产物，因而它对外部世界的准确把握是有限度的。其以作者自身所能表现出的开放态度为唯一尺度。有时即使是无可否定的地理事实，志略也隐约其辞，混淆事实。如在考略中作者已认识到只有“亚细亚以中国为主”，[40]但在志略定稿时却改为“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41]天朝大国的地理模式观仍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二、由于时代的束缚，使志略对一个全新世界里的许多内容无力作出客观准确的判断，有时只能回归于传统思维，借助传统的概念范畴去规范它，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削弱了其真实性。如对新兴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合理现象它不可能有正确的解释，只能用中国传统的三代之治的思想来认同它们。在介绍华盛顿其人创建共和国之事时，似乎华盛顿成了中国古代尧舜禹之类的贤明君主，其总统制也即是为中国人所追慕的“禅让制”。再如他介绍瑞士，尽管其国四周“王侯各拥强兵，熟视而无如何，亦竟置之度外”，因而成了“西土之桃花源”。[42]颇具国际政治意义的中立国被它当作中国古代“无为而治”的理想乐园。这完全是时代造成的误会。与此相一致的是，对当时世界上落后的民族与地区志略也缺乏深刻的认识，如它用八卦定位的方法来说明非洲大陆落后愚昧的现象，甚为可

笑："阿非利加一土，以八卦方向视之，正当坤位，其气重浊 其人类颛愚。故剖判已千万年，而淳闷如上古，风气不能自开"。[9]言下之意是要用外来力量对此等蛮夷辟蒙启智，可叹近代完成此任务的当事者用的不是志略所希望的"柔德教化"的古老药方，而是充满血腥味的枪炮。

综上所述，由于志略的作者主观上没有赋予此书过多过烈的治理社会、匡扶时世的使命，而是用一种"微言大义"式的思想意绪来认识世界，介绍世界，因而全书给人一种相对真实可信，公正平允的感觉。比徐稍晚的郭嵩焘在出使英国后曾叹服地说："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者乎？"正是从这点上，我们指认志略为中国近代最早的一部系统探索域外世界的纯地理之作，其科学价值远远高于同时代同类之作。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作者基本上是"足不出户"、"纸上谈兵"，更由于其自身受传统思想的束缚，所以志略不可能完全超越时代，对新世界作出准确无误的把握，有时反而会附会事实，回归传统。这种创新与恋旧相集于一身的特色其实是中国近代化整体进程中一种鲜明、独特的色调，而较早地充当了这一文化标本。

（作者洪九来，1966 年生，在湖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

注释：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

② 《汉书·陈胜项籍传》，颜师古注。

③⑨ 分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 316—317 页、323 页。

④ 魏源：《圣武记》。

⑤ 王鎏：《海录》序，《海外番夷录》。

⑥ 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八，20 页。

⑦ 徐继畬：《复吴思澄比部世兄书》，《松龛先生全集》文集卷三。

⑧ 转引自《历史研究》86/1，130 页，据考证考略为志略形成过程中的一个手搞

本。

⑩⑮㉝ 均见王韬:《瀛环志略跋》、《弢园文录外编》卷九。

⑪⑫⑬ 均见《瀛环志略》,自序,以下简称志略。

⑭⑯ 均见志略刘鸿翱序。

⑰⑲⑳㉑㉒ 均见《问魏氏海国图志与徐氏瀛环志略考证孰优》,《皇朝经世文四编》卷十。

⑱ 志略卷一,安南篇末注。

㉓㊴ 均见志略卷七,英吉利国。

㉔ 志略卷四,欧罗巴。

㉕㊳ 均见志略卷六,荷兰国。

㉖ 志略卷七,佛郎西国。

㉗ 《海国图志》卷三十七,大西洋总叙,以下简称图志。

㉘姚莹:《东溟奏稿》卷三,54 页。

㉙㊸ 均见志略卷九,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

㉚ 图志,原序。

㉛㉜ 均见图志卷五十九,外大西,总叙。

㉞㉟㊱ 均见志略卷三,五印度。

㊲ 志略卷五,嗹国。

㊵ 见《瀛环考略》卷上,地球全图说,分图说。

㊶ 志略卷一,地球。

㊷ 志略卷五,瑞士国。

㊸ 志略卷八,阿非利加。

●[日]大谷敏夫撰
胡修之摘译

《海国图志》与《瀛环志略》
——中国近代的始刊启蒙地理书

《海国图志》(下称图志)与《瀛环志略》(下称志略),是清朝鸦片战争失败后未几写成的地理志,寓有警世之意。兹将两者的内容加以比较,以探讨其共通点与相异点。

两著的刊行与有关东南亚的原始资料

图志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在扬州刊行,其原本系《四洲志》。与此书发刊同期,王蕴香1842年出版了《域外丛书》。收入其中的文献有:《海录》、《海岛逸志》、《高厚蒙求摘略》、《番社采风图考摘略》、《红毛番英吉利考略》、《三宝栊》、《昆仑》、《爪亚风土拾遗》、《吕宋纪略》,其中尤以《海录》为最贵重。

接着,道光二十三年,江南乡绅郑光祖刊行《舟车所至》一书。郑光祖为江苏常昭人,也是经济学家,曾致力于水利。郑书收入了下列内容:《宁古塔纪略》、《朝鲜志》、《随銮纪恩》、《出塞纪略》、《塞北纪闻》、《西域旧闻》、《乌鲁木齐杂诗》、《伊犁日纪》、《金川旧事》、《维西见闻》、《西藏纪闻》、《容美纪闻》、《海国闻见》、《中山传信》、

《采硫日记》、《台湾使槎录》、《海岛逸志》、《海录》。《舟车所至》的特色是，当时所能收集到的近年所写域外（原文如此——编者）记载，差不多全被罗入。

关于南海的记载，以《海录》和《海岛逸志》资料性价值为高。《海录》刊行经过与特色是这样的：清道光年间，广东嘉应州人谢清高，随商人周游海外，因目盲回乡。他将他的经历，讲给同乡举人杨炳南听，由杨整理成书。谢清高之友吕调阳说："中国之著者谈海事，远及大西洋之外者，盖自谢清高始。清高久居贾舶，亲至欧罗巴洲，布路亚、英吉利诸国，皆身历其处，且意存于传信，故所述绝无夸诞。"[①]可知谢曾远航欧洲。

又据同族谢云龙所述："海客谈瀛洲，论者以为烟涛微茫，大都学士文人逞其臆说奇谈以欺世，未可援为实据。"[②]可知，《海录》与以往谈海外书籍的臆说奇谈相比，是真实的记载，有其价值。志略与图志亦强调《海录》关于欧洲记载的真实性自不待言，即关于东南洋的部分，似亦相当正确。

《海岛逸志》这一著作，是以福建漳州人王大海，于嘉庆年间居住爪哇十年，入赘于"甲必丹"家，游历整个爪哇的见闻为基础而记载成书的；其真实程度也很高。

谢清高、王大海的出生地，是广东省嘉应州、福建省漳州府这种东南亚华侨根据地。此点大堪注目。就是说，当时清政府下令海禁，海外知识与情报的来源，就是来自华侨与其一家。一些开明人士，积极吸收这些知识，加深了关于海外的认识。魏源在着手准备刊行图志时，首先看到的就是《域外丛书》、《舟车所至》，而其中收入的《海录》、《海岛逸志》，也就成为使魏源了解东南洋现状的贵重资料。从而，如若没有这两种丛书的刊行，魏源大概也就不能那么容易地刊行图志。即使刊行，也无非是"旧瓶装进新酒"而已。这样，魏源从这些关于东南洋的记述中，了解到华侨的活跃，对抑制华侨发展的清政府的锁国政策，采取了批判态度。

另一方面，可以认为，志略作者徐继畬，是看到图志的 50 卷本而了解东南洋的记载的。但徐继畬在编修志略之际，却又出现了与图志大相径庭的地方。但我以为徐继畬还是重视《海录》、《海岛逸志》中这些东南洋原始资料的。其后，图志在刊行百卷本时，虽曾参考志略的记述，但基本上仍贯彻着 50 卷本的方针，并未作全面修改。我认为这仍然是由于两种著作之间在编修意图上有着微妙的差异。

两著的编纂意图

关于图志的编纂意图，魏源自序讲得很清楚：

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在撰著方法上，何所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而谈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谈西洋也。

这就表明，本书不限于中国式的论断，而旨在客观地、科学地求得世界知识。这样，在这本书中，著者研究之着力点，在东南洋和英国。重视东南洋各国的理由，在于通过研究英国侵略东南亚的经过，将其来作为中国的战略要素来借鉴。

魏源在指出英美两国在新加坡、麻六甲建立书院进行翻译时，进一步特别指出，英国以此处为据点，目的是建立铸炮局和造船厂，整顿军备以进攻中国。

魏源指出，与欧美各国相比，中国的海外研究落后于人。他举例说，康熙年间平定台湾后，廷议上奏放弃台湾，施琅坚决反对，于是康熙皇帝作出固守台湾的英明决策。魏源呼吁现政府应学习康熙。他断言，当时如果不采纳施琅之议，台湾将成今日之新加坡。同时断言，政府对翻译外国书籍者，研究外国情况者，筹划外国事务者，课以里通外国之罪，只能更使中国落后于欧美，必将追悔莫及。

因此，他倡议，为了研究欧美各国，要设置翻译所，要更积极地研究夷情。

他的关心特别侧重在研究欧美列强之内的英国，收集了所能到手的一切与英国有关的文献，比较研究，按他自已的观点，作了评论，他认为，英国之所以强大，正在于商贾和军事，及谋求经济力与军力的强大。中国非学习这一长处不可。他的思想，成为此后洋务运动的先驱。

关于志略的编纂意图，王韬在为此书写的跋文中说："中丞之作是书，殆有深思远虑也乎？其时罢兵议款，互市通商，海寓晏安，相习无事，而内外诸大臣，皆深以言西事为讳，徒事粉饰，弥缝苟且于目前，有告之者，则斥为妄。而沿海疆圉晏然无所设备，所谓诹远情、师长技者，茫然无所知也，况询海外舆图乎？"

"中丞内感于时变，外切于边防，隐愤抑郁，而有是书……呜呼！古人著述，大抵皆为忧患而作。"在谈到两书的价值时，王韬又说："近来谈海外掌故者，当以徐松龛中丞之《瀛环志略》、魏默深司马之《海国图志》为嚆矢，后有作者，弗可及已……此二书者，各有所长，中丞以简胜，司马以博胜。"[3]

王韬指出这两本著作，在当时为最权威的海图，同时指出志略以简，图志以博擅胜，确是至理名言。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图志所用资料，网罗了当时所能利用的所有部分，并重视其历史上的变迁过程。他不仅仅考察了地名的由来，而且从该地区的历史变迁曲折，完成了贯通古今的地区史。不用说，他的考证方法，还是粗杂的，有的地方只是并列了一些史书，但是他从相互对照能了解到的、能到手的资料中，订正了历来史书中的错误，于此可以想见他要使各地区的地理和历史走向体系化的意图。这样一种规模宏大的地志是过去所未尝有的。仅此一点，他的功绩也是巨大的。

另一方面，志略所利用的资料有限，整个记载亦见简略。它不像图志那样详细。有关各地区的历史的考证，均予省略，最关心的

是现时的地区位置和称呼。不可否认，志略所作的确定地名和位置的工作，是很有价值的。

泰西人对两著的评论

1847年《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中记载了图志的出版。这本书指出，编辑图志的发起人是林则徐，并且记述他是一位完成了水利、救灾工作的有能力的行政长官。编辑图志的目的，在于讨论蛮夷(大谷敏夫注：指欧美列强)的战术能力与长处，以推进中国的适应力。关于东南亚部分，在图志中，有欧美人见所未见的批评，如果有人要想明了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着的结合，并且从中了解一些什么的话，那么读一读这一部分是有好处的。从整体来看，林则徐翻印过非常多的欧洲人的报告，但对东南亚群岛的位置，林则徐无正确认识。如果他获得同福建的普通航海员交谈的机会，那么也许不会发生东南亚名称的混淆。我们从林则徐所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知道，加里曼丹在六七世纪左右，就通过朝贡者与中国谈判，并且可以知道，历史事实证明，加里曼丹这个伟大的岛屿，文明相当发达。对于爪哇岛，林则徐在访问过这一美丽岛屿的同国人的帮助下，记下了相当多的奇妙事实。他对其他同样重要的各岛，则差不多未予记述。只对槟城(译者注：槟榔屿海港)、新加坡，正确地给予了重视。他对进入马来亚和其他种族中并和这些种族精诚团结，从事贸易，振兴产业的福建移民，加以夸赞。

以上是该报说明的概略。一眼可以看出，此报对图志的刊行评价相当高，认为对欧美人也有可资利用之处。事实上，《中国丛报》曾试把图志内有关日本岛的部分译成英文。在幕府末期来航日本的欧美人，可能是读了图志的英译文，才大体了解日本国的概要的。

其次，1851 年 4 月的《中国丛报》又就志略写了文章。这篇文章说，志略这部作品，正是(中华帝国)计划的产物，它成为给予(地理工作)正确指针的一个里程碑。它比中华帝国使高级官员和文人了解地球上其他国家的资源、计划、位置的任何一部出版物，要高明得多。我们希望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作者徐继畬，1844 年曾到过厦门，在那里会见雅裨理。雅裨理友好地谈到徐的情况，指出他是能够自由表达思想的人物。但是徐所绘制的地图，却决不能称之为正确的。

事实上，中国人在此以前，全然不通地理学。中国人的地方地图，就不用三角测量，仅仅依靠询问、推测制作。在这种愚昧的无知状态中，在教育上也是充满着偏见的环境中，徐继畬却试图描绘更正确的地图，这一点是应予注意的。他要求明了各国的大小，政治上的重要性，商业关系。要求把这些国家的位置正确地标定在地图上，特别重视研究英国、美国、法国。但是他在说明安南、缅甸时，则又仅仅根据中国人的著作。他侧重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朝贡关系，记述了英缅战争结果割地的经过，但对 1780 年中国军队败于缅甸军队则只字不提。次之，徐继畬就吕宋、失勒密士、苏禄、加里曼丹、爪哇、巴布亚、新加坡、苏门答腊等，作了相当的记述，从整体来看，虽有失实之处，将研究与传闻奇妙地混淆在一起，但却是相当正确的记载。此外，徐继畬一直认为，中国向这些地区的移民，对中国而言是一个相当大的利益源泉。但是移民中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把中国的言语、制度移植过去，也没有使自己的水平高于原居民的性格。毫无疑问，其理由之一，是因为移民中的任何人，都没有带去自己的家属。由于商业目的而移去的数千中国人，没有给予这个多岛海域的岛民以大的思想变化，他们没有做为数无几的伊斯兰教徒、佛教徒、传教士那种工作。

欧洲各国的地图部分，其形态及区域，相当正确。可以设想，这经雅裨理看过。但徐继畬并不关心正确制图，纬度线和经度线全都

没有画上去。在描绘这些国家的地图时，他侧重于与中国的关系。政治性的、军事性的、历史上的名称，记述的更多。

以上，是 1851 年 4 月《中国丛报》说明文的概略。于此也可以明了，徐继畬所绘制的地图，没有经纬线，由推测制作的部分较多，并非正确的地图。此点对了解已达到相当水平的欧美地图的评论家来说，是会引起不满的。但是这在当时的中国，则是最尖端、最正确的地图，关心洋务的中国人首先要搞到手的，也是志略上所绘的地图。志略继图志之后，传入幕府末期的日本，日本人用日文译注了志略，普及到一般人中间。如果说，幕府末期的日本的地理学，特别是有关东南洋的知识，是出于志略之赐，那也并非过甚其词。

附记：此文原载日本《鹿儿史学》杂志第 27 期，译文载湖南《求索》1985 年第五期，此次选编时作了技术处理。——编者

注释：

①② 《光绪嘉应州志》卷二十九。

③ 《弢园文录外编》卷九，《瀛环志略跋》。

●俞旦初

北京图书馆藏《瀛环志略》誊清修改稿本初考

徐继畬《瀛环志略》自序中称，其书的辑著工作是从 1843 年（道光二十三年）冬开始的。至 1844 年秋，不到一年时间，写成初稿，名《瀛环考略》，可能就是他所说的“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后来，“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先后“五阅寒暑，未尝一日辍”，到 1848 年秋才完稿付梓，定名《瀛环志略》，为初刻本。在短短的四年间，改稿竟达几十次，这在中国近代学者中并不多见。

《瀛环志略》的稿本，台湾文海出版社曾经先后以“清代稿本百种汇刊”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两种形式影印问世，流行海外。《瀛环考略》的稿本，徐继畬故乡山西省的学者发现当地后代藏有先后、详略不同的四种，即五台渠氏藏《瀛环考略》手稿；五台徐氏藏《瀛环考略》“第三草稿”、“欧罗巴”“松龛过目”誊稿、“校定已清”誊稿，分别保存于忻州市徐继畬学术研究会和五台县徐继畬纪念馆。最近，我因偶然机会在北京图书馆发现《瀛环志略》的第五种稿本。因其是在请人誊清的稿本上徐继畬又亲笔修改，姑且名之为“《瀛环志略》誊清修改稿”。从这个稿本中可以充分见到作者用功之勤和著作责任心之强，确实令人叹服。这里拟对它作一初步考证和介

绍，希望引起更多学者的注意和研究。

一

北京图书馆藏《瀛环志略》誊清修改稿本第二册（卷二）封三页，有墨笔行书题识云："此书系松龛（徐继畬字）先生所著，其图并字皆先生请（恐系"亲"之误笔）手所拓。鸿石（原写"徐府"，后圈改为"鸿石"）借吾家所藏先生之志略（当系刻本），后被火蚕蚀，于是府（似应为"徐府"）以先生之墨迹（指此稿本）返璧。吾先人又赠以青蚨（指钱）三串。吾藏之家塾，虽千金，不售焉。古人云，一字值千金，何况汪洋千言乎"。这题识说明稿本的部分来历。稿本原为鸿石家所藏。他家因借某学者所藏木刻本《瀛环志略》被火蚕蚀，无法归还，乃将他家所藏的这个稿本送给，作为赔偿。某学者先人因其稿本珍贵，超过刻本，遂又送钱三串，以表谢意。为此题识中涉及之人名，与徐氏家族有关，特致函山西忻州徐继畬学术研究会秘书长任复兴。他认真查对徐氏族谱并复示告知：鸿石为徐磐之字，其父徐继毂，字贻孙，系徐继畬堂弟，诰封奉政大夫、台湾府经略、盐提举，曾参与 1866 年（同治五年，丙寅）总理衙门重订刻本校字。徐磐系庠生，曾随徐继畬到平遥书院，掌管文书印章等。另据方闻编《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载，1873 年（同治十二年，癸酉）徐继畬卒后，"徐府中丞第忽有火灾，几焚及先生灵柩"。题识中所云"被火蚕蚀"，显然系由此次火灾造成，说明还手稿当在此之后不久。可惜题识未署名，未知何许人，其先人又是谁？有待进一步查考。

原来，题识者称，这个稿本"藏之家塾，虽千金不售。"可是，稿本第一册封三页左上角贴有一小条"北京市图书业同行公会印刷"的售书标签，标明：书名"瀛环志略"，册数"9"，版别"稿"，议价"100（元）"，议价者章"东四区议价组"，议价时间"57 年 6 月"，编号"收字第 326 号"。不知道此稿本是通过什么途径，从山西到了北京，最

后是从谁家脱手，到了东四区的古旧书店。1957年以后，终于为北京图书馆的有识者所收购，倒真可以说是“稿得其所”。此稿本誊清修改于1848年初刻本之前，距今已一百四十多年，其文献价值远远超过了当时“议价”的不知多少倍。值得欣慰的是，这个珍贵的稿本在北京图书馆作为一种善本，得到科学的保存、管理和爱护。而这是稿本作者徐继畲本人当时所想象不到的。

二

北京图书馆《瀛环志略》誊清修改稿本，在第一册（卷一）地图、正文之前，单独夹有彭蕴章、鹿泽长的序，以及陈庆偕的跋各一篇，均为誊清稿，署作于1848年（道光戊申，二十八年）。这二序一跋没有重新抄入稿本，也没有装订进稿本。其所用纸非稿本用白纸，而是旧时木刻直行方格纸，且各不相同。彭序用的是浅蓝方格，并刻署“食旧斋稿”。鹿序和陈跋用的是不同色泽的浅红方格。用纸篇幅均小于稿本。它们之间大小也不等。彭序最大，鹿序次之，陈跋最小。它们誊写的字迹都工整，但字体各不一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彭序最后署名之下，盖有彭本人的两枚红色篆字印章：一是“彭蕴章印”，二是“詠莪”（按彭蕴章，字琮达，又字咏莪。“詠”为“咏”的异体字）。综合以上各种情况可以认为，这二序一跋，是其作者各自分别送交徐继畲的原稿。经查对与后来刻本所刊的序和跋完全一致，不过彭序印章没有在刻本上得到反映。徐继畲自序，与陈庆偕跋同作于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秋八月”），而这里未见，可能是另存别处，且此稿本尚非最后定稿。未见刘韵珂序，显然是由于他作于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夏四月”），在《瀛环志略》1848年付梓过程中的第二年才写成交来的。

三

据我初步查考，北京图书馆藏《瀛环志略》誊清修改稿本曾经后人重新装订，而且有明显的误装者。

誊清修改稿本地图、正文所用白纸，质地细密，分装九册。其中有六册保存原封皮。原封皮浅褐色，质地亦细密，与 1848 年初刻本封皮纸相似。封皮上所题卷数与目录的格式不统一，与初刻本也不同，说明尚非定稿本，而且经过后人重新装订。“卷一”、“卷二”、“卷三”、“卷八、九、十”，均题于装订线右侧上方，“亚细亚”、“阿非利加、亚墨利加”则题于装订线左侧。卷二封皮误装到后加的“卷十亚墨利加”封皮之下。说明当时重新装订前曾发生散乱，而重新装订者又非内行。“卷四欧罗巴”缺原封皮，现封皮系后加，又未补题目录。“卷八、九、十”均题于一册封皮，实际上“卷十”另有一册，封皮系后加。“卷四”封皮不见，也是后加的。凡是后加封皮用纸与原封皮不同，虽亦系白纸，但质地比较粗松。惟独“卷五、”“卷六”、“卷七”这三卷(册)的原封皮题签均较规范，于左侧上方从上而下，分别题：瀛环志略卷五、卷六、卷七。右侧上方从右往左，分别题各卷篇名目录(国名)。据我分析，原封皮可能都是徐继畬的手迹，后加封皮则是后人所补题者。

在开始查考时发现，此稿本第一册，卷一，亚细亚，南洋滨海各国，最后一段按语，从“按南荒诸蛮部，安南、暹罗、缅甸，国势相当”，到“若谓因其贫瘠，不屑经营，则又不”为止，正是该页末尾，下页下文未见。查对刻本，实缺 12 行，279 字。刻本下文，连上文，乃是：“则又不然。安南最贫，然物产未必逊于诸番岛。(中略)市舶虽往，而埔头不设，殆为是耳”。当时我分析原稿不可能残，乃重新装订时所缺，也有可能误装到了别处。后来，经过反复查对，果然发现，此页缺文竟误装到了卷九“阿非利加”的最后一页。

四

据我统计，木刻本地图共40幅(以图名为单元。有的一个图名包括两幅图，也以一幅计)，而北京图书馆藏誊清修改稿本，则只有38幅，缺2图，即英吉利三岛总图、南亚墨利加巴西图，可能系后来修改稿或定稿所补加的。从卷一到卷六，即从第一幅“地球图”到第26幅“佛朗西图”的图名，稿本和刻本完全一致。而从卷七到卷十，即从第27幅“西班牙葡萄牙图”到第38幅“亚墨利加海湾群岛图”，则多数有改动，并有所补充。其中，稿本地图之一“北亚墨利加英吉利藩部图”的“藩”字，徐继畬亲笔圈改为“属”，后来的木刻已经照改。稿本地图名称，后来木刻本改动者有如:“西班牙葡萄牙图”改为“西班牙葡萄牙合图”，“英伦图”改为“英吉利英伦图”，“苏格兰图”改为“英吉利苏格兰图”，“阿尔兰图”改为“英吉利阿尔兰图”，“亚墨利加图”改为“南北亚墨利加总图”，“米利坚图”改为“米利坚合众国图”，“亚墨利加海湾群岛图”改为“南北亚墨利加海湾群岛图”。这些木刻上的改动，在这个稿本中，除“藩”改为“属”外，都没有得到反映。说明北图稿本之后还有其他的修改稿本。

五

北京图书馆藏《瀛环志略》誊清修改稿本的重要学术价值之一，是在这个稿本中，徐继畬采取多种形式亲笔修订，一丝不苟，充分反映了他辑著工作的责任心、认真精神和严谨态度。同时可以看出，这些修订并不是一次完成，而是经过反复多次。这正好具体证明了自序中所说的，在写出初稿后，“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的勤苦劳动的过程。而且，经过查对，这些修订的绝大多数，

在后来的木刻本中都是照改了的。这里，我从大量修订资料中归纳出十种形式，并举例以说明之。为节省篇幅，例不多举。

一、点改

点改，即是在拟改的字上加点，在字旁修改。有时一字之点改，意思就完全不同，其中必有讲究，需要具体资料的依据。

例如，卷三，“印度以西回部四国”，“阿剌伯”部分的按语，稿本原文“惟大月氏、罽宾、乌弋三国，为今何地，迄为定论”，在“迄为定论”的“为”字上加点，改作“无”。原“为”显系笔误。“今考妫水即阿母河，源分五六支”，在“五六”两字上加点，改为“十数”。“是其国在罽宾之东，条支之西北”，其中“东”字加点，改为“西”，“西”字加点，改为“东”。“在罽宾之东，乌弋之西”，“东”字加点，改为“南”，“南”字加点，改为“东”。

二、圈改

圈改，即在拟改的字上加圈，在字旁修改。

例如，卷十，“南亚墨利加各国”，“乌拉乖”部分开头一句。稿本原文“乌拉乖，在巴拉圭之南，东北界巴西，南距大西洋海，西界拉巴拉他，地域之广狭未详(地理备考云，长一千二百五十里，广一千三百里。而西洋人所刻地图，地乃三倍于巴拉圭。未知孰是。——本文作者说明：括弧内所录，原稿中为双行注文)，南方多冈阜，迤北坦阔。巴拉大、乌拉乖诸河交贯，田土肥饶，物产极丰”，经圈改(其中有三字为“字间插补”，详下)，改成“乌拉乖，在巴拉圭之南，东界巴西，南距大西洋海，西北两面界拉巴拉他，长一千二百里，广一千三百里，南方山阜纡蟠，北方则平原坦阔，内哥罗、塞波拉的、巴拉大、乌拉乖诸河交贯，田土肥饶，物产极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稿本的无数修订处，唯独这一处，徐继畬是用朱笔修订的。

三、涂改

涂改，即在拟改处用墨涂去，在字旁改写。也有的是用白色涂

料涂在字上，然后再在涂层上改写。但因历时过久，白色涂料与墨迹融化，显得模糊，难以认清。

例如，卷一，“南洋滨海各国”，“越南”部分正文，稿本原文“故地称曰广南，北界广东、广西、云南三省，西界暹罗，西南界真腊，东面大海，都城曰顺化，在富良江之南岸，衣冠仍唐宋之制”，其中“西南界真腊，东”六字一逗号用墨涂去，改作“东南”二字，结果成为“东南面大海”。

四、贴改

贴改，即在拟改处用原稿本白纸贴掉，然后在贴纸上改写。少的可以几个字，多的可以近一整页。因原稿本抄写比较宽松，而在同一纸面上要修订增补较多内容，使改写的字不能不十分紧凑、细密，但都非常严谨整齐。还有贴掉几行，而只改写几个字的情况。

例如，卷六，“荷兰国”最后按语部分，稿本原文：“余按芝龙本海中剧盗，所养皆亡命之徒，其权谲能得人死力，以此出奇制胜，理或有之。他书言火攻者纷纷，半皆钞袭故纸”。这里“余按”二字，实际上是在稿本上贴去三行，而在贴纸上改写者。“有之。他书”这四个字，也是贴改的。而“半皆钞袭故纸”这六字，则全被贴删（详见下）。

五、圈删

圈删，即在拟改的字上画圈，以示删去。

例如，卷十，“北亚墨利加南境各国”，最后一段按语，稿本原文“按欧罗巴至中国，道涂之纡远，阻于阿非利加，红海地中海之间，隔苏尔士旱路一百七十里，若能疏为海道，则水程减二万里。米利坚至中国，道涂之纡远，阻于巴拿马片土，若能疏为海道，则西行而抵中国之东，水程当减三万里”。这里的两个“能”字，都画圈删去。

六、涂删

涂删，即在拟改处用墨涂掉，以示删去。

例如，卷一，“南洋滨海各国”，最后一段按语，稿本原文“按南

荒诸蛮部。安南、暹罗、缅甸,国势相埒,真腊差小”。这里“真腊差小”四个字被墨涂去,尚隐约可见。又如,卷八,“阿非利加”,最后“阿非利加群岛”第二段,稿本原文“几罗阿岛、蒙非亚岛、奔巴岛、索哥德拉岛,在红海之外印度海中,广长二三百里不等,皆阿剌伯所属,产香料、象胆、朱砂”。本来在“朱砂”之后有双行注文,被墨涂去。

七、贴删

贴删,即在拟改处用原稿本纸贴掉,并在贴纸上画一墨线,以示上下相接。

例如,卷三,“西域各回部”,稿本原文“鞑鞑里者,游牧行国,无城郭室庐,欧罗巴人罕涉其地,故不详其部落之名。综其大势,东起葱岭,西抵里海”。在“里海”之下有双行小注,注文开头大约有七个字被贴掉。余下注文是“泰西人称为喀尔士毕安,一作加斯比约”。又如,稿本原文“哈萨克,回部之大者也”。原来在“哈萨克”之下有双行小注,亦被贴掉。

八、书眉贴条补文

书眉贴条补文,即在书眉贴原稿本用纸,上写拟增补内容,并于原文处的两字之间,作一撇一三角形的标志,说明贴条补文插入此处。

例如,卷八,“阿非利加”,“阿非利加中土”部分第二段,稿本原文“达尔夫(一作他弗——原为双行注,无括弧),在哥尔多番之西”,“居民皆回回,俗重农功,每岁国王率尊长躬耕,以劝农事,贸易颇盛”。在此处书眉贴一纸条,上书:“农事(此礼乃见于此地,亦异事也——原为双行小注,无括弧)贸易”,并于原文“农事”的“事”字下方作一标志。

九、字行间插补

字行间插补,即在字行间直接补字修改。

例如,卷十,“北亚墨利加南境各国”(稿本原为“三国”,后对

“三”字点改为“各”)，“墨西哥”部分，开头一段，“烟山自西北来”一句下边的双行注文，稿本原文最后一句“长约二万里”，在“万”与“里”之间补写了一个“余”字，结果改成“长约二万余里”。

又如，卷十，“南亚墨利加各国”，“乌拉乖”部分开头一段，稿本原文有句“西界拉巴拉他”，在“西”与“界”二字之间，插补“北两面”三字，结果改成“西北两面界拉巴拉他”。

十、就字改错

就字改错，即在错别字上直接改正。

例如，卷十，“北亚墨利加南境各国”，“墨西哥”按语部分，稿本原文“墨西哥自古建国，不同米利坚之獉狉”，把“獉”改为榛，结果改成“不同米利坚之榛狉”。

据我初步发现，这样就字改错的独此一处。

以上十种形式的修订和增补所举实例，在刻本中都得到反映。

六

当我开始把北京图书馆藏《瀛环志略》誊清修改稿本的大量修订处与刻本查对时，发现都完全一致，原以为很可能是最后的定稿本了。但是后来进行更多的查对，又发现刻本也有少量与稿本不一致的地方，使我逐渐认识到，北图这个稿本尚非最后定稿，肯定当时还有其他的刻本所根据的定稿本，下面举数例为证。

卷九，“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介绍华盛顿部分，稿本原文“由是血战八年，屡蹶屡奋，顿志气不衰，而英师老矣。佛郎西举倾国之师渡海，与顿夹攻英军，西班牙、荷兰亦举兵相助，英不能支，乃与顿盟”。这里的“举兵相助”四个字，后来在刻本上已改为“勒兵劝和”，意思完全相反。

卷五，“瑞士国”，最后一段按语，稿本原文“按瑞士地，西土之桃花源也，(中略)花旗人甘明者，尝游其地，极言其山水之奇秀，风

俗之淳古，余不禁悠然神往也”。最后一句“余不禁悠然神往也”，刻本改为“惜乎远在荒裔，无由渐以礼乐车书之雅化耳”。

卷三，“西域各回部”，稿本原文中有一大段为徐继畬亲手贴改，改文是：“世多以里海为雷翥海，误矣。按水经注称妫水入雷翥海，妫水即今之阿母河也。尝见泰西人地图，大二尺许，画阿母河极详细，由东南发源，支流从两岸汇入者十六道，行千余里，乃成独流，向西北行约二千里，又北折行约千里，入于咸海，将入咸海，先汇为小湖，由小湖北注，洲渚错杂，摹绘极细。然则妫水所入之雷翥海，其为咸海无疑矣”（下略）。后来在刻本中全都改了，改为“按葱岭以西之水，以雷翥海为尾闾，蜕罗跂禘诸水入焉。考之西洋人地图，葱岑岭西，惟印度河南流入大海，其余南北诸小河，下游汇为两大支，北为纳林，南为阿母，皆以咸海为归宿，则咸海之为雷翥海，似无可疑也”。

根据以上三例，即可充分说明，北京图书馆藏稿本不是最后定稿。但是，就目前已经发现的几种稿本来看，北图稿本是比较接近定稿的。这也是它的重要学术价值之一。

现据徐继畬研究会提供的资料，得知山西已发现有四种稿本，即“五台渠氏藏瀛环考略手稿”、“五台徐氏藏瀛环考略‘第三草稿’”、“五台徐氏藏瀛环考略‘松龛过目’誊稿”、“五台徐氏藏瀛环志略‘校定已清’誊稿”。这里，拟取其有关部分，与北图稿本和刻本作比较，以为证明。

例一：卷一。“东洋二国”，日本部分一段

1. 山西五台徐氏藏《瀛环考略》“校定已清”誊稿（其他三种稿均缺此内容）

“按日本，本称倭奴，恶其名之不雅，乃改今号。其国在大海之东，居近日出，故曰日本。地方数千里，为畿五：田山城，曰太和，曰河内，曰摄津，曰〇〇（本文作者注：原稿如此，说明当时徐继畬尚未得知），共统五十三郡。为道七：曰东海，统一百十六郡；曰南海，

统四十八郡;(中略)为岛三:曰伊岐,曰对马,曰多�江,各统二郡。地皆依水附屿。郡之大者,不过中国一村落”。

2. 北京图书馆藏《瀛环志略》誊清修改稿本

“顾亭林天下郡国利病书云,倭奴邻三韩而国,故名韩中倭。后自恶其名,更号日本,在东南大海中,依山岛而居,地方数千里,为畿五:曰山城,曰太和,曰河内,曰摄津,曰和泉,共统五十三郡。为道七:曰东海,统一百十六郡;为南海,统四十八郡;(中略)为岛三:曰伊岐,曰对马(原稿双行注文,无括弧:按海国闻见录称,日本平列三大岛,其迤北者名对马岛,而此所云对马岛,止统两郡。盖对马本北境小岛之名,后来遂以为北境总名,余尝见日本人所作广对马岛赋,仿选体,极瑰丽。自注云,岛小不足赋,故广言之,亦一证也),曰多褒,各统二郡。地皆依水附屿。郡之大者,不过中国一村落”。

3. 1848 年(道光戊申,二十八年)《瀛环志略》刻本

与北京图书馆藏稿本完全一致。

例二:卷三,“西域各回部”,布哈尔部分

1. 山西五台徐氏藏《瀛环考略》“校定已清”誊稿(其他三种稿均缺此内容)

“纳林河,泰西称西尔达里亚,发源葱岭,会北方诸水,西行千余里,入于咸海。咸海又名咸泽,又名死海,西域称达里冈阿泊,泰西称亚拉尔,南北约六七百里,东西约百余里。水咸凝结成盐,不通大海,故名死海。咸海之西四五百里,有大泽曰里海,又名北高海。泰西人称喀尔士毕安,一作加斯比约,即水经注之雷翥海,南北约二千余里,东西约四五百里,所受者西北诸国之水,汪洋似海,而不通大海,故名里海。其东岸为西域回部极西之境,逾里海而西,即峨罗斯东南境,与波斯西北境,毗连大西洋诸国矣。世多误以咸海为里海,不知两海虽近而绝不相通也。”

2. 北京图书馆《瀛环志略》誊清修改稿本

“纳林河,泰西称西尔达里亚,发源葱岭,会北方诸水,西行二

千余里，入于咸海之北。咸海又名死海，西域称达里冈阿泊，泰西称亚拉尔，南北约六七百里，东西约二三百里，水咸凝结成盐，不通大海，故名死海，咸海之西约千里，有大泽曰里海，泰西人称喀尔士毕安，一作加斯比约，南北约三千余里，东西约千里，所受者西北诸国之水，汪洋似海而不通大海，故名里海。其东岸为西域回部极西之境，逾里海而西，即峨罗斯东南境，与波斯西北境。世多以里海为雷翥海，误矣。”

3.1848年（道光戊申，二十八年）《瀛环志略》刻本

与北京图书馆藏稿本完全一致。

例三：卷五，“瑞士国”最后按语前的两段以及按语

1.山西五台徐氏藏《瀛环考略》“松龛过目”誊稿（其他三种稿均缺此内容）

“〇北耳尼，邑之大者，贵人殷户，半居于此。〇巴悉，与日耳曼接壤，古有文学院，名最著，文儒所萃，能宣布耶稣教旨。

“按：瑞士地，西土之桃花源也。惩硕鼠之贪残，而泥封告绝，主伯亚旅，自成卧治，王侯各拥强兵，熟视而无如何，亦竟置之度外，岂不异哉。花旗人甘明者，尝游其地，极言其山水之奇丽，风俗之淳古，余不禁悠然神往也。”

2.北京图书馆藏《瀛环志略》誊清修改稿本

“曰内巴拉，在西方，本属普鲁士，割附于瑞，长七十里，广约三四十里，户口五万二千五百，应出壮丁八百八十，乡官二百七十八人。

“苏克，在腹地，长五十里，广三十里，户口一万四千，应出壮丁二百五十，自推乡官理事。

“按：瑞士地，西土之桃花源也，惩硕鼠之贪残，而泥封告绝，主伯亚旅，自成卧治，王侯各拥强兵，熟视而无如何，亦竟置之度外，岂不异哉。花旗人甘明者，尝游其地，极言其山水之奇秀，风俗之淳古，余不禁悠然神往也。”

3.1848 年(道光戊申，二十八年)《瀛环志略》刻本

山西稿本："山水之奇丽"。北图稿本和木刻本均为"山水之奇秀"。"余不禁悠然神往也"，北图稿本未改，1848 年刻本改为，"惜乎远在荒裔，无由渐以礼乐车书之雅化耳"。

例四：卷六，"土耳其国"，开头一段

1. 山西五台徐氏藏《瀛环考略》欧罗巴"松龛过目"誊稿(其他三种稿均缺此内容)

"土耳其(双行注文：土耳叽○都尔基○多尔其○都鲁机○特尔济○杜尔格)，回部大国也，地分西中东三土，西土在欧罗巴界内，中土东土，在亚细亚界内，三土合计，纵横约四五千里，古时皆罗马东境(双行注：即大秦国)(下略)。"

2. 北京图书馆藏《瀛环志略》誊清修改稿本

"土耳其(双行注文：土耳叽○土耳基亚○都耳基○多尔其○都鲁机○特尔济○杜尔格○控噶尔○痾多买诺○阿多曼)，回部大国也，地分西中东三土，西土在欧罗巴界内，中土东土，在亚细亚界内，三土合计，纵横约四五千里，古时皆罗马东境(双行注文：即大秦国)(下略)。"

3.1848 年(道光戊申，28 年)《瀛环志略》刻本

与北京图书馆藏稿本完全一致。

另据任复兴所作"《瀛环志略》若干稿本比较表"，它们残缺篇幅差别很大。刻本全稿大约 15 万字，其中渠氏藏手稿约只全稿的 1/16；徐氏藏"第三草稿"最少，只有全稿的 1/44；徐氏藏"松龛过目稿"约只全稿的 1/7；最多的徐氏藏"校定已清"稿也只全稿的 1/2 强。而北京图书馆藏的誊清修改稿，则是基本上完整的全稿。这又是它的重要学术价值之一。

(作者俞旦初，1928—199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任复兴

《瀛环志略》若干稿本初探

徐继畬在戊申版《瀛环志略》自序中提到，他辑撰此书曾五阅寒暑，数十易稿。历经沧桑，这些稿本多已散亡。可喜的是近几年海峡两岸陆续发现两种全稿和若干残稿，约30万字。大陆发现的均出自徐氏原籍山西省五台县。这为人们了解中国历史巨大转折时期志略这部重要著作的形成过程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这些稿本究竟有哪几种？笔者不揣固陋，据识见所及，罗列如下。

一、台湾影印《瀛环考略》甲辰手稿。全稿。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列入“清代稿本百种汇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中。全二卷一册，有地图28幅，前有“甲辰秋七月山右徐继畬识”一篇，正文有138页，22节，201段，1562行，28017字。正文皆为颜体行书。封面及内文有“继畬之印”、“海运楼藏”等印记23方。封面的题签为：“瀛环考略”。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稿本。简称甲辰稿。

二、五台渠氏藏《瀛环考略》手稿。残稿。1989年笔者从徐门弟子、五台东冶渠纶阁翰林曾孙渠鸿经家中发现剪贴在麻纸上的徐氏手书《瀛环考略》60页。封面题签为《中丞徐松龛先生稿本》，并题识：“守愚草堂谨藏，伯伦题志”（按，鸿经父亲名子和，字伯伦，守愚草堂为其堂号）。此稿内文亦是颜体行书，只有“意大里亚列国”、“阿非利加”两节。前者由甲辰稿“意大里亚”一节的4页、4段、768字，增加到30页、8段、4415字；后者由甲辰稿“亚非利加”一节的

5 页,5 段、855 字,增加到 30 页,22 段、5073 字。简称渠藏稿。

三、五台徐氏藏《瀛环考略》第三稿。残稿。1984 年五台县东冶镇徐尚文(继畬族弟、嗣子树父亲继壎的五世孙)献给县里徐继畬手稿多种,其中有考略稿本若干种 492 页,这便是其中之一。只有"印度以西回部四国"一节 18 页。前 9 页为继畬写颜体行书,与渠藏稿稿纸相同,每页均写 7 行。后 9 页为欧体小楷,书手誊清后经继畬修改。甲辰稿"印度以西各回部"有 11 段、1404 字,介绍从阿拉伯到西域、东土耳其广大地区。此稿只记札布(布哈尔)、阿富汗、俾露芝、波斯,即有 8 段、5478 字。封底有尚文父亲培伦题识:"此系瀛环第三次草稿,殊不易见,余得之三爷之家……"这是否与渠藏稿同为一稿尚难确定,姑简称为第三稿。

四、五台徐氏藏《瀛环考略》松龛过目稿。残稿。出处同上。合装为一册,封面有著者题签:"瀛环考略第三册,欧罗巴上"。内文有欧罗巴、峨罗斯国等 10 节,分装六小册,分别标着序号是"第十一"至"第十六"。序号下均盖有"松龛过目"印记。内文 98 页,77 段,21455 字。(甲辰稿对应章节只有 25 页,39 段,4904 字。)均为欧体小楷誊清,出自两名书手,由著者修改。简称过目稿。

五、五台徐氏藏《瀛环考略》校定誊清稿。残稿。出处同上。仅有 19 节,可能缺 16 节。第一册"地球全图说"、第八册"西域各回部"封面右上角,著者分别标有"校定"二字。第二册"亚细亚"(内含"皇清一统舆地全图")、第四册"南洋滨海各国"封面右上角,分别标有"校定已清"四字。另 13 节没有封面,但字体、篇幅、修改程度都与前二者相似。这些稿本除东洋二国用欧体小楷书写,阿非利加和印西四国前半用柳体小楷书写外,均用颜体小楷书写。共有 366 页(约缺 3 页),272 段,79407 字(约缺 800 字)。篇幅与戊申版大体相当。简称校定稿。

六、北京图书馆藏《瀛环志略》誊清修改稿。全稿。1991 年 5 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俞旦初研究员从北图新馆发现。共 9 册,有地

图 38 幅(缺英吉利三岛总图、南亚墨利加巴西图),正文近 15 万字。第一册夹有彭蕴章、鹿泽长的序,以及陈庆偕的跋各一篇,均可能是原作者的誊清稿。卷五、卷六、卷七封面题签似出自著者之手。例如卷六封面为:“瀛环志略卷六,土耳其,希腊,意大里亚列国,荷兰,比利时”。这是迄今所见稿本中最早出现“瀛环志略”的书名。据俞旦初考证,此稿的日本、西域各回部、土耳其等节后于校定稿,但也不是最后一稿。简称北图稿。

以上两种全稿、4 种残稿近 30 万字,与“稿凡数十易”相比,只是很少一部分。雪泥鸿爪,也能约略探知徐氏的著述过程。据笔者粗略统计,前 5 种稿本正文 680 页,143845 字,窜改增补达 1907 处。这些修改,既体现出徐氏撰述态度之严谨,也体现出他在五年之中思想认识发展变化的微妙曲折。《山西献征》谓:“先生久官闽,且究时务,了然于世界大势,得其要领”。笔者拟通过 6 种稿本及戊申版的比较,追寻徐氏当年的心路规迹,看看他是如何了解并阐述当时世界的文化、经济、政治大势的。

对华夷观念的突破与妥协

鸦片战争的大炮,打破了大清帝国君臣“天朝上国”、“世界中央之国”的迷梦。当此之时,是执迷不悟,继续沉溺于“华夷之辨”的蒙昧状态而不能自拔,还是把中国置于世界民族之林适当位置,向多元世界的近代观念靠近。这是当时中国近代化尤其是外交近代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思想认识问题。

徐氏在办理通商和著述实践中,逐渐使自己的敌忾之情平息下来,冷静地观察外部世界,从而顿改旧观,突破华夷之辨的藩篱。这在当时士大夫中是罕有其匹的。志略各种稿本留下这种思想转变的宝贵记录。

一、地球上强国如林,呈现“齐秦晋楚,相为匹敌”的争雄局面。

换言之，世界乃是多元的世界，并非以中国或某一国为中心的一元世界。

在鸦片战争前，大清帝国君臣陶醉于天朝的一统天下。正所谓"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强，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来王"（圣武纪序）。鸦片战争的败局，使人们认识到在大清及其附属国体系之外还有个强大的英夷，公然敢向天朝上国挑战并战而胜之。

徐氏深入了解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状后进而发现，英国也不是一贯称雄泰西。世界各国是此一时，彼一时，一物降一物。法兰西、美利坚先后战胜过英国，就连小小的丹麦也曾一再占据英伦三岛。"今西土论国势者，英吉利第一，佛郎西第二，峨罗斯第三，奥地利第四"（过目稿"奥地利亚国"页 9）。欧罗巴诸国逐鹿海隅，"比权量力，不过齐秦晋楚，相为匹敌已耳"（过目稿峨罗斯国页 14）。扩大到四大洲，则呈现更为复杂的局势。不是简单的黑白对垒，而是七色棋子争雄六合。中国不过是世界百余个国家之一。

二、对世界各个古国、各种文明源流的考察，对中源西流的否定，即对世界古代文明是多元发生的领悟。

甲辰稿对各国上古历史记载很少。渠藏稿中，则较详细地记载了古罗马、古埃及的历史，及基督教的源流。但未提及迦太基和腓尼基。第三稿波斯国一节，分为正传和别传两个自然段。顶格的正传有 34 行 748 字，低一格的别传——"泰西人纪波斯古事"则有 61 行 1280 字，篇幅几乎是正传二倍，可见其对古波斯的重视。

戊申版"凡例"中说明了有关缘由：

> 日本、越南、暹罗、缅甸诸国，历代史籍言之綦详，今止就其现在国势土俗立传，而略附其沿革于后。至欧罗巴、阿非利加、亚墨利加诸国，从前不见史籍，今皆溯其立国之始以至今日。其古时名国如巴庇伦（今土耳其东土）、波斯（即今波斯）、希腊（今土耳其西土）、犹太（即拂菻，今土耳其东土）、罗马（即大秦，今意大里亚列国）、厄日多（即麦西，在阿非利加北境）、

非尼西亚(即加尔达额,在阿非利加北境)之类,皆别为一传,附于今本国之后,庶几界划分明,不涉牵混。

除正传追溯各国历史沿革外,凡例所列7个古时名国的别传占了很大篇幅,在戊申版分别是:1042字;1375字;2609字;1079字;2919字;676字;1272字;共10972字,占全书十四分之一。

著者认真探讨了古时名国的兴起过程和文明产生过程。据泰西人记载,认为虞舜六载,有个叫凝吻的就在两河流域立国,叫做巴庇伦,"是为西土第一国"(6:12b)。夏后氏之初,北非初立的国家叫做厄日多。夏后少康年间,希腊北境也有了国家。有夏帝芒之世,亚伯拉罕从两河流域迁到迦南,犹太国开始兴起。夏后不降时,波斯已开始入侵厄日多。有夏中叶,非尼西亚崛起于地中海南岸。周幽王年间,罗慕路建城于罗马。这样,域外古时名国,就这样相对独立又互相影响地发展起来。

戊申版追溯各古时名国制度文物互相影响的源流时说到,麦西立国在有夏之初,"时欧罗、阿非两土,草昧未开,麦西独显,西土之制度文物,皆其所创"(8:4a)。并认为埃及成为欧洲开风教之始有两个原因,一是尼罗河两岸的沃壤,二是与阿拉伯、犹太接壤,东方夷族上古时就能迁徙到这里,大约指受古巴庇伦的影响。但在记古巴庇伦时则未提及受东方的影响。可见他是把古巴庇伦作为域外文明最早的源头。

值得注意的是,过目稿中并不这样认识,而是把中国作为世界文明最早中心,并间接影响到欧洲。在过目稿希腊正传后边,紧接着有段按语:

按希腊为大西洋立国之祖。桔木从迦南来,始教土人以稼穑,创宫室,造舟车,习文字,时在商之中叶。前此固榛狉如鸟兽也。迦南即犹太地,在亚细亚之西界。迦南风教之开,由于西域。西域由于中国。盖自中古数圣人,创制以前民用,至唐虞而东渐西被,声教暨乎流沙之外矣(希腊国页4)。

这是后来盛行的中源西流说的较为典型的表述。也许觉得其说牵强，戊申版把这段按语一字不留地删掉了。表明作者对世界文明是多元发生的，已有了一定的领悟。中国不仅在近代不是世界文明的唯一中心，而且在古代也不是世界文明唯一中心。如果有了这样的认识，就将从根本上否定华夷之辨的虚妄谬说。徐氏 10972 字的泰西纪七国古事，大概是有深意的。

著者十分注意宗教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甲辰稿意大理亚图说中，就用一半篇幅论述了天主教。在记犹太人时特别说到“西洋人所尊奉之耶稣生于此地”。过目稿土耳其篇，记载摩西从麦西返回迦南，示十戒以训民，“是为西土立教之始”。戊申版用 2383 字篇幅，在有关篇目中记述了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以及域外古代火神教等原始宗教，以及相互关系。著者肯定了宗教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进步作用，已能够尊重世界其他民族的价值标准，同时也对因教派纠纷引起的战争，以及近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表示担忧：“周孔之化，无由宣之重译，彼土聪明特达之人，起而训俗劝善，其用意亦无恶于天下，顾不必操儒者之绳墨而议其后也”(校定稿“印度以西回部四国”页 29，戊申版此段最后 14 字改为“特欲行其教于中华，未免不知分量”)。“余谓耶稣之立教，以救世也，乃诸国以分教之故，而残杀不已，耶稣而有知也，其谓之何？”(渠藏稿“意大里亚列国”页 30；戊申版 6:14a)

三、虚心体察各个国家民族、各色人种的长处。

日本人立法严，俗倘洁(甲辰稿页 33)。欧罗巴人性情缜密，善于运思，长于制器，金木之工，精巧不可思议，运用水火，尤为奇妙(甲辰稿页 109)。就连最可哀悯的非洲黑人也有可取之处：“愿而驯，得坤土之柔顺”(渠藏稿页 30)。海湾群岛的黑奴还敢于反抗佛郎西人的暴虐统治：“一闻内变，操戈并起，万户聚歼，不遗噍类。语云，蜂虿有毒，信哉！”(校定稿南北亚墨利加海湾群岛页 6)

四、密切关注各国文明的近代发展。

在详记西方战舰、轮船、枪炮的同时，对西方的大学（书院）、医院、专科学校（繁术院）以及残疾人学校都很留心。“佛郎西颇重读书，学优者超擢为美官”（校定稿佛郎西页16）。尤其通过与雅裨理、李太郭、阿礼国等有渊博世界知识和学术专长的西方人接触，对西方成功的教育制度留下深刻印象。与文明程度相联系的风俗习惯也在视野之内：“英吉利之俗，男女婚配皆自择定……男女皆分父母之产。”“英俗宾主相见，以脱帽为恭，各伸右手相握为礼。除跪拜天帝救世主外，见君王亦无叩头之礼。尊卑杂坐，无上下左右之分。”（校定稿英吉利国页33）显然他对这种体现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风俗持欣赏态度。

五、突破与妥协。

基于诸如此类的认识，徐氏已开始较自觉地清理自身的华夷观念的病毒，具有了一定的近代国际关系观念和世界秩序观。在甲辰稿中常常出现的“夷”字，以后各稿要么被删去，要么改换别的字眼。“夷目李太郭”（甲辰稿页143）改为“英官李太郭”（过目稿土耳其页13）。“山之尽头，夷谓之岋”（甲辰稿页26），改为“山之尽头，番谓之岋”（校定稿地球全图说页7）。甲辰稿英吉利图说仅2429字，就有21个“夷”字；校定稿英吉利国达7819字，却不见一个“夷”字。

然而，华夷观念不仅是一种虚骄的心理满足，而且“事关国体”，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徐氏作为一个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学者，岂能不知其中的利害。他称为“畏友”的著名地理学家张穆，在看了志略初刻前三卷后也就此向他发出忠告：

> 读大著《瀛环志略》前三卷，考据之精，文词之美，允为海国破荒之作……再就肤末之事而言，本朝舆图必应挪居亚细亚图之上，尊说不必更动即已吻合。春秋之例，最严内外之词。执事以控驭华夷大臣而谈海外异闻，不妨以彼国信史姑作共和存疑之论，进退抑扬之际，尤宜慎权语助，以示区别。至周孔

之教不宜重译，正如心之精神不淆于脏腑，倘有邪气攻心，则卢扁为之色变。前明徐李，止因未洞此义，遂尔负谤至今。

徐氏不得不在这些“著述大体”上多加小心，只好自损学术价值，与华夷内外的春秋大义求得妥协。将各种稿本与戊申版对照，即可略探这种痛苦的扭曲。

校定稿中，“皇清一统舆地全图”一节仍装订在第二册“亚细亚”中，并且排在“亚细亚”一节之后，戊申版有关的文字、地图却一齐来个颠倒，将皇清“挪居”亚细亚之上。过目稿、校定稿峨罗斯正传第一页均称之为“宇内第一大国也”，戊申版则改为“外夷第一大国也”(4：17a)，以避免把它和皇清比较。同时尽量表明中国是世界主宰，甲辰稿至校定稿一直保持着“亚细亚以中国为主”的提法，戊申版则推而广之，声称“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1：11a)。

在“慎权语助”方面也费了一番心思。过目稿至北图稿均为“瑞士地，西土之桃花源也……余不禁悠然神往也”。控驭华夷大臣却要神游蛮夷之邦，太失身份！戊申版改为“瑞士，西土之桃花源也，……惜乎远在荒裔，无由渐以礼乐车书之雅化耳”(5：31b)。

然而妥协毕竟有限。著者这种处心积虑的修改和掩饰，恰恰反证出志略从总体和实质上，已是一部摆脱华夷观念的书。况且在政治风险和学术良知二者之间，著者常选择后者。对“一统”、“王气”、“方兴未艾”等可致杀身之祸的字眼，竟然未加改动。难怪甫经付梓，即腾谤议。守旧人物“操儒者之绳墨而议其后”。李慈铭在日记中评图志是“魏氏此书，体大思精，真奇书也”。评徐氏及其志略则曰：“……轻信夷书，动涉铺张扬厉。泰西诸夷酋，皆加以雄武贤明之目，佛英两国，后先令辟，辉耀简编，几如圣贤之君六七作。又如曰共主，曰周京，曰宸居，曰王气，曰太平，曰京师。且动以三代亳岐雒邑为比……似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越缦堂读书记页480—482)。史策先也认为：“……立论多有不得体处。如谓英吉利为欧罗巴强大之国，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

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朘削其精华而日用之。又谓荷兰诸国,在英吉利肘腋,卧榻之旁,他人鼾睡,势难久存。此等语,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予初见此书,即拟上章劾之。"(转引自《近代史资料》1980第二期)

当时清议如此,岂止徐氏一人的不幸。更可叹的是一些被后人称为开眼看世界的先觉也持相似态度。道光三十年林则徐在南昌小住期间,其门下士沈衍庆送上二十二年所作《上大府请罢英夷和议书》,大发华夷之辨的高论,认为"今督抚之尊不止古大国诸候,竟下与犬羊之逆用平行礼……此断断不可者又其一也"。林氏阅后复信:"陈义正大,论事明切……此文垂之久远自有定论。"不久回福州后即向徐氏发难,形成乌石山事件。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纪其事:"用广东巡抚黄恩彤言,开各省天主教之禁……而福州乌石山之人,直踞省会腹心,俯瞰全城。总督刘韵珂、巡抚徐泽醇(原文如此),束手惟命……闽省士民愤怨,时林则徐家居,尤为闽大吏所忌。"(民国二十五年世界书局版,页335。也有学者说《圣武记》中《道光洋艘征抚记》非魏氏所作)

与徐氏持相近见解者,不过少数办通商的同僚。先觉是孤独的,信然。

卓然不群的海洋意识
迎拒参半的求通思想

以15世纪末哥伦布首航美洲大陆等地理大发现为契机,在三个半世纪的漫长历程中,欧美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产业革命的进行和完成,18世纪末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建立与成长,19世纪中叶中国、日本大门的相继被打开,美国用暴力对加利福尼亚的兼并,使资本主义统一的世界市场基本形成,而海洋在这一市场中起着

特殊的作用，一个完整的全球海洋贸易网也逐步形成。徐氏的志略正完成于这一世界市场形成的最后阶段。由于他在东南沿海履行有关职责，“春江水暖鸭先知”，志略各种稿本对这种世界经济大势的变化及时作了分析。

一、欧洲海洋国家与中国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别，致富手段和立国之本的截然不同。

立足欧亚大陆东端的大陆—海岸型国家的这位学者，以失败者身份惊奇审视欧亚大陆西端的国度，发现与东亚大陆等大部分土地距海遥远不同，西欧呈现陆海交错的格局：“其地形则平土之中容蓄沧海数千里，回环吞吐亦与他壤迥别”（甲辰稿，页 109）。

陆海结构的巨大差别，也为亚欧大陆东西两端居民提供了不同的海运条件和不同的谋生手段。与中国大陆农耕自守、以田赋为主要财政来源不同的是：“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因其善于操舟，亦因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力而为之也。”（甲辰稿，页 116）这样，一国一地的强弱、贫富就不在于幅员的大小，耕地的肥瘠，而在航运事业、制海权和埔头。波罗的海口的丹麦“以区区之地，乘形便而扼全海之喉，遂翘然为一方之杰，乃知国之强弱，固不在乎疆宇之广狭也”（甲辰稿，页 137）。“欧罗巴诸国皆好航海立埔头，远者或数万里，非徒勤远略也，彼以商贾为本计，得一埔头则擅其利权而归于我。荷兰尤专务此，故以蕞尔小国，而称富强于西土。”（甲辰稿，页 161）

二、对全球完整的海洋贸易网和统一的世界市场形成的敏锐觉察，“天地之气，忽尔旁推交通，混为一体”的生动概括。

徐氏考察了世界海陆交通史，追溯到古代腓尼基人建立的地中海贸易网。在甲辰稿欧洲部分，在欧罗巴总说后，单列一篇欧罗巴地中海图说，称它是“宇宙之一奇”，足见对海洋的重视。渠藏稿非洲部分，尚不见关于腓尼基、迦太基的记载，校定稿则将其作为

世界交通的源头："非尼西亚，古商贾之国。自夏以前，西土之人老死不相往来。有夏中叶，智者始创舟车，贸迁有无，居积财货，以此致富。西土名其人曰非尼西亚，译言客商也。始居于巴黎斯的纳海滨……有迁于地中海南岸者……定都城于土罗（即今突尼斯地），更国名曰加尔达额……益治舟楫，流通百货，地中海南北两岸利权，大半归其掌握。复跨海辟西班牙，建为藩部，国富兵强，一时无抗颜行者"。

对哥仑布以来的世界交通，著者更细加考求。甲辰稿多处提到美洲的发现。"墨西哥，前明中叶，西班牙航海探得之"（页 174）。校定稿更具体："前明宏治年间，西班牙之臣有可仑者（一作阁龙，又作个仑，又作哥仑波），驾巨舰西寻新地，始抵加勒海湾群岛，知有亚墨利加广土，先取哥仑比亚。正德十四年，西班牙人哥尔德斯探闻墨西哥富饶，率兵攻之。"（亚墨利加页 2）

著者对欧州国家这种富有冒险精神的海上殖民活动主要持肯定的态度："欧罗巴人极意搜求，得片土即经营垦拓，遂使万古穷荒之辟岛无不献之精华，其能事曷可少哉？"（10：25a）甲辰稿还有一段按语，既肯定这种进步作用，也对此表示担忧，并且把世界市场的形成概括为"天地之气，混为一体"，可惜后被删去。今节录如次：

> 按亚墨利加南北二土，地极广大，自开辟以来未通别土……欧罗巴人航海探得之，诛莱播谷，遂成沃壤。今米利坚一国，名都大邑相望，居然海外富盛之邦。天地之气，忽尔旁推交通，混为一体，倘一运会使然耶？然天下从此多事矣。（页 203）

欧罗巴总说在甲辰稿以后各稿中，在记中西交通史后都有"天地之气，由西北而通于东南，亦运会使然也"的论断。魏源后来在图志百卷本中，也化用了这一说法。而在欧亚大陆另一端，两位哲人 1845—1846 年的分析更深刻："大工业使竞争普遍化了……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

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马恩选集卷1页67）

三，通则富，通则强，企盼国人走向海洋，走向世界，与列国争雄比胜，创造海外之奇。

世界各国之间和平的以至战争形式的经济、文化交流，都会给各民族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火炮之法创于中国，欧罗巴人不习也……元驸马帖木儿王撒马儿罕威行西域，欧罗巴人有投部下为兵弁者，携火药炮位以归，诸国讲求练习，尽得其妙。又变通其法，创为鸟枪，用以攻敌，百战百胜。以巨舰涉海巡行，西辟亚墨利加全土，东得印度南洋诸岛国，声势遂纵横于四海。”（校定欧罗巴页2）

这种交流，对中国也是利害兼而有之。“中国之布，从前皆以麻织。自元太祖征印度，乃得棉花之种。流传中土，至今衣被九州，功驾桑麻之上，其利溥矣。乃鸦片之毒，亦出于此。”（3:19）吃饭穿衣，在人口众多的中国乃是关系治乱的天大问题。“台湾未开以前，吕宋之米，时时接济闽中。近厦门通市，吕宋之米复至，较之珍奇玩好，其为利益也大矣。”（甲辰稿，页49，戊申版2:7）

著者不仅赞许西欧海洋国家航海贸迁，不辞险远的精神，也赞许彼得大帝“以峨人不善驶船，变姓名走荷兰，投舟师为弟子，尽得其术乃归，治舟师与瑞典战，胜之”，“开通海口”（过目稿峨罗斯页2）。并希望国人也参加与这种海上竞争。荷兰等开发南洋的活动，给华人带来机会。明代以后，闽广之民不顾政府厉禁，成千上万到南洋谋生。著者对这种并未得到政府支持的冒险精神十分关注，甲辰稿一再提起。戊申版进而希望这种自发活动得到组织领导，从而在别人占据的地盘上投下一粒好棋。广东嘉应州数万人到婆罗州息力大山开矿，著者不胜企冀地写道：“倘有虬髯其人者，创定而垦拓之，亦海外之一奇欤？”（2:14）

大陆—海岸型与外界隔绝的状况，农耕为主的自给自足经济，

加上华夷内外的陈腐观念，使中国士大夫成为过分内向的群体。徐氏这种浓厚的海洋意识，面向世界，向外开拓进取的观念就特别难得，而且也是一贯的。1847 年福建有个无名小青年林针附乘洋船越过太平洋，到美国工作一年多，回乡后作诗集《西海纪游草》，徐继畬同治四年题记云："鹭岛十二峰之外，鹏程九万里而遥。"1866年，斌椿父子率同文馆学生一行 5 人，随赫德赴泰西游历 15 国，归来有《乘槎笔记》和《海国胜游草》。当时各国使臣希望中国重臣游历西土，"顾华人入海舶，总苦眩晕，无敢应者"。徐氏对"斌君友松，年已周甲，独慨然愿往"十分赞许(乘槎笔记序)。

徐氏对"多事"的世界，"混为一体"的市场和全球海洋贸易网络中，到底谁是主宰一定十分清楚。当时这种海洋贸易网络带有强烈的时代性和阶级性，是自由资本主义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的网络。中国在这网络中只是消极的被辐射、被剥削的角色。而且和平通商随时可能转为军事对抗。"舟楫之利，固为彼之所独也"(甲辰稿页 99)，那么，畅通无阻的海上通道并非国人之福。于是，他对通市持迎拒参半态度。既然天朝的水师无能为力，只好希望天然阻隔能缓冲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力。甲辰稿多次提到苏伊士、巴拿马两个地峡，及欧美谋凿地峡的计划。校定稿仍忧心忡忡地说："西土之人，谋疏凿者非一日矣。然开河道易，开海道难，且两地之限隔，天地之所以界画东西也，今欲以人力凿之，不亦慎乎？"(北亚墨利加南境三国页 11)

对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的推崇和民主政治思想的阐释

徐继畬有坚定的儒家政治思想，又对当时清朝祚运将衰、吏治腐败、上下壅蔽而深为忧虑。考察域外各国，自然把政治得失置于

重要位置。

甲辰稿在这方面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在米利坚一篇用 2 段 346 字，记载华盛顿战胜英国之后，销兵罢战，确立民主政体。这段热情洋溢的记述，立论基础是儒家《礼记·礼运》的大同、小康学说："兀兴腾既得米利坚之地，与众议曰：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择有德者为之。"这种说法，隐含着对中国五帝之后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大人世及以为礼的小康之世的历史性批判。并记述华盛顿率先垂范，实行任期制，选举制，还描述了选举投票方法。言辞之间，谓其符合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举能的儒家理想境界大同之世。

接着加了 97 字的按语，高度推崇华盛顿"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骎骎乎三代之遗意"。这段按语一字未增地保持到戊申版，只是将"兀兴腾"三字改为"华盛顿"。这是近代中国热情记述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并试图用儒家政治思想来阐释西方近代民主政治思想的最早记录。1847 年徐氏给张穆信中自谦地说："海图前稿舛陋不足观，数年来于泰西人所刻杂书，得即摘录"（方闻复印《徐松龛先生杂书集锦》页 58）。表明甲辰稿或与其时间相近的稿子在 1844 年或以后一二年即在张穆等学者、朋友中传阅。甲辰稿可算是近代中国人引进西方简单的民主政治思想的标志。"天下为公"四字，在一周甲以后成了孙中山等革命者反对清廷封建专制统治的旗帜。

对米利坚的记述从甲辰稿的 1594 字，扩展到校定稿的约 10546 字，戊申版的 10532 字，对其政体认识逐步具体深化。校定稿纪美国两院说："每二年于四万七千七百人之中，选才识出众者一人，居于京城，参议国政，如会盟战守，通商税饷之类。以六年为秩满"（校定稿北亚墨利加米坚国页 43）。这与当时中国乾纲独断，政治不通，上下壅蔽形成鲜明对比。米利坚一篇的校定稿和戊申版基本相同，可惜佚篇末最后 1 页约 48 字，是关于美国政体的按语

后半部。戊申版这段按语是:“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9:34b—35b)一个幅员之大与中国相仿的国度竟然实行民主政治,将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的政治局面。这种一唱三叹的评论,对此后的中国影响颇大。著者还注意到政治体制不能简单地仿效和移植,并认为立国创始人在奠定国家长治久安基础方面有重要作用:“墨西哥拥土自擅全效米利坚,而治忽殊途,显晦异辙,则无华盛顿其人以为之渠也。立国规模,固全在乎创始之人哉!”(校定稿,北亚墨利加南境三国页 6)同当时许多士大夫心头有个难解的“华夷情结”一样,徐继畬心头也有个难解的“华盛顿情结”。没有对当时封建专制制度的深刻认识和不满,不能出此;没有置个人成败利害于不顾的大无畏胆略,也不敢出此。徐氏如此具体地叙述并热情称颂华盛顿的历史功绩,不仅在近代中国,在东方也是第一人。

各稿关于西方其他国家民主制度现状和历史的内容一再扩充。渠藏稿、过目稿尚不见古希腊、古罗马民主政体的记述,戊申版则把西方民主政治的源头上溯到公元前 1235 年的古希腊。国王哥德落斯死,“从此不立国王,以长官一人治事”。公元前 735 年,“立九官以治事,九官由众推选,以三年为秩满,贤则留,否则更”。周灵王年间,“公举梭伦重定法制……建议事厅一,法制司一……有兴革,则集议于议事厅。法制司设品官,定员数,选才德出众者领之”(6:22—23)。戊申版《意大里亚列国》中,将泰西记载和《后汉书》相互考订,既考出泰西通中国之始,也考出中国知泰西共和制之始:“考泰西人所纪载……罗马自努马七世以后,不立国王,选贤者居高爵,立公会以治事。与汉书王无常人,简立贤者之说相合。汉成帝二年,惟大屋践王位,仍世及。汉书所云乃其往事”(6:37)。

过目稿《峨罗斯国》记其实行议会制的内容已与校定稿、戊申版相同。校定稿和戊申版记英吉利政治的段落均为 357 字,详载了

两院的组成、权限、程序，及司法陪审团制度。尤其是对共和制的注意，已近于搜奇猎异。校定稿介绍墨西哥、得撒、危地马拉、秘鲁、玻利非亚、拉巴拉他、巴拉圭、乌拉乖等中南美国家时，都一一说明它们效法美国，逐西班牙人，"自立为国，推择长官理事，不立国王"。北非突尼斯"国王不世及，由众推举"(阿非利加页15)。戊申版称波兰遗民成立小国亦是"自推乡官理事，不立君长"(4:29)。英国前首相撒切尔说过，实行选举制是19世纪的世界性潮流。志略已对此潮流作了记载。

对瑞士(束色楞、瑞士地)民主内容的一再充实耐人寻味。甲辰稿对这个欧州内陆小国并未措意，寥寥77字，除疆域、幅员之外，只说"虽有王，号令不行，自古亦未通中国"。过目稿瑞士国的字里行间，陡然增了许多向往之情："其地山水清奇，甲于欧土……国无王，分二十二部，各推择头人理事，其制相传已六百年。""国无苛政，风俗俭朴淳良，数百年不见兵革，称为西土乐郊"。最后是那段颇招物议的按语，表达了自己"不禁悠然神往"的失态情绪。当年卢梭等人撰文宣扬阿尔卑斯山的美景和山民的纯朴，召唤人们重返自然。这在欧美影响很大，许多人把瑞士视为理想的乌托邦。这成了瑞士旅游业200年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徐氏听信游历过瑞士的美国传教士甘明的话，把瑞士视为西土之桃花源，也可以说是间接受了卢梭等民主思想家的影响。

戊申版瑞士国篇幅，又从过目稿2段392字，扩展到24段1546字。总述中旁加圈点强调各部"皆推择乡官理事，不立王侯"。在分述二十二部的22段里，不厌其烦地写着："各领以乡官头人"，"有乡官二百九十人"等等，可见著者的偏爱。

同文馆学生张德彝1866年随斌椿出访欧州时，已称酣博尔为"民主小邦"，韩挪尔"亦系民主之国"，并说"至美国乃官天下民主之国也，传贤不传子，每四年众举一人为统领"(走向世界丛书载《航海述奇》页540、565、556)。西汉中晚期，政治经济出现危机，盖

宽饶、谷永先后提出:“官天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理论,主张禅让、传贤。年未弱冠的张德彝,能熟练运用《汉书》中的理论观察西方政体,实在耐人寻味。这是否受了笃好两汉书的徐氏的指教呢?值得研究。不论怎样,说明徐氏生前他圈子里的人已将中国《尚书》上已有的“民主”一词赋以近代涵义,将它作为西方德先生(democracy)的译名,这也可以说是同文馆的一大功劳。欧风美雨,培育出了民主新芽。以志略为发端从西方引进的民主政治思想,在此后六十年里,终于在封建专制传统牢固的中国扎根,长枝,开花,结果,导制封建帝制不可逆转的消亡。西方学者指出:“在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中,军事方面的行动简直就是上演了一出滑稽戏。没有经历任何大规模的持久的国内战争,帝国时代就宣告终结了。决定性的进展是在政治上取得的。”(罗兹曼《中国的近代化》中译本页135)这政治思想的功绩,既应归于孙中山等革命者,也应归于康梁等改良者,甚至徐继畲等地主阶级改革者。

以上从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对徐继畲《瀛环志略》近30万字手稿、誊清修改稿和14.7万字的戊申版的初步探讨,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著者已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向华夷观念告别;二、对资本主义统一的世界市场和全球的海洋贸易网,徐继畲作出了“旁推交通,混合一体”的概括,并希望国人走向海洋,走向世界,与列强争雄比胜;三、对世界近代出现的民主性潮流,徐继畲也别具只眼,热情介绍,高度推崇。总而言之,徐继畲已基本上了解当时世界的文化大势,经济大势,政治大势,从当时中国过分内向的士大夫中脱俗而出。他不仅能睁眼看世界,而且也基本上看清了世界大势。林则徐等向徐继畲发难、指责,恰好说明自己认识方面的不及。因此可以说,徐继畲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真正摆脱对世界认识的蒙昧状态,并有效对国人进行启蒙教育的人。

(作者任复兴,1947年生,山西省忻州日报社主任记者。)

●[港]李志刚

从《瀛环考略》探究徐继畬与雅裨理牧师之交游

引　论

徐继畬于道光二十八年所著《瀛环志略》,有称之为“中国最早言地理之名著,盛为学者所推重”。[①]由于《瀛环志略》采集西方地理的资料和方法,详细介绍世界各地真貌,客观论述列国政情,因而打破以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传统观念,使中国对世界秩序有新的认识,了解中国以外西方的蛮夷存有高度的文化,以及先进的机械和科技。因此《瀛环志略》的出版,对于当时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必然带来极大的启示。美国德雷克(Fred W. Drak)在《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中,有谓徐继畬足可和西方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哥伦布(Columbus)、巴波亚(Balboa)、塔斯曼(Tasman)、库克(Cook)、白令(Bering)等旅行家和探险家比美,开启中国人对世界的视野,可称之为“东方的伽利略”。

《瀛环志略》对于满清政府的高层官员和社会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可以肯定的。如曾国藩、郭嵩焘、董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读后,均有获益。然而《瀛环志略》于道光戊申年在福州所刻,印有“璧星泉先生刘玉坡先生鉴定”及“本署藏板”,属于“官书局”所出版,

因此《瀛环志略》是一本具有法律性地位的官方书籍。[2]及至同治丙寅年(1866)重订的《瀛环志略》,则属于"总理衙门藏板",理应是北京内府官刻本,其时《瀛环志略》实为同文馆的教科书。所以《瀛环志略》自始是一本满清政府高层官员阅读的专书,对朝野均有极大的影响力。鹿泽长于序文有云:

中丞徐松龛先生,以浛雅之才兼文武之略,文章经济,炳烁一时。筮仕以来,遍历海疆。近开府七闽,时天子方有事于柔远,倚先生为长城,畀以东南重任。先生沈毅静镇,又推诚待物,宣扬仁风,恩威并济,远人安之,相与婆娑呕吟,鼓腹而笑。时古大秦所分诸国,悉遣渠酋,翕然麏至。先生抚绥之暇,每咨访其形势,得所谓地毯图;并泰西人所绘各国地图,暨东南海岛诸国,山川风土物产习尚,与夫古今沿革变迁之故,了如指掌。又考订古籍,著为之说,此《瀛环志略》一书所由作也。

彭蕴章撰序又谓:

公今宣力闽疆,渥承宸眷,勋猷所至,誉望日隆。方将黼黻球图,焜煌钟鼎。移海国见闻之笔,作太平寰宇之书。赐文锦以招来,毁毛车而更造。上佐天子,布大德于埏纮;下绥黎元,乐匡生于衽席。岂惟是书之成,为足纵横八极,表示千秋而已矣!

此即说明道光皇帝"方有事于柔远,倚先生为长城",徐书既是"上佐天子,布大德于埏纮",自然影响道光皇帝对西方世界的认识,改变对欧美各国的外交策略。所以《瀛环志略》是鸦片战争后,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对外思想,以及影响皇朝对外政策的一本重要书籍。

《瀛环考略》撰写之缘由及与《瀛环志略》之关系

《瀛环志略》一书出版,实起源于徐继畬先生于1844年有《瀛

环考略》的撰写。中英鸦片战争,清帝国战败。徐继畬在战后两个多月曾获道光帝召见,垂询海外形势,并命纂书进呈。是以当徐氏任福建布政使后,为处理通商事务,常驻厦门,藉此留心采访,广征资料。至1844年春(癸卯冬),因多次与美国基督教士雅裨理牧师(Rev. David Abeel)接触晤谈,至是年七月,即有《瀛环考略》成稿。[3]徐继畬在《瀛环考略》序文谓及:

> 道光癸卯冬,余以通商事久驻厦门。米利坚人雅裨理者,西土淹博之士,挟有海图册子,镂板极工,注小字细如毛发,惜不能辨其文也。暇日引与晤谈,四海地形,得其大致。就其图摹取二十余幅,缀之以说。说多得之雅裨理。参以陈资斋《海国闻见录》、七椿园《西域闻见录》、王柳谷《海岛逸志》、泰西人《高厚蒙求》诸书,题曰《瀛环考略》。

其后徐氏以《瀛环考略》为草本,窜改增补,易稿数十次,五年后始有《瀛环志略》出版。以两书的目录及地图作比较,则可知《瀛环志略》源于《瀛环考略》。

(一)目录比较:

《瀛环考略》目录	**《瀛环志略》目录**
序	序
《瀛环考略》亚细亚亚非利加	卷一
地球全图说	地球
分图说	皇清一统舆地全图
	亚细亚
东洋图说	亚细亚东洋二国
南洋图说	亚细亚南洋滨海各国
	卷二
	亚细亚南洋各岛
亚细亚澳大利亚图	亚细亚东南洋大洋海各岛
	卷三

五印度图说	亚细亚五印度
印度以西各回部图说	亚细亚印度以西回部四国
亚细亚极西各国图	亚细亚西域各回部
亚非利加图	
《瀛环考略》卷下	卷四
《舆图考略》欧罗巴亚墨利加	欧罗巴
欧罗巴各国全图	
欧罗巴地中海图	
欧罗巴俄罗斯图	欧罗巴峨罗斯国
欧罗巴北境各国	欧罗巴瑞国
	欧罗巴嗹国
	卷五
欧罗巴专漫尼束色楞图	欧罗巴奥地利亚国
	欧罗巴普鲁士国
	欧罗巴日耳曼国
	欧罗巴瑞士国
	卷六
欧罗巴西特尔济额里士图	欧罗巴土耳其国
	欧罗巴希腊国
欧罗巴意大理亚图	欧罗巴意大里亚列国
欧罗巴荷兰密尔闰图	欧罗巴荷兰国
	欧罗巴比利时国
	卷七
欧罗巴佛郎西图	欧罗巴佛郎西国
欧罗巴西班呀葡萄呀图	欧罗巴西班牙国
	欧罗巴葡萄牙国
欧罗巴英吉利图	欧罗巴英吉利国
	卷八

	阿非利加各国
	卷九
北亚墨利加图	亚墨利加
南亚墨利加图	北亚墨利加冰疆
	北亚墨利加英吉利属部
米利坚二十八部图	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
	卷十
	北亚墨利加南境各国
	南亚墨利加各国
	亚墨利加海湾群岛

(二)地图比较

《瀛环考略》地图	**《瀛环志略》地图**
1. 东半球图	1. 地球图——东半球图
2. 西半球图	西半球图
3. 北极南极图	2. 皇清一统舆地全图
4. 地球东半图	3. 亚细亚图
5. 地球西半图	
6. 地球上半图	
7. 地球下半图	
8. 亚细亚东洋图	4. 东洋二国图
9. 亚细亚南洋图	5. 南洋滨海各国
	6. 南洋各岛图
10. 亚细亚澳大利亚图	7. 东南洋大洋海各岛图
11. 亚细亚五印度图	8. 五印度图
	9. 五印度旧图
12. 亚细亚印度以西各回部图	10. 印度以西回部四国图
13. 亚细亚极西各国图	11. 西域各回部图
14. 亚非利加图	

15. 欧罗巴各国全图
16. 欧罗巴地中海图
17. 欧罗巴俄罗斯图
18. 欧罗巴北境各国图
19. 欧罗巴专漫尼东色楞图
20. 欧罗巴西特尔济额里士图
21. 欧罗巴意大理亚图
22. 欧罗巴荷兰密尔闰图
23. 欧罗巴佛郎西图
24. 欧罗巴西班呀葡萄呀图
25. 欧罗巴英吉利图
26. 北亚墨利加图
27. 南亚墨利加图
28. 米利坚二十八部图

12. 欧罗巴图
13. 峨罗斯图
14. 峨罗斯西境图
15. 瑞国图
16. 嗹国图
17. 奥地利亚图
18. 普鲁士图
19. 日耳曼列国图(两图)
20. 瑞士图
21. 土耳其图
22. 希腊图
23. 意大里亚列国图
24. 荷兰图
25. 比利时图
26. 佛郎西图
27. 西班牙葡萄牙合图
28. 英吉利三岛总图
29. 英吉利英伦图
30. 英吉利苏格兰图
31. 英吉利阿尔兰图
32. 阿非利加图
33. 麦西图
34. 南北亚墨利加总图(两图)
35. 北亚墨利加英吉利属部图
36. 米利坚合众国图
37. 北亚墨利加南境各国图
38. 南亚墨利加各国图

39. 南亚墨利加巴西图

40. 南北亚墨利加海湾群岛图

就以两书内容所见,《瀛环志略》固属充实,但均依《瀛环考略》所列各目加以扩充,即如徐氏所言:

> 明年再至厦门,郡司马霍君蓉生,购得地图二册,一大二尺馀,一尺许,较雅裨理册子,尤为详密。并觅得泰西人汉字杂书数种。余复搜求得若干种。其书俚不文,淹雅者不能入目。余则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

徐继畬所得泰西人汉字杂书,以及所得新闻,应为早期来华传教士出版之书籍及报刊。[④]至于《瀛环志略》所绘四十幅地图,虽较《瀛环考略》尤为精细,但编列名目不外《瀛环考略》的引伸。而《瀛环考略》二十八幅地图,即如徐氏所说,是从雅裨理的图册"摹取二十余幅"。[⑤]

·《瀛环考略》的取材及雅裨理牧师的协助

徐继畬撰写《瀛环考略》,虽然亦尝参考陈资斋的《海国闻见录》,七椿园的《西域闻见录》,王柳谷的《海岛逸志》和泰西人的《高厚蒙求》诸书,但对西方世界形势的认识,可谓与雅裨理牧师晤谈所得;而地图的绘画更是从雅裨理牧师的图册摹取,因此徐继畬《瀛环考略》的成稿,实是雅裨理牧师口授所致。按《瀛环考略》载有雅裨理牧师所云计有以下十则。

一则:

> 按北冰海人人知之,南冰海未之前闻。顷阅西洋人所绘地球图,于南极之下,注曰南冰海,以为不通华文,误以北冰海例

·称之也。询之雅裨理，则云，此理确凿，不足疑也。

二则：

雅裨理又云，南极北极之下，以半年为日，半年为夜。其说太奇，余未敢遽信也。又云：日未尝动，地转动不停，受日光则昼，背日光则夜，其说尤奇。

三则：

按七椿园著《西域闻见录》云，俄罗斯之西北有大国曰控噶尔，包俄罗斯东西界之外，所辖各城自万户至十余万户不等。每一大城，属小城或三或四，以至十余。大城计一千四百余。建都之城名务鲁木，极广大，南北马行九十余日；东西亦然。城内有大江三，山河薮泽。幅员之大宇内无与比。所统八百余部。国有大河，西流入海，长数万里，阔千余里。其都城东南西北各马行数十日。余尝读之而疑其诞。今阅西洋地图，复细询之雅裨理，乃知所谓控噶尔者，即指欧罗巴诸国之全土。所谓西流之大河者，即地中海(夷名墨力特尔勒尼安)，长七千余里，阔一二千里不等。然海水之东注，非河水之西流也。所谓都城者，或意大里亚之罗马……

四则：

雅裨理云，两年前佛郎西、英吉利、米利坚、西班呀四国，曾遣四舟向南探之。近南冰海一带，尚有国土，其广狭未能详也。

五则：

总图限于尺幅，国土部落之名，弗能尽著。雅裨理所挟册子，有分图数十幅，匆促未能尽摹，仅就沿海摹取十数幅。

六则：

东南洋诸岛，陈资斋《海国闻见录》言之最详，而其图则仅附于四海总图，殊不甚确。漳人王柳谷所著《海岛逸志》，言噶罗巴事甚悉，诸岛地名，与《海国闻见录》多不同，其图尤不足

据。惟西洋人所绘南洋图，最为审细。尝令雅裨理译出地名，则与陈、王两书，又不相合。盖以闽音书番语，已多恍惚，而欧罗巴人又多随意命名，不尽系各岛本名。今就两书参互考之，得其大略，然难保其无舛误也。

七则：

雅裨理云，地中海洋盗，皆阿尔济尔回部之人，纵横出劫，商旅患之。前数年，英吉利、佛郎西、米利坚三国，连兵讨之，捣其穴，诛其人，而不取其财货，阿尔济尔大惧，誓不敢为盗。三国乃舍之。其后稍稍敛戢，不似前此之横肆矣。

八则：

据雅裨理云，千余年之前，惟意大里亚最强，欧罗巴诸国，皆其臣仆。其都城极大，名曰罗马，与椿园所云务鲁木者，译音相近。

九则：

宇内疆土之恢阔，无过俄罗斯者，宜其强大莫与京矣。然不特不能与中国争衡，即在西洋诸国中，亦不过比肩于佛郎西、英吉利、米利坚三国，而未能定霸于一方者，何也？尝以询之雅裨理。曰，彼所有者，北裔穷荒之土。迤东万余里，与中国相直，寒冻不毛，有土无人，与无土同。迤西近欧罗巴一带，户口稍盛，然较之佛郎西诸国，总觉土满。舟楫之利，火器之精，心计之密，又远逊于诸国。逐鹿疆埸，往往瞠乎其后。特因其疆土之广，究系海内大国。故诸国亦未敢凌侮之。比权量力，不过齐秦晋楚，相为匹敌而已。其南邻之色尔各设若尔热，并非强大之邦，近数年来，时时与之构兵。俄罗斯竟不能灭此朝食，则其智力亦可见矣。

十则：

又俗传俄罗斯累代皆女主。问之雅裨理，据云，其先代实有此事。其汗有女无男，因而立女，与英吉利之女主同。然女

主生男，仍复立男，并无累代传女之事。其现在之国王，名尼歌拉士。[6]

就以上所述，反映徐继畲对世界各地形势、风尚和自然环境等常就教于雅裨理牧师，及至《瀛环志略》出版，全书载有雅裨理一名计有九次，其中仍有五则提述雅氏之意见。[7]由此推知雅裨理对徐氏影响的重大，而《瀛环志略》的出版，实可肯定雅裨理牧师所作的贡献。

徐继畲与雅裨理的结识

徐继畲对世界事务的留心是在1842年任职广东按察使开始，而他着手研究世界地理，应以1844年1月27日在厦门结识雅裨理牧师后进行。其时徐继畲到厦门与英领事记里布(GribbleHenry)商讨外人在厦门活动的范围。而雅裨理牧师适在1843年自鼓浪屿迁入厦门传教，因雅裨理牧师通晓华文华语和闽南方言，故充当徐氏与记里布的传译。雅裨理藉此派发一些宗教书报，藉机向徐继畲传扬教理。据《雅裨理的生平》一书载谓：

为了此次的旅行，以及英国领事馆所引起那小题大做的无谓纷扰，一位中国钦差奉派到厦门，带来了限制外国人旅行范围的上谕。雅裨理看出中国政府所关心的只是要尽其可能限制外国人的行动，但并无意冒险去引起彼此间的恶感，因此他极力争辩，要求不限制宣教士的行动，并获得良好的结果。那位钦差询问雅裨理许多关乎地理上的问题。雅裨理极尽所能的答复他，并拿出一幅地图详细对他解说。这是双方许多会晤的第一次。这位钦差对于地理和历史的兴趣，不只是好奇而已。凭着雅裨理的帮助，他自己也绘制了几幅地图。他留心注意那些关乎法国、英国、美国和俄国的实况。雅裨理因着他那不拘束和友爱的态度而渐渐对他发生好感。虽然他对那位钦

差的关心地上国度多于关心天上国度的真理不免感觉到失望。

他们多次会晤所产生的结果，大约到了八年以后才显明出来。当时，山西省五台县的苏祈雨(按，应为徐继畬)出版了第一本的中国地理书，那是一本很美丽精致的书籍，书名称为《新世界地理》。那本书的著者就是当时福建省的巡抚。[8]

雅裨理牧师祖籍荷兰阿姆斯特丹，1804年6月12日生于美国新拔兰士威城(New Brunswick)，1823年毕业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因志献身传教事业，旋入新拔兰士威神学院就读。1826年毕业后前往纽约州葛兰尼村(Greene Country)传教，后又转往西印度圣约翰岛(St. John's Island)任职。因丹麦人不允许教士用英语传道，不久折回纽约。适逢其时有美国在华贸易商人奥利芬特(D. W. C. Olyphant)得知广州有美国"海员之友传道会"(The Seaman's Friend Society)的筹设，特鼓励雅氏前往工作，并允捐助雅氏一年生活费用。是以雅氏与裨治文牧师(Rev. Elijah Coleman Bridgman)于1828年10月14日乘罗马号前赴广州，翌年3月25日抵华。二人实为美国第一批来华教士。其时首位来华教士马礼逊牧师(Rev. Robert Morrison)适在澳门、广州两地工作。对两位美国教士至为热诚，并介绍华人教士梁发相助。[9] 雅氏因身体健康欠佳，未及一年即转赴爪哇巴达维亚城(Batavia，今日之雅迦达)，幸获伦敦传道会教士麦都思牧师(Rev. Walter Hnry Medhurt)接待，深受麦氏感动。并随麦氏学习华文及闽南方言，以利在南洋传教。不久与伦敦传道会汤雅各牧师(Rev. Jacob Tomlin)乘坐帆船，在南洋沿岸一带传教，以派发宗教书册和医疗药物接触华人。雅氏因身体日弱，于1833年5月返美国，途径英国、法国、瑞士等地，均到教会访问。1834年返抵纽约，成为首位自东方回国教士，深得各教会热烈欢迎。其后应邀前往各神学院、礼拜堂、妇女团体演说，言论轰动一时。雅氏虽有意返回中国传教，但

因健康所阻，至1838年10月17日与应任澳门马礼逊教育协会学校(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School)校长的勃朗牧师(Rev. Samuel Brown)再度来华，翌年2月20日到达澳门，适逢林则徐到广州主持禁烟，雅裨理则与裨治文牧师、伯驾医生(Rev. Peter Parker M. D.)、卫三畏(Semuel Wells Williams)等美国教士留在澳门，雅裨理亦藉机学习华文。中英爆发战争，1842年2月2日，雅氏与文恩牧师(Rev. William Boone)乘船沿岸北上，24日抵达厦门鼓浪屿，文恩牧师不久转往福州，雅裨理成为入闽南宣教第一人。1843年迁往厦门定居。1844年春间，尝到广州、香港两地调息，其后即返厦门。同年夏天获新泽西州乐泽学院(Rutger's College)颁赠荣誉神学博士，表扬他在中国传教的成就。11月病情恶化，终于12月9日离厦返回美国，于1846年9月4日病逝纽约。雅氏离厦之前，已在厦门购置两所楼房，作为医疗及传教之用址，故雅氏可称为闽南教会的开山主。[10]

雅氏是于1844年1月27日接触徐继畬，而徐继畬只在该年1月、2月、5月三次前往厦门巡视，所以雅裨理与徐继畬的晤谈时间不多。但两人的交游，使徐氏认识世界各国大势；而雅裨理的地理和历史资料，亦为从纽约携回中国的书籍。至于徐继畬对美国的民主政制和华盛顿总统的认识，无疑更是得自雅裨理传授。[11]考略有载美国总统选举之情况谓：

> 兀兴腾既得米利坚之地，与众议曰，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择有德者为之。分其地为二十六部，每部正统领一，副统领一，以四年为任满，集部众议之，众皆曰贤，则再留四年(八年之后，不准再留)，否则推其副者为正。副或不协人望，则别行推择。乡邑之长，各以所推书姓名投匭中，毕则启匭，视所推独多者立之。或官吏，或庶民，不拘资格。退位之统领，依然与齐民齿，无所异也。二十六部正统领之中，又推一总统领，居于京城，专主会盟战伐之事，各部皆听命。其推择之

法，与推择各部统领同。亦以四年为任满，再任则八年。自兀兴腾自今，开国六十余年，总统领凡九人。今在位之总统领，勿尔吉尼阿部所推也。

论华盛顿又云：

按兀兴腾，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

上述所载《瀛环志略》亦有列，惟"兀兴腾"则改为"华盛顿"。按徐继畬撰写《瀛环考略》之前，美国裨治文牧师于 1838 年已有《美利哥合省国志略》之出版；1844 年梁廷枏撰《合省国说》，两书均译称"华盛顿"。[12]足见徐继畬撰写《瀛环志略》之时，论及美国民主政制及对华盛顿的赞词，实非参引他书，而是从雅裨理牧师直接传授。

结　论

徐继畬因为撰著《瀛环考略》，广阔世界视野，认识西方军事、政治、科技、商业等事务，以致在外交处理上采取温和的主张。有谓 1852 年徐氏罢职，事属朝廷"鹰鸽之争"的结果，而与徐继畬对美国华盛顿总统的赞誉亦有牵连。[13]惟是 1853 年美国华盛顿纪念塔刻有徐继畬在《瀛环志略》对华盛顿的赞词，而于 1867 年复获美国总统赠予华盛顿的绘像，推崇徐氏对华盛顿的钦敬。此举不但开创中美两国民间交往的先河，于中美外交发展更有和平助益。纵观徐继畬之贬官，抑或受到美国官方之表扬，显然与《瀛环志略》一书有关。而徐氏之能撰写志略固以考略为蓝本，但考略的手稿实肇始于雅裨理牧师的引发。

雅裨理牧师可称为开启徐继畬对外间世界知识的导师，虽则雅氏入住厦门传教不足三年之久，在传教事业上确已建立基础。惟是由于他与徐继畬的接触，导致《瀛环志略》的出版，影响中国文化事业，实是雅氏在生之年始料不及。徐氏身任福建布政使，心地光明磊落，不以高官自居，坦诚与外人接触，本着儒士谦谦君子风度，不耻向外国教士下问。无怪雅氏深受感动，乐于接待和教导。而徐继畬对雅氏之帮助，亦未尝有所忘怀。于同治七年（1868）为丁韪良所作《格物入门》一书作序亦谓：

> 泰西之学始于利马窦之东来，迨后南、艾诸公扩而充之，益见详备。然所言者，天文历法，于格物穷理之说未之详也。余顷待罪闽中，因公至厦门，晤米利坚人雅裨理，广见博闻之士也，能作闽语。余暇辄引与长谈，于泰西各国古今形势，粗知大略，至格物之学，未暇及也。[14]

徐继畬是雅裨理牧师在华传教接触最高官员，由于二氏之交游，促使徐继畬对基督教的协助，而其一生亦无反教之言论。就以1850年福州发生神光寺事件，因有英国教士租住城内神光寺，徐继畬秉公处理，致令当地士大夫不满，上疏声讨，徐继畬终被撤职，而西方人士及基督教士对徐氏之撤职深表同情，并认为朝廷处置不当。及至1853年华盛顿纪念碑所刻的中文碑文，皆出自"耶稣教信辈"及"合众国传教士"的敬意。徐继畬对早期教士之礼待，实有助于福建基督教会日后的发展，此可谓徐继畬与雅裨理牧师交游所致。

（作者李志刚，1939年生，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主席，礼贤会湾仔堂主任牧师，香港信义宗神学院教授。）

注释：

① 张其昀：《十九世纪中后叶之世界形势，重印〈瀛环志略〉序》，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日本文久辛酉版《瀛环志略》页1。

②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页559,上海出版社1989年。

③ 徐继畬:《瀛环考略》道光二十四年手稿页1,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按原稿无页次,由文海出版社编上。该序文作于夏历秋七月。是年七月为闰月,应为阳历7月27日至9月23日。

④ 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页185—194,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⑤ 考略序文为"就其图摹取二十余幅",分图说为"摹取十数幅";志略序文为"苦不识其字,因钩摹十余幅"。

⑥ 这十则引文,分别见于《瀛环考略》页19;页21;页23;页25;页28;页39;页96;页114;页129;页131。

⑦ 见道光戊申版《瀛环志略》卷一序文页8"徐继畬识"(提名三次);卷一页4,页6;卷三页7,页11(提名两次);卷四页27.

⑧ 卜沃文(A. J. Poppen)著,李华德译:《雅裨理的生平》(*The Life of David Abeel*)页122,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63年。

⑨ Marshall Broomhall,"*Robert Morrison A Master—Builder*"(London,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1924)页192—198.

⑩ Alexander Wylie,"*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Shanghae,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67)页72—75;《闽南中华基督教简史》页1—5。

⑪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x,1851,页170;页187—191.

⑫ 高理文著:《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5,页16;按高理文即裨治文牧师。梁廷枬著:《合省国说》卷2,页19;按《合省国说》于道光二十四年八月成书,较《瀛环考略》为晚,而《合省国说》多以《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为据,两书皆有"华盛顿"称号,而无"兀兴腾"一词。

⑬ 陈存恭:《徐继畬事略及其瀛环志略》,于广州中山大学1990年12月纪念中国近代史开端1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发表之论文。

⑭ 徐继畬:《格物入门序》,引自同治戊辰京都同文馆板《格物入门》。

●邹振环

《瀛环志略》译名试评

两种文化的交流中包含了双方词义的理解与阐释，这种文化现象最典型的是表现在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名词翻译中。尽管《瀛环志略》并非纯粹的翻译作品，然而，作为一部早期近代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文献，它同样存在一个译名的取舍问题。由于这部著作的影响之大，因此它的译名取舍在相当大的意义上还影响着近代中国人认识世界时所采用的语义阐释。译名方法不仅仅是一种翻译技巧，还是一种世界观的反映，因而，通过对《瀛环志略》译名的探讨，也有助于透视徐继畬的世界观。

一

译名问题也是关于语言和世界关系的一部分，"名"给人以一种观察世界的尺度，有了名词才能准确地理解世界和表述世界。"名"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孔子所提出的"正名"意义就在于让名代表它所应代表的，以重建社会政治关系与制度。墨子的"以名举实"即肯定了名是客观世界的准确表述。[①]荀子专门撰写过《正名篇》，就如何制订名词的问题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如"奇辞起，名实乱"，"名是而实辨，道行而志通"。"迹长

功成，治之极也，是谨于守名约之功也"。即名辞纷繁杂陈就会导致名称与其所代表的实际事物不一致，只有名称确立才能使实际事物得以清楚的认识，这样，用名称来表示实际事物的制名之道才得以推行，彼此心意方能沟通。而达到这种大功大治境界就在统一名称的功劳。而统一名称的方法是什么呢？"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2]荀子的意思是，事物的名称并非一开始就合宜的，而是由人们互相约定一个名称，约定了，用惯了，就认为这一名称是合宜的，而与约定的名称不同的就认为是不合宜的。什么名称代表什么实物，并非一开始就确定的，约定用这一名词命名这一实物，是约定俗成的结果。

古代语言问题由古代社会的需要而产生，近代的译名问题同样也是服务于近代的社会使命的。徐继畬的《瀛环志略》所采取的译名选择的方法，可以说正是他面对近代中西文化尖锐碰撞"译字纷岐"[3]的背景下对先秦以来语言与世界关系认识的一个继承。他指出"外国地名最难辨识，十人译之而十异，一人译之而前后或异"，原因是由于"外国同音者无两字，而中国则同音者或数十字；外国有两字合音、三字合音，而中国无此种字。故以汉字书番语，其不能吻合者，本居十之七八"，加上外国人居粤东，又带上了粤东土语，于是波斯被译成"白西"、"包社"、"巴社"，甚至变成"高奢"。因此，他指出译专有名词要依据"因俗定契"的原则。如各国的名称，应当有专门译法，如把西班牙译成"以西把尼亚"，葡萄牙译成"波尔都噶亚"，读者"猝不知为何国，故一切仍其旧称"。[4]

译名统一的呼吁与"因俗定契"的原则，以后始终贯穿于中国翻译史的发展中。19 世纪 80 年代传教士们在西方教科书的翻译中为统一术语作过不懈的努力，20 世纪初任鸿隽的《化学元素命名说》、蔡元培的《译名表》、郑贞文的《无机化学命名草案》都对"统一译名"的重要性，作过系统的阐述。从清末学部奏设编译名词馆，1916 年教育部设立译名统一委员会，直到抗战时期国立编译馆公

布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气象学、动物发生学、比较解剖学、细菌免疫学、精神病理学、药学、电机工程、普通心理学等统一译名 15 种，[5]对统一译名已在学界形成了一种共识。“因俗定契”的译名原则，在后来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梁启超《论译名》、容挺公《致甲寅记者论译名》、胡以鲁《论译名》等论著中所指出的译名原则中继续得到了贯彻和发挥，至今仍是新华社译名室首先遵守的一个原则。由此我们就不能不佩服徐继畬在《瀛环志略》译名选择中所表现出的远见卓识。

二

徐继畬不懂外语，他没有后来著名的不懂外语而能译出近 200 种译作的大译家林琴南那样的翻译实践，也没有做过不懂外语而组织过类似译场的林则徐那样的翻译组织工作。但我们不能怀疑他也有过严复“一名之立，旬日踟蹰”[6]的体验，因为他在把已译成中文的素材加以合成时，同样面临一个如何使异域文化与本国语言相适应的问题。1847 年四美在《中国驻有领事之城市访问记》中描述徐继畬“在一本昂贵的美国出的地图册上，贴满了中文名字”。[7]他在《瀛环志略·自序》中这样地讲述自己选择取舍材料的过程，“搜求得若干种，其书俚不文，淹雅者不能入目，余则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至癸卯至今，五阅寒暑……未尝一日辍也。”陈庆偕在该书跋中讲徐继畬如何“反复询译，参以史录所记，订其舛误”。他必须确定用最恰当、最合适的字眼来表达这种思想和信息，既要使当时的读者理解接受又不致产生太大的折射率。美国学者德雷克认为，由于“中国并没有日语片假名那样的语音体系，日本语的片假名，可以

简单地再现新词的相当准确的发音，而用不着包含表音字母的任何内在意思。中国却没有这种便利，徐继畬只好像好多世纪前的佛教传教者一样，用单音节的文字组合在一起，来翻译多音节的外国名词。……不过对能够用北京话发音表达外国专有名称的汉字进行选择并且使之标准化，这就是《瀛环志略》在技巧上取得的一个真正的重要的成就”。[8]

徐继畬在《瀛环志略》中的译名，严格地讲其译名取舍是否比他的先人、同时代的学者更高明呢？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如波斯和印度，《汉书》译“安息”和“身毒”，志略译“波斯”和“印度”；德意志，《海国图志》译“耶马尼”，志略译“日耳曼”；普鲁士，《海国图志》译“普鲁社”，志略译“普鲁士”；维也纳，《法国志略》译“亚威纳”，《地理问答》译“伟恩”，志略译“维也纳”；伯尔尼，《地理问答》译“伯诺”，《万国图志》译“陛伦”，志略译“伯尔尼”；意大利，《法国志略》译“伊太里”，志略译“意大里亚”；摩纳哥，《世界地学》译“谟拏哥”，志略译“摩纳哥”。荷兰，《大清一统志》译“拂兰地亚”，《西洋史要》译“尼柔兰”，《四裔考》译“法兰得斯”，志略译为“荷兰”。挪威，《四裔考》译“诺而勿惹亚”，志略译“挪耳瓦”又作“讷为”；瑞典，《地理问答》译“合挪威丹国”，志略译“瑞国”又作“瑞典”。

如果说《瀛环志略》在地理译名选择上较其他著作为胜有某种偶然性的话，那在一些专门采用的意译方法就包含有必然性了。如林则徐《四州志》把美国国会的“议员”(Representive)音译为“里勃里先特底甫”，志略则用“贤士”来译议员一词；《海国图志》把议会(parliament)音译为“巴厘满”，志略则以“公会”来译“议院”，以“爵房”译“上议院”，“乡绅房”译“下议院”；蒋敦复《英志》把总统音译为“大伯勒格斯”，《海国图志》译为“大酋”，《万国公报》译为“伯理玺天德”(president)，志略译为“总统领”。这些译名的选择不难判断出，《瀛环志略》采用的译名方法，较先人和同代人的著作在大部分译名上要更准确、更适宜于中国读者的理解接受，也更接近于

后来的“约定俗成”的译名。

我们不能认为这些译名都是由《瀛环志略》首创的，但至少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即志略在比较准确的译名选择和流传过程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不少人就是通过此书掌握正确译名的，如刘鸿翱在志略序中称自己是读志略才知道地球上有个“北冰海”。志略初刊时影响不大，1861 后日本出版了红黄绿三彩印本，广泛流传，于是发生了“出口转内销”的现象，日本刊本流入中国，成为坊肆翻刻的摹本，1866 年总理衙门才特别刻印，列为同文馆的教科书。也许由于志略“以精约胜”，[⑨]其精炼的篇幅正适宜于携带外出。当时出使国外的官员或出外游历的学者几乎都带上了此书。1876 年出使英德的刘锡鸿、1890 年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的薛福成、1894 年出使日本的黄庆澄，沿途都对《志略》的记述进行了仔细的查对，斌椿在 1867 年出使欧州回国后写道：“自古未通中国，载籍不能考证，惟据各国所译地图，参酌考订，而宗以《瀛环志略》耳”。[⑩]1876 年游历欧美的李圭在《环游地球新录》中称志略把“如鹿无斑，身短，顶高于身倍蓰者”译为“长颈鹿”非常合适，[⑪]不仅较古译“麒麟”为恰当，比之后来邹代钧《西征纪程》音译为“吉拉夫”(*Giraffe*)，无疑也要高明得多。1875 至 1881 年出使欧州的黎庶昌在《西洋杂志》中也盛赞“所经过山川城市，风土人情，《瀛环志略》所载，十得七八，乃叹徐氏立言之非谬”。[⑫]尽管郭嵩焘在 1876 至 1879 年的出使途中发现志略有不少信息已经过时，如称“印度产茶岁得 20 万斤，今已逾百倍之多矣”，但仍赞扬其译名，如“直布罗陀”译得恰当。[⑬]康有为、梁启超等早期都受过此书的启蒙，这一点已为学者所熟知。直到 19 世纪 90 年代初，汤寿潜的《危言·夷势》中还借助志略的文字来赞扬美国的民主制度。我们固然不能把这些游记和著作中的许多译名与志略的相同，完全归之于前者对后者的模仿和认可，但徐继畬在译名上的“先路之道”的作用却是我们永远无法抹煞的。

三

译名不仅仅是一种传达命名信息的手段，也是一种深刻的文化现象。明末清初“Deus”的译为“上帝”或“天”、“天主”的争论，最后演变为康熙禁教的“礼仪之争”的一大导火线。作为对一种文化现象的认识，译名者或译名选择者必须充分地体验被命名的对象，因而译名或选择取舍译名的过程，也就成了传达某种思想的过程。

徐继畬开始认识西方和研讨译名的时代，不仅不是一个中国读书人对西方趋之若鹜的时代，而且正是中国很多士大夫坚持排外主义、宣扬华夷之辨而对外国语不屑一顾的年代。当时从事通译的舌人多是一些不为士大夫瞧得起的雇员。在这海禁初开的岁月里，徐继畬追随着林则徐，给那些只有水手、买办等层次注意的译名问题予以特殊的关注，不能不令我们感到钦佩。

世界观是人们对于生命、社会及其制度的综合的认识，世界观是一种价值体系。在漫长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状态下，中国文化在观念上也培植了一种“自足的系统”。即中国文化的一切都是高于周围文化的中国中心主义世界观，形成了“自我中心”的政治观与不平等的外交观，以至不能容忍利玛窦所绘的世界地图把中国放在稍为偏西的地方。传统的中国士大夫把中国临近的诸游牧民族，视为不开化的野蛮部落，用带有明显贬意的“东夷”、“西戎”、“南蛮”和“北狄”呼之。抱着这种“以尊临卑”的心态与西方人交往的初期，英国人被中国官方称为“英夷”，把办理外交叫做“夷务”，按照一切远离中华文明的民族都是“化外之民”的逻辑，西方人自然不属于文明的范围，因此中国在给外国人的译名时也多反映出“华夷之辨”的观念。如用贬义词狄妥玛（今译托马斯·迪克，在中国海关任税务司的英国人）、吓厘士（今译哈里斯，美国外交官）、渣甸（即查顿）、马赖（一译马奥斯多，法国传教士）；或在汉译名一律

加“口”字旁。“口”在汉语里有计数牲畜的意思，以此引申为野蛮的禽兽。如吗咃㖞（今译马他伦，英国水师副提督），喇吃呢（今译拉萼尼，法国外交官）、喳囒（今译查顿，鸦片贩子）。

这种使用贬义词书写西方国家或西方人的名称在那一时代是普遍的做法，连著名的改革家林则徐、龚自珍、魏源都不例外。《海国图志》使用“以夷攻夷”、“师夷制夷”是众所周知的，同一时代和此后的梁廷枏《夷氛闻纪》、夏燮《中西纪事》等，都普遍采用这一译名。然而，《瀛环志略》却是一个突出的例外，这部1848年刊行的书中很少使用“夷”的译名，也很少采用另一些“胡”、“狄”等带有贬义性的译名。[14]而更多的使用了“泰西”、“西洋”、“西土”、“西国”这些属于中性的描写词，在许多官方文献中被斥为“夷酋”的李太郭，志略中被尊称为“英官李太郭”。

如果这部著作晚二十年问世，采用这种译名就不必使人惊讶了，因为1858年6月26日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第51款中明确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15]此后“夷”字渐为“洋”或“远”取代了。但直到19世纪90年代，个人著作中把西方人称为“夷”者仍不在极少数，而早在40年代末，徐继畬就首先自觉废用这一带有文化偏见的译名，可以看出他对世界的认识远远高于同代人。联系到志略研究世界时遵循一种统一的格式，把中国只作为占据亚州大陆的一部分加以评述，使他那具有比较准确译名的著作，成为把中国读者引向纷纭的外部世界的一本正确的导引图。它告诉给中国读者，在中国之外的人类生存环境中，还有其他与中国有着同样文明进化的民族，中国只是亚州大陆的一小半，而亚州又只是世界五大洲之一。其深刻意义在于揭示了地球上文明与文化的多元性。也许正是这种对传统天朝模式带来挑战的译名方法使保守派感到震动，从而成为反复攻击和要求罢免徐继畬的潜在原因之一。

（作者邹振环，1957年生，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

注释：

① 参见《论语·子路》、《墨子·小取》。

② 《荀子·正名》。

③ 参见梁廷枏《兰仑偶说》自序，1846《海国四说》刊本。

④ 《瀛环志略·凡例》，下文所引徐氏用的译名等均见于志略戊申版。

⑤ 《国立编译馆工作概况》，革命文献第59辑，《抗战时期之学术》国民党史委员会1972年，页411—455。

⑥ 《天演论·译例言》。

⑦ 转引自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畬及其瀛寰志略》，文津出版社1990年，页34。

⑧ 参见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前揭书，页179—180。

⑨ 王韬《上丁中丞》，《艺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页105。

⑩ 《乘槎笔记》，岳麓书社1985年，页102。

⑪ 《环游地球新录》，岳麓书社1985年，页242。

⑫ 《西洋杂志》，岳麓书社1985年，页540。

⑬ 《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页62、85。

⑭ 个别的贬辞仍存在，如卷八有"黑番愚懵"等语，估计是受西方殖民主义观点的影响。

⑮ 参见《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辑》上卷，第一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页174。

●袁伟时

从徐继畬看爱国与投降

对饱经忧患的中国人说来，爱国主义是非常崇高的情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许多中国人生死不渝的信念。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是爱国主义的最高表现，也是应该永远继承和弘扬的优秀民族传统。不过，近日读史，却深感爱国这一概念的内涵颇为复杂，稍有疏忽，就有可能蹈误区而不觉。谓予不信，请以徐继畬的遭遇为例。

在近代中国，徐继畬是颇有名气的人物。他的《瀛环志略》在19世纪下半叶，一直是寻求救国道路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启蒙读物。郭嵩焘、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均身受其益，且惠及东瀛。可是，直至最近大陆史学界仍对徐氏颇有微词，好些水平很高的学术著作视之为投降妥协势力的代表。其根据都是他在处理英国人租住福州神光寺一事中与林则徐等地方士绅意见不合，这个差异是投降与抵抗两种政治主张的对立。一个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当时，英国侵略者违背居留城外的约言，强居到福州城内乌石山的神光、积翠二寺，引起了林则徐和当地士绅的不满，共议驱英。闽浙总督刘韵珂，福建巡抚徐继畬都主张对外妥协投降，并准备弹劾林则徐破坏和局。”[①]

这件事发生于道光三十年(1850)六月，一个英国传教士和一

个英籍医生向神光寺僧人租屋二间居住，租期半年，租约并经侯官县用印备案。告老在家的林则徐联络家乡士绅和生童，坚主驱逐这两个英人出城；在京和各地的闽籍大员也为之声援，多次上奏，指责徐继畬等人“强民从夷”；致使皇帝屡降谕旨追查此事。同年末，两个英国人被迫先后搬出，风波才告止息。徐氏旋即被免去福建巡抚，留京任太仆寺少卿，成了管马政的副手，即副弼马温一类的闲官。支持徐氏主张的闽浙总督刘韵珂则被皇帝下旨“因病令其开缺”。

徐继畬在回顾往昔岁月时说过：“在闽藩任内，偶著《瀛环志略》一书，甫经付梓，即腾谤议。……旋因夷人租屋一事坚守成见，不敢启衅边隅，遂致弹章迭上，万矢环攻。”[②]大约都是徐氏始料所不及，前者使他享誉后世，后者却令他至今仍头戴“妥协投降”的歪帽子。因此，透过这一历史现象，讨论一下爱国、投降等问题，似乎不是多余的。

“投降”应有严格的界定

凡略具政治常识的人都了解，妥协是政治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除了极端愚蠢的政治人物都不会拒绝运用这一手段。至于运用是否妥当，则须具体分析个案。只有完全失当的妥协才会导致投降。

投降是在压力下以牺牲根本利益或重大原则性主张为特征的屈服。在国家和不同社会集团的搏斗中，正义的一方通常视投降为奇耻大辱。特别是在反侵略的战斗中，只有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败类才会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干这一类罪恶。

徐继畬生活的年代，外国侵略者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十分突出，在双方的冲突中他的表现如何呢？

在鸦片战争的炮火中，徐氏守土有功。自道光十七年起，徐继

畲一直在闽北任延建邵道。1840年7月，英国侵略者侵犯厦门，他奉命赶赴闽南署理汀漳龙道，与一水之隔的厦门协防守卫国土，“驰驱海壖一年有半，境土幸获瓦全”。[3]在这一次战争中，厦门曾经失守，但直接坐镇厦门指挥的是闽浙总督颜伯焘，且颜氏也以英勇抗战著称。这是徐氏参与的唯一的对外战争。徐氏既无屈膝疆场，亦未允诺割地赔款；同时他赞成严禁鸦片，投降的帽子戴不到他头上。

在英国人租住神光寺事件中，徐继畲有没有干出什么卖国投降的勾当呢？两个外国平民租住寺庙两间房子，按常理说来，即使徐氏处置不当，也属办理生疏事务难以完全避免的失误，本来与投降、卖国一类政治罪行无涉。可就是这么一件小事，竟然弄得朝野上下遑遑不可终日，令人哭笑不得！

不过，历史上许多荒诞不经或落后腐朽的事物往往以特别神圣的面目出现。在神光寺事件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弹章迭上，一个个摆出义正词严的样子，同声谴责徐氏等人“强民从夷，是何肺腑”、“不特外张夷焰，而且内沮民心”、“委曲以顺夷情”。皇帝也指斥“似此抑民奉夷，尚复成何事体！”[4]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压制和损害人民利益，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

徐氏究竟如何“抑民奉夷”呢？当时被徐氏否定或压抑的“民”意，主要有两点：

（一）驱逐夷人的手段。士绅代表认为应立即用强硬手段驱赶，徐氏等官方人士则认为可以用制造种种不便和劝说的办法令他们在六个月租约期满后或提前搬离。为此，官方还采取了严令工匠不准为他们修理房屋、要寺僧具结不再让夷人租住房屋等措施。他们“授意闽、侯两县……以士民公议，如有敢与夷人修理寺屋者，即捆送重惩，并将其住房拆毁，……又向城厢居民遍为告述，仍以士民公议为词，不准赴该寺听经就医”。其指导思想是：“总宜从容设法，令彼自退。”[5]

（二）要不要进行军事演习和增募乡勇。士绅代表主张立即在福州海口布防，修建阵地，调兵演炮，增募乡勇，以临战的姿态去对付英国人。徐氏等福建官方不同意。他们担心这些战备活动可能弄巧反拙，"设该夷因此藉口，是以小事而堕其奸计"。而且在虚耗国帑的同时，乡勇"易聚难散，沿海地方，数年来盗贼之充斥，半系乡勇流毒"。[6]

研究现有资料，确如徐氏所说，双方"虽有缓急之分，然皆坚意驱逐，并无歧异不同之处"。[7]要论有什么不足，那就是徐氏也不能不受制于环境，俯顺流俗。不过，除了后来证明是谣言一类的指责，徐氏所为既未丧权辱国，亦无损害公私利益，所谓"抑民奉夷"等等指责纯属莫须有的罪名。

这并不等于说双方并无是非之分。相对地说，当时官绅分歧中，比较稳妥的主张出自官而不是绅。这些官员避免小题大作，努力化解矛盾，维护了福州地区多年来华夷相安的局面。继刘韵珂出任闽浙总督的裕泰曾奉上谕调查刘、徐二人的言行。经过认真核实后，他一再确认："至福州口岸，自道光二十四年通商以来，迄今八载，民夷贸易互通，彼此均极相安"。徐氏处理神光寺事件后，民夷亦是"彼此相安。"[8]这些结论与徐氏历次报告完全符合。如果按照当时士绅的主张去办，只能令矛盾激化，破坏多年形成的安定局面。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是不能盲目贬斥与民族英雄意见相左的人和事。

福州士绅驱赶夷人的活动是林则徐领导的。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八月，林氏因病辞去云贵总督的请求得到批准，翌年三月回到福州。在这人生历程的最后一年中，他干的大事就是英人"住神光、积翠二寺，则徐率绅士倡议驱之，虑其以炮船来海口恐喝，数乘扁舟至虎门、闽安诸海口阅视形势，函商疆吏。与总督刘韵珂、巡抚徐继畬意见不合"。[9]

林则徐是无可争议的民族英雄。他英勇抵抗侵略者的横暴，收缴和焚毁鸦片一百多万公斤，写下世界禁毒史的辉煌篇章，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伸张了人类的正义。他理所当然地受到正直有识之士的尊重。可是，这也带来一个问题：由于出自内心的敬佩，中国的史家们对民族英雄往往力图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这种崇高的感情常常妨碍人们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出冷静、客观的分析。在评述神光寺事件中把与林则徐意见不合的人斥之为"妥协投降势力"，看来就是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这是一种英雄史观的余绪，不跳出它的窠臼，必然给揭示历史本来面目增加障碍，还可能引导人们从中得出错误的经验教训。

二是学术著作作出的任何论断都必须有可靠的证据。

在现代学术活动中，这应该是不言自明的常识。不幸，由于政治干扰带来的不良影响尚未彻底肃清，一些大方家有时也没有严格遵守这一规则。

外国人与侵略者本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即使是19世纪来华的外国人也有许多不是侵略者。两个租住神光寺的英国平民在一些学术论著中成了"英国侵略者"而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这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又如，在一个事件中谁代表爱国主义，谁主张妥协投降，都是应该根据史料认真论证才有可能求得符合实际的结论。但不少述及神光寺事件的史论都在未提供论据的情况下就分别给林则徐、徐继畲等人赠送爱国、投降等帽子。有些论著实际上还有几条不成文的原则：反对西方国家和西方人士者即爱国，主张与他们友好相处的就有投降之嫌；与著名爱国人士意见不合的大体上就是投降派……。诸如此类的框框把近代中国的历史描绘得黑白分明，历史真相经过人们的重彩涂抹却变得难于辨认了。

尽管这些情况近年已有很大改善，但面对上述情况，再一次的提醒似非多余。

开放与爱国

士绅及其支持者对徐继畬等人的指责唯一比较实在的是说同意夷人入城居住，违反了有关条约的规定。能否据此判定徐氏“投降”呢？

1842 年中英江宁条约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往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来往。”[10]

翌年双方所订通商善后条款，又补充规定：“在万年和约内言：允准英人携眷赴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口居住，……。但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赁……英国管事每年以英人或建屋若干间，或租屋若干所，通报地方官，转报立案。”[11]

这些条约在执行中遇到两个问题。

一个是条文不够严密。例如领事等官雇请的人员如所谓“笔墨人”能不能住城邑？商人以外的其他人如医生、传教士又如何对待？所谓港口也无明确界定，双方“议定”有的包括全部街市。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八日（1844 年）福建藩司与英国领事商定，并经皇帝批准确认“所议尚妥”的条款中规定：“厦门街市，系码头贸易之地，外国客商人等，自应听其往来”，“外国商人到厦贸易……或有留在厦门居住者，一共几人？是何姓名？有无家眷？租何房屋？由管事官照会地方官存记”，[12]即只要存记备案，居住范围并无限制。

二是各地执行中宽严不一。总的说来是除广州以外的其余新开的四口都限制不严。以上海来说，外国人“不问城内外，皆可听其游处，如土著矣”。在这些口岸，他们“所至视其城如户闼。独粤城垣门，与夷馆相距仅咫尺间，转不得一入”。[13]

那么，能否以对外国人活动限制的宽严作为爱国与投降的分水岭呢？有的地方把外国人的居住地逐步变为租界，中国丧失了主权，成为外国统治的飞地或国中之国，这自然是辱国投降。除了这种情况，则须从更长远的角度去考察。

中国在19世纪面临两大问题：捍卫国家独立和迎接现代文明的挑战。这是两个密切关连的问题。以西方列强为代表的现代文明挟其军事和经济的优势，摧毁形形色色的壁垒，把一切国家卷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任何国家都只有勇敢地打开大门，在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竞争中，师人之长，弃己之短，摆脱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的束缚，才能真正实现富强，捍卫自己的民族尊严。因此，对一个贫弱国家说来，英勇反抗外国侵略固然是爱国，维护与外国的和平相处关系，开放自己的国家，促进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本国社会进步，同样体现着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是更为复杂和艰巨的任务。相反，一味排外或者有意无意为文化和经济的交流设置这样那样的障碍，不管其主观动机多么善良，口号多么神圣庄严，客观效果都是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有的甚至因此错过重要机遇而千古留憾。评说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千秋功罪，如果看不到这个全局，必然步入迷宫。

徐继畬经受住了大炮弓刀的考验以后，在对外关系方面，所作所为究竟属于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爱国主义抑是推向殖民化的投降主义？

首先，他为维持所在地区中外人士友好相处作出了贡献。从1843年任布政使到1851年免去巡抚一职，他一直主管福建的对外通商事务。由于他妥善处理，长期保持了安定祥和的局面。以开放较迟的福州来说，“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开关。夷人初到时，与本地民人犹时有争竞；近三四年以来，华夷相安，毫无枝节”。[14]与一些地区闹得势同水火的状况相比，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其次，他广交朋友，积极学习他们的长处。1843年，他因公驻

厦门，便向美国传教士雅裨理认真请教世界各国的历史和地理知识。英国官员李太郭也向他介绍了好些古希腊的知识。他的名著《瀛环志略》就是他虚心向外国人学习的结晶。后来他还写了一部《筹运西米策略》，也是以他对各国历史和现状的了解为基础的。19世纪中叶，因落后而挨打的中国，有众多的知识急待补课。从皇帝到士绅都亟于在军事技术方面师夷长技。鸦片战争的硝烟未散，广东士绅潘仕成已主动聘请法国人指导制造水雷和其他武器。实际最为迫切的莫过于了解世界的历史和现状，为确定有远见的内外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据。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氏的《瀛环志略》就是适应这个需要而出现的双璧。

《瀛环志略》的历史功绩是继《海国图志》50卷本后，帮助中国人民正确了解西方。它客观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和地理。它赞扬西方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制度，“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15]也就是说，中国面对的不仅不是教化未及的野蛮人，而且几乎是中国士大夫一贯尊崇的最高政治典范——天下为公的三代在当代的再现。它还指出：“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由其善于操舟，亦因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力而为之也。”[16]从而说明了西方各国在世界各地活动的经济基础。它还驳斥了法国人喜烹食小儿的谎言。所有这些不但有助于祛除当时笼罩全国的难以想象的蒙昧，也有助于有识之士在认识世界中思考中国的路向。

在处理对外关系中，徐继畲的不足与其说过于软弱，毋宁说在于没有彻底克服封闭心态。但是，在当时的官僚群中，他算是对外部世界有所了解并愿意稳妥地力求化解矛盾，维护和平关系的人。当时的中国处于全面劣势，真正有远见的爱国者必须正视现实，为自己的国家谋取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在学习外国中改变贫弱状态。徐氏虽然有所不足，但总的说来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再看

看与他的主张不合的林则徐的状况，情况就更加清楚。道光二十二年(1842)7月，西行赴戍途中，他曾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动人诗句。这确实坦露了他的爱国情怀。可惜，这时他已被历史进步的主流冲刷到旁边。当复出在政治舞台之时，他扮演的角色仅是抱病为镇压民族暴乱和太平天国而奔命。魏源受其委托编就《海国图志》，人们却看不到他的回应。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魏氏与他私谊匪浅，且林氏声名显赫，魏氏不送书或送而收不到的可能性都很小。

有的前辈史家曾责怪他没有提出改革的倡议：“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17]笔者认为这个指责与实际不符。林则徐不是为了一己私利在事关国家盛衰的大计上知而不言之辈。作为经世致用的杰出代表，林氏堪称表里一致。蒋氏的主要论据是他看到中国军队在“器良技熟”方面远不如人，却没有公开提倡改变这个局面乃至全面维新的主张。这个责难混淆了两个问题：改革军队和对整个社会制度进行维新改革。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军事改革的首倡者。在抗英斗争中，他深感原有武装力量弊端百出。因此，他想方设法购买外洋武器，整顿原有军队，招募水勇，组织人民自卫，准备海战等等，卓有成效，致使鸦片战争初致英国侵略者在广东屡遭挫折。这是包括蒋氏在内的许多史家均承认的。

社会制度的维新改革是更高层次的问题。这必须以更先进的制度为参照系，并对固有制度的弊端有比较深刻的了解。林则徐在这方面不是知而不言而是所知无多。当时，即使是思想最敏锐的知识分子，也尚未形成系统的完整的改革纲领，要求林氏倡导改革维新似乎失之过苛。

林则徐的真正失误在于没有保持和发展虚心了解西方的开放心态，其思想也出现了新意枯竭的症候。他的睁开眼睛看世界大体

停留在“知己知彼”的水平上，没有转化为学习西方的强烈愿望。魏源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经验而提出的许多重要主张，如建立翻译馆、创建军事和民用工业、改革科举制度等等都没有得到他的响应。他自己更无新的主张提出。特别是垂暮之年，他在家乡的作为虽然爱国热忱未减，却缺少宽容大度而不无狭隘民族主义气息。一个西方传教士和一个医生租住寺庙两间房子，无论怎么说也算不上关系国家利权的大事，却弄得朝野上下不得安宁，甚至主张不惜花费国家资财，不顾可能给中外关系带来的后果而“调兵演炮募勇”，很难说是一个政治家处理对外关系中应有的慎重态度。如果不是“官绅不合”，其后果不堪设想。

林氏晚年的上述状况不是偶然出现的。早在神光寺事件之前，他在归家途中曾滞留南昌踟蹰不前。其苦衷在于“第鄙乡卧榻之侧，有人鼾睡，能否常住，尚未可知”。[18]指的是有来自英、美、瑞典等国的十六位外国人住在福州。追溯得更远一些，福州刚开放，林氏仍在留放地，他便在日记中写道：“闻英夷占住城内之乌石山，拆祠庙为兵房，炮火军器运入城者无算，官不能禁，未知伊于胡底也！”[19]其实当时只有几个英国官员依据条约在城内乌石山租屋居住，他们并无拆庙、运军火等越轨行为，林氏却轻信无稽之谈。稍后他便开始叹息：“卧榻之旁有人鼾睡。”[20]事实早已澄清，而他的情绪未改。可见，只要外国人留在自己的家乡，他便感到不安，问题根本不在于居住地有没有争议。

在查禁鸦片和反抗英国侵略的战斗中，林则徐不愧是民族尊严和正义的化身。但是，战争一结束，历史便跨上新的台阶，救国与改革开放成了一件事物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而且由于历史积垢特别浓厚，离开外来新的文化和经济的冲击和滋润，改革就会落空。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放又是改革的前提。也就是说，改革开放成了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极端重要的内容。在新的历史任务面前，林则徐彳亍嗟怨。朝着历史前进方向大声呼啸的已经是魏源等新的

弄潮猛士；徐继畬亦是其中一员。时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一些历史论著在评论林、徐之争时，没有注意到这个基本态势，不能不说是个小疵。

排外与爱国

多年来，不少史学论著热情讴歌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斗争，这无疑是正确的。可是，由于具体分析不够，有的把一些盲目排外事件当作爱国义举而赞颂，斥徐投降与此密不可分。

不准夷人租住神光寺是鸦片战争后延续多年和涉及许多地区的反入城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由广州开其端并一直以广州为榜样的。因此，在神光寺事件中双方的辩论很自然地涉及广州。林氏对鸦片战争后广州人民不准夷人入城一直持肯定态度。他在复粤督的信中写道："承示粤民可用，弟尝谓今之所恃，惟此一端。今经执事为之作新，更可供指臂之使。并闻新来头目，颇以前此之恣纵为非，想可就我范围，消其反侧，从此福星坐镇，海波不扬，当可延颈以俟矣。"[21]在 40 年代，西方官员一提出依据条约进入广州城的要求，往往就受到几万乃至十万民众的包围阻遏，一直未能如愿。不但林则徐为之欣慰，视作救国妙道，自皇帝至各级官吏和士绅也同声叫好。只有少数头脑清醒之士心存疑虑，不肯亦步亦趋，徐继畬就是其中之一。

广州及其周围地区民众的反英斗争经历了不同阶段。在鸦片战争期间，那是伸张正义，反对侵略，捍卫国家尊严的神圣事业。在战争结束订立和约以后，情况就比较复杂了。那些斗争总的说来是战争余波，但起因和性质各异。有的仍带反侵略性质，如反对强租广州的河南地区。有的是外国人欺压中国民众引起的反抗。但也有些冲突中国方面并不具有明显的正义性。这个时期民众斗争的主题——反对洋人进入广州城就很难说是明智的。让外国人入城，

有利于逐步扩大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也有利于维持付出高昂代价方才取得的和平局面。而这两条已是促进中国社会进步必不可少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人群在相互接触中出现矛盾乃至冲突并不奇怪，只要善于引导便有可能逐步化解。福建“民夷相安”的局面就是一个范例。不让外国人入城会不会有利于国家和人民？除了某种虚幻的心理满足外，便很难找到什么有益的效果了。

深入一步看，广州地区阻遏洋人入城带来很大恶果。早在1887年，薛福成就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议论：“粤民激于前此大府议和之愤，万众一辞，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为快，屡请屡拒，纷纭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约，皆成于此，由今观之，甚无谓也。……夫民气固结，国家之宝也，善用之，则足以制敌；不善用之，则筑室道谋，上下乖睽，互相牵累，未有不覆败者。”[22]人们也许会说，这些都应归罪于英法等西方列强，没有他们的种种罪恶行径怎会出现如此局面？这自然有一定的道理。本文无意全面论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及法律、道义的罪责。英法等国自然有许多应谴责之处。但在国际关系中，只有弱者才会指望别国发善心。如果当时的政府不是如此昏愦，那些官员们在“民气可用”的藉口下蓄意利用民众的落后心理，从而使冲突日趋尖锐，历史呈现另外一番面貌不是没有可能的。

由此引出两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第一，为什么会把排外当作爱国？

从广州反入城到福州神光寺事件都具有盲目排外的倾向。但包括林则徐这样的杰出人物在内，都深信这些是爱国大业。按主观动机，这些事件的组织者和参加者都不乏爱国热忱，他们参加这些活动毫无私利可言，有的还为之献出了生命。但从客观效果看，都是对国家正常发展的困扰，甚至导致恶劣的后果。

原因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消极因素中去寻找。同世界一切民族的文化一样，中国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盲目的自

我中心和自大心理就是其中突出的负面因素。这类古老的民族文化心理以宗法自然经济为基石顽强地孳衍，一再成为正确处理对外关系的障碍。鸦片战争以后，朝野上下被迫接受屈辱的现实，这种心理未变，并衍生出许多奇特的理论去满足这类畸形心理。除了西学中源，中体西用等流行一时的理论外，还突出表现在把敢于提倡同外国人友好相处，虚心学习西方之士视为汉奸、卖国贼，而把各种反对西方各国的言行不分是否合理都看作爱国壮举。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就曾身受其害。据他观察，19世纪的中国士大夫的流行风气是“但以诟毁洋人为快，一切不复求知”，“一论及西洋事宜，相与哗然，以谓夸奖外人，得罪公议”，至使有识之士“切切焉以评论西人长处为大戒。中国士大夫愦愦如此，虽有圣者，亦且奈之何哉！”[23]

像林则徐那样伟大的历史人物，也难免受到这些社会思潮的影响。他深受传统文化的的熏陶，刚睁开眼睛看世界便被迫滞留边陲，沾染一点错误思潮，又有什么奇怪呢？

第二，为什么当代史家也跳不出误区？

徐林之争在清季就有不同的议论。徐继畬传的作者承认：“其时士大夫顾多是文忠而非公。”[24]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是个必然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也视此为无可怀疑的结论。早在50年代，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的编者就断言：“继畬对英交涉，持投降主义，与退居在福州的林则徐议论不和，颇为时论所非。”[25]时值朝鲜战争结束不久，仇视帝国主义正成为一时风尚；加上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念深入人心，史家们热诚地赞颂群众斗争；社会情绪激化成了谴责徐氏投降的思想基础。时间过去了30年，已经到了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恰当时机，方家们却依然不加分析地沿用如是的结论。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疏忽，除了对民族英雄的偏爱，怀疑和经常重新审查一切的理性精神也嫌不足。而这正是思想文化进步的不可缺少的

前提。“凡事只看其理如何，不要看其人是谁。”“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26]先哲名言，应该记取。

中国好不容易才打开大门。所付代价之巨，世界史上绝无仅有。历史一再证明，商品经济没有高度发展，经济和文化尚未现代化之前，民族自大和封闭心理甚难根除。史学有责任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揭示真相，弘扬进步，鞭笞落后和谬误。因而不揣浅陋，信笔写来，聊博读者一哂。

（作者袁伟时，1931年生，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

注释：

① 来新夏：《林则徐年谱》(增订本)49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②③⑭ 《松龛先生全集》332页，306页，49页，701页。文海出版社，台北。

④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卷三，中华出局1979年版，46、56、116页，北京。

⑤⑥⑦⑫㉒ 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一)108页，114页，201页，233页。上海出版社，1978年。

⑧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四，145、137页。

⑨ 《闽侯县志》卷69列传五下：《林则徐传》。

⑩⑪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31页，35页。三联书店1957年。

⑬ 梁廷枏：《夷氛闻记》，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六)85、87页，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上海。

⑮⑯ 徐继畬：《瀛环志略》，卷九，29页，10页；卷四10页。日本阿波对嵋阁版1861年。

⑰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26页，岳麓书社1987年，长沙。

⑱ 林则徐：《致姚椿木》，《林则徐书简》307页，福建出版社1985年。

⑲⑳㉑ 林则徐：《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178页，242页，293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

㉓ 《郭嵩焘日记》(三)11页，634页。湖南出版社1982年。

㉔ 杨笃：《松龛先生传》，《松龛先生全集》701页。

㉕ 《鸦片战争书目题解·退密斋文集》，《鸦片战争》(六)471页。

㉖ 《陆九渊集》468、472页，中华书局1980年。

●郦永庆

神光寺公案辨析

——兼谈徐继畲外交策略思想

鸦片战争，使独立的中国开始一步步地沉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同时也是中国由封闭走向世界的契机。鸦片战争期间及战后，林则徐与徐继畲都开始寻求有关世界各国的新知识。林则徐曾在广州组织人翻译了一些外国书报的资料。他手下的梁进德译成一卷《四洲志》。魏源经过努力，在《四洲志》基础上写成《海国图志》一书。差不多同时，徐继畲在福建收集外国人出版的地图和书籍，经过五年辛勤努力，道光二十九年出版了十卷的《瀛环志略》。《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在我国是系统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最早的两部著作。应该说林则徐与徐继畲都是近代中国最早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杰出人物。

道光三十年，林则徐与徐继畲在福建神光寺事件中意见不同，史学家一般将神光寺事件看成福州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入城的斗争，并把这场斗争说成由于清朝官吏破坏而遭到了失败。时任福建巡抚的徐继畲被看成妥协派、投降派的代表人物。神光寺事件导致了徐继畲在政治上失势，而病中的林则徐则被重新起用，作为钦差大臣去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尽管林则徐与徐继畲都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但后人对他俩的评价却大相径庭，前者

是抗英斗争的民族英雄，后者却是投降妥协的庸吏。这似乎已经定论。笔者近年来查阅了有关的档案资料，感到这一结论有失偏颇，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有必要加以澄清。本文拟用档案资料，对神光寺公案进行考证、分析，并对林则徐和徐继畲在神光寺事件中的意见分歧问题加以探讨，以期得出比较符合历史的结论。[①]

一

我们在探讨神光寺事件以前，首先要搞清鸦片战争之后徐继畲在福建任上对外交涉活动的核心思想究竟是什么？

道光二十三年四月，徐继畲由广东按察使迁任福建布政使。五月，刘韵珂由浙江巡抚迁闽浙总督。刘韵珂在任闽浙总督七年中，外交上基本上依赖布政使（后为巡抚）徐继畲。道光二十六年十月二十日刘韵珂接奉上谕：广西巡抚著徐继畲补授，福建布政使著陈庆偕补授。刘韵珂立即上奏了《密陈夷务急需得人》一折。刘韵珂认为，闽省夷务“虽稍减于广东，而实难于江浙”。原因是“江浙通商，每省均止一口，又距省城较远，有府道县为之维持，均不甚难。闽浙则两口通商，一在南台，逼近会垣，为入省门户；一在厦门，孤悬海外，为台内咽喉”。另外“英夷领事又驻居省垣，稍有未周，即难保不别生枝节”。刘韵珂说：“臣自莅闽以来，时深顾虑，幸得新授广西巡抚徐继畲，熟悉八闽利弊，洞晓各夷情伪，遇事熟筹密商，时向厦门道恒昌指授机宜。故虽英夷或间有背约要求，或夷商因纳税狡狯，或华夷因语言不通，口角争斗，均可设法随时了结，相安无事。”刘韵珂在赞扬了布政使徐继畲后，即表现出对福建巡抚郑祖琛的不满：“夷性偏执，非其所习好相信之人，竟难冀其听受。是以抚臣郑祖琛到任已及半年，英夷领事，从未禀陈一事，亦绝不至署请谒。”因此英人“事无巨细，无不求地方官，带赴藩署商议，一经徐继畲相机开导，靡不帖然悦服。其开导之法，悉与臣意见相符”。刘韵

珂坦诚地说："是闽省夷务，日形繁重，其得以无误，并可数年相安者，徐继畬之力十居八九，臣实不敢掠人之美为己有也。"而"欲求如徐继畬之人地相宜者，实难其选"。刘韵珂最后写道："臣为夷务紧要起见，谨不揣冒昧，缮折密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臣无任惶悚待命之至！"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道光帝在刘韵珂密奏上朱批："国事为重，何冒昧之有！"接受了刘韵珂的意见。即刻下了谕旨，将新任广西巡抚徐继畬与福建巡抚郑祖琛互调。[②]如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福建对外交涉活动的实际中心人物是徐继畬而不是刘韵珂。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徐继畬在福建任上推行了对夷惠而对民猛的对外妥协政策。这一结论有失偏颇。笔者前几年在清宫档案里发现了闽浙总督刘韵珂在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五日上奏的一件留中密片。刘在密片的结尾处写道："所有臣等年余中筹办福州夷务事宜，并年来揣测夷情，因均关机密，正折内不便胪叙，谨附片内详细密陈，伏乞圣鉴。再，臣等所办各情，因夷性阴狡，巧于窥探，故除藩司外，余人皆未知悉。皇上垂览之后，并乞俯赐留中。"道光帝在密片上朱批：所见所办俱好，切不可令该夷知觉，是为至要。并密谕刘韵珂："驾驭夷人事宜，密之又密，不可稍露端倪，致令有所藉口。"[③]根据刘韵珂的密片及道光帝的谕旨，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1. 密片说除藩司徐继畬之外，余人皆未知悉，证明这一策略是刘韵珂和时任布政使的徐继畬密商之后制定的。2. 道光帝对这一策略是完全赞同的。3. 道光帝再三强调密之又密，说明这一对外政策不仅英人不知道，而且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也不清楚。

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时，道光帝可以同意侵略者割地赔款的要求，而不愿意福州开埠通商，其原因有两点。首先，福州是省会，华夷杂处，自然要影响统治阶级的政治威望。而维护天朝统治阶级至尊无上的"光辉形象"，是道光帝对外政策的基石。所以当耆英上奏："若坚拒不准，许易他处，该夷既以天津藉口，诚恐又添枝节"

时，道光帝立刻软了下来。英人如在天津开埠通商，其政治影响自然要比福州大得多。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时道光帝才不得不同意福州开埠通商。刘韵珂、徐继畬认为，英人是为了收买茶叶而要求福州开埠通商的，如果断绝了英人的茶叶贸易，"则福州一口虽有如无，该夷不能开市，其势自难久住，庶上可以副圣意，下足以靖海疆"。因此他们在英人未到福州之前，则在"茶商应行经由及可以绕越各处，节节设卡稽查，使内地贩茶之人先多阻碍，则人情不以为便，必仍贩往粤东等省行销，不复来福"。道光二十四年五月，英人李太郭到达福州，刘韵珂、徐继畬"密派文武员弁，分赴各地查访，不准稍有偷漏。一面又委熟悉之员，向省城内外之巨商大贾密加晓喻，以夷人在省会通商，非有益于地方之事，总宜令其废然而返，方为长策，劝令各该商等勿得即与互市，俾免在此勾留"。[④]由于刘韵珂、徐继畬暗中下令华商不得与英商互市通商，使英商处于困境，所以福州开埠多年，实际上并没有开展对外贸易。

英人入城问题是福州开埠后的重要事件。人们认为"闽浙总督刘韵珂因福州人民反对，只准英国领事李太郭在城外设立领事馆"。[⑤]这种说法并非事实。道光二十四年九月，英人德庇时来福州查看码头时，以英国领事李太郭住处卑陋为由，提出了李太郭移居城内的要求。刘韵珂、徐继畬查核原议和约，载有领事准住城邑之语。所云城邑二字原指城内而言，该夷所请本非违约要求，特以省垣重地，与省外之郡县不同，且其所指之白塔寺地方居民稠密，未便与该夷错处其间。故先以和约内城邑二字系兼指城内城外。该夷前来通商，自应在城外居住之言，由徐继畬向英人说明。同时他们"密令绅民许有年等，联名赴署具呈请阻，欲令该夷知舆情不顺，或行中止"。另外又令地方官"在南台觅得宽大民房数处，引令李太郭前往相度"。以上这些措施都是刘韵珂、徐继畬"委曲筹办之策，原欲拒其入城，以免华英错杂"。[⑥]也就是说，为了不让英国领事入城，又必须有恰当的理由，刘韵珂、徐继畬才密令绅民具呈请阻英

领事入城。这就是福州开埠之初所谓福州人民反对英国领事入城的内幕。

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英国领事李太郭又私向城内积翠寺僧人租房数间，搬入居住。刘韵珂、徐继畬却未加拒绝。六年之后，徐继畬在处理神光寺事件时，向咸丰帝透露了当年英国领事李太郭搬入城内积翠寺的真情。徐继畬说："福州一口，当道光二十四年开关之际，英夷派有领事夷目李太郭来福驻扎。李太郭即欲在城内租屋居住。时臣徐继畬尚在藩司任内，经臣刘韵珂密与商酌，以夷目准住城邑，虽已载入条约，但城厢重地，使丑类杂处，诸多未便，务当设法拒绝，方臻妥善。惟官为禁阻，该夷必以有违条约藉口，必须密约绅耆居民，公同出阻，然后臣等再以众心不服，众怒难犯等情，危词耸动，或可使之畏葸中止。随饬前署侯官县保泰向绅民密为授意，并令先具联名公呈，以便由县据此照会。俟李太郭进城之日，再行邀集多人，在南门外坚持力阻，俾臣等得以措词理拒。讵联名具呈者虽有二百余人，迨李太郭入城之日，绅耆士民，竟无一人出城阻止。闽县差役家丁，上前劝阻，几致决裂。李太郭随入城租住乌石山积翠寺房屋。"[⑦]由此说明，徐继畬当年是反对英国领事居住城内积翠寺，并且暗中布置了福州绅民加以阻止。但在英领事入城的关键时刻，福州绅耆士民无一人出来阻止英国领事入城。这一现实打破了徐继畬原来的设想和安排，迫使他放弃利用民众力量阻止英人入城的计划。刘韵珂在道光二十五年三月给道光帝的密片中奏陈，同意英人在乌石山积翠寺设立领事馆的三点原因：1.英人提出的租住积翠寺僧寺是城内荒凉僻静之区，与民居并不毗连，没有华夷错杂的忧虑。另外，英国领事进城仅两三人，亦无虑其向民滋扰。2.民间没有不令英人入城之意，许有年等呈请阻止，系臣等密令具呈，并非绅民本谋。3.最关键的是，英人在福州未能开市，无利可图，难保不另乞别处码头，以求足原给五处之数。这一点提醒了道光帝。他即在密片上朱批道：所见周到之至。并在上谕中说：

"该夷酋等情既诡诈,性复贪刁,惟有设法羁縻,妥为驾驭"。英人请租积翠寺问题,"自应准其暂住,以顺夷情"。完全赞同了刘韵珂、徐继畬的意见。[8]刘韵珂、徐继畬在允许英国领事租赁城内乌石山积翠寺时,又与英领事议定,只许领事馆人员入城居住,而英商租屋居住须经地方官盖印,方能生效。

以上说明,鸦片战争后,徐继畬在福建任上推行的并非是对夷惠而对民猛的对外政策,而是推行了"明示德意,阴为钳制"的对外政策。正如刘韵珂在密片中所说:"臣等惟有与藩司(即徐继畬)尽乎力之所能为,阴加阻挠,密为钳制,使该夷不能即遂所谋。外则仍待以德意,曲示羁縻,使其冥然罔觉,无以借词生衅,以免枝节。如能仰赖皇上福庇,福州竟不通商,数年后,该夷灰心而去,则省城根本重地,不令非我族类者实逼处此,殊为万幸。"[9]也就是说,表面上仍恪守条约,民夷相安,使英人找不到挑起边衅的借口,而私下设卡阻挠内地贩茶之人来福州,并晓谕省城内外巨商大贾,勿得与英人互市贸易,使英人在福州不能通商,最终迫使其灰心离开福州。

二

我们在搞清徐继畬对外策略思想之后,进一步考察他在神光寺事件中的表现。

道光三十年,英国驻福州领事若逊回国,由翻译官金执尔代理领事,办理通商事务。六月间,一名英籍传教士和一名英籍医生来福州,金执尔代他们向城内乌石山下之神光寺僧人租屋一间,并将租约送侯官县用印。侯官县令兴廉"忆及上年曾有夷官租赁城内寺屋收存行李之案,误为事同一律,即于租约内用印交给"。[10]如前所述,徐继畬同意英国领事李太郭及其他领事馆人员住进福州城内积翠寺,但仍然严格禁止外国其他人员入城居住。现在侯官县令兴

廉在租期半年的契纸上盖了印，也就承认其他英人入城居住为合法。此时刘韵珂在外阅伍，徐继畬得知这一消息后，即以该县兴廉办理错误，严行申斥。兴廉即向英官金执尔言明错误，嘱令遵约搬移。这时金执尔提出索要照会，兴廉即根据刘韵珂、徐继畬与英人议定的条约，照会金执尔，让寄居神光寺的英人在福州城外另行租赁。金执尔将照会抄呈香港总督文翰查核，并回答侯官县令兴廉，英人是否应出城，须俟文翰批回后办理。在这以后，福州绅士缮写公启，交侯官县转致金执尔，令神光寺英人立即搬出。不久，神光寺生童以神光寺系当地生童会课之所，难容英人租住。应各约会同至寺内，与英人讲理，公具告白。同时福州街头出现了“某日定取夷人首级”粘贴字条。金执尔接到公启，又见公白字条，两次到巡抚衙门投递申陈，声称是否退租神光寺需待英国香港总督文翰批复处理，并要求福建巡抚保护。徐继畬表面上曲存英人要求，派兵役在神光寺附近弹压巡防，但同时又照会金执尔“以讲经夷人，现尚未得住处。岂忍逼令搬移，致使露处。但省中绅民，既不甘愿，必难日久相安，只好在神光寺内暂行借住，不准租赁，一俟城外觅有妥善房屋，即行退还”。一面致书士绅，称“此时若将两夷人逐出”，英国“势必借为口实，以兵船入港滋扰”。并饬该管府县密谕生童，从缓设法，使英人“心愿情服，自行搬迁，方为正办，断不宜操之过急，致令别生枝节。”[11]让生童多体此意，勿再肇衅。不久生童就默喻止息了。徐继畬采取的两面手法，使“该夷疑团已释，该绅士亦无异词”。至于侯官县知县兴廉办理错误，咎有应得，徐继畬将他“先行饬司记过，仍责成他从容布置，务令该夷人等自愿搬移”，如果不知愧奋，“办理始终失当，即当从严参办，以示惩儆”。[12]刘韵珂阅伍回省之后，查知徐继畬办理此事，不动声色，暗中筹画，必欲使该夷搬出城外，并不为倡议强逐之数绅所摇。认为徐继畬所办极为合宜。刘韵珂、徐继畬知道英人“所租寺屋非常破旧，即饬令鹿泽长授意闽、侯两县及委员郭学典，“以士民公议，如有敢与夷人修理寺屋者，即捆

送重惩，并将其住房拆毁，向泥作木匠等人遍为晓谕，又向城厢居民遍为告述，仍以士民公议为词，不准赴该寺听经就医”。当有生童投递公禀时，他们将生童传至署中“复以前情密为指授，嘱其分投禁阻，各生童皆欣然而去”。并饬鹿泽长照会英官星察里“以众怒难犯各情，面向该夷目明白开导”。[33] 刘韵珂、徐继畬恐怕各庙僧贪利，向英人私自租屋，所以又密饬鹿泽长转饬两县：“除南台港口房屋，准照条约租与英人居住外，其城内及东西北关外所有寺庙，士民公议一概不准租与英人居住，均令住持僧具结存案”。[34] 当他们得知神光寺行医英人医死两人的消息，立即令鹿泽长“密遣亲信广为传播，数日内即无就医之人。行医之人急欲搬出，而讲经之夷未允。现虽同住一寺，不时争论，业已分炊，其势似难久住”。刘韵珂、徐继畬抓住这一机会，即密饬鹿泽长等“随时随事劝谕，务令及早搬移，勿任久居城内”。[35] 九月间，福州连日阴雨，英人所住之神光寺房屋渗漏不堪，遍觅瓦匠，无敢往者。英人星察里多次向兴廉恳觅匠人，兴廉回答：“百姓不愿，断难相强。且神光寺无人收租，白住房屋亦伤体面，不如搬去为妥。”[36] 这样英人无可奈何，分别于十一月二十八、十二月二十等日，先后搬至英翻译官所租赁的道山观，将神光寺房屋交还。这件事也渐就平息了。

综观神光寺事件始末，正如徐继畬所说：“臣等现办此事，虽不动声色，无非保民以拒夷，并非强民以从夷。有驱夷之实，而无驱夷之迹。不拂民之情，而可灭夷之口。此皆臣等镇静筹办之实在情形也。”[37]

但是在英人租住神光寺之后，围绕着如何对待和处理英人租住神光寺问题，统治阶级内部却展开了一场斗争。道光二十九年九月，道光帝下旨准予云贵总督林则徐病免。道光三十年四月，林则徐返抵福州。英人租住神光寺后，林则徐串联了一些士绅，书写公启，质问侯官县令兴廉。七月林则徐又带头联名上书福建巡抚徐继畬，要求效法广州，立即驱除神光寺的英人。与此同时，林则徐联络

了在京的福建籍官僚，先后上奏谴责闽浙总督刘韵珂和福建巡抚徐继畬。七月十八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铭恩上奏，英人借住神光寺，“经该士民迭次呈控，并公给该夷书信，明白劝止。现闻致信之后，该夷仍执印文，不肯退租。地方官意存迁就，有带兵护送该夷入神光寺之说”。孙铭恩痛斥福州官吏：“强民从夷，是何肺腑”。[18]七月二十八日，工科给事中林扬祖上《英人租住神光寺绅民反对而官方不为办理折》。林扬祖说：“福建省城内乌石山积翠寺，被奸僧赁与暎夷为望远探船公馆。经督臣刘韵珂从权应允，夷官居住省城内，民间惶恐已非一日”。他进一步指出：“设官所以卫民，官非民无与共守，民非官无与为依。夷人无他伎俩，所恃者，官民未能一心，因得售其奸计耳”。[19]八月初一日，湖广道御使何冠英上《英人租住神光寺民人反对而巡抚徐继畬一味畏葸折》，言词激烈，指责徐继畬袒护属员，徇庇汉奸，不能振作以胜疆寄。[20]十月十八日，何冠英又上了《福建英人占寺院民房钉塞大炮督抚畏葸请查办奏折》及《闽浙商船多雇英轮护送英人并枪伤幼孩奏片》。何冠英说：“闽省夷情叵测，渐有蔓延。霸占省城内外各寺，强买民房起造楼屋，并钉塞炮眼。骑马数人四处踏勘，经各乡民驱斥，地方官反为禁阻”。他在奏片中又说：“闽浙商船多雇夷船护送，该督反谓水师巡缉之功。又夷人用鸟枪打伤幼孩，该督委员查检，含糊禀复，贿和了事”。何冠英怒斥刘韵珂、徐继畬“畏葸性成，苟安旦夕，以通商为掩耳之计，以和约为护送之符，即谕旨森严，亦不过含混其词，一奏塞责。惟有仰恳皇上天恩，俯念夷情叵测，省会濒危，特简公忠体国威望素著之大员，迅赴闽疆，严密查办”。[21]在接二连三的参奏之下，咸丰帝谕令两广总督徐广缙，按照何冠英参奏折内片内所指各情，“逐加访查，果否实有其事，并督抚现在能否设法抚驭之处，据实具奏，毋稍瞻顾”。并申饬刘韵珂、徐继畬：“该督抚身膺疆寄，抚驭之道，岂竟毫无主见，任令滋扰，何以并无一字奏及？”再次下令刘韵珂、徐继畬据实复奏闽省实情，不准再有回护。[22]两广总督徐广缙

遵旨调查英人在闽情况，在未得到前往闽省确查英情人员禀复之时，就上奏咸丰帝："该省民夷既不相安，官民又复不协，诚恐别生枝节，相应请旨，将该督抚先予薄惩；一面责成抚夷安民。民心既不动摇，夷情自归驯顺。倘再饰延，即予严谴。"十二月十一日咸丰帝以"徐继畬职任封疆，抚民防夷，责无旁贷。乃于降旨敕查至再至三之事，日久并不奏闻。是既已错误于前，又复因循于后，漫不关心，成何事体？徐继畬著传旨申斥"。十二月十八日，咸丰帝又收到了徐广缙有关"福建土木匠人不受英雇地方官出示严拿请敕查参"的奏片。他说："工匠等人执业本微，乃亦知顾名义，不肯腼颜顺夷，可见天理民彝，不容泯灭。地方官顾必极力挫折，以助夷人之虐。臣不知其是何居心？应请旨敕交新任总督裕泰，秉公查参，严加惩办，以为抑民奉夷者戒"。二十六日咸丰帝着裕泰："刘韵珂、徐继畬等，频年办理夷务，有无措置失宜及迁延消弭之处？一并详细密查具奏，毋得有不实不尽之处"。[23]

必须指出，徐广缙、何冠英奏参刘韵珂、徐继畬各情，完全失实。徐广缙后来接到前往福建查探英情的委员禀复，并面加询问，所谓英人租住神光寺后，又将东门外之鼓山寺、西门外之西禅寺亦行占据。并南门外之银镶浦、水部门外之路通桥，强买民房，起盖楼屋各情。事实上，除英国领事馆人员在城内乌石山积翠寺居住。"其余各国贸易夷人，均在城外南台、中洲等处，租赁民房而居。"神光寺英人，在绅民公呈驱逐后，福州地方当局曾带他们在城外选择住址，起造房屋。有幼孩多人，乘英人出进之时，丢掷瓦片，喧呼驱逐。闽县知县来锡蕃出有告示，以该处系在城外，与原约相符，不得借口生端。并无骑马夷人，四处踏勘，经各乡民驱逐，地方官反为禁止之事。所谓英人钉塞炮眼，及英人轮船向经过商船索银三百圆护送过浙，则与事实不符。英人用鸟枪打伤幼孩，实系广东人放枪打雀误伤。徐广缙最后以"夷情如此骄纵，即恐难免复生事端"为由，又详细询问该委员。当据禀称：密访夷情，佥云，连年福建港口贸易

亏本，该国王极不愿其多事。[24]委员调查的这一情况很重要，说明徐继畬对外策略是有实效的。

另外，新任闽浙总督裕泰到任后，也立即进行调查。再一次指出，何冠英参奏刘韵珂、徐继畬各情节，均与事实不符。刘韵珂、徐继畬复奏各情，"尚无不实，亦无掩饰情弊"。裕泰的调查表明，除侯官县知县兴廉办理英人租住神光寺事件一案实为荒谬，刘韵珂、徐继畬未能参革外，"此外实无措置失宜及迁延消弭之处"。徐继畬对侯官县知县兴廉也无回护徇庇别情。裕泰最后的结论是：福州口岸，自道光二十四年通商以来，迄今八载，民夷贸易互通，彼此均极相安，绅耆亦无异说"。[25]值得一提的是，神光寺事件期间，咸丰帝得知，英国火轮船驶进台湾鸡笼口停泊，企图采购台湾煤炭的消息，下令加强台湾的防御。徐继畬的态度是："海外严疆，断难容异类杂处，但使台地文武，联络绅民，同心敌忾，协力防范"。其措施是，"以委员会同淡水同知史密，邀集绅民，公议严禁挖煤，立有禁约，复刊碑碣，重申厉禁"。不久徐继畬"又密谕该镇道，并由省派委员干员，前往会督该处文武，传集绅民，谕以大义，怵以利害，务令全台百姓，亿万一心，互相查禁，使该夷恍然于煤炭之未得采购，实由民自为禁，实非官与作难"。[26]同时又下令查明各口要隘，相度形势，妥为布置，镇静密防，不露形迹。由此可见，徐继畬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的策略与处理神光寺问题作法相同。

综观徐继畬在神光寺问题上的态度，平心而论，确实是主张驱逐英人的。他所采取的依然是"明示德意，阴为钳制"的策略。由此可见，把神光寺事件简单地说成福州人民的反入城斗争，并把这场斗争说成是由于清朝官吏的破坏而遭到了失败，是不符合历史本来面貌的。

三

人们会问，徐广缙、裕泰等大员已先后上奏，澄清了徐继畬在神光寺事件中实无措置失宜之处，为什么咸丰帝仍然下令将徐继畬招回北京，致使徐继畬离开政治舞台十三年之久？我们联想到福州开埠通商之初，道光帝对徐继畬的“阳示德意，阴加钳制”的对外策略极为赞赏。然而时过境迁，在神光寺事件中，徐继畬这一策略不仅遭到了统治阶级内部攻击，而且受到咸丰帝的冷遇，其原因又在哪里呢？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道光二十五年刘韵珂曾在密片中说：“臣等经理夷务数年，稍窥底蕴。其意正是图利，并无不规之谋。盖其国离中国七八万里，水程绵远，势不能跨越大海，尽率丑类，占我地方”。刘韵珂又说：“论者以该夷受抚之后，不免仍有桀黠之端，恐本年银款交清，或又另启边衅。不知该夷之间形桀黠者半则仍为谋利之计，半则欲中国加以优待，以为荣幸，初无别情。此时抚之之法，惟有刚柔互用，持大纲以折其骄，宽小节以顺其意，则边圉自必久安，可以仰纾宵旰”。也就是说，英国并不像中国历史上所遇到的外敌那样，要来进行掠夺，占领地方，直至来当中国的皇帝。他们只不过是为了通商，只要抓住通商这个大纲，就可以折服英人，就能顺利地加以羁縻和控制，不至于出大乱子。道光帝非常赏识刘韵珂的见解，亲笔在密片上朱批：所论甚是。[27]

但是道光二十九年广州民众反入城斗争的胜利，使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初九日，道光帝收到了两广总督徐广缙和广东巡抚叶名琛上奏的暎夷不敢进城，已见明文一折，及广东绅士公启底稿。道光帝在奏折上朱批：“所办可嘉之至！朕心甚慰。如此棘手之事，卿不动声色，使彼自屈，较之军功，尤堪嘉尚”。又在绅士公启上朱批：“远胜十万之师，皆卿胸中之

绵绣，干国之良谋。嘉悦之怀，笔难尽述也。”并在上谕中说：“卿等读朱批之语，具见朕忻慰之忱，早晚事竣，必膺懋赏”。“该夷既不畏兵而畏民，则收服民心，即可化其骄而制其命”。道光帝下令发去黄珊瑚豆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白玉四喜搬指一个，白玉烟壶一个，著徐广缙祗领。[28]四月十五日道光帝又收到了徐广缙等关于“英人罢议实因民团齐心并恳优加褒奖”的奏片。徐广缙说：“自正月二十七日以后至三月二十日，居民则以工人，铺户则以伙伴，均将其强壮可靠者充补，挨户注册，不得在外雇募，公同筹备经费，置造器械，共团勇十万余人”。道光帝阅读到此，即朱批道：“朕初不料卿等有此妙用”。徐广缙的结论是：“嘆夷罢议进城，实因省城官民齐心保护，防御森严。畏葸中止，是声威远播，已属信而有证”。当日道光帝颁布上谕：英人“入城之议已寝，该夷照旧通商，中外绥靖。不折一兵，不发一矢，该督抚安民抚夷，处处皆抉根源，令该夷驯服，无丝毫勉强。可以历久相安。朕嘉悦之忱，难以尽述。允宜懋赏，以奖殊勋。徐广缙著加恩赏给男爵，准其世袭，并赏戴花翎，以昭优眷。发去花翎二枝，著徐广缙、叶名琛分别祗领”。[29]

统治阶级中相当一部分人从广州民众反入城斗争中受到了巨大鼓舞。他们把民心可恃看作是对华夷观念的支持，希望用民众的力量来恢复鸦片战争前中外体制的格局。

闰四月兵科给事中曹履泰上奏：徐广缙、叶名琛等“能内禀指示，外察机宜，识夷人之无能为，知民情之大可恃，故能镇静持平，不劳而理”。但是五口通商码头，只有广东不准入城。他奏请“敕下江南、浙江、江苏督抚，晓谕夷人，毋许越境闲游，以杜后患而息祸端”。并奏请：“只准夷人在就近衙署递禀，毋许大员入夷馆面商”。曹履泰认为，这“于国体大有关系”。道光帝立即下令五口通商地方毋许英人越境闲游。[30]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驾崩，咸丰帝继位。新皇帝深受广州反入城斗争之鼓舞，又不满于战败带来的耻辱，对外政策也强硬

起来。

四月，英国公使文翰派商务监督麦华陀前往大沽投书，引起了清廷的一阵紧张。五月初三日兵科给事中曹履泰上奏林则徐为英人所敬畏，请令其回京协办交涉一折。曹履泰认为，"粤东夷务，林始之而徐终之。两臣皆为暎夷所敬畏"。现在暎夷顽梗不化，因之他建议咸丰帝"速令林则徐赶紧来京，候陛见后，令其协办夷务"。他断定如此办理，"英夷必望风而靡，伎俩悉无所施，可永无宵旰之虑矣"。当天咸丰帝下令刘韵珂等转饬林则徐迅速北上来京。初五日咸丰帝得知英船起碇南返，即下令沿海督抚预为筹防，咸丰帝在上谕中说："文武官员，总须慎选得力者分布防堵。其一味卑谄懦弱者概应更换。经此敕谕，倘有疏虞，惟该督抚提督是问。其福州向准通商，且有夷酋在城居住，平日尚属相安。惟当此夷情浮动之际，刘韵珂、徐继畬亦应留心察看，择要密防，切勿恃其日久安静，致有猝不及防之患。"[31]

徐继畬奉旨复奏福建筹防情形之后强调："惟暎夷此时并未露蠢动形迹，办理一涉张皇，不特居民惊扰，且虑夷人猜疑肇启衅端。祇可暗中筹画，外面仍寂然无事"。仍然坚持原有的对外策略。

五月十一日江西学政张芾上奏，讲求海防："自夷人受抚后，疆臣狃于无事，不思振作。"他认为，"沿海文职大员，尤以固结民心为第一要义"。奏参浙江宁绍台道咸龄，前在苏松太道任内，惟夷酋之言是听。指责他在浙"仍以纵容夷人为事，且其眷属竟与夷妇往来。损国体而拂舆情，堕军威而长寇志，莫此为甚。应请旨敕该抚查明，即予罢斥"。但是浙江巡抚吴文镕调查的结果是："宁绍台道咸龄，在浙经理夷务，均尚得体。兹臣钦奉前因，详加访查，委无纵容夷人及过于卑谄之处。且在宁波海口领事夷酋索利完，人亦安静，从无要求，该道亦无所用其纵容卑谄"。既然如此，咸龄为何受到攻击呢？这就需要我们搞清一个细节。原来"时值年节，该夷酋曾备席邀请该道府县等到馆饮宴，极其恭顺。该道等因其邀请在先，亦经

备席回邀，彼此以礼接见，此外无事即不相往来。至该道眷属，绝无与夷妇往来之事”。[32]由此可见，统治阶级内部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从夷夏大防的观点出发，把一切正常的对外交往，也都看成是纵容卑谄外人之事。他们以传统的忠奸教条出发看侵略者的本质，认为“华夷相安，总在地方官廉明公正”。福建学政黄赞汤说：“大抵夷人亦非全不讲理，只要地方官处置得当，又须平日居官清正，彼亦心服。从前之所以迭生事端者，皆地方官之办事不足相服有以启之也。故当朱桂桢抚粤、林则徐督两广时，虽拆马头，烧烟土，亦遂帖然畏服，可见守边抚夷，全在地方官之廉明公正也。”这就意味着，凡是民夷发生纠纷的地方，该地方官必然不廉明公正。咸丰帝认为言之有理，“著沿海各督抚按照该学政所奏悉心体察”。[33]难怪当时有位按察使衔的江苏苏松太道麟桂奏陈：“至夷人最惧粤人，且广东人深悉夷情，素称勇敢，遇事齐心，夷人虽忌，而莫敢如何。即如福建厦门之兴泉永道，浙江宁波之宁绍台道，江苏上海之苏松太道，皆用广东籍贯之员，加以升衔，使之妥办，使五口声气相通，夷人更生畏忌。”他简单地认为，只要广东人办理夷务，天下就太平多了。[34]

综上所述，如果说道光帝以前对徐继畬采取的外示德意，阴加钳制的对外策略极为赞赏，认为“所见所办俱好”的话，但是在广州民众反入城斗争取得胜利后，他对此已不感兴趣，开始转变为“以民制夷”。到咸丰帝时，这一倾向更为明显。神光寺事件发生后，咸丰帝收到了徐继畬、刘韵珂不可仿效粤省禁英人入城的奏片后，气愤地说：“朕为天下臣民主，不特封疆大吏陈奏，不能逆料其虚，即绅民众论，亦岂肯遽存漠视。该督抚等果能固结民心，外抚内防，筹及久远，自不至为士民藉口，转滋事端。若徒托空言，夷患未消，民情亦怨，试问身膺疆寄，所谓好恶同民者安在耶？”[35]言路的奏参，皇帝的申饬，刘韵珂、徐继畬在统治集团内部日益孤立，迫使他们先后离开政治舞台。刘韵珂以风痹之疾奏请请假调理，道光三十年

十一月十八日咸丰帝下令:“闽浙海疆紧张,刘韵珂既系久病增剧,毋庸赏假,著即开缺,回籍调理”。[36]咸丰元年神光寺事件风波虽已平息,福建巡抚徐继畬却不得不上奏:“查神光寺所住夷人虽已搬去,第未能先事防范,实属咎无可辞。惟有仰恳天恩,将臣交部从严议处。”[37]

据此,我们说刘韵珂、徐继畬是清朝统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牲牺品。

四

最后我们探讨神光寺事件期间林则徐与徐继畬的分歧问题。在这以前,我们先澄清一些历史事实。

英人租住神光寺后,林则徐联络福州士绅上书福建巡抚徐继畬。林则徐在《福州绅士公致巡抚徐继畬信函》中说:“夷人愈进愈多,并无搬移之意。且每日辎重入城,络绎不绝。有八人共抬一长箱者,有十六人共抬一大箱者,市中人人目击,明指为炮位军械,民心倍切惊惶”。信函中又说:连日夷人又往各寺观,常川踩看,随处议租。又闻闽县前一带民房亦有几种人欲来占住,口称系为英吉利等国办事,要将房屋作衙门。等等。信函中所反映的情形与事实有一定出入。徐继畬在回复福州绅士的信函里澄清了这些情况。“查神光寺居住之两夷人,只有大小箱笼八只,早经搬入。后来续到者乃英夷翻译官星察里,随后又来一个副领事官咪吐喹嗱,带来一妻一媪,所有陆续搬入者皆系此两人行李,俱住积翠寺。其极重之大箱,南台委员曾经查问,该夷开箱合看,皆系玻璃器物及日用铜锡器皿。”徐继畬接着说明:“该夷官居积翠寺者,现止三男二女,讲经人止二人,携械炮意欲何为。此不足致疑也。”另外有关英人在城内随处租房一事,原来是英人“星察里从广东来,请有办笔墨一人,系江西人,携有妻室,在闽县地方租房居住”。因为“和约中并无夷官

所用华人不准住城内之说”，所以“未便无端拒逐”。除此之外，“实无夷人又租城内房屋之事”。[38]

上述事实澄清之后，我们开始探讨林则徐与徐继畬的分歧问题。林则徐在福建省城士民致英吉利夷官公信中指出，英教士、医生租住神光寺“实于人心不协”，因此“谨合千万人之心先为执事明白劝止焉”。林则徐援引广州民众阻止英人入城为例，在公启中说：“本地士民从前稍肯通情，遂有得一思二之请，是不以厚道为可感，直以厚道为可欺，岂本城内数十万家之人，不能为广东人之所为乎？不激之则依旧相安，激之恐众怒难犯。”[39]由此可见，林则徐主张仿效广东民众反入城斗争的形式，驱逐租住神光寺的英人。

广州民众反入城斗争是由地主绅士领导的爱国斗争。民众出于对侵略者的仇恨心理，其正义性是无可非议的。对此我们应该给予历史的理解和尊重。但是这是一种简单落后的反侵略斗争形式。广东绅士在劝导呅嗬公启中说，广州“城内居民稠密，良歹不齐，每见外国之人，易于动摇。闲人之积愤生事者有之，土匪之乘机抢掠者有之。民情习俗，均非上海、福建等处之可比”。这就充分表明，绅士们（实际上是统治阶级的在野人士）对下层民众的不信任。他们认为，下层民众若不为我所用，就有可能被敌所用，甚至成为汉奸。因此他们力图控制民众的活动范围，自然不可能看到民众真正力量之所在。公启中又说：“我大皇帝以中外为一家，怀柔远人，无分畛域。现在钦奉谕旨，亦以民心为重”。如果英人不入城，则相安无事。“我广东贤士大夫，必将敬礼有加；即乡曲愚民，亦必颂扬无已，荣莫大焉。固远胜于入城万万矣”。[40]可见绅士们的爱国激情是与忠君、夷夏大防等陈腐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种斗争很难把民众引向正确道路，甚至会给我们民族带来更大损失和灾难。

徐继畬对林则徐的这一主张持否定态度，认为“闽省绅民，果能同心协力，与地方文武一气相承，不稍退缩，则众志成城，不但现住之夷人，驱逐甚易，即有比此重大之事，当亦无求不得，尚何顾

虑。无如福州之民气孱弱，重利轻义，心志不齐，与广东情形迥不相埒，即就臣前饬阻止进城，及禁绝交易两事，已可概见”。[41]徐继畬的这番话是有根据的。长期以来，清政府对民族观念一直是很忌讳的，害怕它成为汉族反抗满族统治的口号。因此民众处于“瘝患”之中，没有明确的国家意识，他们的自发斗争大都取决于自己的家园是否遭受到损失。因此民众的反抗只能在侵略者施虐的一些地区产生。其规模有限，并不会形成全国性的高潮。福州是鸦片战争期间唯一没有成为战场的通商口岸城市，因此福州民众对西方侵略者并不了解。福州开埠之初，尽管徐继畬私下布置绅民阻止英人入城，但当英人入城时，竟然出现了“绅耆士民竟无一人出城阻止”的尴尬局面。徐继畬“办理福州夷务，已阅七年，向来福州士民，从不过而一问”。神光寺事件，“非特城内百姓不与其事，即书院诸生童，亦不过闻声应和，非特生童不主其事，即在籍绅士倡议者，亦不过两三人”。徐继畬非常清楚：“夷人畏百姓，不畏绅士。彼知蛮悍之百姓，声势既重，官府有不能约束之时”，而绅士等“仅能口诛笔伐，断不能与之用武”。[42]

事实上，神光寺事件中徐继畬和林则徐等绅民虽有缓急之分，然皆坚意驱逐，并无歧意不同之处，主要分歧就在于“调兵演炮、募勇二事”。

林则徐主张调兵演炮募勇，积极备战。他写信给徐继畬说：“辰下如何择要，如何密防，省中大中小各炮位现有若干尊？斤重若干？分安何处？所配药子斤两各若干？曾于何时派令何官何兵演放？能打及若干丈尺？其官兵可以派往海口防堵熟悉点放大炮者约有若干？精习鸟枪者约有若干？是否能保临事不至脱逃？并此外有何可为省垣保障？俾比户均获安全之处，统祈明赐谕知……亦必恭候切谕，自当迅速遵行”。林则徐是在分析当时形势后作出积极备战主张的。他认为，英人既然强占了神光寺，“势必往香港请数只兵船前来福州海口，以持强梁之凶焰，而吓积怯之恒情。若不早赐良筹，

预为准备，一旦猝然事至，又必相率惊逃，恐不成事体”。[43]因此他认为神光寺事件后，英人必然会在福州武装挑衅，所以主张借民力以制夷，备战以制夷。

徐继畬对形势的分析与林则徐不同。他说：“该夷城内城外不过十余人。大半携带妻孥，性命寄他人之手，焉敢妄动？果萌蠢动之意，必先相率而去。”徐继畬认为，并无迹象表明英人会起衅端。神光寺事件，关键谬误是侯官县令“误与县印”。既然英人有侯官县用印租榜，我方就处于被动地位。就应该防止事态扩大，不应感情用事。徐继畬主张“按约理论”，主张通过谈判，用和平的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徐继畬在回复林则徐等福州绅士的信中说：“此时若将两夷人硬行驱逐，则出尔反尔，其曲在我。该夷正在投文乘衅之时，势必借为口实，以兵船入港滋扰，是彼不来，而我实有以召之也。”[44]从外交斗争的角度讲，徐继畬的策略是正确的。徐继畬不同意演炮募勇，还有一个原因，林则徐等“绅士不能尽知”。徐继畬等“亦不敢明泄”。徐继畬说“缘福州一口，英夷本视为鸡肋，特因强求而得，不得无端抛弃。臣等早已逆料其不肯株守，故时时防范，总不予以可挑之衅，非敢过为迁就”。另外，神光寺事件之时，英人在香港，有用福建港口换台湾的说法。所以徐继畬说：“臣等若扶同绅士，调兵演炮募勇，一经各夷侦知，势必信致香港。设该夷因此借口，是以小事而堕其奸计，臣等何肯出此。”[45]

另外，徐继畬对募勇一事，本身也持怀疑态度。认为鸦片战争期间，“各省招募水勇乡勇，不下十余万人，帑金之耗于口粮者，不下数百万两，然卒不闻何处得一乡勇之力，而易聚难散，沿海地方，数年来盗贼充斥，半系乡勇流毒。臣等每论及此，辄不禁涕泪垂膺，恨填胸臆”。[46]这反映了徐继畬既想利用民众力量，但从本质上害怕民众力量的心理状态。

徐继畬在采用外交手段解决神光寺问题时，并非完全放弃了战备。他在给林则徐等人的信中说：至省港情形，虎门、闽安最为扼

要，闻少穆（即林则徐）老前辈大人曾乘扁舟阅看，正拟数日内叩谒平泉，面求指示。火药炮位已密给各营将检点查阅。但是徐继畬认为所有这些战备措施“但须暗中筹画，不敢稍涉张皇”。[47]

长期以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人们往往将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的主和思想看成是妥协投降的外交路线。徐继畬在神光寺事件中的外交策略被视为害怕敌人船坚炮利，不敢挺直腰杆反侵略，妥协投降的证据。这不符合历史事实本来面貌。徐继畬曾感慨地说：“继畬性虽迂缓，然同仇之愤切切于心，从前为委员时，每与此辈周旋，何尝不惭恨在心，思得而食其肉。”但是“国家之定和议，既出于不得已；则疆臣之办夷务，亦苦于无如何”。徐继畬向林则徐明确表示：“敌来则惟有与之拼命，不来则审己量力，不宜与之生端。继畬之不敢轻于召衅，实为地方计，非为一身谋。傥仓卒之间，夷船忽来恫喝，誓当乘一小舟，直造其船，与之讲理。如有不测，当陨身以谢吾民，再与之开炮未晚。”[48]这些声音既表示了徐继畬舍弃个人利益的胸襟，同时也反映了徐继畬的内心矛盾及被人误解的心灵痛楚。

如果人们冷静思索一下，就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仅仅因为两个英国人租住了福州城内的神光寺，林则徐就提出积极备战，这似乎有些不合常理。但是如果我们联系林则徐在鸦片战争期间的遭遇，以及他的一贯思想，就会找到答案。林则徐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鸦片战争前夕，他在广东的禁烟抗英斗争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林则徐被革职查办，失去了在战场上和英军决一胜负的机会，因而使他遗恨终身。鸦片战争后期，林则徐产生了依托长江内地，借助民众进行持久抗英斗争的设想，但是这一战略又没有机会得以实现。鸦片战争刚一结束，1842 年冬天，林则徐的好友苏廷玉就建议招募壮勇防守福州，林则徐十分赞成。神光寺事件发生后，林则徐带着虚弱的病躯，扁舟泛闽江，视察了五虎门、闽安诸海口的形势。当五虎门一带乡勇组织起来后，林则

徐非常高兴，他说："近日密察彼处民情与其力量，洵能不负此险。又水部门、东门一带，劲气相连，迩日亦著效。此差足以慰荩怀者耳。"[49]笔者以为，林则徐试图利用神光寺事件的机会，实现其借助天险，依靠民众抗英斗争的实践。

和林则徐一样，鸦片战争初期，徐继畬积极投入了抗英斗争。他在福建海防前线，兼署汀漳龙道台。1840年夏天，英国远征军从广东海面北上天津，沿途封锁了厦门，攻陷了定海。1841年，闽浙总督颜伯焘用了半年时间布置厦门防务。处在一水之隔的漳州的徐继畬理当给予协助。当时颜伯焘对厦门的防务信心十足，奏称："若该夷自投死地，惟有痛加攻击，使其片板不留，一人不活。"[50]英军攻陷厦门后，徐继畬回忆说："七月初十日，逆船三十余只驰厦门开炮，我兵亦开炮对击。我之炮不如彼铜炮之轻灵。我岸上之炮又不如彼船中之炮稠密。相持半日，大炮台被其攻破，遂致全军溃败。死难者一总兵(江继芸)、两游击(凌志、张龙)、一守备(王世俊)，千把数人"。[51]血的教训使徐继畬认识到，从海上来的英军掌握着比中国更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必须看到，在封建大一统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有可能了解外部世界信息的，必然是那些在战争中和侵略者交过手、在开埠地区和外国人打过交道的沿海封疆大员们。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对西方列强的实力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估计。从这点讲，徐继畬的感受可能要比林则徐更深刻一点。历史已经证明，打败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打了败仗还要充胖子，不承认失败，不愿改变旧的思想，不图振作，不图改革。这是我们民族在近代落伍的重要原因。

徐继畬的可贵之处在于，在巨大民族灾难之后，他惊醒过来，痛定思痛，开始逐渐抛弃华夷之辨的陈腐观念。道光二十三年底，徐继畬在厦门会晤英国领事时，从译员美国传教士雅裨理那里看到世界地图时，就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放下天朝大员的架子，与雅裨理多次交谈，并开始与其他外国传教士、外交官、医生等交

朋友，如美国医生甘明，英国驻华领事李太郭、阿礼国等。值得一提的是，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仍然没有脱离华夷观念的传统窠臼，他们虽然为割地赔款而伤心，然而最痛心的还是夷人欲与中国官员行平行礼。咸丰二年，闽浙总督季芝昌上奏："福州居住之英吉利领事人等，每于督抚抵任，辄欲到署禀谒，冀得接见为荣。臣上年病痊回任后，该副领事韦谢岩、翻译星察里欲来禀谒，臣以体制不宜，随饬办理夷务之署福州府胡应泰，先期谕阻，旋即中止。"[52]由此可见，徐继畬敢于破除天朝上国观念，毅然地向"夷人"学习各种知识，在当时可谓凤毛麟角。同时，他还详细访问当地航行外洋的舵工，广泛"荟萃采择"中西文献资料。因此，《瀛环志略》的学术成就超过了《海国图志》及这一时期的其他著作。《瀛环志略》的历史贡献主要不在于历史、地理学本身，而在于明显的启蒙性。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需要启蒙与反思，愚昧与涣散的民众连最微小的暴力也不能抵抗，更谈不上有效地抵抗荷枪实弹的武装侵略。只有把民众的觉悟与智慧提高到一定水准，并且开始产生民族、国家观念及近代化的意向，这样有组织的觉悟的民众，才可能是不可战胜的。正因如此，《瀛环志略》成了以后洋务思潮和维新思潮的奠基石。因此它是近代中国改革变化思潮的前奏曲。

笔者认为，神光寺公案，徐继畬和林则徐都想驱逐英人出城，都主张抵御外来侵略，目标是一致的。但是两人对形势存在不同看法，以及对解决问题的方法存在不同意见。他们之间的矛盾并非是投降派和抵抗派之间的斗争。他们之间的功过得失，还需要人们费大力气分析探讨，最后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估。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徐继畬对敌强我弱形势的认识是清醒的。神光寺事件中，徐继畬"按约理论"，并且"据理而争"，在外交活动中竭力争取和平环境以自强的设想，应该说是富有理性的。总之，历史的发展是复杂的。它是由一幅幅五彩缤纷的画面所组成。爱国者之间同样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矛盾。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两条路线斗争方法研究和

解释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历史现象，更不能简单地以人划线，厚此薄彼。

（作者郦永庆，1951年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

注释：

① 本文所利用的清代档案均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奏折、奏片来源于《宫中朱批档》和《军机处录副档》。上谕档来源于《军机处上谕档》和《军机处剿捕档》。

② 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刘韵珂奏折，同月二十五日上谕。

③④⑥⑧⑨㉗ 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刘韵珂留中密片，同年四月十五日上谕。

⑤ 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页39。

⑦⑩⑪⑫⑬⑭⑮⑯⑰㉖㊶㊷52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101页，102页，103页，104页，108页，109页，106页，126页，122页，112页，103页，121页，395页。

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㉛㉜㉝㉟㊲ 咸丰夷务，第一册，46页，53页，55页，93页，97页，110页，133页，144页，20页，26页，60页，89页，125页。

㉘㉙㉚㊵ 道光夷务，卷80。

㉞ 咸丰元年二月十二日麟桂奏折。

㊱ 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十八日上谕。

㊳㊴㊸㊹㊺㊻㊼㊽51 方闻：《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135页，132页，137页，138页，164页 164页，140页，139页，77页。

㊾ 《林则徐书简》页309。

50 道光二十一年颜伯焘奏折。

●任茂棠　杨荣春

析神光寺事件

1850年6月，两名英国人（传教士、医生各一）在福州神光寺租屋居住，引起福州绅民（包括原云贵总督林则徐在内）的反对和对徐继畬的不满。不久，就有翰林院侍读学士孙恩铭、工科给事中林扬祖和湖广道御使何冠英等人，对徐继畬交章弹劾。1851年1月，咸丰帝对徐继畬“传旨申斥”，命裕泰为闽浙总督前往查办，还命两广总督徐广缙“逐加查访，据实奏闻”。该年4月，尽管裕泰回奏徐继畬并无“措置失当”之处，但咸丰帝仍然罢掉了徐继畬福建巡抚的官职。

两名外国人住进福州城内，本是区区细微之事，但事情虽小，却形成了一场政治上的风波，而且历时达十个月之久。在这一事件中，徐继畬是主要角色。随着徐继畬的被罢官，风波也宣告平息。

造成这一结局的原因，首先同官场派系斗争有一定关系。从道光帝开始禁烟起，以对鸦片和战争的态度为分水岭，以满汉官僚间旧有的矛盾为脉络，或明或暗地存在着两个集团的冲突。一方面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为首，在各个不同时期以琦善、耆英等为主要成员；另一方面以林则徐为首，在朝辅以军机大臣王鼎等人。从1841年林则徐遣戍新疆之后，穆彰阿一直握有朝内实权，迨至咸丰帝上台后情况才发生变化。咸丰帝本人对外态度倾向强硬，开始压制穆派。1850年底，咸丰帝索性罢黜穆彰阿，对耆英等也降级使

用，而同时起用了林则徐。对徐继畬的处理，恰恰也在这一时期。从目前接触到的材料看，蛛丝马迹中表明徐继畬同穆彰阿、耆英等人都有比较密切的直接简接的关系(《松龛先生全集》、《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抚远纪略》等书都提供了一些线索)。如果这种分析无误的话，那么徐继畬与林则徐在福州的相遇，发生意见不合是不足为奇的，徐继畬的贬官与穆彰阿的罢官发生在同一时期，自然也非偶然了。

当然徐继畬的被撤职，最主要的原因还不在人际关系上，而是在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方针和态度上，徐继畬和咸丰帝发生冲突的结果。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一直到咸丰帝上台，清廷的对外方针和态度，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战后至 1848 年，主要是"顺夷情，顾国体"。用道光帝的话说，就是"怀柔远人，俾无滋生事端"。贯彻这一方针的代表人物是伊里布、耆英等人。本来，《南京条约》应该是中英战争的终结，条约已经规定了清朝作为战败的一方所该付的代价，战后中国不应该再丢失主权。但是，耆英等人不仅又同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且丧失了像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以及外国军舰常驻中国港口等许多主权，除了英国进广州城和外国人直接到北京上书之外，凡是外国侵略者所要挟的，几乎都得到了满意的答复。这种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对敌人百般顺从的态度，无疑是民族妥协政策。

然而，从 1846 年之后，广州人民反对英国人进广州城的斗争日趋激烈，而且直接喊出了"官方清道以迎洋鬼"，官吏"事夷不复为大清官"的口号。道光帝担心百姓们对官吏的不满会引起事端，于是在上谕中屡屡告诫耆英等要以"固民心为本"，"俾使民夷相安"。这当然是极为困难的。耆英在广州周旋到 1847 年初，暗中默许英人两年后入城，便于次年(1848 年 2 月)溜回了北京。继任两广总督的徐广缙抵任之后，清朝的对外方针转向了第二阶段。

徐广缙在广东察觉到"民情若是，其坚且众。夷一动则民刻生变，势难终日"。于是他给道光帝上折，说对英人的入城要求，婉拒之未必遽开边衅，轻许必至立起兵端。且阻其入城而有事，则人心瓦解，必至内外交讧。这个意见受到道光帝的赞赏。1849年春，英公使文翰要求兑现与耆英的密约。谈判中广东群众武装示威，徐广缙以众怒难犯为辞，拒绝了文翰的要求，最后迫使文翰宣布罢议进城问题。道光帝得报后，大喜过望，"嘉悦之忱，难以尽述"，在大肆嘉奖徐广缙等人的同时，便下令各地"务当团结民心，激扬士气，以安民为抚夷之本"。从"顺夷情"到"以安民为抚夷之本"，这是清廷对外政策上的一大变化，说明道光帝的对外态度开始转向强硬。血气方刚又受到严格儒学教育的咸丰帝上台后，继续支持徐广缙的"利用民气"的作法。就在这种形势下，福州发生了英人租驻神光寺的问题。在绅民反对和言官的弹劾过程中，咸丰帝多次告诫徐继畬："驭夷之要，莫先于固结民心"。然而徐继畬却坚持己见，认为"福州民气散弱，心志不齐，与粤民迥殊"，故不能"曲徇其(绅民)所请，致生边衅"。为了阐述他的主张，他还详细陈述了英国的军事优势，批驳了陆战可以制胜和长江有险可守的观点，建议要以"镇静为主，以张皇为戒"。对咸丰帝关于"驭夷之权，粤东似有把握"的观点提出异议，即不同意徐广缙在广州的所作所为。徐继畬的这些主张，当然未博得咸丰帝的赞同，相反却多有批驳。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继任闽浙总督裕泰对徐继畬持褒赞的态度，而奉命"多加访查"的徐广缙却对徐继畬极力弹击。1851年1月，徐广缙在上咸丰帝的奏折竟说："闽省督抚，但知将就夷人，不思固结百姓，以致夷情愈骄，民心日离"，还建议"将该督抚先示微惩"。咸丰帝得奏，不免大发雷霆，斥责徐继畬"既已错误于前，又复因循于后，漫不关心，成何事体！著传旨申斥"。由此可见，徐广缙的弹劾是徐继畬被罢官的关键。而徐广缙之所以能起这样的作用，又是因为咸丰帝在对外方针上欣赏他在广州的"以民制夷"。所以，归根到底，徐继畬

被撤职主要是因为同咸丰帝在对外方针上的不够一致。

区区神光寺事件，集中地反映出皇帝、官吏和绅民在对付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问题上的不同的方针和态度。哪种意见占上风？取决于权力。但何者正确？却是另外一个问题。当时兴起的群众的反进城斗争，应该视为是民族矛盾的主要体现，是近代中华民族反抗资本主义侵略斗争的一个环节，在性质上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一斗争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历史局限性。诸如他们的反抗难免夹杂着像"华夷之辨"、"夷夏大防"等一类传统观念。在斗争中缺乏科学性和长远的战略思想。尽管能起到打击侵略者的作用，但不可能取得彻底胜利。至于清统治者的以民制夷的思想，绝对不是真正的发动人民群众抵抗侵略者，而是他们的权宜之计。其最终目的是使民夷相安，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已。他们貌似强硬，实际是硬而不坚，仅仅是应付于目前，并无反击侵略的战略观点。那么，徐继畬的见解又如何呢？他是一位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家，在鸦片战争中，不仅主张坚决反击英国侵略者，而且参与过反击英国的战争实践，是一位爱国者，这是毫无疑问的。战后，他长期担任对外交涉要职。尽管有时在一些问题上与黄恩彤等人意见有略同之处，却没有干过任何一件有损中国主权的事情。在神光寺事件中，他所表述的对付外国侵略的思想和态度中，有一点很值得重视，即基于他对英国比较透彻的了解。他抓住了英国人担心断绝贸易的弱点，主张在关键时刻可"停其贸易，以伐敌谋"。这在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确有其实际意义。然而，就其全部思想来看，主要是强调"镇静"，甚至认为调兵、募勇、购船等战备措施都是"树招敌之形，即难保不生其尝敌之计"，这不免使人感到消极应付有余，积极进取不足。在分析敌我形势中，论敌之优势和我之弱势多，却很少提及敌之劣势和我之优势。特别是在反击侵略的战略战术上，都没有提出坚决有效的见解。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神光寺事件是皇帝、官吏和绅民之

间在如何对待外国侵略者的方针和态度上矛盾的反映。可惜的是，任何一方所提出的观点和措施都不是有效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战略和策略，即使在非本质问题上存在你长我短，但评论者也不必非要把它分出个谁高谁低不可。我们不应苛求于古人，因为在他们时代里，已经有人提出了极为可贵的、代表时代特征的战略和战术思想。例如，魏源认为，“既款之后，则宜师夷长技以制夷。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此外，他还提出了培养海军人才的构想。又如安徽巡抚程矞采在分析了敌人的弱点后也曾经指出：“以远隔万里之英夷，敢恃孤军深入内地者，其意盖利速战也。今我不与决战，而与之久持，我持愈坚，彼力愈困”。林则徐也曾经提过收复失地之策和建立新式海军的建议。无论是战争时期的持久战思想，还是战后痛定思痛的战备思想，在敌强我弱、外患日盛的历史大前提下，要比徐继畬、徐广缙他们在神光寺事件中所表述出来的观点更符合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的要求。

（作者任茂棠，1930 年生，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
杨荣春，1965 年生，山西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主要参考文献：

1. 道光朝、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
2.《松龛先生全集》。
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
4.《林则徐书简》。
5. 方闻：《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

●张武文

评乌石山事件中徐继畬抗英斗争的策略思想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在福州城内发生过一起乌石山事件。这起事件本身虽然很小，在当时却掀起一个轩然大波，集中地反映了抵抗派内部稳健与激进两种策略思想的斗争。在这一事件中，盲目排外的逆流掀起一股震动朝野的恶浪。事历半载，官司打了两年，最终导致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封疆大吏——福建巡抚徐继畬的倒台。

乌石山事件是由英人谋僦居福州城内乌石山上下之积翠、神光二寺而引起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在英军胁迫下，全部接受英国议和条款，订立了第一批不平等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宁波、厦门、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按照通商条约，英国人可以在口岸租赁土地及房屋，从而为此后外国侵略者在通商口岸建立租界，做为侵略中国的桥头堡提供了特权。1844 年，福州开关后，英国领事李太郭来福州驻扎，欲在城内租屋居住。当时，徐继畬尚在福州布政使任上。闽浙总督刘韵珂与徐继畬计议，按照通商条约，应该准住。但考虑"华夷"杂处，多有不便，欲加拒阻。为此，刘、徐议以"藉绅拒夷"的策略：首先让侯官县保泰向绅士授意，联名公呈"拒夷"，再由知县照会"夷人"。当李太郭入城之日，邀集联名绅

士在城门力阻，官方出面以“城民不愿，众怒难犯”为由，措词理拒。这诚然是个既不违条约，又能“拒夷”进城的好办法。但当李太郭进城时，虽有二百余名绅士联名“拒夷”，竟无一人出城劝阻。无奈之下，由县衙差役、家丁出面劝阻，不仅无效，且因事涉条约，双方发生争执，几至决裂。李太郭遂租住乌石山上之积翠寺僧房。在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刘韵珂、徐继畬只得依约准租。但规定只准外国领事官住城内，其他外国人员一律只准住城外。并明令没有官府用印批准，任何人不得向外国人私租房屋。

1850 年，两个英国人（一个传教士，一个医生），来福州租屋。英国代理领事金执尔在乌石山下之神光寺代租破漏僧房两间，租期六个月。租约送侯官县审批。当时该县知县兴廉失于检点，与李太郭租住积翠寺视同一例，批准租住，铸成错误。已任福建巡抚徐继畬知道后，即令兴廉向金执尔言明错误，遵约搬出城外别居。金执尔提出将照会呈明英国驻广州领事官哎唼查核后再搬。

值此情况下，就在如何对待这两个英国人的问题上，徐继畬和林则徐发生严重歧议。在徐继畬看来，铸成英人租住神光寺僧房错误，英人与兴廉都有责任。只能“从缓设法”，使“夷人”“心愿情服，自行搬迁，方为正办，断不宜操之过急，致令别生枝节”。[①]而林则徐则坚决主张将两个英国人立即强行驱逐。徐继畬认为，值此“夷情”浮动之际，“总以制夷而足以服夷，息事而不致生事为要”。[②]他说：“彼既挟有侯官县用印租榜，此时若将两夷人硬行驱逐，则出尔反尔，其曲在我。该夷正是投文乘衅之时，势必藉为口实，以兵船入港滋扰，是彼不来，而我实有召之也。今我不遽逐两夷人，而但将士民不愿和约不符之理，与之徐徐讲说，似不至遽来侵扰。从来镇能静躁，缓可堕急，操之太蹙，适是堕其奸计。”[③]林则徐责徐畏葸，大为拂意，策动书院生童公白“英夷”，不准在城居住；策动地方绅士公启“英夷”，饬令立即搬出；策动士民公告“英夷”，立即驱除。有人还书写揭贴，到处张贴，声言要“割取夷人首级”。徐继畬痛切地说，

此等“以恐喝之辞为胁制夷人之计，非为无益，实恐有损”。“若办理稍涉歧异，则该夷有辞可藉，鲜不执为口实。”[4]徐继畲始终不为这些过激的做法所左右，而持以镇静，妥善处理。他记取积翠寺的教训，改“藉绅拒夷”的策略为“藉民拒夷”的策略。他认为，“夷人不畏绅而畏民，缘绅士之笔伐口诛不能慑其气，而百姓之力强势众，实可挫其锋”。[5]徐继畲的这种识见，显然超出了开明封建士大夫的“民本”思想的范畴，而带有某种程度的民主启蒙思想的意义。从这种“藉民拒夷”的策略思想出发，徐继畲采取多种办法，周密而慎重地处理了这一涉外事件。一、饬令兴廉与英人交涉，劝其尽快搬迁；二、晓谕神光寺僧人不准收取房租；三、遍告泥木工匠不准为“夷人”修葺漏屋。是年九月连日阴雨，租屋渗漏不堪，英人求助官府，官府告以民既不愿，官亦无方。英人深感士民不愿，官府为难，若不搬迁，恐伤和好，于年底先后搬出神光寺。徐继畲“操以镇静，藉民拒夷”的策略，取得了抗英斗争的胜利。

腐朽守旧，盲目排外的官僚们却死死抓住乌石山事件不放，必欲致徐继畲于死地而后快。尽管徐继畲奉“总期民夷两安”[6]的御旨，一直在慎重处理乌石山事件，“一学士、两御史”仍是不遗余力地接连上奏，一旬三章，弹劾徐继畲。1850年七月十八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铭恩妄奏徐“派兵护送”英人入寺，“强民从夷，是何肺腑”！七月二十八日，工科给事中林扬祖妄奏徐“偷旦夕之安”、“抚驭无方”。八月初一，湖广道御史何冠英妄奏徐“强词压众”，“巧于卸责”，“一味畏葸”，“平时既委曲以顺夷情，有事复不能振作，以胜疆寄”，袒护属员，回护奸民，“不知是何居心”。福建距京路途遥远，徐继畲妥善处理乌石山事件的奏章不能及时送达清廷；而“一学士，两御史”的弹劾却又不绝于耳。这就日渐惹起龙廷震怒。九月二十六日咸丰帝下诏责问徐继畲：该夷“究竟何时可以搬出？前此何以听其任意阑入？……倘筹办终不妥协，竟至酝成事端，惟该督抚是问！”值此关头，孙铭恩等再奏矫情，火上浇油，参徐向“英夷”

泄密，并谎称“夷人”不仅不搬出神光寺，并将东边鼓山寺，西边西禅寺全行霸占，还强买民房，钉坏火炮，乘马四出踏勘。而“乡民驱斥，地方官反出示禁阻”，向“夷船”索贿护送，“夷人”打伤民孩，官府竟“贿和了事”等。这就更加触怒圣上：“该督抚身膺疆寄，抚驭之道，岂竟毫无主见，任令滋扰！”⑦徐继畬接连上疏力陈，有时竟至日呈三疏，并报英人已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开始搬出神光寺。怎奈咸丰帝谎言盈耳，先入为主，徐继畬的话已是无孔可入。十二月十一日咸丰帝还下诏责徐：“乃于降旨饬查至再至三之事，日久并不奏闻”，如此“漫不经心，成何事体！”龙廷震怒如此，尽管闽浙先后两任总督刘韵珂、裕泰再三上奏为徐剖白，“所办极为合宜”，“并无回护徇庇别情”；刘韵珂还特别呈明，“英夷”派设领事、管事等官，准住五处城区，不特福州，上海、宁波均有驻札，以此为徐辩护，还是不能幸免。1851 年三月，咸丰帝召回徐继畬，降职留用。不久借故再劾，终至徐继畬被彻底革职，回家为民。

乌石山事件中，徐继畬和林则徐在反抗外来侵略，维护民族主权这一爱国主义根本立场上，是完全一致的。徐继畬在 1850 年八月十日《复英夷租住寺屋实情并镇静筹办侦察谣言疏》中说，主张立即强行驱除的，“在该绅士等忠愤所激，洵足令人钦重。然以目前之小事，不顾后日之隐忧，究属失计”。九月二十六日《复官绅意见不合疏》中说：“臣等于绅士虽有缓急之分，然皆坚意驱逐，并无歧意不同之处。”次年三月，徐继畬终因乌石山事件被弹劾下台，晋京陛见，在答复咸丰帝询问时，对林则徐的评价依然是：“忠正，惟不悉外情，致误事机。”今天看来，徐继畬对林则徐爱国主义的根本立场和策略上的失误，评价应该说是中肯的。乌石山事件中，从英国统治者的用心来说，固然有其文化侵略的意思在，不论林则徐和徐继畬是否看到这一点，均主张“坚意驱逐”，这从当时来讲，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但就事件本身来讲，毕竟是一个外交事件。失误首先是由侯官县造成的。要纠正这个失误，必须用外交手段来解决。如

果像林则徐等人主张的那样，采取强行驱逐的办法，则“其曲在我”，“势必藉为口实”，兵戎相见，引起纠纷，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徐继畬的见地无疑是高出林则徐一筹。

至于徐继畬本人，在乌石山事件及其前后的作为表明，他不愧是一位积极抵抗外侮的爱国官吏。史学界有人因为徐继畬在乌石山事件中和林则徐的意见不合，就把徐继畬打成“投降派”，这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徐继畬就对清廷的妥协投降政策深表忧虑，对林则徐的被罢黜深表同情。他于道光二十一年十月七日写了《致赵盘文明经、谢石珊孝廉书》，深沉地表述了他当时的心迹。他说，自粤东查毁英夷烟土两万余箱，致启兵端，陷定海，旋又赴天津递呈。朝廷意在怀柔，九月褫两广总督林少穆则徐，闽浙总督邓嶰筠廷祯，命琦相善赴粤查办，为夷所愚，弛备求和。旋又在粤东滋事，下虎门，兵临省会，琦相逮问下狱，粤事更不可问。这封信中，徐继畬对琦善为代表的卖国投降派的嘴脸还看不透彻，但对清廷“意在怀柔”“弛备求和”的妥协投降政策，看得是清楚的。并对国是日非的情势表示了深切的不安。此后，徐继畬在福州加强战备。1840年七月，徐继畬任汀漳龙道台，驻防漳州。刚到任，英船第一次攻打距漳州仅七十里的厦门。徐继畬采集大木排桩，塞镇门各港口，调集民兵扼险固守。敌知有备，退去。接着，徐整饬漳州道之海澄、郡城、铜山防地，简汰老弱，加饷军粮，“每夜间登城与守陴者垂泣告语，勉其敌忾”。并对克扣军饷的某藩司提出强烈抗议。徐愤慨地说，似此“战守难期”，“且立致鼓噪之变”，“伏望俯加点察，着赔惟命，参撤惟命，头可断，议不可改，必嫌其违例要名，诚不如罢斥之，免致贻误严疆”。[8]1841年二月，闽浙总督颜伯焘驻守厦门督办军务。经营半年，安炮四百余门，屯兵六七千人。七月初十，英船再次炮击厦门。终因敌船坚炮利，我全军溃败。总兵江继云，游击淩志、张龙，守备王世俊及兵员千人殉难。徐于上述信中追述这次战斗失败后的心境说：“厦门失守，强寇直逼寝门之外，民心惶

骇，一日数惊。文武官中有将家眷送出城者，百姓纷纷有逃亡之意。弟极力抚以镇静，誓以死守，调兵募勇，运米拦港，劝练诸事，昼夜拮据。”敌船坚炮利，收买奸民，而我承平日久，人不知为战，“官兵连年挫败，知中国孱弱无能，其志愈侈，其谋愈狡，非大挫其锋，其势未有所止”。“二百年全盛之国威，乃为七万里外之逆夷所困，至使文武将帅，接踵死绥，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末，兴言及此，令人发指眦裂，泣下沾衣。”这封信的最后，徐继畬表述了他誓守边城，胜败由天，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他写道，值此危难关头，“与此土为安危，与此城为存亡，以八字自坚曰：竭力尽心，听天由命”。我们从信中看出，当时的徐继畬同林则徐一样，仍只是一个恃炮抗侮，空有一副爱国心肠的抵抗派封建官吏。

如果说，在 1841 年厦门失守后的徐继畬还只是一个“竭力尽心，听天由命”的封建皇室忠臣的话，那么，在 1850 年乌石山事件中的徐继畬，则已是中国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具有某种民主启蒙意识的思想家。在这个时期，徐继畬对于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根本大计，他已成竹在胸。

在军事上，积极构筑工事，加强战备。1847 年，徐继畬接任福建巡抚后，“操以镇静，密筹防御”，与总督刘韵珂亲行履勘修筑福州港内各炮台。长门暨闽安南北岸新建炮台，势扼险要。新铸炮位，皆在炮台安设，地近省城，便于调度。[9]与刘韵珂、新任藩司陈庆偕、候补道鹿泽长所铸新炮七十余门，颇为坚固完好。而“外面仍示以寂然”，既“可却凶焰”，又“可安居民”。[10]徐继畬在省港炮台防御工事，以虎门、闽安最为险要，就连在乌石山事件中主张公开演炮募勇的林则徐看了，也默无歧议。

在政治方面，徐继畬潜心研究外国的政治制度，寻求富国强兵的根本途径。通过对鸦片战争失败的反思，通过对厦门失守的反思，通过对世界各国形势的精心考察，徐继畬所看重的，绝不仅仅是外国的洋枪洋炮，也绝不仅仅是外国的科学技术，而是一个更深

的层次：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对于这一点，尽管徐继畲本人也许还处在朦胧的钦慕之中，但他毕竟远远超过了他的同时代人，包括林则徐在内。这和他的经历是分不开的。福州是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徐继畲在这个地方为官多年，兼管通商事务。经常与外国人接触，并受钦命了解、研究"夷情"，从而使他比单纯完成禁烟使命而在广州实际不到二年即被革职的林则徐，更"了然于世界大势"。徐继畲在乌石山事件中富国强兵、抗御外侮的政治策略思想，体现在他 1850 年七月所上《揣度夷情密陈管见疏》中。

《揣度夷情密陈管见疏》是研究徐继畲政治策略思想的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献。该疏开宗明义，首先分析了鸦片战争的实质。他说。英人"为强售鸦片之故，突尔称兵"。这就揭明了鸦片战争是由英国对我国进行经济掠夺而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从而驳斥了鸦片战争是因为林则徐虎门销烟而引起的投降卖国的论调。其次，徐继畲抨击了清廷在鸦片战争中的妥协政策及其导致的严重后果。他说，我朝"为息事安人"，"宽其奔突之罪，俯准各港贸易"，但这并没有能够满足侵略者的胃口，而是相反，"逆夷得志而骄，贪求无厌"，越加紧了对我朝的经济侵略。第三，徐继畲从敌我双方的国力对比分析中，指出我国在短期内无力对"英夷"予以致命打击。他指出，"英夷"远在六七万里之外，"彼能来，我不能往"，因此我对其无法"扫穴犁庭"铲除祸根；而我海防线长达七千余里，无力处处设防，既不能阻其海防之外，又不能诱而歼其在海防之内。第四，本疏着重分析了尚处在自由资本主义前期的英国资产阶级对落后国家主要是进行经济掠夺的特点。他说："英夷"和倭寇不同，它以"贸易为生"，"总以中国马头为养命之源"。这种对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掠夺特点的独具慧眼的分析，没有对外情的真知灼见是绝对做不到的。他估计，英国下一步侵华战略，在于"入长江而阻运道"，"以投文控诉为名，扼我之吭，妄肆要求，其炮火在可开可息之间，于和议在可完可毁之际，以此为牵制之谋，要劫之计"。这种估计为后来列强瓜分中

国的实际所证实，足见其远见卓识。该疏最后，徐继畬对清廷呈述了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根本思路。他总结鸦片战争的教训，提出："审思粤东浙省之往事，而仍欲恃炮台以无恐"，"臣等窃不以为然"。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深谋远虑的思想。正是这一点，他比他的同时代人超越了将近半个世纪。从林则徐到康有为，中间五十年间，各种志士仁人，开出过多少富国强兵的药方，修炮台，办洋务，师夷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无不从船坚炮利出发。但在 19 世纪中期的徐继畬，则已明确意识到，封建制加火炮，是对付不了资本主义的侵略的。那么，什么是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根本出路呢？徐继畬没有明言，他只引了宋臣苏洵的两句话："寂然若不闻其声，漠然若不见其形。"然后说：此"正今日之所宜用"。那么，徐继畬不以炮台为无恐，而又不闻其声，不见其形的富国强兵之道，究竟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恐怕应该到《瀛环志略》一书中寻找。

《瀛环志略》是一本奉钦命纂集的地理书。但它所介绍的，绝不仅仅是各国风土人情。该书详尽介绍了各国历史沿革和政治经济制度，尤其是当时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徐继畬特别推崇华盛顿及其所开创的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可惜，处在以传贤为奇，传子为主的封建王朝，处在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已开始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时期，而我们还是只知黄豆芽绿豆芽，不知有西班牙、葡萄牙的闭关锁国、腐败无能、而又老大自居的清王朝，徐继畬给他的恩主所开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药方，触动了封建皇室的神经，腐败的封建官僚们岂能容他！当然更谈不到赏识他的"深识远谋"，用他所推崇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来做为"抚驭之策，控制之方"了。《瀛环志略》成书于 1848 年，而 1850 年乌石山事件中的《揣度夷情密陈管见疏》中，徐继畬不敢明言他不恃炮台以无恐，不闻其声，不见其形的富国强兵的具体方略，恐怕就是这个原因吧。《瀛环志略》开出各国可供我们借鉴的具体方略，《揣度夷情密陈管见疏》再给出了一个总的提示，让皇帝自己从中去揣

度，这也许正是老成的徐继畬的机警之处。尽管如此，此书一出，满朝惊骇，封建官僚们抓住书中介绍日耳曼的一句评语“殆西土王气之所鍾欤！”几致弹劾遭祸。

在整个乌石山事件中，徐继畬抗英斗争，维护主权的策略胜利了，而他在官场斗争中失败了。林则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举起反侵略斗争的爱国大旗，振奋了民族精神，激励了后人。徐继畬在他的《揣度夷情密陈管见疏》和《瀛环志略》中所体现的某种民主启蒙思想，则给他的后人留下寻求救国救民的根本途径以宝贵的精神启迪。对于这些错综复杂的史实如何评价，对于这些宝贵的民族文化如何扬弃，这是我们后人的事。但不论怎么说，把林则徐当作鸦片战争的祸首，固然是对民族精神的亵渎；而把徐继畬的民主启蒙思想当做妥协投降，把徐继畬的抗英政绩记在毫不相干的林则徐名下，却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对于这两个杰出的历史人物，我们都应该给以应有的肯定。

（作者张武文，1937年生，中共忻州师专党委副书记。）

注释

①④ 《报英人租住神光寺并采买台湾煤炭疏》（道光三十年六月）。

② 《再奉谕密防夷情疏》（道光三十年六月）。

③ 《复福州绅士神光寺夷人并无携械炮情事函》（道光三十年七月十八日）。

⑤⑥ 《复英夷租住寺屋实情并镇静筹办侦察谣言疏》（道光三十年八月十日）。

⑦ 《复英夷不肯搬出神光寺及钉塞炮尊疏》（道光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⑧ 《致某藩使书》（道光二十年九月）。

⑨ 《奉谕密防英夷疏》（道光三十年五月二十八日）。

⑩ 《覆英夷不肯搬出神光寺及钉塞炮尊疏》（道光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覆周天爵原奏预防英夷疏》（道光三十年八月十日）。

●吕义才

从神光寺事件看 徐继畬的对外策略

在徐继畬的政治生涯中，一半的时间是从事外交工作，客观地分析徐继畬的对外策略，对研究徐继畬的思想及认识中国近代对外开放的进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然而，由于在1850年发生的神光寺事件上涉及到民族英雄林则徐，致使近代史研究者大都褒林贬徐，对徐继畬的评价有失公正客观。笔者根据近来查阅的一些资料，拟对徐继畬的对外策略作一粗浅的分析，以求抛砖引玉。

徐氏对外策略的形成

研究徐继畬的对外策略，离不开当时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历史状况。徐继畬所处的时代，正是腐朽的封建王朝走向没落，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殖民掠夺的时代，值此世界风云变幻之际，徐继畬于鸦片战争前夕被调往多事的沿海地区，接受了建立坚固的海防和排外御夷的重任。鸦片战争爆发后，徐继畬面对面地领略到了西方强国的巨大影响，夷人“船坚炮利”而“我之官兵，则承平日久，人不知战，名之为兵，实则市人。无纪律、无赏罚、见贼即走，此其所以

败也”。他为“二百年全盛之国威，乃为七万里外之逆夷所困，至使文武将帅，接踵死馁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末”而“发指眦裂，泣下沾衣”。他向家乡父老表明心迹：“当此危难之际，正当捐糜图报，逆夷叵测，事无了期。与此土为安危，与此城为存亡”。但他当时又无力挽回败局，只能以八字自坚曰：“竭力尽心，听天由命，如是而已。”鸦片战争失败后，痛定思痛，徐继畬认识到了清政府长期以来闭关锁国政策造成的软弱、腐败、落后，如果沿着这条路再走下去，中国必然被列强所吞并、瓜分。从天朝大国的梦幻中醒来之后，徐继畬开始冷静地研究世界大势，把希望寄托于学习西方，改良社会。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徐继畬在对外策略上，其一采取的是内紧外松，羁縻夷人，即对内加紧防范，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走自强之路，要利用夷人尚为驯顺之机，修造炮船，加强战备，以求迎头赶上。对外，体国家休息之意，以安抚笼络为主，避免轻启衅端。其二采取的是以商制夷的策略。在徐继畬看来，“逆夷以商贩为生，以利为命，并无攻城掠地割据疆土之意，所欲得者，中国著名之马头，以便售卖其货物耳”。只要停止贸易，以伐敌谋，则夷人“即如婴儿之断乳，有不可以终日之势”，自会不战而退。基于这样的思想，当英国人在南台口岸开市贸易时，他“密饬署福防同知裕禄及保泰邀集绅耆嘱令密约居民铺户公立议单，不与夷人来往货买”。致使“开市三月果无一人前往交易，该夷情急，将洋布等物零星拆售，仍不能出脱”。他还在福建层层设卡，重课茶商，以阻止茶商从福州卖给英人茶叶。徐继畬以商制夷的做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使英方亏折较多，这后来虽成了英方易换港口的藉词，但也从中可以看出以商制夷的效用。其三采取的是以民制夷的策略。从广东人民抗英斗争的胜利中，徐继畬认识到了人民力量的不可低估，他对咸丰帝说：“伏思夷人不畏绅而畏民，缘绅士之笔伐口诛，不能慑其气，而百姓之力强势众，实可挫其锋，诚如圣训，驭夷之要，莫先于固结民心。如果民知大义，志切同仇，地方官正乐于激励，以为防御之资。”他

认为："绅民果能同心协力与地方文武一气相承，不稍退缩，则众志成城，不但现住之夷人驱逐甚易，即有比此重大之事，当亦无求不得，尚何顾虑。"他成功地借助人民的力量，粉碎了英人采挖台湾煤炭的阴谋。他"密行该镇道转饬前任淡水同知曹士桂纠合各乡士民，公同查禁，并刊立禁碑，严密防范"。并"由省派委干员前往会督该处文武，传集绅民，谕以大义，怵以利害，务令全台百姓亿万一心，互相查禁，使该夷恍然于煤炭之未得采购，实由民自为禁，并非官与作难。纵令贪狼狡黠，亦将颓然自失，藉口无由"。当接到英香港总督文安欲求采挖煤炭的照会后，徐以"鸡笼山为全台总脉，该处居民系闽粤两籍，性情强悍，保护甚严，久禁开挖，以培风水，断非官员所能强，此事断不能行等词照复"。"嗣后该酋并无续渎。"然而，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徐继畬以民制夷的策略不过是将民作为官方的挡箭牌，他为的是免启衅端，苟且偷安，而并不敢放手发动人民群众起来抵制外国殖民主义的侵略。相反，他惧怕人民群众起来以后，"易聚难散"，并将"沿海地方，数年来盗贼充斥"，说成是"半系乡勇流毒"。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不能对徐继畬太过苛求。

徐氏对外策略的具体体现

道光三十年，英人一医生一传教士租住福州城内乌石山下之神光寺，侯官县令兴廉误与用印，旋有书院肄业生童公具告白，反对英人居住。这就是神光寺事件。

在处理神光寺事件的过程中，徐继畬首先用的还是羁縻之法。他认为，"现在讲经夷人既已进屋居住，该翻译官金执尔又坚欲等候夷酋回文再行定见，自须从缓设法，使之心愿情服，自行搬迁，方为正办，断不宜操之过急，致令别生枝节"。他一面饬令该管府县密谕生童勿再启衅，"一面故示优容，以讲经夷人现尚未得住处，岂忍

逼令迁移，致使露处”。其次，他又用以民制夷的办法威胁金执尔："但省中绅民既不甘愿，必难日久相安，只好在神光寺内暂行借住，不准租赁，一俟城外觅有妥善房屋，即行退还。”他的这种策略令“生童等均以默喻止息，该领事金执尔亦别无异词”。当行医英人医死两人之后，徐继畬又不失时机地令经办夷务委员候补道鹿泽长“密遣亲信，广为传播，数日内绝无就医之人”。迫使“行医之夷，即欲搬出”。为了尽快借民众之力赶走英人，达到“制夷而足以服夷，息事而不致生事”的目的，徐继畬分析了英人“一系讲经，一系医病，其所租寺屋，亦多敝坏”的情况后，认为“若令城厢居民皆不赴寺听经就医，该夷株守无聊，自必居处不安。再令泥作木匠皆不受雇与之修理房屋，则风雨漂摇，该夷亦难久居”。并“密饬在邵郡督办官运回省之候补道鹿泽长授意闽侯两县及委员郭学墺等，以士民公议如有敢与夷人修理寺屋者，即捆送重惩，并将其住房拆毁，向泥作木匠人等遍为晓谕。又向城厢居民遍为告述，仍以士民公议为词，不准赴该寺听经就医”。并令住持僧具结存案，“其城内及东西北关外所有寺庙，士民公议一概不准租与夷人居住”。在暗中筹划以民制夷的同时，徐继畬又会同闽浙总督刘韵珂“饬鹿泽长照会夷目星察里，并以众怒难犯各情面向该夷目明白开导”。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与英人既不敢动硬的，又不想任其所为，徐继畬使用两面手法，阳为羁縻，笼络之，阴为钳制，挤走之，这种策略无疑是正确的，而且也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正像他对咸丰帝说的一样："该夷目口虽巧辩，而实不无馁心。至今寺屋穿漏，赴寺之人甚属寥寥，以情势揆之，省垣居民果能同心一气，该夷寂处萧寺，断难日久迁延。”时至“九月间，连日阴雨，两夷所住之房渗漏不堪，遍觅瓦匠无敢往者”。星察里向兴廉恳觅匠人，兴廉以“百姓不愿，断难相强，且神光寺无人收租，白占房屋，亦伤体面，不如搬去为妥”答复。最后，“该夷目无可如何始称租屋本是小事，既系士民不愿，官府为难，若不搬移，恐伤和好”。不得已，搬到翻译官所租赁之道山观暂住，即

将神光寺交还。误用印之租约，亦缴还注销。至此，徐继畲运用羁縻和以民制夷的对外策略圆满地处理了神光寺事件。

徐氏推行对外策略遇到的阻力

在道光在位期间，徐继畲的对外策略深得道光帝的嘉许。1847年2月，徐继畲接任福建巡抚，初六日，他在给道光帝的上疏中对当时福州厦门的形势作了分析，他说："福厦两口，现又为夷人互市之区，官民交困，催科与抚字两难，番汉杂居，弹压与羁縻匪易。"道光帝阅后朱批：一切认真勉力，夷务尤当细心妥办，钦此。在道光帝及耆英、穆彰阿等安抚羁縻集团的鼓励下，徐继畲以自己的对外策略成功地处理了福建的夷务。对此，《山西献征》亦有记载："先生久官闽，且究时务，了然于世界大势，得其要领，莅任后端严持重，务坚守要约，疏阔节目，以恩信羁縻外人，体国家休息之意，通商诸国悦服，咸遵约束，市舶辐辏，部内疮痍亦渐复元。"这种华夷相安毫无枝节的状况随着道光帝的驾崩和耆英、穆彰阿集团的倒台而横遭破坏，徐继畲的对外策略遭到了以咸丰帝为首的包括林则徐在内的激进派的强烈反对，正像他在1852年所写祭文中说的那样："继畲谨守先训，饮冰茹蘖，不取一钱，矢慎矢勤，力图补救。九年之中，疆土幸无变乱，夷情亦复安恬。不料时局既变，议论日新，继畲坚守素志，不肯轻开边衅，遂为言路所攻，弹章至于六七，圣主悯其戆愚，降补太仆寺少卿。"

徐继畲对外策略所遭受到的阻力集中地体现在神光寺事件上。在处理神光寺事件的过程中，林则徐正在福州病休。当时，受广东抗英斗争胜利的鼓舞，林则徐对徐继畲的羁縻策略很不赞成，他纠合福州的一些绅民分别给英人和徐继畲写信，要求英人搬出神光寺，要求官府招募乡勇，做好战斗准备。徐继畲以"从来静能镇躁，缓可堕急，操之太蹙，适是堕其奸计"回答，并说："国家之定和

议，既出于不得已，则疆吏之办夷务，亦苦于无如何。”“审己量力，不宜与之生端。”拒绝采纳林则徐的意见。这更加激怒了林则徐，林又联络了福建籍京官工科给事中林扬祖、湖广道御史何冠英、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铭恩等接连参奏徐继畬、刘韵珂，言词甚为激烈。七月十八日，孙铭恩上疏称：“地方官意存迁就，有带兵护送夷人入神光寺之说”，“强民从夷，是何肺腑”。七月二十八日林扬祖奏：“今该抚既恐绅民逞一时之忿，各绅民又疑大吏偷旦夕之安，傥迟回生变，成何事体。”紧接着，八月初一日何冠英向咸丰帝上疏，言词更为激烈：“抚臣容隐意多，而主持意少。民夷既不相下，势恐激成事端。”“该抚回护前非，欲以强词压众。”“外张夷焰”，“内沮民心”，“该抚事事袒庇，不知是何居心？”“该抚一味畏葸，平时既委曲以顺夷情，有事复不能振作以胜疆寄。夷情叵测，民亦难驯，万一乘衅弄兵，公私无备，省会安危，所关非细。”

咸丰帝新政未久，年轻气盛，对当时的国情外情判断错误，不敢也不愿承认腐败落后的事实，再加上广州人民反英人入城斗争刚刚取得胜利，咸丰帝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对徐继畬的羁縻策略甚为不满。七月十八日，他接到孙铭恩参奏神光寺事件的奏折后，十分重视，当天即寄谕刘韵珂、徐继畬：“朕思驭夷之要，莫先于固结民心，若如所奏，强民从夷，势必激生事端，关系匪浅。著刘韵珂、徐继畬按照所奏情节，妥为晓谕，不可致生夷衅，亦不可稍拂民情，总期民夷两安，方为不负疆寄。”七月二十八日，咸丰帝接到林扬祖的奏折后当即寄谕刘、徐二人：“该夷诡谲性成，固当示以镇静，然过于迁就，必失民心。驭外之道，莫先安内，但不可稍露偏袒之意，致该夷转有所藉口。……该督抚身任海疆，若民夷稍有不安，即系尔等办理不善，务当曲体朕意，妥为控驭，平心开导，毋得苟且目前，致贻后患。”八月一日，咸丰帝接到何冠英的奏折后，大为震怒，当即寄谕刘韵珂：“兹又有人奏夷人恃强构衅，大吏抚驭无方等语。著刘韵珂秉公密查，是否该抚徐继畬办理谬误，有无袒护属员，

徇庇汉奸？并现在民夷能否相安？据实具奏，毋得稍有不实不尽。”由于当时的交通落后，八月十日徐继畬才接到七月十八日的上谕，他立即回奏英人租住神光寺实情，并将自己的处置策略及所传谣言作了剖析，表白自己“然以目前之小事，不顾后日之隐忧，究属失计，臣等又何敢逞一己之才能，而不体宵旰之轸念。博一时之名望，而不计黎庶之安危”。“臣等现办此事，虽不动声色，无非藉民以拒夷，并未强民以从夷，有驱夷之实，而无驱夷之迹；不拂民之情，而可关夷之口”。“断不敢稍存姑息”。八月十八日接到咸丰帝七月二十八日的上谕后，于九月二十六日上复官绅意见不合疏，称官绅之间的矛盾是因为有些事不能互相沟通造成的，他说：“伏思臣等忝任海疆，办理夷务，其艰难曲折，有止堪自喻而不能为绅士共喻者。有不堪自喻而并为绅士所不能共喻者。七八年来，幸得无事，无非内安民心，外察夷情，不敢有偏袒之私，不敢存苟且之念，总期民夷相安，上慰圣怀”。然而，咸丰帝为激进派观点所左右，再也听不进徐继畬的辩白了，他于九月二十六日下了严令：“该夷强租神光寺一事，几至激成衅端，降旨查办，业已至再至三。该督等既称该夷寂处萧寺，断难日久迁延，究竟何时方可搬去，前此何以听其任意阑入，事关绅民与夷人互相争执，该督等惟当持以镇静，出以公平，总期该二夷及早搬去，庶绅民均可相安。倘筹办终不妥协，竟至酿成事端，惟该督抚是问”。“若徒托空言，夷患未消，民情亦怨，试问身膺重寄，所谓好恶同民者，安在耶！懔之！慎之！”及至咸丰帝听到英夷钉塞炮尊、打伤幼孩等谣言后，更是愤怒异常，十月十八日寄谕刘、徐：“该督抚身膺疆寄，抚驭之道，岂竟毫无主见，任令滋扰，何以并无一字奏及”。“以上各情，著刘韵珂、徐继畬逐一据实复奏，不准再有回护。其神光寺所住二夷，究于何时可以搬去，并著随时奏闻，毋涉含混。”与此同时，他又密谕两广总督徐广缙：“有人奏闽省夷情叵测，渐至蔓延，霸占省城内外各寺，强买民房，起造楼屋，并钉塞炮眼，骑马夷人四处踏勘，经各乡民驱斥，地方官反为出示

禁阻，又片奏闽浙商船多雇夷船护送，该督反谓水师巡缉之功，又夷人用鸟枪打伤幼孩……刘韵珂等身任重疆寄，何以听其滋扰，竟无办理之法，徐广缙总理五口通商事务，且闽粤接壤，必有闻，著即按照折内所指各情，逐加访查，果否实有其事，并该督抚现在能否设法抚驭之处，据实具奏，毋稍瞻顾。”徐继畬接谕后将谕旨垂询各条，逐一分析，据实复奏，说明钉炮眼、枪伤幼孩并非英人所为，皆系谣言。而徐广缙却奏称：由于福建省城与广东省城相距二十九站，道里辽远，声息不能时通。有福建籍在广东做官的人说：“督抚但知将就夷人，不思固结百姓，动辄抑民以顺夷，以致夷情愈骄，民心日离。”徐广缙还向咸丰进言：“恭读圣谕，该省民夷既不相安，官民又复不协，诚恐别生枝节，相应请旨将该督抚先予薄惩。”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一日，咸丰帝接到徐广缙的奏疏后，立即向徐继畬传旨申斥：“徐继畬职任封疆，抚民防夷，责无旁贷，乃于降旨饬查至再至三之事，日久并不奏闻，是既已错误于前，又复因循于后，漫不关心，成何事体？徐继畬著传旨申饬。刻下神光寺夷人究竟曾否搬出，该抚现在如何筹办？夷情是否静谧？绅民能否相安？俱著明白回奏，毋再含混延宕。”此谕尚未到达福建，神光寺两夷人经徐继畬软硬兼施，阳抚阴挤并用，再也无法居住，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十二月二十等日”，“先后搬至该夷目租赁日久之道山观居住，将神光寺房屋交还”。徐继畬当即于十二月二十二日上疏奏明。及至咸丰元年正月初二日接到咸丰帝十二月十一日的谕旨后，徐继畬不得不检讨了自己的过失：“臣失于觉察，致生枝节，愧疚在心，无以仰对君父，数月以来，寝馈难安。”“现两夷人虽已搬去，第未能先事防范，实属咎无可辞，惟有仰恳圣恩，将臣交部从严议处，以为办事粗疏者戒。”

在神光寺事件中，刘韵珂完全赞同支持徐继畬的对外策略，他向咸丰帝上疏：“查知徐继畬办理此事，不动声色，暗中筹画，必欲使该两夷搬出城外，并不为倡议强逐之数绅所摇，窃以为所办极为

合宜。”又称“如果徐继畬有谬误，臣亦不得谓无谬误。如果徐继畬初办时有袒护属员情事，臣岂肯扶同于后。臣密加查察，徐继畬实无办理谬误袒护之处”。极力为徐继畬洗刷罪名，并遣责那些参奏者：“只以臣与徐继畬不肯调兵、演炮、募勇，有违数绅之意，即远近传布，而言事者但知情关桑梓，不顾安危之大局，即以耳食之言，一再上渎宸聪，随致宵旰轸念，更难保嗣后不将钉炮眼、寻尸虫各谣言接续妄渎，臣实不知其是何居心。”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六日，刘韵珂又上疏咸丰帝：“查英夷二人前租住神光寺一节，现据兼署督臣徐继畬函称，该二夷已经侯官县知县兴廉理谕搬迁，将寺屋缴还。”并对所传谣言向咸丰帝作了解释。

咸丰帝对刘、徐的对外策略早已不满于心，岂可轻信刘韵珂所奏，他又于十二月二十七日谕新任闽浙总督裕泰：“到任后不动声色，再行严密走访，并将节次寄谕确查，详悉密奏，毋稍含混”。咸丰元年正月二十四日，又下谕旨：“著裕泰查明徐继畬有与回护徇庇等情？并遵前旨将饬查各件，一并据实具奏。”咸丰元年三月二十二日，裕泰回奏：徐继畬“尚无回护徇庇别情”。“刘韵珂、徐继畬复奏各情，尚无不实，亦无掩饰情弊。”咸丰元年三月二十三日，裕泰又接到咸丰帝二月二十二日的谕旨，令其将“英夷在闽买房打炮各节及刘韵珂、徐继畬频年办理有无错误，著该督仍遵历次谕旨，确切查明，据实复奏，毋得稍有不实不尽”。四月十六日，裕泰又将神光寺事件的前因后果向咸丰帝回奏，与徐继畬所奏各情基本一致，并称“夷等或在此贸易，或企图传教情形，均尚驯顺，民夷亦甚相安，臣惟当随时随事妥为控驭，期于安民抚夷，各得其宜”。

神光寺事件对徐氏是极大打击。他在道光三十年给其兄服先信中说：“弟在闽办理夷务已阅八年，不知历多少艰难，幸得平安无事。”不想在神光寺事件上，“巨绅林少穆（林则徐）意在沽名，急欲驱逐”，他“劝绅士从容图之，大拂林少翁之意”。“少翁又欲劝绅士捐资，雇募水勇，办理防堵，弟与刘玉坡制军（即刘韵珂）以英夷此

时并未露蠢动形迹，今忽先自张皇，是召之来攻，大为失计，不肯附和其说，愈得罪林少翁。寄信京中，嗾令弹射，于是攻之者一学士，两御史。”“此间公事本万分艰难掣肘，弟与刘玉坡制军俱怀退志。”“将来因此罢斥归里，固属万幸。即使平安过去，亦断不可一日居，早则今年腊月，迟则明年正月，决定引疾。”从这封信中也可以看出徐继畬对外策略遇到的阻力之大。

徐继畬虽然圆满地处理了神光寺事件，但由于他的对外策略得不到咸丰帝的赏识，且咸丰帝在这件事上对刘徐早已极为不满，这使得刘徐最终也免不了遭受惩处的厄运。刘韵珂因病开缺，徐继畬于咸丰元年三月降补太仆寺少卿。

徐继畬的对外策略，有效地解决了许多外交问题，避免了许多纷争衅端，使福建地面民夷相安，为清政府恢复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损伤的元气赢得了时间。徐继畬从道光十八年到闽，前后凡十四年，此后咸丰十一年中，福建巡抚凡七八更调，这也说明了徐继畬处理外交事务是十分成功的。如果当时清政府能接受徐的策略，一方面羁縻夷人，另一方面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图革新自强，则有可能避免或推迟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发生，或多或少地可以延缓中国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发展的进程。

我们今天研究徐继畬的对外策略，应当摒弃过去那种闭关锁国、驱夷拒夷即是爱国，开放外交、探求新知即是妥协投降的陈腐观念，还徐继畬一个历史的、客观的、公正的评价。

（作者吕义才，1964 年生，山西省忻州日报社记者。）

主要参考文献：

《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德雷克著，任复兴译。

《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方闻编。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外交类。

●李峭仑

这种对策不可取

道光三十年五月初，英国讲经人蔗枕、委里董，在福州城觅屋传教。[①]英驻福州代领事金执尔，代在南门内神光寺向寺僧租屋两间，并将租约送交侯官县用印。侯官县令兴廉当即在租约上用印交给英人。事情发生后，徐继畬觉得办理不妥，令兴廉前往英领事馆说明用印错误，并嘱令两英人搬出寺院，到城外另行租赁。金执尔借口此事须向英国香港总督文咹请示，待批复后再作办理。徐对此事看得不甚要紧，便决定“暂行从缓”，因此这事就拖了下来。直到半年之后，在清政府再三逼促之下，才使两英人搬迁出城。

这件在徐看来“事本细微”的事，迅速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在禁烟运动中名驰遐迩的林则徐，对此事深表不满，与福州绅士一道，向英国领事馆发出公启，令讲经人即速搬出城外。福州生童贴出公白称，神光寺系生童会课之地，难容夷人居住。福州士民也贴出类似公白。不久，这件事又惊动了京城。翰林院侍读学士孙恩铭、工科给事中林扬祖、湖广道御使何冠英相继上奏弹劾徐，说福州官民不和，地方官意存迁就，该抚一味畏葸等等。新即位的咸丰帝屡下谕旨，指责徐“徒托空言，夷患未消，民情亦怨。试问身膺重寄，所谓好恶同民者，安在耶！”又责道：“徐继畬职任封疆，抚民防夷，责无旁贷，乃于降旨访查至再至三之事，日久并不奏闻。是既已错误于

前，又复因循于后，漫不关心，成何事体！”面对绅士、京官激昂慷慨的弹射、指责，和皇帝声色俱厉的切责，徐上疏、复函十余件，对事件经过和本人态度作了辩护，但终究无济于事，断送了自己的前途。

对于这件事，徐本人的认识是“事本细微”，对林等绅士的反对意见认为是“意在沽名”。有的论者也认为林小题大作，对徐在事件中的遭遇表示同情。笔者认为对这件“事本细微”的事不应就事论事，而应从国家民族所处的环境来看待。当时鸦片战争已过十年，英帝国主义者以得胜者的姿态，获得五口通商特权后，得寸进尺，企图进一步扩大其特权。在神光寺事件中，英人违反除官员之外其余人不准进城居住的条款，竟然为两传教士租赁地处城内的神光寺。当要求他们搬出城外时，他们又以向上请示为借口拖延时日，不肯搬出。这一态度正好表明英帝国主义得寸进尺，扩大特权的企图，不应视之为“事本细微”。面对英帝国主义罪恶图谋，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抗。林则徐的所作所为，表明对英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嫉恶如仇的民族大义及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在神光寺事件中，林则徐是见微知著，十分敏感地识破了英帝国主义者的企图，发动群众对之给予有声有色的回击。这是林则徐自鸦片战争以来一贯的态度，不能认为是小题大作，意在沽名。

至于徐继畬在处理神光寺事件过程中，始终表现出意在迁就、一味畏葸的态度。首先，侯官县令兴廉在关系到国家尊严的重大问题上，错误用印，如此疏忽的行为，起码说明作为上司的徐继畬，平时在如何对待帝国主义者的问题上要求不严，负有间接责任。问题发生后对兴廉的处置也是一再拖延，并没有把兴廉的疏忽当作不可容忍的行为。其次，当英人借口要待港督批复后再作办理时，徐决定“暂行从缓”，表现了对帝国主义得寸进尺行为的容忍。徐在神光寺事件中的这种态度也不是偶然的，也是他以往态度的继续。早在鸦片战争之初的 1840 年，他写过一篇《禁鸦片论》，其

主张是，对贩运鸦片到中国来的罪魁祸首帝国主义者放任不顾，而对吸食鸦片深受其害的中国群众则加以严厉惩处，并提出大县每年杀十人，次者递减。他的这一主张表现了对帝国主义者的畏葸、对国内群众强硬的反常态度。这种主张在他回到山西后积极办团练镇压农民起义的行为中表现得十分清楚。此外，1844 年徐担任福建布政使时，曾受闽浙总督刘韵珂指示，在福州会见了英国香港总督德庇时。德庇时当时对英国领事李太郭住在福州城外表示不满。徐代表刘对此表示歉意。此后不久就让李太郭搬入福州城内。可以看出，徐在神光寺事件中所持态度也不是偶然的。

对于神光寺事件，我们还可通过与广州拒英人入城事件进行对照来认识。广州拒英人入城事件，发生在神光寺事件前一年，即 1849 年。《清鉴》有详细记载："英人遂以兵轮闯入粤河，申前约。广缙密召诸乡团练，先后至者逾十万人。自乘扁舟赴英船，告以众怒不可犯。耆老十余辈随入领事馆，陈说百端。英酋方谋留广缙为质，两岸练勇，呼声震天。英酋惧，请仍修旧好，不复言入城事。于是粤人益自得，谓洋人固易制也。"[②]广州拒英人入城与神光寺留英人住宿两相对照，广州之事令人扬眉吐气，福州之事使人窝囊丧气。而徐对广州拒英人入城是这样认识的："且我福州虽称省会，而地方之富庶，民气之强悍，实非广州可比。"岂不知，广州人民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表现出英勇不屈的抗争精神，正与那里的地方长官如林则徐、邓廷桢、徐广缙、叶名琛等人的鼓舞、倡导与组织分不开。福州群众并非天生软弱，在神光寺事件中所表现的激昂慷慨的态度正好说明这一点。问题在于作为巡抚的徐害怕群众的激昂情绪惹恼帝国主义，引来麻烦，所以一味压制群众的反抗精神。这样的态度当然培养不出强悍的民气，也就无法与广州相比了。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开始，其主旋律是如何通过各种形式，动员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在近代史上凡是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不管其影响大小，都是可贵的，都应该给予肯定。神光

寺事件中福州士民反对英人入城的行为理所当然应该肯定，而对徐继畬在这一事件中的对策只能持否定态度。

当然，徐也有他的苦衷。正如他所说："国家之定和议，既出于不得已，疆吏之办夷务，亦苦于无如何。"这种无可如何、左右为难的处境，我们可以谅解。但是，谅解归谅解，不能变为对他在神光寺事件中所作所为的肯定。

不错，在神光寺事件之前二年，徐完成了他的《瀛环志略》。此书是他广泛访问海上来的西方人的结果，从而高出同时期其他同类著作。他的这种深入虎穴探得虎子的精神是非常了不起的。西方人夸奖他："在对世界各种情况的了解上，在思想解放的程度上，该省代理巡抚都远远超过了当地政府任何官员……他比他的国人要进步得多。"在徐因神光寺事件被撤职后，西方人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退步"。当然西方人所说的进步与退步，都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来衡量的。但这足以说明西方人对徐这样的官员是感兴趣的。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得到那样丰富的资料，写出那样博大精深超越当时其他同类书籍的不朽之作。

有所得也会有所失。与外国人长期交往，使徐得到外国人的同情和赞扬，完成了《瀛环志略》这样的海国破荒之作。但是，当了解到外国的诸多先进之处，再看看中国许多不足之处时，不免对外国的强大产生畏惧之心，所以在神光寺事件中，生怕列强借口寻衅，生怕绅民惹事生非。而且与外国人广泛接触，感情上自然较为缠绵，要想在徐任巡抚的福建省会福州，发生像广州那样拒英人的壮举，也就很难想象了。

尽管徐在介绍西方各国情况、特别是美国情况时，介绍了西方的民主思想，此思想在以后中国近代史发展中起过积极作用。但是中国遭到的却是"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命运。徐和其同时代人都有一个共同理想，即通过学习西方使中国富强起来，否则中国无法同帝国主义对垒。他们却有一个思想弱点，就是怕群众起来惹

事生非，怕群众的“过激”行动招来帝国主义寻衅。但狼吃小羊总会找到借口的。后来的清政府虽然一再妥协退让，帝国主义的侵略却总是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只是在中国共产党出现以后，还是在中国这块贫弱的土地上，还是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应用马列主义，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不怕“刺激”帝国主义，才推翻了包括帝国主义在内的三座大山对中国人民的统治。“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徐在这方面的认识，还相差太远。

（作者李峭仑，1940年生，忻州市煤建公司经理。）

注释：

① 《咸丰夷务》卷四，页133，《徐广缙奏英人在闽居住情况及行动折》，中华书局1979年。

② 印鸾章编：《清鉴》卷十，页581，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

由华盛顿纪念塔中文石碑说起

——兼以祝美国独立二百周年

余于1974年4月赴美，往返五阅月，行经日本、夏威夷、美国本部十七州、十大城市，加拿大五大市区，所见所闻，略有记录。其中与我国有关事项八件，第一即华盛顿纪念塔石刻中文碑一则(Chinese Memorial in the Washington Monument)，承《中央日报》节略刊于1975年元旦副刊。是日晨间趋中山堂参加庆祝开国纪念典礼，礼毕甫出大门，即有二三好友告曰："华盛顿纪念塔中文石刻碑一事，大有意义，请将所有此项有关文字、图片一切资料，尽量搜集见示，详为刊载，以供世人详知其书、其事、其人，以征史实，以广传布。"既以盛意见嘱，热心可感，而余忝为原文著者徐公松龛同里后学，又1973年为徐公逝世百年纪念，倍有意义，爰集此项文稿，并检所存有关文件照片附入。意在述事纪实，不重史体文字，或亦可为治近代史者参考资料也。美京华盛顿纪念塔(Washington Monument)与其国会大厦、林肯纪念堂成一直线，遥对白宫。自1848年动工兴建，时经三十六年，至1884年始成。全用纯白大理石建筑，尖塔耸立，为美国首都独特之标志，全高五百五十五呎余，有石阶可拾级盘旋而上，共历八百九十八级。若乘电梯直上，需时约一分钟。每日游人如织，年辄逾亿。1966年竟达二亿有余，实一最佳观光胜地。其内壁砌有当时世界各国及美国各州所赠铸文、石

刻等共一百九十方，升登至第十层，见有长方形石刻中文碑一方，上镌徐继畬先生所撰，介绍美国，称颂华盛顿文，即为摄影。

谨按徐公继畬，字健男，一字牧田，号松龛，山西省五台县东冶镇人。生于清乾隆六十年（岁次乙卯，公元1795年），卒于同治十二年（岁次癸酉，公元1873年），年七十有九（中国名人生卒年表、钱穆先生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学人生卒年表皆列，而《中国人名大辞典》、《中文大辞典》皆未列）。其传美国政府1943年出版之《中国清代名人列传》（"*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2Vols, Washington. D. C. 1943 edited By Arthur W. Hummel）记录颇详。其父广轩先生名润第，字德夫，乾隆乙卯进士，内阁中书，施南府同知。在河南光山、山西介休、崞县、五台先后设馆授徒，成就颇多。治陆王之学，大有阐发。卒后公为裒集《敦艮斋遗书》十七卷，彭国栋先生（湖南茶陵人，山西大学毕业，山东省民政厅长，国防研究院讲座，香港珠海大学教授，清史编纂委员会总编纂）重修清史艺文志列入子部集儒家类。《易》类列有《说易》一卷，《中庸》类列有《中庸私解》一卷。以及《遗书》内读傅青主先生书钞杂言、答门人问学书等，皆极精粹，称理学名著。晋人乐道明晋南有薛文清公（名瑄，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人。永乐进士，累官礼部左侍郎，翰林院学士，入阁预机务，学宗程宋，世称河东学派，著有《读书录》，谥文清）为程朱学派大家；清晋北徐广轩先生为陆王学派大家；先后辉映。公道光六年进士（岁次丙戌，公元1826年），朝考第一，入翰林院，散馆授陕西江南两道御史，十六年出守广西浔州府，升福建延建邵道，转汀漳龙道，擢两广盐运使、广东按察使。二十三年升福建布政使，二十六年十二月授广西巡抚，行抵杭州，奉命与郑祖琛（字梦白，浙江乌程人，嘉庆十年进士，累迁福建巡抚，调广西，咸丰元年以弥缝酿患夺职，二年以养痈贻患，遣戍伊犁）对调，改任福建巡抚，迄咸丰元年，五年中两署闽浙总督。著有《瀛环志略》，华盛顿纪念塔内石刻中文碑即系咸丰三年（1853）中国耶稣教

人撷取此书卷九《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篇按语前后两段合成，由浙江宁波府镌赠者。

其书自道光二十三年（岁次癸卯，公元1843年）公以布政使常驻厦门办理通商事务起，经五年数十易稿，最初稿题曰《舆图考略》，又涂写为《瀛环考略》，有地球总图，各洲、各国分图二十一幅。后乃改定为《瀛环志略》，至二十八年八月（戊申公元1848年）始定刻印。余早年在国内陆续所收藏此书大小版本，共见八种，现检中央图书馆所藏道光戊申（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福建最初所刻本，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所藏同治丙寅（1868）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刻印本、台湾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道光庚戌（1850）镌本，及笔者现存在抗战胜利后，承乡先达靳克天先生（名巩，汾阳人，久居沪上，收藏金石书画甚富）所赠日本文久辛酉（咸丰十一年，1861年）刻本（书中名词两边，皆分注英、日字）共四种。全书分十卷，总分图共四十四种，对照华盛顿纪念塔内所砌中文石碑，其正文暨前后所记全文为：

> 钦命福建巡抚部院大中丞徐继畬所著《瀛环志略》曰：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
> 大清国浙江宁波府镌　耶稣教信辈立石
>
> 咸丰三年六月初七日　合众国传教士识

当《瀛环志略》一书刊行以后，人争传阅，风动一时，而朝野有力者，乃多以其"张大夷情"，横肆攻讦，激起轩然大波。适道光三十年秋又以解决英人租住福建省神光寺房屋事，与钜绅意见相左。公致其

兄家书云："……事属细微，本可了结。弟与刘玉坡制军均主避免先自张皇，以防启衅。乃有钜绅，寄信京中，嗾使弹射。一学士两御使，弹章迭上，一旬奉谕三次……此间公事，本属万分艰难，弟早蒙退志，因此罢斥归田，固属万幸。"[①]遂屡经乞辞，咸丰元年，陛见后降补太仆寺少卿。二年壬子科特简四川乡试正考官，乃攻者复力，遂传旨革职，试差事毕，奏报公文递出，径行归里。受聘为平遥县超山书院山长，教授生徒。十年中以洪杨猖獗，山西巡抚荐命驻上党督办防务。嗣以回捻乱起，复奉命督率山西官绅总办各府州团练，驰驱太行各径，两事各年余，晋抚依重，三晋得以独免祸乱。十一年二月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亦简称总署），以外人（英使威妥玛、美使薄安臣、卫廉士等）特重公，同治四年始复召起，仲冬入为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时公年已七十有一。五年冬授太仆寺卿。六年创立同文馆，任公为同文馆大臣。晨夕深念，惟时西后当朝，官绅虚骄，不能有为，觑欷不自得，遂于八年春季告归。兹举数事以见当时情形。

时相倭仁（字艮峰，蒙古正红旗，驻防河南。道光九年进士，曾文正公在京时，相与讲求宋儒之学，同治初，翰林院掌院，帝师，大学士。同治十年卒，谥文恭）最负时望，总署议设同文馆，考选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官入馆，肄习天文、数学等，聘西人为教习。倭以"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尤以西教习为上亏国体，下失民心，大为不可……"上疏罢议。恭亲王奕䜣等奏驳，始行设立。翁松禅（名同龢，字叔平，江苏常熟人。咸丰六年进士，久居讲席，刑部工部尚书，历掌文衡。光绪二十一年入总署。二十三年，协办大学士，戊戌开缺回籍，三十年卒，谥文恭）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日记："倭相力言同文馆不宜设。又同文馆之设，谣言甚多。有传写对联云：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又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余又曾闻同文馆开办时，徐总管奏请派倭相莅馆训示，竟以途中马逸为辞，终不到馆。似此种种，公之处境，亦可知矣。

当公罢官后,《瀛环志略》亦随之不复流传,而日本官民则先后翻刻数次(据美国出版之中国名人书内谓翻刻二次),以为通知世界之南针。我国则至同治五年(1866)总署始再刻印。至光绪三十一年,端方、载泽、李盛铎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乃大印行。前者距书成已十八年,后者又迟三十八年。前者较日本文久辛酉刻版已迟五年,后者又迟四十有四年矣。又在光绪二十三年,王锡祺与弟锡祄辑《小方壶舆地丛钞》收有徐著《地球志略》,其再补编(全书起自光绪三年,至二十三年完成)刊有只署一"毅"字者一文,曰《瀛环志略订误》。光绪二十六年,张煜南榕轩在其所著《海国公余辑录》中,刊有《辨正瀛环志略》、《推广瀛环志略》各一文。王书订误分邦国名称之误,如英吉利之总称,不译以比利敦或被利地,乃以英吉利为英国之总称,有舛名实。及方向错置、地势断续、部属遗漏、岛屿未详、远近失考、大小有误等。张著则有辨正,有增补。此殆道咸间,国人世界地理知识,粗简不周。如见公有致张石洲先生(名穆,号月斋,山西平定人。乡试被黜不再赴试。博通经史,著有顾炎武先生、阎百诗先生年谱,《蒙古游牧记》,皆称名著。有《月斋文集》,早年北京海甸商场书肆,先生所书对联等,价高于祁相国寯藻所书者,重其艺,兼重其人也)函中言:"海图前稿,舛陋不足观。数年来于泰西人所刻杂书,得即摘录,其书皆俚不成文,而事迹颇有可采,每与夷官接晤,辄询以西国事,亦多有新闻。魏默深《海国图志》引证浩博,洵为钜观。惟其中舛误亦复不少。如以黄海西岸之瑞典与日耳曼南之瑞士混为一地……"[②]"不出户,通天下",不已难乎?惟公此著,自知不能详确,故始题曰"考略",终题曰"志略"。

当道咸之际,士大夫非公者偏多,而赞誉其人其书其事者亦大有人在。兹录所得有关记载与传述,藉以悉其概略。

先是自道光二十年起,公在福建延建邵道,调汀漳龙道,兼办粮台、通商事,成绩卓异。大吏以"清廉明达,有守有为",特为保荐。

其后,刘韵珂(字玉坡,山东汶上人,拔贡,道光二十年浙江巡

抚，二十三年闽浙总督，三十年罢公署）称："余又与中丞，共治海邦，抚辑彝夏，有以见其用志之密，度物之明，慎枢机于一室，恢磅礴于万里。"

刘鸿翱（字次白，山东潍县人。嘉庆十四年进士，内阁中书，福建巡抚，有《绿野斋文集》）称："五台徐松龛，博物君子也。五年成《瀛环志略》，绘总图分图，先总说，次考据论断……幸车书大同之世，扬至诚配天之烈，诚言地球之指南也。"

彭蕴章（字咏莪，长洲人。道光十五年进士，咸丰元年军机处行走、工部尚书，文渊阁、武英殿大学士）称："五台徐松龛中丞，博学多闻，兼综条贯。尝与论历代典章制度以及前言往行，无不元元本本，考核精详。""今移海国见闻之笔，作太平寰宇之书"，"才士倾心"，"小儒咋舌。"

鹿泽长（字春如，山东福山人，福建道员，佐理通商事务）称："精心考证……藏之秘府，颁在学官……馈饷靡穷，而于国家抚驭之策，控制之方，实有裨益。"

陈庆偕（字慈圃，浙江会稽人。道光末福建布政使，后任山东巡抚）称："松龛中丞治闽，政通人和，旁及柔远之略……《瀛环志略》一书，凡各国沿革建置与夫道里、风俗、人情、物产咸备，古今荒唐之说，归于实是。"

沈桂芬（字经笙，一字小山，宛平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历官山西巡抚。同治八年，军机大臣，左都御使。九年，兵部尚书。十年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至光绪七年卒，谥文定）对公最为钦重，大力提倡《瀛环志略》。

董恂（字忱甫，一字蕴卿，苏州人。道光二十年进士，同治二年三口通商大臣，四年左都御史，五年兵部、八年户部尚书。自咸丰十一年设总署，冬入为大臣，迄光绪六年，任事十九年。曾受人弹劾，有《狄芬书屋遗稿》）奏请翻译《万国公法》，并奏准由总署刻印《瀛环志略》。同治四年为作长序，五年书成，序中有言："往籍中驰情域

外，综怪奇谲诡之事，为汪洋恣肆之文……以不获躬历其境，一决所疑为憾。……《山海经》最古，……不敢臆断……，比叩泰西诸国人，则竟谓十不一实，而独服膺吾松龛先生《瀛环志略》一书。……各国之建置、沿革、疆圉、方面、广轮、道路、风俗、人情、物产，极地球之所有，莫不毕纪，……泱泱乎大风，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谨严慎密，视文人之子虚乌有，寓言八九者，不可同日而语。……特不解当年见是书者，何以不尽谓然？……于以知载籍极博，而其量十世，其量百世，自有确不可易者在。而益叹文章之显晦，又各有其时也，夫岂作者之幸与不幸哉！”

其后曾文正公晚年感外交困难，称公为天下才。

郭嵩焘（字筠仙，原名松涛，湖南湘阴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初佐曾文正公治军。光绪元年，兵部左侍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二年，改署礼部左侍郎，出使英国）初亦以公书述英法诸国盛强为过，及使英，与人书叹曰：“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者乎？”

清人《说荟》载：“忆道光末年，徐松龛中丞名继畬，撰《瀛环志略》，当时见者哗然，谓其张大外夷，横被訾议，因此落职。自来我中国士大夫夜郎自大，其贻讥外人，固不足怪。惟今日慕欧化者，又何前倨而后恭也？”（按，此文原系选自辜鸿铭先生汉滨读易者杂文内）

《近世人物志》载：“管理同文馆事徐继畬，同治四年，由前太仆寺少卿召赴京，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年七十一，授太仆寺卿，八年三月致仕。论者谓徐之出处，可以觇一时风尚云。”（按，此书系金梁所著。金，满州正白旗人驻防杭州。光绪三十年进士，任职清史馆暨故宫博物馆，著有《近世人物志》、《光宣小记》）

梁任公《三十自述》：“年十八（光绪十六年，1890），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始知有五大洲各国”。又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地理学部内言：“鸦片战役后，则有魏默深《海国图志》

百卷、徐松龛继畬《瀛环志略》十卷，并时先后成书。……魏书不纯属地理，……徐书……纯叙地理，视魏书体裁较整。……中国之士大夫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

《中国地理学报》载：于右任先生（原名伯循，陕西三原人。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举人，民国元年交通部次长。自 1942 年 1 月 1 日任监察院院长，迄 1964 年 9 月 10 日，卒于任）于民国三十二年春，在重庆各报发表《太平海》一文，主张地理图上取消“日本海”，正名为“太平海”。有言：清道光二十八年，五台徐松龛所著《瀛环志略》，于今所谓太平洋者，注云：“大洋海即东洋大海，又名太平海”。

笔者今查各地图，仍为“日本海”，迄无“太平海”字样，于公主张正名，以文化力量为侵略者之惩戒，使此太平海为正义胜利之征象，以是获太平老人之称，亦因以自号焉。

近年在台湾印行之《清史列传》徐继畬传末论曰：“……直针君德，所举三防（指咸丰二年所上《三渐宜防疏》：土木之渐，宴安之渐，壅蔽之渐，皆宜预防。商务印书馆出版之《道咸同光四朝名臣奏议》载有此文。人谓与孙文定公《三习一蔽疏》先后媲美），陈义尤高。”未及《瀛环志略》一书之风波与影响。

又笔者于抗日战争前，在太原招待傅增湘先生（字沅叔，四川江安人。光绪二十四年进士，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著有《藏园迪书题记集》、《续集》）承告：“贵省在季清，有两大要事，一为徐松龛先生在道光年间，即主平等外交，接受西洋文明，可称维新先觉之士。二为光绪二十八年（1902）太原即成立山西大学堂，分设中西两斋，中斋以研习中学为主，西斋以研习西学为主（民国元年改称山西大学，后改为国立）。并在上海设立山西大学堂译书院，译成西书三十余种，即开中西学术并重之风。此两事国人实不应忘，想贵省人士，当更为重视。”云云。余归告阎公，公曰：“松龛先生在清道咸间，已知维新，虽当时不能竟其用，于世大有影响，实不得仅以‘自了汉’称之。”谨按，民国四年，阎公即为辑印《松龛先生全集》六册，影印

《松龛先生家书墨迹》一册行世。惟先生手定奏议稿本，光绪七年张文襄公（名之洞，字孝达，号香涛，河北南皮人。同治二年进士，为学重经史实学，历任两广、两湖、两江总督。锐意新政，创办实业。后任大学士，军机大臣，谥文襄，著有《广雅堂集》）抚晋借观，迄未收还。彭著重修清史艺文志，列有公著《瀛环志略》十卷，及《地球志略》、《俄罗斯国志略》、《五印度论》各一卷于地理类外志之属。又《两汉志沿边十郡考略》、《两汉幽并凉三州今地考略》各一卷，列于总志之属。阎公序文有曰："先生深识远虑，烛照事机，复按成局，历历不爽。惜当时舆论嚣然，廷议未协。虽荷知遇，卒不得谐，抵瑕者尤媒蘖之，罣议去职，闽事遂日以坏矣！……先生之一身，始也纷然，今也漠然，嘻可慨也已！"

又赵公次陇言："吾幼时读松龛先生在平遥超山书院复闽省友人书有云：'血性未寒，寸心不死，心中有欲吐之数言，关系安危大计。此言朝达宸枫，夕依秋柏，毫无遗憾。惟废员擅递封章，有干例禁。……欲效一喙之忠，竟无上达之路。垂死孤臣，所恨不在饥寒也！'云云。其实即系欲建议政府，决定对外与外洋各国均善邦交，对内取法泰西文明，并先采用其长技，以图自强也。"又言："松龛先生当时受人攻讦，最为耸动听闻之点，即系有人摭截《瀛环志略》书中第五卷，论日耳曼原文有'日耳曼为欧罗巴适中之地……其人聪明阔达……又佛郎西、英吉利立国之主，皆日耳曼人。诸国每遭丧乱，辄招取日耳曼列侯或世子为王。大如英吉利，小如比利时、希腊等皆是也。殆西土王气之所钟欤？'言者故意隐略'西土'二字，及（上述碑文中所引）'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一节，故意不当叙述文，而混为议论文，含有赞成之意，上劾并为哄传，实欲中以奇祸。后以部议在福建巡抚任内起解犯官何士邠迟误，于公在四川主办乡试甫毕，正在进呈时，奉部文传旨革职，乃是表面说法了法，亦以示朝廷宽宥大臣之恩义，藉以保全首领，亦云幸矣。"

追后李文田(字仲约,号芍农,广东顺德人。咸丰九年进士,南书房日讲官,同治初侍读学士)性好舆地之学,详阅《瀛环志略》全书,间或加注并圈点,于卷六《意大里亚》"居然大一统之势,建都城于罗马,诸国仰之如周京"一句,删去"大、之势、如周京"六字,绎其文义,仍系出于忌讳之意。

又笔者民国三十一年再到重庆,寓所与赵公芷青(名丕廉,号麓台居士,五台人,清拔贡。辛亥前秘密参加革命工作。民国初,任丰镇、屯留等县知事,继任潞泽辽沁营务处处长,兼长治县长。北伐前,任太原国民师范学校校长。北伐初,代表阎公,由沪密赴南昌蒋公行营连结。后任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居楼,上下为邻,辄有长夜之谈。一次语余:"清季吾乡阎公伯川、赵公次陇(名戴文,号清凉山人,清秀才,留学日本。辛亥,与阎公太原首义,任督都府秘书监、参谋长,陆军第四混成旅旅长。北伐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内政部部长,监察院院长,太原绥靖公署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总参议,国民政府委员,山西省政府主席,遗著《清凉山房集》)、张公玉堂(名瑜,与阎公同留学日本。太原首义,任督都府参谋长。五年病逝,五台山下阁子岭,建有大纪念碑)、徐公西园(名翰文)、王公弼臣(名建基,与徐公同留学日本。辛亥,与阎赵两公,约定分在太原、归化城同时起义,事泄同被害。民国元年春,在五台举行追悼大会,建有四面石刻烈士碑)、康公子韩(名佩珩,留学日本,辛亥在五台起义,成立保安社。民国初,任潞泽辽沁营务处处长数年病逝)、徐公子澄(名一清,号四耐轩主,清秀才,曾任山西大学堂斋务长,留学日本。民国初改建太原电力公司,创设晋华纺织厂,晋生染织厂,晋裕面粉公司等多种实业。又任粮服局局长,山西省银行经理,参加宗教团体,办理各项慈善事业)以及王朝山(名庆恩)、李自牧(名楼鹊,号晓峰)、白映斗(名长明)、赵恭安(名三成)、赵云若(名子初)、赵涵溪(名晋清)诸先生,相率放弃举业,热心留学,各有成就。而今日老弟张子奇先生(名云峰,

留学日本，后任山西留学日本学生监督。曾赴俄国考察，抗战前任天津电话局长。胜利后，任天津特别市副市长，现在台北）甫由天津脱虎口，经香港来重庆，《大公报》发表欢迎推崇之社论。当抗战之初，子奇独留天津，冒险奋斗，因应机宜，达成任务，建有殊功，荣归陪都，真乃大丈夫，奇男子。可称今之苏武，尤觉光荣。以吾五台素号贫瘠偏僻之小县，而能如此，以当日言，实非易事。推厥原因，则多系各人早年直接间接感受《瀛环志略》及父老传说徐公之影响，故得风气之先云。"噫！书香流泽，无间遐迩，诚哉斯言。

上述华盛顿纪念塔中文石刻碑，迄今已一百二十四年，久成为中美传统友谊之证象。去年适值美国独立二百周年纪念，特为显扬此碑，乃最富历史性、国交性之礼品，当为中美两国识者所重视。而徐公以先机敏识，宏开风气，可称维新先驱，乃竟郁郁以终其生，然身虽黜于当时，文乃传于国外，名永垂于后世。今距《瀛环志略》刻版为期一百二十有九年，迄 1973 年为公逝世百年纪念。而在公身后三十余年，国父革命，使中华民国成为亚洲第一共和国，实行天下为公，选贤举能之民主宪政体制，亦可大慰公在天之灵矣。公忠体国，曲突徙薪，真知卓见，公是公非，久而自明。故所贵君子立言，觉世牖人。陈如一先生于 1968 年冬留美时，亲为察看记述并建议设法洽商洗刷韵漆，一新观瞻，藉以引人注意，诚善事也。

至公在闽抚任内，于道光末年，办理通商事务，应付英人，其间因英人租住福建省神光寺房屋事，与《瀛环志略》一书，当时汇合，涌起一大波浪。兹录闽浙总督刘韵珂查复处理神光寺事疏，并公之有关家书，以明经过实情，以供参证。

再臣刘韵珂于道光三十年八月二十日承准军机大臣密寄道光三十年八月初一日奉上谕："前因英夷借住福建省城神光寺，叠经降旨，饬令该督抚密筹妥办。并饬刘韵珂阅伍事竣，迅即回省会商。兹又有人奏：'夷人恃强构衅，大吏抚驭无方'等语。著刘韵珂秉公密查，是否该抚徐继畬办理谬误？有无袒护

属员？徇庇汉奸？并现在民夷能否相安？据实具奏，毋得稍有不实不尽。将此密谕知之，原折着钞给刘韵珂并与徐继畬阅看。钦此。”遵将原折详细披阅，并与抚臣徐继畬阅看。当据徐继畬面称，以英夷租屋一节，事甚细微，乃竟办理不能速竣，致人言纷纷，屡烦圣廑，真觉愧悚无地。伏查此次英夷入城租住寺屋之始，臣虽尚在泉州阅伍，然一接徐继畬函信，即以该夷既经入住寺屋，虽系有违条约，只宜设法令其搬移，断不可硬行驱逐，致该酋吹唆于上海投文之际，执此藉口等情，函复。臣回省后，查知徐继畬办理此事，不动声色，暗中筹画，必欲使该两夷搬出城外，并不为倡议强逐之数绅所摇。窃以为所办极为合宜。迫后一切办法，均系臣与徐继畬密为商酌。所有实情及密筹侦察，并将侯官县知县兴廉暂行缓参各缘由，已于另折另片内缕晰入奏，均系据实敷陈，并无不实不尽。是此事既系臣与徐继畬公同商办，如果徐继畬有谬误，臣亦不得谓无谬误。如果徐继畬初办时有袒护属员情事，臣岂肯扶同于后。臣密加查察，徐继畬实无办理谬误、袒护之处。至原折谓夷人恃强构衅，查该夷仅止两人，寂守穿漏之屋，毫无动静饶舌之处，臣竟不知其恃强构衅者何在？又谓徐继畬庇护汉奸，徐继畬虽至愚，谅不屑为此，臣即不为代剖，自在圣明洞鉴之中。又谓闻五口互市，并未明许入城，该抚回护前非。查条约内载明英夷派设领事管事等官，准住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等语，中外咸知。原折所闻之语，何所依据？徐继畬查照条约办理，并无错误，因何回护？又谓五口通商而福州省会之区，独令入城居住，本由督抚办理不善所致。查宁波、上海两口城内均有夷人居住，并非福州一处独令入城，且均系查照条约。浙江、江苏既无办理不善之处，即不得谓臣与徐继理不善办理。总之，此时夷务除却恪遵谕旨，镇静密筹，别无办法。现在福州省城内外闾阎安堵，阛阓恬熙，实系民夷相安。只以臣与徐继畬不肯调兵、

演炮、募勇，有违数绅之意，即远近传布，而言事者但知情关桑梓，不顾安危之大局，即以耳食之言，一再上渎宸聪，随致宵旰轸念，更难保嗣后不将钉炮眼、寻尸虫各谣言接续妄渎，臣实不知其是何居心？臣与徐继畬受先皇帝特达之知，蒙圣主高厚之眷，虽无才识，尚有天良，且非木偶，何敢因小事而肇大衅？现仍督同办理夷务之候补道鹿泽长与兴廉设法密筹，不稍张皇，俾令该二夷退居港口。硁硁之见，总坚定不移，断不为喜事沽名之数绅所摇惑。所有遵旨密察缘由，谨据实密片复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公是年九月初六（西历10月10日）致堂兄服先（名继畤）书云：

弟畬禀请哥哥大人安！八月间折差晋京，寄书一函，未稔于何时可到？弟在闽办理夷务，已阅八年，不知历多少艰难，幸得平安无事。今年夏间，有夷人租住城内寺屋一事，事本细微，系侯官县兴令一时疏忽，误与用印。从容劝谕，本可了结。乃巨绅林少穆则徐，意在沽名，急欲驱逐。既出绅士致夷人公启，又写生童告白，遍城粘贴，声势凶凶，几致酿成大事。弟以唤夷今年，正在上海投文，天津赴诉，方欲挑衅生端，不可使之藉口。劝诸绅士从缓图之，大拂林少翁之意。偕诸绅士致弟公启，弟剖析利害答之（绅士致夷人公启，暨绅士致弟书，与弟复绅士书，皆为言事者钞呈御览）。刘玉坡制军旋即回省，与弟意见相同。林少翁又欲劝绅士捐资雇募水勇，办理防堵。弟与玉坡制军以唤夷此时并未露蠢动形迹，今忽先自张皇，是召之来攻，大为失计，不肯附和其说，愈得罪林少翁。寄信京中，嗾令弹射。于是攻之者一学士、两御史。八月一旬之内，连奉寄谕三次。初参弟为抚驭无方，继又参弟为袒护属员，徇庇汉奸。现已一一复奏，尚未知旨意如何？此间公事，本万分艰难掣肘，弟与刘制军俱怀退志。因俱受宣庙特达之知，又值新主初登大

宝，不敢遽作乞身之想。不意群小乘言路宏开之际，吠影吠声，轰然交作。弟与玉坡制军先后俱遭弹劾，深悔见几之不早。此事尚末见分晓。将来因此罢斥归田，固属万幸，即使平安过去，亦断不可一朝居。早则今年腊月，迟则明年正月，决定引疾。自出奏请假（弟出奏时当寄信京中，专足送至家中），至再请开缺，总须七八十日，方能奉旨。起身已在夏初。炎天走路，不如秋冬之好走，然亦无可如何之事。

前所云外边客房，能于明年春天盖起最好（能盖五间为妙），平房即好。但以进深深些（台基须高些），有歇厂为妙（东西如能盖小房数间，以为佃户长工停歇之所更妙）。其余一切诸事，吾兄酌度为之。

计今年家中饥荒，买地钱七百五十千，还槐阴赵姓老债钱二百五十千。二宗已是一千千之数。此外杨姑爷钱一百千，有娃子钱八十千。李璋表弟家，弟从前曾许接济，长年屡有信来，可安顿钱四十千。又达人表叔两次信来索借，自因写碑谢礼嫌少之故，今可再送钱五十千。并致意以本欲多竭微情，因已在下台之际，两袖清风，甚为抱愧。三存、三才回时，弟许以再各寄买驴钱二十千（共四十千），此数宗合起，又有三百余千。今共寄去银壹千两，打各项饥荒，暨吾兄用度外，如有存余，可为明春盖房之用。外另寄银壹百两，系弟前应承为继贤兄打饥荒之用，可交继贲转交六婶母。

弟到家后，至多停歇二年，即须赴介休设馆。闻义安村之十方院，现尚完好。以此为老学究藏拙之地，亦甚妙也。此禀，即请

嫂嫂安，合家都好！

庚戌九月初六日弟继畬禀

可另提钱十千与继壥为树儿添补一切之用。[②]

同治十二年，距公乡举六十年，依故事重宴鹿鸣，地方大吏先期报闻，赏加头品顶戴。七月卒，年七十有九。有子名树，字子立。其时徐府忽遭回禄，几焚及柩，迟迟葬于东冶镇东之仓城十亩平地内。

乡宁杨秋湄先生（名笃，字维利，同治四年进士。久参张文襄公幕，长于考据金石之学，篆书最有名）为撰家传，文末“论曰”一段，人称卓见得实，传为张文襄公甚为激赏云。兹录如下：

公讳继畬，字健男，号松龛，五台人。父润第乾隆乙卯进士，同知施南府，以理学名世，公其长子也。幼颖敏，成童工属文。周石芳侍郎督学山西，大器之。补诸生，食饩。年十九，举嘉庆癸酉乡试。道光丙戌成进士，朝考第一，选庶吉士。遭父忧，服阕授编修，转陕西道监察御使，时公释褐十年矣。虽读书中秘，而于部曹事例，郡国利病，靡不究研洞晓，思有所建白。及拜台谏，一月章数上。当是时，宣宗屡降旨切责内外诸臣空文无实，每得公疏，必称善再四，风示有位。海内翕然想其风采，以为贾生、陆宣公复出也。最后论政体宜崇简要，尤切时务。疏入，上大感动，立召对，与语移时，询及民瘼，至于流涕。明日即擢为浔州知府。甫到官，迁福建延建邵道。延平于上游四府为要冲，岭溪盘亘，奸宄时发。道光初总督赵文恪公设法惩治，始少戢。公申明条约，督所属实力奉行。巨盗某尤枭黠，踪迹诡密，屡捕弗获。公一夕侦知所在，掩擒之，并其党数人，生磔诸城门，见者股栗。比去任，境内肃然。海防事起，庚子四月，敌艘驶入穿山洋，八闽骚动，乃调公署汀漳龙道。甫至而厦门告警，距漳七十里，居民日数警。公连夜购大木为排桩塞镇门各港，扼险固守。敌知有备，不果犯。旋舍厦门去。事平，擢广东盐运使，未至而改按察使。癸卯迁福建布政使。丙午授广西巡抚，未至复调福建。公既久驻岭表，益究心洋务。于外国山川、道里、政事、风俗，一切战守之势，张弛之宜，无不了然心

目，如聚米画沙，烛照而数计。既受事，则坚守要约，疏阔节目，务以恩信相羁縻。通商诸国，咸倾心向慕，商民辑睦。侯官林文忠公时督云贵，闻之弗善也。及归里，倡议尽驱西商出城。责公畏葸，公不之辩，发数难曲询之，林亦不能答也，意稍懈。而闽之新近喜事者，日相与媒孽，竟为蜚语闻都中。同官皆为公危，公屹不动。始公入觐时，宣宗询及海外形势，各国风土，公具以对。遂命纂书进呈，公归未尝以语人。及书成，曰《瀛环志略》，未表进而宣宗升遐。至是言者摭中外交涉事劾公，并指是书为口实，欲中以奇祸。文宗既召见，知公无他，顾左右曰："徐某乃老诚人，何谓欺诈？"命留京供职，补太仆寺少卿。公念上方初政，当以养德为先，上《三渐宜防疏》。一曰土木之渐；二曰宴安之渐；三曰壅蔽之渐。特旨嘉奖，命书之屏风，置座右。是岁，咸丰壬子乡试，即简公为四川正考官，异数也。试毕未复命，以前在福建起解犯官迟延，再被议落职。公自居台谏，迄膺方面，一岁或数迁，莅职皆不久即去，独抚闽五年，与洋务相终始。遇事持大体，具卓识，不以小数沽名，激切耸众，有所筹画，动出万全，议者未能深悉。即不安于位，而天下益以多故，乃叹服为不可及。家居十余年，值粤逆北犯，当事奏派督办防堵，既而陕豫军并兴，复奉命总办各府州团练。同治四年，诏有司趣之入朝，两宫皇太后慰劳甚至，授太仆寺卿，通商衙门行走。以前在籍团防功，给二品顶戴，寻充总理同文馆事务大臣。居三年，以老乞致仕，优许之。岁癸酉，距公乡举六十年矣，故事重宴鹿鸣，大吏先期奏闻，加头品顶戴，其年七月卒，年七十九。公伟躯干，言词朴讷，性强记，于书无所不读，为文博大宏深，制举业尤成一家言，蔚为当代宗工。年六十始为诗，具张王体格。每一篇出，人争传诵。遇人甚和易而耿介自信。在翰林日，时相慕其名，屡招致之，卒不往。罢官不名一钱，主讲平遥资修脯以给。平生论学大旨，以不欺为本，忠爱特出于天性。其再

出山，年逾七十矣。自知衰老，顾以受先帝知遇，冀得展布所蓄，因时补救。及见事势大异，则感叹歔欷，郁郁不自得。然各国使臣闻其至，皆额手相庆，争先觌面，或携榼酒造邸为寿。国之君主，亦时时寄声讯起居，其敬服若此。而所著《瀛环志略》，中外刊布，群奉为指南云。

杨笃曰，余读林文忠公使粤奏稿，辄叹以彼其才不竟于用。读公书又疑之，乃晓然于地势敌情与事变之所由来也。两公深谋远虑，持论不同，而为国之心则一。其时士大夫顾多是文忠而非公，果何如哉？果何如哉？秀全既炽，朝廷畀文忠以讨贼之任，未至而卒，海内尤同声痛惜，谓为生民之不幸，而不知公之身系安危者，其事又相若也。初，宣宗既简公抚粤西，旋命郑祖琛抚闽。粤西地偏瘠，独抚臣以岁食浔梧关税称肬仕。郑，时相门人也（按，道光二十六年、二十七年大学士为潘世恩、穆彰阿、宝兴、卓秉恬、耆英、陈官俊），意有所属，乃于上前盛称公才。谓粤幸无事，闽方通商，宜两易，公行至杭州而膺新命。郑素奉佛，既抚粤，日持斋戒杀，遇会匪劫盗，专务姑息，不以实奏。秀全遂无所忌而难作矣。虽创钜者溃或迟，痛深者愈难速，然使公当之，必不匿情畏事，酿患若是其极。论者徒冀幸于功成，不追维于祸始。天下既定，更无言及之者。吁！曲突徙薪，无劳可见，而况其在几微之先乎？余故备著之，以俟后之知人论世者。

又公葬后不封不树，地由族人分耕，毫无标记。民国二十七年余干役西安，一日在防空洞内与徐公子澄谈及，引以为憾。约定俟胜利还乡后为徐公修墓立碑，举行纪念大会，刻印书籍，就其中丞第改设图书馆，以资永久纪念。及三十四年日本投降，在渝准备还都，一夕侍坐贾公（名景德，字煜如，清末甲辰科进士，山西沁水人。久为阎公秘书长，时任铨叙部长，并为阎公代表。后任考试院及行政院副院长，行政院秘书长，考试院院长）、徐公（名永昌，字次辰，

山西崞县人。陆军大学毕业，时任军令部部长，曾任绥远、河北、山西省政府主席，两任国防部部长，陆军大学校长，代表中华民国出席日本东京湾美国米苏里军舰受降典礼）重提此愿，徐公即推请贾公撰文备用。兹将所存墓表文稿影印，以供观览。其中警语有："公之先机敏识，宏开风气……化中国为真正民国者，宜以此论为称首。"书至此，忽忆民国二十五年秋，承常师子襄（名赞春，山西榆次人，京师大学堂毕业，山西大学、法政专门学校教授。邃于国学，特精篆书。贾公煜如称时人罕与伦比）以徐公父子大幅画像各一幅赐赠，并另纸楷书："松龛先生尊人广轩先生貌清奇，目有清光，富山林气。松龛先生则容仪威重，风度端凝。读书通大义，不沾沾章句，亦不为讲学家言。性和易耿介，尤不解沽名。文宗召对时，顿足指东南曰：'徐某乃老诚人，何得谓有欺诈？'"继言："松龛先生诗不多作，自亦大家，文出入史汉，真是大手笔。"手批两汉书，多有卓见，真是读书得间。至其父子制义文，尤为当时上上乘。字系褚颜合参，所藏临争座帖十二条，可配南园等。常有白话文。余当举所记五台县城明伦堂前楹所悬公书大字联："学以明人伦也，若为功名富贵而来，出足便已错了；道在求放心耳，徒工语言文字之末，到头成个什么？"两旁题记文句颇长。余继以所记忆公与友人书，不非寡妇再醮，告师，遂说："可惜一般人不知道，以为世皆腐儒。"又余幼时读书东冶沱阳高等学堂，承公曾孙铭栋同学引入徐府中丞第，见大门有公自题"恪守家风"匾。升奉先堂瞻拜公之公服画像，迄今犹觉其弘伟气象，深印脑中。再进二院，大门有"循理"二字，其内左广轩先生小院，过门刻"归璞返真"，屋门有"敦艮斋"匾。公之小院，过门刻"安静和平"，屋门有"退密斋"匾。皆公笔迹，褚颜合参。主讲平遥超山书院时汇所作范式课文曰《退密斋时文集》，亦以知公罣议后，愿"退藏于密"之隐衷焉。又忆父老传言，徐公晚年每饭常有东坡肉一道，白酒一壶，可想其老当益壮，矍铄情状。又言，公里居时有腊月以马褂等物托人带至忻州典当事，生计拮据，其情可知。公威丰

三年归里祭祀文有:"困心棘手,不可名言。继畬谨守先训,饮冰茹蘗,不取一钱;矢慎矢勤,力图补救。九年之中,疆土幸无变乱,夷情亦复安恬。不料时局既变,议论日新。继畬坚守素志,不肯轻开边衅,遂为言路所攻,弹章至于六七……惟谨洁自守,尚未玷先人清白。……从兹里居教授,为村学究以终身矣。"吁!公之深远纡谟,忠诚风规,顺时卷舒,百世馨香,又何尚乎汲汲于一时之高爵显名哉!

(作者方闻,号彦光,1901 年生,山西五台人。曾任太原绥靖公署第二战区司令部秘书长、国民政府铨叙部司长,现为美国芝加哥中国文化学院教授。)

附记:此文原载台湾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 1976 年 9 月号复刊第十卷第三期;10 月号复刊第十卷第四期。——编者

注释:

① 此段引文与徐氏信稿(见下文)稍有不同。——编者

② 此段引文"之瑞士混为一地"之前的字句,均已与方闻先生编《徐松龛先生杂书集锦》中致张穆书残稿核对。——编者

③ 方氏原文此信影印件作为附录附于文末,此次据商务印书馆 1917 年影印《徐松龛家书真迹》校点后插入文中。——编者

●何守先

华盛顿纪念塔上的中文石碑研究

美国华盛顿纪念塔里砌着当时世界各国及美国各州所赠的190方铸文、石刻中，在第十层内壁上嵌着一方长方形花岗岩中文碑，碑文如下：

钦命福建巡抚部院大中丞徐继畬所著《瀛环志略》曰：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大清国浙江宁波府镌　耶稣教信辈立石

咸丰三年六月初七日　合众国传教士识[①]

碑文盛赞华盛顿在领导美国独立战争中所表现的雄才大略，推崇完全不同于封建帝制的美国民主共和政治，把华盛顿评价为高于中国的曹操、刘备和陈胜、吴广，是西方古今人物之首，而且气概绝

伦，是不可多得的人杰。

美国传教士促成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

此举，据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龙夫威教授所著《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所述，是"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们从福建向华盛顿国家纪念馆赠送了一块花岗岩纪念碑。在这块石碑上，用汉字雕刻着从《瀛环志略》中摘录出的徐继畬对美利坚英雄的评价"。理由是"华盛顿对这位中国博学官员具有超越文化壁垒的吸引力，作为对此的永久性礼赞"。既是为了纪念华盛顿，也是为了纪念徐继畬对华盛顿这种难得的歌功颂德，目的是双关的。

事情是由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们策划促成的，在宁波鲜为人知，查遍了有关地方史籍也得不到此举的记录。咸丰三年间，宁波涉外事务本应由宁绍台道管辖，不知何故却由宁波府署名，知府是毕永绍，于咸丰二年二月接任，在咸丰三年六月办完赠碑这件事后的九月就离任了。虽然查不到当时宁波府赠碑的具体经过，但是所以由宁波府署名，至少有如下三点可以说明绝非偶然。

一、鸦片战争前夕，宁波已成为长江下游海外贸易最重要的港口，宁波区域经济在此时也发展为全国少数几个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宁波在明清之际就有资本主义萌芽，在农村形成了"耕者十之六七，渔及交通者十之二三"的新格局，经济作物、家庭副业、手工业有新的发展，漆器、木雕、红木嵌镶家具、贵金属制品已极负盛名而行销全国，自然经济趋于解体。商业的发展尤为显著，这时的"南号"、"北号"总数不下六七十家，拥有大小海船 400 余艘。药材业已由明末的 20 余家增至 50 余家，并独创了"过帐"制度（即用专设簿记转帐，不用现金）。市内街道已由明初时的 6 条发展到 26 条，市场由 3 个发展到 8 个，宁波已是一个中等城市。[②]与此相伴随的是宁波的农业文化较早地向工商文化转变。与王夫之、

顾炎武并列为明清之际三大进步思想家的浙东学派鼻祖黄宗羲，比法国天赋人权论者卢梭早一个世纪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了“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专制天下的法都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都是“非法之法”，应当废弃。[③]

二、宁波在唐宋时代已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主要港口城市之一，西方文化进入和中西文化交流较早。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英军于1841年10月攻陷宁波府城，派鸦片贩子兼间谍郭士立为宁波知府，实行殖民统治达半年之久。五口通商之前西方文化已经通过葡萄牙、英国等国商人带到宁波。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人在侵占澳门的同时就在宁波设商馆。五口通商后西方文化更是随着传教士立教堂、办报纸、设学校，开医院等渠道一涌而进，影响日渐扩大。

三、美国对宁波的传教活动十分关注，传教活动一开始就与政治活动相伴随。道光二十三年(1843)即有美国耶稣教浸礼会医生玛高温(D. J. Magaowan)首来宁波设医传教，并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在宁波设美领事署。美国长老会医生麦嘉缔(D. B. Mecartee)同年来宁波施医传教，一度任宁波领事，后去日本任教授，回华后任上海美国副领事、邮政局主政以及清廷出使日本钦使的顾问。道光三十年(1850)到达宁波的美国长老会宣教士丁韪良在宁波建立传教团，学习华文华语，设立“天道书院”，8年后他离开宁波去北京美国驻华公使馆当翻译，但仍挂名宁波20年之久。他曾参与《中美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签订工作，咸丰八年(1858)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玛嘉温在宁波创办了宁波也是浙江最早的近代报刊——《中外新报》。咸丰七年(1857)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柯夫人(MrsCale)来华，在宁波办了一所女校。1844—1850年的6年中美国长老会派到宁波的传教士就有16人，并以宁波为基地逐渐向邻近绍兴、湖州、金华等地发展，在中国扩大他们的宗教、文化和政治

影响，增强这种影响力，几乎是所有传教士们的终生追求。[4]

以上背景资料说明，碑文所署耶稣教信辈就是包括了当时宁波的浸礼会和长老会的耶稣教信徒。所署美国传教士，当然也就包括了麦嘉缔、丁韪良等人。从他们在宗教和政治上的地位来看，赠碑之举的促成，麦、丁两人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在赠碑的时候，徐继畬的著述《瀛环志略》"张大夷情"和其他"夷务"上的问题已受到"弹章至六七"的抨击，被罢职还归五台县故里。如果没有麦、丁等传教士对宁波地方政府和朝廷方面都施加影响，宁波府是不会自动去赠送这样的石碑的。我以为赠碑之举，实际上是一种"借花献佛"。当然，如果没有鸦片战争的刺激，使得当时像徐继畬、魏源这样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感到为了对付西方来的陌生人，必须对他们有一番切实的了解，因而开始寻求有关世界各国的新知识……"[5]如果没有宁波当时比较早地萌发了民主意识，以及美国教会的影响，那是不会有《瀛环志略》中对华盛顿的赞语被辑成碑文赠送美国，不过，此举仍不失为中美传统友谊的一个象征。

西方民主政治的先觉

《瀛环志略》本来是一本世界地理专著，它与魏源的《海国图志》分别在 1848 和 1842 年出版，"第一次提供了比较符合实际的了解。这些新书大体准确地说明了地球大陆、海洋和各个国家的位置和各国的地理形势，也粗略地叙述了各国历史，还企图说明欧洲各国当时的经济政治制度"[6]。可是引起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重视的却是他在书里赞誉华盛顿的两处只有 150 多字的按语，一下子便把这本书的政治性突出起来，形成与封建帝王思想的尖锐对立，在道光和咸丰年间引起一场抨击风波。

其实，徐继畬在《瀛环志略》中对于西方新兴资产阶级民主共

和的赞扬并不只是赞扬美国及其领袖华盛顿，在书中还提供了英国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的模糊图画，他写道："英国……都城有公会所（按，指议院）内分两所，一曰爵房，一曰乡绅房（按，指上议院和下议院）。爵房者，有爵位贵人及耶稣教士师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必乡绅大众允诺而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大约刑赏征伐条例诸事，有爵者主议，增减课税，筹办帑饷，则全由乡绅房主议。此制欧罗巴诸国皆从同，不独英吉利也。"[7]徐继畬之所以对美英两国的经济政治了解得比较详细，也特别关注，这与他在福建厦门办理通商事务中结识美国传教士雅裨理以及英国驻福州首任领事李太郭及后任阿礼国，受他们的影响较深有关。

咸丰二年（1852）徐继畬曾经给咸丰皇帝上书"防三渐"，即一曰土木之渐宜防，二曰宴安之渐宜防，三曰雍蔽之渐宜防，说政治上要通，不要雍塞不通，[8]与他在《瀛环志略》一书中如此公开地表达对美英民主政体的推崇联系起来看，就可以看出：有的徐继畬研究者评价他是"不满清廷腐败，提倡民主政治的先觉"是并不过分的了。

早期中美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

石碑由宁波府署名，似乎是一件地方性的事情，其实它是整个徐继畬事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徐继畬 1844 年着手著述《瀛环志略》，1848 年出版，1853 年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将书中颂扬华盛顿的两段文字辑成碑文赠送华盛顿纪念塔。1862 年伯驾又在美国把碑文全文译成英文。然而事情并未结束。徐继畬 1865 年复职以三品京堂在总理衙门供职，协助处理中国与各国之间的事务之后，1867 年 10 月 21 日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将一幅仿斯图尔特作的

华盛顿画像，作为官方礼物送给徐继畬，以安慰和表彰他因称颂美国首届总统而被罢职，并在北京举行了赠像仪式。蒲安臣在致辞中说："画像是总统特地让国务卿请一位卓越艺术家制的，今天，我以美利坚合众国全体人民的名义，带着一切美好的祝愿，赠送这幅画像。"徐继畬也在仪式上作了答辞，说"华盛顿已成为全人类的典范和导师。他的贤德，已经成为连接古代圣贤和他以后各代伟人的一条纽带"。当时美国的《纽约时报》于1868年3月29日在4版发表了题为《美国在中国之影响》的报道，综述了徐继畬著述《瀛环志略》和他本人的沉浮经过，最后说到徐继畬复职时的评价是："这种重用也是美国在中国影响的一个意味深长的标志。"《纽约时报》还在10版发表了蒲安臣的致辞和徐继畬的答辞，可见美国官方和舆论界对这件事的重视。

徐继畬著述《瀛环志略》时，美国已进入向外扩张时期，终于迫使清政府签定了不平等的望厦条约。对华贸易不断增长，1852年美国对华输入棉布量超过英国，1852—1853年沿海城市人民曾多次开展反对殖民主义者掠夺华工的斗争，附近农民纷纷入城支援。1852年3月，400名华工以自由雇佣工人被诱去美国作工，每月言明工银4元，坐美国"罗伯特布朗"号从厦门驶往旧金山。在航途中当他们发觉被骗当契约华工时，即群起反抗，杀死船长、官员等人，将船开回厦门。恩格斯在1857年发表的《波斯与中国》一文中曾赞扬中国人民的这种斗争，"连坐轮船到外国去的苦力都好像事先约定好了，在每个放洋的轮船上起来骚动殴斗，夺取轮船，他们宁愿与船同沉海底或者在船上烧死，也不愿投降……"赠碑还像，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其目的都是为了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影响，改善美国在中国人心中的形象。徐继畬赞扬华盛顿和推崇美国共和政治，对于反对封建专制显然是有很大进步意义的。对源于资产阶级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说的理论基础的美国独立宣言，马克思就曾经指出过它的进步作用："最先产生了伟大的民主共和国思

想的地方宣布了第一个人权宣言”。[9]当然，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资产阶级共和国，正像恩格斯指出的，“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理想化的王国”。[10]

（作者何守先，1930年生，原浙江省宁波日报总编辑、主任编辑，已离休，任宁波老年报主编。）

注释：

① 《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附录三。

② 宁波计划委员会编：《宁波国民经济综述》志稿。

③ 黄宗羲：《原君》，《明夷待访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④ 宁波文史资料第二辑范爱侍：《基督教传入宁波简述》。

⑤⑥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页87，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⑦ 《瀛环志略》卷四。

⑧ 《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徐继畬：《三渐宜防疏》。

⑨ 马克思：《致美国总统阿拉伯拉罕·林肯》。

⑩ 恩格斯：《反杜林论》。

●杨荣春

《瀛环志略》初期冷遇原因析

徐继畬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伟大先驱。他的《瀛环志略》是近代早期介绍域外史地的重要著作,其体系之严密,内容之充实,学风之严谨在当时同类著作中是出类拔萃、雄冠群芳的,对后世的影响也绝不亚于魏源的《海国图志》,而且后者在1852年增补为百卷本时,曾辑录了不少前者的材料。后世人们总是把《瀛环志略》和《海国图志》并称为"谈海外掌故"的"嚆矢"。[①]在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更被视为"通知世界之南针"[②]。19世纪末,江苏人薛莹中在整理其父薛福成遗稿中有关国外地理知识的资料时,毫不犹豫地将书名定为《续瀛环志略初编》而不加任何说明,足见《瀛环志略》当时在学术界的地位,与《皇朝经世文编》的影响已相去不远,"风行海内,几于家置一编矣"。[③]然而,就是这部泽被后世的学术巨著却"甫经付梓,即腾谤议",备受冷落,侧置蒙尘,18年之后,才得以广泛流传于世,明珠生辉。本文试从社会、政治等方面对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作一简单的分析。

一

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打破了中国固步自封、闭关自守的孤立状态,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大清帝国被迫与所谓"夷蛮"的英

国订立城下之盟，开放五口，割地赔款……，朝野为之震惊，“忿恨之余，哭不成声”。[④]但是，民族战争失败的耻辱感很快冲淡了人们对“三千年来一大变局”的冷静思考，两千年儒学浇灌出来的“夷夏大防”观念和情感，小农经济社会所特有的封闭意识，使得清朝从最高统治者到一般平民百姓仍认为，战争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国文物制度的落后，而是由于皇帝的“用人不当”，是奸臣误国。道光帝以“保全沿海生灵”为借口，[⑤]向侵略者屈膝之后，又屡次表白“总因朕无知人之明，自愧之恨”，[⑥]以推卸他决策失误、指挥失策的责任，同时又要求“内外诸臣，亦宜仰体朕怀”，[⑦]用瞒天过海、自欺欺人的手法，掩饰以他为首的清政府那无可救药的虚弱和腐败，企图保全已经残破了的“天朝上国”的面子。

而一般士人也相信“林邓镌职，逆夷洒酒相贺”，[⑧]把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愤恨，转移到与林则徐等意见不合的琦善、伊里布等人身上，认为他们陷害林则徐，对敌妥协是战争失败的真正原因，“夫逆夷之敢于猖獗，沿海兵丁之敢于逃窜，至今日海水群飞，鲸鲵跋浪，为所欲为，莫可谁何者，实由于琦善于逆夷入寇之始，首先示弱，以惰我军心，助彼毒焰”。[⑨]整个社会“倘俯采舆论，谁不切齿于琦善而以为罪魁”。[⑩]把一切归咎于琦善等对敌“示弱”，从而将问题大大地简单化。另一方面，对敌愤愈深，林则徐的英雄形象也就愈高大，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就愈来愈高。以致他在被贬谪戍新疆时，所受的礼遇是一般正常委任的将军、大臣们所难以企及的：都统迎于五百里外，而且早已为他租好住所，雇好僮仆。这种情况在清代被谪官员中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隐藏在这种英雄灵光之后的就是那种“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小农经济社会的皇权思想，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为皇帝开脱罪责，为腐败的专制皇权寻找避难所，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皇帝是永远正确的。当然，林则徐作为民族英雄是当之无愧的，但人们寄托给他的情感不仅仅是尊敬而更多的是对民族战争失败的解释，以及对“天朝”尊严的哀思。当人们

以“奸臣害忠良”的模式解释战败原因之后，专制主义皇权政治反而逃脱了舆论、道德乃至政治的谴责，从而在根本上消除了鸦片战争应该带来的正面影响，使鸦片战争的悲剧色彩更加浓厚，正如近代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所言“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的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11]只有认识了这种“奸臣害忠良”模式背后的深层底蕴，我们才能理解徐继畬时代的社会心态环境以及徐继畬伟大之所在，也就能够理解徐继畬生前和身后遭遇的必然性，当然上述倾向在史学界至今并未绝迹。

同样，鸦片战争之后，在一片谴责奸臣、弘扬“忠义之气”声中，也将已受到挑战的“华夷之辨”观念神圣化和强固化。《广东义民斥告英夷说帖》中痛骂英国侵略者是“不过能言之禽而已”，“身同畜类，性本无知”，[12]中国人不值与之交锋，因为“岂有人与畜斗之理”。[13]广东士子甚至因为曾在三元里劝导罢战的广州知府余保纯来到乡试考场，而“文童哗然，皆云：我辈读圣贤书，皆知节义廉耻，不考余汉奸试”。[14]这样，一方面使“华夷之辨”观念强化成维系传统爱国主义的心理防线，一方面又严重地束缚了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步伐。所以，这一时期，虽然已经有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如林、魏等）继承嘉道以来经世致用思想，开始把目光投向广阔的外部世界，迈出了了不起的一步。但是绝大部分人仍在“夷性犬羊”，“就我范围”的烟障下，陶醉于所谓“万年和约”，并从“苗蛮逆命，何损尧舜之朝”的古训中找到自我安慰的理由之后，倾斜了的“天朝上国”心理便得到平衡，仍不愿向外探求世界的真实面目，审度历史变动的恢恢大势，“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15]对日益激烈的中外冲突则有意闭目塞听，讳莫如深，“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谈，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16]“天朝”的人们关于“四夷宾服”、“万邦来朝”、“世界中心”之类的迷幻仍好梦未残。

在国人犹在酣睡，专制皇权仍在自欺欺人的时候，自幼饱读诗书，科场一路春风得意的徐继畬，于1842年，即《南京条约》签订的那一年，由一个汀漳龙道道员青云直上，一年内三次升迁，成为福建布政使，跻身清高层官员之列，奉命专办通商事务。四年后又升任福建巡抚，成为清朝封疆一方的15个巡抚之一。早在1842年秋进京陛见时候，皇帝还要他将海外之事撰书进呈。他也不负重望，两年有《瀛环考略》之初稿，六年后《瀛环志略》就初版付梓。宦途和学术可谓齐头并进，蒸蒸日上。但是，在民族受创后愁云惨雾背景下的加官晋爵，很容易招致非议和嫉恨。尤其是孜孜探求"夷"人情事，与当时耻言夷务的社会风气更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当他把《瀛环志略》的前三卷赠给同乡好友，著名地理学家张穆时，张穆一方面承认其书"考据之精，文词之美，允为海国破荒之作"；[17]一方面又不无担心地告诫他"春秋之例，最严内外之词，执事以控驭华夷大臣而谈海外奇闻，不妨以彼国信史姑作共和存疑之论，进退抑扬之际尤宜慎权语助……至周孔之教，不宣重译，正如心之精神不滑于脏腑，倘有邪气冲心，则扁卢为之色变，前明徐、李止缘未洞此义，遂尔负谤至今"。[18]张穆的思想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被"天朝"观念蒙蔽了视眼的中国人把普通的世界史地知识视为"海外奇闻"，把介绍外界情况看作是引"邪气冲心"，害怕知识流传会威胁到己腐朽了的官方哲学——周孔之教的神圣地位。因为以箝制思想为目的的"周孔之教"，是封建专制政体统给人民的工具，也是封建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专制主义封建集权政体如同"小心保存在紧密封闭的棺材内的木乃伊一样"，[19]是经不起任何振荡、容不得半点新鲜空气的。作为工具的官方哲学——周孔之教更是腐朽而反动的，但是"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动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20]会本能地维护它，排拒外来文化。在当时那种文化环境中，连以讨论西藏地区经济和军事为主要内容的姚莹的《康輶纪行》也有人认为

"以司马氏之奇伟，第就域内人事伦理求之，非驰心海外及未来千百年后"，指责为"矜奇眩异，骇人耳目者"。[21]当时，凡是探求域外之事的书籍乃至思想都会被视作异端邪说，有碍"世道人心"而加以排斥。徐继畬著《瀛环志略》时又"未洞此义"，其受到冷落简直是在劫难逃了。

二

任何事物都并非如此简单，在单纯的社会背景之后，隐含着更深刻的封建政治的影响与束缚。《瀛环志略》高度的学术性固然可以使它彪炳史册，但政治性的相对韬晦则对它问世之初的命运影响非浅。早在徐继畬做翰林时期就崇尚经世之学，注重学以致用，"虽读书中秘，而于部曹事例，郡国利病，靡不穷研洞晓，思有所建白"。[22]尤其对具有一定经世作用的西北舆地之学更是早有偏好。很早就有《尧都辨》、《晋国初封考》等著作。鸦片战争时期，他亲自参加了反侵略的战争。万顷碧波上来去自由的英国军舰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之铁炮不如彼铜炮之轻灵，我岸上之炮不如彼船中之炮之稠密"。[23]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战略要求出发，他便结合自己的爱好，十分注意外域知识的了解和资料的搜集，对外知识相对丰富。而促使他著书的直接原因则是，1842 年秋他进京陛见时，侃侃而谈引起道光帝的兴趣，从而有呈书之命。从此，他不得不发奋努力与外人广泛接触，刻苦钻研，"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五阅寒暑，公事之余，唯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24]三改其名，稿凡数十易，而有《瀛环志略》。这种备皇帝广见闻的特殊要求和徐继畬身在官府、封疆一方的地位相表里，使作者必须处处谨慎，字字负责。只能以详尽确实的内容曲折地透露一些"古今一大变局"的信息，达到"以上答主知而下扶时局"[25]的目的。而未能也不能像身为幕僚的魏源那样直接了当地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之

类的口号。其思想脉络也只能“隐愤抑郁”，用比较韬晦的方式加以表述，“故言之不觉深切著明也”。[26]这种温和的、寓言式的学术著作自然不能像“名为地志，其实武备大典”[27]的《海国图志》那样激动人心，产生迅速而强烈的社会反响。在局势日益危殆，“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奇耻大辱”[28]而痛苦求索时，愤激的情绪，昂扬的意气，简洁的答案远比扑朔迷离的寓言给予人们的印象深刻得多。而那些醉生梦死，苟且偷生，懒于思考者更不会去揣度作者文后之深刻底蕴。如果说《海国图志》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的呐喊如一声炸雷而能使睡梦中的一部分大清臣民们抬头一瞥的话，志略则宛如一首抒情曲，较难惊开他们的睡眼，尽管后者要深沉得多。姚莹在看了《海国图志》后，认为“余数十年之所欲言，所欲究者，得默深书，可以释然无憾”。[29]而徐继畬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进一步以严谨学风，订正魏书的乖误，补充新内容，使自己著作的缜密性、学术性大大进步。毫无疑问徐继畬和魏源、姚莹的思想脉络是相仿佛的，他著作的目的与姚莹一样是“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图制夷之策，是诚喋血饮恨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重海边之防，免胥沦于鬼域，岂得已哉？”[30]但他没有也不能明确地表述自己的政治目的，文风的晦涩成了干扰志略社会影响的重要原因。当然这与道光以来文化领域中，传统的汉学学风的衰落和今文经学的勃兴也有一定的关系。考据、训诂式的汉学传统对徐继畬的影响是明显的。无论志略的学风还是退居时《两汉志沿边十郡考略》、《两汉幽并凉三州今地考略》等文章都是鲜明的例证（这里不作深入讨论）。

三

在封建专制时代，学术著作的命运往往是与一个人的社会角色和政治生命紧密相关的。对历史地理学早有研究的徐继畬之所

以能撰写出志略这样惊世骇俗的破荒之作，得益于他有机会与西方人广泛接触。志略能在1848年初版刻成，也与他已是福建巡抚的显赫地位以及闽浙总督刘韵珂等人大力推崇不无关系。但书没有来得及大量发行，徐氏很快于1851年被降职调任，1852年撤职还家。他的著作也不能不受作者命运的影响而侧置蒙尘。直至1865年徐氏被再次起用召回北京，以三品京堂在总理衙门任职后，《瀛环志略》才于1866年由清政府的权力机构——总理衙门以官方名义重印，得以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从而对洋务派官僚郭嵩焘、早期维新派王韬以及维新志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生影响，在近代中国产生了一些社会效应。但在此之前，与它同类的《海国图志》曾三次刊刻，咸丰年间，兵部左侍郎王茂荫曾奏请将《海国图志》“重为刊印，使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学，以知夷难御，而非竟无法之可御”。[31]早就得到官方承认了。在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相同，思想脉络相仿佛的同类著作，在同一时期的命运差异，不能不给我们另外一些启示，即作者的个人因素，徐继畬的政治生命以及在清代官场中人际关系的倾向性等因素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清政府内部，从道光帝开始主张禁烟起，以对鸦片和战争的态度为分水岭，以满汉官僚间旧有矛盾为脉络，或明或暗一直存在着两个集团的矛盾和冲突。一方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为首，在各个不同时期以琦善、耆英等为主要成员；另一方是以林则徐为首，在朝辅以军机大臣王鼎等人。徐继畬在人际关系方面的种种迹象表明，与前者有着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的密切关系。他与穆彰阿是师生关系，他做翰林院庶吉士时，穆彰阿是掌院学士。徐氏在代鄂恒所作《诰封一品夫人穆太夫人八十寿序》中，有“夫子(穆)不以为不才而进之，受知为最深”[32]的话，也间接反映出他与穆的关系。此外，徐氏与耆英的得力助手黄恩彤是“同年”好友，耆英认为徐继畬“历办夷务，素为该夷所信服”，[33]而且能与他协调一致，“情意相

通，威信能服各夷”。[34]耆英的推荐曾对1843年徐继畬升任福建布政使以及后来升任福建巡抚都起了重要作用。我们虽不能因此就判定徐继畬是“穆党”，但在穆彰阿专权时代其“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35]徐继畬被他们一厢情愿地视为同类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在道光朝徐继畬在福州的所作所为确实一直与广东的耆英是保持一致的。19世纪40年代，清政府外交的主要主持者耆英在广州“进城”问题引起的“民夷冲突”中，所执行的基本政策是“顺夷情，顾国体”。刘韵珂、徐继畬在福州的几起事件中的做法几乎与耆英在广东的做法雷同。据美国人马士记载：1845年10月14日，“英国领事馆的翻译官巴夏礼在城里的满洲警卫区行走的时候，被军事殖民的人们（福州人民）投掷泥土和石块，他们并破口大骂。官方对这件事很快就表示了歉意。并且有六人被处罚，其中三个年轻的被杖，三个成年的被枷号示众”。[36]1848年8月30日，“英国领事馆助理员巴里希，在福州城里骑马时被投石，据说他以前也遇到过这种事情，总督很客气地慰问了巴里希，并发布告示晓喻人民要善待外人”。[37]这显然与耆英的做法毫无二致。尽管耆英已于1848年初离开了广州，但在1850年咸丰帝上台后对外态度转向强硬的时候，采取起用林则徐，罢黜穆彰阿、贬降耆英等一系列政治调整活动不久，徐继畬也被劾贬官。这绝不是偶然的，不管事实如何，在宦海横流中，徐继畬的群体归属在别人眼中并不一定要与事实相符，派系斗争中个人的归属有时并不是可以由主体自身来选择的。说徐继畬被别人视为“穆派”也许并不过分。而且，那时在许多情况下，正如一外国学者所言“人们的世俗的思与行之间总是脱节的，在思辩中的与例行奏疏中的同一位哲学家也往往言行不一”。[38]历史总是纷繁复杂而曲折的。

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摆脱当事人的恩恩怨怨和时代局限，既不能以并不明朗的人际关系问题就把徐继畬与穆彰阿、耆英一样看待，也不能对他们简单地评说。而在当时，在主持通商事务

的大臣们也"遭到人们对虚报军情，欺上罔下的那些将军们一样的痛恨"[38]的岁月里，徐继畬在福州的所作所为(姑且不论其是非得失)自然会引起激于义愤的民众和士绅的反对，并把他视为"官方清道以迎洋鬼"的代表，他的10卷本《瀛环志略》尽管有"浩若吞胸，听邹衍之谈天，小儒咋舌，览木华之赋海，才士倾心"[39]的水平，在那时却得不到世人的首肯，更无法与魏源的《海国图志》遭遇相比，而是"见者哗然，谓其张大外夷，横被訾议，因此落职"，[40]竟成为别人攻击他的口实。在封建社会里，这几乎是顺理成章的。徐继畬人际关系的倾向性，加上"神光寺事件"中他不同意林则徐关于调兵、募勇、演炮等组织民众坚决驱逐违约英人的建议，而与林则徐发生矛盾等事实，人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把他与"穆派"联系起来，简单化地敬林则徐而轻视徐继畬。"穆派"在咸丰一朝受到压制，在整个近代乃至现代史研究中被贬斥的事实，无异对《瀛环志略》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管志略负谤于初，还是被冷落于后都与作者的政治生涯息息相关，实际上唱了一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历史苦剧。

总之，当学术研究还脱离不了政治的干扰，当中国社会的内部机制还没有产生对外交流的内在要求和内在动力，中国人还在夜郎自大地满足于自己的文物传统时，惊世骇俗的《瀛环志略》被诽谤、被冷落，只是时代特征的体现，它的悲剧也只是民族悲剧的缩影。

(作者杨荣春，1965生，山西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附记：本文于徐继畬讨论会后完成。——编者

注释：

①㉕㉖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九，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 转引自[台]方闻：《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第248页。

③㉓㉜ 《松龛全集·文集》卷三、卷一。

④⑧㉝㉞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8、15、69。

⑤⑥⑦ 《清实录·宣宗实录》道光二十六年六月。

⑨⑩ 陈庆镛:《籀金堂类稿》卷一。

⑪ 转引自《陈旭麓文存》页271,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⑫⑬ 《史料旬刊》第38期402—404页。

⑭⑮⑯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三册第15页;第五册第531页。

⑰⑱ 张穆:《月斋文集》卷三。

⑲⑳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页;第一卷第629页。

㉑㉚ 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八。

㉒ 《松龛全集·叙传》,杨笃《太仆寺卿前福建巡抚徐公家传》。

㉔ 徐继畬:《瀛环志略·自序》。

㉗ 盐谷世弘:《翻刻海国图志序》,《宕阴存稿》卷4。

㉘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㉙ 姚莹:《康辅纪行》卷12。

㉛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28。

㉟ 赵尔巽:《清史稿·穆彰阿传》。

㊱㊲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374页,第427页。三联书店1957年11月版。

㊳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册第19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2月版。

㊴ 徐继畬:《瀛环志略·彭序》。

㊵ 《张文襄幕府纪闻》卷下。

●任复兴

同文馆事件：中国近代化的严重挫折

——兼谈徐继畬在其中的角色

1867年同文馆事件的败局，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影响十分深远。海外学者认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前曾“作出了一个实在大胆的计划，此计划的激进性质，通常为历史学家所忽略”，是一次受到挫折的变法。[①]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拓荒者徐继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更鲜为人知。本文拟就现有资料对这些问题加以探讨。

危亡前夜的风险决策

“庚申之衅，创巨痛深”。在签订城下之盟中备受屈辱的奕䜣，与慈禧太后联合发动政变参与掌权后，大力推进自强运动。其重大决策之一，就是重用汉大臣。1865年秋，咸丰初年被罢黜的徐继畬重新回到北京，不久就被任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这在国内外引起关注。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各大臣更佩服徐的“器识深沈，谋猷卓远”，总署奏准重印《瀛环志略》。书中变局、自强等等命题，为自强运动提供了指南。与他同在总署供职的董恂、沈桂芬后来为

他书写墓志铭时记述道："各国使臣闻公至，皆欢忭，持酒榼诣署谒公。其为异国所敬服，与辽人中国相司马之言无异，而公所著《瀛环志略》，中外奉为指南矣"。董、沈这里用了宋代的典故：垂帘听政的高太皇太后召家居十五年的司马光入主国政后，"辽夏使至，必问光起居，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衅"。[2]可见徐氏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徐氏与外国一些使节确实也有特殊关系。例如英国新任驻华公使阿礼国，早在二十年前驻福州领事任上就对徐氏研究世界地理提供过帮助。当年徐氏被贬职时，阿礼国惊呼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退步。美国署理公使卫廉士，早年曾在《中国丛报》撰文盛赞《瀛环志略》，并希望有一天徐氏能到皇帝身边参与最高决策。多年之后他们在京见到徐氏担任重任，自然十分欢欣。美国总统约翰逊后来向徐氏赠送华盛顿像，也是对他的最高礼敬。

从清朝统治者的角度看，当时中外关系处于相对平静时期，徐继畬的复出对联络中外情志、缓和中外矛盾不无裨益。国内太平天国起义已被平息，捻军虽仍在活动，但已构不成重大威胁。可是总署诸臣居安思危，深恐数年、数十年后国家再遭大难。在实力外交时代，如果国力虚弱，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徐氏复薛焕书谓："至各国夷情，尚无大变，而小波折时时有之。幸同事诸君子，熟悉事务，知其肯綮，就事了事，暂可相安，欲求一劳永逸之法，则实茫无把握。"[3]总署后来的奏折谓："自定约以来，八载于兹，中外交涉事务，万分棘手，臣等公同竭力维持，近日大致虽称驯顺，第苟且敷衍目前则可，以为即此可以防范数年、数十年之后则不可。是以臣等筹思长久之策，与各疆臣通盘熟算，如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制造机器各法，教练洋枪队伍，派赴周游各国访其风土人情，并于京畿一带设立六军，藉资拱卫：凡此苦心孤诣，无非欲图自强。"[4]那么，什么是最重要的"长久之策"和"一劳永逸之法"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先应了解总署诸臣当时最痛心的致败原因、最担

忧的焦点是什么。看来他们已认定，这个致败原因和焦点就是士大夫不悉外情，缺乏西学知识和责任感。奕䜣等在同一奏折中说："溯自洋务之兴，迄今二三十年矣。始由中外臣僚未得窍要，议和议战，大率空言无补，以致酿成庚申之变。彼时兵临城下，烽焰烛天，京师危在旦夕，学士大夫非袖手旁观，即纷纷逃避。"皇家以高官厚禄培植起来的社会支柱，在关键时刻见识如此，表现如此，乃最大的致败原因。而在战后，士大夫故态复萌，依然唱着华夷内外的高调，抱着儒家的经典，沿着千年一贯的科举仕进阶梯向上爬。这无异重蹈覆辙。要走出覆辙，应付不久将来的不测之变，必须对教育和官制动大手术，尽快培养任用一批既有西学知识，又有责任感的年轻有为高级官员。总署诸臣的奏折对此虽不敢明言，但从其所作所为已充分表明他们已强烈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年轻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有阅历的五品以下京内外正途出身官员身上，企图在短短三四年时间内经过同文馆，从中培养一批学兼中西的通才和三四品以上的高级官员。总署深知，"非常之举，谤议易兴，无人执咎"。上有权势欲极强的慈禧，下有守旧诸大臣和不识时务的士大夫，这个重大决策很可能告吹。但迫于时势，不得不冒这个风险，并企图将可能发生的不利事件尽量排除。从现有材料看，他们似乎自同治四年秋开始，就小心翼翼地逐步把这一政策推到前台。

投石探路，逐步出台

小试之一，奖掖同文馆外文生。咸丰十年签订北京条约时，奕䜣受外国翻译欺蒙，致使中法条约中搀入许多关于传教士特权的内容。因此在他力主之下依照俄罗斯文馆的旧例，成立了同文馆，选 30 名十三四岁以下八旗子弟，随外国教习分别学习英、法、俄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在北京东堂子胡同原赛尚阿的府第内(现

门牌49号），正院为衙门大堂，东院即为同文馆。到同治四年秋，三馆学生三年学习期限已满。大臣们眼见中国近代第一批翻译人才成长起来，由衷喜悦。"于十月十一日至二十一日按馆分日由臣等在大堂公同面试……因洋文非臣等所习，特饬总税务司赫德与各馆外国教习会同阅看，分别名次高下……其翻译各文虽未能通体贯串，亦尚有相符之处，外国语言亦多吻合"。并奏请照章办理，分别优劣，对其中约六人授予八九品官衔，其余记优、记过再留馆学习，劣者退回本旗。同时重新拟定的六条章程，规定学生每月给膏火银三两，每逢岁考、季考，有一半学生可得到一两五至四两的奖赏。得八九品官者不再领膏火银，每年另领俸银五十两、四十两五钱。这些钱都从本署三成船钞中支出。这一小试探，得到最高当权者慈禧的批准。对这些贫寒的八旗子弟来说，待遇颇为优厚，提供了一条升官的终南捷径，也为同文馆招考正途人员起到立木为信的宣传作用。

小试之二，派同文馆生出洋。在封建专制时代，"国体"问题是最大的禁忌，是万万不可触犯的。有些事只可意会，不能言传。比如南京、北京条约均为城下之盟，这是《春秋》所耻的，必须写成"岛夷受抚"、"就款"。有些事必须绕着弯儿办。各国使节入京后，纷纷希望中国重臣游历西土，以联络中外之情志。六十三岁的副护军参领衔斌椿慨然愿往，但这是天朝体制所不容的。于是，在同治五年初总税务司赫德回国时，总署奏请同文馆学生风仪、德明、彦惠随其前往。为防止他们少不更事贻笑外邦，由斌椿带领前往，这样就"不稍涉张皇，似乎流弊尚少"。为壮观瞻，赏给斌椿三品衔，同文馆生赏六七品顶戴。也得到慈禧批准。

两次试探均未激起大的波澜，于是，从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起，总署正式分三步提出开办天文算学馆的建议。

第一步，招考举人和五项贡生。总署当天的奏折说："查臣衙门于同治元年七月间设立同文馆，延请英、法、俄三国教师，分馆教

习。各馆学生系由八旗咨取年在十四岁内外。迄今几及五载。各馆学生于洋文洋话尚能领略；惟年幼学浅，于汉文文义尚[illegible]贯串，现仍督令该学生等将洋文翻译汉文，以冀精进。只以功力分用，速效难期。若再令讲求天文、算学等事，转恐博而不专。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习学皮毛，仍无俾（裨）于实用。臣等公同商酌，现拟添设一馆，招取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汉文业已通顺，年在二十以外者……一体与考，由臣等录取后，即延聘西人在馆教习……举凡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这又得到慈禧的批准。

第二步，招考翰林和进士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总署于十二月二十三日的奏折中，分析了此举的必要性，对可能出现的种种非议进行了驳斥，最后，才将真正希望招考的人选范围提出。奏折充满忧患意识，是那个时代少有的佳作。

……臣等前因制造机器、火器，必须讲求天文、算学，议于同文馆内添设一馆……奏请施行等因，于十一月初五日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

臣等伏查此次招考天文、算学之议，并非矜奇好异，震于西人术数之学也。盖以西人制器之法，无不由度数而生。今中国议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苟不藉西士为先导，俾讲明机巧之原，制作之本，窃恐师心自用，徒费钱粮，仍无裨于实际。是以臣等衡量再三，而有此奏。

论者不察，必有以臣等此举为不急之务者，必有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者，甚且有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此皆不识时务之论也。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疆臣如左宗棠、李鸿章等，皆能深明其理，坚持其说，时于奏牍中详陈之。上年李

鸿章在上海设立机器局，由京营拣派兵弁前往学习；近日左宗棠亦请在闽设立艺局，选少年颖悟子弟，延聘洋人教以语言文字、算法、画法，以为将来制造轮船、机器之本。由此以观，是西学之不可不急为肄习也，固非臣等数人之私见矣。

或谓雇赁轮船，购买洋枪，各口均曾办过，既便且省，何必为此劳绩？不知中国所当学者固不止轮船、枪炮一事。即以轮船、枪炮而论，雇买以应其用，计虽便而法终在人；讲求以得其源，法既明而用将在我。盖一则权宜之策，一则久远之谋，孰得孰失，不待辨而明矣。

至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亦臆说也。查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彼西土目为东来法。特其人性情缜密，善于运思，遂能推陈出新，擅名海外耳。其实，法固中国之法也。天文、算学如此，其余亦无不如此。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中国傥能驾而上之，则在我既已能洞悉根源，遇事不必外求，其利益正非浅鲜。且西人之术，我圣祖仁皇帝深韪之矣。当时列在台官，垂为时宪，兼容并包，智周无外，本朝掌故亦不宜数典而忘。况六艺之中，数居其一。古者农夫、戍卒，皆识天文，后世设为历禁，知者始鲜。我朝康熙年间，特除私习天文之禁，由是人文蔚起，天学盛行。治经之儒，皆兼治数，各家著述，考证俱精。语曰，“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士子出户，举目见天，顾不解列宿为何物，亦足羞也。即今日不设此馆，犹当肄业及之，况乎悬的以招哉？

若夫以师法西人为耻者，其说尤谬。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查西洋各国，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新。东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国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造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亦必有成。西洋各国，雄长海邦，各不相下者，无论矣。若夫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转因薪

至其人，将来或可突过其人，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

或谓制造乃工匠之事，儒者不屑为之，臣等尤有说焉。查《周礼》考工一记，所载皆梓匠轮舆之事。数千百年，黉序奉为经术，其故何也？盖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理明而用宏焉。今日之学，学其理也，乃儒者格物致知之事，并非强学士大夫以亲执艺事也，又何疑乎？

总之，学期适用，事贵因时。外人之疑议虽多，当局之权衡宜定。臣等于此筹之熟矣。惟是事属创始，立法宜详。大抵欲严课程，必须优给廪饩；欲期鼓舞，必当量予升途。谨公同拟章程六条，缮呈御览，恭候钦定。

再，查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等官，学问素优，差使较简，若令学习此项天文、算学，程功必易。又进士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与举人、五项贡生事同一律，应请一并推广招考，以资博采。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训示遵行。

此折还附有酌拟同文馆学习天文算学章程六条，规定专取正途人员，每届三年举行大考，学习期间厚给薪水，优加奖叙以资鼓励。三年以后试居高等，“均准各按升阶，格外优保班次，以示鼓舞而广招徕”。言外之义，这些人有希望很快就成为三四品的高级官员。这也得到慈禧的批准。

第三步，让徐继畬担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一日总署奏称：

再，查臣衙门现议设学习天文算学馆，咨取进士、举人、恩、拔、副、岁、优贡生，并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及由前项出身之京外各官，考试录取留学，业经条议章程，奏奉谕旨准办在案。

……现在学习天文算学之员，均系已成之材，汉文无不通晓，汉教习自可不设，但亦必须有群情宗仰之一人在彼指引开

导，庶学者有所禀承，否则该馆只有洋人讲贯，而中国无师表之人，恐来学者竟疑专以洋人为师，俾修弟子之礼，未免因此裹足。臣奕䜣与臣文祥……公同商酌，惟有臣徐继畬老成望重，品学兼优，足为士林矜式，拟请旨饬派徐继畬作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以专稽查而资表率，谨附片具奏请旨。

以前三馆的汉教习均为月俸八两的八品以下官员，而天文算学馆设立后即派三品京堂、二品顶戴的老臣徐氏充任总管大臣，可见总署对该馆的重视。正月二十一日内阁奉上谕：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派员充总管新设同文馆事务大臣等语。太仆寺卿徐继畬，老成望重，足为士林矜式，著仍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充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惟寺务恐难兼顾，著开太仆寺卿缺，以专责成，而资表率。钦此。

经过这样逐步的完善之后，一个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终于出台。奕䜣等奏折中把这个计划概括为“采西学，制洋器”，其实还有“改科举，变官制”的蕴意。《剑桥中国晚清史》评论说：“我们作以下设想并不过于牵强：如果这个建议达到预想的效果，那么一个清代的教育和文官的重大改革也就指日可待了。”

徐继畬对朝廷的重用感激涕零，胜任愉快。五台徐继畬纪念馆藏有他当时给十弟节之的家书清末抄件，内云：

兄年已七十三岁，精神饮食尚好，步履亦较前加健……本年京察，三品以下京堂例应引见。恭邸虑其起跪不便，或有蹉跌，奏明两宫皇太后，将太仆寺卿本缺开了，作为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兼总管新设同文馆事务大臣。天恩高厚，不禁感泣。谕旨有‘老成望重，足为士林矜式’之语，读之愧悚。同文馆即在总理衙门内，来学者编修、检讨、庶吉士，暨恩、拔、副、岁、优各贡生，专学天文地理算法，兼用西洋人引导，二月内即开馆也。

权力之争阴影下的政见之争

事实表明，裂痕已深的母后垂帘、亲王辅政的权力结构，已经经不起重大变革的震动。早在同治四年二月的蔡寿祺奏摺事件中，慈禧就给奕䜣以沉重打击，虽经王公大臣九卿等公奏，恢复其军机大臣职务，但不复议政。奕䜣"希冀垂帘之名，而实权归己"的幻想成为泡影，两人在对等地位上互相监视的历史已告结束，视权如命的慈禧成了最高主宰，奕䜣已降到管家的可怜地位。慈禧发现绝大多数王公大臣拥护奕䜣后，分化瓦解他们，以进一步削弱奕䜣势力，便成了下一目标。而且此事沸沸扬扬，中外咸知。奕䜣虽愈形谨饬，仍难免落入别人圈套。天文算学馆的新政出台后，首先表示不满的是京城士大夫阶层。

太平军起义期间，为了缓和财政危机，大量卖官鬻爵，士大夫阶层流品混杂。起义被镇压后，145 万有功名和官衔的人中，贡生以上的正途出身上层绅士 20.4 万人，新近捐纳的却有 53 万人。1860 年以后，四到七品官中，捐纳而得者已多于正途出身者。愈来愈多的正途人员无缺可补。这种矛盾一触即发。天文算学馆的招生办法虽说为少数上层正途人员提供了新的机会，却也表明更多的正途人员的进一步贬值。其中有这样的潜台词：面对古今一大变局，士大夫苦苦研习的传统知识已不够用了，只有进而研习西学，取法西方文明成果，才可能成为有助于国家自强的有用之才。这对广大正途人员是雪上加霜。早已积聚的不满情绪立即宣泄到奕䜣等人头上。这一新政出台适逢春节前后，自然成为士大夫拜亲访友时的热门话题。翁同龢同治六年二月十三日日记云："同文馆之设，谣言甚多。有对联云：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⑤]全联谐音指斥奕䜣为"鬼子六"，把同文馆诬为另立中央的"小朝廷"机构，这和谋反的罪名大同小异。率

先公开发难的是御史张盛藻。正月二十九日张氏上奏，对招考正途人员，并用厚给廪饩、优与奖叙深表不满。他不顾庚申之变士大夫的怯懦表现而侈谈气节："若以自强而论……臣民之强则惟气节一端耳……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御寇而寇可灭……若令正途科甲人员习为机巧之事，又藉升途、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的确，同文馆的宗旨是培养学兼中西的高级官员，而不是培养工程师或技术工人，他抓住总署奏折这一不敢明言之处大作文章："臣以为设立专馆，只宜责成钦天监衙门考取年少颖悟之天文生、算学生，送馆学习……至轮船、洋枪，则宜工部遴选精巧工匠或军营武弁之有心计者……不必用科甲正途官员肄习其事"。大约此时慈禧认为张氏人微言轻，不足以用来打击奕䜣，当日就予以驳斥："朝廷设立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原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正途人员用心较精，则学习自易，亦于读书学道无所偏废。是以派令徐继畬总管其事，以专责成，不过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何至有碍于人心士习耶？该御史请饬廷臣妥议之处，著毋庸议。钦此！"

可是半个月后，大学士倭仁亲自出马，大加反对，形势立刻发生重大变化。

倭仁，蒙古正红旗人，道光九年进士，历任编修、侍讲、大理寺卿等职，咸丰朝被目为好谈性命道德的迂儒，不被重用。同治元年擢工部尚书，充同治帝师，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协办大学士。蔡寿祺事件中，坚决站在慈禧一边，主张罢斥奕䜣。后见多数人随肃亲王为奕䜣陈情，只好削改前稿。结果，在肃亲王稿上署名的有七十多人，在倭仁稿上列名的只有几名军机大臣。倭仁对奕䜣等与洋人往来久已不满，此次招考翰林似乎又侵犯了他的权力范围，将与洋人来往很多的徐继畬作为"士林矜式"，更使他这位理学名臣厌恶。于是他一再上奏竭力反对。

倭仁二月十五日的奏折，从夷夏大防的所谓"国体"立论，请立

罢前议。说:“以奴才所见,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并武断地说,“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他危言耸听:“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慈禧似乎立即意识到,这位忠实奴才的反对意见可以再次用来打击政敌奕䜣,有意无意地采取火上加油的办法。翁同龢当日日记写道:“今日倭相有封事,力言同文馆不宜设。巳初与倭、徐两公同召见于东暖阁。始询同文馆事,倭相对未能悉畅”。显然,慈禧已看出倭仁奏折中的漏洞,并将他问得理屈词穷。如果将其奏折留中不发,事件也就平息了。奇怪的是,次日慈禧向总署批发了此折,并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无一句驳斥的话,只批“该衙门知道。钦此!”

京城守旧士大夫更加有恃无恐。翁同龢二十四日记云:“京语(师)口语藉藉。或粘纸于前门,以俚语笑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云云。)或作对句: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又曰,孔门弟子,鬼谷先生。”

这样,同文馆能否开办天文算学馆重新成为问题。奕䜣等于三月初二上奏详陈苦衷,回顾了办洋务以来形成这一决策的过程,并列举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躬亲阅历洋务者的共同见解和甘苦,再次指出中国面临的严峻局势,并指出倭仁的游谈侈论已经给招生造成的危害,最后斩钉截铁地说:“在臣等竭虑殚思,但期可以收效,虽冒天下之不韪,亦所不辞。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所有现议开办同文馆事宜,是否可行,伏乞圣明独断,训示遵行。”并抄录曾国藩等折件信函,请饬倭仁阅看。

正如后来李鸿章所言，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倭仁从未膺方面之寄，充其量与少年新进、放言高论的言官的角色相当。总署抓住倭仁的这个短处，立刻使其陷于窘境。三月初八日倭仁的奏折词气已软了一半。但又反唇相讥，说应考的正途人员以至办学者存心不正，有汉奸之嫌。他说，“延聘夷人教习正途一事，上亏国体，下失人心”，“今以诵习诗书者而奉夷为师，其志行已可概见，无论所学必不能精，即使能精，又安望其存心正大，尽力报国乎？恐不为夷人用者鲜矣”。

总署诸臣希图采西学以自强，不意如此艰难掣肘，他们由此隐隐看出大清祚运将绝，他们和各封疆大吏的处境，竟与当年扶持阿斗的诸葛亮颇为相似。三月十九日上奏：“夷患之兴，匪伊朝夕。当年内外臣工，不求御制实际，徒以空言塞责，遂酿庚申之变。今值腹地未靖，兵财交困，纵竭力讲求，思以自强，幸而收效，固在数十年以后。若仍前苟安，不思补苴，其大患亦或在数年、数十年以后。但望臣等言之不中，而国势永庆奠安；断不愿言之幸中，而朝廷毫无备豫……臣等只就事所当办，力所能办者，尽心以办，至成败利钝，汉臣如诸葛亮尚难逆睹，何况臣等？”诸臣对以道学鸣高、将国家引向败亡之路的倭仁深恶痛绝，决心把这个老儿也拉入洋务“污水”之中。同折中提出，既然倭仁谓习天文算学者有人，应请另设一馆，与同文馆互相砥砺。当日即允准在案。二十一日，又有旨，倭仁著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这可给道学先生出了一道大大的难题。如遵旨，岂不是佛头著粪？如推辞，也无充足理由。当时在弘德殿充帝师的还有李鸿藻（号兰荪）、翁同龢（号叔平）、徐桐（字荫轩）三人，多为“崇宋儒，说守旧，恶西学如仇”的一流人物。翁氏日记记载，此后数日他们互相串联“商略文字”，议论对策。倭仁只得承认以前奏折是信口开河：“奴才前奏谓算法为六艺之一，如欲讲求，中国岂无精是术者，盖以理度之……奴才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他力辞

总署职务，不准。二十五日，他只得含泪受命。为避免到总署值班而受到污染，他忽然得了"上马几坠，类痰厥不语"的重病，龟缩不出。

朝野因此众论纷争，日甚一日，总署成为众矢之的。三月二十七日通政使于凌辰又从党祸立论反对同文馆，说："夫天文算学本属技艺之末，其果能得力与否尚不可知，而先令臣子别户分门，开国家未有之风气，所关实非浅鲜。臣惟伏愿我皇上以至仁至勇之圣心，密筹消弭，防患未形，庶永无汉、唐、宋、明党人之祸"。成都将军崇实对设馆招考正途人员也持否定意见，认为各省尤其沿海不乏精于机器之学者，提出了一种折中的办法，建议从各省精选若干破格超擢，奖以禄位。"既无须限定正途，亦无庸尽师西士，如此办理，庶合时宜而息物论。"

较之蔡寿祺事件绝大多数王大臣同情奕䜣，同文馆事件中公开为奕䜣等讲公道话的几乎没有，慈禧对这种局面可能是惬意的。不过她在这时还离不开奕䜣这个"管家"而完全依靠倭仁一伙见识迂拘的人，所以不能使矛盾失去控制和平衡，也只能见好就收。候补内阁侍读学士锺佩贤因亢旱日久，奏请直言极谏以资修省，内有"倭仁谏止同文馆，则令别设一馆以难之"等语，奉旨："著在廷诸臣于时政得失尽心献替，毋循故常，毋避忌讳"。这个候补官一下出了名，使得另一个候补官也心痒难忍。他就是"遇缺即选直隶州知州"杨廷熙。这个从四川远道来京候补而不得的穷教谕，早已不满于"遇缺存遇缺之名，即用无即用之实"，五月十七日读有关邸抄后，猜测慈禧似乎想打倒奕䜣，决心趁机碰碰运气，赶写了洋洋五千言的奏折，认为设同文馆其事、其理、其心有十不可解，空前激烈地攻击总署原奏，甚至说"偏执己见，专擅挟持"。都察院左都御史灵桂等却认为"其中实无违悖字样"，于五月二十九日封呈御览。杨氏一时名声大噪，"中外竞传诵其文"。

奕䜣、宝鋆等当天看到此奏，大为惊恐，慌忙上奏"请将杨廷熙

所奏十条派大臣核议，并请将该王大臣及现任各大臣均暂开总理衙门差使听候查办”。倭仁躺倒不干，“管家”又要撂挑子，慈禧左右为难，权衡利害之后当日即颁上谕：“杨廷熙以知州微员，痛诋在京王大臣，是何居心！……推其原故，总由倭仁自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后，种种推诿所致。杨廷熙此折，如系倭仁授意，殊失大臣之体，其心故不可问；即未与闻，而党援门户之风，从此而开，于世道人心大有关系。该大学士与国家休戚相关，不应坚执己见，著于假满后，即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任……至杨廷熙草莽无知，当此求言之际，朝廷宽大，姑不深责……当此时事多艰，该王大臣等不避嫌怨，力任其难，岂可顾恤浮言，稍涉推诿，所请著毋庸议。钦此。”对杨廷熙不给任何处分，对倭仁亦是温语相勉，未予深究。奕䜣等忍辱负重，正善始善终地进行招考；倭仁却依然托病家居，请求开缺。这样很不利于制约奕䜣等人，所以慈禧表示出甚为愠怒的样子，户部尚书宝鋆对倭仁所为不以为然，吏部尚书文祥从中转圜，慈禧才准倭仁开一切差使，仍以大学士在弘德殿行走。而这正是倭仁最称心如意的，另几个帝师“为之额手”。倭仁不久就欣欣然销假了。

政见之争中谁是谁非且不论，权力之争中的胜利者却是倭仁，最大的赢家是慈禧。海外研究者注意到：“慈禧本来可以选择的道路是，坚持一种更加灵活而依然是正确的儒家观点，就像恭亲王和曾国藩在奏稿中所举例说明的那样。但那时在慈禧看来，把一个在京师官员中有大批追随者的显宦抬出来使之盖过恭亲王，这种做法是毫无害处的。我们发现 1868 年的一道上谕直接按倭仁和恭亲王的顺序把他们作为负有最重责任的两名官员提出来：一位是皇帝的道德指导，一位是领班军机大臣。”[6]

误人家国，岂有涯耶？

由于慈禧的暧昧态度，同文馆招生受到严重打击。奕䜣等不无悲怆地上奏："当御史张盛藻条奏此事，明奉谕旨之后，臣衙门投考者尚不乏人；自倭仁倡议以来，京师各省士大夫聚众私议，约法阻拦，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是臣等未有失人心之道，人心之失，倡浮言者失之者也。"于凌辰的奏折亦可资佐证："天文算学招考正途人员，数月于兹，众论纷争，日甚一日，或一省中并无一二人愿投考者，或一省中仅有一二人愿投考者。一有其人，遂为同乡、同列之所不齿。夫明知为众论所排，而负气而来，其来者既不恤人言，而攻者愈不留余地，入馆与不入馆，显分两途，已成水火"。奕䜣等六月初二日奏："两月以来，正途与监生杂项人员相间。臣等以此举即不能如初念之所期，不敢过于拘执，因而一律收考，共计投考者正杂各项人员九十八名……先经投考临时未到者二十六名……择其文理可观者选取三十名"。前来应考的七十二人中，有许多是年老失业者。据当时一个外国人的观察，他们是一些"衰颓无能的人，为著总理衙门对同文馆学生发给的优饩而不顾他们的名誉"。对于已进入上层士大夫的人来说则不然，"词馆曹郎皆自以下乔迁谷为耻，竟无一人肯入馆者"。[⑦]考题是"抱义戴仁论"、"射御书数明理策"。十一月初六日开学。同治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又奏，经诸臣在大堂当面考试，该三十人中尚堪造就者不过数人，所以将学经半年毫无功效者二十人立予撤退，留下的十人与原有三馆八旗子弟暂归一处教学。西语馆汉教习期满，无人应考接替。幸运的是，著名学者李善兰应请到馆，洋教习丁韪良、傅兰雅等馆课勤慎。不过，作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的徐继畬，属下只有区区四十余名师生。天文算学馆学生流品不一，据说该十人中只有五

名毕业，殊非当初所期。雄心勃勃的同文馆计划，以凄惨的失败而告终。

这一失败对中国的近代化的影响有以下数端：

第一，它确定了同文馆的小模样，严重影响了清末学兼中西的官员的培养。

总署企图将同文馆作为从翰林中培养学兼中西的高级官员的最高学府的计划告吹，同文馆的宗旨依然和成立初期一样，仅仅是培养翻译人才的小规模学校。所以徐继畬致仕后，多年不再派总管大臣。该馆的作用就很有限。

光绪十一年中法战争后，朝廷又感到"边务人才"的缺乏，是年秋冬总署奏："前于同治五年奏设天文、算学，招收满汉正杂人员，送馆肄业，迄今十余年以来，各该学生或随带出洋，或升迁外省，及调赴沿海各处差委，在馆人数无多"，不敢再提从翰林、进士中招考，而是"拟将满汉举贡生监及平日讲求天文、算学、化学、洋文者，不拘年岁，一律收考"。阻力比当初大大减少。应考者多达三百九十四名，"共取汉文八十名，幼童虽未全篇而文理明顺者十名，算学十二名，化学三名，翻译洋文一名，共一百八名，以备送馆肄业"。生源数量、质量仍远远不能适应取法世界各国文明以自强、抵御外侮的需要。光绪十五年奏准派曾纪泽、徐用仪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该馆仍未有大的作为。

清末，不仅有西学知识的高级官员严重缺乏，就连翻译人才也"绝少"。《异辞录》有李鸿章先后被两个一窍不通的"翻译"所骗的笑话。李派浙江某甲"至幕府美人毕格德处讲习西学，甲漫应之而终未往。将及年余，一日，召洋人某乙入署摄影，用甲通译。甲闻之大窘，急走告毕格德，先见某乙为道其情。约以手作势而唇吻任意作声。李相不通外国语言文字，见甲与洋人应对裕如，以为可用之才……李相出督两粤……携医士麦信坚自随，道出香港。酬酢中应有祝辞，皆毕格德预为之捉刀，麦信坚背诵而已，大庭广众之地，竟

能鱼目混珠”。[8]而四次任日本首相、多次成为李鸿章谈判对手的伊藤博文，早在1863年就留学于英国，多次出国考察，日本其他许多高级官员也有丰富西学知识。比较19世纪末中日高级官员的知识结构，也可看到同文馆事件的负面影响。

第二，中学与西学，分为两途，中学依然唯我独尊，西学被排斥于华夷之辨的文化壁垒之外，根本不被视为“学”，在旧的教育、文官体制内实际上长期没有合法地位。

总署深知在中国推行西学之难，所以预先提出了两种推行理由。一是“中源西流说”，认为“其实，法固中国之法也，天文、算学如此，其余亦无不如此，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二是本朝掌故，“西人之术，为圣祖仁皇帝深韪之矣，当时列在台官，垂为时宪，兼容并包，智周无外，本朝掌故，亦不应数典而忘”。无奈当时已不似康熙朝。康熙朝逢开国之初，底气很足，有汉唐气象，敢于对西学兼容并包地加以囊括。皇室衰微之后，时时担心别人取而代之，于是拿出夷夏大防的春秋大义对西学加以深闭固拒。

同文馆计划的本意是，将西学的新芽，嫁接到中学之砧木上。总署认为，“又恐学习之人不加拣择，或为洋人引诱误入歧途，有如倭仁所虑者，故议定考试必须正途人员，诚以读书明理之士，存心正大，而今日之局，又学士大夫所痛心疾首者，必能卧薪尝胆，共深刻励，以求自强”。事实表明他们对士大夫的期望值过高。而且这涉及到一个后来争论颇多的问题，即中学与西学的关系。绝大多数正途人员并未从变局中引出师法西方，发愤图强的教训，勇猛地吸收西学，相反，他们从夷夏大防出发，视西学如洪水猛兽，且不愿再攻素所未习的天文算学，仍希望遵循常规，沿着旧教育体制和文官体制的阶梯往上爬。投考同文馆者人数之少、质量之差，充分表明士大夫惰性之强。因此，使同文馆在培养高级官员方面超过翰林院的设想落空。同文馆的出现，不仅未能触动原有教育体制和文官体制，反而作为陪衬使之更加唯我独尊。同文馆章程不得不作出妥协

规定："遇乡会试年份，学生有愿应试者，准给一个月假期。"这样，学生就不愿专心攻读西学。广东同文馆情况亦然："该生等虽仍在馆肄业，然皆专意汉文，冀图乡试文理平通……志安小就，不思愤强，致将西文荒落，未能精深，殊失设立同文馆之意。"在京师同文馆题名录里，自豪地记录着 1873 至 1893 年该馆有一人中翰林，四人中进士，四人中举人，一人中副榜。即使如此，正途人员也未必瞧得起这些有"西洋习气"者，未得第者处境更逊一等。

同文馆首届英文生张德彝(德明)的身世很典型。他在 1865 年经大考后就被奏保为八品官，此后四十余年多次出洋，曾侍光绪帝读英文，还担任过驻英国参赞，出使英、义、比国大臣。仕途是比较畅达的。可是，他对自己同文馆英文生的出身，抱着强烈的自卑感。在《宝藏集序》中，他谆谆教导自己的儿孙：

> 国家以读书能文(按指八股制艺)为正途。……余不学无术，未入正途，愧与正途为伍；而正途亦间藐与为伍。人之子孙，或聪明，或愚鲁，必以读书(按指读传统的圣贤经书)为要务。[⑨]

这难免被后人视为守旧，可是，不难猜出他遭受了多少正途人员的白眼后才有这等表白。他的经历生动反映出同文馆乃至西学在晚清的卑微地位。读西学之书不能叫读书，孔孟之道的独霸地位可见一斑。

即使到皇朝行将覆亡，不得不废科举，兴学校，大批留学生放洋时，仍对从国内外各级学堂毕业者分别给予贡生、举人、进士、翰林等功名以资鼓励，在西学的实质外面再披上一层中学的合法外衣。不过，到这时已风气大开，守旧误国的士大夫理所当然地被历史唾弃，翰林、进士很快成了守旧遗老的代名词。有意思的是，这时有的翰林就以徐继畬及其弟子作挡箭牌。清末，成连增翰林所撰渠经甫翰林墓表云："中丞公松龛益恢(阳明之学)而扩之，其所著《瀛环志略》，规划大地，实开今日五洲交通之局，非寻常讲学家所可同

日而语也。(经甫)公以同里后学犹及亲炙门墙……呜乎！自废科举,立学堂,士咸号为开通,往往鄙夷先哲。孰知泰西文明,数十年前乡先正已肄业及之哉?”[10]

第三,总署诸臣心灰气沮,总署作为近代化运动领导集团的地位已大大削弱。

晚清取法西方,推进近代化,所遇阻力十分强大,如没有坚强的政府是难见其功的。同文馆事件更加暴露了慈禧与奕䜣之间的矛盾,奕䜣进一步失势。总署此后慑于守旧势力的强大,不再敢有大的动作,即使迫于时势的小有更张也是阻力重重。认清总署无能为力处境和慈禧识见短浅的,有热心洋务的曾国藩、李鸿章等封疆大吏。所以同治九年曾、李等人策划派幼童赴美留学的大动作时,不再希望总署起促进作用,相反担心由总署挑头会引起慈禧及倭仁之流猜疑。他们只得背着北京密谋,妥当后于次年会衔上奏慈禧。李鸿章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复曾国藩书云:“陈荔秋与容闳建议选派聪颖子弟赴西国学习,尊疏前已略陈,内无可否,其懵然不知,非不为也。此事先须议订条款,预筹经费。南中熟悉外情者尚多,乞令集议通筹。若有眉目,请尊处挈敝衔会奏,断不可望事由中发”。笔者以为信中的“内”指慈禧,“中”指总署。由于绕开了正途人员和权力之争两个敏感点,并采取逐步追加经费的策略,幼童放洋开始还比较顺利。可是,由于总署不太清楚个中缘由,当陈兰彬等于光绪七年作梗,请尽撤幼童回国时,就不能与李鸿章和衷共济地及时识破陈的险恶用心,致使此事也中途流产。

第四,清议日趋浮嚣,开清流党之先河,毒化了改革图强的政治环境,为戊戌变法等变革的失败埋下伏笔。

同文馆事件巩固了倭仁作为清议领袖的地位。同治十年,倭仁去世,另一帝师李鸿藻继之主持清议。李在军机处与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沈桂芬关系紧张。郭嵩焘光绪二年九月使英前与李谈话后记:“兰生相见一谈,所言多中肯綮。政府自分门户,而以兰生

辈不谙洋务，一切不使与闻，实亦使人难堪也。"郭氏此时还未识破李的圈套。其实把在筹议海防之争中对郭大加攻击的刘锡鸿派为郭的副使，以便阴加钳制的主谋，正是李鸿藻。后来郭才明白，刘"在京师受命于李兰生，令相攻揭；其出京，一切皆未携备，惟携备折件，亦李兰生之意"。[11]慈禧不会不知李的政见，奇怪的是次月就将此人也派在总署行走，其用意无非像李对付郭嵩焘一样，在奕䜣、沈桂芬等人身旁安上一个钉子，以期形成"人盯人"的局面。李鸿藻等对办洋务者阴加钳制的同时，还诉诸舆论。而当时一些讲官言官认为处于"时会多艰，人才不出"的"无英雄之时"，欲"厕言路以伸其志"。他们接膝京师，谬引同志，以同乡和同年关系，组成了"实有左右朝野舆论之权"的被称为清流党的利益集团。首脑为李鸿藻，骨干人物有张之洞、张佩纶等。"二张一李内外唱和，张则挟李以为重，李则弭张以为用，窥探朝旨，广结党援"。[12]再加上李慈铭等"党外"清议人物，吠声吠形，轰然交作，以诡激邀名，为取法西方文明造成极其艰难的舆论环境。其最得手武器就是春秋大义、华夷之辨。办洋务者免不了要被扣上一顶姓夷不姓华的高帽子。在筹议海防之争时出马的清议名人有于凌辰、王家璧、刘锡鸿。《使西纪程》毁版事件中出马的有清流党人何金寿，清议名人李慈铭、刘锡鸿。总署大臣董恂将清流目为徒尚空言，不负责任，成事不能，败事多端，被二张寻机奏劾。张之洞代黄体芳写的奏折，明指董为"奸邪"："今朝臣中之奸邪，如户部尚书董恂是已。……其在总理衙门，言语猥琐，举止卑谄，通国皆知……伏望亟予罢斥，以清朝列。"[13]郭嵩焘、董恂终因清议猛攻落职。朝野派系复杂，斗争激烈。慈禧假手清议，以便控制各派，二张等人先后被擢为方面大员。

第五，中国坐失二十多年宝贵时机，造成落后挨打的长期被动局面。

19世纪后半期，世界正酝酿着以电力运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对人类社会生活带来深远影响。资本主义正从自

由竞争走向垄断。世界政治格局和经济秩序基本形成。恰恰在同文馆决策提出的1866年,德国西门子发明自激式发电机。而正在这十分关键的时期,清朝拒绝重大改革,李鸿章等办工厂、海军、派幼童放洋,都比同文馆计划改革幅度小。以致国力不振,从中法战争起,短短十几年内,遭受到三次一次比一次沉重的打击。尤其是日本,从中国得到巨额的赔款,极大地帮助了它的原始积累,迅速成为一个极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一百多年来,世界许多国家以很大加速度前进,上世纪中期耽误10年,下一世纪一百年都都未必能赶上。梁启超1896年写的《变法通议》中,痛切地揭示了倭仁等清议人物破坏同文馆招生给国家造成的巨大灾祸:

> 昔同治初叶,恭亲王等请选编检庶常,并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之京外各官,及举人恩拔副岁优贡等,入同文馆,学习西艺,给以廪俸,予以升途,得旨依议。其时正当日本遣人出洋学习之时耳。此议若行,中学与西学,不至划为两途。而正途出身之士大夫,莫不研心此间以待用。至今三十年,向之所谓编检及五品以下官,皆位卿孤矣。用以更新百度,力图富强,西方大国,犹将畏之,而况于区区之日本乎?乃彼时倭文端方以理学名臣,主持清议,一时不及平心详究,遂以用夷变夏之说,抗疏力争,遽尼成议……文端之言,其误人家国,岂有涯耶!抑天心之未厌乱也?[14]

同文馆事件的主角

现在还未找到更多资料证明总署关于同文馆的哪个奏折出自徐氏之手,但其中西方人"性情缜密,善于运思"等语,显然出自《瀛环志略》。徐氏是总署当时七大臣中两个翰林出身的官员之一,又是唯一任过翰林院编修的人(另一个为翰林院庶吉士谭廷襄,散馆授刑部主事),且"时艺卓然成一家言,海内推为宗工",因此在总署

制定同文馆招考翰林进修的计划时，人们会很尊重他的意见，他也成了总管同文馆大臣的合适人选。他在此事中与奕䜣等人的关系，与他当年在福州办洋务时与刘韵珂的关系有相似之处。如果说他是同文馆新计划的重要设计师和主要实行者，也许并不过分。

徐氏在制定、实行同文馆计划中所起的作用，还可从别人对他的攻击中看出。居忧在籍的李慈铭在其日记中畅发反对“用夷变夏”之论，为倭仁鸣不平，指责说：“至今年开同文馆，以前太仆寺卿徐继畲为提调官（按，实为总管大臣），而选翰林及部员之科甲出身年三十以下者学习行走，则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驯将夷夏不别，人道沦胥，家国之忧，非可言究……识者谓湘乡之讲习泰西技算，实为祸端；至于继畲，盖不足责尔”。[15]李氏以诸生入赀为户部郎中，辛酉政变中曾奉奕䜣等命检历代贤后临朝故事以资参考，对朝中人事典章相当熟悉。他这里不归罪奕䜣而归罪徐氏，似乎把徐氏当作主谋，这固然是念及往日与奕䜣的关系，可也正说明他知道徐氏在其中充当了一方的主角之一。

徐氏年过七十再度出山，本欲对国家自强有所助益，不料同文馆计划功败垂成，自然心灰气沮，但仍能不计成败利钝，就事所当办、力所能办者尽心以办。他为丁韪良《格物入门》作的序，和美国驻华公使向他赠华盛顿像仪式上的答辞，表明他在历经挫折后，晚年的思想仍居当时中国思想界前列，具有全球性眼光和历史的宏观角度。

同文馆决策早期失效引出的教训

现代决策理论揭示，决策的失效是有共同规律的。一项新政策由于传统势力的阻力，一开始执行就失效的概率较高，这叫早期失效阶段；如果能坚持下去，转入正常，新政策就会发挥其有效功能，失效率就会减少，这叫偶然失效阶段；继续执行相当时间之后，政

策就会老化，失效率又会增大，这叫损耗失效阶段。同文馆决策就是因守旧势力的阻挠而早期失效的。这早期失效，主要是因倭仁等挑起华夷之辨的争论而引起的。

在历史传统深厚的旧中国，能轻易找到一千条依据为守旧辩护，难得找到一条依据为改革辩护。任何改革政策如果诉诸舆论，挑起争论，十之八九要失败。要想成功，必须避免争论。当年李鸿章对此感触颇深：

> 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头角；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路线，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攻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纳，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16]

李鸿章这些话里对慈禧太后不无怨言。从同文馆事件可以看出，在一项决策要不要诉诸舆论上，慈禧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后来当同治帝病死，慈禧欲立"幼者"继续垂帘时，她"一语即定，永无更移"，[17]根本不容置辩，是何等果决。而同文馆事件时她却一再让言官讨论。此无他，完全取决于怎样才有利于她巩固最高统治地位，至于祚运的短长、国家的盛衰，那是次要问题。倭仁也把眼前权力视为命根子。在庚子之乱中，其九十岁老妻被强奸，全家被杀，大概不是偶然的。

同文馆计划的失败，从根本上说，表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动顽固，在重大关头已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水火不容。经过诸如此类的一连串失败后，人们不得不从根本制度上考虑问题，清皇朝落得个"人心已去，天命亦绝"，这个结局，徐氏虽然没能看到，却早

已预料到了。后人穿过这一凄惨的最后一幕，考察徐氏等当年开办同文馆的艰辛时，更能体会到他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悲壮意蕴。

（作者任复兴，1947年生，山西省忻州日报主任记者。）

附记：此文于徐继畬讨论会后完成。

注释：

①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卷上，页568，中国社科出版社，1985年；刘广京：《经世思想与新兴企业》页407。

② 《五台徐氏宗谱》卷七，松龛徐公墓志铭；《宋史》卷336，司马光传。

③ 方闻：《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页271，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

④ 本文引文除另注出处者外，均见上海出版社《洋务运动》辑2。

⑤ 《翁同龢日记》，第一册，同治六年。下引翁氏日记出处相同。

⑥ 《剑桥中国晚清史》卷上，页571，参《大清穆宗实录》卷238，页17。

⑦ 《经世思想与新兴企业》页412；《近代稗海》辑2，页389。

⑧ 刘体仁：《异辞录》卷3，页17. 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

⑨ 钟叔河：《走向世界》页91，中华书局1985年。

⑩ 《敕授文林郎经甫徐公墓表》，见《五台渠氏宗谱》民国年间抄本。

⑪ 《郭嵩焘日记》卷3，光绪二年九月十八日；《走向世界》页242。

⑫ 《越缦堂詹詹录》下集，页32，转引自《近代史研究》1992年4期，247页。

⑬ 马东玉：《张之洞大传》43页，辽宁出版社1989年。

⑭ 《饮冰室文集类编》上，31页，日本帝国印刷株式会社，1904年。

⑮ 转引自《近代稗海》卷2，页388－389.

⑯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107－108页，岳麓书社，1985年。

⑰ 《翁同龢日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

●[美]梁伯华

徐继畬时代的中国对外关系

前言

首先,我很高兴今天能参加这个学术讨论会。这个学术会的主题是有关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这个主题很有意思,特别是在19世纪徐继畬的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可说是一个革命性的想法。在保守的环境下,徐继畬怎样去突破传统来应付两千年来未有的变局。更深一层来看,究竟在19世纪中叶中国对外关系是不是仍然处在不变的局面?或是说,在19世纪中叶中国的对外关系是不是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是个怎样的变化?这个变化对徐继畬有些什么影响?这个变化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又有些什么影响?

我认为研究这个课题可用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是微量观的研究(MicroStudies),就是集中在徐继畬的所作所为及他的著作。例如美国的德雷克教授(ProfessorFredDrake)所写的 ChinaChartstheworld,由任复兴先生中文翻译成《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这本书对研究徐继畬有很大的贡献!

第二个角度是宏量观的研究(MacroStudies),那就不在于集中在徐继畬本人,而是从徐继畬时代中国对外关系变化的过程及特色作为研究及探索的重点,以了解当时中国对外关系变化的全

貌，再回头来察看及评审徐继畬的所作所为。相信从这个角度来看，更能凸显徐继畬在历史上的贡献！本文就是从这个宏量观的角度来探讨的。

徐继畬时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

什么叫徐继畬时代？虽然徐继畬是生于公元 1795 年，但是所谓徐继畬时代，我们还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到徐氏死亡的那一年，那就差不多是从 1840 年开始到 1873 年的这一段时间。在这短短三十多年中，我们发现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是巨大的，也是史无前例的。而且这个变化对中国影响是深远的。我们可从两个层面来看：

（一）外交上的变化：——鸦片战争后战败了的中国被强逼签订南京条约，从此不能再称呼英国人为英夷。这个转变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一向以天朝自居的中国，从来不以平等姿态对待西洋诸国，中国只希望东西洋诸国朝贡及臣服中国，而不希望有平等的外交关系，也不会接受西方的国际公法。但是从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无力保护朝贡国关系，而开始被迫接受西方的平等主权国家观念来对待西洋诸国。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可以说就是在这种环境及情况下提供给当政者有关中国以外的国家的种种宝贵资料，这从历史的角度看，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徐继畬的贡献自然是很大。到了 1870 年代，中国更进一步派遣使臣驻扎西洋诸国，中国还是希望维持传统的朝贡及臣属关系。于是在中国的外交关系上，有西洋使节来中国，也有东洋贡使来中国。这实在是中国转型期外交的特色，也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造成日本对琉球及朝鲜的侵略，也加速了中国在外交上的变化。所以在徐继畬时代，中国外交上的变化实在是十分巨大的！[①]

（二）文化交流上的变化：——东西方文化交流对 19 世纪的中

国而言，可算是新鲜事物。儒家中国一向鄙视西方“蛮夷”文化，自不会学习他们的文化，而只有其他国家向天朝的中国学习。因此，宁波府向美国华盛顿纪念塔赠送汉字碑，而美国政府于1868年向徐继畬赠送华盛顿画像，这些事情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是一个重要而又良好的开始，徐继畬的贡献实在很大。由于这个良好的开始，而间接促成了首批留美官费幼童于1872年派遣美国。相信在当时徐继畬的内心是十分兴奋的。因为这在东西文化交流史上又跨进了新的一步。当然，到了清末，中国留学生大量放洋，加速了东西文化的交流。

结　语

由上面可见，纵观徐继畬时代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国已是踏入巨大变化的过程。在这个巨大变化的过程中，徐继畬的所作所为，及他的作品，都是在领导着这个变化的巨轮而作出伟大的贡献。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这个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讨论会，缅怀及肯定徐公在历史上的地位及贡献，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当时中国的对外关系，明白了解到当时西方对中国造成的冲击及造成的剧烈变化，相信更能欣赏到徐公的远见。在一个保守而又封闭的社会里，加上对外关系的困难重重，徐继畬是开风气之先的。他的真知灼见，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有很大的影响。

（作者梁伯华，广东南海人，1950年生于香港，现任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

注释：

①参见梁伯华：《近代中国外交的巨变——外交制度与中外关系变化的研究》，香港商务印书馆1990年出版。

●任复兴

徐继畬与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变

鸦片战争后半个多世纪，中国的外交制度、外交原则、外交观念都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其制度，先是由单一的朝贡国制度，转变为朝贡国制度和条约制度并存的双重体制；继而朝贡国制度土崩瓦解，中国成为多元世界的普通一员与各国平等交往。其原则，由宗主国和藩属国之间不平等交往的原则，转变为领土主权独立的国家之间平等交往的原则。其观念，由华夷一统世界观、天朝观转变为多元世界秩序观、主权国家观。尽管这一过程极其艰难、屈辱，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是世界由分散到整体、全球外交制度一体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那么，处在这个转变前半期的徐继畬对此进行过怎样的思考和实践？他的《瀛环志略》在这一历史巨变中发生过什么影响？

两大世界体系的碰撞

鸦片战争前地球上所有国家，呈现出两大世界体系：其一为欧美列强及其殖民地以及其他独立国家组成的多元世界；其二为大清帝国即“天朝”及其朝贡国组成的华夷一统的一元世界。

华夷之别，当始于有夏之世。它客观地反映了上古时期在东亚大陆多元发生的文明的不平衡发展。华夷一统的世界秩序构想，最

早见于儒家经典《春秋》:"内中国而外诸夏(按指诸侯),内诸侯而外夷狄"。[①]在当时礼崩乐坏的形势下提出这种构想,其政治目的是为"尊周室,攘夷狄",恢复周天子的权威制造理论依据。但是直至汉皇朝才重新成功地实行了长期的大一统统治,并臣服了周边少数民族,以《春秋》大义为模式,建立起内中国,外诸夏,及于化外之夷狄的三个同心圆圈式的世界秩序,即西方汉学家所说的"朝贡国制度"。后来国家分裂,朝贡国制度荡然无存,华夷观念却大盛。此后这种制度与观念迭为兴衰的历史一再重演。明初朝贡国制度扩展到东南洋。徐继畬后来反省到:"成祖好勤远略,特遣诏使,遍历各番岛开读。于是诸番岛喁喁内向,效共球者数十族。如吕宋、爪哇、婆罗洲、苏门答腊之类,幅员差广,可称为国。亦有蕞尔小岛,户不盈千,仰慕威灵,携孥求见。遂至渔獠蜑户,概锡王封,虽云盛事,亦未免夸而滥矣!"

清太祖起兵后,曾以边陲臣属的身份亲赴明京朝贡七次。满族入主中原,继承了明朝的朝贡国体系制度,而对企图以华夷观念向其正统地位挑战的文人学士则予严厉镇压。吕留良、曾静案发后,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反复数千言批驳说:"本朝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圣德?""从来华夷之说,乃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不相尚,北人诋南人为岛夷,南人称北人为索虏。当时之人不务德行,徒事口舌相讥,已所谓至卑至陋之见解。今逆贼于天下统一、华夷一家之时,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之大罪乎?"[②]又下令,禁民间刻书用夷、狄、胡、虏等忌讳字。

乾隆帝以"十全武功"平定了边陲地区叛乱,臣服了各藩属国,清皇朝进入了鼎盛期。从此,"视海内外莫与为对"。[③]其对外关系准则乃是单一的宗主国与藩属国不平等交往的准则,认为自己高踞天下权力金字塔的顶峰,根本不承认世界上有第二个与之平起平坐的国家君主,根本不知道哪个国家敢向它的宗主权挑战。而至

此时，满族已由夷狄的文化圈，幸运地被认同为进入中华文化圈。华夷观念之“毛”，牢牢地附着在朝贡国体系之“皮”上。《春秋》模式得到最后一次完美展现。这种世界秩序大体呈三个同心圆圈：清帝国本土相当于周天子的“中国”；朝鲜、琉球、越南、老挝、缅甸、尼泊尔、苏禄等朝贡国，相当于诸夏；处于最外圈、无缘沾浸周孔之教化雨的西洋各国，则是夷狄。朝贡诸国又以规定进贡期限短长区别等级。在文明教化方面，呈现天朝单向输出的趋势。

正当清朝君臣为十全武功、万国来朝所陶醉的时候，西方诸国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洗礼，产生了近代工业文明，并以强大推力向外扩散。随着海上贸易网和统一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世界正发生由分散到整体的历史性转变，形成另一个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之内，除殖民地之外，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是有近代意义的主权国家之间平等交往的原则。这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和民主平等思想在国与国关系上的体现。这个多元世界体系向“天朝”的朝贡国体系发起空前挑战。在此之前，一些西欧商人曾经混迹于朝贡国贡使的行列，从对华贸易中颇获厚利。然而由于近代国家主权观念的兴起，已逐渐不能容忍中国以不平等方式接待，更不满中国以夷狄相称。这种态度得到其政府有力支持。清朝君臣却仍以宗属关系原则处理所有对外问题。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通过一系列事件暴露出来。1793 年马嘎尔尼事件、1816 年阿美士德事件、1834 年律劳卑事件，中英冲突的焦点都是所谓礼仪问题，互不相让，逐步激化，终于导致武装冲突。三次遣使通商皆不得要领，英方决心以武力叩开中国大门。律劳卑事件后，广州英人向英王呈诉：“回溯我们在中国贸易所受到的限制和无能为力的处境，是由于我们对中国方面妄自尊大长期默从。中国皇帝狂妄地认为他和他的子民都是比别国君皇子民高人一等的。我们不能不认为必须对这种妄自尊大的行为作坚决驳斥和打击，否则对于进行继续交涉也是没有好效果的。”④

鸦片战争即是这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外交观念、外交原则截然不同的两大世界体系的碰撞。对中国来说强弱之势无异于以卵击石。遗憾的是清朝君臣对此茫然无知，依然大话连篇。虎门销烟后，林则徐《拟颁发檄谕英国国王稿》说："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我天朝君临万国，然不忍不教而诛……王其诘奸除慝，以保乂尔有邦，益昭恭顺之忱，共享太平之福。"道光帝得意地在上朱批："得体周到。"林氏还作出了英国"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的战略判断。君臣二人对英国的军事报复都没有精神准备。林则徐在英军封锁广州前两个月，骄横地将美领事送上门的战略情报"原禀掷还"，丧失了备战的最后机会。⑤

两种世界观的对垒

鸦片战争的结局，是天朝的朝贡国体系被撞开一个大的缺口。清廷被迫在与英、美、法等国签订的条约上一一痛苦地写上，双方外交官之间"往来俱用平行"等字样。于是，中国对外关系有了两种并存的制度：一方面，依据古老的朝贡国制度、宗属关系准则处理与原有朝贡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依据条约制度、主权国家平等交往的准则处理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两种制度并存乃是一种过渡形态，两种原则常常互相混淆，中国和西方对此均感到很不舒服。尤其对中方来说，条约制度、平等原则对华夷内外专制秩序的核心——君臣主从关系也构成极大威胁，给对内维持等级森严的专制统治造成巨大问题。

是像列祖列宗一样，弘扬圣武，企图在扩大了的世界范围内制服夷狄，将其纳入儒家古老的朝贡国体系之中呢？还是理性地考察世界，取法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变法自强，使中国走向世界，在多元的世界中占据一席应有地位呢？这是对西方挑战的两种截然相反

的回应，两种大相径庭的世界观。魏源在林则徐《四洲志》基础上完成的《海国图志》，与徐继畬的《瀛环志略》，是这两种世界秩序观的对垒。

魏源在鸦片战争期间，"军问沓至，慨然"，双管齐下，于 1842 年 8 月，40 余万言的《圣武记》"告成于海夷就款江宁之月"；1843 年 1 月，又作《海国图志》序。大约此时《海国图志》50 卷本亦已脱手。魏源如此勤奋神速地编撰，是为一种什么力量所驱使呢？他对未来世界秩序的总体构想如何呢？两书序言是生动的夫子自道。

魏源认为，如同皇清开国以来经常在边陲地区遇到一些麻烦一样，小小英夷不会对天朝华夷内外的秩序构成根本威胁。如果说准噶尔叛乱经过 70 年才平定的话，那么猖獗的英夷遇有适当时机即可扫荡而廓清之。"昔准噶尔跳踉于康熙、雍正两朝，而电扫于乾隆之中叶。夷烟流毒，罪万准夷……天时人事，倚伏相乘，何患攘剔之无期，何患奋武之无会？"崇国威，全国体乃是时间问题。此次交兵，也为弘扬圣武，扩展儒家以中华为中心的朝贡国体系造成机会。世界国家如此之多，胆敢向中国挑战的不过一个小小的英夷，它是今后唯一的假想敌，其余均是近交远攻、远交近攻的可借用力量。性近犬羊的夷狄所恃者不过船坚炮利，岂是有文韬武略的中华的对手？如果实行"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三大主义，玩众夷狄于股掌之上，就会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强，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来王"的秩序。魏源正是在这种机会与前景鼓舞下奋笔疾书的。魏书展示的世界图象，是以中国为地理、政治、文化中心的一元世界。为了论证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百卷本还自撰《释昆仑》、《释五大洲》两文。约言而之，《圣武记》从纵的时间方向为弘扬圣武提供了"光荣"的历史，自认为可资借鉴的经验；《海国图志》则从横的地域空间提供了弘扬圣武的广阔舞台。两书是不可分割的连体姐妹。由于魏源这两本共百万言的文集是在南京条约签订前后一年之内完成的，本人又缺少直接

接触外部世界的机会，因而未能找到当时世界上较进步的参照系，以便对儒家的价值体系进行反省，凭思维惯性对巨变中的世界作出如是观，也是可以理解的。

率先突破华夷一元世界秩序观的，当推徐继畬费时五年写成的《瀛环志略》。战后，徐继畬利用专办厦、福两口通商的机会，较广泛地与外国人接触，如饥似渴地探求域外知识，评估西方国家走向富强的原因和性质。徐书既向读者提供了全球地理的基本图象，又提供了由许多互相竞争的国家构成的多元世界的观点。其要点是：1. 全球人类古代文明是多元发生的，虞舜至周代域外先后出现了巴比伦、埃及、希腊、波斯、犹太、腓尼基、罗马七个古时名国。2. 现实世界依然是多元世界，各国自有其宗教信仰、价值标准、风俗习尚，“周孔之教无由宣之重译……固不必操儒者之绳墨而议其后也”。[6] 3. 西方政教颇有可观者：三千年以前，古希腊就实行过共和制，古罗马也曾不立国王，实行议会制；当代英、美、荷等国都设议会，美、瑞士及中南美诸国实行选举制、共和制；华盛顿几于天下为公，乃泰西人物之称首。4. 欧美发达的工商科技远远超过中国。5. 对世界由分散到整体的巨变、世界统一的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也有觉察：“天地之气，忽尔旁推交通，混为一体，倘亦运会使然耶？然天下从此多事矣！”[7]

这个多元世界体系对中国的朝贡国体系早已构成严重威胁：“南洋诸岛国苇杭闽粤，五印度近连两藏，汉以后明以前朝贡时通，今则胥变为欧罗巴诸国埔头。此古今一大变局。”面对千古变局何以自处？徐书蕴含着以现代化为主旋律的维新纲领：自强；务实的外交；以彼得大帝为榜样，引进有用知识；借鉴西方政治体制。关于务实的外交，有以下要点：1. 对于有攸久历史和先进政治、经济、文化的西方列强，不应与古代夷狄作等量观；2. 中国对遥远的西方列强决不可能像对准噶尔部那样犁庭扫穴，相反，西方列强正对中国形成战略包围之势；3. 西方人见君王亦无叩头之礼，宾主尊卑杂

坐，男女皆分父母之产，中国在外交中应正视之；4.在西方，像土耳其那样的落后国家也在京城设有各国使馆，与中国由沿海督抚办理外交，不许外国人入城、入京的体制迥异；5.昔日之西方，求疏通而不得，今日之西方，欲隔绝而不能，像突尼斯那样的小国也是“欧罗巴各国皆与通商”，中国遵约通商乃大势所趋。

以上这是对《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立论大体的粗略认识。论者常将这两书相提并论，可是如果比较分析一下它们对世界大势、中外关系的总体认识，就会发现大异其趣。

争取和平国际环境的艰难八年

徐氏在鸦片战争中的良好表现，引起道光帝的重视。以前，人们对徐氏战后入觐、奉旨修书表示怀疑。可是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找到的多件有关朱批档、录副档可知并非虚构。1842 年 5 月 26 日、6 月 6 日，道光帝连擢徐氏为两广盐运使、广东按察使。7 月 5 日，徐氏拜发谢恩疏请觐。8 月 20 日，即耆英、伊里布与璞鼎查在英舰康华丽号上会见，商谈和约条款的同一天，道光帝在徐疏上朱批：“着来见，钦此。”徐氏入京后，道光帝对这位来自福建前线、又将派往多事的广东的官员十分器重。因而十月间(11.3—12.1)徐继畬在京“叠蒙召见”，“恭聆圣训”。道光帝正处于一生中最难堪的时日。在这种特殊气氛中，老皇帝多次垂询，面授机宜，自然使徐氏感激涕零，悚惶无地。[8]

次年正月徐氏到广州后，克尽职守，力争使事杂言庞的粤东臻于绥靖。他与先期到粤办理条约善后事宜的同门至交黄恩彤讨论粤东隐患，所见略同。认为“粤东俗浮民悍，自夷变后盗贼充斥，劫杀公行。而不逞之徒往往假攻夷复仇为名，聚众抗官，敛钱肥己”，“於是遣散壮勇”，“白诸大吏拿获浙江游棍钱江及何大赓等加重惩办”，“置之狱，省城顿形安谧，而各属盗蜂起(皆散勇为之)”。善后

事宜初有端绪。[9]

到广州才3个多月，1843年5月1日，道光帝又授予徐继畬福建布政使之职。这是他一年之内第三次升迁。道光帝5月29日在徐氏谢恩请觐疏上朱批："即赴新任，届期奏请，钦此。"1846年8月28日徐氏3年届满后上奏："兼通商一事，臣系专派之员。虽参商督抚，臣随时办理，而是否吻合机宜，无由自信合无。"可见他是福建通商事务的主要负责人。徐氏严格按照道光帝旨意，与刘韵珂、刘鸿翱等督抚和衷共济，处理了大量棘手事务。1843年11月2日，厦门在条约规定新开四口中率先开放，1844年冬福州开埠。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清朝两种对外制度并存的过渡形态，在福建对外事务上也得到全面体现：一方面要按照传统的朝贡国制度，接待琉球隔年一贡的贡使及海上遇难漂流到岸的人员；另一方面，则按新的条约制度处理与英、美、瑞典等国来闽通商、传教、行医人员有关事宜。而道光帝又不愿省会福州发展通商，与条约规定大不相同。徐氏对外采用阳示德意、阴加钳制的策略，既未使福州的通商超过皇帝的心理承受能力，又无明显违背条约的举措。在公务之外，他向英、美在闽领事、传教士虚心求教世界地理、历史、现状。他与雅裨理的交游，成为近代中国高级官员与外国传教士接触的最早事例之一。如果他还是天朝大员盛气凌人的架子，决不可能将复杂的对外事务处理得如此妥贴，也决不会有如此内涵丰富的《瀛环志略》产生。徐继畬不仅具备了平等外交的思想，而且在环境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了平等外交的实践。

从沿海各口岸看，一般来说，化解矛盾，遵约和平通商，是当时中外许多官员的共同目标。如果不得已而再次诉诸武力，对英国官员来说也是有辱使命的事。例如1846年7月广州暴乱中，港督德庇时、海军少将科克伦都主张对引起事件的英商金顿严肃处理。德庇时在致外交大臣巴麦尊函中称："在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之内行使治外法权。在此非常特殊的地位上，对我国人民加以约束，是极为

重要的”，甚至提出：“我应请求阁下，核准我提出有关中国政府合理要求引渡英国犯人的法令草案。我相信中国政府这种固有权利，足以使犯人被引渡过去”。[10]

中外双方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都不愿轻易破坏和局。因而南京条约使清朝赢得八年极为宝贵的国内外和平时期，使境内疮痍逐渐化生，和平通商中获益不少，许多官员也增加了对外情的了解。有的史家甚至期望，道光末年的大好时机，应该有一次变革维新。

然而，国内有两种势力威胁着这种安定局面。第一种就是所谓山中之民。封建专制的原则是神秘和恐怖。君临万国的天朝败于区区数千名“岛夷”之手，昔日威风扫地以尽，难免使一些人产生“彼可取而代也”的想法。于是，落魄书生洪秀全就在徐继畬曾任职的浔州聚众起事。这固然由于社会矛盾激化所致，洪氏从鸦片战争中窥破大清虚实也是诱因。难怪他一开始就无所顾忌地封了那么多王。耐人寻味的是太平天国也以天朝自居。于是，中国境内有了一南一北两个“天朝”。第二种势力就是来自君臣自身对往日臣服中外的世界秩序的恋旧心态，即潜滋暗长的华夷观念。从广州的节马图和福州的射鹰楼可见一斑。

1841年1月7日，英军攻陷虎门两炮台，副将陈连升阵亡。26日英军占领香港。据说陈的坐骑被掳至港，它为大清也为陈氏守节，不食夷草而死。此说荒诞不经，却被士绅非理性地大加宣扬，刻其英姿、小传、赞诗于石上。据广州镇海楼、福州林则徐纪念馆拓片，小传为：“节马者，都督陈公连升之马也。庚子冬，沙角陷，公父子死之。一马为逆夷所获。至香港，群夷饲之，不食。近则蹄击，跨则堕摇。逆怒，刀斫不从。放置山中，草亦不食。日向沙滩北面悲鸣。华人怜而饲之，则食。然必以手捧之，若置地即昂首而去，以其地为夷有也。每华人围视指为陈公马，即泪涔涔下。或呼能带归，亟摇尾随之。然逆终不肯放还，以致忍饿骨立，犹守节不变。道光

壬寅四月，马卒香港。"寥寥153字，将这牲灵的气节描绘得若有其事，堪称千古奇文。可是按现代外交常识，此马罪责难逃。因为在其生前，南京条约尚未签订，香港依然是天朝领土，放开肚皮大吃其草，其谁而曰不然！不吃其草反而留下口实。这等于擅将天朝领土许为"夷有"，应与琦善同罪。士绅们如此卖力地吹捧此等罪马，不知要将君父置于何地！

林昌彝，侯官举人，与魏源为挚友，同邑林则徐相知尤深。福州开关时，徐继畬等因准许英领事住城邑已载入条约，官方不便公开禁阻，乃饬侯官县联络绅耆士民待李太郭进城之日出城阻止。岂料递呈者二百余人，届时竟无一人露面。只好让李太郭住入乌石山积翠寺。名士昌彝亦在未露面者之列，可是事后却命名其楼为"射鹰楼"。《清史稿》本传谓："家有楼，楼对乌石山寺，寺为饥鹰所穴，思欲射之。鹰谓英吉利也。"其主张是："欲革洋烟，须先禁内地吸食之民，然后驱五海口之英人。驱之之法，则不主和而主战。"黄恩彤曾辛辣讥讽沿海勇于笔伐、怯于任事的文士："徒假忠义之名，自快一时之笔舌……扬之则雄兵百万，按之实乌有先生，何益之有哉！"[11]

上有不甘于丧失天朝皇帝威仪的道光帝，外有以战胜者自居、寸步不让的领事、商人、传教士，下有徒恃虚骄、无裨实用的绅耆士民。周旋于诸种势力之间，化解矛盾，实在难乎其难。徐氏1850年10月10日家信称："弟在闽办理夷务已阅八年，不知历多少艰难，幸得平安无事。"这道出了他维护和平通商的一片苦心，反映了他处境的狼狈。

君臣吏民浸肌浃髓的愚昧观念，一遇适当时机，便要变为恢复朝贡国制度的行动。条约议定准许英人在五口城邑居住。但粤省士大夫认为"国有典章，二百年从无夷人入城之事"。1849年英人重申入城之约时，粤督在林则徐鼓励下，认为"中外大防在此一举"，发动士绅组织乡民加以拒绝。道光帝为之动容，接奏报当天即颁谕旨："洋务之兴将十年矣……朕深恐蹂躏之虞，故一切隐忍待

之……本日由驿驰奏……入城之议已寝……朕嘉悦之忱，难以尽述。”[12]一语泄露天机：遵约通商不过是“一切隐忍”，“待之”的是重建列祖列宗臣服中外的秩序。不过来不及措手就驾崩了。

两起事件与近代中国外交的首次逆转

八年和平时期使清朝国力有所增强。“时局既变，议论日新”。咸丰帝登基后年轻气盛，比临终前的父皇更趋强硬。既然自信有力量恢复战前中外关系格局，那么从事“羁縻”的官员顺理成章地被视为“抑民媚外，罔顾国家”。于是便有《瀛环志略》事件、神光寺事件的爆发。

一、《瀛环志略》事件。徐氏曾说：“甫经付梓，即腾谤议”，但付梓时间待考。戊申版中的刘韵珂序作于 1849 年 4 月 23 日至 5 月 21 日，定本当出版于此后。此前曾将初刻前三卷送好友征求意见。谤议可能腾起于定本出版后的 1849 年的后半年，而至次年达到高潮。据同年徐氏 12 月 15 日《供职已届三年不获依期入觐吁请暂行展缓折》，是年他依例应赴京述职，但因闽藩调升，新任藩、臬均未到闽，刘韵珂又将查阅浙伍，因此奏请俯赐暂缓北上。奉朱批：“如所请。”徐氏可能计划在赴京述职时将《瀛环志略》进呈御览，由于谤议沸腾，不便将有争议的著作进呈，又因公不能离闽，此事就被耽搁下来。《松龛徐公墓志铭》乃由沈桂芬据徐氏行状而撰、董恂书丹，可靠性很大。其中说，徐氏因神光寺事件，“遂被言官弹劾。先是公入觐，成皇帝询以各国风土形势，公对甚悉。爰命公归采辑成书。及书成，名曰《瀛环志略》，未及进呈而宣宗升遐。至是言者竟以此书为口实”。[13]可见在神光寺事件中《瀛环志略》成了言者整倒徐氏的又一口实。已知对此书持赞成态度的有刘韵珂、璧昌、吴文镕、刘鸿翱、鹿泽长、陈庆偕等大员，阵容可观。对立面尚能闹到谤议沸腾的程度，可见亦非等闲之辈。据口碑，利用此书整徐氏的有

林则徐；保全徐氏的有奕䜣、祁寯藻。《山西献征》谓："言者摭书中论日耳曼联邦有西方王气方兴未艾之语，而隐西方二字劾先生，欲中以奇祸。"李慈铭则从立论大体上对魏、徐二书予以褒贬，说"魏氏此书，体大思精，真奇书也"；而徐氏"轻信夷书……似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史策先也说："立论多有不得体处……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予初见此书，即拟上章弹劾之。旋知已为同事者所纠，书版饬令毁销。"他们所谓的国体，可理解为朝贡国体制。这种从大处着眼的思路，是很精明的。史策先所说毁版系传闻，但也说明当时此事闹得很大。[14]公认的守旧人士的毁誉是反映不同著作思想倾向的良好镜子。尽管《海国图志》成书比《瀛环志略》要早，可是因如实介绍了世界大势，蕴含有新的思想，首先刺痛守旧人士神经的，乃是《瀛环志略》。徐继畬成了近代向国人进行世界新知和近代化的启蒙而受到攻击迫害的第一人。在《瀛环志略》事件中，一方为了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而取富有理性和开放的姿态，另一方则为了维护华夷内外的"国体"而大申挞伐。所以这一事件也具有新旧外交思想冲突的性质。

二、神光寺事件。多位学者对此作了辨析。此处略述发难者林则徐的心态。林氏道光末年一直很不得志。被遣戍新疆，出资垦田立功复职之后，至少在三次职务变动时应入京谢恩。也许道光帝惟恐钩起对难堪往事的回忆，一直未允召见。所任之职，又在西北西南，不是他心向往之的京城和沿海。滇督任上一再人被赴京控告，查处京控案的钦差大臣一度又是政敌琦善。林氏屡屡受挫，旧病复发，不再恋栈，请开缺回籍调治。1849 年 10 月 12 日奉旨卸任，赋诗言志："除书频添姓名标，自入关来未入朝。谬向蛮方开节镇，犹闻洋舶逞天骄……病榻呻吟犹未了，残灯孤枕警中宵。"1845 年夏在南疆时，他就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闻英夷占住福州城内之乌石山，折（拆）毁寺庙为兵房，炮火军器运入城内者无算，官不能禁，未知伊于胡底也！"回籍时又语人云："福州既有他族逼处，弟若与

之同壤，尤恐招惹事端。"可见他早已有肇事之想，而不论有无神光寺事件。归途小住南昌，门下士沈衍庆上1842年所作《上大府请罢英夷和议书》："《春秋》所最重者，冠履之分；所最谨者，华夷之辨……今督抚之尊，不止古大国诸侯，竟与犬羊之逆用平行礼……此断断不可者又其一也。"林氏答复："陈义正大，论事明切……岂非古今之至文哉！仆不敢于文中加墨者，执事必能知其故而谅之……此文垂之久远，自有定论。"[15]

咸丰帝即位后，将林氏作为执行强硬对外政策的首选人物。1850年6月12日下诏命刘韵珂等察看情形、转饬林氏迅速赴京。徐继畬到其宅查访后上奏："臣察该员林则徐，面貌虽形减瘦，言语精神尚觉清爽，惟所得疝气，委系实情。臣当谆嘱该员上紧调理，一俟痊愈，即遵旨进京，切勿延缓。"林氏虽因疝气严重，见皇帝不能下跪而暂缓北上，如此恩宠却使他大喜过望，久压心头的巨石被搬掉了！而卧榻之侧鼾睡着的异族更令他难以忍受。不惜一切尽驱"丑类"，可能是他最好的入觐之礼。因而徐氏说他"意在沽名，急欲驱逐"。刘韵珂的态度尤其值得注意。当年林、邓革职后，刘氏曾与颜伯焘一齐挺身而出奏请起用林、邓，"准予戴罪自赎"。刘氏机警多智，鸦片战争中"世多讥其巧于趋避"。然而，神光寺事件发生后，刘氏对朝廷的偏向一清二楚，本来转而支持林氏即可免祸，他却上疏："此事既系臣与徐继畬公同商办，如果徐继畬有谬误，臣亦不得谓无谬误……臣与徐继畬受先皇帝特达之知，蒙圣主高厚之眷，虽无才识，尚有天良，且非木偶，何敢因小事而肇大衅……硁硁之见，总坚定不移，断不为喜事沽名之数绅所摇惑！"据理直言，风节劲厉。后来愤而乞疾，12月21日被开缺。[16]

在京城则发生更大的人事变动。11月30日咸丰帝手诏将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革职，耆英降为五品员外郎。封建专制时代重大政策的调整，常以帝位的更迭为契机。《瀛环志略》事件、神光寺事件、穆耆革职夺级事件表明，咸丰帝即位初对外政策发生重大逆

转，其趋向是企图恢复战前中外关系格局，即单一的朝贡国制度。咸丰帝布告中外的处分穆、耆诏书，甚至连《清史演义》也认为未免近于周内。此诏集中体现了他对当时内外形势的愚昧看法，也形成了对中国近代史开端期代表人物褒贬的框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中方对外政策的这一重大转折，很快引起西方反映。英国领事阿礼国就认为徐继畬的撤职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退步。西方列强认识到采用和平方式保持条约体系已经无望。广州反入城、神光寺事件成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序曲。林则徐在两次鸦片战争初期都是重要当事人。《山西献征》谓："咸丰元年，先生入都……及召见，文宗询及林则徐为人，先生对以忠正，惟不悉外情，致误事机。文宗以足顿地，叹息者再。及先生退，语廷臣曰，徐继畬乃老成人，何谓欺诈？于是以太仆寺少卿内用。"徐氏所说"致误事机"，不单指林氏广州所为，还指其十年后福州所为。此时咸丰帝似有所悟，可是倒车已隆隆后退，调整政策人事已非易事。徐氏再被弹劾，终于罢职归里。他和刘韵珂等人，成了中国近代改革开放史上第一批牺牲品。

重新活跃于外交舞台

东方遇到西方列强挑战之后，进入了蕴藏着多种多样历史发展可能性的时代。假如能长期保持 1840 年代中期遵约和平通商的开放势头，假如徐继畬等务实官员能安于其位，中国的面貌将会是怎样？然而清廷却不无主动地再次与西方列强开战。民气可用之说盛行的广东，偏偏又出了个洪秀全，其组织动员民众的拜上帝教又取法于"夷狄"。致使咸丰朝内乱外患不断，京城不保，天子西巡。外交乏术乏人，而徐氏等人只能在乡赋闲。

咸丰帝死后，那拉氏与奕䜣联合发动政变，又出现了内政外交大转变的契机。中国以大片领土和大量利权为"礼物"，将各国公使

迎进北京，开国成为定局。京城在传统的朝贡国制度的旧旗号下出现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文馆等新事物。这次悲惨战争证明了徐继畬对外部世界看法的正确性。年过七旬、在乡授徒糊口十余年的徐氏于 1865 年被召回北京，加入了同治中兴即自强运动领导者的行列，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成为这次改革运动的红人。“外国使者，则初闻其至也，额手称得人，争相睹面，或携酒造邸以为寿，其国主亦时问起居。”

1865 年，总署奏准印行《瀛环志略》，次年再版。此书初版 17 年后才被清廷视为合法，而其再版较日本晚了七年。徐氏一如既往地坚持早期对外政策的基本观点，珍视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滥觞，参与了中外关系上一些破题儿第一遭的事。1847 年，厦门青年林针从广州附乘洋船到美国游历，两年后归国，有诗集《西海纪游草》，对“统领为尊，四年更代”的政体，电报、温度计、报纸等先进科技，及地理、风俗均有记载。这是中国对美洲的最早见闻录。诗集出版时，1865 年 7 月 16 日徐氏存阅并题：“鹭岛十二峰之外，鹏程九万里而遥。”1866 年春，由赫德提议，总署奏准由斌春父子带领同文馆张德彝等三名学生，随请假归国的赫德到欧洲游历。临行，徐氏向斌春赠送《瀛环志略》。斌春一行四个多月游历了欧洲十余国，这是中国官员第一次周游欧洲。斌春归而有《乘槎笔记》等纪实诗文集，张德彝有《航海述奇》。斌书除亲历者外，多采自“西人咸服允当”的《瀛环志略》，尤其锡兰以西地理，“惟据各国所译地图，参酌考订，而宗以《瀛环志略》耳”。徐氏作序赞扬：“……诸大国咸遣使臣驻京师，办中外交涉事务，欲得中国重臣游历西土，以联合中外之情志。顾华人入海舶，总苦眩晕，无敢应者。斌君友松，年已周甲，独慨然愿往。遂于同治丙寅岁正月，乘槎以行。凡十五国之疆域，于所谓欧罗巴各国，亲历殆遍。游历之余，发诸吟咏。计往返九万余里，如所谓英、法、俄、布、荷、比诸国，土俗民情，记载尤详。”[17]

1867 年 10 月 21 日，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在卸任前，代表约

翰逊总统向徐继畬赠送了华盛顿画像。这是中国高级官员首次受到西方国家元首如此礼遇(据传英国女王还向徐继畬赠送过圣母像,待考)。徐氏在答辞中高度赞扬华盛顿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典范和导师。他的贤德,已经成为联结古代圣贤和他以后各代伟人的一条纽带"。

西方各国一再希望清政府遣使,可是碍于天朝朝贡国制度,在礼仪问题上尚未达成妥协,于是在蒲氏向徐氏赠像、总署为蒲氏饯行等场合,酝酿出由蒲安臣这个洋人充任"办理各国交涉事务大臣"的妙法。1868 年 1 月,蒲氏与志刚启程,先后到日、美、英、法、俄等 12 国,还与美国签订有利于维护中国权益的蒲安臣条约。1870 年 2 月 23 日,水陆奔驰,不无劳瘁的蒲氏逝于彼得堡。清廷颁诏著加恩赏给一品衔,并赏银 1 万两。

攘夷派的再次反击

近代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迟迟不能对西方挑战作出有效回应,而受西方挑战比中国晚十余年的日本,迅速由攘夷转向开国,取法西方文明,发愤为雄。这使总署诸臣深以为忧。1866 年冬,总署函商于曾、左、李、郭,关于同文馆有三项引人注目的政策出台。一、继设英、法、俄文三馆之后,增添天文算学馆,延聘西人在馆教学,但不修弟子之礼;二、招考学生条件,由十三四岁八旗子弟,提高到翰林院编、检、庶,五品以下正途出身京内外各官,以及进士、举人、五项贡生;三、着徐继畬兼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上谕有"老成望重,足为士林矜式"等语。这些政策,见于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十二月二十三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䜣等一系列奏折中。其中充满忧患意识,洋溢着自强精神,与《瀛环志略》有相似的基调,有些言词也是采自《瀛环志略》。各种迹象表明徐氏是这些政策的重要设计师。

这一改革设想是比较宏伟的。其战略目标，就是让众多正途出身的人员到西方式学校接受再教育，“师法西人”，“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多出真才，宏济时艰，“则中国之自强之道在此矣”。

这一改革设想也是十分大胆的。其刀锋所向，直指传统的科举制度。它以能否提高国力、实现自强为最终价值尺度，对传统的人才标准、学问标准作了重大修正。其中包含这样的思路：儒士们终生苦修的学业，许多是驰骛玄虚、不可究诘、无裨实用的东西，即使取得功名的正途人员也未必掌握多少有用知识；西方讲求的天文、技算之学，一一可以见之实事，是他们能够富强的重要基础。为了实现自强，必须把西学作为根本之学。当务之急是让被视为国家未来栋梁的年轻正途人员尽快接受西学。

总署诸臣的设想是美妙的。可是这些招考条件一出，就意味着正途人员的极大贬值。尤其翰林院编、检、庶，历来是部院大臣的后备人员。他们本来可能沿着古老的晋升阶梯官至极品，然而今后必须再攻读素昧平生的西学才算国家的有用之才。这未免太辛苦、太冒风险了！如果实行这些政策，儒士们当做命根子的科举制度还有什么存在必要？

当时，圆明园的熊熊烈焰并未使士大夫阶级的天朝虚骄之气有丝毫收敛。他们对同治中兴的许多内政外交措施久怀愤懑，将与洋人过从甚密的徐继畬作为士林矜式更使他们火冒三丈。他们抓住能煽起广大正途人员情绪的同文馆改革设想发起反击。1867 年 3 月 4 日御使张盛藻上奏，指责这是“令正途科甲人员习为机巧之事”，“于士习人心大有关系”。被标榜为儒学名臣的大学士倭仁接连上奏：“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有用者，变而从夷……数年之后，必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于凌辰、崇实、史灵桂、杨廷熙也纷纷上奏反对。京内外谣诼群兴，前门还贴出揭帖。李慈铭还把徐氏作为主谋，把曾国藩作为祸首：“识者谓湘乡之讲泰西技算，实为

祸端；至于继畬，盖不足责尔。”总署诸臣念及“中国之宜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不避嫌怨，与倭仁等反复辩难。因浮言所惑，应考者寥寥72人，词馆曹郎竟无一人肯入馆。经考试勉强合格者仅有10人，不得不与英、法、俄文馆原有的30名八旗子弟归并一处教学。中国近代大兴西学的首次尝试以凄惨的失败而告终。这一失败确定了西学此后30年在“天朝”的可怜地位。以八股起家的科甲人员继续保持其特权，国家的富强无从谈起。[18]

徐氏七旬入京，本欲“展布所蓄，因时补救。乃清议多主排外，主张者又徒恃虚骄，而无实际，用是日䜣䜣不自得”。一再受挫，仍不改初衷。1868年春，同文馆刻印了丁韪良的《格物入门》，分水、气、火、电、力、化、算七册。徐氏作序：“余受而读之，皆闻所未闻，且一一可以见之实事，与他人之驰骛元虚，其语卒不可究诘者盖判然矣。”可惜丁书在中国同样遭了厄运，而日本却在一年后即“官许”翻刻出版，且保留着徐序。[19]徐氏自悼衰老 可天无力，于1869年以老病乞致仕归里。清明时节，在连日大风，蔽天黄沙中永远离开了守旧势力盘踞的京城。

覆国亡家关头的认同

《瀛环志略》事件、神光寺事件、同文馆事件之类的闹剧在徐氏致仕后一再重演。攘夷派用华夷观念对付西方列强无裨于事，对付忧国忧民的同胞则绰绰有余。筹议海防之争中的李鸿章、丁日昌，《使西纪程》毁版事件中的郭嵩焘，都曾被李慈铭者流击伤击倒。百日维新中的六君子，庚子之乱中的五大臣，则被攘夷英雄的屠刀砍掉理性的脑袋。这一系列事件表明，在晚清，以维护天朝朝贡国制度为天职的攘夷派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占据着主导的、支配的地位。徐继畬、郭嵩焘等具有对外开放思想者不敢公开提开放口号，很难说形成一个开放派或开国派。美国学者说：“1850年以后的半个世

纪中，在条约口岸、对外贸易和军事劣势冲击下的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是极为缓慢的。怯懦的政府稍有动作，即被淹没在惰性的汪洋大海中。”日本学者也说，在从华夷思想转化为开国思想上，日本比中国、朝鲜具有更为有利的条件。江户时代的日本，本来并未隶属于中国的宗主权之下，因而所受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华夷观念的束缚比较轻。中国因为实际上同周围各民族保有宗属关系，尽管洋务派得势，统治阶层的华夷思想总的来说是凭惰性延续着。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前的短短十多年时间里，较容易地转移到攘夷不可实行论和富国强兵优先论上来。[20]这些局外人的话使人悟出，在近代中国，华夷观念对人们的精神麻醉作用，同鸦片对人们的肉体麻醉作用相为表里，大大削弱了国人的理性应变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列强侵凌中国的最好帮凶。在攘夷英雄的喧嚣中，中国失去了一个个自强机会。大清连本土都被大片大片地割去，何谈保护朝贡国！1879 年，日本吞并琉球；1885 年，清廷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1886 年，清廷承认英国在缅甸的宗主权；1890 年，清廷承认哲孟雄（锡金）为英国保护国；1895 年，清廷丧失对朝鲜的宗主权；1904 年，英法订约，片面废止暹罗入贡中国的旧例；1910 年，不丹成为英国保护国……郭嵩焘抨击南宋以来的攘夷好汉：“惟一意矜张，以攘夷狄为义，而置君父于不顾，必使覆国忘（亡）家，以自快其议论为名高。”不幸而言中。可是，论者常把罪责归于签约的李鸿章等人；那些排斥人类共同文明成果、阻碍国力提高的守旧派，大多被视为攘夷好汉——重大的因果链被历史表象掩盖了。[21]

历史的发展并不像魏源预言的那样，是外部世界被纳入天朝朝贡国体系，而是天朝朝贡国体系忽啦啦倾塌，中国被拖入以西方为主导的多元世界。1873 年在攘夷派的哭闹中，各国公使觐见了同治帝。70 年代起，一批批使节出访世界、驻节各国，许多使节的指南便是《瀛环志略》；每次国难，都要惊醒一些志士仁人，他们的西学启蒙读物往往是《瀛环志略》。甲午战争至五大臣出洋，国难达

于极点,《瀛环志略》一版再版,几于家置一编,终于得到广大读书人认同。幸耶,不幸耶?甚至慈禧"及辛丑回銮,则于《海国图志》、《瀛环志略》诸书展诵不辍,意谓可藉窥外人情事也",但不知她相信哪个人对外情的介绍?[22]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天朝"中国终于以普通一员的身份加入国际大家庭。由于其姗姗来迟,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远在东洋小国日本之下。这种格局,使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数以百万计的人为祖先的虚骄守旧付出了血的代价,其中就有徐继畬的一个曾孙、两个玄孙。可是也应当看到,晚清的志士仁人历尽艰难曲折,毕竟为中国奠定了一个近代化的薄弱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西方有的学者认为日本和中国在回应西方的挑战方面都得了高分。这是比较客观的。纵观徐继畬的所作所为,从其开放厦、福两口到同文馆事件中主张大规模地吸收西方文明,前后20多年都在为中国的开放和近代化包括外交近代化艰难跋涉;其《瀛环志略》,则大有助于东西文化交流,为"天朝"阴暗、腐臭的黑屋子洒下了理性之光,唤醒了大批志士仁人务实地面向外部世界。今天看来,守旧士夫对他的一再攻击是赐予他的难得殊荣。

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傅增湘指出:"徐松龛先生在道光年间,即主平等外交,接受西方文明,可称维新先觉之士。"[23]谨以此语作为本文结论。

注释:

① 参见《春秋公羊传》卷18;《后汉书·章帝纪》。

② 《清鉴易知录》页159,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③ 《清史稿·交聘年表序》。

④⑩ 《鸦片战争史料选译》页35,页433,中华书局1983年。

⑤ 《林则徐集·公牍》页125—127,页189,奏疏页677,中华书局1985年。

⑥ 五台徐继畬纪念馆藏《瀛环志略》校定稿页29。

⑦ 《瀛环考略》页203,台湾文海出版社。

⑧ 本文所引关于徐氏入觐的奏疏均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档和录副档。

⑨⑪ 黄恩彤:《知止堂文集》年谱、抚远纪略。

⑫ 《夷氛闻记》页166,中华书局1985年。

⑬ 《五台徐氏宗谱》卷7,1933年。

⑭ 《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页193,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越缦堂读书记》页480－482;《近代史资料》1980年2期页219。

⑮ 来新夏:《林则徐年谱》页492,上海出版社1985年版。沈衍庆:《槐卿遗稿》页78—90。

⑯ 《徐继畬年谱》页110;页311;页186－188。《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页109。

⑰ 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

⑱ 《洋务运动》(2)页22－56;《近代稗海》辑2,页385－390。

⑲ 丁韪良:《格物入门》,同治戊辰仲春京都同文馆版;明治己巳晚夏官许明亲馆版。

⑳ 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页186,江苏出版社1988年;远山茂树:《日本现代史》页7,商务印书馆1983年。

㉑ 梁伯华:《近代中国外交的巨变》,香港商务印书馆1990年;《郭嵩焘日记》卷3,页80。

㉒ 《清稗类钞》册1,页394。

㉓ 《徐继畬年谱》页327。

●刘　泽

徐松龛诗歌略论

松龛先生从58岁革职归里之后，“晚而学诗，不主一家，稿出，人争诵之”，[①]是誉满乡里的晚成诗人。

我国许多诗人，往往与松鹤琴酒等“诗佐料”有种天缘，松龛与松和酒就缘分不浅。归里执教时，曾作《自题种松小照》，言雅号之来历，发孑立无嗣之慨，抒枯杨生荑之望云：

> 昔人闭户著书早，种松皆作龙鳞老。我此苍颜亦种松，非关铅椠穷幽讨。忆我生时感慈梦，盆植小松供三宝。科名仕宦两平平，徒愧出山为小草。中年似续频关心，捧壶孑立萦怀抱。偶然作此种松图，意望萌芽发丛葆。迄今白发已披肩，未见呱呱觅梨枣。每顾此图一慨然，凉德自惭申默祷。无后之愆难谢责，敢怨天公同伯道。数卷残书付有人，荑发枯杨亦自好。

其中“忆我”联下自注道：“畬生时，先母续太夫人梦人赠盆植小松，置佛座前。先师谭兰楣先生为命别号曰‘松龛’。”可见松龛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雅号本有诗趣存焉。而更为奇怪的是当他吟此诗后，天公果似行起仁道：马氏妾居然生一女婴，而且由于产前梦见松根长出新芽，起名“松芽”。他在超山书院获得弄瓦喜信，喜赋《归里有期》云：“一芽初试抱，却笑瓦同璋”，一“抱”一“笑”，尽传喜悦心态，并赶紧注明一笔：“上年七月生一女，名曰‘松芽’，余犹未见也。”大概因为松树与他结有如此奇缘之故，往往见松即吟，并兴

寄遥深，如七律《题灵遭溪画松和原韵》云：

秃爪苍鳞自倚天，春花何处斗娇妍。孤高只许明蟾照，丑怪端应野鹤怜。石友荒寒长伴影，竹孙小弱未齐肩。涛声隐隐生虚壁，恍在空山落日边。

在他所描摹的画境中，那孤高倚天只许明月照的苍松，那空山落日中的隐隐涛声，以至伴松的荒寒石友，小弱竹孙，春花野鹤，无疑是寓含着诗人人格的写照，境遇的比拟，甚至就是一位晚清名臣在日落空山似的王朝末运中的浩叹！

松龛虽洁身自好，不取分文不义之财，淡泊一生，然终身嗜酒，每餐必饮，革职归里后囊中无几，又无酒友，感到独酌浊酒少趣无味，翌年就藉口多病而欲戒酒，作《戒酒》自嘲自慰道：

东坡十诗九言酒，其实量小不容斗。乃知酒是诗人料，何尝濡笔定濡首。渊明一生惟耽此，摘菊宅边杯在手；远公莲社苦相邀，一闻戒酒攒眉走。迨后乃有止酒篇，或亦未尝谋诸妇。我与曲生素莫逆，五十年中不相负。浮白飞觞那计巡，醉后悬河奔出口。迩日衰残肺病多，河鱼腹疾时时有。生平酒徒半陈人，独酌徘徊苦无友。举杯邀月月不来，芒角槎牙撑枯朽。本欲消除万斛愁，翻令愁肠回且九。不如暂免醉乡游，君子之交淡可久。从此酒惟诗里见，卮言聊引龟堂叟。

当了超山书院山长，得其所乐，有酒有友，肺病也好转，即写《弛酒戒戏作》，借曲生之口大谈酒能延寿成仙，消灾免难，交友谈心之功，列举诗人阮籍、刘伶、陶潜、李白、苏轼等无不饮酒自适，而后嘱告主人云：

君今六十余，仕宦遭三黜。皤然老秃翁，笔耕非肉食。纵或修小名，讵复一钱值。醉卧酒家垆，谁屑加诃叱。君又喜汉书，时时手自乙。下酒最相宜，无酒恐萧瑟。君近好为诗，撚髭吟不辍。斗酒入枯肠，能助生花笔。百利无一害，胡为见遗轶。

主人听了曲生的这席话，觉得句句在理，酒可使人远名利，避是非，

助读书,催诗思,便感到几年戒酒,有愧旧友,长揖谢罪,申言“与君修旧好,壶觞时在侧”,日醉酒乡了。

从其松、酒情趣中,得知松龛本有诗人气质品格,更喜“诗佐料”,诙谐风趣,至老未减。有这份诗家才气品格,加之学博识卓,宦游四方,为官际遇的磨炼,国内风雨的涤荡,西方思潮的冲刷,风土民情的影响,早已洞达人生世事,老而“退密”,寂然沉思,神与物游,往昔的人事物色,自然会卷舒于眉睫之前,吐纳珠玉之声也就不足为怪了。他在《谢政归里祭主文》里说:“方今时事艰难、中外皆无从措手。幸以微罪归田,未必非塞公之福。”在《感怀杂咏》中亦云:“使命既已毕,吏议斥编氓。幸补生平缺,何惜抛簪缨。曲终还奏雅,岂曰未奇荣。”他在深解时事艰难,国家内政外交束手无策,大清帝国江山已经不大不清的情况下,将革职归田当作塞翁失马之“福”和曲终所奏之“雅”,自感“奇荣”的心境中,咏歌吟诗,当然别有一番情趣在笔头。“余生平未尝为诗,年过六十,乃偶为之。授徒餬口,不能肆力于此。钉铰箍桶,尝自鄙笑。”[②]这类“钉铰箍桶”之作,总计250余首,不拘一格,无论内容、形式、语言、风格,都自然而然,触景遇事,随即咏叹,没有虚浮语,尽是真性情,朴实清淡,一如其人,兹略论述:

山村水乡的风俗世态画

松龛32岁中进士,朝考荣获第一。在考卷《政在养民论》中写道:“古圣人陈谟赞化,不曰治民,而曰养民。养之云者,养其身,并养其心。是故教养二者,皆可以该之曰养。”“其养民之身,不啻自养其身,而疾瘼之无不周知。养民之心,不啻自养其心,而慆淫匪彝之无不规于正。”“若夫管、商之权谋,富国而不知富民,固不足以言养。汉之文、景,亦庶几矣,而厚其身未正其德,于养之义,犹未尽也。”终其一生,以此为本。63岁教书餬口之时,“因闻海运短绌,京

师乏粮，旗人有投河自尽之事，转思转惧，遂致呕血发狂”，病中作《筹运西米策略》一文，不料陆侍御拾为折料，得旨交部，农部议驳。自己觉得犯了“不在位而谋政”的错误，“揆之素位之理，亦大相剌谬”，“以此深自咎悔，绝口不谈时事，邸报亦从不借看”。[③]但不到一年的光景，得知孔云鹤“荣晋台澎观察之信，为之忭舞，七鲲片土，又可得数载绥安。不特为台民喜，而兼为闽民喜也”。而且分析往昔台湾：“辄有变故，固由民情浮动，亦半由在事者必求饱橐，兼欲邀功。入苙而招，恒所不免”，故劝告孔云鹤要以“廉静”、“迂拙”作为治理台、澎的要诀。[④]正因为他自衣还乡之后，仍对百姓忧乐念念在怀，所以在他的创作生涯中，继承《诗经·国风》、汉乐府、南朝民歌的传统，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爱者歌其情，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先看其关于北方故乡的民瘼之歌两首：

> 富食米，贫啖糠；细糠犹自可，粗糠索索刷我肠（初碾者为粗糠，再碾者为细糠）。八斗糠，一斗粟（俗称为“八兑一”）；却似抟来沙一掬。亦知下咽甚艰难，且用疗饥充我腹。今年都道秋收好，囤有余粮园有枣；一半糠秕一半米，妇子欣欣同一饱。昨行都会官衙头，粒米如珠流水沟；对之垂涎长叹息，安得淘洗持作粥。
>
> ——《啖糠词》

> 隔巷相呼犬惊扰，夜半驱驴驮炭道。驴行黑暗铎丁东，比到窑头天未晓。驮炭道，十八盘；羊肠蟠绕出云端。寒风塞口不得语，启明十丈光团栾。窑盘已见人如蚁，烧得干粮饮滚水。两囊盛满捆驴鞍，背负一囊高累累。驮炭道，何难行；归时负重来时轻。人步伛偻驴步碎，石头路滑时欲倾。日将亭午望街头，汗和尘土面交流。忽闻炭价今朝减，不觉心内怀烦忧。价减一时犹自可，大雪封山愁煞我。
>
> ——《驮炭道》

这两首诗置之白居易的《新乐府》亦为上品。其题材富典型意义，思

想倾向性很强，对比强烈而集中，其语言形式，三、五、七言相参，灵活自然，间用方言俗语，充分发挥了乐府民歌的优良传统，无怪雅俗共赏，“人争诵之”。据方闻教授《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载，民国十八年夏，阎锡山邀冯玉祥将军来五台，宴席间，冯举杯回敬主人说：“贵乡贤徐松龛先生全集我已读过，其中《啖糠词》《驮炭道》两章，尤能道出当地人民疾苦，我都能背诵。”遂高声朗诵，举座感叹。松龛此类诗歌都有详序。前首序云：“晋俗俭啬，石岭关以北，寒瘠尤甚，丰年亦杂糠秕，司牧者宜念之也。”旨在告诫地方官了解民俗风情，关心乡民疾苦。后首序说：“民间农隙，皆以驮炭为业。余所居之东冶镇，其聚处也。自幼目睹艰辛，杂方言作《驮炭道》。”乡俗民艰，皆亲目所见，故言之切切，动人心弦，农民驮炭往返之苦，无异于乡民之坎坷人生道路。

松龛在闽粤一带为官十四五年，江南成了他的第二故乡，那里风情习俗对他感染很深，晚岁仍萦绕于怀，有《三江竹子词》十二首，分咏闽江、珠江、浙江的水乡风光和男女欢情。

《闽江》之二是：“篾篷重叠遮太阳，惟有船旁露水光。鸦鬓青衫水中照，何似苏州娇小娘。”之三是“石尤风紧不开船，山头嫩绿照娟娟。行客自愁侬自喜，船中还住两三天。”之四是“水口沿村集暮鸦，送郎登岸莫嗟呀。归时相访南台路，不在船中即在家。”其二之小娘，临河自照其鸦鬓青衫，何其娇美可掬！其三之风紧天留客，小娘暗喜，心态毕现，其四之送郎时安慰叮咛再再，亲切在耳。

《珠江》四首一组船妓联唱，描绘了广州城外海珠小岛周围的景象，妓船像“无数玻璃水光晃”，“舱门三洞有层阶，素馨球子幔悬罗，盆兰分向两边排”；船妓们的衣着是“短衫白袷净无瑕，绣出连枝五朵花”，生活是“宿醒未解怕梳洗，勉自摩挲两鬓鸦”，“昨宵送客花埭东，归来却又阻南风；小舟一叶来相傍，鲜鲜摘得荔枝红”。从中可窥南国的繁华。

《浙江》四首中的第二首，摄取的是一个船家招待船客的特写

镜头，阿哥"宰雏鸡"，"阿嫂弹筝攘皓腕"，未及笄的"阿妹酣歌"。船客之兴高采烈自在言外。第四首写一位女子送别情郎："隔江塔影认钱塘，停桡相送泪双行，凭君莫道西湖好，争似之江意思长。"中途告别，远望塔影则情游，俯视江水则意长，处处言景，句句道情，含思宛转，牵人心肠。

松龛不只对妇女的似水柔情有如此的细笔描摹，对妇女的抗暴火情亦有长篇记述。《房烈妇行》歌颂了介休县义堂镇一位寡居贫妇对一个恶少的英勇搏斗：歌行先以比兴入笔："劲草生岩阿，不畏终风疾。美玉投泥中，不变瑾瑜质"，揭其题旨。而后写其智勇抗奸："烈哉房氏妇，缝纫居篷筚。邻家恶少年，斜盼涎殊色。游语似相挑，霜面詈狂贼。意恐去复来，短刀袖藏密。狂且心不死，蹈隙横入室。哭骂邻不闻，裸体遽相逼。大呼出短刀，奋手刺其腹。狂且负痛走，淋漓血喷溢。"虽然"妇以目睹裸形，不堪其辱"，"乘间倒投水瓮死"(《序》)，造成了不应出现的悲剧，但房氏得到旌表，恶少受到绳律，大快人心，有益风化，作者以"风化良可述，我是旧史官，表扬宜载笔"作结，还是深意犹在，不无教育意义。松龛所看重的是"正气塞天壤，终古未尝息"，即我们中华儿女疾恶如仇、坚贞不屈的传统美德。

《房烈妇行》中虽有"匹妇撑纲常"等字句，但他不主张扼杀情欲，他所说的"纲常"、"名教"，并非村学究所理解的狭隘意义。《书王印川广文诗注后》一文对"男女大欲"有其开放性的高论：

> 盖诗人吐谈意兴，与宋儒讲书语录，判然两事。……忠孝至性与男女大欲，同出一源，欲其真，不欲其伪，欲其节，不欲其流。流而无节，岂特男女之淫秽。……忠孝之流而无节，其失为愚；男女之流而无节，其失为淫秽。清浊虽异，消息自同，然不得戒愚而废忠孝，又岂能惩淫秽而废男女？圣贤豪杰大抵不远人情。……《风》诗之义，发乎情止乎礼义。窒其情而不使发，圣贤亦不能，但贵乎能止耳。今有人曰："我性不好色。"是

伪也。……娶寡妇为已失节，伊川程子之言也。宋以前尚无此说。孔子为人伦之至，而伯鱼之母，子思之母，子上之母，三世皆改适。使己妇失节，又陷娶者以失节，圣人忠恕，不宜有此。……伊川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者，匹妇能毅然行之，诚令典之所重，志乘之所必详，苟有其人，宜竭力表彰焉。不能守而改醮，亦常情耳。彼固为贤，此亦中人，未为不肖也。慕其名而强效之，客气一衰，大缪随之矣。

文后"自记"云："村学究见此议论，未免惊讶，然皆平正通达之言。"这段"平正通达之言"，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松龛这位晚成"诗人吐谈意兴"，"不废男女大欲"，"欲其真不欲其伪"，或歌烈妇，或咏船妓的深意所在。

独树一帜的山水画轴

在探讨松龛山水诗之前，先看其《拟行路难》八首之一："陆行忽登舟，风波澒洞使人愁。水行又登陆，山路崎岖伤马足。狨啼猿啸不可闻，貂裘已敝空瑟缩，不如归去闭柴门，败絮自拥饱饘粥。"陆行水行，风波弥漫，人愁马泣，衣破裘敝，这是他执行公务于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之时，考察险关隘口、山川形势之际的实录，并非单纯的兴象寓意。由于当年王命在身，忠于职守，养成了他察地理、重防务的习性，山关河津的社会政治军事的功利价值，引起他的由衷热爱，铭刻在心，在当时就可能产生过某种程度的审美愉悦。当他"不羡人间万户侯"，"归去闭柴门，败絮自拥饱饘粥"时，精神生活是"升沉已作烟云过，身世全归梦幻中，独系神交惟偃室，曲高难和意难穷"(《顷乘障上党有留别诸绅八诗……再叠前韵奉酬》)，在梦幻神交中，往日的江河峰峦成为千姿万态的审美意象，当然会信笔绘成诗之画境，然而他毕竟是位受到乾嘉以来考据派影响的地理学者，因而他所写出的山水，既不同于诗仙李白梦游中的浪漫雄

奇，更有异于诗佛王维静观中的幽静闲雅，而是一笔不苟的栩栩写生，并加详尽的考证注释，有如《水经注》，更似导游图，可称作独树一帜的山水地理诗。有一首别题为《陈剑芝同年擢粤西观察使，将有岭表之行，追忆昔年宦辙所经，赋长篇送别》，看了这30个字的长题，就知他所写的山水路途纯属纪实，要为友人提供行程路线，指明路标，然而它确是一首别具匠心的送别诗，并非路线图。为了理解其内容、艺术的独特，不妨连同原注并录：

我昔游桂林，山川犹在目。君今赴岭南，万里驰轮毂。试以我所经，为君徐往复：夏口挂轻帆，岳阳泛舻舳。浩渺湖水平，湾回三十六。九面望衡山，绿山潇湘复。南道走零陵，渐睹奇峰秀（永州山形已似粤西）。全州粤门户，舍舟还就陆（水路可达桂林，惟斗河淹滞特甚，故仕宦多由陆路）。夹道多乔松，疏枝云自宿（全州之南，驿路皆植松，高至十余丈）。最幽怜绝处，桃花间修竹。过此为兴安，湘漓泉一掬（湘漓本一源，出兴安县。北流为湘，南流为漓。因一水而相离，故名）。胜绝严关口，奇山兹焉伏。如笋如浮屠，双角或为鹿。平地不相连，遥瞻似林木，行人入其中，迷途互相逐，竟疑八阵图，不止川中独。行行及桂林，城垣山所筑。风洞为北门，凹凸排崖谷（此门在风洞山峡）。峨峨独秀峰，苍黛如膏沐（独秀峰在城中，平地拔起）。阛阓周四围，一拳天际矗。城西象鼻山，连蜷舒不缩（山在水中似象鼻，船出其间）。中间过估船，张帆展蒲幅。南行驶八杆（粤西船皆双桅交缚，作八字形，谓之八杆船），下濑波洄洑。木棉烂如锦，杜鹃红簇簇。猿猱攀悬崖，小石时翻蹴。天半忽槎牙，万笏攒如镞。腭眙问舟人，阳朔固耳熟。舟过帜江亭，峭壁悬清肃（阳朔县城在江岸，两峭壁夹之，谯楼榜曰“帜江亭”）。极目望峰巅，仙灵气纷郁。过眼留云烟，宛然画可读。粤山此最奇，余者无庸渎（粤西山水之奇，至阳朔浦而止，余无足观）。

从湖北夏口到广西阳朔，水陆路线分明至极；沿途松林花木，山水风光，宛然如画在目。尤其是严关、桂林、阳朔一带的山奇水秀，漓江两岸的美景胜境，移步赋形，天姿尽绘。山水美与地理学相结合，似给友人带了一轴山水画，一张指路图，岂非送别诗中的异品？送友人赴任高官，免不了祝贺之词，希望他做“循吏”，布“仁风”，“抚绥百姓”，使之衣丰食足，“政成君亦暇，看山涉林麓。奚囊定不虚，新诗且盈轴。作诗送君行，举觞歌百禄”。这样的结尾，别有情趣，希望友人，治政之暇，像李贺一样，“每旦日出，骑弱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所得，书投囊中”，归府后取出，回寄于己。

如是之作，集中不少，且举《太行绵亘上党之东，险隘林立，述其在潞安境内者，示朱生甫》，以示南北山水之异彩：

> 太行走北干，山势何巑岏，河内与上党，两界起峰峦。潞州扼其吭，形胜留不刊。壶关汉名县，大河流急湍（大河村为壶关东南冲要，东通河南林县）。新旧两窟窿，五丁凿奇观（大河村之西，有新窟窿、旧窟窿。凿为山洞，以通道路，长至百余步）。其北为玉峡，高岭路纡盘（玉峡关在县东北，中隔销军岭，极险峻）。桃、花隔两园，斗绝不容攀（桃园梯在玉峡东北，花园梯在玉峡东南。路险仄，仅通行人）。林虑近可接，望之云漫漫（林虑山在林县境内，与壶关诸山接连）。再北为潞城，虹梯空际蟠（虹梯关在潞城东数十里，凿石为磴，盘回十余里，阔仅二三尺，行人无敢骑而过者，其地设有巡检）。鸟道百回折，投足欲走丸。樵苏尚彳亍，何人敢据鞍。奇险由天造，一夫可以完。下有笋兰岩，峨峨石剑攒。……

在描述这些险要奇观时，或将关山之名略加点化，以状其奇，如“桃、花隔两园，斗绝不容攀”，一个“隔”字，点出了桃园梯、花园梯隔着玉峡，陡绝险峭，对峙壁立；或就名作释，铺绘其险，如对虹梯关，先写其盘曲空际，鸟道百折千回，丸石圆滑，善攀小径的樵夫也得走走停停，有一夫守关万夫难进之势，再写下有如刀似箭的石岩

从立，俯视心惊肉跳。然如作者不加注释，读者会误“桃花”非二梯道。这不能不说是松龛山水诗的一大特色。

至于专写关山的篇章，更为传神，令人信实，因是作者“皆亲行履勘，系之以诗，告后来之乘障者”。这方面的代表作，当推《辽州五隘》。其中的《云头底》，起句横空而来：“桂林之山天下奇，武夷之山奇兼秀。我昔游览叹观止，二者寥寥空宇宙”，没想到在辽州（今左权县）遇到了更为罕见的奇峰怪峦：

> 远望惟开一线天，却如穴中两鼠斗。过此山石变横纹，奇形怪状都奔凑。头岭拱立或如人，岭半攫拿恒似兽。横看旋转成螺髻，侧似孤危同鹭堠。何来天半朵云垂，又疑绝壁重楼构。藓斑苔印杂青苍，一皱一皴皆瘦透。

岭顶岭腰，横看侧看，形态各异，远胜武夷山的奇秀，无怪他“驻马多时看不足，惜此奇尤生僻陋。若教移置近名都，蜡屐雕鞍游恐后”，感叹不已。

云头底一隘奇秀惊人，《黑龙洞》、《黄泽关》更为神奇骇目：

> 古洞藏深井，其井不知几千几百尺。窥之黝黑似有风怒号，儿童不敢投以石。夏云擘絮走雷霆，此井流倒忽喷射；奔腾落涧竟喧豗，一条白练界青碧。黑龙在何许？无形亦无迹。但解利农田，时时降雨泽。

这是神奇利农的黑龙洞。黄泽关有如龟首，其右曲折而下，有十八盘之险，“以大石从崖边滚下，万人亦不能过”。其险处：

> 黄泽关，行旅何班班。万年神龟锁灼不得死，化为土石昂首悬崖一壑之中间。一径蜿蜒盘颌下，如绾秋蛇往复还。百人守之惟礌石，万夫到此亦难攀。

这两首涂着浓厚的神话传说色彩，运用杂言体，起伏顿挫，犹似其地之龙藏龟伏，怵目惊心。

这些雄关险隘都有军事价值，在《大摩天岭》中，描述其“去天惟一握”之高，“磴道盘回十二里”之曲，“片石峨峨如笋角”，“仄径

弯环愈绵邈"之险狭后，大发感慨地说：

过此一线临深涧，何人走马能横槊！守以巨炮卒百人，万骑云屯且跄踔。如何胜国当季年，夜半贼来人不觉？乃知地利赖人和，古训昭然宜善学！

作者联想到当年李自成率兵夜度摩天岭进攻北京而亡明的故事，让人明白"地利不如人和"，"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古训。在勘察《抓角岭》时，了解到此地有利列营屯军，却有害居民输米运盐，便发出"利害两无全，何言成与毁"的慨叹，主张放弃军事行动，保全民生利益。蕴含功利价值于山水诗中，算得上不无观赏借鉴意义的异花一枝。

诗国星空的彩色巨照

松龛诗文中对我们古老诗国的诗笔巨擘们作过种种评述，在一些读诗诗中，大赞李白、杜甫及其传人元好问。称李杜是"摩天两赤帜，亭亭自千古"（《读李太白诗》）。

然而，这两杆亭亭千古鲜艳夺目的摩天红旗，风彩迥异，各有千秋，在《读杜甫诗》中对比云："太白诗如仙，工部诗如神。神与仙异趣，体物太无伦"。李白是"星辰下精气，岳渎动殷辚。挥毫百灵集，穷幽万鬼驯。云车谒阊阖，气象干天人。一呼风雨至，动植随之新。"上天入地，唤风呼雨，挥灵驯鬼，异彩纷呈。杜甫与之完全不同，忧国忧民，怜孤悯贫，直面人生："聪明且正直，所忧国与民。哀吟梦魏阙，涕泪悯孤贫。与仙虽异路，于人转益亲。馨香延百世，位业此为真。"尽管他说"我读太白诗，如与仙人语。袖中出明月，清光照天宇"（《读太白诗》），思入莲峰帝乡，忘却人间烦恼，得到一种超脱红尘的享受，然而"忧国频年白发生"的诗人，还是觉得杜甫更"亲"更"真"，因而赞颂吴梅村诉说兴亡的《圆圆曲》，更为"生平学杜皮兼骨"，"泪痕多似少陵诗"（《读元遗山诗二首》）的元好问高唱

赞歌，大鸣不平，不仅誉为“（石岭）关北诗人鼻祖”、“杜林嫡派”，而且写了一篇有如传记的七古长诗《过野史亭》，为金元之际的这位诗坛明星拍摄了一幅彩色巨照。

《过野史亭》共46句，322字，从元好问金亡不仕、哭行归乡写起，列叙其诗、史两方面的重大贡献，一直写到死后的寂寞凄凉，为之大鸣不平，对这位长期不能被人正确理解的一代宗匠，作了实事求是的全面评价。

首段十四句是记述元好问国亡不死，执笔集诗存史，编辑《中州集》的独特贡献：

> 繄昔遗山遭国变，白衣行哭归乡县。沧海横流身不死，兵火余生存笔砚。女真建国年近百，诗词不乏金闺彦。中都已弃汴京焚，累朝无复朝存文献。遗山乃构野史亭，河朔篇章搜罗遍。中州一集成巨编，微寓褒讥留小传。顿使金源生颜色，不与夏辽同鄙贱。

他认为元好问“遭国变”而“身不死”，为的是“存笔砚”，“成巨编”，“使金源生颜色”，“不鄙贱”，决不是贪生怕死，不忠不贞。这确是异代知己之精论。《金史·文艺传》有云：元好问“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时金国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乃言于张，愿为撰述。既而，为乐夔阻而止。好问曰：‘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亭’。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今所传者，有《中州集》及《壬辰杂编》若干卷……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今存《中州集》，共收金代249位诗人诗作1980余首，36位诗人词作115首，每位诗人名下附有小传，以诗传人，以诗存史，开创我国断代诗之新体例。“元人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故于三史中，独称完善。”⑤胜于同时所修的宋、辽二史，顿使金源生色。这是元氏构筑野史亭的本愿，对中华文化的卓越贡献。

第二段八句，略抒对忻州牧汪本直重建野史亭的感激以及对无人给元氏建祠纪念的遗憾后，就转入第三段，评赞元氏的诗学成就及其在诗歌史的重要地位：

我思雁代古边陲，长枪大戟夸豪健。溯从汉魏迄三唐，太原以北无诗卷。闲气蟠郁生异人，杜陵英魄一朝见。白虹紫气吐眉睫，扛鼎十年力不倦。鞭笞灵怪入肝鬲，右手风霆左霜霰。睥睨陆范俯虞杨，山魅野魈挥以扇。石岭云霞生光采，开宝元音今再现。

他赞颂元好问是禀天时地理特殊之气所生的“异人”，太原以北自古未有的诗雄，杜甫英魂的再现，因为在其仕宦十年期间，直面金朝腐衰灭亡，一面艰难从政，一面奋力创作，写下了反映生民涂炭、国家动荡的丧乱诗篇，鞭挞蒙古贵族的残暴，指斥宋、金统治者的短见，还批判江西诗派末流的脱离现实，笔力千钧，风格遒劲，成就不亚于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中的陆游、范成大等，更高于元代四大诗人中的虞集、杨载等，是一位承前启后的跨朝代的文学大家。在金、元之际，他的诗歌犹如开元天宝间的李、杜之音，是一位“跨苏黄，攀李杜”的诗坛钜子。然而，当松龛在主持四川乡试时，见到的却是“浣花草堂开夕宴，东坡祠宇太白楼，词客常将萍藻荐”。李白、杜甫、苏轼等大家备受人们慕拜敬仰，“独有遗山长寂寂，难与杜公分麦饭”，这未免太不公平了，于是在结尾段发出要理解、重视诗人，“为构祠堂浇薄奠”的呼唤。当修建起“元遗山祠堂”之后，他就题匾“杜林嫡派”高悬祠堂门的内额之上。

邵祖平《无尽藏斋诗话》云：“古今诗人学杜甫者多矣，而卓然可自成一家者，李义山、黄山谷、元遗山三人而已。李学杜学其雅，黄学杜得其变，元学杜得其全”。邵氏所说的“全”就是松龛《读元遗山诗二首》之二中所说的“生平学杜皮兼骨，偶效苏黄亦示奇。禾黍故宫歌代哭，泪痕多似少陵诗”。松龛高度赞评遗山，主要着眼于遗山继承发扬了杜诗爱国忧民、反映时代现实的精神，是历代林林总

总学杜者中的嫡派，也与他同遗山是异代同乡，并又心同志合、忠国爱民直接有关。他在《王印川诗集序》中说："山右诗人，右丞、柳州、香山，杰出三唐。嗣后有作者，皆在太原以南。石岭关之北，……地近边塞，自古列郛开屯，名将接踵，独未有以诗鸣者。……至金源季年，忻州乃有元遗山，直接东坡、昌黎，蔚为大宗，故关北诗人以遗山为鼻祖。遗山而后，嗣音绝少。"从这里可以看出他锺爱家乡诗人，由热爱到研究，经历了一个由"直接东坡、昌黎"到"生平学杜皮兼骨"，从"关北诗人鼻祖"到"杜林嫡派"的体认升华的过程，挥笔描绘"杜陵英魄"元遗山的高大形象，寄寓着自己的人格理想和诗学理想。

太平军和捻军的系列侧影

1853 年春至 1855 年秋，松龛奉命参予了山西境内防堵太平军、捻军的活动，这在他的诗文中多有反映，是以"急公"、"为国"、"爱民"、"卫京"之名来诛伐"匪""贼"，悼念"忠魂"的，当然是他诗作中的糟粕。不过，由于重在叙事写实，又详加注释，从侧面显示了农民起义军的英容烈迹，同时也暴露了清朝各级文臣武将的腐败无能与勾心斗角，不失为可信的史料，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如《感事五首》、《哭祁幼章方伯》等作，记述了洪秀全初起广东、后在广西金田起义，建立太平天国，直至占领南京的过程；《上党即事留别诸绅士》七首、《哀平阳》等，又记载了捻军与太平军在陕、晋、豫交界处配合作战的情况。兹举几首，以示一斑。

《感事五首》之二写的是 1853 年 1 月太平军攻克武昌、汉阳的情景：

> 巍巍黄鹤耸高楼，锁钥东南控上游。雷出地中鸣鼓角，云骤天半压城头（武昌初陷，系贼用地雷轰塌西城。汉阳同时亦破）。青磷夜照龟蛇尾，白气晨迷鹦鹉洲。倏忽金汤填瓦砾，几

村波静掉扁舟。

尽管黄鹤楼巍巍高耸，龟蛇二山牢锁大江，天险地设，似乎万无一失，然而太平天国大军，埋地雷，燃火线，轰隆隆炸毁武昌西城，烟柱土柱冲天，护城河填满瓦砾，鼓角齐鸣，一举攻入武昌，随后破汉阳，何其神智勇武！其五写出安徽捻军的攻城斩将，愈战愈强，清军将士的顽抗虚弱，不堪一击：

皖公山色早模糊（安庆先破，皖抚蒋蔚堂死之），淝水重颁使者符（安庆既陷，移省会于庐州）。兵满八公皆草木，城空百雉付萑蒲（江岷樵中丞舆疾转战，入庐州，守备单弱，援兵屯数十里，观望不进，城遂陷，中丞死之）。登陴徒见张髯怒，舆疾犹闻奋臂呼。江令死绥周处陨，淮南从此乏良图（周敬修漕帅在淮上，捻匪犹未敢肆行，周寻以老病卒于军，捻匪遂不可制）。

1853 年，太平军北伐，攻入河北、河南、山西，捻军相应配合作战，攻入陕西，经晋南进逼北京。在山西南境设防堵截的官兵乡团横遭袭击，接连败退。这在《上党即事留别诸绅士》之三有所记述：

从来表里有山河，天险才容一骑过（济源西界有隘，曰“封门口”，一夫当关之地，即汉志垣县所谓邵郫之阨也。本议设防于此。河东道张鹤生因其地系河南所辖，防兵出境，须加盐菜银两，弃而不守。贼遂由此窜入）。揖盗西来谁主阃，弃军北去尽投戈（都司玉恒先遁，守备景亮随之）。纷纷塞路黄巾满（贼由绛县入平地，遂不可制），藉藉填渠白多骨（平阳、曲沃两城，屠戮最多）。逸寇缓追真恨事，路人指点说摩诃（贼由摩诃岭东窜，诸将逗留未进，托将军孤军遇贼，致受枪伤，贼遂由潞黎窜出）。

在作者“揖盗”、“逸寇”、“弃军”、“投戈”、“缓追”的怨声恨气中，我们看到的是义军节节胜利的投影，清军望影即逃，平阳稍抗，就遭到惨重的打击惩罚，从而清军诸将畏首畏尾，抱头鼠窜，更不敢进行任何阻截。从《哀平阳》来看，1853 年 9 月的平阳之战，在山西最

为激烈残酷："愁云暗淡风酸烈，鸡犬无声烟火绝。夜来寒月照空城，惟见纵横抛白骨。驱车欲进马不前，填辙骷髅粘乱发。我闻此地古尧都，勤俭俗与他方殊。浩劫胡为不择地？三万男女一日屠。"显然，百姓遇难的也不少。为什么造成这场劫难呢？"传闻闾左有郑姓，编管岭南及宽政。导贼来此肆荼毒，磨牙大恣虎狼性。一夫自复睚眦仇，万家遂并婴孺命"（临汾屠者郑福犯罪，充广西军，投入贼夥，引贼攻平阳，城遂陷。福寻为贼所杀）。从这些记述里，我们既看到起义队伍不够纯洁，有挟私恨报仇的人，也看到义军军纪严明，发觉郑福居心不良，杀害无辜百姓，便立即处斩。这是一则生动具体的史料。应该说松龛这类作品也可算一种"史诗"，至少是太平军、捻军的一系列侧影，客观上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何正确评价太平军、捻军功过，是史学界专家的事，不是本文所要探索的课题。本文旨在以其乐府民歌、山水画卷、诗星彩照和农军 刂影等作，说明徐松龛是一名多姿多彩、不拘一格的晚成诗人。

（作者刘泽，1933 年生，现为山西大学师范学院教授。）

注释：

① 全集阎锡山《叙》。

② 全集《王印川诗集序》。

③ 全集《复吴思澄比部世兄书》。

④ 全集《致孔云鹤观察书》。

⑤ 《四库全书·遗山集提要》。

●薄子涛

徐继畬诗中的复仕思想

严格地说，徐松龛是一位从封建社会未期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的政治活动家。对他的全部著述，应该这样评估：主体倾向是表现了他的政治主张、措施及其相适应的思想、愿望和追求。其间，最鲜明，最直接的论据，还是他的那些经世奏章、条陈和有关文章。即使是驰名中外的《瀛环志略》，从科学意义上界定也不能因此而将他归类于地理学家的范畴，而更主要的意蕴仍然是一种政治的、思想的内涵。那么，他的晚成诗的价值取向，当然也并非关注诗自身特性的缘故，而是一种过多的跟政治的种种联系以及对社会功能与作用的思维方式在诗歌中的宣泄、传达。作为封建社会的一名杰出政治家，其宣泄、传达的文学效果就自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性和局限性。

松龛先生的父亲广轩跟著名文学家高鹗同榜，且有深交。诗人薄承砚(字石农)，是广轩的门婿。因此，松龛不仅就学于父，也曾受教于高鹗，同时跟石农"以文章相切劘"(徐松龛《傲霜园诗抄序》)，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文学教养。而他从道光六年(182?)起，即从政弃文。直到咸丰二年(1852)被罢官归里后，才"暇则浏览古书，间作小诗以自娱"(《复吴思澄书》)。他说："余生平未尝为诗，年过六十，乃偶为之。授徒糊口，不能肆力于此，钉铰箍桶，尝自鄙笑"(《王印川

诗集序》)。这虽属松龛自谦语,然而"不能肆力于此"一语恰隐隐透示出其诗的思想与艺术的审美走向。

纵观《松龛全集·诗集》(上、下卷)、《退密斋吟稿》(文中引诗均据此)中的二百余首(组)诗作,可以看作是对诗人的政治生涯、思想轨迹的延续和补充。在罢官与授徒、忠君与爱民、开放与专制、观察与思考等一系列矛盾冲突中,诗人曾困惑、苦闷和躁动不安,可有一股燃烧着的复仕之火,骤然照亮了他几乎所有的诗行,添了光亮,同时,也在字里行间投下了阴影,涂上了灰色。令人吃惊的是,诗人异乎古代众多归隐的硕学名儒,这股火居然烧通了他东山再起的复仕之途!这是诗人微妙的政治背景所致,还是由于诗歌的功能?值得探究、思索。

一

咸丰二年秋,松龛被谪于四川乡试正考官的归途中。是时,诗人已是"仕宦遭三黜"(《驰酒戒戏作》),年已58岁。从这时起的近10年里,诗人过着满腹忧思、彷徨苦闷的设帐授徒的生活。他的几乎所有诗歌,都是在此期间创作的。

按理说,这时的诗人仕途破灭,政治无望,且年事已高,应该像他所言,有"早悟投闲有清味,罢官已悔十年迟"(《到平陶设帐闲吟学放翁体二韵》)、"一官误我走天涯,远别书城散五车"(《借书》)的省悟,然而,这仅仅是外在的对周围环境的掩饰而已,灵魂深处却充溢着眷恋朝政、关注时局的热情。且看《夜梦早朝二首》:

一从放逐远长安,京洛风尘久未弹。凤阙忽通千里路,貂裘仍怯五更寒。似闻吴楚天戈捷,又道江淮露布刊。宵旰忧劳何日已,梦回孤枕泪汍澜。

壮年曾忝鹭鹓班,岭海驰驱数往还。葵藿向阳虽自信,蓬蒿作柱总嫌孱。时艰讵敢谋归卧,年迈端应得赋闲。谁扫欃枪

天宇肃，夜阑频望斗牛间。

从这两首七律中，可以看出诗人是何等的忧国恋政。他借古咏今，以唐喻清。自己虽然被放逐，但京尘未弹，貂裘仍旧，还注视着平定内乱的“吴楚天戈”，谛听着江淮捷报。每每忆起御使台和闽粤为官时像鹭鹓一样井然有序地列于朝廷。虽说自己像蓬蒿，不堪挑大梁，却如葵花似地心向着宵旰忧劳的咸丰帝。国难当头，置身事外本非己愿，也决不敢逃避为臣的天职，在夜阑人静之时，仰望斗牛二宿之间兵戈之气郁结，因想到在其分野之下的安徽、江苏、江西、浙江一带战乱不已，谁来扫清天宇的妖星兵气和人间的战乱呢？年迈归卧的诗人只落得两泪涟涟。这种情，是梦中情；这种景，是梦中景。既是梦中，而非现实，这就避开了世人的訾议，又不致落个犯“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的忌讳。松龛其人，可谓玲珑精巧。但是，性格使然，本性难移，蕴藏在诗行里的那种炽烈的复仕之火，是如此的炀然，如此的强烈！

像诗人这样浓烈地流露、抒发罢官后的复仕思想，进而转化为行为的事是很多的。如他考察和探索作为政府财政重要来源的盐政改革问题，以山西潞盐为实例，向地方当局提出了很有见地的建议（见《潞盐刍议致王雁汀中丞》）。又如，诗人“因闻海运短绌，京师乏粮，旗人有投河自尽之事，转思转惧，遂致呕血发狂”，于是病中急拟《筹运西米策略》。不料，陆侍御拾为折料，被户部议驳。因此他觉得有冒不韪，“揆之素位之理，亦大相刺谬”，“以此深自咎悔，绝口不谈时事，邸报亦从不借看……暇则浏览古书，间作小诗以自娱”（《复吴思澄书》）。《足梦中句》曰：“短衣疋马罢游行，枕籍残书了此生。宝剑七星悬在壁，休教夜半匣中鸣。”诗人在自注中写道：“下二句梦中所得。”下二句乃“诗眼”。恰恰将目遮去，成了“梦中剑”。结句之匠心，用意之韬晦，足见诗人对关注局势，干涉朝政的讳莫如深。从诗人作品中窥其倾向，不管怎样克制自己的行为，也不管怎样回避这个问题，但它只能是短暂的。过不了多久，这种“地

火”依然在运行，依然在他笔下或直接或曲折地透射出鲜明耀眼的光束。

咸丰九年诗人65岁时，在《复保慎斋书》中说：“弟以获咎之故，转得置身事外，偃息林泉，局外之人多以塞翁失马相庆，每闻此言，寸心如割……现虽气力衰残，不任金革……惟热血未寒，寸心不死。心中有欲吐之数言，关系安危大计，若朝达宸枫，夕依秋柏，毫无遗憾……欲效一喙之忠，竟无上达之路……不知其心头眼底，有死不瞑目四字，念念不能忘也。”这里，突出地表达了诗人企图复仕、上达的思想。虽然“气力衰残，不任金革”，但“热血未寒，寸心不死”，其固有的思想是难以摧毁的，其东山再起的意志是坚毅的。只要打开诗卷，无论那些新乐府歌行，民生篇什，时政大事诗，还是那些酬答感怀，山水田园等诗作，字里行间的主体倾向是无法用字面来弃覆的。譬如《寄呈寿阳相国二首》之一：

> 忧国年来鬓早霜，扶人勉拜乞祠章。梦魂仍伴紫薇省，杖履何心绿野堂。共祝温公无返洛，且看裴令再扶唐。秋风即日能苏病，旦夕还宜理绣裳。

这首诗可以看作是《复保慎斋书》那段话的佐证。诗人将去职的祁氏，比作蛰居绿野堂的裴度，隐居洛阳十五年绝口不谈国事的温国公司马光，坚信祁氏还能像他俩一样再度出山，鼎力匡扶社稷。诗人借勉励寿阳相国来抒发自我情怀，句句显示出“人退心不退”，“梦魂”实现“再扶唐”的“见召复用”的坚定信念。如果说《夜梦早朝》是仅仅眷恋朝政、不忘君恩意韵表达的话，那么《寄呈寿阳相国》则是坐待“仍伴紫薇省”，早日返朝从政的心灵呼唤了！

诗言志。抒发情感，表达思想是诗歌创作的固有之义。“出山复仕”也是一些诗人所言之志。问题在于，所体现的这种倾向是否对彼时彼地的社会现实具有进步性。对于一个封建社会末期的政治家来说，这无疑是施展自己的智慧才华、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的有效途径。就其诗人主观上评价，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是值得肯

定的，就其客观效果来评价，还要考察他这种政治主张是否具有历史的正确性和积极性。综其仕宦一生，徐松龛乃是一位滓廉明达、有守有为、放眼看世界的封建开明官吏。将他南国为官生涯以及他罢官后所作的诗加以研析即可知道：诗人对清朝的吏治腐败、士风日颓，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扩张，对人民的贫困和疾苦，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并提出要了解世界学习西方民主自由，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诗人是一位经世派人物。然而，也需指出"经世致用"的本质特征还是为挽救政治危机服务的，由此而派生出的思想观念也无不在他的诗作中打下了阴暗的印记。

尽管构句曲折、意蕴含蓄，但有些诗作还是表现了他"入世复仕"的积极的政治主张和思想态度。如在《读杜诗》中，他写道："聪明且正直，所忧国与民。哀吟梦魏阙，涕泪悯孤贫……馨香延百世，位业此为真。"悯孤怜贫，是忧民；吟梦"魏阙"，是忧国。诗人紧扣民与国的联系，来评论杜诗的根本，确是一语中的。同时，也反映了自己的思想真实。在《哭吴甄甫师》中写道："乾坤正气赖支撑，忧国频年白发生。"为了支撑国家正气，诗人忧虑，白发频生。在《读元遗山诗二首》中写道："禾黍故宫歌代哭，泪痕多似少陵诗。"国家丧乱，遗山以诗代哭，使诗人对遗山爱国情怀表示了高度赞赏。在他《题吴梅村诗集四首》中也写道："长庆清辞入管弦，歌残萧史唱圆圆"，"一代兴亡谁诉说，故留天宝旧宫人"。诗人在其间该倾注了多少的国家兴亡的喟叹之情？在《怀人三首·张翰槎水部》中写道："砥柱狂澜君莫让，肯随下濑扬轻帆"。在这里，诗人不仅是感叹兴亡有责了，而是激励同僚砥柱中流，力挽狂澜，去"扶社稷，振家国"了！这些对古代硕学名儒、当朝达官仕人的题咏随笔，显示了一个爱国者的高度责任感，从侧面展示出忧国忧民、兴国安邦的政治主张和进取信念。这种进步和开明的积极态度，比起我国古代那些许多罢官归隐后即产生逃避现实、消极厌世思想的文人墨客来，就愈显其光彩照人了。

每当诗人忆起往日政绩时，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奋之情。在《平遥书院感怀杂咏》写道："忆我通籍时，朝野歌天保。东观抽秘书，西台焚谏草。"忆及当年奏疏上达，自负豪情不禁油然而生。江南行政，曾历千辛万苦，治民防夷，清廉节操，经世尽力。这些作为诗歌抒露胸臆内容来说，毕竟是有限的。那么，前文诸多论述的忧国忧民、支撑正气的诗句，其内涵究竟是什么呢？他的朝考文章《政在养民论》、奏疏《特参州县入省钻营疏》等等，似可作为其"复仕涉世"诗歌的诠诂注脚。

二

徐松龛仕政的年代，正值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入侵、鸦片战争爆发、漫长的封建社会行将崩溃、太平军和捻军等农民起义的动荡时期，这就不能不把诗人推出生活的正常轨道，让他一连串的思想情感经受社会系统和环境信息的反复调节，使之产生某种"质变效应"。事实上，在内忧外患的历史发展和生活经历中，诗人对世界的理性思维成果、功利考虑、文化修养和道德、伦理观念，已经积淀成为一种不自觉的深层心理结构。作者的相当一部分诗作的审美意识，就是建立在这个心理结构之上的。也许，诗人还没来得及深虑西方世界的民主意识与自身社会生活的真实意义，便高度模式化和规范化地驶向浅陋、虚伪和愚忠。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诗人的思维定势，弱化了自己的形象。

"政在养民"是诗人入仕的凭藉，也是他的立身之本。在《特参州县讳灾催征疏》中，对农民遭灾还要被逼课，寄寓了他同情人民疾苦的情感。他上谏说："（农民）骨髓已罄，目下青黄不接，粮价腾翔，卖男鬻女，道殣相望。壮者弃产奔逃，弱者填委沟壑，人心汹汹，朝不谋夕。"这是一种常轨下的传统民本思想的表现，而民本思想在较为安定的环境下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诗人也创作了一些

这方面的诗，如《啖糠词》描述了北国乡民的穷困生活。“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体现了诗人知民爱民的思想，同时也写出了官衙挥霍浪费，不爱惜粮食的奢侈行为。虽然，诗的典型意义不能跟杜工部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相类比，然而诗人也同样采用对官、民的特定生活进行对比描写，显得爱憎倾向分明，起到了歌颂农民，揭露官场的审美效果。但是，也必须指出，这里的歌颂、揭露是不彻底的，是浮泛的，跟农民的思想情感有着难以拉平的差距。且看，在诗序中说的“啖糠”是“晋俗俭啬”。因为“寒瘠尤甚”所以“丰年亦杂糠秕”云。固然，勤俭持家是山西人民的美德，应该赞赏和提倡，但啖糠并非“晋俗”，也绝非吝啬。由于寒冷贫瘠，石岭关以北的粮产是低的，吃糠咽菜本为常事，丰年啖糠者亦有之。当然，究其啖糠的成因，其间有自然的因素，也不乏有严监生、葛朗台式的人，但从“粒米如珠流水沟”的底蕴看，其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所致。

将《啖糠词》跟《特参州县讳灾催征疏》相较，诗的思想性就显得大为逊色。评者以为，诗作不及奏章的深刻尖锐，其因恐怕不能归于诗这个载体的容量有限，艺术要求制约的缘故；而大概是因为草写奏疏时诗人正值“在其位”，属职内事；作诗时则已退居林下，当“不谋其政”。另外，还可深究一下，诗歌带有更多的传播性，民间性和宣教性，而奏疏却是专为皇帝进谏的。既要安抚人心，但也为最高统治者的前途担忧，诗歌的格局写法只能如是而已。这种源于民本思想的忧患意识，之所以不像对西方文化影响极大的“原罪意识”，能够成为推动社会迅速进展的强大心理动因，其关键在于，西方的“原罪意识”通过“自我灵魂拷问”，力图以现实是非去思维、赎罪过去，从而将自己置于超前位置；而我们民族传统的忧患意识，却把基点放在过去，放在“先圣”试金石的考辨上，以要求现在，将来和民间。诚如是，任何伟大的理想和主张都归到实现“王政美德”这一点上。这种忧患意识，忧民是基础，忧国是本质。而忧国的

实质是“忠君”。从封建社会最早的诗人到诗人邓廷桢、黄爵滋、魏源、龚自珍等，莫不如此。徐松龛在这上面表现得更为突出。他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的《谢恩疏》中说：“臣唯有殚竭血诚，力图挽补，尽其心之所能尽，为其力之所能为，断不敢畏难苟安，以冀仰答高厚鸿慈于万一。”由此观之，诗人的忧民爱民，就是以追求这样一种“仰答”为出发点的。所谓“无负于长民之责”的“陈谟赞化”，不是为了否定封建制度，而是为“挽补”封建统治，使人民永不反抗最高统治阶级。为巩固其统治，开明的君主甚至也会提倡“爱民”。如李世民就曾说：“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以纵欲也”(《资治通鉴》卷192)。就连道光也假惺惺地做出过“爱民”的情状。诗人的《政体宜崇简要疏》上呈道光，“上大感动，立召对，与语移时，询及民瘼，至于流涕”(方闻《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诗人的几首“民瘼”诗之所以为阎锡山、冯玉祥所推崇、所传诵，其因盖出于此。其他类似的民生诗篇，其主题、其诗魂也大抵如此。在诗人有分寸感地把握这些诗的表现力，难道不是为了进而“复仕复政”吗？

对越出常轨的时势与事件，诗人就被放逐到正常生活的轨道以外。在异常环境中才有可能有异常表现，也只有这时，诗人的思想性格才具有了深度和本质性。因为，典型性并不命中注定与平均数联系在一起，典型性也不命中注定与例外性和异常性绝对排斥。同样是农民，同样是卖男鬻女、民不聊生的农民，在被封建统治阶级高压下揭竿而起的时候，诗人便不再同情了，就急速地转向征剿，镇压。这时，“忧民”便被“忠君”完全替代了，旗帜鲜明地表现出封建忧患意识的阶级性。

在《顷乘障上党有留别诸绅八诗潞人泐石，以当纪事。余小栏大令，见而和之，再叠前韵奉酬》中，诗人在对农民起义军问题上进行了思想和行动上的选择。选择的结果，就迫使诗人获得了政治立场和阶级情感的“定性外观”。且录其中二首做一论评：

俄惊蚁穴溃全河，遍地黄巾跃马过。车骑渡江空击楫，鲁阳酣战几挥戈。侧闻淮北完城少，怅望江南战垒多。谁比关张能馘贼，掷将铣铣忆摩诃。

跳梁群盗躏畿南，烽燧遥连晋土三。险扼太行陈甲士，城环潞水誓丁男。白衣讵识弢铃秘，赤帜空传载籍谈。幸值鲸鲵全就戮，清凉山下有归骖。

其时，诗人已归里。太平军陷九江、镇江、扬州、又挥师北上攻取了归德、安庆。咸丰三年(1853)又直指山西，渐次夺取了绛县、曲沃、平阳、洪洞，然后东进。应山西巡抚恒春请，调诗人进省襄办防务。以上两首就是以此为背景，传达了彼时彼地的心境。他协助巡抚去剿灭太平军，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以关张自比，以驾车的侧马自谦，直至平息战事才归故里。同时也看出，诗人对这场镇压义军的军事行动，虽然是被"奏请"而"恩准"的，但这是主动的选择。这从诗的情感走向上即可察知。这类诗很多，诸如《感事五首》、《哭祁幼章方伯》、《寄怀陈剑候观察》、《哀平阳》、《重逢遣闷》、《彭咏莪司空拜协揆之命寄诗致贺》、《王雁汀中丞受四川节度赋诗赠别》、《闻客谈南中事》……与其说这也是诗，倒不如说是"忠君灭民"的印证，或者是精心酿制的复仕的进见之礼。

对农民起义如此，对外国侵略者又是如何呢？在《复官绅意见不合疏》中所引的上谕曾提出"驭外之道，莫先内安"。所以，他在对待"驭外"的态度上就不如对待"内安"坚决。且看他回忆跟英国入侵者较量的诗《感怀杂咏》(摘录)：

……无奈海波扬，楼船致声讨。霞漳当其冲，防卫周群岛。远夷行受抚，市舶罗瑰宝。魋髻性难驯，重译虞颠倒。包荒赖圣慈，覆载归洪造。任重智乃昏，算多谋未老。终因抚驭乖，分应书下考。三黜从宽典，疚愧萦怀抱。

当英人入侵，鸦片战争初期，诗人也曾在署汀漳龙道时，募兵勇筑防事，"霞漳当其冲"，来保卫海防，但抵御失败后即由主战转而倾

向主抚。所以，诗人感叹“任重智乃昏，算多谋未老”。为“抚驭”的失败而深感“疚愧”。当然，决定诗人转变的主要客观原因是以道光为首的清廷统治集团的转变。这表明外在条件通过内因所呈现的“定性外观”。这种“定性外观”不能不说是主观上的选择。

把诗歌创作当作一种“上达”的补充形式和“复仕”的政治手段，虽然客观上提高了诗歌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意义，但更多地失落了文学自身的价值，这就是复仕思想指导下的诗作的局限性。

三

徐松龛诗歌总的政治倾向和所采用的艺术形式基本上是相适应的。无庸讳言，他的诗在写法上不是很新的，是传统的现实主义纪事写实的手法，事到笔随，情来意随，排比铺陈情境尽现。但也有一些构句不直爽，态度不鲜明，主旨隐晦令人不易捉摸的诗作，这跟作者既有罢官后“老来唯恐少情味，到处寻诗岂是偏”(《城居闷甚偶行郊外有喜》)的愁闷心境，又有“循声久已腾当路，卓荐行看入帝畿”(《顷乘障……》)的跃跃欲出复政的迫切愿望有关。例如：《青雀篇》就是一首以物拟人的寓言诗。其诗全篇照录于兹：

> 青雀来西方，翔集房栊端。主人性仁爱，饲养同鹓鸾。黄花杂麻子，堆积溢铜盘。雀感主人惠，鸣声常告欢。飞集衿袖间，依依刷羽翰。突有少年儿，张弓发弹丸。中雀雀未死，负创入林峦。林峦幽且僻，固无异患干。唯念主人恩，中夜鸣声酸。欲矢衔环报，微躯恐不完。云中盼庭院，滴泪落花栏。

假如对诗人的身世、阅历和思想政治倾向有所了解的话，那就不难体味到诗作的寓意。显然，这里诗人以青雀自比.它受到主人的青睐，以黄花杂麻子饲养，所以它对主人颇为感激。先是鸣声“告欢”，继则飞落主人臂，后则是刷羽取悦于主人。不期有狂儿发弹中雀，负伤入林。虽然林峦幽美僻静，但老惦记着主人的豢养之恩，想着

以结草衔环报，又恐体伤未愈，再遭打击。只能望着主人的庭院，滴泪而已。根据诗意串联，主人当是清朝最高统治者，“小儿”当是曾弹劾他的官绅，“负伤入林”当是罢官归里。山西五台在清政府首都北京的西方，故言“青雀来西方”。“青雀”行为次序，正是象征着诗人的宦海经历。诗作语言质朴自然，读来上口。构思也很巧妙，意蕴婉约，其间复杂、矛盾的心理活动，写来真实生动。从而揭示出诗人“欲矢衔环报”、“云中盼庭院”的复仕思想。诗人的这篇诗，很像汉民歌《枯鱼过河泣》、曹植的《鹞雀赋》、李白的《山鹧鸪词》、卢仝的《白鹭鸶》等。很难说，文学史上这一不绝如缕的拟人、象征、影射手法传统对诗人类似诗毫无启示，可是诗人的借鸟言志、衔环效忠的明确性，在特定情境中把诗当作“奏疏”的政治手段，却不失为是一种诗歌创作上的成功尝试。这首诗，评者以为是松龛诗集中的“诗眼”，是“点睛”之笔，可以用它来统帅起其他诗篇。

《山西献征》说徐松龛“晚学诗，具张王体格”，是指他的一些以民间疾苦为题材的诗，和唐代元和间擅写新乐府的张籍、王建有类似的格调。但评者认为松龛与唐代张九龄、王维二位诗人也有相通之处。如果说诗人的诗风，像张子寿“兰叶春葳蕤，桂花秋皎洁”(《感遇》)，王摩诘“斜阳照墟落，穷巷牛羊归“(《渭川田家》)那样的超然，那样的明丽，似乎有些不足和不确；如果说具有张王的“清淡”的某些特色，似乎合理。这种特色主要集中在一些田园山水诗和思乡念亲诗上。如《二月朔晨起仍雪》：“算来明日是花朝，一天风雪散琼瑶。应嫌朔地风光冷，万树梅花落九霄。”诗作如行云流水，自然天成，没有一丝雕琢的痕迹。看去清淡，实则劲炼雅丽，且寄托有之。诗人多次地赞叹梅花，并不仅仅颂其清香傲寒的美，而是对江南为官时的回忆和眷恋。在《顷乘障……》写“梅开何逊吟方苦，花梦江淹笔已枯”，在《六十二岁生日》写“醉里重寻香国梦，梅花万树晚山前”。诗人在“晚山前”之后自注：“余性喜梅，而北方甚少，每于梦中见之。”这一“自注”道破了诗人心底的奥秘。如此对梅花“吟

方苦"，只是出于对暖日南国梅花的忆念，以至于梦中求之；而对北国家乡的梅花，一嫌少二嫌冷。这一南一北，一热一冷，就把诗人一官一"民"，一喜一忧的心态含蓄地写了出来，不甘于退归林下和以雪作梅的希翼，丝丝缕缕地漫散在诗面上。

再看诗人的另首景物诗《七夕》(四首择其首)："天上逍遥才一日，人间倏忽已经年。如何夜夜常相会，犹怅银河少渡船。"这诗写得清醇雅丽，耐人咀嚼。它写的是七夕，是极平常的事。诗人也是信手写去，随意道来。牛郎、织女难得相会，只因鹊桥不常有，更无渡河船。这纯系白描，不事雕绘，读来亲切。然而，诗意却并非平淡。"天上"何以逍遥，人间何以"倏忽"？而想天上人间常相会，就需渡船。不说"无"渡船，只言"少"渡船，点明了"常相会"的仍然有它的可能性，这里不也隐隐地透露出诗人对明君良臣相遇的憧憬吗？

诗人的这一类型诗，正如他在《水仙花》中写的那样："不作夭斜羞媚世，独标淡素自宜人。"在《怀人三首》中也说："白首郎曹淹宦迹，黄花晚节淡诗情。"在《夏日晚坐二首》中又说："诗篇但取吟成句，谁耐推敲费苦搜。"这是他对自己"独标淡素"，"谁耐推敲"诗风的概括和写照。也是对此境界的追求和要求。也恰恰是由于诗人不假雕饰，随意写来，才写得清淡、平易和接近"元和体"。《驮炭道》一诗，微仿古乐府和李杜歌行，构句多以三、七言参差相杂。似拟七言古体格式，但又行文自由，无拘牵滞碍之苦。作品词句简单流畅，间用方言俚语，显得生动活泼，自然如散文，充分发挥了古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但它只有外在表述形式上的"元和体"，却似乎少了"元和体"那个"讥讽时事"的内在底蕴。这诗虽不能说是"意袭"白居易的"新乐府"《卖炭翁》，却也题材大致雷同。"卖炭翁"烧炭、运炭、卖炭之艰辛，"驮炭者"买炭、行路、用饭之困苦，皆勾勒出饥寒交迫、生存之不易的心理特征，但结尾就大相径庭了。"卖炭翁"被掠取，白乐天把矛头指向了"黄衣使者白衫儿"，揭示了统治者的残酷压榨，而"驮炭者"内心烦忧，徐松龛却将矛头对准了大自

然的客观因素。展示出"愁杀我"的原因是"大雪封山 。从而,《驮炭道》在《卖炭翁》面前就显得黯然失色了!然而《驮炭道》十分注意细致刻划驮炭道中人物的行为和心理的状态,自然式地表现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繁衍的精神脊梁,无疑是值得肯定的。那么,诗人的这首诗为何在思想性上跟白诗反差这么大呢?在艺术构思和表现上,诗人颇为讲究行吟觅句,"不及时政"。这从他的《读吴梅村诗集四首》、《读王阮亭诗集》等诗作中便窥得走笔行端。吴伟业,王世桢都是明末清初人,是诗文大家。但他们受到了康熙的重用,吴被封为国子祭酒,王官至刑部尚书。因之,他们的诗文言行极为谨慎,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民族矛盾与"谤讪清政"的嫌疑。诗人出于自己的思想实际需要,很欣赏他们的谋篇布局,大量的诗篇不无受其影响,同时也受自己思想的制约。像《驮炭道》这样的诗,就不仅仅是创作上选字遣词的艺术性问题,而是跟诗人的世界观、立场和阶级情感密切相联。这有如张文昌、王仲初的乐府风格,尽管较多注重艺术功力,"思深而语精"(宋·张戒《岁寒堂诗话》),但张王体格的评价究竟不及白居易的新乐府。什么原因呢?特定地位中的政治观念、思想见解之差异使然。松龛诗,虽是"老不能耕聊借笔,心无所用漫裁诗"(《初到平遥……》),但也"日月跳丸何太速,乘闲搜句莫嫌迂"(《和泗心梁子……》),"差喜诗情时欲动,巡檐镇日拈吟髭"(《雪后适平遥馆》)。既是漫裁诗,写去通俗易懂、浅显若语,又是拈髭搜句,不能敷衍了事,随心所欲,真所谓"成如容易却艰辛"了。一言以蔽之,是诗人复仕思想的积极性也是其局限性,造就了具有艺术个性的松龛诗。

(作者薄子涛,1946 年生,在忻州地区农业广播学校工作。)

附记:本文于徐继畬讨论会后完成。——编者

●张乃彬

徐继畬的教育思想

一

称徐继畬为教育家，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咸丰六年(1856)至同治四年(1865)的10年间，主持过山西平遥的超山书院，随后又于同治六年(1867)二月至八年(1869)三月，担任了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而且是因为他的教育思想具有当时的先进成份，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

然而，乍一接触其教育思想，就会发现它存在明显矛盾。

美国的德雷克先生曾指出："徐继畬在《瀛环志略》中曾经探讨过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制度，令人费解的是，八股文却是他的真正爱好。"[①]是的，他在主持超山书院时，确实只从事八股文的教学。不但为一些人的八股文集作过序，[②]又专门选了32篇范文，编成《举隅集》，并作了精辟的讲解，以为学生们的教材；而且每月以八股文来"大课生童"，还亲自动手，写了50多篇文章和30多首试帖诗，集为《超山书院课程》来作示范。那么，八股文、试帖诗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东西呢？在我们民族整个摆脱了八股文的束缚之后，对它作科学的反思的时候，鲁迅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八股文原是蠢笨的产物。"[③]其内容只允许"代圣贤立言"，丝毫不能有自己任

何思想观点的发挥；其形式必须讲究“起承转合”，是一套极为僵化的固定模式。八股文作久了，势必会把人们的头脑，变成毫无生气的“阴沉末”。[4]试帖诗则要求竭尽全力去歌颂皇恩、皇朝——不管它是否值得歌颂。它们都是封建统治阶级为制造蠢笨、禁锢人们的思想而提倡的文体，因此成了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唯一体裁。一般热衷于功名的读书人，也把它看作步入仕途的便捷之径，对它深感兴趣，因而就不可能探究其实质。徐继畬也正是经由这一途径才取得功名，成就事业的。他是“道光六年(1826)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5]再屡任外地官吏，直至封疆大员。因此他说：“壮年久困礼闱，尝耗心血于此(按：指八股文)，其规矩法律犹在心头，见猎心喜，出之甚易。”[6]自己深受其害尚不觉，又用教授莘莘学子，这恰说明了其教育思想中有着保守、落后的一面。

就是这同一位徐继畬，在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前后，却在教学内容是否应增加天文、算学，以至进而掌握制造轮船、枪炮的“机巧”，即引进较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上，与大学士倭仁、监察御史张盛藻等，发生了尖锐争执，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这表明他的教育思想较之于超山书院时，有着明显的不同，表现出了他又有不甘保守，勇于追求新事物的进步一面。

对这种矛盾该怎样解释呢？德雷克先生认为：“正如日本早期维新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一样，徐继畬也表现出了两面性。一方面他公开地攻击传统观念，另一方面在自身行为上仍有守旧性。”[7]这个一分为二的论断，思路显然是合理的，然而有明显的缺陷：只不分主次地平列出他的两面，不易使我们准确地认识和评价他；只分开了两面，而不再统一起来，也不能使我们看到一个完整的徐继畬。实际上，徐继畬是一个虽具有两面性，却两面和谐统一，绝不对立、分裂的教育家。他对传统观念，并未“公开地攻击”过，他的教育思想统一于我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与外来的、更富有生命力的西方文化发生猛烈撞击和翻天覆地的变革时代。我们要探讨他的教育

思想，就必须从这样的时代文化背景入手。

二

徐继畬教育思想中保守的一面，来源于传统的文化积淀。《清史稿》本传说，他的父亲“治陆、王之学，继畬承其教”。[8]这就为我们的探讨，提供了一条明白的线索。

宋代的陆九渊，是“心学”的创始人。他主张心是唯一的存在，天理、物理、人理，都只存在于心中；而心又是古今中外完全一致的：“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西南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9]所以在为学上，他主张要致力于修养自己的“本心”。[10]明代王守仁对这一学说又加以发挥，他把心视为万物的本源，“心即理也”。[11]心就是天理，也被称为“良知”。教育的根本问题，就在于“致良知”。[12]读书只是寻求自我良知的手段，最后还须靠自己的“解化”，[13]即发现自己原来就具备的本体。这样，知和行就会完全一致，知行合一，知行并进。所以他们的教育原则是重内心自省，重施教对象的心理发展水平，重调动受教者自身的积极因素。这种“心学”直接来源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14]就其思想内容看，是儒家的正统，就其思想体系看，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但相对于程、朱“理学”，在重视启发人们自我觉悟这一点上，则有一定意义。

徐继畬接受陆、王之学的具体过程，我们已不易考知了，[15]从他在超山书院时的教育实践，却可以肯定他确在恪守陆、王学派的准则。在《超山书院课程序》中，他明白宣告：“阅生童课卷，亦尚有天资近慧者”，因此编这课程就是“思有以开凿其心思”。《举隅集序》也说：“盖我心有规矩、绳墨，则为雅为郑，为朱为紫，一览即分，弃短取长，不虑堕入五里雾中也”，这样看来，他不是只教学生如何

作八股文，更重要的是“开凿其心思”，使之“有规矩、绳墨”，即教他们如何进行思想修养，树立纯正的儒家伦理观念，也就是在教学生如何作人，作合乎封建礼教要求的人。[16]

这也正是王守仁“致良知”的落足点，王守仁认为“致良知”的结果，表现于行动上，就是能够正确地事父、事君、交友、治民。[17]徐继畬本人是严格按照这一标准，规范自己的言行的，不但在各种职位上都“谨守先训”[18]忠于职守，使所守“境土幸保无虞”，[19]即使罢官归里了，也还风尘仆仆地奔走于三晋大地，募集资金，组织民团，抵御太平军捻军起义。就是从事了“批改课文”的教书，也不自认为是以“笔耕求活”的“贫宦”，或“不知黜陟，不问理乱”的“林下高人”，其心头眼底总有“死不瞑目”四字，念念不忘“效一喙之忠”。[20]可见其人伦思想是何等正统。所以皇帝对他的一些奏疏，或“嘉纳”，或“优诏报之”，还称其人“老成”，[21]就很自然。

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着这样的人伦原则，而且还孜孜不倦地用来教育弟子。所以在《超山书院课程》和《举隅集》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些题目：《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有本者如是》、《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其使民也义》、《圣人之忧民如此》、《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修身则道立》、《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这些一方面是八股文的题目，另一方面，也是思想修养的题目。徐继畬对八股文的看法，与鲁迅不可能一样，他正在八股的牢笼之中，认为这既是入仕的工具，更是作人的规范。所以他对八股文的爱好，完全是传统文化的熏陶，儒家思想影响的具体表现。

还应该注意到，他不但在超山书院时推重八股文，就是在同文馆，他也极重视学生的思想是否纯正，即行动是否合乎封建礼教的人伦要求。人们现在虽不能看到他在这时期独自表示的见解，但他的意见，绝不可能与推荐他任同文馆事务大臣的奕䜣、文祥等人相左，因此，我们可以认定，当时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恭亲王奕䜣等有

关同文馆的各种奏折，其中包含着他的观点。在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初五日奏折中，他们建议添设一馆，“招取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并准令前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22]来学习天文、算学等。为什么他们特别强调学员中须具有这样严格的“正途”资格呢？就是希望他们“道成于上，艺成于下”。[23]具体说，“……正途人员，诚以读书明理之士，存心正大”，不至“为洋人引诱，误入歧途”。[24]显然，他们都把传统文化的教育视为根本，亦即“中学为体”。由此看来，应该说这是徐继畲教育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一面。

三

《清史稿》又说徐继畲“通时事，在闽、粤久，熟外情”。[25]这个叙述是不充分的，因为没有明白讲出他对所熟悉的“外情”的态度。

实际上，他在广东、福建接触到了以船坚炮利为标志的西方文化后，在思想认识上，是经过了一番痛苦的交锋。然后才总结出了较为现实的，沉痛而清醒的结论。道光二十一年(1841)七月，他署福建汀漳龙道台，此时恰值英国侵略军沿海北上，途经厦门，中、英双方互相炮击，结果厦门炮台被攻破，清军死难者千余人。徐继畲当时驻守在位于九龙江入海口处，直通厦门与漳洲的海澄，英军轮船也曾经“直驶至海澄城下，因水浅退去”[26]才未进入该地。他在这场正面的接触中，充分看到了“夷狄”所掌握的先进科技的力量。这个事实，使他在谴责以鸦片毒害大清朝，“不知信义、唯利是图”的“英夷”[27]的同时，也陷入了沉思：怎样才能取得“制胜之术”[28]呢？于是他在震惊之余，开始了极为艰巨的探索。这艰巨，不仅在于资料收集的困难，更在于观念转变上的艰辛。本来闭关自守的大清王朝，一向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天下无敌，现在竟要承认并非如此而且去人甚远，这实在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幸好徐继畲正是这样

的勇士。于是在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他写成了《瀛环志略》。在这部著作中，他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更研究了西方主要强国的文明发展概况和现行政治制度等方面的问题。所以，与其说这是一部地理专著，不如说它带有一定的政治性质，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世界，进而帮助朝廷确定“国家抚驭之策，控制之方”[29]更为恰当。

徐继畬这种态度的出发点，虽然仍是以天下为已任的儒家传统观念，但较之当时的一般儒生，他是现实的，他没有坚持孟子的教条：“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30]而认为“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假若”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因此他不“以师法西人为耻”，[31]而主张在教学内容上，先增加当代科技的基础——算学，然后再逐步扩大到“制造机器各法，教练洋枪队伍”[32]等。同文馆始建于同治元年(1862)，并非由他创立，他的这个教学改革设想，是想把同文馆从单纯培养翻译人员，变成一所理工科学校，通过培养理工人才，实现自强救国。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愿望。当然，他的这个设想，并非在任职同文馆之后才有的，到同文馆只不过提供了可能实现的机会。在超山书院那样闭塞的环境中，则连提出这设想的条件也不具备。

还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教学内容的改革，只是“中学为体”思想指导下的“西学为用”，而所用的“西学”，又仅限于西方较先进的科技知识的基础学科，还没有涉及到人权、民主思想等等，其范围是极狭小、有限的。

不料，就是这样一点小小的改革，竟也招来了极端守旧派的敌视与攻击。既有人编撰对联，“粘纸于前门”，败坏同文馆声誉于先，说什么：“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及什么“孔门弟子，鬼谷先生”；[33]又有倭仁、张盛藻、杨廷熙等出面于后，上奏皇帝，口口声声“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34]“朝廷命官……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

造轮船、洋枪之理乎”?[55]甚至要求撤销同文馆。[56]在他们看来,孔、孟之道既是体,也是用,处理中国的事,只能是中学为体,中学为用。徐断畬与他们的分歧,并不在“体”,只在于“用”,而且是相当有限的一点“用”,守旧派之所以是守旧派,就因为他们连这一小点新也不想接受。

这场冲突的结果如何呢?从表面看,同治六年五月二十九日的上谕,痛斥了杨廷熙,又追问是否由倭仁授意,[57]似乎守旧派失败了。实际上,他们的舆论造得非常成功,致使同文馆的招生受到了很大挫折,“正途投考者寥寥”,“正途与监生杂项人员相间”,参加考试者也只有 72 人而已,[58]这对于想通过教育途径实现自强的徐继畬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到了同治八年(1869),他便不得不“以老疾乞归”[59]了。

不过历史的发展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守旧派们虽然可以得意于一时,但绝不能蒙蔽人们的思想于永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终于逐渐为有识之士所接受,并于实践中扩大其应用的范围,导致了时代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徐继畬的教育思想,是开一代风气之先,他不愧为一个时代的先觉。

四

在滔滔滚滚的历史长河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只不过是一朵微不足道的浪花,何况徐继畬所用的西学,又极为有限,而且还遭到了打击与失败。那么,它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这朵浪花出现的必然性,到 19 世纪中叶,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形态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形态之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不平衡,根据文化交流和传播的规律,先进的西方文化冲击落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势在必然。伴随着殖民主义者的炮舰,像徐继畬这样的先觉,就是第一批被轰醒者。他们对西方文化

的感受，当然首先是其物质的层面。像魏源主张的“师夷长技以制夷”，[40]也正是这种形势下的产物，反映在教育思想上，就不能不是西学为用，而且只是“技”之用。这正是时代发展的需求。

其次，我们绝不能低估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谁也不能让一个人的思想在一夜之间就发生根本的改变。更何况儒家思想已经流传了两千多年，深入到了当时大清王朝的每个臣民之心呢！人们思想的变化，要受时代的限制，这也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所以我们不能要求徐继畬离开中学为体，一步登天去宣传和发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附带说一句，就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也未能完全脱离中体西用的框架），甚至我们也不能要求徐继畬所办的教育，必须贯彻他的政治向往（如对像华盛顿那样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崇拜）。因为他的“体”毕竟是深深植根于“中学”之中的，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等等，恐怕他连想也没有敢想要在大清王朝加以推行。

最后，我们还必须强调，不管中体西用这种思想有什么局限和不足，它毕竟是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封闭性，它不可能通过自我调节、自我革新，而衍变为现代文化；社会要进步，就必须对它进行彻底的改造，徐继畬当然也还不可能认识到科技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生产力，但他的教育思想中的先进因素，使他直觉到这部分西学是谋求自强的应有途径。他勇敢地回答了守旧派的辩难，并付诸实践，就为冲击传统文化的大一统天下，打开了一个突破口。人们对先进文化的追求，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掌握，总要历经由不自觉到自觉的阶段，我们绝不能因为开始阶段是不自觉的，就不予它以足够的重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确实只是一小朵浪花，但在它的下面，却萌动着蕴含了巨大能量的涌浪，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变成裂石拍岸的连天狂涛。这个思想，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到来的序曲，是我国开始近代化的起跑点，所以我们说，徐继畬的教育思想中尽管保守一面还

占主导地位，但其整体，却既是时代的产物，又将推动时代进步，这就是我们对他应有的科学评价。

苏轼有句云："春江水暖鸭先知"。[41]鸭的可爱，是因为它的"先知"来自自身在江水中的实践，徐继畬的能够体现时代精神的教育思想，则是源于他与先进文化接触的实践。他不是呼唤革命暴风雨迅速来临的海燕，就算他是一只鸭吧，难道其来自实践、又勇于实践的思想和行动，就不值得赞美么！

（作者张乃彬，1937年生，忻州师专中文系主任，副教授。）

注释：

①⑦ 德雷克：《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中译本，141页。

②⑱⑲㉖㉗㉘ 《松龛全集·文集》卷一，卷四，卷四，卷三，卷一，卷三。

③④ 《内自由书·透底》。

⑤⑧㉕㊴ 《清史稿》卷422。

⑥ 《超山书院课程序》

⑨⑩ 《象山先生全集》卷22，卷35。

⑪⑫⑬⑰ 《阳明全书》卷1，卷2，卷3，卷1。

⑭㉚ 《孟子》尽心上，滕文公上。

⑮⑯⑳㉑ 《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页403，页416，页247，页373。

㉒㉓㉔㉛㉜㉞㉟㊱㊲㊳ 《洋务运动》（二）页22，页23，页32，页25，页32，页30，页28，页43，页51，页52。

㉙ 鹿泽长：《瀛环志略序》。

㉝ 《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页519，页512。

㊵ 魏源：《海国图志序》。

㊶ 苏轼：《惠崇春江晚景》。

●赵光清

徐继畬与王印川

近年来，松龛先生的两篇短文，引起一些学者注意：一是《书王印川广文诗后》，论佛、道二氏和因果之说；二是《书王印川广文诗注后》，论忠孝和贞节。两文惊世骇俗，道人所不敢道，道人所不能道，生动体现了松龛文章“才力之大”。那么，进而了解王印川其人、徐王交往及两文的背景，就有必要。笔者拟主要从王氏《怡青堂诗集》、《怡青堂文集》对此作点发掘。

关北诗人第二指

王氏名锡纶，字印川，广文乃是对他担任的县儒学训导一职的尊称。嘉庆十四年人日（己巳年正月初七，1809 年 2 月 20 日）生于忻州麻会镇一殷实人家。生他时，母亲梦见登里中南阁，有人赐（锡）予双合砚，认为是将来为官的吉兆，就起名为锡纶。他少小多病，父亲百里求医诊治才免于一死。“六岁母教读，窗前就讲诂。七岁父提携，游行皆简毕。八岁知大义，九岁究声律。十岁偷作文，避人拈彩笔。十一就外傅，篇完夸敏捷。十二学诗歌，十三成卷轴。”[1]然而，自从十四岁开始应试，六次才考中秀才，十余次赴省都未考中举人。到四十岁（道光庚戌）时，省学政才将其考选为拔贡，进京朝考又未获售。家道中落，先后设馆于文水、交城、清源、徐沟、寿阳

等处。咸丰九年(1859)借债到京捐纳县儒学训导,1861 年补临汾县训导。他感伤地咏道:“廷试初从庚戌临,一官需次到如今。卑员偏值年光老,薄俸还当债负深”。

松龛说他“君以选拔,秋赋十余上,华发而气不衰”。夙负诗名,“出入唐宋元明,不名一体。尤工七古,合昌黎、东坡、遗山为之。其得意处,兴象不让古人”。[②]

王因捐官过河北时的七古《真定大菩萨歌(铜像高七丈二尺)》,就足以当之。全诗云:

> 京师昔过大钟寺,一钟为铜八万四千斤。恶髡(谓姚广孝)不解重人力,传闻彼时散落犹纷纷。谁更作此巨无霸,庞然大也摩檐云。我读院中碑云是,开宝之年首其勤。宋祖圣德讵有此,此语无乃愚诬云。尔时果有铜从土中出,何不造为兵,复我燕云州十六?果有木从井中来,何不造为屋,使我疮痍之民皆欢咍?何乃造此无用物,占我农桑地,废我耕作财,徒然不笑不言不履不行不运一奇不建一策尸居如此斗然矗立兮崔嵬!岂有殊勋冠九州,岂有隆名归八垓?第以供人一瞻玩,阍徒索钱喧且豗。况复显德当日亲承世宗业,毁像作钱史所推。讵有及身反造之,坐令二辟成分歧?后世末孙背祖训,天书神语纷可猜。道君嬖蔡奸,乃进林灵素,至今所传道藏之语纷纭诡诞犹难裁。人道不修乃征鬼,庸愚陋妄输婴孩。一旦父子蒙尘去,迁之冰天雪窖仙兮佛兮何往哉!汉明偶一误,千古成罪魁。秦始隋炀虽云暴,未若招致异俗流毒千年该溺人之心害人事。安能长得昌黎程朱其人斩除其居作我民居材。一从钱法事缴绕,十铢荐叶剧潦倒。闾阎坐叹官吏愁,铜运不继何时好?何不取并病虎之钟,万牛持曳餉大农,用以作钱布寰中!

此诗将史、论熔入其中,体现了关心民间疾苦的传统精神,汪洋咨肆,确非寻常手笔,因而受到松龛激赏:“辛酉秋,君选临汾校官,省试路出平遥,手诗卷相质。余读之惊曰,君与遗山同里,诗乃

具体，关北诗人，当屈第二指矣。……识解之超，持论之正，不受迂儒笼络，不作名士佻语，时时以匡扶名教、表正风俗为志，不止风云月露而已。此又工部、香山之遗意，非诗人之诗也！”徐相见恨晚，遗憾未能早得他山。

信佛者愚　辟佛者亦多事

印川虽穷困潦倒，但不肯俯顺流俗，对僧道因果报应之书，恨不得统统焚之。他在清源设馆时，有个笃信僧道的友人某氏，可能是个亲民之官，好刻因果书赠人度人。王说不相信因果报应，这个友人就说，权且生十天病读之，定能立即应验。他诙谐地回答，我早就领教过了，我健康时不愿读它，正是怕生病哩。还口占六首七绝赠送这位友人：“见说洪涛有度槎，缁流黄侣尽争夸。我怀温范两文正，一度生民忆万家。（向见一缁流家书，乃一为督抚者所纂。中言持此度百数十人矣。余不觉失笑：身为大吏，当言治人，不当言度人。且所辖不下数十百万人，而度亦仅此，犹欲自以为功耶）”。“烂柯山畔莫询途，丹鼎丹砂总自愚。更怕修成千岁寿，比量人世止须臾（仙家一日当人世数百年。然则彼言千岁，止吾之一日有余耳，岂不更促乎）”。“经正民兴有典型，讽经诵咒究何曾。劝君双眼长江洗，有道惟闻鬼不灵。”

徐氏读之，认为其中见解与自己往往暗合，放笔写了 1278 字的短文附议于后。此文重申《瀛环志略》和《后汉书批语》一些观点，并加发挥完善，成为徐氏论述道家、佛家比较圆满的文献：

书王印川广文诗后

忻州人，名锡纶。诗为辟二氏及因果之说而作。

道家皆言老庄，然老庄之书具在，并无吐纳烧炼之说。导

引延年，南华尝及之，不过引为闲文，并非漆园宗旨。秦皇汉武，信方士欺诳之说，曰不死之药可得，黄金可成，其说与老庄无涉。两人以帝王之力，求之不已，卒无成效。刘安集方士著书，乃凿凿言之。道家讳其谋反湛族，而曰拔宅飞升。有两友人皆当世贤豪，弟总角之交，以兄事之。两君酷信烧炼，砂汞耗财致贫，炉火熏灼致病。尝争之曰，秦皇汉武不能得，而两兄欲得之，不量力矣。且曰大道在是。夫欲不死，贪生也；欲点金，贪财也。发念在贪，而曰大道在是，吾不信也。两君亦哑然失笑，然为之不已。两君非贪财，亦不敢吞服，因性好奇，故为人所愚。后乃悔而不为，然家资已耗其半矣。服金丹而死者，历代多有之。炼内丹结圣胎而死者，亦尝屡见其人。道家后来之书，皆祖于吉太平书，《后汉书》注，言之甚悉，即张道陵之所祖，今所谓张天师者。张宝、张角、张鲁，衍其说为五斗米教，会稽王氏崇奉之，与所谓老庄者风马牛不相及也。

佛教起于五印度，侏儒之俗，与中国殊异。周孔之化，无由渐被，彼土聪明之人，劝令戒杀、戒淫，怵以果报，使之忏悔，其用意原无所谓非。汉明帝感金人之梦，无端遣使求之，佛法遂入中国。乃中国开门而揖，非佛法之能乱中国也。其时首崇信而舍身供养者，楚王英也，以谋反杀身废国；创建琳宫耗费民财者，广陵太守笮融也，卒为黄巾赤其族。事佛求福，乃更得祸，昌黎之言，可谓明辨，特愚人迷不悟耳。文中子曰："佛，西方之圣人也，行于中国则乱。"朱子诗曰："亦是聪明奇伟人，能空万念绝纤尘。可惜当年处西土，未听尼山讲五伦。"两大儒平心之谈，令人心折。愚民所好之佛，土苴木偶，专为祈福，至浅鄙不足道。士大夫所好之禅，所谓宗门祖派，其机锋语，似微妙可思，然亦儒流佞佛者，援儒家性命之说，参入其中，并非禅教本来面目。此又儒家引之入室，非禅教之能动人听也。先儒辨之已详，不烦觍缕。我朝崇重佛教，拥护两藏，立黄教喇嘛为六

大座，分统内外蒙古。乃因蒙古信佛，顺其俗而利导之，使之安于游牧，不生异心。此列圣安边大计，执两用中之微权。俗儒不知，妄议本朝之好佛，何殊呓语？世祖世宗两圣人，皆深于禅理，御选《十大禅师语录》、《圆明居士语录》，宗门老宿，莫赞一辞。然两圣人之治天下皆纯用儒术，德比尧舜，制轶武周。大圣人学贯天人，化裁通变，更非小儒所能窥测。窃谓信佛者愚，辟佛者亦多事。先儒辟佛之书，汗牛充栋，昭如日星，更不烦后来薪积。今髡徒遍天下，不过游惰不耕之闲民。纷纷揭竿者，并非僧道。则天下之治乱，又何关乎此辈？大抵儒者著书，中无辟佛数条，则以为不合绳尺。窥其隐衷，不过睥睨两庑牲牢耳。陆王近禅而亦辟佛，孙夏峰参合朱、陆、薛、王，而亦有辟佛之论，自是讲学格套，与昌黎之大声疾呼者异矣。我辈读书则修儒业，为吏则广圣化。元气既足，外感自不能侵，所谓经正则庶民兴也。否则二氏之外，又益以回教、天主教，口诛笔伐，不亦劳乎？大作欲焚黄缁书，即焚骨人人火书庐居之意，为愚人说法，最为有益。此正是昌黎家法。河间纪文达公有言曰，佛教不畏宋儒而畏昌黎。宋儒所辟之佛，就义理精微言之，于彼教无伤也。昌黎之说行，则髡徒无宿食之地，故深畏之。昔孟子辟杨、墨，一切不与深言，而但责其无父无君，此正黎昌学术之所由来。大作深得此意，拜服之至！弟生平不喜道家之说，其书荒诞不足观。佛氏教门之书，称为相宗，驱神役鬼，幻杳无凭，付之一笑。宗门之书，称为性宗，即禅教也。《楞严指月》，中多清悟之语，意颇喜之，然亦不过资为谈柄，采为诗料。如读钟谭诗，姑尝别味，实未入其藩篱也。因读大作，辄刺刺书此，以质高明。大作制题，所云好刻因果书者，其人其书，弟皆知之，不足观，亦不足道。其人已往，付之勿论可矣。弟畲再拜不宣。

放笔为之，是壮悔堂文体。此种议论，俗儒所惊，然未

必敢驳也——自记。[3]

文中关于佛教源流的议论，表明已具备了多元世界观。他对宋、明、清诸大儒，包括王阳明的辟佛，都不以为然，认为他们搞那讲学格套，是为了在死后从祀孔庙，坐于两庑之下，分点冷猪肉吃。“信佛者愚，辟佛者亦多事”，在先儒辟佛之书汉牛充栋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徐对此文很自信，认为可与壮悔堂文媲美。李迈堂《国朝文录》称侯方域《壮悔堂文集》，“旨远词文，耐人寻绎。读之如九霄鹤唳，三峡猿啼”。[4]徐文亦当之无愧。

忠孝至性与男女大欲同出一源

“杨花堕地无人惜，老来尚作飘零客”。王虽比徐小十四岁，但年过半百仍不得不抛却病妻，远出研食。他俩的命运，是相似的。1858年春，王就聘到寿阳阎家当私塾教师。主人是户部主政阎汝弼，以经学世家，与军机大臣祁寯藻为世姻。初春至寿阳，途经泰安驿，登临韩公诗亭，只见上有韩愈《寿阳驿题绝句》：“风光欲动别长安，春半边城特地寒。不见园花兼巷柳，马头惟有月团团(长庆二年出差镇州途中作。寿阳驿在山西)。”王说《唐语林》谓此诗“意有所属”，意指韩属意于他的二妾：绛桃和柳枝。[5]许多人出于维护韩文公形象的目的，力辨此说乃附会。

王氏对这种隐讳颇不以为然，身临其境后认为，韩公在春寒料峭中艰难跋涉在崎岖山径上，忆起温暖的家庭和娇妻美妾，这即使是事实，也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他作七绝《泰安驿韩公诗亭》并加注释：“驿路孤亭曙色开，晓寒犹自逼人来。园花巷柳何妨忆，奉使韩公未易才(文公过寿阳驿诗，前辈多辨其非忆桃柳二姬者。余以为小说所载原非定论，但此在公甚无关轻重。即存是说，为诗词点缀，酒间灯下述之，未尝不芬人齿颊，与小桃留花不发首作印证，未为不可。公生平大节，奉使不辱，致可贵耳。辄欲讳之，反觉陋

隘)。”

徐对王的见解十分赞同,写了760字的短论呈正。该文从陆王心学出发立论,认为忠孝至性与男女大欲同出一源,即从人心产生,都不能废止,也都不应无所节制。驱经策史,崇论闳议。以伯鱼之母、子思之母、子上之母,即孔子之妻、伯鱼之妻、子思之妻三世都改嫁的“孔氏家法”,对后世道学家认为寡妇再嫁为失节的迂腐见解作了有力的批驳。短论前引原注、后有自记,全文如下:

书王印川广文诗注后

原注云,文公过寿阳驿诗,前辈多辨其忆桃柳二姬者。小说所载,原非定论。但此在公,无关轻重,即存此说为诗词点缀,未为不可,与公生平大节,正是无碍。关壮缪上表孟德,乞取秦宜禄妻,于公磊落行谊,究属何害?而谈公事者,辄欲讳之,反觉鄙隘。鄙见如此,请质高明。

昌黎过寿阳驿诗,谓忆桃柳二姬,说本穿凿,不足深辨。即使有之,亦复于公奚累。玉烛频摇,金钗半醉,何碍于公之岳岳。杜工部每饭不忘君,而云鬟玉臂,语丽情悲。屈灵均孤忠自沉,而《离骚》一编,言美人者居半。盖诗人吐谈意兴,与宋儒讲书语录,判然两事。苏子卿仗节牧羊,偶胡妇而生子。王大令东晋名流,桃叶桃根,传为佳话。白香山立朝风节,砥柱中唐,樊素小蛮,星添柳宿。胡忠简忤秦桧,远窜海南,黎娃握别,垂涕沾臆。文文山正气拄乾坤,作郡时尝有歌童舞女。忠孝至性,与男女大欲,同出一源。欲其真,不欲其伪;欲其节,不欲其流。流而无节,岂特男女之淫秽。伯奇握蜂而死,申生不辨胙毒而死,权鬻兵谏而自刖,原轸唾地而归元,后之人悲其志,未尝不悯其愚。故忠孝之流而无节,其失为愚;男女之流而无节,其失为淫秽。清浊虽异,消息自同。然不得戒愚而废忠孝,又岂能惩淫秽而废男女?圣贤豪杰,大抵不远人情。孟子谓太王

好色爱厥妃，岂以戏语污太王乎？梁伯鸾得孟光，孔明得阿承女，不嫌其丑。设两妇淑而且妍，两贤未必弃而不取也。风诗之义，发乎情，止乎礼义。窒其情而不使发，圣贤亦不能，但贵乎能止耳。今有人曰，我性不好色，是伪也。窃妻而逃，或出于目不邪视之人，又可信乎？

关壮缪取秦宜禄妻，事极寻常，与秉烛待旦，有何加损。娶寡妇为己失节，伊川程子之言也，宋以前尚无此说。孔子为人伦之至，而伯鱼之母、子思之母、子上之母，三世皆改适。使己妇失节，又陷娶者以失节，圣人忠恕，不宜有此。夫礼制因时而变，风议因时而发。宋承五季之后，世风靡靡，夫妇一伦，轻亵已甚。故伊川立此严峻之防，使士大夫有所矜式，非为愚夫愚妇言也。周制，同姓者百世不同昏姻；夏商以前，五世即通。将执周道而议夏商之渎伦可乎？故执孔氏之家法而訾伊川，妄人也；执伊川之论而疑孔氏，其妄不更甚乎？

柏舟之节，桢干人纪，夫妇一伦，赖兹不坠。伊川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者，匹妇能毅然行之，诚令典之所重，志乘之所必详。苟有其人，宜竭力表章焉。不能守而改醮，亦常情耳。彼故为贤，此亦中人，未为不肖也。慕其名而强效之，客气一衰，大僇随之矣。弟生平所见如此。读大作诗注，与鄙见相合，书此呈政。如乖谬，幸垂示。弟畲再拜。

> 村学究见此议论，未免惊讶，然皆平正通达之言，不读书者，自不知耳。文体欲仿壮悔堂，参以柳州之廉刿。虽未成体，而八股俗调，已去大半——自记。[8]

松龛此等放言高论，亦因受其父广轩影响。《敦艮斋时文》有篇《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其中说："世之人每思绝欲存理以为道，而卒苦于欲之不可绝。君子谓是为不知道也。夫妇一伦，所谓大欲所存者，第授之以节，而天则见焉。端造于此，欲之所在，正理之所在。从欲从理，不分两事，其于道也，有秩然者矣……道患其息，不

息于至易息之地，斯不息矣，若是者惟夫妇；道害于伪，治伪于不能伪之地，则无伪矣，若是者亦惟夫妇。"松龛对父亲鞭辟入微的见解，心领神会，编《敦艮斋时文》时附记："先君子晚年，案头唯《周易》、《中庸》两书，每有所会，辄拈一题抒写……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皆性道之微言，未可与寻常八比家较论工拙也。"

理解传统，才有可能突破传统。由于对儒家性与天道的学说有精透的理解，所以对假道学的批驳就入木三分。

心折徐公辞荐牍

1861 年七八月之交，王从临汾赴太原乡试途经平遥，拜访徐，求为诗集作序。徐细读之后立即作序，给予很高评价。王对徐任封疆大吏和太仆寺少卿（八驺吏）回乡后仍笔耕养家，表示由衷羡佩。九月初，王在返临汾途次作《介休上徐松龛中丞》七律二首，记述自己在超山书院的见闻，表达崇敬和感激之情：

> 登堂未敢鄙心萌，德已熏人感至诚。家世本崇偏善下，头衔虽重不知名。碧油幢拥闽波肃，金鉴星悬蜀宇清。谁道频年八驺吏，归来犹是老诸生。
>
> 掩户萧然自著书，缤纷桃李绕阶除。文章妙得江山助，学问兼从历练储。碧眼侍笺邹衍传（《瀛环志略》一书，公从米利坚人访成之），黄巾争避郑公闾（癸丑甲寅间，公防堵晋省东界，所至之处贼皆远遁）。弁言矜宠吾何敢，得奉钧陶幸有余。

此次相见，对王氏影响甚大。他见徐曾为高官还"掩户萧然自著书"，自己身为冷官更应以著述自任。而徐亦鼓励王多写有益于儒学和"圣化"的诗文。咸同间，在祁寯藻等倡导下，三晋诗坛称盛。在京有诗以瘦劲名于时的董文焕（书画家董寿平之祖父）、董文灿弟兄等。锡纶与他们也有酬倡往来。王还有一个朋友叫秦东来，当时在太谷收藏家孙近居处设馆。孙氏财力雄厚，藏书籍、字画、碑

贴、彝器甚富。王亦希望秦在饱读孙家藏书的时候，作些读书笔记，整理出孙家书目。王还告秦自己的著述进展："弟自辛酉夏为松龛中丞怂恿，谬为此举，刻书七种，他尚有七八十本不敢刻。"还向壬戌山西乡试主考官翁同龢去信汇报："为诸前辈及友人怂恿，付梓诗六本、古文四本、孝史二本、论文绝句一本"。

秦东来因孝母成三晋名士，受到祁寯藻垂青。同治帝即位，特诏起用祁，以大学士衔任礼部尚书。祁上疏："军兴以来，不讲吏治。请下中外大臣保举循吏及伏处潜修之士"，祁还"荐直隶知县张光藻、陈崇砥、王兰广……山西举人秦东来，并嘉纳允行"。可是秦仍以养疾推辞，并把致祁的信抄王阅。王因此作寄怀二首。其二为：

> 十年奉母罢公车，廿载邱园乐未疏。上相喜能推国士，幽人终自爱吾庐。论崇荀孟非忘世，道广河汾足著书。心折徐公辞荐牍，后先高躅映乡闾（辛酉秋，谒松龛太仆于超山书院。时公方被征，出所作寄大中丞书，亦乞以疾辞）。

此诗道出一段史实：早在1861年，朝廷就准备重新起用徐氏。徐接到山西巡抚英桂的有关官方文书后，以年老有病推辞。王认为秦东来的品德可与徐媲美。

由此可见王对徐是十分崇敬的。然而王亦自有其见解。徐劝其勿再辟佛，意在引导他把有限心力用于关于国家治乱兴衰的重大问题上。王亦理解徐的深心，可是他仍一如既往地辟佛。他曾给一个名叫王耐庵的信佛而力主戒吃牛肉的朋友连去两封长信，申言佛教之谬。信尾还附言："古云，佞佛者愚，辟佛者迂。辟佛之论，前人甚详，原无事今之哓哓，且纶亦非以此自诩卫道者。然近今友朋中入于愚者颇众，不得不一为拯救，号之为愚所不恤焉。"此处古人云实为徐氏所言。王氏并未拘泥于徐之指点。

从王氏诗文看，与徐一样，爱舆地之学，有《汾水考略》、《西域考略》等篇什。诗文集中还留下关于晋商、光绪三年奇灾等宝贵史料。其《丁丑奇荒记》等记载，光绪三年五月后，山西一带连续十多

个月无雨。加之许多良田种了鸦片，交通运输困难，全省饥民不下四五百万，“饿死者十五六，有尽村无遗者。小孩弃于道，或父母亲提而掷之沟中者，死则窃而食之。或肢割以取肉，或大脔如宰猪羊者。有御人于不见之地而杀之，或食或卖者，有妇人枕死人之身嚼其肉者……”当年九月朝廷派阎敬铭来晋督赈，与巡抚曾国荃协心齐力借款买粟平粜。王急上《急救饿死贫民赈粜合一以厘诸弊议》。阎敬铭批语云：“此议语语切实可行……平粜胜于施赈，尤为的论”。并写信让王急赴运城行辕，王以望七之躯毅然命道。他的诗文至次年而止。《山西献征》的《学博王印川先生事略》说他“光绪戊寅卒于家，年七十岁。”从最后几篇诗作看，他是这年冬病死的。

王创作年代从1819至1878年，即从10岁至69岁。到1918年，山西大学文史教授张友桐征文，王之玄孙鲁封抱其遗书乞校。张通读了怡青堂诸书，从四十余卷草本中，选编为《怡青堂文集》6卷，忻州陈子庄(名敬棠)、王树侯出资赞助印行于世，《怡青堂诗集》8卷亦同时印行。张认为王氏“才不见用，老于闲散，晚获一荐，蹭蹬依然。此所以郁勃于胸臆而一寓之文，不觉其语之长，心之重欤！”文稿虽未惨淡经营，可是“精气卓识，往往迸现”。

(作者赵光清，1926年生，中共忻州地委党校副教授)

注释：

① 本文所引王锡纶诗文，均见于民国六年张友桐编、忻州市地方志办公室藏《怡青堂诗集》、《怡青堂文集》。

② 《松龛全集·文集》卷一，王印川诗集序。

③ 同上，卷四。东冶徐尚文在向五台县捐献《瀛环志略》多种稿本时，捐献松龛手稿《随时杂作》一册，有文字者30页。封面有徐培伦题识：“七曾祖松龛公手书。前后皆公手笔。望我子孙世世宝藏，切勿以故纸弃之。式彝徐培伦手识。”内有手稿三篇，依次为：《介休田氏族谱引》、《书王印川广文诗后》、《题王广文诗注后》。杂作中《书王印川广文诗后》题、文均与《松龛全集》所载吻合，《松龛全集》所载，唯在文尾增“自记”二字。杂作《题王广文诗注后》与《松龛全集》所载《书王印川广文诗注后》标题虽不同，内文却基

本相同。对本文全文引用的这两篇文章，标题仍据《松龛全集》，内文以手稿为底本，与《松龛全集》校勘，断句、分段、圈点亦据手稿，手稿文字加圈者用底线表示——编者。

④ 《简明中国古籍词典》页 363，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7 年。

⑤ 《韩愈诗选》页 144，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又见清代华西闵著《广事类赋》卷十九，引《语林》："韩退之侍妾一名绛桃，一名柳枝。退之奉使王庭凑至寿阳驿，有诗曰，'风光欲动别长安，春半城边特地寒。不见园花并巷柳，马头惟有月团团。'盖有所属也。追归，柳枝窜去，家人追获。及镇州初归诗曰，'别来杨柳街头树，摆乱春风只欲飞。惟有小桃园里住，留花不发待郎归。'自是，专属意绛桃矣。"

⑥ 见徐氏《随时杂作》手稿，《松龛全集》卷四。全集所载文有异：如"赖之不坠"、"已去太半"，均已据手稿改。取、娶本通用，徐氏手稿、全集皆混用，但全集多用娶，今据手稿改。又据《辞原》、《辞海》，籰权应为籰拳。手稿作权籰，疑有误。——编者

●李木子

徐继畬与薄承砚

徐继畬的同窗、姐丈薄承砚，定襄县芳兰镇人，字石农，号六愚居士，生于 1791 年，约卒于 1863 年，少年即好为诗，白首犹穷困潦倒，“境益窘而吟益多”，《傲霜园诗抄》（以下简称诗抄）收其诗 340 余首。诗抄的初版本是薄的门生王亮功于咸同年间刊行于世的。现在见到的是民国五年牛明允刊印的《雪华馆丛编》本。前有徐继畬的序，另有《薄石农小传》。诗可存史。我们研读诗抄，也可从一个侧面增加对徐继畬的生平和思想的了解。

徐薄青少年时期的学习生活

从诗抄可知，徐薄同学加姻亲的特殊关系是少时就确定了的。广轩门生众多，薄出类拔萃。薄长徐四岁，两人才相埒，志相得。薄“制义得先君子法，出入启祯诸家，文心清绝，先君子极许之”。故广轩不计薄少年丧父、家境清贫的状况，“爱其才”，将唯一女儿许配与他。薄徐就由“同砚席”、“少时居游如昆弟”，进而变成姐夫与内弟的关系了。

薄有诗云：“忆我少疾苦，孑孑谁与亲。并蒙托外舅，随处加托循。饮食兼教诲，斯文与传薪。过庭有松龛，诗礼训同遵。”徐也说：“与余孩提长，重之以姻亲。趋庭相后先，诗礼两人均。”他们受着好

陆王之学的广轩的家风熏陶和诗礼启蒙，逐步养成幼承家学而好博览，关注时事的通经致用、知行合一的思想作风。薄生平精理学，辩论高妙，还写诗对王阳明推崇备至："俗学昧经世，安能致太平。风云起方寸，独服王阳明。"

广轩先生对女婿、公子的功名前途寄予厚望，谁知薄却屡试不第。徐1826年考中进士时，两人已届中年。当徐陶醉于"殿试得二甲，五台县于今初见；朝考获第一，山西省特未前闻"的赠联赞扬时，可能是薄经不起思想上的打击，精神上的刺激，"忽得怔忡，几危"，染上了恐惧忧郁之病。从此，薄开始了"壮年抱沉疴，辗转终不起"，"还学陶靖节，顾问惟桑麻"的田园蹇困生活。而徐则策马扬鞭，踏上了宦海升沉、忠君报国的政治里程。

徐薄中晚年交谊

徐从政到罢官的数十年里，与薄的相互关系见诸于诗抄的游历、述志、忆旧以及两人的酬答篇章，交谊基本上是笃深的。可是，薄流露出的寄人篱下、牢骚忧怨、孤愤慰藉、失意自责的情绪，明显看出相互间个人感情上有过不愉快的曲折经历，从侧面展示了徐洁身自持、回避亲友的廉政仕风。这与徐"耿介自信，足不履权贵之门"，"谨守先训，饮冰茹蘖，不取一钱"的操守是一致的。在封建社会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官场中，这很难能可贵。

1836年，徐继畬出守广西浔州。此时薄的身体已渐康复，开始依附徐南下漫游、求官。"万里还携药一囊，只因多病学歧黄"。一再追踪徐的宦迹。"十年九出门，故园几绝迹。岁暮飘然归，至家还是客"，"自笑浮萍荡此生，南旋稍慰故乡情"。他泛洞庭，溯潇湘，越桂林，沿邕江，又逾仙霞，汛剑西，足迹遍浔州至福州的名山大川。然而，"十载风尘征鬓角，一腔心事付毫尖"。徐恪守封建避亲制度，不便委任薄任何宾客、幕僚职务，致使薄的失落之感不时地从诗中

由含蓄进而鲜明地流露出来：

中岁染沉疴，久乏风云气。无端想非非，百非无一是。冒险涉江湖，所为诚何事……万里走孤蓬，百日劳心计。意速行反迟，所往辄淹滞。

——《行路难》

由来行路难，求人更不易。终日苦奔波，所为区区事……长为传食人，即此亦已利。善交以淡成，市交以甘弃。不作风尘客，安见炎凉意。

——《客寓遗怀》

诗人对长期居于客馆，作为辗转受人供养的“传食人”的栖遑生活是不满意的。诗中的“所为诚何事”、“区区事”究竟是什么事？当不是物质上的追求，也许是想通过徐求得一官半职吧。然而在徐面前，欲提不能，欲罢不忍，心情复杂，“百日劳心计”。或者开口以后遭到徐谢绝。在无法解脱的情况下，托物抒情：

江寒木落影依稀，南望天涯北雁飞。关塞秋风难久住，潇湘暮雨又思归。平沙万里光阴过，寒夜方知旅客非。万里云山都入梦，那堪回首怅斜晖。

——《秋雁》

呢喃佳话一时稀，画阁重帘怅落晖。托迹梁间原是客，寄人宇下那如归。

——《秋燕》

少年同窗，呢喃多情，“文章相切劘，志相得”的佳话已一时稀了，万里云山的理想抱负也化为烟霞梦幻了。潇湘胜景、帘阁佳寓掩不住思归情绪，展示了寄人宇下、愁肠百结的无奈何心态，甚至呼出了“独不见光武中兴日，犹入深山访子陵”的抱怨声。

薄 54 岁左右最后一次出省晤徐，然而，“官因君去冷，数自我来奇。骥尾犹难附，穷途亦早知”。凭托骥尾一展抱负的希望彻底破灭：“从今认得安身处，风雨蓬庐是故乡”，官宦生活和自己已无

缘:"岂为功名作运筹,白衣从事白衣休"。一边作农,"种瓜瓜自得,种豆豆自收。即此愿已足,万事都无求";一边吟咏,"何当踏东篱,一看傲霜节",过起了半农半诗的生活。

薄"长于孤苦之中","性不偕俗,见富贵人辄望望而远去",引为知己者只有徐一人。而徐坚守廉隅,珍惜名节,只好借韩昌黎振孟东野于孤寒而延其声誉的掌故,叹息对薄"力不足以济之穷"、"使之名当世"。对薄的偏激情绪、愤惋心理,还是理解谅解的。而薄也在感情危机中进行反思,认识到"功名富贵多危境,得失关头似战场"。当他窥破世事时,徐亦罢官归里,这时两人"皆皤然老矣"。薄更是老态龙钟:"两耳聋已久,雷霆瞀不闻。与君不能谈,枯笔代齿唇。君览辄大笑,妙论响然臻。"徐与薄相处的日子又多起来。两人品诗论文,互相慰勉。徐上党防务结束返里不久,因生计所迫,1856 年刚过立春就应请主讲平遥超山书院,薄作诗饯行:"一月与论文,穷愁亦顿遣。送君又南行,故人从此远。""君以客为家,我以老作壮。岂必异人情,时势亦所限。人生如浮萍,谁能定聚散。风雨催行旌,谈心时亦暂。"在闽时,徐就把薄的独子于逵带在身边,帮助校对《瀛环志略》刻本。这次徐又把于逵带到平遥,协助他讲学、抄校八股文集书稿。

两人都已年逾花甲,却都没有积聚下防老资金安享晚年。徐"八口之家仰砚田,敢嫌修脯太戋戋",靠每年二百余两束修养活全家和近亲。薄因身体欠佳,阳春三月也"蔽蕴不离袍",已不能笔耕,精神生活却也丰富:"览镜乍怜垂白首,开函犹抱不灰心。案头剩有毛锥子,一扫残云啸古今。"薄与徐一样,爱书法绘画,都酷爱颜真卿的争座帖,"素爱争座帖,临摹苦不佳。近来无一事,日日手画沙"。对画的审美趣向,薄是:"下笔必须开生面,嚼墨一喷如烟云。"徐是:"画法之妙全在烟云变幻之中","工细之笔间以写意,亦甚可观也。"

薄年将七旬时曾拖着病体出过两次远门。一是暮春南下平遥

面晤徐，受到热情接待："忽减征程苦，风尘气一新。主怜多病客，天惜老年人。得酒方知味，看花乍觉春。案头有书卷，即此可怡神。"二是北游代州看望表侄王亮功。王字寅卿，定襄嘴子村人，薄的门生。薄回忆当年自己在介休、五台塾馆训蒙时，诸生童中唯王是望。王却于1854年以举人选代州训导，当冷官。薄开导他"虱官岂足贵，广文犹较清。勉励勿厌冷，官冷心自平"。薄嘱徐写序和嘱王刊行自己的诗集很可能是这两次旅行提出的。但刊行问世时，薄徐均已离开人间。

徐为《傲霜园诗抄》写序并写了《赠薄石农姐丈四十韵》："乾坤有清气，不赋裘马人……定襄有畸士，文慧来夙因。其于古作者，温故能知新。白首困棘闱，肮脏一头巾……昔我官岭峤，君来到海垠。忽忽二十年，须发俱如银。迨我归故里，昔年人多陈。君独支瘦骨，过从及良辰。却似枯藤杖，人嗤骨相屯。独余此清气，犹复解呻吟……愿君保耆艾，长为八百椿。"薄以《松龛以长篇见赠聊为长章未步原韵》作答："昔官闽中抚，薄书日纷陈。今作山中长，众才资陶甄。全力攻制艺，苦无舒啸辰。愿君仗斗酒，下笔自有神……人生重知己，加之以内姻……相关共休戚，切若齿与唇。惜我复重我，情长语自伸。"历经沧桑的文坛老友之间深情厚谊，跃然纸上。

诗风的熏染及爱民篇章

徐薄晚年在诗歌创作中探讨切磋，诗风互有影响。

薄评徐："松龛邃诗学，诗笔亦嶙峋。取法近韩杜，余子非其伦。"还勉励徐："风雅非小道，命笔各加勉"，"百篇至再再，积成席上珍"。徐评薄："唐贤中独喜孟东野……诗体近襄阳、苏州，峻削处微似东野，实不专于孟也。其好东野诗，盖取穷而后工之意耳。"又评云："其诗兼韦柳，唐宋往来频。"而薄自谓："神往在古人，我怀孟襄阳"，或"谁识韦苏州，高风早挂冠"，或"少陵自穷愁，不掩真气

骨”。薄还推重清初吴嘉纪、傅山:“品高诗亦高,我爱两征君。”

他俩的诗有一种倾注现实主义情感、体现忧国爱民思想的共同特征。徐最具人民性的《驮炭道》、《啖糠词》是写家乡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杰作,人争诵之。至1925年,晋南民主革命者梅景九,还将两诗刊登在他所创办的《国风日报》军民《叫苦集》专栏。

薄一生蹇居乡间,长期和下层劳动人民为伍,对农家生活的甘苦有切肤体验。“悲歌寓感慨,言皆由苦衷”,“诗以穷而工,不穷便无诗”。他的笔底展现了一幅幅农村艰苦生活的感人画面。如《挑菜》:

> 糟糠犹不足,挑菜如分肥。岂必嗜佳味,即此可充饥。蹴踏赴田野,妇子携依依。粗菜盈筐贮,细菜裹于衣。但得不空往,安问葑与菲。傍午待炊爨,母归儿未归。饭后悬母心,出门望依稀。携筐人尚众,不知中是非。忽杂群儿出,归路当夕晖。

薄诗中还体现了墨家兼爱思想。如《博爱》云:“夙性颇博爱,所愧力不赡。解衣与推食,虚愿徒沾沾。我本一介士,疾苦知穷檐。食力已不给,况复饥馑兼。去年减收获,还望今岁添。安得沛雨淋,万户歌既沾。”

诗抄中不见春闺幽怨诗,《女木工》却塑造了一个手艺精湛的农村女艺匠形象:“群材任斧削,运斤亦生风。观者每惊讶,惟恐伤其躬。岂知昂健步,远木犹能攻。耻言妇人事,好谈古英雄。”薄的咏史诗,亦有讽喻之意。“五代唐为盛,庄宗百战功。能创不能守,终失乃父风。”似在悲叹大清的后继无人。

(作者李成文,笔名木子,1950年生,定襄县广播站编辑。)

●赵培成

徐继畬修志观点及其《五台新志》研究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历代相沿的优良传统。卷帙浩繁的各类地方志书，是中华民族文化典籍中的优秀遗产。在编修地方志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方志学专家，如清代章学诚、戴震等。对于徐继畬，很多人知道他是一位思想家和地理学家，却不大知道他是一位地方志专家。他对地方志的深入研究，自成一家的修志理论及编修《五台新志》的实践经验，是其学术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就其修志理论观点及其编修《五台新志》的实践作些探讨。

《论县志书》的主要观点

徐继畬的修志理论，集中体现在同治三年(1864)的《致武芝田观察论县名及县志书》一文中：

> 山西郡县志，弟所见无多。省志亦不过集各州县志而成，因讹袭谬，绝无可观。惟《潞安府志》沿革尚不甚舛误，文亦晓畅，自系出通人之手，苦太烦冗，尚须删节。最芜者太原各志。如唐叔虞之建国，本在平阳之翼城，不在太原。而太原县有古唐城。此缘郑康成一语之误，遂有先都太原后徙平阳之说……

又唐代丛书载，狄梁公裔孙惟谦为晋阳令，因祷雨沉女巫……比之西门豹……而修太原、阳曲两志者乡贤名宦皆不收，则其采访之疏漏可知。三晋志书名作，惟汾州府及汾阳县新志出于戴东原之手，景星庆云，偶然一见。此不独山右所无，即宇内亦仅见。其汾州府之旧志，弟亦见之，则前绘八景城庙图，俚俗与他处无异。此外，惟关中五志及陆清献所修之《灵寿志》称为名作。闽省之《宁化志》亦最有名。弟好李寒支之文，其全集尝读数过，此志亦出寒支之手。各志小叙，似庐陵五代史，可称奇作。惟腹笥淹博，不免贪多。羊枣十之二三，脍炙居十之八九。止可以奇文学之，非志乘之正体也……关中五志……朝邑、郃阳太简，惟康对山之《武功志》，繁简合中。陆清献之《灵寿志》，利病详核。[①]

从中可以看出，徐氏最推崇的是戴震编修的《汾州府志》、《汾阳县志》，以及《武功志》和《灵寿志》。字里行间反映出的修志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1. 采访要认真，资料要翔实，不可“因讹袭谬”，“采访疏漏”，产生舛误。徐氏批评，《太原府志》记载唐叔虞之建国在太原，不符合史实，建都本在平阳(今临汾地区)的翼城；又批评志书记载祁县有辋川，说是王维的别业，而唐书载王维为河东人(今永济县)，又辋川在陕西兰田县，本宋之问别业。这些都是采访疏漏，因讹袭谬造成的舛误。而资料的翔实可信，则是地方志书的生命，如果资料不实，志书就绝无可观。

2. 内容要繁简适中，既不可贪多，炫耀“腹笥淹博”，烦冗芜杂，也不可太简。徐氏认为《潞安府志》太烦冗，最芜者为太原各志。阳曲、太原两志且失之过简。唐代丛书载狄梁公裔孙惟谦任晋阳令时，政绩显赫。任满当去，民不肯舍，加三品服终于任。而修阳曲、太原两志者乡贤、名宦皆不收，可见其内容之单薄。

3. 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做到“利病详核”，秉笔直书。徐氏认

为陆清献所修《灵寿志》，最大优点是利病详核，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认真分析当地的优势所在和不利因素，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勇于秉笔直书。志书是资治之书，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总结经验教训，“利病详核”。

4.要不落俗套，敢于创新。反对描绘俗例相沿的八景图、寺庙图。徐氏认为修志不能“援例以求”。他说各州县志之八景，始于东坡虔州八境诗，后之修志者规以为例，九则削其一，六则凑其二。何处无月、无云、无雨，何处不归燕，“荒陋可笑”，“奚足为景”？他决意“不仍旧贯”，明知“必不惬众人之意”，也要将八景图之类“一概削去”。

5.严格区分史志，寓论于叙事之中。徐氏不赞成以“叙”议论，认为宁化志中的“小叙似庐陵五代史”，“止可以奇文赏之，非志乘之正体也”。还认为专门记述佛教史迹的《清凉山志》与志书也以不同的体例相区别，“彼释典，此县志，何可混而为一”？

6.语言要晓畅，应出“通人之手”，不可疙疙瘩瘩。

这些修志观点是十分中肯的。它丰富了我国的修志理论。

对于旧志的批判

五台县自金朝天会年间创修县志以来，明清两代曾几度重修。可惜明代以前的版本毁于战火，散佚无存。现存五台县志有康熙二十二年版一卷（存北京图书馆），和乾隆、光绪年间纂修的版本。在《论县志书》中，对于康、乾年间的《五台县志》，徐氏从体例、内容等方面进行了批判：“旧志荒落已甚，体例全乖。创始者不知何人，似于志乘体裁茫然未解。即如方外一门，在别县可有可无，在五台则为至要”。又指出，五台“古德尚多，节之皆可成小传，而志无之。《五代史·东汉世家》称……五台山僧继容……为人多智，善商财利……多蓄积以佐国用……至太师中书令卒，追封定王。按继容于

佛法不足道，而其事迹则关系五台山古今大局……而旧志竟佚其名。其所胪列者则各丛林名目碑记，不过钞袭清凉志而已，彼释典，此县志，何可混而为一？即欲存其名目，仿朝邑志之例，不过千余字已无挂漏。乃连篇累牍，以祸梨枣，何其不惮烦！又载梆腔戏文出家之杨五郎，岂不令阅者齿冷？又艺文志所载清凉山诗多近代人作，颇有打油恶札。而吴梅村、朱竹坨两诗伯，集中皆有清凉山诗，梅村诗五篇，尤为高唱，而志皆无。修志者见闻，亦未免太狭矣。至我朝三圣人屡幸五台，为民祈福，兼以抚绥蒙古，六飞莅止，凡十余次。驻跸回銮之年月，必宜恭纪。多士迎銮献赋，召试之诗赋题目，取士之等第姓名，必宜纪载，而志无一语及之，尤为失其轻重”。

徐氏对旧志的批判，进一步反映了他的一些修志观点。

1. 县志应体现地方特点。他说：“即如方外一门，在别县可有可无，在五台则为至要。邑以五台山得名，五台山以文殊师利道场得名。宗门古宿，见于《指月录》诸书者甚多。文益禅师为五宗之一，称为清凉宗，内典多其所译”。五台山佛教是五台区别于他县的地方特点，为了突出地方特色，它在县志中应有特殊地位。

2. 要广搜博采，突出人物传记。人物，从古至今，应该是地方志记载的主体。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人们与大自然的斗争史。县志更要突出人物。徐氏指出：“至人物一门，自明以前草草数人，国朝张龙池先生，理学名儒，为傅青主征君畏友，旧志有传。而郑乐山太史，劾喇嘛之横恣扰民，除积年之害，志载其疏而不为立传。又知县事陆公长华手缚典器喇嘛锁呐元旦穷治之。事得上闻，追夺大喇嘛提督印……由是喇嘛敛迹，县民喜若更生，至今家尸户祝。名宦传中当首为立传，而旧志无之。今欲为之补立，而陆公之资贯已无从查考，尤为可惜。”他认为，五台“古德尚多，节之皆可成小传”。除上述诸人外，其父徐润第等，都应立传，以突出人物。

3. 强调县志应记载国家大事，以补国史之遗。他认为，康熙、乾隆、嘉庆三帝十余次到五台山礼佛，其政治意义是抚绥蒙古，团结

少数民族，维护国家安定。这样的国家大事发生在五台县，县志“必宜恭纪”。如不纪载，便是“失其轻重”。而且正史中对这些也不可能详加记载，所以县志辟出较大篇幅，就能起到存史、资治的作用。

4. 继承旧志，但不能抄袭。他认为，五台旧志抄袭《清凉山志》，连篇累牍，以祸梨枣，使人惮烦。对于旧志的继承，只能在继承其优秀传统基础上创新，而不能抄袭其内容。

5. 对于民间传说，要有选择地记载，不可兼收并蓄。他认为旧志记载梆腔戏文中传颂的出家的杨五郎，这是将不可靠的民间传说当作史实，有损于“信史”的声誉，使阅者齿冷。

《五台新志》所体现的创新精神

徐继畬不仅在修志理论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且具有修志的丰富实践经验。五台县志自乾隆四十六年编修后，至同治年间已八十余年。当时五台县知事余绍昶与门人王西楼，商议重修县志，欲委托徐继畬主其事。徐继畬表示：“如必欲弟任其事，则请勿掣其肘。体例由我为之，勿令不晓事者旁参议论。采访委之众绅，落笔则独任之，不必设局，即在馆中乘暇为之，两三月即可脱稿。”这一方面说明其博识强记，才思敏捷，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有创新精神，不希望有人掣肘旁参。《五台新志》是他在研究分析了许多方志，博采众长，继承和发扬古代志书优点的基础上动笔的。他首肯繁简合中的《武功志》，利病详核的《灵寿志》，所以编修《五台新志》时，“意欲合此两志成法核实为之”。并且自信“将来成书，即不敢窃比对山、稼书两先哲，然与世俗之所谓志书者自当不同，断不至如旧志之荒陋可笑”。

同治四年（1865），徐继畬已七十一岁，仍在平遥超山书院讲学。他利用课余闲暇，编纂成《五台新志》三卷。他在应召赴京前，将这三卷手稿交其侄孙徐耘田，并说：“此吾未竟之书，卷四尚缺乡

贤、烈女、艺文等。他日县令修邑志，呈之以供采择。体例我则全改旧套。虽不敢比康对山之志武功，李寒支之志宁化，要在归之实事而已。”[②]一语道破《五台新志》的真谛。

《五台新志》除卷首外，共分四卷，261页，约15万字。前三卷为徐继畬所撰，第四卷则为郑增耀、徐耘田、刘升瑛、张映环补修。于光绪十年刻本印刷，称为“新志”，以区别于旧志。郑增耀在付梓时作序云：“松龛先师以著作大手笔写桑梓事，体例谨严，指归明确，其事约而赅，其文曲而畅，其意微而彰。芟刈繁芜，不规规于铺衍陈迹，点缀物华。名曰新志，别乎旧也。”[③]其新志特点是：

1. 体例谨严。体例是志书的体统义例、表达形式，包括体裁、结构、门类。旧五台志“体例全乖”。徐氏新志中，采用卷目体，连卷首共五卷十八目。卷下设目，层次简明，一目了然，无叠床架屋之感。按事物分类，归类得当，门类齐全，以目横排，纵述其事，无重复之弊。其目录是：卷首：巡幸。卷一：分野、沿革、疆域、气候、城池、治所。卷二：山水、土田、水利、生计、风俗。卷三：名宦、人物。卷四：人物续、烈女、艺文、杂录。

2. 体裁完备。体裁指志书的表达方式。《五台新志》突破了旧志陈规，采用了纪、志、传、考、图、表、注等多种形式，不同内容，采用不同表述方式，做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对皇帝巡幸大事，则采用“纪”的体裁，以编年纪事，详述其事件经过和人物活动，创造了编年与纪事相结合的形式。对社会、自然客观事物及某种事业在当地发生发展的经过，则以志表述，反映其本来面貌，成为志书的主体。志山志水如是，写人物则以传叙其生平事迹，性格品德，突出人物形象。对旧志中史实不准的记述，则广征博引，以“案”考据，还历史事物本来面目。这就创造了志书的新形式。对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如碑记、艺文等，则采用录的形式，原文照录，以备后人查阅。对人数众多，又内容简单的烈女，则采用列表的形式，罗列姓名、籍贯，省略了许多文字。此外，新志中还有地图、注释等形式，可谓体

裁多样,形式活泼。

3. 资料丰富,实事求是,务求准确、翔实,写出信史。如山水一节中,共写了较大山峰 68 座,较大河流 6 条,较大泉水 15 处,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资料。凡旧志中记述不准确的,新志中都据实改正,并以“考”的形式说明。如志山一节,考据五台山之名说:“案五台山名,北齐始见于史。而所注水经,实在其先。今《水经注》滹沱水一卷久佚,《太平御览》及寰宇记引有此文,而御览较备,为此山记载之权舆,宜详征者。其他经典所引,已见《清凉山志》者,不复备注。”这种考据比比皆是,反映了他实事求是的精神。

4. 秉笔直书,寓论于叙事之中。这是志书区别于历史著作的重要特点之一。徐氏深谙此道,即使记述皇帝巡幸大事,也如实写来,只记巡幸时间,所到处所,皇帝圣旨,抚臣奏疏等,著者绝不大发议论和歌功颂德,而是寓议论于叙事之中。这对于曾经官居二品的三朝老臣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写郑乐山上疏雍正皇帝、县令陆长华为民除害,详细记述了事件的过程,字里行间赞扬了他们关心民间疾苦,勇于为民请命的精神。

5. 语言精炼简明,准确流畅,言简意赅,文约而事丰,读来朗朗上口。如志山水一节:“五台遍地皆山,导脉恒岳,连太行八径。在县境者,以五台山为鼻祖。东一大干直走东南,南接盂县、定襄,横岭侧峰,蜿蜒起伏,多峭削如壁,有石无土,两山间为深沟,绵延二百余里。西一大干,由东西峨岭走繁峙、代县,迄于雁门。中间支条南出,蟠绕错互,矗为峰峦,降为关阜,迤为坡陀,而滹沱河之两岸,土人随地命名,不可胜记。”这段文字维妙维肖地刻划出五台山区的自然地貌特征。又如风俗篇中载:“五台地本贫瘠,其俗之俭为尤甚……妇女皆能核计,数米而炊,无敢浪费者。丰年亦杂糠秕。麦珍如珠,非祭先、供客、婚丧不用。无故而食白面,人以为不祥。家腌萝卜、蔓荆一瓮以御冬,春夏多食野菜。家贫者终年不见肉,至度岁乃割片肉为水角”。寥寥数语,把五台人民生计艰难,吃食困难之

状，和盘托出。这种运用语言的技巧，追求语言的严谨、朴实、通俗、流畅，也是旧志所不能比的。

对于新志，后人给予很高评价。曾国荃在新志序中说："顷阅闽抚徐松龛中丞所著《五台新志》，叹其综核简明，义精文赡，诚著述家当奉为准绳者……中丞少擢巍科，登显仕，出膺封圻，入赞枢密，晚乃优游泉石，以著作自娱。新志之修，盖病旧志之朴陋，与体例之弗谙也。因为补其缺略，芟其繁芜，斟酌损益，求所以信今传后。故斯志之作，独具别裁。"因此，曾国荃决定"拟付剞劂，为晋乘嚆矢。"即以新志为样板，推动山西全省的修志事业。曾经修过晋冀多部县志，后来又完成《山西通志》的杨笃，时任繁峙教谕，在新志序中也说："是书质实简严，不屑铺张粉饰，诚古法也。"

由于徐继畬是封建官吏，不能不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如记人物，对顺治初年农民起义领袖张丕初，贬之为"土寇"，在人物志中不予列传，只在志山篇中，记述摩天寨时，夹叙了一句"顺治六年为土寇所据"，此外从未提及名姓。对于同时起义而后投降清朝的高鼎，新志则为立传，并说："鼎乃效顺，随大兵征剿，功至参将……从征吴三桂，以功授四川松蟠镇总兵。鼎既贵，移家大同。圣祖幸大同，驻跸其家，赐匾旌之。"在烈女篇中，罗列金元明清烈女 94 名。这些糟粕，是需要批判的。另外，《五台新志》记述经济生产的内容不过 2000 字，有失之太简之嫌。

（作者赵培诚，1938 年生，五台县政协副主席，副编审。）

注释：

①本文引《论县志书》，见方闻：《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附录。

②《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页 270.

③《五台新志》序。

●任复兴

直针君德　砥砺廉隅

——读徐继畬《后汉书批语》、《疯话偶存》札记

贤明的君主，廉能的官吏，本份的编民，是封建专制时代长治久安的基本要素。《清史稿·徐继畬传》对传主办理外交、面向世界着墨不多，主要篇幅引述其《三渐宜防疏》等奏疏，把传主与咸丰朝其他立言者归于一类，赞曰："徐继畬直针君德，所举三防，陈义尤高。"正文称："在官廉谨，罢归主平遥书院以自给。"讲求致君泽民之道和立身行已之方，既是直臣，又是廉吏，乃徐氏生平大节所在。所思所行散见于其未刊行的《后汉书批语》、《疯话偶存》及其他材料中，本文略加钩稽贯串，以对其有关内心世界作一窥探。

暮年处衰乱之世

徐继畬笃好两汉书，多有批语，以前阎锡山欲观而未访得。1988 年 12 月笔者从其曾孙媳白粉芝、玄孙女徐惠云家中惊喜地发现，徐继畬手批明末毛氏汲古阁版《后汉书》全套 11 册尚存于世。书上有徐氏所作眉批、卷末批、行间批约 10 余万字。眉批、卷末批多为墨写，间有蓝色者，行间批、圈点多为红色。绝大部分批语

用整洁的颜体小行书写成，很少涂改，可能打过草稿。从批点的墨色顺序及内容判断，这些批语大多完成于咸丰初年其降职内调为闲官之后，即上《三渐宜防疏》前后。年谱将批语定在中翰林之后不确。他在列传 54 眉批："暮年投闲，心力无用，重理残书，竟如创获，以此了余年，日日舞蹈，何等快乐。"[1]这些话是不得已而言之。其实徐氏并不如此超脱潇洒。当时外患日迫，内乱蜂起。徐氏是以浓重的忧患意识，把史书当作医书读，希望从中找出对症之穴，济世之方。他在第一册目录后用朱笔批有："甲寅六月中旬读起历七月闰七月至八月读讫。"这表明，即使在上党防堵太平军时，仍把这部基本批完的书带在身边，可见其郑重态度。列传 78《大秦国传》的书眉上，徐氏以蝇头小行书密密麻麻地批上古罗马政体、意大利概况等内容，说明他此时对西方民主政体的历史和现状已有相当了解，在观察中国历代皇朝盛衰时已增加了新的参照系，可称之为"中西会通"。

中国自帝制出现后，秦始皇虽有万世一系的构想，历代皇朝却均未逃脱周期性的危机，短者三五十年，长者二三百年即宣告灭亡。两汉是帝制出现后最初实现大一统的长治久安的两个皇朝。有深厚传统文化根底，又有一定外部世界知识的徐氏，从政治家的角度深入研究了两汉由盛转衰的循环周期，作了许多精炼生动的批语，这对后世认识历代皇朝的盛衰规律是不可多得的文献。由于它是咸丰初年所作，人们也可谛听到《三渐宜防疏》的弦外之音。

徐氏认为后汉从第 3 代章帝时已伏致乱祸端，至第 6、第 7 代安、顺二帝时人心不可收拾，至第 10 代桓帝时炎祚斩绝，东汉实际亡于梁后、梁冀之手。"章帝时固称治平，然窦后专宠，无端废立，已伏后来之祸。"(批传 33)"安帝宠任女谒，狂惑不君，中兴炎祚至时已黯然矣。继以顺帝之授权阉寺，海内人心遂涣散不可收拾，叹惜痛恨岂独在于桓灵哉？"(批传 36)"孝质聪颖颇类孝昭，乃为梁冀所弑。清河王蒜年长有德，人望归之，使听李固之言而援立，东汉又

中兴矣。乃梁冀又杀固戕蒜，而援立昏幼之桓帝，炎祚之忽焉斩绝，实由于此。为之主者，则妖孽之顺烈梁后也。人但知西汉亡于王氏，而不知东汉之亡于梁氏也，悲夫！”（批纪 6）尤其安帝朝是由盛转衰的关键，徐氏痛下针砭：“和熹后聪敏明达，节俭之德，渊博之学，几于希踪明德。惟贪恋大权，终身称制，以致嗣主积不能平……母后临朝，总非常道，虽有善政，亦不免于讥议。和熹之后有安帝，宣仁之后有哲宗，治于阴而乱于阳，亦可为长太息矣！”（批纪 10）“宠任乳母而致乱者，前有汉安帝，后有明熹宗。生长阿保之手，遂终身不离乳臭。祚运将衰，继体遂生此下愚，良可悲也！”（批传 44）徐氏批阅这些纪传时，常“废书而叹”。显然，“处衰乱之世”的徐氏也为自己的皇朝险象环生、祚运将绝、大势将去而兴叹。

天命　人事　君德

徐氏认为，皇朝兴衰固然与天命有关，但决定因素是人事，人事非一端而以君德为主。君德不修，失去人心，天命亦随之而去，何人不可取而代也？自作孽，不可活，佛爷亦决不庇佑。西汉末刘秀以“刘”字旗招摇，能重开帝业；东汉末刘备以“刘”字旗招摇，却只能偏安一隅。此无他，乃由人事之故，因有人心思汉与人心背汉之分。有关批语如下：

“汉人迂固，遂以阴阳为宰相专责，不复过问杂事。迨及东汉，竟以水旱灾异策免三公。凡人主所不喜、群小所不悦者，即坐以空言斥责之，或至诛死。呜呼，何其诞也！夫阴阳无形，燮理之术，不外人事；人事非一端而总以君德为主。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不闻归咎于宰辅。且东汉时枢机归于台阁，大权操于戚宦，三公虽高爵而事权不属，即有伊周，安能取所谓阴阳者而燮理之？”（批传 34）

“佛法入中国，首信之者楚王英，笃嗜之者梁武帝。两人皆及身

而亡国，不保其终。人事不修而佞佛以求福，佛岂能私庇之哉！”（批传 32）

“桓、灵二帝皆以冲年以旁支继统，其昏庸荒乱若合符节。委宗祊于宦寺，戮忠贤如草菅。党祸之狱，一兴再兴，朝野善类，靡有孑遗。遂致毒痡遍于四海，冤愤积于兆人。一旦溃裂，涣然不可收拾也。尝论西汉之衰，国柄潜移外戚，虐不及下，继以王莽之水火，故人心思汉，世祖之兴也勃焉。东汉则安顺之后，继之桓灵，人心已去，天心亦绝，故昭烈号召西川而中原无复响应之人。兴亡故有天命，岂亦不由人事哉！”（批纪 8）

“主德不修，何人不可取而代耶？”（批传 47）

徐氏层层剥皮，将历代皇朝治乱兴衰的根本，归结于君德。这对人治为主、法治为辅、君权无上，缺乏制衡机制的专制制度的症结是有力揭示。在太平军节节胜利，清朝半壁河山沦于“敌手”的背景之下，徐氏把自己的视线聚焦于古今帝后的薄行和秕政，而把欲取而代之者则置诸视野之外，这需要何等冷静的头脑和历史洞察力。

远色　俭约　纳谏

君德也非一端，徐氏注意的有节欲远色、躬崇俭约、纳谏从善诸事。

徐氏对一般的男女大欲、妇女守节与否持达观宽容态度，而对君主的情欲即“宴安”却持论甚严，认为“圣帝明王即以是为修省最切之地……所谓衽席之上，天命流行……圣德之日新又新，圣政之久安长治皆将肇基于此”。[2]这决非危言耸听。在《后汉书》帝纪目录页，徐氏在 12 帝的讳号下面一一以工整小楷写上岁数和在位年月数。按虚岁计，分别为：光武帝 63 岁，33 年；明帝 48 岁，19 年；章帝 33 岁，12 年；和帝 26 岁，16 年；殇帝 2 岁，9 月；安帝 32 岁，20

年；顺帝 30 岁，20 年；冲帝 3 岁，6 月；质帝 8 岁，19 月；桓帝 36 岁，22 年；灵帝 34 岁，23 年；献帝 54 岁，32 年。徐氏认为皇帝寿命与皇朝盛衰有对应关系："东汉自和帝以下，年寿多促，嗣续屡断，遂致女后临朝，贪权立幼，外戚柄国，戕贤立昏，旁支递绍，炎祚灰飞，良可叹也！"（批传 45）

为什么和帝以下多寿促呢？色荒可能是重要原因。以和帝而论，在前殿，"躬亲万机"，其内宫，则醋雾熏天。阴后宠衰怀恨，甚至行巫蛊之术。这对他是沉重心灵打击，内外相煎，27 岁而亡。邓后遂贪恋大权，终生临朝。女后戚宦置皇帝如玩木偶，以后便长期处于小皇帝在位的恶性循环之中。而且广置后妃并不一定呈百男之祥，桓帝"立三皇后，博采宫女五六千人，并无子也"。《后纪》开篇援引《周礼》："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以备内职焉。"徐氏愤加眉批："自后至女御凡一百二十一人，虽晋武、隋炀恐亦不能遍及，安有圣帝明王而色荒至于如此之甚者！故内宫九御之说，乃后人伪窜礼经之文，断非圣人之制也！"他盛赞前两代贤后："光武之不忘糟糠，郭后之安于处废，阴后之宽柔不妒，东海之深心退让，显宗之友爱克敦，夫妇、父子、兄弟之间，皆遇淑人，故能互成其美。""三代以后，妃匹之贤，以明德后为第一，任姒以后一人也。后惟唐太宗之长孙后、明太祖之马后差有遗风耳"。（批纪 10）

耽于女色淫逸，后妃竞相侈糜，必得大兴土木以安置之，从而毒化社会风气。反之，如果后宫简朴祥和，"风化起自宫闱，自如草上行风"。（批纪 10）明德马后常穿大练裙，不加缘，袍衣疏粗，致明帝朝的俭约可与西汉文帝媲美。"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观其理为易循易见，但恭俭守节、约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过两人，近幸赏赐，不过数金。惜费重人，故家给人足。"徐批赞："恭俭守节，约身尚德，括尽文明二帝。"（批传 46）而至桓帝，博采宫女五六千人，衣食之费日达数千金，田野、朝廷、仓库皆空，民不堪命。继以荒淫之灵帝，遂致遍地黄巾，骤然倾覆。

远色难，俭约难，从谏尤难。如明帝朝，“钟离尚书有史鳍、汲黯之风，古之遗直也。显宗知之甚深而不能常置左右，与孝武之知汲黯而弃之外郡正复相同。木惮从绳，贤主且然，况于中下者哉”（批传 31）。即使有豁达襟度的开创英主光武帝，也曾谬托庞萌：“萌为人逊顺，甚见信爱。帝尝称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庞萌是也。拜为平狄将军，与盖延共击董宪。时诏书独下延而不及萌。萌以为延谮已，自疑，遂反，帝闻之大怒。”徐批：“以逊顺而许其托孤寄命，帝诚误矣。汲黯之戆而武帝许为社稷臣，正与此相反。魏征犯颜敢谏而太宗称其妩媚，庶乎可称睿明也。”（批传 2）章帝在这方面优于光武、明帝：“朱文季义烈之风，坚正之节，可称豪杰之士。肃宗能知之，复能容之，故明主也。”（批传 33）君上喜听顺耳话，致群臣阿附。马太后诏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徐批：“一语道破，明德文章之妙，神似伏波。”（批纪 10）又批：“吏治之弊总由迎合而来，千古一辙。”（批传 31）更始帝将直言极谏的刘淑下狱，关中离心，四方怨叛。“赤眉入城，更始单骑走，从厨城门出。诸妇女从后连呼曰，陛下当下谢城。更始即下拜，复上马去。”徐批：“何其暇也，使纳谏如听妇言，亦何至于败亡！”（批传 1）

致君尧舜上

徐氏批阅《后汉书》时对西方实行议会民主，言路畅通，上下齐心的政体已有较多了解，对乾纲独断、等级森严的专制政体持忧虑态度，因而对大臣的立朝风节、言官的制衡机制格外珍视。

明君良臣相遇，这种和谐状态在帝制时代并不常有。徐氏艳羡后汉初东平宪王刘苍的际遇：“宪王以至亲辅政，宏通之识，忠靖之风，在两汉宰辅中亦罕伦比……明帝之友爱，章帝之尊崇，明良际会，千古一时，呜呼盛哉！”（批传 32）

当最高层出现麻烦时，辅臣能否以正色立朝的问题就凸现出

来。如和帝朝的袁安:“窦太后妖孽汉室,将成禄产之祸。袁邵公之为宰辅正当其时。幼主冲龄,太阿不能自握,其势概岌岌矣。邵公与任司空同心协力,辅振王纲,不阿意以取容,不任气以偾事,心如金石,屹然不可摇撼。宪虽骄横亦未敢遽蒙篡夺之志。迨邵公薨逝,群凶乃顿起邪谋,而天子已稍长,定计剪除如狐鼠矣。东京社稷臣以邵公称首为无疑也。”(批传 35)安帝朝杨震:“伯起尽心匡弼,百折不回,与袁邵公相同”,“正色立朝,风裁懔懔,无愧于古大臣。”(批传 4)

徐氏一再批评汉儒:“两汉诸儒,以传经为本业,章句训诂之间能精其业即称名儒。不特致君泽民之道不甚讲求,即立身行己之方亦多忽略。其负王佐之略者,贾长沙、董江都、诸葛武侯三人耳。”(批传 27)由此可知徐氏本人的理想是,通经致用,讲求致君泽民之道,重视立身行己之方。“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杜甫困居长安时的政治理想。徐氏忧国忧民,也有杜甫一样的壮心。

于衰乱之世,何以行事?和帝朝乐恢欲弹劾权戚窦宪,其妻阻之,恢叹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徐批:“忠臣只是此一念耳。”(批传 33)“拼出身命,尚何畏哉!”(批传 35)即使昏庸的桓灵二帝也有醒悟之时,徐氏佩服爰延伺机进谏。“帝游上苑,从容问延曰,朕何如主也?对曰,陛下为汉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对曰,尚书令陈蕃任事则化,中常侍黄门豫政则乱,是以知陛下可以为善可与为非。帝曰,昔朱云廷折栏槛,今侍中面称朕违,敬闻阙矣!”徐批:“桓帝能为此言,似尚可与为善,无如其不绎不改,何也?”(批传 38)

咸丰何等主,慈禧何等后?

咸丰、慈禧夫妇统治 1850 年以后的中国近 60 年。咸丰帝初当政,企图恢复战前中外关系格局,起用强硬派,贬斥徐氏等对外持

务实态度的官员，轻启衅端。天津条约后，为维护其天朝皇帝威仪，因拒各国使节驻京不惜重开战火。违背祖制，采汉女供其淫乐。好色之癖当政初已露端倪。《异辞录》卷3谓："惇王如生于乾嘉承平之日，亦贤王也。文宗勤于政事，万几之暇颇耽逸乐。王心弗善焉。及洪秀全之乱蔓延不可收拾，朝野咸惧。王悦曰，非此一震，选色征歌，未知伊于胡底。殷忧启圣，正斯时矣！"徐氏此时已内贬，二年四月咸丰帝至宣宗陵行释服之礼时，徐氏又在随扈之列，对帝之薄行或许有所见闻，深恐其色荒短寿，清朝重蹈后汉覆辙，回京后即痛下针砭，撄鳞而谏，上《三渐宜防疏》，劝其远色节欲，躬行俭约，择言从善。咸丰览奏后如当年桓帝一样，作出从谏如流的姿态，有旨："意深词婉，置之座右，可当箴铭。"在这之前，徐氏还在咸丰帝召见，询及林则徐为人时，"对以忠正，惟不悉外情，致误事机。"此话也有谏阻排外政策之意。咸丰帝似有所悟，"以足顿地，叹息者再。及先生退，语廷臣曰，徐继畬乃老成人，何谓欺诈？"[③]奈何不绎不改，盲目排外如故，耽于淫乐如故。徐氏深以为忧，在《后汉书》袁安主张令南单于返其北庭一段眉批："是时漠北空虚，若返南部于北庭，边塞可享安静之福。乃窦宪惟恐天下之无事，坚欲树立降虏。邵公竭力争之而竟不听。卒之北虏依然反叛而鲜卑旋跨据其全土。永寿以后，二陲寇掠无虚日，其患遂迄于鼎革。小人之误国，其罪不可胜诛，而后世犹艳称其勒石燕然之功，亦惑甚矣！"（批传35）顺帝朝，李固奏削戚宦权柄，帝多所纳用。戚宦即以匿名"飞章"陷害李固，遂遭贬黜。徐批："甫露明机，旋即为阴霾所蔽，昏庸之主，千古一辙。"（批传35）与顺帝如出一辙的是，咸丰帝在嘉纳徐氏三防疏的当年，因有人罗织罪名，弹劾徐氏在闽抚任上起解犯官迟误，咸丰帝也将其罢职。综观咸丰帝一生，与顺桓二帝一样，貌似谦恭而十分昏庸薄德。

徐氏批阅《后汉书》时，慈禧仍为秀女。可是，既然母后临朝是许多皇朝衰乱期的痼疾，慈禧也玩不出新的花样。她聪敏明达，不

乏善改，贪恋大权，终身称制，有类邓后；毒妒如阎、窦二后；屡立幼弱，又与亡汉的梁后同。西后能将东汉诸劣后的特色兼收并蓄，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清皇朝实际亡于他们夫妇之手，真可谓出类拔萃。徐氏同治年间复出后，日歔欷不自得，其殷忧之一，可能是仍在慨叹“母后临朝，总非常道”吧？

对心学的顿悟

徐氏认为：“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也，足见立身为第一义也。”（批传35）徐氏生当东西会通之世，能见人所不能见，言人所不敢言，辣手著瀛环，抗节乌石山，屡遭攻击诬陷，卒能远祸全身，与注意立身行己之方大有关系。其父中年淡于仕进，潜治陆王心学，继畬承其教，深有得于周子主静之传。其批《后汉书》郭林宗传云：“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赞张衡“要其生平，得力全在从容淡静。”（批传49）“沈正二字，写出君子性情，凡轻浮之人未能有守正者。”（批传29）“《潜夫论》指陈时弊，几于绘影绘声，大指归于平正无诡激偏谬之病，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批传39）“一任气则处事不得其平，贤智之过，往往有此。”（批传46）

1856年冬，亚罗战争爆发。因忧时感事，徐氏于次年骤得痰迷之疾，卧于超山书院病榻上。也许是感到上天留给自己的时间已不多，于是以“示云衢甥”（即随侍在侧的外甥薄于逵）的形式，写下了《疯话偶存》，病后吐真言，讲了平时不愿讲或无暇讲甚至讲了别人不信的思想或活动，承认他最佩服、对他影响最大的有三个人：一是他父亲的第一高足，道光朝任侍郎11年，咸丰朝任尚书7年的满大臣阿灵阿；二是其姨表兄，居四民之末，读书识字不多却被他推为其父第二高足的京城砖瓦窑商人梁问青；三是乾嘉道三朝元老松筠。其中说：“尔外祖与村中老汉闲谈良知即良心，亦不过当一场笑话说。独问青听之既久，悟所谓良知者即心上安不安，过去过

不去。读书不多，亦不能问难，独确信良心二字保守不难。故入孝出弟，言而有信，待骨肉极厚，能忍人所不能忍，紧要处主意坚定，不可摇夺，行其所安，与圣贤之道往往暗合，我自愧不如。”其中还说，道光初年他甫入词馆，春风得意。一日遇上“醉菩提”松筠，“年已八十，色如童子。问有何养法？笑按心口曰，天天用大碗烧酒灌此地，使之不醉。那些作怪的妖精钻不破地皮，戮不破窗纸，甚为快活无事，所以脸面好些。”这一席机锋话，使他对心学产生顿悟：“松中堂之醉而成佛一言棒喝，使我终身不犯热中之病。”这些的确是“反常之论，石破天惊”，[4]也是对他与刘韵珂在乌石山事件中行事的很好注脚。当时如果能迎合上意，与林则徐等妥协，或许可以免祸，甚至获新的荣宠。然而他们“虽无才识，尚有天良，且非木偶，何敢因小事而肇大衅……硁硁之见，总坚定不移，断不为喜事沽名之数绅所摇惑”，[5]遂获咎以去。

恒自濯磨　留以盖棺

据《辞源》：廉，棱角，锋利；隅，方角；廉隅，棱角，比喻人的品性端方不苟。廉隅一词屡见于徐文。“其处家国乡党之间，于是非可否之界，往往狐疑颠倒不能自决。一遇小利害则急趋巧避，毁廉隅汙声名而不顾。此有聪明而无器识者也。”“该州县等廉隅既毁，罔惜身名，竭其聪明才力，尽萃于纳贿之一途。”“庄年之严气正性，俨然在余寤寐之间，将以是砥砺其廉隅，而坚其志节。”[6]徐氏以有无廉隅视人，也以此律己，其涵义大约是清白而锋利的棱角，官员不贪污纳贿，行事不苟且方能保其不毁。

徐氏清廉，三世相承，其祖其父皆为5品府同知，而不置田产，至其任巡抚时家产唯有小院一处，院内10余间石灰抹顶的平房，寒酸如中农之家。因其材料地皮无甚价值，这座“司马第”得以保留至今。阿灵阿的清廉节操对他影响也很大。《疯话偶存》说：“外祖

一生讲学及门者数百人，其能身体力行，专主良知，字字见诸躬行者，惟故大司马阿懿勤公一人，我敬畏之如师。”阿灵阿初在内务府供职，管茶叶库、关防衙门，人所谓发财之地，而他冬天无像样的御寒衣，面起寒栗，袖两手不能出。任热河总管时，离任前拒收3千两工程款陋规，典当家产后才凑足雇车钱与副总管回京。“我一见即曰，兄矫廉太过，苦节难贞，似亦非中庸之道。岂名字关未打破乎？公大笑曰，吾弟视兄太高。果是太平钱，百年陋辙，人云亦云何为峣峣皎皎，但咬定牙关不肯尝毒药耳。我惊问其故，曰，此案不出三年必破，破则无一获免。”不出所料，3年后热河工程案发，前后6任正副总管以脏获罪者10人，只阿灵阿这一任正副总管2人以失察得降留处分。（同上）

在亲友同寅的砥砺下，徐氏洁于去就，得保清廉。“我由太守历封疆，外任十六年，归来一贫如洗。老病笔耕，固由缺分清苦，亦由胆气太怯，虑患太深……三次离闽，寅好送盘缠约三万金，分厘未受。后改京卿，眷口在闽不能归，裕勤毅公泰为总督，乃属同舟助资斧送之回京。任粤东臬司甫三月，擢闽藩，首府照旧规赠番银四千圆（合银二千四百两，一府六县所摊），却不受。绅士潘德畬都转赠以千金，不受。虑其晋京无路费，备兑京都三千金以票来，谢不纳。存虚谷方伯，换贴兄弟也。黄石琴廉访，同年也，又同出宋芝皋先生之门。孔萃农观察，癸酉乡试大同年也。各赠舟车之费，皆谢不受。诸公谓其矫廉沽名，谯让杂作，亦笑不辨。制府祁勤懿公埙，同乡父执，又长君之舒与服先二兄为壬午乡试同年。公饯饮曰，老年伯有二百金助膏秣，若视为盗泉之水，则不敢送，我敬谢而受之。初莅闽藩任，有旧属员为台湾县令，遣人渡海馈黄金二百两。我大怒，欲禀两院弹治之，转念事近沽名，非长者所为，且将酒劝人，本无恶意，但施之不择人耳。因掷还其金，叱出其家人，其事始终未告人也。”（同上）

1862年起，在平遥任教的徐氏全面负责山西防堵太平军、捻

军和陕西回民义军的团练。1864年中秋节他给在西路的先篪八弟去信："前闻新泰赵二兄云，西路共事各官，欲为我预做七十整寿，不知此信确否？如有其事，吾弟可竭力一拦，不但干礼、水礼一概不收，即公同送一寿幛亦不得不奉璧。从前在潞安时，送盘缠者一概未收。陈剑芝同年，不令我知，将各处寿幛送在渠处悬挂，木已成舟，璧之不近人情。回时驮得寿幛一箱，甚为累坠，至今犹有余悔。我若贪图财物，三次离闽，一次离粤东，各同寅所赠资斧，不下三四万金，何至家徒四壁，犹须出门研食？今年已七十，名节二字，岂敢再有点(玷)污？我已决定主意，明岁科场后，辞馆回家，在楼村设立散馆，安排受穷，保此晚节。诸君子以后如宦途得意，偶有绨袍之赠，我必领受。此时嫌疑之际，万万不可。君子爱人以德，想诸君子亦必以为然也(此信可钞寄同事诸公人各一纸，要，要)。闻此间董事生徒，亦有此意。此与官场不同。能拦则拦之，否则听之，伊等自行张罗，我不能备办酒席，亦不能陪之行礼。每人不过出钱一两千，敷酒席之费而止，令子侄陪之行礼而已。"[7]

徐氏读《后汉书》有得："世祖戎马倥偬，首褒节义，明章二帝遵而行之，其优礼褒扬迥逾常格。海内之士，争自濯磨，遂成一代风教。草上之风必偃，岂不信哉！"(批传29)又谓董平，"风节棱棱，令行禁止，且廉洁过人，身后无长物。"(批传67)徐氏身体力行，恒自濯磨，安心而去。门人渠纶阁送挽联："三载抚军贻子孙清白二字，一朝仆御报君王防渐千言。"这是对徐氏作为直臣、廉吏一生的生动概括。笔者1988年从其后人处找到一纸分析财产合同，系1931年嗣子树去世后两孙占坤、占恒所立。其中说，"种松堂之田产，大朴村共有壹顷叁十亩，东冶有数十亩之普(谱)"；房产只有中丞第一处，内分抱厦厅院、平大房院、书房院、照壁院四个小院。[8]虽比其入仕前有增加，在清代督抚中却算清贫的。例如林则徐1847年为三子分析财产书说："合计前后之产，或断或典，田地不过十契，行店房屋亦仅二十三所，原不值再为分析……除文藻山住屋及相

连西边一所，仍须留为归田栖息之所毋庸分析外，其余田屋产业，各按原置价匀作三股，各值银一万两有另……再目下无现银可分。”[⑨]林氏在封疆中尚不足称为富足，被推崇为清廉榜样，而徐氏又远不及林氏产多。当然在时间等方面也有不可比因素。

正如徐氏赞扬拒受金马、正身洁己、威化大行的东汉边将张奂时所说：“所谓廉生威也。”（批传 55）尽管徐氏遭攻击构陷，史家对他也不乏贬词，在其故乡普通百姓中却有历久不衰的威望。历经战火动乱，许多手迹、遗物能得到乡亲、后人的保护，便有这个因素。应当说，今天能据原始资料完成这篇拉杂的文章，也是间接受松龛先生廉洁之惠。

附记：本文于徐继畬讨论会后完成。——编者

注释：

①本文所引徐氏《后汉书批语》，据笔者抄录徐氏手批毛氏汲古阁版《后汉书》的笔记，以及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叶灵原《辛勤庐丛刻·徐松龛手批后汉书残本》。叶氏所据残本系其在 1940 年从“冷摊”发现，可能是过录本，或徐氏初批本。现整套徐氏手批《后汉书》由三晋文化研究会收藏，笔者所引可能有误，待核对。

②⑤：方闻《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页 354，188，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7 年。

③咸丰旨意据沈桂芬《松龛徐公墓志铭》。《清史稿·文宗纪》则是“得旨，置之座右，时时省览”。召对事见《山西献征》京卿徐松龛先生事略。

④《疯话偶存》，民国年间影印本，原影印时只剩前 33 页，每页约 80 字。五台徐继畬纪念馆藏。

⑥《松龛全集》：《小序梁君问青》、《请整顿晋省吏治疏》、《别刘庄年观察序》。

⑦引自徐建南捐献抄本《先辈杂志》中徐继畬同治三年中秋节致先箎八弟书抄件，徐继畬纪念馆藏。徐氏七十整寿，平遥受业生徒送有 12 条屏蓝缎金字寿幛，笔者从徐家发现后 11 条。参与其事者有进士、举人、拔贡、生员、童生 91 人。

⑧民国二十年《分析种松堂财产合同》，原件存三晋文化研究会。

⑨来新夏：《林则徐年谱》页 460，上海出版社 1985 年。

● 编 者

徐继畬研究述略

对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的研究，已成为中外史学界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人们作了大量工作，可是尚未见对此的简要回顾。编者僻居小城，孤陋寡闻，进行概述时难免不周，敬请读者特别是研究者鉴谅。

徐氏著述资料的聚散、整理出版

徐氏生前对其著述，在福州刊《瀛环志略》10卷分装6册(道光戊申本署板)，《退密斋时文》4册(道光己酉家塾板，晋图藏)；在平遥刊《退密斋时文补编》(咸丰丁巳家塾板，山大图藏)，《超山书院课程》2册(咸丰丁巳始刊，迄于己未，超山书院板，研究会藏)，《徐氏本支叙传》1册(咸丰庚申七月，晋图藏)。编辑他人著述有：在籍丁忧编辑、福州刊行其父润第《敦艮斋遗书》17卷分装5册(道光戊申二月，福省宋钟鸣镌字，研究会藏)，《敦艮斋时文》6卷分装6册(道光庚戌家塾板，研究会藏残本)；在平遥选批明清时文有《举隅集》4编1册(道光辛酉超山书院板，研究会藏)。

后人编辑、刊行的徐氏著述有：《五台新志》4卷(光绪九年五台崇实书院板)，《退密斋文集》光绪年间崞县石印本(日本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洋文库藏)，《地球志略》(《小方壶舆地丛钞》

本，中国科学院图藏)，《俄罗斯志略》(《北徼汇编》本，中国科学院图藏)，《退密斋吟稿》1 册(受业张汾泰校字，光绪庚子暗然堂刻竣，民国三年印行，晋图藏)，阎锡山编《松龛先生全集》10 卷(民国四年铅印线装 6 册，晋图藏)，阎锡山编《徐松龛家书真迹》(商务印书馆影印，含徐氏家书 5 件，有阎锡山民国六年跋，晋图藏)，《退密斋批点古诗源》14 卷(民国年间铅印本，山大图藏)，《疯话偶存(残)》影印本(民国年间影印，附致曹象谦书 11 件，66 页，纪念馆藏)，《徐松龛行书》(民国年间影印本，晋图藏)，《徐松龛先生墨迹》(民国年间影印本，晋图藏)，《徐松龛批后汉书残本》(见于民国三十年闻喜叶灵原编《辛勤庐丛刻》第一辑，晋图、中山大学图藏)，《瀛环考略》2 卷(《清代稿本百种汇刊》本，台湾文海出版社)，《徐松龛先生杂书集锦》(方闻 1989 年于美国复印，89 页，孔德成署耑，纪念馆藏)。

徐继畬所作序文《全集》未载者有：《黄修存慎六生斋剩稿序》(咸丰己未刊本，介休师延龄藏)，《斌春乘槎笔记序》(同治戊辰，《海国胜游草》亦载，见《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 1985 年版)，《丁韪良格物入门序》(同治戊辰，京都同文馆存板)。

后人编印的其父作品有：《敦艮斋遗墨五种》(裔孙仙舟辑，民国癸亥徐氏知行斋铅印本)，《徐广轩撰书王月谭先生小传》(山西书局民国二十四年影印，方闻藏)。

松龛先生一生浪迹天涯，手稿墨迹所在多有，大部分书籍运回原籍。去世后宅中失火，难免损失。其族人门生常有收藏。阎冯倒蒋时，族曾孙培伦将部分松龛墨迹带至北京，客栈失火全部烧毁。民国二十年两个孙子将种松堂财产一分为二。日本侵华，曾孙培杞、玄孙光裕、光文、一廉毅然参加八路军，前三位先后为国捐躯。家中老弱妇女生活无着，有的就以书换食。据一廉之子富昌1992 年回忆，他幼时家有满满一耳房线装书。父亲当兵后爷爷无法，恰好镇上卖豆面的没有包装纸，爷爷就零星把书全部换了豆面

吃，把许多字画给自己换了饼子。族曾孙建栋讲，以前他家有一包袱松龛家信，土改时散失。文革中当地古旧书被当作“四旧”销毁不少。

数十年来，一些徐氏遗物陆续面世。1956 年，北京有人到东冶收古旧书。次年北图从北京东四区收购《瀛环志略》誊清修改全稿 9 册。晋图藏有各卷首页钤有“退密斋珍藏”印记的同治五年版《瀛环志略》1 套，封面有徐培伦赠某上司的题记。1984 年，培伦之子尚文献给五台县徐继畬《瀛环志略》手稿、誊清修改稿多种，492 页，《随时杂作》手稿 1 册，手订《遥商通行事宜，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1 册 85 页，手批其父诗稿 1 册，等等。1989 年，松龛曾孙媳白粉芝、玄孙女徐惠云向省里捐献松龛所遗手稿、书籍、字画、衣物 33 种共 297 件，经山西社科院崔正森、忻州报任复兴之手，交给三晋文化研究会刘贯文。其中有：松龛手批明汲古阁版《后汉书》全套 11 册，手批王步青《塾课分编》残本 8 册，手批《古诗源流》残本 1 册，《有不为斋诗之序》等手稿 1 册 49 页，《五台新志》手稿》1 册 102 页，手稿《商办立嗣书》1 册 12 页，手书《大悲咒》1 册 16 页，松龛同治元年《团练条款》刊本 1 册，《举隅集》残版 36 块，《敦艮斋时文》残版 168 块，徐广轩老夫子遗像 2 轴，徐松龛老夫子遗像 2 轴，续太夫人遗像 2 轴，松龛壬戌春手书家训 6 轴，松龛丁巳题识《兰亭真迹》长卷 1 轴，乾隆四十二年诰封松龛曾祖父母圣旨 1 轴，“字健男号松龛”煤精石印章 1 枚，松龛用象牙镂刻柄翎扇 1 把，民国二十年松龛两孙分析财产合同 1 纸。1990 年，渠鸿经献给徐继畬研究会《瀛环志略·意大里亚列国》手稿 1 册 60 页，《松龛先生杂著》抄本 1 册。1990 年徐建南经徐士瑚之手献给徐继畬纪念馆《松龛遗迹》手稿、抄稿 1 册 50 页，《先辈杂志》1 册 150 页，徐润第藏《诗法浅说》1 册……同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三晋文化研究会、徐继畬研究会从堆积如山的宫藏档案中检出徐继畬奏疏约 100 多万字。1991 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陈

存恭从台湾故宫博物院检出徐继畬奏疏约10多万字，并赠徐继畬研究会复印件1套。

徐继畬研究在美国的发轫

徐继畬自从到沿海办理讨嫌的洋务之后，就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其《瀛环志略》出版后，更变成众矢之的。他的这种不幸遭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以来在具有二重性的海上来的西方人面前的二难选择。总体上看，海上来的西方人从道德方面评判，他们是不义的侵略者，是恶；但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方面评判，他们又是超越中国整整一个时代的先进文明的载体（至于其中个别人，则不一定具有这种二重性），代表进步。随之而来的是，那些以务实态度与西方人打交道的沿海官员，从道德方面评判，他们难免有主和派、奸臣、投降派、卖国贼之嫌；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方面评判，则往往是由这些人引进了西方文明，对中国落后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冲击。在这种二重性面前，人们常常表现出困惑。翦伯赞编《中国史纲要》在论述近代史地研究新发展时写道："魏源继林则徐的《四洲志》，编纂了《海国图志》……步其后尘的有福建地方官吏徐继畬编成的《瀛环志略》。徐继畬是依附于耆英的官吏，但这部书很有作用。他从西人地图集直接描绘，附图比较准确。这部书出版不久，就风行日本。"这是同时期对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较客观的评价，却依然对其品德有些微辞。主流的看法为，徐继畬是投降派。随之而来的是，他的书也没有什么价值，不值得阅读和研究。史学界通读《瀛环志略》的似乎很少，于是许多名家把《海国图志》中引用的《瀛环志略》中对英国、瑞士的论述，当做魏源的高见谬加褒赞。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对魏、徐二书均作了较高评价，并分别对魏的一段话和徐的三段话作了评述。其

实，魏书的那段话最初也出自志略。建国以后，长期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环境之中，许多学者接触资料时间有限，出现这些小疵是可以理解的。

对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是从大洋彼岸的美国史学界开始的。

费正清 1953 年版《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中说，徐继畬是“满清官僚政治下，具有外国人和他的同僚都可接受的美德的夷务专家，真诚的学者－官员”之一。徐“在福建承担的与夷人联系的重大责任，远远超出了他的实际职位”。并提出，徐的生涯是“一段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经历”。次年费正清与邓嗣禹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映》中指出：“徐巡抚的研究，将西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充分论据摆在他的国人面前，一清二楚地说明，西方夷狄体现出一个迥然不同和十分强大的社会。困难在于，如何从这种差异中吸取经验教训，将它运用在提高国家管理的水平上。”费正清从而向他的研究生指出，一些值得注意和能引起兴趣的问题，与徐继畬的轶事密切关联。

1957 年，东亚研究中心的《中国论文集》刊登了第一篇关于徐继畬的论文，即罗克韦尔的《徐巡抚的〈瀛环志略〉》。两年后，罗伊完成了《徐继畬与 1850 年福州的神光寺事件》。

龙夫威是费正清的第三位聚焦于徐继畬的研究生，于 1965 年发表了《徐继畬〈瀛环志略〉对 19 世纪美国的观察》。当时正值越南战争，将徐继畬当年的卓越见解与美国现时的错误政策对比，使龙夫威深深感到，增高文化壁垒，加深文化鸿沟，是多么有害。而突破这壁垒，跨越这鸿沟，求得理解与和解，则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历史使命。面壁十年图破壁。龙夫威在与繁难的汉字，与难得的资料苦战多年后，于 1971 年完成关于徐继畬的长篇论文，获得哈佛历史学和东亚语言学博士。此后又精心对论文进行浓缩修改，《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第一本关于徐继畬的英文专著终于

在1975年出版。

中国台湾学者的继起

正当美国学者潜心于徐继畬研究的时候，中国大陆却惨遭“文革”的劫难，学者们自身难保。“四人帮”的影射史学独霸史坛，无正常学术空气，出版业也陷于停顿。此时，台湾却屡有徐继畬著述的新版、重版和研究徐继畬的论文、专著、动态的发表，不期而然地成为对美国学者的回应和继起。

1968年，台北华文书局翻印道光庚戌版《瀛环志略》。次年3月21日中央日报副刊载宁波陈如一所撰《华盛顿纪念塔中文碑》一文。1972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出刊《近代中国对西方列强认识资料汇编》选松龛文件8件;《四国新档》选松龛文件20余件。读者从这些资料多能作出其在闽办理夷务，无谬误不合之处的结论。1975年，文海出版社影印《瀛环考略》最初稿墨迹1册。

去台的方闻为松龛同里后学、阎锡山部下，受阎氏等影响，对松龛深为敬佩，半个多世纪中，注意收集徐氏资料。“集多年之力，远由美、日各大图书馆，遍览群籍，广罗旧闻，兼综条贯，勒成一书”，于1982年出版《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治世界地理学的张其昀、治东西文化交流史的方豪，分别为之作序。

方闻还在台湾商务印书馆支持下，由自己提供原稿，于1986年影印日本文久辛酉版《瀛环志略》，张其昀以《19世纪中叶与20世纪中后叶之世界形势》为题，为作长序。此序“分前后两段，前段论述19世纪世界形势，以《瀛环志略》为蓝本，大都摘原文，未加改易。后段述20世纪中后叶之世界形势，以拙著《世界新地图》四册为蓝本，亦采用拙序原文，摘其要点，未加改易。两相比较，则见近一百三十年以来国际形势之变迁，何等深钜，何等惊人。”“世局变迁之深且烈，有过于已往五千年之历史。”张氏行文方式，也说明

《瀛环志略》对19世纪中叶世界大势的分析，已是不刊之论。1990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又影印出版方闻提供原稿的《敦艮斋遗书》1册。同年冬，广州召开“纪念中国近代史开端1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台湾中央研究院陈存恭研究员在大会宣读《徐继畬传略及其〈瀛环志略〉》，激起波澜，赞同者有之，喝倒采者亦有之。

各方同仁在中国大陆的汇合

中国大陆直到1978年以后，才重新获得学术研究的条件。复旦大学陈绛教授1979年在《学术月刊》第11期发表《19世纪中叶向西方学习的思想》，评介了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在学习西方方面的历史功绩。各院校重招研究生。华东师范大学陈旭麓教授，在考卷上出了一个关于《瀛环志略》的题目，大部考生不知其为何物。陈教授指导研究生说：“徐继畬官至巡抚、署总督，清一代的总督、巡抚不下两千人，我们数得出名字来的并不多。为什么要讲徐继畬？因为他写了《瀛环志略》。”

陈教授的研究生潘振平，把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在资料相当缺乏的情况下，进行拓荒性的研究，舍得下笨功夫，曾将台湾版《瀛环考略》抄录一过。1981年率先在华东师大学报9期上发表题为《徐继畬和〈瀛环志略〉》的论文。到三联书店工作后，对徐氏及其《瀛环志略》的兴趣仍没有减低，陆续写了《鸦片战争后的开眼看世界思想》(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和《〈瀛环志略〉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

陈教授的另一个研究生熊月之，1986年出版的专著《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中，用4页篇幅论述了《瀛环志略》在不满封建专制、赞扬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方面“透出的新鲜信息”及其社会效果。

从1986年起，徐继畬研究在其家乡山西逐步展开。方闻撰写的徐氏年谱出版后，与其去台好友赵正楷经北京徐士瑚等寄赠家

乡有关学校、单位和人士多册。薄一波指示山西应重版《瀛环志略》。有关单位开始着手《徐继畬全集》的编辑工作。忻州的一些同仁发起成立了徐继畬研究会,得到徐向前等老一辈的支持。1990年,松龛后人向山西省捐献了大批珍贵资料。在徐士瑚和客居澳门的五台人士赵文房等倡导下,主要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先后在山西和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了徐继畬生平文物展览。

1990年秋,在当地驻军、煤炭产销单位和其他单位支持下,《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中译本出版。10月,在美国西东大学工作的阎锡山的堂侄阎志洪教授在阅读该书和应聘为徐继畬研究会顾问后建议,“举办一有关徐公对中西文化交流之影响之国际学术会议,或更能增光彩及吸引力”。

1991年春,在阮芳纪、梁尚贤、潘振平等策划下,历史研究杂志社、近代史研究杂志社和徐继畬研究会发起召开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国际学讨论会。山西大学、山西文史资料委员会、山西古籍整理出版领导组参与举办。台湾赵正楷、陈存恭分别应聘为徐继畬研究会的顾问和副会长,他俩和卢学礼等对会议准备予以鼎力支持。北京大学罗荣渠帮助研究会与龙夫威建立起联系。龙教授接邀请后立即准备启程来华。

经过各界人士的紧张准备,1991年7月22日至26日,“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忻州和五台山召开。薄一波为会议题词:“为弘扬三晋文化做出新的贡献——题赠徐继畬与东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王庆成、台湾陈存恭、香港潘振雄、美国龙夫威、梁伯华,以及北京、湖北、四川、甘肃、福建、贵州、广东、广西、山西的知名教授学者。提交论文的还有上海、浙江、广东、香港的学者。向会议致贺的有李力安、裴丽生、史进前、方闻、徐士瑚等海内外耆宿,陈增辉、陈绛、陈匡时、阎志洪、赵文房、周积明、陈振江、罗福惠、茅家琦、熊源滂、周宗奇等教授专家和

作家。著名书法家董寿平、沈鹏等书写了高度评价松龛先生的对联。与会人士宣读(部分为代读)27篇论文,展开热烈争鸣,对促进此项研究,以至对中国近代史、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繁荣作出了努力,取得了丰收。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当此之时,最感欣慰的是大洋彼岸的两位徐继畬研究的拓荒者和播种者。

龙夫威来华前,曾看望了84岁高龄、正在病中的费正清教授。他刚从中国返回,又于8月15日到费教授家逗留了两小时,向他报告了在中国讨论会期间的见闻。当费教授听说人们重新激起对徐的经历和历史重要性的兴趣时,他感到极其欣慰,并答应为徐继畬的墓碑写一篇碑文。令人痛心的是,费教授还未来得及动笔,就离开了人间。

90岁高龄、居于新奥尔良的方闻先生,不顾严重眼疾,为会议亲笔写来贺信:"一粒种子,培养得法,能长成遍地谷子,此种能也。徐公著《瀛环志略》一书,可使国人早通知世界,大助日本维新,成为强国,亦种能也。此当为今日举行盛会之意义。世多高明,竭知贡献,即此类也。特函远贺,敬祝大会圆满成功!"

关于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的观点

海内外学者对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的观点,可谓异彩纷呈。兹将所见各种专著、论文、书信,尤其是本书所收论文的观点撮述如次。为节省篇幅,引于本书的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一)鸦片战争与徐继畬

萧致治、杨木根认为,从《禁鸦片论》中的主张看,徐氏和黄爵滋、林则徐建议严禁吸食的态度完全一致,强调先贵后贱、先富后贫尤为卓见,是严禁派。战争中,他整顿海防,以身作则,反对妥协,是抵抗派。战争之后,有感于民族危机的深重,遂究心世务,发

奋著书，力图有以振作，志略是战争失败刺激下的忧愤之作。而其认为由禁烟酿成战争，则有片面性。

（二）辑著《瀛环志略》的意图

龙夫威专著认为，徐氏著书的目的简而言之，是输入外部世界的信息，以便使中国人作好应付新世界挑战的准备。

潘振平认为，徐氏著书与时势变化有密切关系。战争的失败迫使清政府不得不更多地与外国打交道。徐氏在实践中深感以往文献不能适应需要，于是将自己接触到的材料和知识整理成册，以期使国人不再昧于外情，这就是他的初衷。至于其直接动因，则得自于偶然机遇，即与雅裨理的接触。

刘天纯认为，徐氏写此书动机是为了启蒙中国的无知和愚昧，把中国之外的另一个新世界的信息和成就告诉中国人民大众，以便让中国有应付新世界挑战的思想准备。

虞和平认为，徐氏著书主要动机是佐上改革，希望皇上参照西方的社会模式，改革经济和政治制度。

（三）《瀛环志略》的资料来源和实践基础

龙夫威专著认为，徐书决不只是徐氏孤身奋斗的奇异产物，而是不同文化的人在中国海疆接触、交流的产物。雅裨理、甘明、李太郭、阿礼国等西方人都为徐氏著述提供过地理和历史资料。

陈绛《19世纪中叶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学术月刊》1979年第11期）一文认为，徐氏“取之泰西人杂书，有刻本，有钞本，有月报、新闻纸之类，约数十种”，他还直接从外国出版的地图上描绘，“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这样使得这部著作篇幅虽远远小于图志，但内容却比较精审严谨，所附各国地图也比同时期其他著作准确。在当时官吏中，徐氏是同外国人接触较多的。除雅裨理外，他接触的外国人还有英国“杜鲁特号”船长史密斯等。

潘振平认为，徐书资料来源包括三方面：一是与外国人士直接接触，二是搜集和阅读外国地图集及西方人士汉文书籍，三是考察

了一批中国官私文献。多方面搜集资料为志略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章鸣九认为，魏源、徐继畬处于同一时代、同一社会环境之下，徐身任封疆要职，社会地位比魏要高，但徐在对待西方文化上却比魏较开明和宽容。这主要由于徐在福建办理通商事务，与外国人有较多交往接触的机会，而且能够主动、虚心向外国人求教。

周宗奇认为，徐氏成功的著述实践表明了人的认识对客观环境的依赖关系。改革开放的意识，现代化的意识，只有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环境中才能培养造就；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才能，也只有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实践中才能锻炼提高。

（四）《瀛环志略》的世界观和时局观

龙夫威专著认为，徐书既向中国读者提供了全球地理的基本图象，并向他们提供了由许多互相竞争的国家构成的多元世界的观点。一部分中国之外的国家，通过历史的和附庸的关系，接受了中国文明的基本成分；而另一部分国家则是植根于非中国的（即印度的、穆斯林的、欧美的）文明。徐书在探察西方强国的本质和剖析中国在世界上的悲惨沉沦方面，均超出了客观的地理学的范畴。

张其昀《徐松龛先生年谱序》一文认为，松龛所异于19世纪中叶我国各名臣者，即由于博学卓识，志愿宏伟，洞达世界列国之国情，慨然知新时代趋势与我国立国要道。其对19世纪中叶世界大势的论述，至今可为蓝本。

刘学照《论洋务思想》（《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一文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外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近代中国面临一场“古今之变局”的提法，最早见于黄钧宰、徐继畬40年代后期的著述。但对这种认识加以阐发，形成一种系统的时局观，则是在洋务运动之中。

潘振平认为，徐氏已意识到，欧洲的扩张打破了世界各地的隔绝状态，造成世界格局的新变化，已开始从总体上把握明末清初以来中国海疆告急的历史意义。

陈存恭指出，徐氏提出的“古今一大变局”，指中外国际情势之变，西方武力及商业经济力量延伸及于亚洲，改变中国宗藩关系；至于为英军所败，二百年来之奇辱，当系中外强弱形势之变。

任复兴比较志略多种稿本后认为，徐氏已率先突破了以中华为世界中心的华夷观念，实现由一元世界观到多元世界观的飞跃。

(五)《瀛环志略》的主题

龙夫威专著认为，徐书是以现代化为主旋律的：自强；官商合作；务实的外交；参考彼得大帝计划，引进有用知识；借鉴西方政治体制。

付才武认为，自强，是徐继畬的呐喊，也是志略一书的主题。徐书向国人疾呼自强的紧迫性，以世界各国奋发图强的范例激励国人信心，试图从总体路线方针上向国人指明一条中国自强之路。

(六)《瀛环志略》的启蒙意义

张其昀认为，松龛先生当满清专制之时代，独能远识美国开国政治，符于孔子天下为公之遗意，创为推举之法，公器付之公论，实为中国首先倡导民主政治之人物。其后，孙中山先生革命，使中华民国成为亚洲第一共和国，而溯其渊源，当以松龛先生之议论为称首。此则《瀛环志略》一书最早亦最大之贡献也。

陈旭麓《浮想录》(《陈旭麓学术文存》页133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一文认为，中国近代的民主思想并不是在传统思想中的民主观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海国图志》《瀛环志略》介绍西方民主制开始的。

刘天纯认为，徐继畬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启蒙思想家。他在一百多年前就向中国人指明，世界最先进的时代潮流是什么，并且列举了值得中国人效仿的近代化样板或楷模。志略是中国近代化的启蒙宣言书，标志着中国人的知识和理想，早在一百四五十年前就达到相当水准。如果不是受到内外势力的干扰，当时如能按徐氏的认识水平处理问题，中国的历史发展会快得多。

虞和平认为，徐氏对世界大势，尤其对西方诸资本主义强国形成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其世界观中具有近代化思想启蒙意义的有：一，意识到中国是世界之一国；二，看到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三，认识到工商发达可致国富强；四，意识到世界资本主义化的发展大势；五，以遵约通商为主的“抚夷”主张；六，以“上佐天子”，“远抚长驾”为出发点。

吴廷桢认为，志略等使中国人对国外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高度，把着眼点和注意力，从人种学转到社会学，从生理特征和武器精良转到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并看到一个多事的天下，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新觉醒。

薛振齐、高闻认为，徐书中大量文化地理记载，是他全面听取情况介绍，冷静分析国际环境和认真思考对应措施的复合体，他试图通过展示世界的巨大变化以引起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清政府和国人的警觉。

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的近代意义》（《新华文摘》1992 年第 11 期）一文认为，徐继畬在 19 世纪 40 年代就称赏华盛顿及其所实行的民主共和制度。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盛赞之词恰恰是将近代西方比拟为中国三代，将西方近代民主政治比拟为中华元典（如《礼记》）所早已阐发的“禅让”、“天下为公”等古道。徐继畬开辟了将西方近代民主政治附会中国“三代之治”的先河。继徐氏之后，改良派思想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了类似的运思方式。

（七）《瀛环志略》与《海国图志》《文明论概略》等比较研究

方豪《徐松龛先生年谱序》一文认为，《海国图志》有日本版，极受彼邦人士之重视，然所记史实与考证，舛误时见。地理之外，更及战舰、火器与夷情，虽张之洞誉之为中国知西政之始，然与体例实不合也。《瀛环志略》则不然，凡《海国图志》之误者，类能一一辨正。盖松龛先生初官福建，办理通商事务，与西方接触频繁，乃能广集资料，遍悉各国政情，历五年十易稿而成书。其成功岂偶然哉？

章鸣九认为，比较这三部书，在解答如何看待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历史课题时，中国学者远不如日本学者，但徐继畬的思路颇与福泽谕吉接近，其见识又在魏源之上。福氏明确认识到西方文明高于东方文明。他肯定了儒学的历史作用，但认为已不适应于近代社会，因而对儒学采取分析批判态度，主张以西洋文明为学习目标。魏氏视西学为异端、杂学，固守儒学传统。徐氏承认中西文化是两支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对西方文化赞美欣赏，对儒学存在离异的倾向，但没能从学理上进行清理反省。士大夫对徐、魏二书的不同态度，说明在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前期，士大夫阶层存在强烈、盲目的文化优越感。这不仅决定了两书的不同命运，同时还决定了中国在向西方学习问题上，必然采取与日本不同的途径。如果说两次鸦片战争证明西方文化胜过东方文化，那么，甲午战争则证明日本学习西方的途径优于中国学习西方的途径。

刘天纯认为，从内容看，徐书的长处是全面介绍整个世界地理、政治、经济状况，不论从系统性、理论性而言，都比福氏的《西洋事情》高出一头。两书的社会影则差别甚大，福书一出版立即受到社会欢迎，几乎成为朝野人士推行明治维新的指导纲领。徐书出版后，当朝非但不支持，相反加罪徐氏。造成这种反差的根本原因，并非完全如福氏所说，"日本的文明乃是士人无知所赐"，而在于中国处在极端反动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

潘振平认为，图志几经增补，在介绍各国时，把能得到的有关记载几乎一并辑入，纲目较乱，差误不少，可说是一部未经雕琢的资料集；志略集中叙述各国史地，对搜集到的资料予以消化，故眉目清楚，层次分明，是一部精心编撰的著作，在世界地理研究和介绍方面的成就超过了图志，是代表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世界地理著作。其介绍世界地理的成就是：一、比较全面叙述了各大洲各地区情况；二、初步吸收了某些近代地理科学概念；三、重视地图的作用；四、著述态度严谨。

李鸿生认为，志略与图志等相比的高明之处是：一、具有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意识；二、超越了魏源等着重于西方先进技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初步接触到西方文化的制度层面，力图探索西方政治制度与国家富强的联系。正由于比着重介绍西方文化的物质面具有更深的层次，图志百卷本部分引用了志略有关材料。

洪九来认为，如果把志略与同时代以图志为代表的一大批有关域外知识的著作比较，它显示的特点是：准确可信，新异公允和微言大义的笔法。

（八）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的遭遇和影响

龙夫威认为，如果当年徐氏对中国面临的新形势的理解能在皇朝和官僚化领导阶层中推行得更广，中国也许能避免在现代化进程中丧失十年时间，避免伴随急速转弯而产生的某些极度痛苦。后来，徐氏的破荒之作深刻地影响着 19 世纪中国整整一代的思想家。作为变革与维新的微妙宣言，它为 19 世纪 60 年代的自强运动奠定了根本的思想基础。直至辛亥革命后，山西省的“模范省长”阎锡山还把徐氏作为现代化的楷模。

王庆成认为，鸦片战争中，外国侵略者以大炮打开中国大门，强制地把它拉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当时，介绍外国的意义远不能从地理学着眼来衡量，但在四五十年代，多数士大夫还未认识战争失败的意义，还没有感到认识外部世界的必要。这就是志略初版时受冷落的社会背景。当时批评它为外夷张目，是私人评论；其降职内调，并不直接由于此书，也不能说由于守旧派打击。

杨荣春以专文分析了志略初期冷遇原因：一、以奸臣害忠良解释中国战败，华夷观念神圣化、强固化，社会心态环境不良；二、深受封建思想政治压抑写成的寓言式著作较难惊醒国人的睡眼；三、志略负谤于初和被后世冷落，都与徐氏被指为“穆派”的政治生涯息息相关。徐书的悲剧是民族悲剧的缩影。

山西大学**郝树侯**在徐继畬研究会成立会议上说：第一，徐松龛

是直臣，直言敢谏；第二，他是时代的先觉；第三，他和林则徐的矛盾，两人争执的问题很扯淡，现在看是徐松龛对。60年代初，侯外庐在山西大学开座谈会。学校中国史教研组提出徐松龛与林则徐的关系，意见左，定不了，请教侯外庐。侯说，他两个差不多吧？我们那时候连这个结论都不敢做。你要说徐松龛好，等于你附和了汉奸。这种气氛已有多年历史。从民国十三年起，就搞六三烧烟纪念，说是爱国的。这样才衬得把松龛先生没人敢提了。

方闻指出，当徐氏罢官后，志略亦随之不复流传，而日本官民则先后翻刻数次，以为通知世界之南针，实有助其明治维新。我国则至同治五年总署始再刻印。至光绪三十一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乃大印行。前者较日本文久辛酉刻版已迟五年，后者又迟四十四年矣。人谓国运攸关，深致叹息。

大谷敏夫认为，日本人用日文译注了志略，普及到一般人中间。如果说，幕府末期日本的地理学，特别是有关东南洋的知识是出于志略之赐，那也并非过甚其词。

（九）神光寺事件双方当事人的动因和策略

郦永庆认为，广州反入城斗争后，统治阶级中相当一部分人希望用民众的力量恢复鸦片战争前中外体制的格局。林则徐试图用神光寺事件的机会，实践其借助天险，依靠民众进行抗英斗争的夙愿。而徐氏则是竭力争取和平国际环境以自强。徐氏采用的策略是阳示德意，阴加钳制，按约理论，据理而争。

吕义才认为，徐氏的对外策略，一是内紧外松，羁縻夷人；二是以商制夷；三是以民制夷。

张武文认为，徐氏在乌石山事件中的政治策略思想是富国强兵，抗御外侮。他的不闻其声、不见其形的富国强兵之道，即是志略中为其恩主所开的民主政治的药方。

任茂棠、**杨荣春**认为，神光寺事件是皇帝、官吏和绅民之间在如何对待外国侵略者的方针和态度上矛盾的反映。可惜，任何一

方的观点措施都不是有效反抗外国侵者的战略策略。即使在非本质问题上存在你长我短，但评论者也不必非要把它分出个谁高谁低不可。因为在他们时代，已有人提出了极为可贵、代表时代特征的战略战术思想，如程矞采的战争时期持久战思想，魏源、林则徐的战后战备思想，这都比徐继畬、徐广缙在神光寺事件中表述的观点更符合中国实际。

（十）同文馆事件

费正清、郭廷以、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页56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认为，1866—1867年冬季的同文馆新计划实在大胆和激进。如果达到预想效果，那么清代的教育和文官体制的重大改革也就指日可期了。

美国哈佛大学**刘广京**《经世思想与新兴企业》一书以"变法的挫折——同治六年同文馆争议"为题展开论述，认为奕䜣等关于招考翰林等入同文馆学习的建议在19世纪60年代提出，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事。这个提案和戊戌变法时期关于教育及考试制度和文官制度的变法方案是可以比拟的，是一个极重要的变法方案。

任复兴认为，同文馆新计划的目的，是抓住当时中外关系的相对平静时期，企图在三四年时间内培养一批三四品以上的学兼中西的高级官员，以作好应付日后外国严重挑战的准备。此计划的失败，是中国近代化的严重挫折。徐继畬是同文馆新计划的重要设计师，是事件中一方的主要角色。

（十一）爱国、投降与开放、排外

陈胜粦《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207—209，页302—304）一书认为，神光寺事件中，福州人民反侵略斗争遭到投降派阻挠破坏，但这场斗争毕竟打击了侵略者和投降派的气焰。林则徐坚持抵抗侵略、反对投降的爱国主义崇高理想，是这场正义斗争的英勇旗手。徐氏在政治上追随投降派，在论述美国时，则欲据以佐天子以柔远抚远；魏源、梁廷枏则欲据以

说明顺乎民心坚持抗英之必要。林、魏、梁等开明进步的爱国者，不愧为鸦片战争时期开眼看世界思潮的真正代表；徐氏则是当时另一部分人的代表，他和刘韵珂代表了投降妥协势力。

王庆成认为，在中国被迫打开大门之初，林、魏与徐继畲都是睁眼看世界的人物，志略在介绍西方史地人文的详实方面有其突出优点，有很大启蒙意义，但它没有直接回答中国面对这样的世界应该怎么办的问题，没有如林、魏那样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与徐在福建的对外交涉中的表现，是互为表里的。

龙夫威认为，徐氏早已认识到，任何企图跨越中西文化之间的鸿沟，向国人阐明西方文明现状和动态的人，都是要冒被当作乱臣贼子的风险的。作为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孔门弟子，他冒险犯难，冲破思想和文化的重重阻力，系统地提出处理中国与新的、突然出现的世界秩序的关系的相当务实的、可行的观点，这就表现出对他的祖国、对他的文化的更高的忠诚。徐继畲因为对变动着的世界的大胆陈述而付出了沉重的个人代价，受到守旧派的迫害，成了东方的伽利略。

陈存恭认为，林氏禁烟之际，亦探西事，但他不肯明告世人以利害。此时国人方以见辱于洋夷为奇耻，竟抬林氏为英雄。林氏复起用后强硬抗英如故。此为福州官绅引发福州入城事件之源，他与强硬分子同流，具虚骄之气，有盲目排外之嫌。

赵正楷致函徐继畲研究会认为，我们不可偏于崇徐而故意抑林，因为林实在对国家亦有大功，不可湮而不语。此是写史事应当注意公正、信实的地方。大体说来，我觉得林是有点“官僚”作风，有意无意中有轻视徐之表态，此即不够个爱才者，亦即难成为十足的爱国者之一点。而徐则忠厚笃实，但问事，不对人，心之所安，行之无愧，而又考虑周到；不似林之冒失官僚，三家村心态，还以“天朝”自居，夷狄视外，结果其心虽忠，其行则惹事生害矣。

袁伟时认为，“投降”应有严格界定。有些论著实际有几条不

成文原则：反对西方国家和西方人士者即爱国，主张与他们友好相处的就有投降之嫌；与著名爱国人士意见不合的大体就是投降派……诸如此类的框框把近代中国的历史描绘得黑白分明，历史真相经过人们重彩涂抹却变得难于辨认了。改革开放是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鸦片战争后，在新的历史任务面前，林则徐彳亍嗟怨。朝着历史前进方向大声呼啸的已是魏源等新的弄潮猛士，徐继畲亦是其中一员。广州等地反入城斗争带来很大恶果。如采取另外方式处理中外冲突，历史呈现另一种面貌是可能的。把排外当爱国，原因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消极因素中寻找。当代史家之所以跳不出误区，除了对民族英雄的偏爱，怀疑和经常重新审查一切的理性精神也嫌不足。

郦永庆、林岷《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以夷制夷对外策略问题探析》（《历史档案》1991年第一期）一文认为，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的对外策略在鸦片战争期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并在历史舞台上走完了它最后一段历程。而对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侵略，统治阶级试图用传统的方法来解决新问题，即使是林则徐这样近代早期最开明的爱国者，其思想也只限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水平。历史已证明，近代师夷长技以制夷也是无法从根本上摆脱中国落后挨打局面的。

任复兴《晚清士大夫对华夷观念的突破与近代爱国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三期）一文认为，图志和志略，是两种世界观的对垒。应将华夷观念作为区分传统与近代爱国主义的一个标志。由此可知林、魏还未向近代世界观跨出关键一步，思想和行动都停留在中世纪；徐继畲、郭嵩焘等则是中国近代最早跨越中世纪门槛的人，是更富有理性、更深沉的爱国主义者。对开眼看世界的内涵、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的通行无阻，也应提出质疑。并认为咸丰帝未免周内的处分穆耆诏书对后世评价这一时期人物影响很大。

（十二）徐继畬与中外关系及东西方文化交流

龙夫威认为，当中国领导者开始从西方得到灵感的现代化进程时，文化交流则是主要源泉。徐继畬是中西方文化交流这块处女地的拓荒者，已经充当了中国现代世界观的创造者和正宗的历史性角色。由于和在华美国人的个人接触以及他对美国的赞赏观点，使美国人感到，如同与当时和后世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中国人一样，和徐继畬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

阮芳纪认为，徐继畬那个时代还只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初始阶段。雅裨理等来了，徐继畬汲取西方人的知识写成《瀛环志略》，又传到海外。这都是切切实实的文化交流。从各国历史发展的纵横关系看，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是纵向发展特长，历史上也有横向发展很长的时代；而美国的特点却是横向特长。从雅裨理到龙夫威也可看出这个特点。

潘振平认为，志略的编写过程清楚展现了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向中国渗透的最初内容和具体途径，表明在这过程中西方传教士的媒介作用十分突出。

梁伯华认为，纵观徐继畬时代的中国对外关系，中国已是踏入巨大变化的过程。徐继畬的所作所为及其作品都是在领导着这个变化的巨轮而作出伟大的贡献。

李志刚认为，雅裨理牧师可称为开启徐继畬对外间世界知识的导师，徐氏是雅氏在华所接触的最高层官员。徐氏对早期教士之礼遇，实有助福建基督教会日后的发展。

何守先认为，由宁波府向华盛顿纪念塔赠碑，后来美国总统又向徐继畬还像，这是早期中美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美国官方和舆论界重视此事，是为了扩大对中国之影响；徐氏推崇华盛顿和美国共和政治，对于反对封建专制有很大进步意义。

（十三）徐继畬是什么派

陈存恭认为，鸦片战争对中国朝野刺激殊深，但因各人对敌我

国力的认知不同，因此对策亦异。当时即有强硬派和抚绥派之别，近似今日之鹰派与鸽派。强硬派认为军事失败乃抵抗不坚定之故，怪罪与敌谋和者，而隐以林则徐为首；抚绥派确认力既难敌，利用民心士气不足以攘外，攘外必先安内，应整饬吏治，安定民生。耆英如此主张，徐继畬亦近似之。鹰鸽之争实皆忠爱国家，只是对西方认识有所歧异，政策遂执两端。在此魏源与徐继畬亦有异同。

冯祖贻专文论述徐氏为什么派，分析有关奏疏后认为，徐继畬是经世派；分析其生平和著述后认为，徐继畬不是投降派。

参加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中外学者，如前所述，有的认为徐氏在鸦片战争中是严禁派、抵抗派，但无人认为徐继畬是投降派。有些学者则不赞成以派划人的程式，认为将历史人物划分为黑白分明的两派，不利于实事求是地、多侧面地考察研究历史人物。

（十四）徐继畬诗文、教育、史志观点

刘泽以其乐府民歌、山水画卷、诗星彩照和农军侧影等，说明徐是一名多姿多采、不拘一格的晚成诗人。

薄子涛分析了徐氏罢官后的诗作，认为一股燃烧着的复仕之火，照亮了他几乎所有诗行。复仕思想的积极性和局限性，造就了具有艺术个性的松龛诗。

张乃彬分析了徐氏在超山书院和同文馆的教育实践，认为他后期的教育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一代之风气。

赵光清、**李木子**分别发掘了徐与王印川、薄承砚的诗文交往。

赵培诚认为，徐氏的修志观点丰富了我国修志理论，其《五台新志》富于创新精神。

任复兴通过《后汉书批语》、《疯话偶存》，考察徐氏直针君德、砥砺廉隅的思想背景。徐氏已将西方政制作为考察中国皇朝的参照系，已认识到皇朝盛衰固然与天命有关，但决定因素是人事，人事非一端而以君德为主。其立身行己之方，则得力于陆王心学，把

玄奥的致良知归结为心上安不安、过去过不去的简单问题。

对若干问题的考证及引出的若干问题

俞旦初先生奔波于京城各图书馆，终于从北图找到一套比较完整、比较接近刊本的志略誊清修改稿，并进行了认真细心的考证，受到台湾山西文献编者的赞誉。他归纳出徐氏修改此稿的形式有：点改、圈改、涂改、贴改、圈删、贴删、书眉贴条补文、字行间插补、就字改错等。并考出此稿尚非最后定稿。

郦永庆从大量宫藏档案中，查出了有关神光寺事件的资料，基本梳理出事件的前因后果，从扎实的资料得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王庆成、郦永庆经考证都指出，前人所写徐氏传记，对徐与郑祖琛对调，徐任闽抚一事，有郑贪图梧、浔关税，主动要求调广西之说。此说不确。从宫藏档案可知，是道光帝根据刘韵珂密奏，从闽省洋务需要出发，将徐、郑对调的。

李志刚注意到徐氏考略最初手稿将华盛顿写作“兀兴腾”，与裨治文、梁廷枏的提法作了比较，考出徐氏考略论及美国民主政制及对华盛顿赞词，实非参引他书，而是从雅裨理牧师直接传授。

任复兴援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徐氏奏疏说明，1842年十月间(11.3——12.1)，徐继畬到北京“叠蒙召见”，“恭聆圣训”。入觐之事不应视为子虚乌有。徐继畬手批明毛氏汲古阁版《后汉书》多数批语完成于1851年降调回京至1854年在上党办防堵前后。年谱将批语定在中翰林之后不确。

邹振环对志略的译名进行研究，认为用贬义词书写西方国家和人士的名称在当时中国是普遍做法，徐书却是突出的例外。徐氏自觉废弃有文化偏见的译名，可以看出他对世界的认识远远高出同时代人。

何守先对宁波府与耶稣教徒、美国传教士一起向华盛顿纪念

塔赠送镌有志略两段按语的石碑一事的历史环境进行分析，说明在宁波发生此事决非偶然，但其具体经过的材料尚有待发掘。

徐士瑚提出，同治四年徐氏的再次出山，是由哪些因素造成？希望有所发掘。

研究徐继畬的现实意义及如何引深研究

杜导正认为，当前，改革开放和廉政建设，成为突出的问题，世界政治格局发生激剧变化。在此形势下，研究徐继畬，借鉴历史经验，有很大现实意义。

龙夫威认为，徐氏的所作所为表明，甚至在最大的文化鸿沟之上，以互相交流为使命的、有创造力的开明的政治家，必然能架起理解的桥梁。过时的思想，有缺陷的政策，造成美国在越南的失败，这好似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教训的折射。现在是美国转而面对它在世界上影响力的局限性的时候了。徐对西方的有力回应，也使人认识到，中国应该保留自己的传统，如徐氏为了中国在这个复合的、多民族的世界上生存，促进和解、妥协、了解，以及彼此融洽，所用的中庸之道。希望美国的研究生们以后能到徐继畬的家乡，利用那里保存的丰富资料，重新开始对这位中美关系史上真正重要的人物的严肃研究。

赵文房致信徐继畬研究会认为，松龛先生确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早期先进人物。他的著作、思想丰富了伟大的中华文化传统。他身居高官而能不忘劳苦大众，在那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尤为难能可贵。这种思想感情从他的诗文中不难找到。他为官清廉，身无长物，足为后人楷模。举办关于他的学术讨论会，不仅有益于认识过去，总结历史，且对教育当代中国人亦不无益处。

陈存恭认为，有关徐氏办理洋务的原则源之于他对西方世界的认识，这在当时——也在目前，都是非常重要而值得争辨的问

题。徐氏撰写志略，具有虚心、求真、客观、冷静、和平仁爱的精神。近两年来，时局变动堪忧。人们希望的是两岸和平共荣，进步发展。但黩武主义、斗争主义、台独分裂主张，暗中滋长。所以松龛先生的理性、和平、爱国思想，都有益于世道人心。问题是，如何发扬光大？如何引起学界的共鸣？

复旦大学**陈匡时**致信徐继畬研究会认为，从中外关系角度看，志略的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近代最初的中西文化交汇的起点，与林、魏当时的了解比较，又是另一种模式。推动徐公此作的动机和背景，需作深入的分析与研究，以显出志略的历史地位。近年文化热中，很可惜许多人都挤在一条狭窄的道上，于徐公开启的这一条深邃的通路的意义注意得太少了。

福建师范大学**陈增辉**致信徐继畬研究会认为，徐继畬研究会的成立和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召开，是具有特别现实意义的。徐继畬是一个放眼看西方各国情况的拓荒者，确实了解大千世界的先知先觉。他的著作和思想在清末有重大影响。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敢于弹劾贪官污吏，敢于在清帝面前直言不讳。

福建师范大学**徐恭生**致信徐继畬研究会认为，无论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福建地方史，或中西关系史，徐继畬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可以从各个不同角度进行深入研究。这对弘扬祖国传统文化，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将起积极推动作用。

南开大学**陈振江**致信徐继畬研究会认为，徐继畬是中国近代开端时期难得的博学务实、远见多识的奇才。他的《瀛环志略》更是近代学术宝库中的瑰宝，在近代史上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因此对他及其学术著作的深入研究是很有价值、很有积极意义的。

华中师范大学**罗福惠**致信徐继畬研究会认为，徐继畬与魏源一样，为我国近代能关注世局、适应世变的先觉之一，可惜以前对其人其事注重不够。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李玉明**在徐继畬研究会成立会上说，翻了

许多辞书，如《中国人名大词典》、《辞海》，比徐继畬官职小的都有词条，却没有他，有的只在《瀛环志略》条目中提到他。是不是因他和林则徐观点不一致造成这种情况？不妨作为题目研究一下。

周宗奇认为，由美国龙夫威先生完成对徐氏及其志略的第一部长篇研究专著，为我们中国史学界填补了一项空白。这使人有点酸溜溜的感觉。

山西社科院**降大任**在徐继畬研究会成立会议上说，林则徐与徐继畬之间的小矛盾，实际上是个自强自立与对外应变的统一关系问题。这种统一关系在新时代就是四项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关系问题。当前，我们的国家有好多问题值得忧虑，我们应以积极的态度考虑面临的问题，鉴往知来，有所前进。

阮芳纪认为，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是徐继畬研究的一个里程碑。此项研究，应侧重于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他这样的人物，他在历史上起过什么作用，和他的前人、同时代人比较，达到了什么程度等。这较之简单地给他一个什么评价，要有意义得多。把他放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之中，放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特有的历史发展的纵横座标之上，这样才有可能全面、准确地把握徐继畬，进而对他的历史地位作用出科学说明。

● 周宗奇

独行草（代跋）

人生苦短，能有多少赏心乐事？在一座古庙里，在一场连下十天的阴雨中，聪明的金圣叹与他的几位朋友计算出来了，说是一共有二十三种。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体验，未必就肯买他们的帐。譬如说在下不才，便别有一种自得其乐的生活享受，若套用金才子的叙述风格表达就是：悄然独行，于一处毫无俗事打扰的陌生地方，搜求得一本好书，昏天黑地一气读完，思之想之，品之评之，信手录而存之，不亦快哉！

上个月，我实施自己本年度的最后一次"悄然独行"，来到X市，平黑住进一家绝不引人注意的鸡毛小店。一夜无话。第二天早上，用过"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传统国餐——稀饭馍头咸菜，便一路打问下去，直奔该市的新华书店。我们这行的朋友都有个体会，越是小地方的书店，往往越能买到好书。所以，我如赴幽会般热血奔涌，心痒难熬。

不料结果却极惨。一本书没买到，却三吃售货员同志的窝心拳。一进迟开半小时的店门，但见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店主正在生一座半人高的铁炉子。那浓烟半天不散，刚好遮住书架。欲绕过柜台走近细看，当即尝到第一拳："想往哪儿钻！"烟熏之下，我早就泪流满面，趁机哀求道："忘带近视镜，能否……"不敢真说烟大

看不见。于是打来第二拳："不会拿去！"只好收回脚步，百米瞄准似地盯上一本书，要来看看，当请求取第三本时，迎来最后一拳："你到底买不买！"多亏我是大陆同胞，这种考验经得多了。国产自尊心质量可靠，经久耐用，百不咋的，趁机走人就是。

我之所以讲这段无聊的小插曲，那是因为如果没有它，就肯定见不到洋人德雷克写的《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这本书，也就不会有下面这篇文字了。

且说我被三拳打出新华书店，困在鸡毛小店动弹不得。书瘾犹如烟瘾，犯上来虽说不打哈欠，也难受得你抓耳挠腮、坐卧不宁。情急之下，只好把当地出的一种小报反复扫瞄。忽然眼前一亮，看到报缝里登着这么一则征购广告："由美国德雷克著、任复兴译的《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已由文津出版社出版。徐继畲是我省五台县东冶镇人，是徐向前元帅的族曾祖，官至广西、福建巡抚、总理衙门大臣。1848年，他完成了惊世骇俗的《瀛环志略》，揭示了中国在强国如林的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严峻局势，蕴含着系统的改革主张，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及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均有重要影响。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指导帮助下，德雷克教授经过十多年深入研究，撰成这部学术专著。购书地址：X市某秘书处。"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一口气读完这部洋洋近二十万言的书，你猜我头一个感觉是什么？酸溜溜的。真的，酸溜溜的！

徐继畲是我们中国一百多年前的历史人物。其传世之作《瀛环志略》，据《辞海》的权威定评是："与魏源的《海国图志》同为中国较早的世界地理志。"然而痛心的是，对他和它的第一部长篇研究专著，却并不是出自国人之手，由一位名叫德雷克的美国人拔了头

著。是他替我们中国史学界填补了一项空白。玩一句北京油腔:这话怎么说的!

更可叹的是,这位马萨诸塞大学的教授德雷克,不惜耗费自己宝贵生命的黄金阶段,潜心钻研十五年,引用二百多种资料,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处女巨著。而书成之后又经过漫长的十五年,方才传到我们这里。这就是说,最先欣赏这部书的,也还不是我们中国人。你说,你心里会甜滋滋吗?只有酸溜溜。多亏我们之中还有位任复兴,翻译了这本书。不然再让哪位洋人把它译成中文送到我们面前,我们还不得一头撞死吗?

据说我们早就有"徐继畬学术研究会",还有"徐继畬纪念馆"……总之,该做的表面文章都热热闹闹体体面面搞过了,唯独没搞出第一部像样的研究专著。是中国史学界无人吗?是中国人的研究能力低下吗?我绝不相信!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又据说,近年在台湾出版了一本《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是方闻教授编撰的。也算给中国人拾起点面子。可惜的是海峡阻隔,大陆同胞尚难见到。

在今天,"闭门造车"这个成语饱含贬意,已与朱熹《中庸或问》中的意思大不相同了。徐继畬一生从未涉足国外,却写出一本世界地理志,确有闭门造车之嫌。一部十卷的《瀛环志略》,三卷记地球的总体形态及中国之外的亚洲,四卷记欧洲,二卷记美洲,一卷记非洲,内容可谓充实。但他所用的资料都是第二手或第三手的。其中除对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的研究主要靠本国旧有的文献外,其余所有资料可以说都是由西方人提供的,包括书中那四十二幅世界各国地图,也是在美国传教士雅裨理的直接帮助下复制出来的。

照这么说,徐继畬头上的光环是否该减色了呢?决不。因为他的这个闭门造车,却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要知道,在他闭门造车

的时候，19 世纪中期的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精神状态如何呢？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又如何呢？说来可怜可笑。南海就是"天涯海角"；东海就是"天尽头"；而"西洋"在哪儿呢，实指南中国海及迤西之印度洋……这些古老陈旧的地理概念，体现了十足的"大中华文化"，一时很难改变。要说到对外国人尤其是西洋人的知识，别提普通老百姓怎么样，士大夫们也愚昧得无以复加。文渊阁大学士耆英认为，英国人一到晚上就睁不开眼睛；身为总督的琦善说，英国女王自己选择丈夫，"是固蛮夷之国、犬羊之性，初未知礼义廉耻，又安知君臣上下"；另一位总督大人骆秉章得意洋洋地教导说，西洋兵的上半截身子刀刃难伤，但如果用木棍捅他们的脚丫子，则"应手即倒"；就连名垂史册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也不免闹出笑话，他错误地认为，只要我们中国的茶叶和大黄"禁不出洋"，就完全可以"立制诸夷之命"，而且洋人只是枪炮厉害，步战格斗一点不行，因为他们"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难怪徐继畬在咸丰皇帝面前告了林大人一状，说他"忠正，惟不悉外情，致误事机"。

仅就以上数例，足可见当时中国与世隔绝的严重状态。对传统典章的盲目自信，对古老声名文物的清高自诩，对近代科学知识的茫然无知，对世界大势的蒙昧颟顸，牢牢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遮蔽着人们的眼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徐继畬挺身而出，大胆描绘了中国之外的广大而真实的世界，向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人忠诚介绍了西方在军事上、经济上以及体制上的实力和优势。使一贯夜郎自大、闭目塞听的中国人开始猛醒，知道在"天朝"之外，还真有许多异样的国度，这些昔日被视为野蛮无知、远在天边、不足挂齿的夷人，如今却以绝大部分陆地和海洋的主人姿态出现；而我们自己的"中央王国"，不但不在世界的中心位置，而且只统治着亚洲大陆的一小半，亚洲又只是世界五大洲中的一个。徐继畬这样的功劳还能算小吗？用德雷克的评语说，他简直就是"东

方的伽利略”！尽管他搬来的是“他山之石”，尽管他是在“闭门造车”，也难掩其丰功伟绩。

我忽发奇想：假若徐继畬不去福建，一直留居山西或其他内地，他能否写出《瀛环志略》这部不朽巨著？这挺有意思。

德雷克先生在形容山西时有句话极传神：“整个山西如同一个巨大的堡垒”。当然，他是指自然环境而言。但在我看来，山西更是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一个巨大堡垒，一个桥头堡。安土重迁和闭关自守，乃是这种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文明的本质表现。落后的生产方式长期把人们牢牢限制在狭窄的土地上，宗法的、封建的、迷信的观念，严重压抑着人们的精神，使人变得内向和保守。用德雷克描述山西人性格的话说就是“驯良温顺”、“循规蹈矩”、“诚实得甚至有点愚蠢”。我就想，这样的一种社会历史环境，能造就一种外向型的博大胸怀与目光吗？显然不能。

徐继畬出生于书香门第、仕宦之家。徐氏家族定居五台的时间，可以追溯到上八代。明末清初之际，徐家已经成为当地的殷实富户和名门望族，其子弟已经可以不事稼穑，以读书作学问当敲门砖、向中国的上层社会钻营。德雷克准确地叙述说：“继畬的祖父徐敬儒，首先在‘笔耕生涯’方面取得较大的成功”。而继畬的父亲徐润第，则在乾隆末年“中了进士”，“在京城和外省”担任过各种官职，然后潜心于“陆王之学”，精研《易经》，成为当地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我就想，这样的一种家庭背景和家庭教育，能造就一副反传统的倔犟性格吗？也显然不能。

那么，事实上的徐继畬何以会有惊人之举？震聋发聩之作《瀛环志略》又何由产生？我看这个谜底只能从他在福建的十三年经历中去找。

徐继畬是1838年春天走进东南沿海省份福建的。他最初担任

延建邵地区的道台，那里民间的反清秘密团体和土匪，尤其是猖獗的鸦片走私活动，肯定就开始强烈刺激这位内地出身的四品官，叫他看到天下并不都像家乡山西那么风平浪静，四平八稳。

不过，客观环境对他的真正的严酷改造，应该从 1840 年算起。这年夏天，他调任汀漳龙地区的代理道台，衙门就设在厦门对面的漳州城里。德雷克俏皮地说："一个不习惯海上生活的北方人，来到有海洋意识的福建。"这一定是命运的安排。在这里，他平生头一次看到曲曲折折的海岸线，数不清的海上小岛，国产海盗和日本海盗，历史悠久的无政府主义的自然的海上国际贸易活动，充斥于大街小巷的外国水手和西方传教士，主要还有辽阔雄浑的大海和掀天覆地的波涛……这种生活环境的根本转换，必然导致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彻底改变。存在决定意识，这不是马列主义的哲学观点吗？

更大的刺激是，徐继畬上任不久，爆发了鸦片战争。英国远征军置广州于不顾，以鳄鱼号为旗舰，转攻厦门，炮击定海，北上天津。攻击厦门时，他得以经受洋枪洋炮的洗礼。他不得不开始思考：为什么西方的大炮命中率这么高、射程这么远？为什么西方人搜集和传递信息那么迅速又精确？……他逐渐认识到，我们对西方文明的愚昧无知，原来就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应该立即觉醒并行动起来，重新认识西方国家，重新认识整个世界，认真探求别人强大的真正奥秘。徐继畬这种认识上的飞跃，有他写给山西友人的书信为凭。

认识上的进步，必然产生行动的勇气。我们这位"循规蹈矩"的山西老乡，终于开始变得"不老实"起来，开始发疯般钻研世界历史地理，而"不读圣贤书"了。更勇敢的是，此时已升为福建省第二把手的布政使徐继畬，居然与外国人打得火热，尤其与美国传教士雅裨理过从甚密，从对方那儿得到大批先进的西方书籍和世界地图册。应该承认，正是这些鲜活的新知识，真正打开了他理性的视野，

让他摒弃了狭隘保守的国产世界观,以明亮的新目光审视人类生活着的这个硕大无朋的星球。他在知识化、现代化道路上的这种飞速进步,外国人留有可靠记载:徐继畬"是一个思想解放的人。他对西方地理和政治的熟悉程度,简直令人吃惊。""在对世界各种各样情况的了解上,在思想解放的程度上,他都远远超过当地政府的其他任何官员。"

这时的徐继畬,写出这样的《瀛环志略》,才是顺理成章的事。

那么,我们于此可得出一个什么道理呢?是否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的意识,现代化的意识,只有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环境中才能培养造就;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才能,也只有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实践中才能锻炼提高。不管是对一个人的进步,还是对一种事业的成功来说,客观环境是多么重要啊!

怎样才能创造一种健康活泼的客观环境呢?大文豪钱钟书说得极幽默:"门窗洞开,难保屋子里的老弱不伤风着凉;门窗牢闭,又怕屋子里人多,会气闷窒息;门窗半开半掩,也许在效果上反而像男女搞对象的半推半就。"真是各有利弊,实难两全。掌握好分寸并不容易。

正如德雷克教授所敏锐指出,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决不是一本简单的世界地理教科书,而是一种充满维新精神和改革主张的"微妙宣言"。它深刻影响了曾国藩、董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中国整整一代改良主义思想家,为 19 世纪 60 年代的自强运动和 90 年代的戊戌变法,奠定了根本的思想基础。

我觉得,在徐继畬这一历史性重大贡献中,他大胆公开推崇彼得大帝和华盛顿,乃是他喊出的革命最强音。

徐继畬认准彼得大帝是现代化运动的世界性领袖,赞美说他"变姓名走荷兰,投舟师为弟子,尽得其术乃归"。然后"疏通波罗的

海道，水陆皆操形势，战守攻取，疆土愈阔。峨罗斯近世之强大，实自彼得罗始也！”

而对美国的开国英雄华盛顿，更是极尽赞美之能事，高度评价说：“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封建专制社会的一位封疆大吏，不去歌颂自己的大清皇帝，却把两位西洋国主捧得老高，说人家远远超过优秀历史人物中的佼佼者陈胜、吴广、曹操、刘备而跟尧、舜、禹这些神仙似的英雄差不多。我们这位山西老乡也真够“胆大包天”的了。

公元 1852 年，徐继畬运交华盖，罢官为民，回到山西老家。对于他的罢黜，德雷克和他的美国同胞一致认为，主要原因是他写了《瀛环志略》，尤其是为他们的总统唱了赞歌。

我看这是很不全面的。

诚然，极端守旧的卫道士们一致觉得，如果不严格控制与西方人的接触，中国文明将被污染。像徐继畬这种已被“夷人”及其“奇技淫巧”所诱惑腐蚀的危险分子，不能不予制裁；他们的言论著作不能不予禁绝。徐继畬的丢官与守旧势力的攻击是有很大关系。不过，这件事的另一个主要原因，还在于清廷统治阶级上层的政治斗争所致。道光皇帝的驾崩、咸丰皇帝的继位，导致了以耆英和穆彰阿为代表的“主和派”的失势。而徐继畬是穆彰阿的学生，一直属于“耆穆集团”。所以，他即使不写《瀛环志略》这本书，恐怕也得倒台。

而令我感动、觉得有必要提一笔的，是这么一段小喜剧：徐继畬罢官十四年后，随着又一位新皇帝——同治皇帝的继位，他又官运亨通起来，回北京做了“同文馆”的总管大臣。这时候，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专门组织起一个盛大仪式，将一幅华盛顿画像赠送给徐继畬，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辞。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总统特地让国务卿请一位卓越的艺术家，制作了这幅画像，并且越过陆地和

海洋，送到你的手中。当你看着画中的温和的面貌时，请不要回忆由于你努力想使人们更多地了解华盛顿和西方各国，而遭到罢黜的十四年悲伤岁月……”

这些有意思的美国人。

在《瀛环志略》中，有两处不显眼的文字，但却使我心头一颤。徐继畬用有八卦符号的罗盘针测定欧洲的方位，判定它在乾戌方，在中国的西北，于是他即按金、木、水、火、土的五行理论下结论，说欧洲“独得金气”，所以“其土膏腴，物产丰阜”。他又以同样的中国办法评定非洲说：“阿非利加一土，以八卦方向视之，正当坤位。其气重浊，其人类颛愚。故剖断已历千万年，而淳闷如上古，风气不能自开。”

这可就露出马脚了。一面宣扬新知识、新文明，一面却掺上看家的陈货色，多么刺眼！多么矛盾！其实在徐继畬身上，矛盾之处远不止这点。他一面在《瀛环志略》中探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制度，一面却最喜欢做八股文章；一面在福建大量接触西洋朋友，一面回到山西（罢职期间）却组织民团，残酷镇压太平军的北上部队……

当然，这种“两面性”，绝非徐继畬所独具，而是他那个时代一般有维新思想的士大夫的通病。这里我想举一个更典型的例子。

就在徐继畬重新做官的那一年，清廷派出第一个正式的官方代表团，由斌椿带领去欧洲考察。团里有位年仅二十岁左右的年轻随员，名叫张德彝。他后来因为著有《航海述奇》一书而名扬天下。初到巴黎，张德彝惊奇地看到“铁裁缝（缝纫机）”、“擦物宝（擦字橡皮）”之后，忽然又看到更为绝妙的物什——“肾衣（避孕套）”。他认为是好东西，饶有兴趣地写道：“外国人有恐生子女为累者，乃买一种皮套或绸套，贯于阳具之上，虽极倒凤颠鸾而一雏不卵。”设想一

下，这位老兄当时假如有勇气把这种文明先进玩意儿带回来，加以宣扬和推广，中国人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谁知他反而无比严正地又写道："孟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惜此等人未之闻也。要之倡兴此法，使人斩嗣，其人也罪不容诛矣！所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你瞧他吓坏了，怕有违孔孟之道，怕成为始作俑者而断子绝孙。中国传统旧观念的束缚力何其巨大顽强！纵然在千万里之外，在人家欧洲文明的磁场中心，也难以挣脱。

比徐继畬、张德彝更伟大的康有为、梁启超又怎么样？既可以拿热血性命相搏，义无反顾地推进"戊戌变法"运动，也可以鼓吹帝制，组织臭名昭著的保皇会，成为中国历史进步的绊脚石。

这是整个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悲剧，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悲剧。认真研讨我国19世纪中后期的维新思想和改革运动，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我们，实在具有极为迫切的特殊意义。

读罢德雷克教授的《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我思绪纷繁，百感丛生，心里热乎乎又乱糟糟的。这正是我每每读完一本自认是好书后的正常反应。我心满意足地告别鸡毛小店，踏上归程。

我忽觉自己正在攀登一座山峰，放眼眺望大地，美丽的地平线环抱着河流村庄、绿树红花、飞鸟走兽。但我看不见地平线以外的景物。我越爬越高，地平线越往远处推移。先一阵还看不到或不易界定的景物，如今都清清楚楚地框入视野。然而我却立刻悲观绝望起来：不管我爬得多高，总有一个地平线以外的广大而未知的世界，充满神秘和引力。我对它却无能为力。哦，原来人类的知识和能力，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限制。虽说每个限制迟早都将打破，却往往得付出"毁灭人格或结构"的沉重代价。因此，悲剧在人类生命中是基本的，不可避免的。每当意识超越了能力，悲剧便会产生。但一个人的失败，可以为他人的思想和行为换取超越性的象征意

义；甚至对失败者本身来说，也可以引导他进入新的——重建其人格或深层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我渴盼着自己的下一次“悄然独行”。

1990年12月6日于“学洒脱斋”

（作者周宗奇，1943年生，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副主席。）

附记：此文原载1991年1月13日太原日报。原题为：《独行草——围绕一本洋人著作的漫议》。征得作者同意，将此文置于书末，代为本书的跋。原编者编稿手记说：“描述古今者，世人尊之为作家。考证古今者，世人尊之为学者。本文叙议兼并、人事兼及、古今兼容、中外兼顾。乡人徐继畬成书《瀛环志略》的前因后果在作者缜密谨严的推论中变得无懈可击；国人的历史局限性和民族劣根性经作者冷静而客观的分析使得读者无言以对；尤其是本文了无雕凿之痕的语言表达方式与枯燥繁琐史实二者之间所达到的那一种契合，不禁使编者陷入迷津：宗奇此人，作家乎？学者乎？”——编者

附录：徐继畬研究近年书目

《瀛环志略》，徐继畬辑著，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六年据方闻提供的日本文久辛酉版影印。精装本基本定价十三元，平装本基本定价十一元。

《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方闻编，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七年版。基本定价三元四角。

《敦艮斋遗书》，徐润第著，徐继畬校刊，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九〇年据方闻提供的道光戊申版影印。基本定价九元。

以上三种书可通过获准经营台湾书籍的书店（如各省外文书店）订购。

《松龛全集》，**《山右丛书初编》**之十四，阎锡山编，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据民国二十三年山西省文献委员会铅印本影印。定价五元六角。

《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德雷克（龙夫威）著，任复兴译，文津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

《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任复兴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以上二书可向译者、编者邮购，书价（含邮挂费）分别为人民币五元和十五元。通讯地址：山西省忻州日报；邮政编码：034000。

●编者

后记

本书遴选论文的来源是：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的27篇；会后收到的7篇；海内外刊物登载和其他学术会上宣读的4篇。编辑中注意保持以下特点：

观点纷纭。论文作者年长的与世纪同龄，年少的生于60年代，大体算三代人；肤色、国籍、文化背景、学术造诣不尽相同。有共识，也有分歧。中国近代史学多种模式风格，在文集中得到体现。

资料丰富。各位作者在论述中，引用中外资料数百种。个别不经见又比较重要的，基本是全文引用。

方便阅读。书末附有《徐继畬研究述略》，读者用十几分钟即可了解此项研究的进展及各学者的主要观点。

1995年12月4日，是徐继畬诞生200周年。相信到那时会有更多人参与此项研究，并会取得更多成果！

本书的出版，得到海内外众多人士的关心，得到山西省和忻州地区有关领导的支持。杜导正、王庆成、阮芳纪三位先生拨冗为之作序。虞和平先生审阅了全部稿件，提出许多宝贵修改意见。陈绛先生、陶文钊先生校订了英文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俊义、范明礼等先生对本书的编选出版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编者的妻子张鲜花女士承担了许多工作。在此谨致谢忱！

1993年7月22日于"圈圈斋"